

下册：1688年—现在

Volume II：1688 to the Present

英国史

〔美〕克莱顿·罗伯茨　戴维·罗伯茨
道格拉斯·R.比松 著　潘兴明等 译

A History
of England



中国出版集团
CHINA PUBLISHING GROUP
商務印書館

A History of England

Volume II: 1688 to the Present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06882-6

定价：8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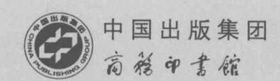


下册：1688年—现在
Volume II：1688 to the Present

英国史

〔美〕克莱顿·罗伯茨　戴维·罗伯茨
道格拉斯·R. 比松 著　潘兴明等 译

A History
of England



A History of England, Volume II: 1688 to the Present 4th ed. (ISBN: 9780132064835) by Clayton Roberts, David Roberts, Douglas R. Bisson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下册,1688年~现在/(美)罗伯茨(Roberts, C.),(美)罗伯茨(Roberts, D.),(美)比松(Bisson, D. R.)著;潘兴明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100-06882-6

Ⅰ.①英… Ⅱ.①罗… ②罗… ③比… ④潘… Ⅲ.①英国-历史-1688~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6624号

责任编辑　张艳丽
装帧设计　熊熊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41
字　　数　600千字
印　　次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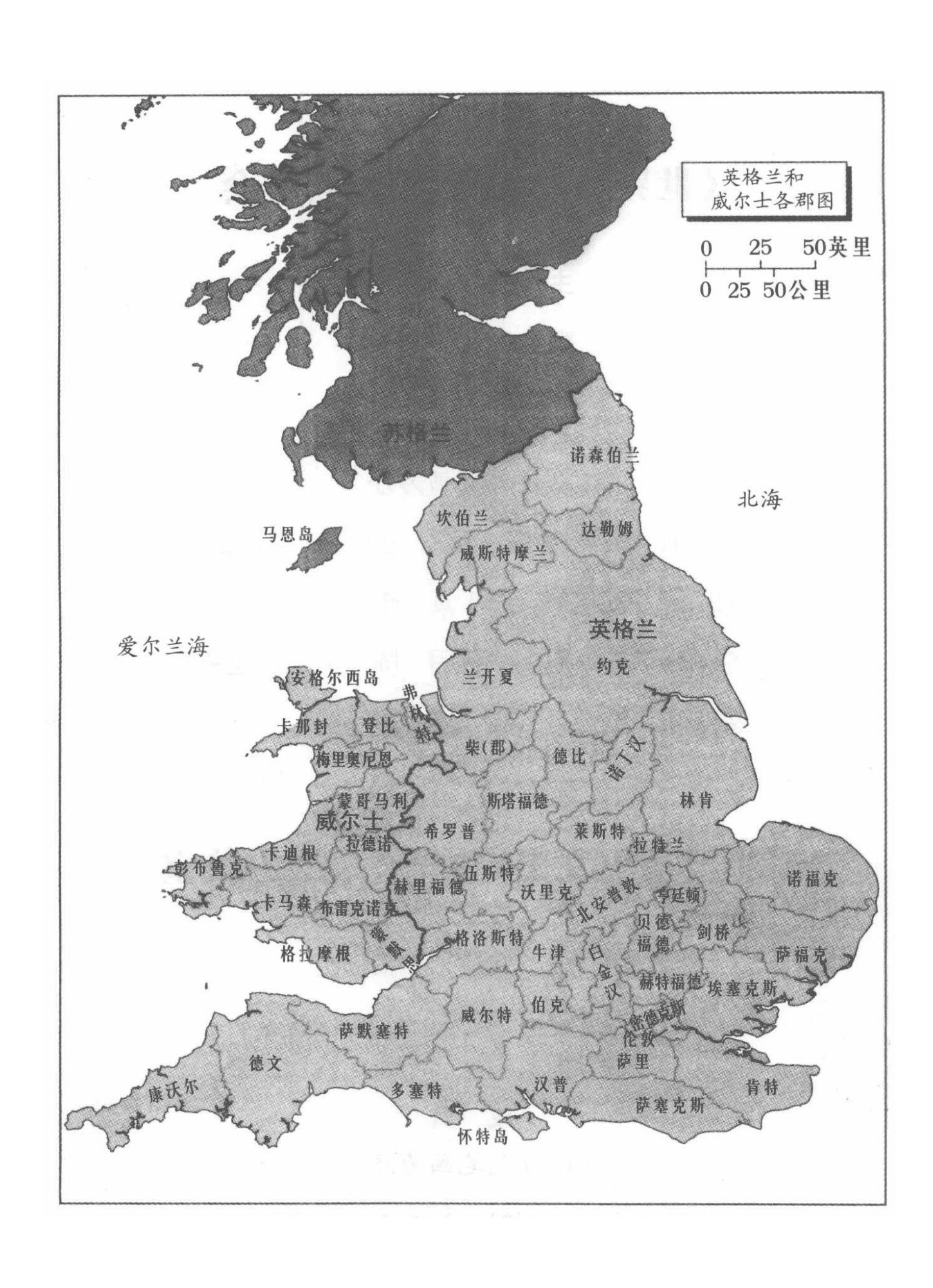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英格兰和
威尔士各郡图
0 25 50英里
0 25 50公里
苏格兰
诺森伯兰
北海
坎伯兰
达勒姆
马恩岛
威斯特摩兰
英格兰
爱尔兰海
约克
安格尔西岛
兰开夏
弗林特
卡那封
登比
柴(郡)
德比
诺丁汉
梅里奥尼恩
蒙哥马利
斯塔福德
林肯
威尔士
希罗普
莱斯特
拉德诺
拉特兰
卡迪根
彭布鲁克
伍斯特
诺福克
赫里福德
沃里克
北安普敦
亨廷顿
卡马森
布雷克诺克
贝德福德
剑桥
蒙默思
格洛斯特
格拉摩根
牛津
白金汉
萨福克
赫特福德
埃塞克斯
威尔特
伯克
密德克斯
萨默塞特
伦敦
德文
萨里
肯特
康沃尔
多塞特
汉普
萨塞克斯
怀特岛

中译本序

钱乘旦

由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和道格拉斯·R. 比松合写的《英国史》即将以中文出版，这是值得庆幸的。

英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扮演特殊的角色，中国人对英国的介绍也开始得很早。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就组织人编写《四州志》，其中关于英国的介绍有一两千字，主要介绍了它的一些基本历史知识，这些知识十分零散，也不可能全面，但这就是关于英国历史的最早的有系统的记叙。后来，关于西方的介绍逐渐增多，不少西方历史书也被翻译成中文。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最早一部英国通史译著是《大英国志》，[①] 讲述从古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历史，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他向中国人介绍英国史，意在说明英国的强盛是上帝的旨意。稍后，许多世界通史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泰西新史揽要》[②]、《万国通史》[③]、《万国史略》[④] 等等。这些著作中有大量关于英

---

① Thomas Milner, *Chronicle of Great Britain*, published by the Mission Press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56。中译本刊行于光绪七年（1881 年），译者是 William Muirhead。

② Robert McKenzie,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李提摩太、蔡尔康译，上海书店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出版。

③ J. Lambert Rees, *History of Ancient and Nations*, 上海广学会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一年（1900—1905 年）出版。

④ （美国）彼德巴利撰，金陵江楚编译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出版。

国历史的内容，比如《万国通史》30卷包括“英吉利志”4卷及“大英属地志”2卷，都是对英国及英帝国史的系统记载。当时的中国人对英国历史十分注意，原因是英国在那时的世界上国力鼎盛、称霸全球，许多中国人希望从英国的历史中找到某种启示，以帮助中国走出困境。这种意图在1907年出版的《英民史记》中说得很清楚，作述者声称：“命自东徂西，匝行一周，于文明诸国之政治，窃欲抽绎而比较之。及过英之伦敦，见其君主立宪，上下有章；日本维新，多由取材——尤我国异日之准绳”。[①] 原著者葛趚（J. R. Green，今译格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英国历史学家，他的作品扭转了迄至当时英国史学界将历史写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的一贯传统，而以普通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对象，因此具有开创性意义。《英民史记》（今译《英国人民史》）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那个时候被翻译成中文，的确有一点超越时代的味道。

民国时期译成中文的英国通史著作中，钱端升翻译的《英国史》[②]最突出。这部书的作者是屈勒味林（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他是20世上半叶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辉格派史学的代表人物马考莱的外甥，因此其作品中自然流露出辉格史学的痕迹。作为单卷本英国通史，这本书本身价值很高，它脉络清楚，文字通俗，但问题出在译文的风格离现代汉语远了一点，有点半文半白的味道，所以今天读起来，颇有费力之感。不过，与更早时期即晚清的译作（如《英民史记》）相比，其文字却已经“白话”了许多；晚清译著中的文言色彩更浓，这从上文摘引的那句话乃至书名的译法中都可以看出来。钱端升本人也是著名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和法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从美国回来投入文化和法制建设，一度相当活跃，出任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参加过第一部宪法的制定。

---

① J. R. Gree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中译三卷，译者 W. E. Macklin，李玉书“述”，上海美华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引文见第1页。

②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History of England*，钱端升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他翻译的这部《英国史》，则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指定为高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几本英国通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首先需要提到的是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1] 其内容基本限于1640—1815年之间，其实是一部英国近代史。当时，中国在各个领域向苏联学习，因此需要翻译一部苏联学者撰写的英国历史教材以供高校教师与学生使用。塔塔里诺娃的书相当典型地体现了苏联主流思想界对英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其中对一些重大事件及人物的评价（如17世纪英国革命、工业革命、工会运动等），后来都成为我国世界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法。

稍早几年，英国历史学家莫尔顿撰写的《人民的英国史》也被翻译成中文。[2] 莫尔顿是英共党员，其作品在基本出发点上接受苏联体系的指导，然而作为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他又在相当程度上把英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独特看法保留了下来。这部书从远古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地地道道的"通史"，英国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事件都涉及到了。但作为通史著作它又确实简单了一点，许多该写的内容都完全没有写，因此充其量只能算是英国历史的入门"ABC"；此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太陈旧了，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认同。挑选这部书翻译有它的时代背景，莫尔顿的英共党员身份是一个重要因素。

"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大量翻译作品，在英国通史方面，下面几部书特别值得一提：

首先是《英语国家史略》,[3] 作者是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是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算是历史学家。他一生有过多部历史著述，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

---

① K. H. Татаринова: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и* 1640—1815 *гг. Rus*，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

② A. L. Morton, *A People' s History of England*，谢连造等译，三联书店1958年第一次出版。

③ 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薛力敏、林林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

界大战回忆录》等。《英语国家史略》是关于英国与英帝国史的一部纯历史学著作，第一卷写英国史包括其殖民史，第二卷则是英帝国中其他英语国家（即白人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形成的历史。丘吉尔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观也充满保守主义色彩，他的著作以英国的壮大与英帝国的扩张为主题，无意中流露着对大英帝国的无限怅惘。但《英语国家史略》却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保守派英国通史作品，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保守主义对英国历史的陈述与解释。从这个角度看，它的出版是有意义的。

《英国现代史》[1] 是另一部保守主义史学作品，表现着英国历史学中的“正统”路径、即保守主义的诠释路径。作者梅德利科特是著名历史学家，他曾主编《朗曼英国通史》（Longman History of England），自己撰写第 11 卷即最后一卷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英国现代史》。但这只是多卷本通史中的一个部分，涉及时段是 1914—1964 年。迄今为止，我国尚未翻译过任何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著作，这让人遗憾；在英国，有影响的多卷本通史已经有好多了，如果能够翻译一两套，一定对学术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不过有一部真正的“通史”被译成了中文，即《牛津英国通史》[2]，其涉及年代从公元前 55 年一直到 1983 年，覆盖了英国历史的整个过程。主编肯尼思·摩根是当代最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而各章作者也都是所涉时段上突出的专家。在所有单卷本英国通史中，《牛津英国通史》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牛津”这两个字就体现着这种权威性。我曾向英国历史学家请教过在当代单卷本英国通史中，哪一本最得到认可，回答是《牛津英国通史》，可见翻译这本书，应该是很值得的。不过英国历史学家在回答时其实颇有犹豫，因为在他们看来，单卷本通史一般写不好，《牛津英国通史》只是更有权威性而已。

---

① W. N. Medlicott, *Contemporary England*，张毓文等译，黄席群校，商务印书馆 1990 年出版。

② Kenneth O. Morgan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出版。

然而，这本书又是很有特色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当代西方历史学理念的指导下，力图破除传统历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观察角度，“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并且力图把历史的所有维度——不仅是传统的政治、外交、战争等等，并且把生活、家庭、娱乐、心态这些最新鲜的历史内容都写出来，以图全方位地表现每一个时代的整体面貌。从这个角度说，它是一部“新历史”；也是从这个角度说，它的确写出了特色、同时写出了权威性。然而却恰恰是这个特点导致了它最大的缺点：它试图写太多的内容，但在区区一卷的篇幅中（哪怕有好几百页），又何以容纳下这么多内容？结果，所有内容都是点到即止，无法深谈，一般书中要用好几页纸才能说清楚的问题，这本书中往往只用一二小节、十几行文字。这就造成奇怪的局面：了解英国历史的人觉得书中内容很一般，没有新鲜之处；不了解英国历史的人却觉得书中内容看不懂，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总体而言，这本书只适合懂英国史的读者看，但对懂英国历史的人而言，它又太浅。所以，对想要了解英国历史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不是很适合。

还有一本通史性质的书也很重要，那就是阿萨·布里格斯写的《英国社会史》。① 阿萨·布里格斯也是当代英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其《英国社会史》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从史前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写到了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很少有其他书能超越它。不过，它终究只是一部“社会史”，它以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题，其他方面的内容（政治、外交、军事等等）则基本不提及，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英国历史的“去政治”史。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迄今为止，中国仍未翻译出一部特别适合中国读者、尤其是想初步了解一下英国历史的中国读者阅读的英国通史著作；现有的翻译作品中，有些太陈旧，有些过偏颇而太富有倾向性，

---

① Asa Brigg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有些只是断代史，有些是历史的一个纵切面，有些很有权威性但尤其不适合中国读者，有些则史学的方法与观念过时、赶不上当代学术的发展。在中国走向世界、迫切需要客观而准确地了解外国历史的今天，有必要翻译一部适合中国人阅读、由英国历史学家撰写的英国通史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和道格拉斯·R. 比松合写的《英国史》中译本问世，它正是这样一部合适的英国通史作品。

译者潘兴民教授从事英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他除了自己著述之外，亦有丰富的译作经历，比如参加 E. P. 汤普森的史学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翻译工作。潘教授译文流畅，释义准确，对于目前这部《英国史》而言，他是合适的译者——对于这一点，读者可从中译本中看出来。商务印书馆的王明毅先生和张艳丽女士为这部书的出版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为此应该十分感谢他们！

2010 年 1 月，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第十六章　战争与社会[1]

408

由于威廉率军入英并不仅仅是为了夺取英国王位，他的主要目的是使英国加入对法作战，打破原有均势，因此，光荣革命使得英法作战不可避免。这一点在1689年5月便已相当清楚了。当时，威廉以英王的身份，在英国议会的支持下对法宣战。这场战争直到1713年才告结束（其间从1697年至1701年曾有过短期休战）。在威廉和安妮统治英国的25年中，英国在21年里处于战争状态。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英国陆军的作战区域遍布爱尔兰和佛兰德、多瑙河两岸、西班牙平原以及阿卡迪亚的波特雷约港和梅诺卡岛（Minorca）的波特马思港等。英国舰队则在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大洋公海上对敌作战。英国在欧洲大陆保持了4万作战军队，建造并派出了323艘军舰（并提供水兵），还往西班牙派遣了9000兵员。此外，英国供应本国军队的军需给养和资助盟国的开支，每年超过500万英镑。

动员如此庞大的力量去作战，对英国社会的影响相当明显。因为战事，议会每年召开，并成为英国政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战事，国王的行政机构用人越来越多，效率也越来越高。因为战事，许多新的财政机构应运而生，并将英国的有产阶级一分为二：土地利益

① 本书上下册重复第十六章，英文原版如此。——出版者

集团和商业利益集团。同时，商业价值观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并有助于塑造英国文明。在参战之初，英国不过是一个二流的欧洲列强，英格兰与苏格兰分而治之；其政治还不够稳定；对殖民地的控制还不够牢固。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已成为欧洲第一流的大国，与苏格兰完成合并；取得政治上的稳定；从此走上了强大帝国的道路。英格兰变成了大不列颠。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内乱和革命后，此时进入另一个世纪的和平和稳定。

409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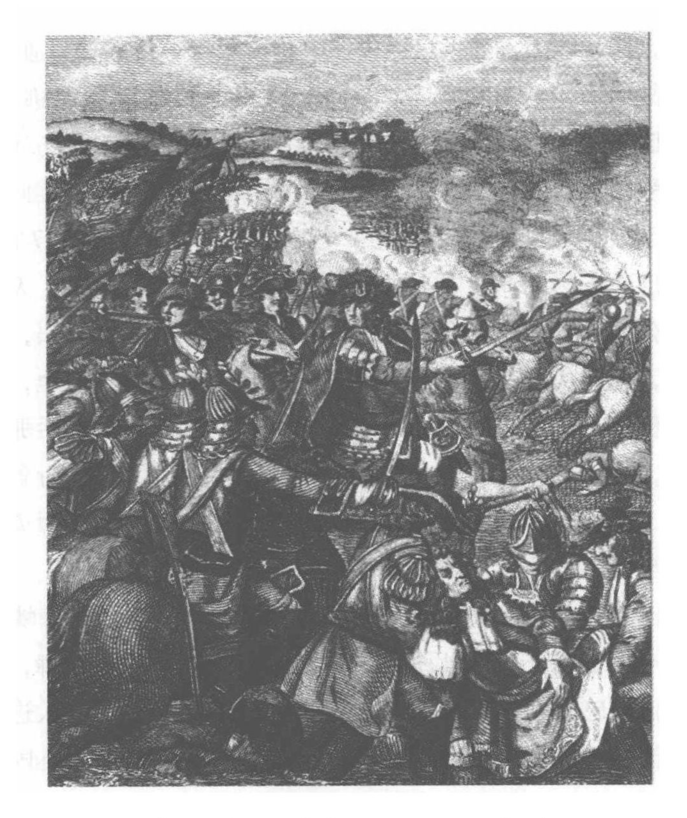
1667 年，路易十四的军队侵入西属尼德兰；1672 年，进攻荷兰；1681 年，攻下斯特拉斯堡；1688 年，将巴拉丁夷为废墟。这些行动使威廉不得不专心将其朝政重点转向遏制法国在欧洲的势力。同时，法军的入侵也逼使欧洲列国——奥地利、西班牙、瑞典、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巴拉丁于 1689 年结成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并于 1689 年与荷兰和英国结盟，全力抗击法国。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担心法国过于强大会危及欧洲的自由。但英国对法宣战，还另有原因，即路易十四曾于 1689 年 3 月向詹姆士二世提供兵员、金钱和船只，使他能重返爱尔兰夺回失去的英国王位。因此，对于英国人来说，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也是英国王位继承战争。

在爱尔兰登陆后，詹姆士二世发现爱尔兰人更热心于夺回被克伦威尔夺去的土地，却并不热心帮助他夺回英国王位。他们所标榜的政治纲领是“爱尔兰属于爱尔兰人”，他们所倡奉的口号是“要么现在就干，要么永无机会”。爱尔兰议会废除了《1661 年土地解决法》（Act of Settlement of 1661），并没收了 2400 名逃亡英国的新教徒的土地。北爱尔兰的长老会派教徒没有逃走，他们到伦敦德里和恩尼斯基楞的城垣里避难。他们的顽强抵抗，抗住了爱尔兰人的围攻和袭击，替威廉保住了北爱尔兰，并给他提供了一个基地。因此，威廉得以在 1690 年夏统率 35000 名纪律严明的军队南下追击詹姆士的 21000 名武器很差、军心涣散的败军。爱尔兰人组成的军队兵员数目处于劣势，

机动性差，作战能力不强，最终未能阻止英军于7月1日强渡博因河。第一个从战场溜走的是詹姆士本人。一星期之后他又乘船逃往法国。他的临阵脱逃，导致了爱尔兰人在博因河战役的失败。这场战役成为新教收复爱尔兰的决定性战役。在此后的20年中，英国人实际上将爱尔兰人置于奴隶的境地。占人口4/5的天主教徒只拥有1/7的土地。一系列的刑法条例，剥夺了天主教徒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公职，不能在议会中拥有议席，不能在选举中投票，不能担任陪审员，不能从事司法业，不能开办学校，不能购买土地，也不能拥有一匹价值超过5英镑的马。而且，爱尔兰人，甚至包括那些勤劳的新教徒，都不得向英国出口呢绒或牲畜，或与殖民地进行贸易。按照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说法，爱尔兰成为英国征服者的“砍柴挑水的伙计”。

1690年爱尔兰是欧洲的焦点，而到1692年，英吉利海峡取而代之。1692年，路易十四从比奇角的一次海战胜利中得到鼓舞，准备入侵英国。他在巴弗勒尔集结了一支军队，詹姆士二世也加入进来。但是，一支派往英吉利海峡清扫目标的法国舰队在拉奥格被英国和荷兰联合舰队击败。当时英荷联合舰队以99艘一线战舰对法国舰队的44艘军舰，占有明显的优势。法国损失了15艘军舰，路易从此不再派出舰队作战。海上力量的优势使英国避免了法国入侵的危险，正如从前腓力二世用西班牙舰队发起进攻，以及后来拿破仑和希特勒企图以大军强渡英吉利海峡时的情形一样。 410

博因河战役和拉奥格战役的胜利，保证了新教徒对英国继承权的控制，战争也削弱了法国在佛兰德的势力。路易十四打了胜仗，但未能赢得战争。威廉不是一员善战的战将，但却能够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来补救他在指挥用兵方面的缺陷。打到第六年，英荷联军抵住了法军的压境之势。这一年，联军方面攻占了法方的要塞那慕尔。这一要塞的陷落以及法国财力的衰竭，迫使路易十四于1697年签署了《赖斯威克和约》（Peace of Ryswick）。路易承认威廉为英王，归还1678年以来他所占领的除了斯特拉斯堡以外的所有疆土。



博因河战役的浮雕（*Bettmann/Corbis*）

411

财政革命

在那慕尔的围困和攻坚战中，英军的作战开支均来自新组建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这个银行的成立，标志着英国财政方面的革命。

在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英国政府的年支出约为200万英镑；到威廉和安妮统治期间，约增至600万英镑。国库日益增加的巨额支出，靠政府用各种手段搜刮全国人民来维持。于是，一个人口不满600万的国家，竟能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并供给战场上巨额的军需。这笔应付作战的费用，2/3出自政府税收，以土地税为最大宗。每年，由全英地主所选举的议会通过法案，规定英国地主收取的

地租，每英镑必须拿出 4 先令缴给政府，这等于现在缴纳一笔 20% 的所得税。从筹钱——作战的重要资源来看，英国君主立宪制度比法国专制王朝的效率要高得多。

政府通过借款来解决因税收不足以供给的那部分战时预算。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两个君主，在政府筹款紧急之时都曾向富人借钱，而以王室岁入作为偿还担保。这种借款都是短期性的，利息很重，对国库后来的收入不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长期借款，由议会在预算的收入作为担保，出借者应当是全国各个阶层的富人。1693 年，英国议会便筹划了这样一笔借款，由议会通过法案，授权出售终身年金公债票，用一种议会规定征收 99 年的国税担保。实际上，这种公债政府不还本只付息，年息为 14%，一直支付到持票人去世为止。1693 年法案是英国有永久性公债的开端。任何国民，只要有几镑余款；都可购买公债。比如，诺里奇的教长当时便一时兴起替他的女儿买了一笔这种年金公债。

随着 1694 年英格兰银行的创立，这种发行永久性公债的办法取得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创建国家银行的主意，来自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erson）。他是一个苏格兰农民的儿子，后来在伦敦经商致富；他游历荷兰，研究了荷兰人的银行制度；也到过美国，其朋友说他在美传教，其敌人却说他在那里干海盗勾当。将帕特森的银行构想变为立法的，是一位能力高超的辉格党议员查理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他在议会指导了有关议案的通过。这项立法规定设立一家银行，并由银行借款 120 万英镑给政府。而政府每年付给银行 8% 的利息，并授权银行出售股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发行货币。这个构想一经实行即告成功，12 天之内，民众将银行的全部股票抢购一空。在这之后的数年里，银行发行的货币保持了币值的稳定，政府把银行视为未来筹集资金不可缺少的来源。

英格兰银行是英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但不是最早的银行。最早 412 的私有银行出现在 1650 年代。当时伦敦的金店已经接受客户存放金银，同时将其部分借出，以收取利息。金店接受存放金银的收据开始像钞票一样在市面流通。到 1675 年，银行家开始行使银行的三种主要

职能：吸纳存款、放出贷款、发行货币。在银行的这些职能之外，那些从事财产转让业务的中介经纪人增加了第四项职能：提供抵押贷款。不久，政治家发现，由于银行提供的贷款增加，发行的货币增多，促进了新企业的创办，因此增加了贫困者的就业机会。在1690年代，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借贷和流通媒介，新创立的英格兰银行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威廉三世统治时期财政革命的第三步就是成立证券交易所。此时股票经纪人已经在交易巷的乔纳森咖啡馆和盖拉维咖啡馆从事买卖公司股票或政府证券的活动。因为许多经纪人销售假股票或成倍出售股票牟利，议会在1697年便把经纪人的人数控制为100人，并规定销售政府债券的经纪人必须在政府注册登记。此后虽然还有人在小册子上写文章骂“股票贩子”，但没有这些贩子就没有资本交易市场。

且战且和的政治

那些达成革命妥协的人并没有打算规定议会每年开会，而是至少每3年开一次会。但在战时需要的情况下，威廉不得不每年召集议会，以让议会通过税收和借款法案来取得军需供应。威廉对于议会的依赖，对英国宪法的演进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政党斗争炽热的局面下。正直的人斥责党争过分激烈，但他们却无法消除此风。在威廉统治时期，下院投票的分组名单（即议员对讨论问题的投票的分组名单），须在连续8次投票中得到保持。从这种名单中可以看出，有85%的议员，专投辉格党的票或专投托利党的票。这种党派分野，并不是随便形成的，议员由于社会身份地位和政治原则主张而分成不同的党派。大多数乡绅属于托利党，但不是所有的乡绅都是，否则辉格党就永远赢不了选举。大多数商人和银行家则属于辉格党。托利党主张严惩非国教徒；战争规模仅限于海战；王位世袭制神圣不可侵犯，其中许多托利党人认为王位属于斯图亚特王朝。辉格党则主张宗教宽容；欧洲的战争应该是陆上战争；恪守光荣革命所达成的革命解决。

威廉三世的愿望是当英国全民的国王，而不仅仅是辉格党的国王。

所以，他组织政府时选用不同党派的人，或是两党成员，或是无党派人士。但是1690年辉格党过于强烈的党派狂热，驱使威廉从1690年到1692年转而起用托利党。然而托利党不能有效地保护英国的海运，反对陆上作战的态度越来越明朗化，而且无法掌控议会。他们的无能为辉格党提供了机会。辉格党左右了议会，他们一步一步地逼迫威廉，要求将高级官职授予自己。到1696年，内阁成员是清一色的辉格党人。政府内部的顾问从此替代枢密院（Privy Council），成为政府权力的中枢。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政府。 413

1697年，通过谈判，向来把外交大权紧操在手的威廉缔结了《赖斯威克和约》。和平的到来，对于辉格党人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样一来，托利党正好鼓动乡村地区议员们反对辉格党，这些人痛恨发战争财的王室亲信。宫廷和乡村的分野，在威廉统治时期的政治活动中与辉格党与托利党两党的分野一样重要。一位议员惊呼：“‘如果从天国来的一位天使说他是枢密院大臣，那么我不会放心将自由放在他手中，哪怕是片刻之间也不行。”这样的猜忌之风，使议会在1698年拒绝批准威廉拥有超过7000人的常备军，因为常备军被看成是暴政的工具。同样，它也使下院在1701年弹劾辉格党的内阁大臣，因为他们未向议会咨询就开始条约谈判。同年，议会还在《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此案规定由汉诺威王室继承英国王位）里加上一章保障自由的条文：任何在国王手下任职并领取薪金者，不得担任下院议员；所有枢密院通过的决议，都必须经各枢密院大臣签署；法官的罢免，须经议会上下两院正式提议；议会通过的弹劾案，不得申请特赦。虽然议会在1705年撤销了这些条文中的第一、第二条，使内阁制政府能够在英国发展下去，但在1701年这两条居然能通过，可见当时乡村贵族对王室的不信任到了什么程度。埃利奥特（Elliot）和皮姆（Pym）的精神尚存。 414

1698至1700年间，托利党人通过煽起乡村贵族对宫廷的怨火，终于把辉格党人赶下了台。1700年秋，威廉不得不用托利党的头面人物组阁。但这时他的主要精力都转到了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已无

心于国内的这些党争了。《赖斯威克和约》对那痴愚多病又子嗣断绝的国王查理二世死后西班牙王位如何继承未作规定，于是，威廉和路易十四续订了两个分裂西班牙国土的条约。其中的第二个，是将西班牙本土及其殖民地，以及西班牙所属的尼德兰划归于奥地利要求入继西班牙大统者；而将那不勒斯、西西里、米兰划归于法国要求入继西班牙大统者。英国商人痛恨这个条约，因为它将地中海划入法国的势力范围。但这个条约从未生效。

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于1700年去世，他生前留下遗嘱，将整个西班牙王国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腓力（Philip, Duke of Anjou）。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这个遗嘱，和平了事，否则不仅西班牙国土要分裂；而且还要引来一场血战，但威廉却不同意。路易十四挑起一连串蛮不讲理的事端来促使英国舆论主战。他派法军入驻西属尼德兰，占据荷兰要塞，又强迫西班牙人与一家法国公司签订将非洲黑奴输送美洲的合同，并拒绝要求腓力做出永不入继法国王统的诺言。这样，欧洲的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英国公众深感不安。但使英国人更为担心的，是对英国纺织品在西班牙、尼德兰和地中海市场的威胁。

1701年夏，威廉巧妙地使英国议会采取对法开战的立场，又在9月与荷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缔结盟约。在此之前数星期，路易十四在詹姆士二世临终的榻前，宣布承认其子詹姆士三世为英国国王。路易的这一行动，决定了所有的英国人——不论托利党还是辉格党——将团结一致与他决一死战。可是，威廉却没有机会再率领英军踏上对法作战的疆场。1702年2月，他在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公园骑马时，因马踏入鼹鼠洞而将他摔在地上。两星期后，威廉撒手人寰，他与路易十四的终身殊死决斗，将由后人来完成。

415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詹姆士二世之女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于1702年继承英国王位。此时她已37岁，肥胖得有些超常，脸色红润且多雀斑，患有痛风，行登极加冕礼时竟要人抬去。她既笨拙平庸，又脾气执拗、心胸

狭窄；但她信教虔诚、明白事理、秉性仁慈。她生有子女 15 人，都死在她辞世之前。她笃爱教会，也倚重捍卫教会的人。但她对艺术、音乐、戏剧和书籍都不喜欢，唯一的爱好是吃东西；而她丈夫的爱好，则是喝酒。这样一个普通女子，经英王继承法登上王位后，却对在位期间的时局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是 1702 年任命马尔伯勒伯爵（Earl of Marlborough）为英国军队统帅；第二是 1711 年罢免了他的统帅职务。首举为英国带来了重大的军事胜利；次举使英国得到了和平。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约翰·丘吉尔（Joha Churchill），即马尔伯勒伯爵（后封为公爵），发动 4 次战役，指挥了 4 场大战，围城 30 余座。在这么多次的战斗——包括围城战和遭遇战中，他从未败北。他是历史上的名将之一，能征善战这绝非偶然，因为他从小就选定了戎旅生活。他的父亲是一个忠于王室的富农，因为替查理一世打仗而失去所有土地。所以马尔伯勒一贫如洗，前程叵测，但却雄心勃勃。他通过自身魅力进入宫廷任职，而且他具有迷人姿色的姐姐成为约克公爵詹姆士的情妇也对他大有帮助。他在军中不断晋升，则因为英勇过人、战术高超。他在马埃斯特里赫特（Maestricht）为路易十四作战，深谙法国用兵之术。马尔伯勒通过在塞奇穆尔（Sedgmoor）战役击败蒙茅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证明了他在战术方面的天赋。在 1689 年沃尔科特（Walcourt）战役中，他与荷兰军队并肩作战。在 1690 金塞尔（Kinsale）战役中，他表现出了出色的战略视野。马尔伯勒除了精通军事之外，还擅长宫廷政治和外交手腕。他长相英俊，温文尔雅，讨人喜欢，善于辞令，折人以柔，从不发火。然而他也诡计多端、虚情假意，从不轻易吐露真言；他还抓住一切机会为家人利益谋利。在威廉三世时，他曾经失势；但在安妮女王登位之后，他又东山再起，1678 年与萨拉·詹宁斯（Sarah Jennings）结婚，而她正是女王的密友。

马尔伯勒接任盟军统帅之时，正是欧洲战争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他的军事天才，使英国进行战术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但不幸的是，法国却没有这么做。这种变化，基于三点技术上的创新：第

一是燧发毛瑟枪、第二是纸装子弹；第三是带插槽枪刺。燧发毛瑟枪比旧式火绳枪轻好几磅，每10发只有两发死火，发射的进度比旧式枪快8倍，约每分钟两发。纸装子弹，是预先装好的弹药，包恬火药和一盎司重的铅弹，它简化了装弹的步骤。带插槽枪刺，士兵用枪既可发射，又可刺杀，这意味着不再需要旧式长矛。马尔伯勒看到这些创新使步兵成火力发射点，而不再像在旧式战场上那样只是构成拒敌兵阵。于是他将步兵队形排成3列，前后交错，以便全排同时放枪。法

416



《安妮女王》(1665—1714)，油画，帆布画，长199.4厘米，宽128厘米，威廉·维兹（William Wissing）创作(*Scottish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Edinburgh, Scotland.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军则仍用纵队队形，排成4排或5排，只有前排放枪。法军所用的马队战术，也是旧式队形。马尔伯勒则采用了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us Adolphus）和克伦威尔的战法：马队以全速向敌阵冲击，以冲击力冲散敌阵，然后用刀枪砍刺敌兵。法军仍将骑兵视作流动的火力，他们在冲到离敌阵约30步远，才用手枪射击。这种战术使法军在布莱尼姆（Blenheim）战役中伤亡惨重。

马尔伯勒在战略上也有创新:40年来,欧洲战场上采取的邦足围攻战。经过围攻攻下一城之后,再围攻另一城。按这样的速度,需要30年时间才能打下佛兰德。马尔伯勒则好打运动战,直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公爵画像》，油画，帆布画，阿德里安·梵·德尔（Adriaan van der Werff）创作（*Palazzo Pitti, Pitti, Florence, Italy.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1704年，发动运动战的绝佳机会到来。巴伐利亚加入法国一方参战，给维也纳造成了威胁，连奥地利能否继续留在大同盟（Grand Alliance）之内也成了问题。马尔伯勒决定驰援奥地利。由于他一向极为关注给养问题，也由于有英国的黄金做后盾，他率兵急行250英里横越欧洲，自尼德兰直抵巴伐利亚。他佯装直赴摩塞尔河，令法军一时不敢轻举妄动，然后突破莱茵河，直赴巴伐利亚。在海德堡，他发给每名士兵一双预备好了的新鞋，先将当地的巴伐利亚军队驱入奥格斯堡，然后转而迎击由塔拉尔元帅（Marshall Tallard）统领下追击自己的法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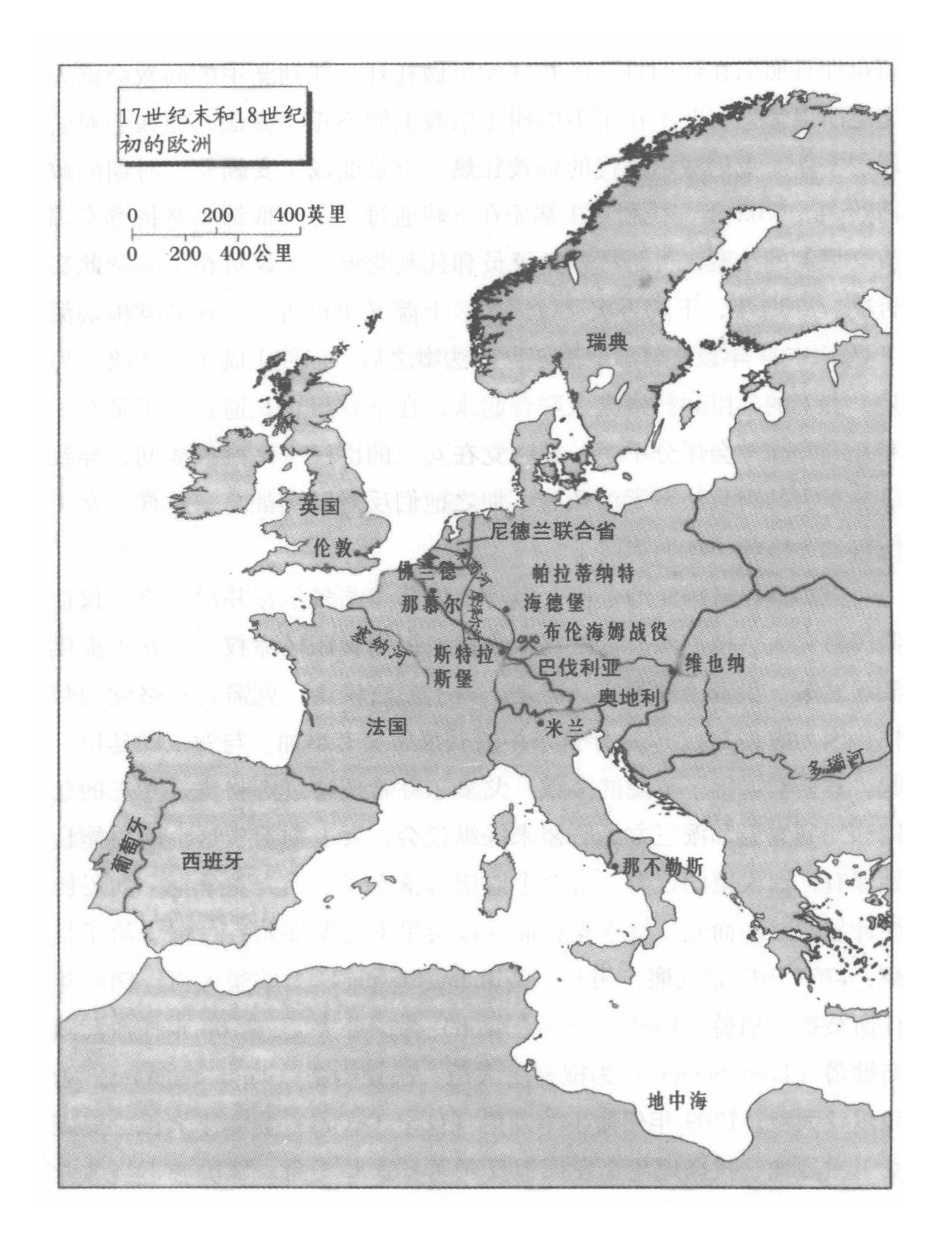
当时塔拉尔元帅的兵力是56000人，而联军只有52000人，但寻求战机的是马尔伯勒而不是塔拉尔。8月13日，在多瑙河岸的布莱尼姆村，马尔伯勒发动了攻击。他先以强大兵力猛攻该村以使法军从中央调兵前来增援，用16个营的兵力缠住法军的27个营；到傍晚时分，又以81个骑兵中队和18个营的步兵猛攻法军的中央阵地，而这时法军中央只有64个骑兵中队和9个营的步兵。于是法军中央阵地崩溃，英军直趋多瑙河畔，将大部分法军团团围住。不到天黑，已消灭2/3的法军，并俘虏了法军统帅。布伦海姆战役结束了法国军队所向无敌、称雄欧洲40年的优势，拯救了维也纳，维持了大联盟，令马尔伯勒的英名威震整个欧洲。

418

胜利之后的政治

战场上获胜的代价是一年900万英镑的支出。筹措这笔巨款的任务落在戈多尔芬伯爵西德尼（Sidney, Earl of Godolphin）的肩上，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官员，一位机敏过人的财政家，一名不顾一切的赌客，一家赛马养育场的经营者。他通过借债得到了款项的1/3，其余的2/3即600万英镑则出自议会。这就触及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如何使议会成功地运作。女王起初依靠的是托利党的内阁大臣，而他们能得到以托利党人居多数的议会的支持。可是，托利党的高教会派（High Church Tories）对非国教徒的打击越来越凶，托利党人对远征欧陆的战争热情也越来越低落，不久女王的施政方针就失败了。

420



托利党高教会派最痛恨的就是不能一贯坚持尊奉国教会惯例的做法，这使非国教徒能够规避《宣誓法》的约束处分。这一法律规定每年参加在国教会教堂举行的圣餐礼少于两次者，不得担任国家或市镇公职。非国教徒的做法便是依法每年在国教会教堂领圣餐两次，然后

每星期日照旧在他们自己的礼拜堂里做礼拜。托利党中的高教会派人士之所以愤怒，并不在于不能纠正宗教上的不正当做法，而在于对公职的垄断。克伦威尔时代的宗教狂热，于是变成了安妮女王时期的政治热潮。1702 年，托利党极端派在下院通过了一个取缔不坚持尊奉国教会惯例的法案，可是辉格党议员和托利党温和派议员在上院将此案否决。1703 年，下院再次通过原案，上院又予以否决。托利党极端派于是于 1704 年设法将原案附于财政法案之后，以使上院无法否决。但是，女王的廷臣和辉格党人联合起来，在下院阻止其通过。于是女王和托利党高教会派分手了。托利党在女王的臣民中间挑拨离间，导致供应军需的财政法案无法通过，加之他们反对欧洲战事，这样，女王便再也无法任用他们执政了。

虽然仰仗辉格党的合作，但马尔伯勒和戈多尔芬并没有将大权让给辉格党人。他们两人依然实权在握，控制官职任命权，向女王提供治国之策，负责治理国家。但是，为了左右议会，就需要辉格党的帮忙，因为辉格党在 1706 年选举中所获议席又有增加。与女王的廷臣一起，辉格党取得了下院的多数。戈多尔芬希望通过辉格党、女王的廷臣和托利党温和派三方的联盟来操纵议会；女王则希望这个联盟能让她保有任命大臣的权力。这两个愿望都落空了，因为党争把一切妥协性计划都一扫而光。辉格党答应在议会里支持戈多尔芬，但得给予报酬：1704 年任命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为掌玺大臣；1706 年任命桑德兰伯爵（Earl of Sunderland）为国务大臣；1708 年任命萨默斯勋爵（Lord Somers）为枢密院大臣、沃顿勋爵（Lord Wharton）为爱尔兰大臣；1709 年任命牛津勋爵（Lord Oxford）为海军大臣。安妮女王激烈地、执拗地甚至发疯地反对所有这些任命。她决心不当政党的囚徒。可是，到 1709 年，她却只得服输。在 1708 年的大选中，辉格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她别无选择。对于执掌钱袋的权力和政党精神的结合，任何王室特权都抵挡不住。

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政党贯穿于政治之中。从 1702 至 1714 年，当选的议员共 1064 人，其中只有 71 人明确归属托利党或辉格党。激

烈的党争之风从议会里一直吹到乡村、城镇、伦敦市、教堂、军队、咖啡馆、剧院、报馆以及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的人分成互相对立的派别。政党的主要后果，就是政治权力掌握在选举中获胜、从而取得议会下院多数的那个政党手中。

下院所代表的是英国社会中范围狭小的精英，这类人均拥有财产，主要是拥有土地。议员来自的社会阶层，仅占英国人口的0.5%。即使如此，连挤满了下院的开会地点——圣斯提文斯教堂——坐席上的乡下士绅们，仍然抗议偶尔挤入他们中间的军官或商人。为了将这些人拒之门外，他们通过了《1711年财产资格法》（Property Qualification Act of 1711），规定乡村议员每年必须拥有价值600英镑的地产、市镇议员每年必须拥有价值300英镑的财产。实际上该法的规避并不困难，其方法是新议员可临时将土地转到自己名下。

那些拥有议员选举权的人要更多些，但依然属于精英阶层。拥有选举权的人只占全部人口的4.3%，大约每5个成年男子中有1个。其中许多选举人是有地佃农，他们在选举时由地主召集前往投票站，市镇的有绝对影响力的贵族同样召集居民前往投票站。在议会的513个议席中，其中大约有120席由显贵人物指名选出，有20个是由国王提名选出。在若干选区中，某个托利党或辉格党家族往往对本选区议席的控制十分牢固，选举中根本没有竞争者。在安妮女王当政时，每年大选中经竞选产生的议席只有约100席。不过在这些竞选中，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争斗还是十分激烈。

乡绅在地方政府的权力之大甚至超过在下院的权力。乡绅作为治安法官，控制各郡法庭，掌握司法、行政及征税大权。1688年的革命告诫国王不要干预地方政府的事务。在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曾竭力夺取政权。马车夫、皮革商人和屠夫的子孙都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却恢复了富有阶级的统治，英国成为一个寡头政治国度，财产权的神圣取代了君权的神圣。

商业新世界

寡头政治统治下的这个社会因商业而富裕起来。这个商业新世界

422

的中心是有50万人口的伦敦。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是桅杆林立之所。在泰晤士河以外的海上，东印度公司的巨型船只从印度运回茶叶，使英国成为一个饮茶国度。海船从北美运回水獭毛皮，可以用来制时髦绅士们的帽子；运回的烟草，可以装满他们烟斗；从地中海东岸运回咖啡和棉花；从非洲海岸运回象牙和染料木；从波罗的海运回苎麻、沥青和木料。一年到头有苦力从纽卡斯尔把煤运来，这种贸易在17世纪中增加了3倍。那种狭尾帆船与旧式船相比，可以多装货而少用船夫，在北海能够和荷兰的平底船相媲美。到1700年，在伦敦登记的船只总吨位达14万吨。伦敦的居民，每4人中就有1人以海为生。

尽管伦敦是当时的商业中心，但该城未能像在都铎王朝时代那样称霸商界。伦敦的商人拥有总吨位为14万吨的船只，但伦敦以外各港商人的船只总吨位达18.3万吨。例如布里斯托尔港，每年有240条船出入，把英国工业制成品装运到各殖民地，然后运回烟草和糖。埃克塞特以出口毛纺织品而成为生意兴隆的港口。利物浦以加工提炼出自西印度群岛的粗糖而赢利致富。英国进口殖民地产品，特别是烟草，然后将其重新出口，此类出口贸易几乎要占英国出口总额的1/3。以往有一个时期，英国由于过于依赖对北欧的贸易而陷入危险境地，现在英国则成为一个世界转口贸易中心，其进口物资有1/3来自美洲、西印度群岛和东方。贸易量也有增加，进口每年增加140万英镑，出口每年增加230万英镑。但真正令重商主义者欣喜不已的是在同时期中，英国由每年入超300万英镑变成了每年出超600万英镑，英国此时已经拥有贸易盈余。

英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虽然很大，但其国内贸易额还要大三倍。货船和驳船装载谷物、煤炭、食盐、砖块和铁，从一个港口运往另一港口，并转运到内河上游。纺织品依然是英国的主要的制成品，纺织品的生产依然是按国内市场体系组织起来的。但是泰恩河上的熬盐业、默西河上的煮糖业、康沃尔的熔锡业、伦敦的蒸酒业、纽卡斯尔的玻璃制造业都已成为半工业化的社会。到1700年时，这些老工业已经解决了如何用煤而不用木炭去熬盐、煮糖、熔锡、蒸酒和烧玻璃的问题。

这也就解决了英国缺乏木柴的难题。1709 年，一位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贵格会教徒、铁匠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发现了用焦炭（将煤置窑内烘烤，除去杂质后而成）炼铁的办法。后来，他的发现将使炼铁业发生变革。不过在当时，促使英国制造业进步最大的是在宗教上的宽容，而不是工业技术上的进步。1685 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于是 15000 名胡格诺派教徒被赶出法国，他们大都是工艺方面的能工巧匠。他们逃到伦敦，住在斯比塔尔非尔兹、索霍（Soho）和巴斯那尔格林等区，替英国的贵族、乡绅、商贾和律师们制作大户人家喜欢的各色用品，如水晶、精制纸、刀剑、钟表、精密仪器等等。尤其斯比塔尔非尔兹的丝业织造的丝绒、缎匹和织锦等，正是一个讲究风雅的时代所需要的。

商业精神渗透到整个英国社会。连地主乡绅们也从事经济活动。约翰·劳瑟爵士（Sir John Lowther）在他的怀特黑文田庄上生产小麦，也生产煤。托马斯·福利（Thomas Foley）是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创立家业的大户，就在自己的田庄上开铁矿。不是所有地主的土地上都有煤和铁，不过他们大多数都能生产木材、羊毛和木材，并卖给工业制造者。乡绅们会因为喝多了大杯的十月酿造麦酒而诅咒商人，但是塔维斯托克侯爵（Marquis of Tavistock）会毫不在乎地娶乔赛亚·蔡尔德爵士（Josiah Child）的孙女为妻。蔡尔德爵士初为酿酒商，后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是英国当时的最大富豪之一。她的孙女是他的继承人。另一方面，发了财的商人也购置地产，跻身上流社会。

423

股份公司的发展，使所有富裕阶层——宫廷大吏、大户地主、殷富律师、高级教士——都投资英国的商业。1688 年，全英国还只有 15 家股份公司，到 1696 年，已经超过了 100 家。任何人都可以投资于大股份公司，如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或哈德森湾公司，也可以投资经营火药制造、铸铜、铸造凹槽刀剑或者从汉普斯泰德运水到伦敦的公司。其中最幸运的，是那些威廉·菲利浦公司的投资者。该公司是一家打捞公司，当时正打捞一艘沉没在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附近的西班牙运金船。这一公司打捞起的金银，与德雷克（Drake）掠夺

回来的一样多，它给投资者带来的收益是每投入 1 英镑得到 100 英镑的回报，投资回报率高达 100 倍。

英国商业和制造业体系，牢固地建立在农业相当可观的财富之上。17 世纪，每英亩小麦的产量已经和现在差不多。1720 年，奶牛每天产奶 1.33 加仑，与现在相差无几。自中世纪直到 17 世纪末，谷类和牧草的年产增加约 4 倍。牛羊畜牧的增加幅度更大。总的来说，自 1400 年至 1700 年，农业生产增加了 5 倍。中世纪的农业很难养活 300 万人，而 1700 年，英国提供了 500 万人的食粮，还有出口。

农业生产率获得巨大增长的原因在于 1560 年至 1720 年发生的农业革命。这一革命的关键是田地永耕制（但每三年休耕一次）和牧地永牧制被耕牧轮替制所取代。按新法，在一块田地上，农民可以种小麦或大麦 4—5 年，接着种牧草 7—8 年，然后再恢复耕种粮食。这样的轮耕，可以保持土地的肥沃，虽然不能增加谷类的产量，但养分丰富的牧草能增产许多。畜牧业生产得到提高，乳产品和牛羊肉大增。农业在采用耕牧轮替制的同时，还进行其他改良。如芜菁和苜蓿草在田里播种，使农民在冬天也可以饲养牲口。永牧草场通过灌溉，牧草的产量更高、品质更好。东盎格利亚和范兰等地的沼泽地通过将水排净，肥沃的土地得以利用。泥灰、沙子、石灰和肥料都施在田地里以增加地力。牛羊等牲畜的选种也有改善。在这一时期，科茨沃尔德绵羊得到改良：腿变短，骨架增大，这样可多长肉（获取的利润的不在于羊毛而在于羊肉）。所有的这些改良都是英国农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终结了中世纪在英国普遍发生的饥荒。

424

社会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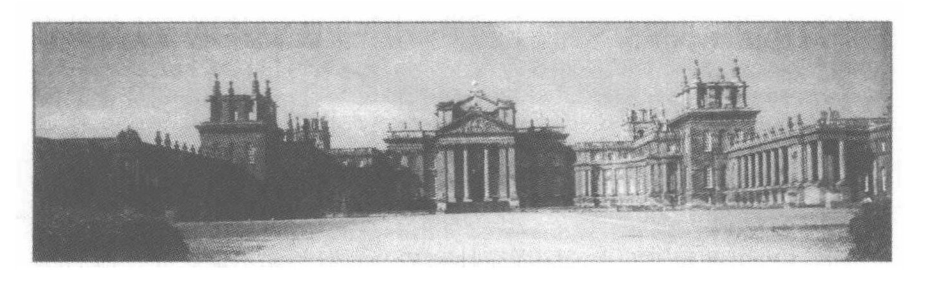
通过劳动和勤奋所得到的财富，按照一种非常不平等的形式分配给英国的 500 万人口。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其新颖之处在于“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的产生，即可以对财富分配进行定量分析。最杰出的政治算术家是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他是利奇菲尔德一位测量师的儿子、水平高强的数学家、有天赋的统计师和级别不

高的公务员，对许多奇怪的事情都有浓厚兴趣。在威廉三世在位期间，他以图表形式描绘英国的社会结构。

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160名贵族（noblemen，平均年收入为2200英镑）和26名主教（年收入从布里斯托尔主教的360英镑到达勒姆主教的6000英镑不等）。贵族们用他们丰厚的收入建造乡间豪宅，雇用成群的仆役，享用豪华的大餐，购买意大利名画和法国家具，到伦敦过冬，在赌场一掷千金。

贵族之下是中上阶层绅士（gentry），从男爵到爵士、乡绅、绅士排列，共约16400人。其中最富的年收入约2000英镑，穷的仅200英镑，平均为354英镑。乡绅们从事的业务是卖出粮食买进牲口，休闲活动有打猎射击和饮酒等。他们说话往往带有地方乡土口音，其图书室里除了《圣经》和福克斯的《殉道录》之外，其他书甚少。他们很少到伦敦去，但一到那里便引人注目，因为他们那没有袖子的古式上衣颇与众不同。他们中较阔绰者也建豪宅，式样多为雷恩式，其特点是简单、美观。这种建筑的墙饰以嵌板代替挂毯，框格窗高达5英尺，取代了伊丽莎白式的竖框窗。他们的太太则大量收集购自东方的瓷器。

绅士之下是自耕农，他们耕种自有土地，但没有获得封授纹章，也不敢自称绅士。格雷戈里·金称他们为英国的自耕农，人数约有16万。境遇较好的，平均年收入为91英镑，较差的则平均为55英镑。 425



布伦海姆宫，英国巴洛克风格，约翰·范布勒（John Vanbrugh）设计，国家斥资为马尔伯勒公爵建造（*John Bethell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埃尔特姆小楼——一幢普通的乡村房屋，建造于17世纪晚期（*Topham Picture Source, Edenbridge, Kent,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这一阶层之下为15万农民，他们是握有租约的佃农，平均年收入约42英镑。乡绅们是看不起这两个阶层的。为了表示鄙夷，他们在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自耕农岁入在100英镑以下者，不得打猎，即使在自己的田地上也不行。这就是说，山鹑鸟得专门留给绅士们射杀取乐。

比自耕农人数更多的是格雷戈里·金所称的雇工（laboring people）和役工（outservants）。他们在田地上劳动，受雇于自耕农和农民。其数目约364000户，每户平均年收入约15英镑。

这些农民和雇工的生活同样简朴和辛苦，但并非不堪忍受。他们吃小麦面包多于吃黑麦或大麦面包，每星期至少吃两餐烤肉，而且当牛肉价格降到2.5便士1磅、羊肉2便士1磅的时候，吃肉的次数会更多。他们还没有学会喝咖啡和饮茶，但是喝的啤酒却多得很，每天2—4品

脱。他们的村居干净、整洁，常使外国人为之赞叹。他们每天工作的时 426
间很长，从田地劳作回来后疲惫不堪，于是虔诚的信徒责备他们以疲乏为由连祷告也不做了。童工是常见的，而且受人鼓励。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常赞扬哈利法克斯附近一带很少有4岁以上的孩子游手好闲。男人在田里干活的日工资是8—22便士，这点钱供养妻室子女是不够的。所以他们的妻子要做梳理羊毛的工作，每天挣9便士，孩子做纺毛线的工作，每天挣4便士，这样一家的生活才能过得好些。

像今天一样，经商是发财的途径。当时，农业方面300万人每年的总收入为2500万英镑（每人约8英镑）；而商业方面30万人每年的总收入1000万英镑（每人约33英镑）。按照格雷戈里·金的统计，约2000名业绩突出的商人每人每年约赚400英镑，另外2000名商人每人每年约赚198英镑。开店和经商的人总共约5万户，每户每年约赚45英镑；工匠约6万人，每人每年约收入38英镑。城市专业工作是致富的第二条路，律师每年收入154英镑，有名的教士每年收入72英镑，地位稍逊的教士每年收入50英镑。海军军官每年收入80英镑，陆军军官60英镑。普通水兵每年收入只有20英镑，陆军士兵为14英镑。政府的高级官员每人的年收入240英镑，地位较低的官员为120英镑。他们是除了普通水兵、士兵和农民阶层之外，在英国新积累的财富中的获益者。

处在金字塔的底层的是40万户茅舍农（cottagers）和贫民（paupers），他们是最大的也是最穷的阶层；平均年收入每户6英镑10先令。所谓"茅舍农"与"贫穷"几乎是同义词，茅舍只是一座陋室或茅屋，周围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地产可言。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曾把茅舍农称为"有房子的乞丐"。因为在18世纪早期，田庄上几乎没有固定工作可做，所以他们只能靠侵占公地维生，他们在这里养鹅、伐木和偷猎。他们生活的不足部分通常不得不靠领取教区贫民救济金和得到私人慈善救助来弥补。前者每年可提供约90万英镑，后者每年可提供约20万英镑。两者合在一起，可向每个贫民每年提供约1英镑，而且分配得很不均匀。这点救济仅能使他们免于

冻死和饿死。每个教区总是设法拦阻其他教区的贫民混入本教区。根据《1662 年土地解决法》（Act of Settlement），对于打算在一个教区定居者，如果该区觉得他会成为累赘，就可将他遣送回原教区。丹尼尔·笛福认为，解决这个可怕的贫穷问题的办法，不是靠慈善救济，而是靠安排贫民就业。东印度公司董事、经济学家乔赛亚·蔡尔德爵士甚至提议政府买地建工厂，安排贫民做工。他的提议未得到响应。

文学艺术鼎盛时代

伦敦是英国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新生的中产阶级的文化中心。在这里，人们聚集在他们喜欢的咖啡馆里谈天说地，在餐馆里吃饭，阅读《观察家》（*The Spectator*），谈论新上演的话剧，欣赏新上演的意大利歌剧，采购马甲、领巾和假发（那时甚至商人也戴假发）。伦敦的市中心此时已经西移，因为富豪搬离旧日的城区，以及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皮卡迪利（Piccadilly）和圣詹姆士广场等地建造起连排住宅楼。克里斯托弗·雷恩在伦敦大火之后，曾提议在伦敦重建一条条笔直而宽阔的街道，这些街道在一个星形的广场处交汇。这就是法国在路易十四王朝所实行的圆形辐揍（*rond-point*）模式。但查理二世思考几天之后，拒绝采纳这个提议。伦敦在 17、18 世纪对城市规划的贡献是广场、花园或空旷方地，四周环绕若干私家建造的外形相似的房子。这种住房大都是砖房，高度划一（3—4 层），朴实无华。临街的墙面装有框格式窗户，每层都有，上一层的比下一层小，依次递减。法国的圆形辐揍模式反映的是专制君主的万千威仪，而伦敦的广场则反映英国绅士阶级的财富、权力、出色的鉴赏力和独立性。

427

在查理二世统治时，英国人把咖啡说得一无是处，"因为它既不合营养之需，又无助放纵之兴"。可是到安妮女王在位期间，伦敦开了 500 多家咖啡馆。人人都有他特别喜欢光顾的咖啡馆。时髦人士爱去圣詹姆士街的怀特咖啡馆、诗人到威尔咖啡馆去喝咖啡和巧克力饮料，学者喜欢光顾希腊咖啡馆。商人到劳埃德咖啡馆填写海运保险单，而股票经纪人则在乔纳森咖啡馆做股票交易。在咖啡馆里，地位显赫

的贵族随意与身份低微的绅士攀谈，各界人士在这里得知最新的国内外新闻。

伦敦的剧院晚上6点钟开门。在安妮女王时，伦敦有两家剧院：林肯律师学院广场一家，德鲁里巷一家。随后在1705年，约翰·范布鲁（John Vanbrugh）在海伊市场（Hay Market）又建造了一座剧院。他是一名军人、剧作家、未来的布伦海姆宫的建筑师。剧院名为女王剧院亦称意大利歌剧院。虽然文艺批评家们认为意大利歌剧“毫无意义，只不过唱腔悦耳而已”，但是它在安妮女王时期风靡伦敦。英国本身也产生了作曲家，最有名的是亨利·柏塞尔（Henry Purcell）。但柏塞尔也不免受意大利影响。在他的歌剧《狄多和阿尼亚斯》（*Dido and Aeneas*）中，他将音乐的表现能力与戏剧的展示功能都融合在戏剧之中。在整个欧洲，音乐带来一种新精神，世俗的旋律取代了宗教的曲调。

尽管托马斯·贝特顿（Thomas Betterton）笔下哈姆雷特王子颇具感染力，但戏剧在威廉和安妮统治时期并未兴盛起来。上演的剧目大多数是复辟时期剧作家写的那种风俗喜剧。这种戏剧情节灵巧紧凑，内容玩世不恭，难登大雅之堂，以致教士们指责剧院不道德，政府指控演员们邪辟诲淫。在这期间，戏剧界的风格由复辟时期的华丽虚饰和玩世不恭变为18世纪喜剧的讲求道德和注重情感。

安妮女王在位期间的文学艺术的鼎盛时代被称为“奥古斯都时代”（The Augustan age），这个称呼是因为这个时代在文艺方面成就巨大，堪与罗马奥古斯都时代匹敌。这不是戏剧的时代，也不是诗歌的时代，而是散文的时代。它的代表性的文艺体裁是新闻报章、小册子和评论文章，这些都是1695年撤销了《颁发许可证法》（Licensing Act）后，所产生的新自由的成果。这样，作家只要不违反诽谤和叛乱法，就可以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安妮女王登基之后不出数月，英国的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The Daily Courant*）问世。到这位女王逝世之前，英国报纸的发行总量是每星期7000份。但是当时的报纸每日一大张两面排印，只刊载新闻和广告，没有社论，当时只有政治

428

小册子和评论简讯上才有社论。在编写政治小册子和评论简讯的作者当中，最著名的是丹尼尔·笛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笛福文笔辛辣地抨击宗教专制，《对付非国教徒的捷径》（*The Shortest Way with the Dissenters*）一文使他招致了枷手示众的刑罚；而斯威夫特在《同盟者的行径》（*The Conduct of the Allies*）一文里严厉谴责荷兰人的文字，帮助英国在1713年取得了和平。在八年时间里，笛福一直编写《评论》（*The Review*），争取人们加入温和派的队伍；斯威夫特前后两年编写《评论》（*The Examiner*），劝人投向托利党。文字笔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大的威力，因为政客们从来没有这样需要左右舆论。而控制议会就需要依靠舆论。

斯威夫特和笛福迎合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和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则迎合了人们对社会的兴趣。理查德·斯蒂尔曾当过救生队长、剧作家、剧院经理以及商业计划的策划人，他在1709年开始办《闲谈者》（*The Tatler*），1711年创办《观察家》。他说服了他的朋友约瑟夫·爱迪生为两份出版物写文章。爱迪生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生性羞涩的学者、助理国务大臣，颇有文学天赋。这两份出版物很快取得成功，因为它们嘲贬种种恶行，褒扬种种美德，教诲那些新发财的绅士、商人、律师和公务员们如何行事、如何理财。

《观察家》旨在改良当时社会的风习，提高英国社会男女的道德标准。该出版物认为人具备出色的认识能力，要比拥有渊博的学识更为重要；同时人的美德要比客套重要。它讥笑人的鄙野粗俗，嘲弄决斗；规劝人们不要走向政治偏执，也不要陷入宗教狂热；主张"理智应当控制情绪"；赞美诚实，认为诚实高于出身高贵所带来的矫揉造作："商人和我做一笔我丝毫不懂的买卖，若能正直无欺，就有资格做一名绅士。他比那些给我虚假希望的宫廷大臣或笑我不学无术的学者，更有资格做绅士"。《观察家》又把欧洲大陆贵族们"奴颜婢膝又盛气凌人"的做派与英国绅士们愿把幼子送去经商的做法相比较。这份刊物，一方面是做人的圭臬，一方面又是写文章的范本。它的散文

既严谨又灵活，行文优美、润饰得当、简明易懂。这种文字风格，完全适合于一个欣赏理性、睿识、优雅和庄重的时代。

同样的精神也渗透进了宗教。在宗教方面，高教会教派教徒对非国教徒的愤怒，掩盖不住国教会中温和宽容的精神（不久被称为宗教自由主义，Latitudinarianism）的滋长。在牛顿和洛克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重视基督教中的理性方面。人们也开始追求一种有现实意义的神学，从中人们能够学会如何生活。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一群教士们创建了礼仪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该会大力减少人们的诅咒和酗酒的不良习气，但做得更多的是促成了英国星期日的单调乏味。甚至贵格会教徒也变得不那么锋芒毕露，把其精力从扰乱礼拜转移到账房内的工作上。正如非国教徒的代言人笛福所说，我骑马走遍了英国，发现“人生的主要工作”乃是“赚钱”。

429

婚姻、求偶和家庭

公共生活在历史书里占重要地位，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与他们的私人生活相比，公共生活显得微不足道。在私人生活之中，没有一件事比男婚女嫁更为重要。在 16 世纪的英国，在与土地有关的阶层中，选择伴侣是父母的事，父母依据家世、财产、势力和名誉等方面的考虑作出决定。家庭世系必须延续下去，家里的财产必须增加，政治上的同盟必须稳固起来，社会地位的下降必须避免。这种制度留给子女们谈情说爱的时间就很少了。新娘新郎的第一次谋面大都是在结婚之后。有一位侯爵夫人的女儿写道：“像我这样的人就如同奴隶那样被卖掉。”

这种婚姻安排制度逐渐走向衰败，原因一则是新教教义力主男女结婚必须有感情，二则是 17 世纪重视个人自由．三则是 18 世纪的讲求人心境情感。这种变化缓慢且并不一致。那些拥有大地产的贵族们拘守旧式婚配方式最久。但是，改革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1660 年，议会废除了婚姻关系拍卖庭（Court of Wards），即由王室拍卖无家长的贵族子女的婚配权的法庭。1680 年，女权运动的热烈的倡导者阿夫

拉·贝恩（Aphra Behn）猛烈攻击婚姻安排制度。1705年，丹尼尔·笛福谴责“保全财产的婚姻”无异于强奸。约瑟夫·爱迪生则主张求偶时间应该长些。到1700年，大多数乡绅和富商的子女便拥有了否决父母所选定配偶的权利。到1800年，他们已拥有选择配偶权，而把否决权留给父母。这一改变使求偶成为必要的过程，使之很快予以确定。18世纪出现了简·奥斯汀（Jane Austin）的小说所描写的那个世界，那里充满了舞会、牌局、茶会、聚会等社交场合和伦敦和巴斯的社交季节。



上流社会的求爱场面，蚀刻画，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创作（*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Elisha Whittelsey Fund, 1959. [59.533.117]*）

在当时，英国并非所有男女都会成家立业，而已结婚者，年纪也往往相当大了。贵族的女儿的平均结婚年龄，16世纪是20岁，18世纪是23岁。乡绅的拥有继承权子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从16世纪的21岁，升高到18世纪的28岁；而他们的幼子的平均婚龄，在18世纪则升至30岁以上。幼子迟婚的原因，既在于自由择偶风气的到来，也在于他们上中学大学的年限延长了，而且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攒够结婚所需费用。有很多一直未能赚够这笔费用的幼子，只能终身不娶。他们这种做法，使当时老处女的数目大为增加。16世纪，地主阶级女儿独身的比例是5%；到18世纪，增加到25%。因为社会地位高，所以她们不肯做工，有的宁可到姐妹家当管家，有的则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430 靠一小笔养老金过活。

在16、17世纪，店主、工匠和自由农阶层的子女们在择偶方面所享受的自由比富家子女要稍大一些。但是，如果涉及财产继承问题——像家里开有一店或据有一纸佃约，则父母的控制权就大了。到18世纪，这种控制也减弱了，中产阶级的下层人家的子女，常常自由择偶，甚至无须父母的允许。无产的穷苦人家，青年男女有选择对象的自由，父母几乎丝毫不加干涉。中下层人家的求偶几乎成了摆样子装门面的事，而婚姻的动机则是慎重的。穷人除了酒色，别无其他娱乐，他们在求偶方面很少受到约束，正如当时婚前怀孕的数字所显示的那样。凡在结婚之后8个半月或不到8个半月就分娩的情况，均属于婚前怀孕的范围。根据16、17世纪的纪录，在所有初次怀孕者当中，婚前怀孕者在20%以下，而到18世纪则上升到40%。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在 431 1620年至1720年间，认为订婚便可性交的看法复活，但这些婚前怀孕者，有许多人是在婚前很久就怀孕，这只能解释为当时对婚前性交的道德、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约束都降低了。清教运动的崩溃减少了道德上的约束，教会法庭的没落减少了法律上的约束，而无地者能在乡村工业就业又增加了这方面的机会。结果，这导致18世纪的贫民阶层里，有许多新娘在婚前就和自己未来的丈夫发生了性关系。

结婚之后，新娘就完全服从她的丈夫。父权至尊主义风行于16、

17 世纪。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说：在法律上，“夫和妻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夫。”他们的财产和子女，都属于丈夫一人。这样，妻子应绝对服从丈夫，对丈夫要礼遇恭敬，和丈夫之间必须保持某种距离。妻子要称丈夫为“先生”，而丈夫则称妻子为“夫人”。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国家，更加强了女子的服从。新教教义将家庭里原由教士负责管束的一切宗教道德方面的责任，全部交由丈夫负责，家庭祈祷代替了教堂里的忏悔。文艺复兴时代的国家认为对父亲的尊敬，是对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的一种保证，与对君主的忠诚的意义相当。难怪詹姆士一世会称自己是“人民的政治父亲”。在中下层人民中，婚姻被看作经济的结合，妻子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她的丈夫往往把她看成仆人而不看成伙伴。在贫苦的劳工阶级里，妻子往往终日辛劳，还要挨丈夫的殴打。

18 世纪时，在富有的阶级中，一种夫妻之间的更加亲密、更有感情、更平等而较少家长父权那一套的婚姻出现了。这是一种伴侣式的、夫妻之间彼此直呼其名的婚姻。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种伴侣式婚姻在工匠和商人中间已相当普遍，此时扩展到了上流社会。促成这种伴侣式婚姻的原因甚多：宗教热诚的减退令家庭祈祷减少，从而削弱了父权。有关宗教宽容的信念和对于个人意识的尊重，促进了家庭中的个人自主性。光荣革命推翻了国家的父权，因此维持家庭中父权的合法性更加困难。当时社会上对各种虐待的反感日增，激起人们对殴打妻子行为的抨击。1782 年，一位法官想恢复丈夫打妻子的法理，只要板子厚度不超过大拇指即为合法，结果激起了公愤。但最有力影响力的是女子教育的日益普及。约翰·密尔顿写道：夫妻之间进行高质量的交谈，婚姻才会美满。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说，受教育才能保证交谈的高质量。1600 年时，女子能够签名者与男子的比例是 1：8，到 1750 年，变成 1：2。而到了这时候，大量寄宿学校培育出许多精通历史、诗歌、法语、音乐和舞蹈的女子。

432 人们性态度的改变与婚姻方面的改变并行不悖。中世纪神学家对

性曾大加贬斥，认为一切性皆不洁，而视处子之身为理想楷模。新教改革者们则以神圣的婚配代替了对处子的理想，认为《圣经》之圣训，主张多子多福。但是新教神学却谴责一切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性行为，认为不能受孕的性行为是不正当的，例如女子已经怀孕之时的性行为。以下性行为应予禁止：口交和手淫行为；避孕行为，最常用的是“性交中断法”；婚姻中情爱的表达，神学家们认为这无异于通奸。实际情况与这些限制也许相去甚远，但在这个时代，还有别的障碍会妨碍性生活的高度满足。例如个人卫生的缺乏、疾病的频繁袭扰、对裸体的害羞，对怀孕的担心等，都会抑制性生活。但是到 18 世纪，限制过多生育的愿望和及时行乐的观念，在上层社会里带来了性解放。这种新享乐主义，将性快乐和妊娠的功能区分开来。作家们，如阿夫拉·贝恩、曼利夫人（Mrs. Manley）、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和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都毫不掩饰地颂扬性的快乐。从 1675 年起上层阶级的人开始实行避孕节育。伦敦的书店很自由地发售黄色书刊和图画。但这种新享乐主义大都是为男子而设的。在这几个世纪里，如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中一样，人们对性的态度采用双重标准。新娘在新婚之夜应当是处女，而男子是应当有点性经验的。对男子而言，私通和淫乱都被视为小节问题；而对女子来说，这样的行为则被视为最大的耻辱。

这种双重标准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上层阶级中未婚的男子和淫乱的丈夫，都能够在较低阶层的女子如女演员、服饰店女、侍女和妓女等等中找到性伙伴。穷人的淫乱和卖淫，保持了上层女子的贞洁。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这种淫乱甚至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便已经存在。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埃塞克斯郡的 4 万名成年人中，有 15000 人曾经在宗教法庭被指控有性犯罪行为。这就是说，那时候每 4 个成年人中有 1 人因犯奸淫、私通、乱伦或同性恋罪而被法庭传讯。而伊丽莎白女王治下英国非婚生子的比率是 4%。17 世纪，在清教徒传道的压力下，性道德的标准渐严，私生子的比率下降至 1.5%。但到 18 世纪，淫乱性行为和卖淫又兴盛起来。非婚生子的出生率 1760 年升至

4%，1780 年代达到 8%。伦敦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性行为的场所：有私人供养的情妇、有高级的幽会场所、有普通和特别的妓院、还有当街拉客的妓女。各个阶层的男子都光顾妓院，因为日益增加的单身汉和晚婚男子的存在，对妓女的需求越来越大。贫穷将年轻女子推入妓院，按照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的定律："贞节与贫穷不可相容"。贫民性放纵文化的泛滥也促使妓女的人数日益增多。许多
433 妓女是未婚母亲。妓女的年龄从 15 岁到 22 岁不等，平均为 18 岁，当时没有超过 22 岁的妓女。她们既卑贱又痛苦，前途无望，是英国人中最值得怜悯的阶层。

繁衍后代是结婚的主要目的。地主阶级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因为嫁女所需的一份嫁妆足以使家庭破产。贫苦的人家不愿意生孩子，越少越好（因为抚养他们成人，实在是很艰难的事）。在 16、17 世纪，父母并不懂如何抚育婴儿，常常是哺乳期过长，断哺较今日为晚，也不训练婴儿大小便的习惯。但在某些方面，又比今日的抚婴方法严格。例如，为避免腿被折断、眼被抓破或耳朵被撕掉，婴儿在初生的 4 个月全身都被紧紧裹住，即所谓的襁褓法。

一旦小孩脱离了婴儿时代进入童年时代，他或她便转入另一世界，一个循规蹈矩、保持距离、尊重长辈、唯命是从的世界。上层家庭的孩子见到父母的时候很少，他们在婴儿期有奶妈哺养，长大一点有保姆和家庭教师照管，到了约 10 岁时，便送往寄宿学校由教师管教。下
434 层社会的儿童也在同等年龄被送出去当家仆或学徒。那个时代的童年时代不但意味着恭顺服从，还意味着要饱受严酷对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教主义（Puritanism）造成的，因为原罪说将摇篮里的婴儿看作罪人。他们认为必须打破小孩的原有意志，教他们服从上帝的告诫，将他们培养成为有德行的人，否则就不可能在世界上创造一个上帝治下的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父母和老师教育儿童所用的办法不是奖掖诱导，而是体罚，此外还用死亡、地狱等等来恫吓孩子，制造心理恐怖。当时的儿童读物，充满了如何惩治罪人的内容。当时人们甚至相信老师可以用鞭笞的办法教儿童学拉丁文。最常见的对犯错儿童

的体罚方式，是将之按在一条板凳上用一束柳条抽打臀部，直到流血为止。学徒们也常受师傅同样的体罚。清教徒对待子女办法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关心子女的未来，而不像以前那样对子女漠不关心。

在18世纪，这一严酷的景象改变了。家庭里出现了温暖、热情、亲切、欢笑和宽容。襁褓让位于较宽松的衣物，母亲亲自哺乳而不用奶妈，加强了母亲与婴儿之间的感情。较亲密的称呼，如“妈妈”和“爸爸”，代替了“先生”和“夫人”这类的称呼。诸如在父母前跪下或垂手站立等表示恭敬的象征性动作，也逐渐消失。儿童读物中令人感到愉快的内容，取代了神罚恫吓的内容。玩具店到处都有，能换衣服的娃娃大量地生产出来。做父母的也开始控制家庭的规模，以便拿出钱送儿子受教育，为女儿准备嫁妆。父母越来越多地在家里教育孩子，以避免在学校受到体罚。学校的严酷体罚也减少了，出于学业缘故而鞭笞学生的情形渐渐少见。引起这种改变的原因甚多。约翰·洛克为此提出了一个思想前提，即人并非像加尔文所说的那样生而有罪，人生来是一块空白的白板，有利的环境会在上面写出美德。这种看法，加上这个时代日益壮大的个人主义，把所谓教育子女的目的是打破其意志的旧说斥为荒谬。此外，18世纪的理想如追求幸福和培养情操，都不可避免地使家庭里具有更多的快乐和亲切。最后，反严酷行为运动不仅导致奴隶贸易的废除和斗鸡的取缔，而且也导致了鞭笞的消失。

这些变化最先出现于城市中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家庭，但随后就传播到乡绅阶层，最后传至贵族家庭。对于下层人家，这些新思想的影响较小，他们大都是非国教徒。这些人家渐渐也重视子女，但家长专制仍然没有改变。在茅舍农和工匠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常常相当粗暴，但他们又把子女看成经济上的财产而加以重视。在最贫苦阶层的家庭里，父母对子女常常漠不关心和使用家庭暴力。他们能用到子女干活时便利用，不能利用时便不把子女当一回事。因为忽视而致死的儿童，在18世纪的死亡儿童中占很大比例。那种新的、亲切和愉快的家庭氛围，在贫苦阶层的家庭中非常罕见。　435

苏格兰合并法

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一部公法可能就是《苏格兰合并法》(Act of Union with Scotland)，使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摒弃了许多世纪以来的争端。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苏格兰是极端主义（fanaticism）的表率。在复辟时期，苏格兰恢复了被克伦威尔废除的议会。但这个议会听命于在爱丁堡的枢密院，而这个枢密院则由查理二世从伦敦遥控。查理二世运用他的权力恢复了主教制，强迫长老会派废除《庄严盟约》（Covenant，一部由苏格兰人立誓定下的捍卫其教会的神圣盟约)。由于不愿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宣誓法》规定，有1/3的教士（接受盟约的教士）离开教会，到僻静的山地或茂密的树林里去主持宗教活动。政府派民军进行镇压，盟约派进行激烈的抗击，揭竿反叛，随后政府残酷地将之粉碎。英政府虽然不允许苏格兰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独立，但将苏格兰人所不想要的经济独立硬加给他们。根据《航海法令》（Navigation Act)，苏格兰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也不得参与英国沿海贸易。

诚然，并不是所有苏格兰人都拥护盟约派，因为这派教士暴政与国王的暴政同样令人恐惧。但是，所有苏格兰人都反对詹姆士二世的罗马天主教的阴谋。因此，当詹姆士将军队调离苏格兰去抵抗威廉时，在爱丁堡的政府的权力尽失。于是，一些苏格兰人立刻南下要求威廉在爱丁堡召集一个立法会议。1689年3月，立法会议召开，通过了与英格兰的《权利宣言》相类似的《权利声明》（Claim of Rights)，但内容更加激进。例如英格兰的《宣言》称詹姆士“退位”，苏格兰的《声明》则直截了当地说他“废黜”。立法会议也强迫威廉重新确立了长老会教会，废除了条例和章程制订委员会（Lords of the Articles)，即国王用以操纵议会的委员会。在数个世纪以后，苏格兰人第一次享受了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独立。

虽然不受操纵的议会振兴了苏格兰的政治生活，长老会教会也平息了苏格兰的宗教纠纷，但苏格兰的穷困依然如故。100万人民仅仅

靠耕田种地和有限的本地商业过活。苏格兰的农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没有资金投到土地里面。由于土地的短期租约和租佃权不稳定，耕种方面的改良就不可能做到。苏格兰的人均财富只有英格兰的1/5。苏格兰人最大的愿望便是能有机会加入英格兰的商业帝国，但是英格兰人却一直将他们拒之门外。苏格兰人于是决定自行创建他们自己的商业帝国。1695年，他们创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通商。1698年，这个公司在巴拿马地峡上的达连（Darien）创建了一个殖民地。他们希望能够从这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商业。这个很多人投资的达连计划；结果化为泡影。公司将殖民地建在一个沼泽地中心，运去的羊毛和《圣经》都是当地土人所不需要的东西，同时又得罪了当时英格兰的盟国西班牙。疾病、破产和西班牙的大兵压境最终结束了新殖民地的寿命。苏格兰人于是看到了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与英格兰合并，从而享受《航海法令》的好处。

436

1667年、1670年和1680年，苏格兰人曾经要求过这样的合并，但都被拒绝了。此时他们找到了一把可以打开英国商业帝国大门的钥匙。1703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保证法》（Act of Security），规定议会在安妮女王去世时开会，选择王位继承人。如果英格兰事先不答应苏格兰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通商，英格兰不得为苏格兰挑选继位人。《保证法》的通过，迫使英格兰人不得不考虑，或者要一个一直与本国为敌的独立的苏格兰国家，或者要一个合二为一的国家，保证充分的贸易互惠。

英格兰人选择了贸易互惠。1706年，安妮女王经双方议会同意，指派代表就《合并条约》进行谈判。这个条约体现了明智和妥协精神的胜利。两个王国合二为一，共尊一位君主，共有一个议会，其通过的商务法律，适用于“大不列颠”的全体居民，大不列颠便是这个新王国的名字。苏格兰虽然放弃了她的议会独立，但她保有自己的法律，与英格兰普通法（Common Law）大不相同，同时该条约保证永远保有长老会的地位与特权。大不列颠王国的国税和海关税将予以统一，但考虑到苏格兰的贫穷，条约规定苏格兰的土地税仅为英格兰的

1/40。

英格兰议会几乎未经任何辩论就批准了条约，但条约在苏格兰议会引起激烈的争斗。苏格兰舆论反对条约，直到长老会看到条约对他们教会提供足够的保证后态度才转变。但是最后决定权还取决于苏格兰议会。1707 年，苏格兰议会终于批准了条约。英格兰人投入的金钱无疑使批准过程产生了作用，但贿赂并不是条约获得批准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经济利益。苏格兰的商人想与殖民地通商，苏格兰的地主想把小麦、牲口和煤运到英格兰，他们掌握了足够的议席和足够的势力，促使苏格兰议会完成了对条约的批准程序。他们的如意算盘没有落空，因为《合并法》使苏格兰在 18 世纪享受了史无前例的繁荣。

乌特勒支条约

辉格党内阁这些年来最具建设性的成就是《苏格兰合并法》，而最具破坏性的失败就是 1709 年对法和约的落空。问题出在西班牙那里。1703 年，英国为确保葡萄牙依附大联盟，曾允诺谈和之时决不会将西班牙留在法国波旁王朝控制之下。于是，"没有西班牙便没有和约"成了英国的口号，并禁锢了辉格党人的思路。到 1707 年，这种想法已不合时宜，因为这一年法西联军在阿尔曼萨（Almanza）战役取得胜利，永远断绝了查理二世和来自奥地利的王位争夺者取得西班牙王位的希望。次年，马尔伯勒元帅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而在 1709 年法国又遭受了多年来人们记忆中最惨重的霜冻。已经破产的路易十四甚至答应将西班牙王位让给查理三世。但是，当英荷方面要求他派遣法军进入西班牙，将他的孙子菲利浦五世驱出马德里时，他却拒绝了，他说："如果非打仗不可，我宁愿和我的敌人打，也不和我的儿孙打。"于是，盖特鲁登堡（Getruydenberg）的和谈破裂，劳民伤财的战事又延续下去。

1710 年，英国厌战气氛愈加强烈，安妮女王也越来越厌烦辉格党。不但乡绅们在重税之下呻吟，海运和贸易也受到损失，像在威廉

437

统治下的战争时期一样。从1702年5月到1709年圣诞节，英国丧失了1146条商船。全国主和，而辉格党却将战事拖下去。这时，他们又犯了一次政治策略上的严重错误：提出弹劾亨利·萨切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的议案。萨切弗雷尔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贵格会派教士，提出弹劾的理由是他有一次讲道中攻击光荣革命的原则。在审判庭上，辉格党律师揭露了被动服从的谬误，上院裁定萨切弗雷尔有罪，但仅仅罚他停止讲道3年。事实上，这样的判决等于宣判无罪。此案审讯拖了很久，审讯所引起的关注和最后的宣判结果，都引起了人们对辉格党和非国教派的不满，舆论转而拥护国教派和托利党。

就在此时，一位名叫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的人为自己找到了进入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后门的门路。他在威廉统治时期是一名乡村辉格党人，1701年当了下院议长，安妮女王当政后，成为托利党内阁的国务大臣，是一位擅长于操纵下院的政客。哈利获得女王的恩宠后，就以权术致使女王不动声色地把戈多尔芬和辉格党人的权力一一解除。8月，女王罢免戈多尔芬，9月又罢免辉格党的阁员，哈利本人当上了财政大臣，其他阁员的位置由温和派托利党人担任。这些事件充分表明女王手中握有实权。哈利必须替女王把下院搞定，否则便不能保全自己的职位，而他在秋天必须面对的，正是一个辉格党的议会。于是他劝说女王解散议会，颁布诏令重新选举。选民渴望和平，又为萨切弗雷尔一案所激怒，就选出了一个托利党占多数的议会，哈利本人属于托利党温和派，通过施展权术实现了举国企盼的和平。

达成和约的最大障碍是英国的盟邦特别是奥地利在和会上提出的条件，远远超过其在战场上的贡献。为排除这个障碍，新的托利党内阁通过谈判以达成独立的和约。1710年8月，他们开始秘密谈判，1711年10月达成对法初步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对法媾和，但不包括西班牙在内，辉格党人闻之大怒。哈利力劝女王加封了12个新贵族，438 才使得上院通过初步协议。1712年6月，他以从战场上撤回英军相威胁，迫使同盟各国参加了在乌特勒支（Utrecht）举行的谈判。英国无

疑背弃了盟国，单独缔结和约，但是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成和平。

由此达成的《乌特勒支条约》与其他大多数和平条约一样，其内容反映着战争结束时战场上的局势：腓力五世的军队征服了西班牙，条约便承认他为西班牙国王，条件是法西两国君主，永远不得由一人兼任。马尔伯勒的军队已经占领了现在属于比利时的尼德兰那部分，条约上便把这部分划为奥属尼德兰。而荷兰则取得在奥属尼德兰边界地区堡垒的卫戍权。最重要的是条约反映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自从1694年以来，英国的舰队便在地中海过冬。1704年，在布莱尼姆战役前一个星期，英国舰队夺取了直布罗陀，4年之后，又夺取了米诺卡及其十分优越的马洪港。乌特勒支条约规定英国保有上述两地。1710年9月，4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军人和1500名新英格兰士兵攻占了阿卡迪亚（Acadia，后改名为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罗亚尔港。乌特勒支条约承认该港为英国所有。条约明确英国在纽芬兰和哈德森湾一带地方享有主权，并将西印度群岛的圣基茨岛（St. Kitt's）划归英国。最后，英国还从西班牙手中政得了阿先托（Asiento），又和西班牙达成一项协定：西班牙给予英国将黑奴运往西属西印度群岛的专有权，并准许英国每年派设一艘载重500吨的船前往加勒比海，参加该地区每年一度的商品交易会。

虽然英国还没有取得加拿大和印度，但已坚定不移地走上帝国辉煌之路。《乌特勒支条约》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人口变动的情形也提供了证明。1688年，英国在北美的殖民还只有20万居民；到1713年，这个数字已达35万人。

汉诺威的王位继承

安妮女王当政的最后几年，王位继承问题成为头等大事。但与此纠缠在一起的是托利党的内部团结问题。1711年已晋封为牛津伯爵的罗伯特·哈利企图用超政党方式进行统治，与安妮女王在位初年戈多尔芬和马尔伯勒的做法如出一辙。但是政党领袖又一次无法满足政党

本身贪得无厌的要求。托利党人要将所有辉格党人清除出政府，而代之以托利党人。持这个立场的托利党人找到了一位合适的领袖——精明能干而圆滑过人的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Henry St. John, Viscount Bolingbroke）。博林布鲁克认为一个政府由不同政党的人执掌是行不通的，正如一辆马车配上四个大小不同的轮子不能行走一样。他发誓要将所有辉格党人赶出政府，连官职最低的也不例外。作为财政大臣的牛津伯爵是女王的宠臣，且掌握政府的官职分配。他对此表示抗议并拖着不办，但是最后还是屈从。托利党渐渐取代了政府中的辉格党人，但在博林布鲁克觉得还不够快。这时他又在牛津伯爵背后搞鬼，想取代女王宠臣的地位。

439

博林布鲁克的盟友是高教会教派，他们的目的是彻底镇压非国教徒。1711 年，他们在议会通过一个法案，规定非国教徒违反国教会惯例的做法不合法，1714 年又通过《分立教会罪行法》（Schism Act），关闭非国教徒开办的学院和学校。高教会教徒对非国教徒的痛恨有增无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是，托利党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女王的健康一天天恶化，汉诺威王朝（House of Hanover）入继英国王位的前景使托利党人的前途暗淡，因为他们曾经得罪汉诺威王朝。托利党的右翼被称为詹姆士二世派（雅各白派，Jacobites），因为他们主张英国王位应由詹姆士二世和他的儿子詹姆士三世继承，而詹姆士的拉丁文名字就是雅各白（Jacobus）。雅各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怀念旧君的情感运动，但在托利党内却喧嚣一时，像有很大的力量，特别在苏格兰议员之中更是如此，这就令汉诺威方面恐惧。这时已消沉到懈怠、酗酒之中的牛津伯爵或许会对汉诺威的忠诚不二，但是博林布鲁克在安妮女王在位的最后几个月，似乎已倒向詹姆士二世派那边了。他得到女王的垂青，策划罢免牛津伯爵，又打算让詹姆士二世派的人入阁。然而，1714 年 8 月 1 日安妮女王去世时，他执掌大权才整整两天。假使女王的寿命能延长六个月，博林布罗克可能会把篡位者请进英国，但也许不敢做这件毫无胜算的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无法争取到议会的多数去

废除《王位继承法》，而由此引发叛乱的危险太大。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博林布罗克在这几个月里破坏了托利党的团结。这样，当辉格党在乔治一世统治下上台执政的时候，所面临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威信扫地的反对党。辉格党在 18 世纪日益强大，其基础是在安妮女王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奠定的。

阅读文献

David Chandler, *Marlborough as Military Commander* , New York, 1973. 该书的内容并不是局限于书名的范围，而是由一位研究 18 世纪战争的权威所撰写的一部文笔优美的传记。

P. G. M. 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 London, 1967. 这是一部研究国债、货币市场和证券交易所起源的重要著作，学术性和专业性兼备。

Richard Cough, *The History of Myddle* , Penguin Books, 1981. 这是一部关于 17 世纪教区历史的著作。作者是该教区居民，对英国普通乡村居民的生活作了生动的透视。

Geoffrey Holmes,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nne* , London, 1967. 该书透彻而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政治画卷，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有议会，还有乡村、咖啡馆、剧院和出版物。

Judith Hook, *The Baroque Age in England* , London, 1976. 该书探讨了整个 17 世纪的艺术和建筑，尽管狭义上的巴洛克风格到 1690 年之后才兴盛起来。

440

Henry Horwitz, *Parliament , Policy and Politics in the Reign of William III* , Manchester, England, 1977. 该书仅论及政治方面，主要集中在议会承办国王旨意的方式之上。文字晦涩难懂，但概述了有关威廉三世统治时期的最新研究著作。

Ralph Houlbrooke, *The English Family 1450—1700* , New York, 1984. 这是一部颇具实用性的概述和批判性分析目前有关近代英国家

庭研究状况的著作，反驳了下面这部著作中提出的对父母与子女关系所持的负面看法：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abridged ed., paperback, 1980.

Eric Kerridg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1967. 该书研究了轮耕制、沼泽排水、肥料施用、草地灌溉、萝卜和苜蓿等新的种植品种，其中心观点是上述这些革新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农业革命。但学界对这个观点仍存有争议。

Craig Rose, *England in the 1690s: Revolution, Religion and War*, Oxford, 1999. 该书通过论述民谣、信件、日记、小册子、布道、话剧和诗词来揭示1690年代，此前几十年的辩论、争执和斗争对这个年代起到了塑造作用。在学术上对Horwitz的著作有补充作用，但未能超过其著作。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England Under Queen Anne*, 3 vols., London, 1930, 1932, 1934. 作者为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对安妮女王时代作了史诗式的权威性概述，文字表述准确，富有感染力。

441 第十七章　稳定时期：1714—1760年

1714年9月18日的晚上，由乔治一世、汉诺威选侯（George I, Elector of Hanover）带着他的情妇和儿子——即后来的乔治二世（George II）——在格林威治登上英国土地。乔治一世是詹姆士一世的外曾孙，经英国议会的立法程序而登上英国王位。第二天，英国绅士和贵族乘坐约200辆马车，簇拥着两位乔治来到伦敦城，伦敦市长亲临迎接，万民欢声雷动。这一兴高采烈的场面，表明英国人更多的是为英国逃脱了一场内战和一个天主教国王而感到欣慰，远胜于对两个乔治的爱戴之情。

1714年的英国行将进入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帝国胜利时期和学术文化昌明进步的时期。但此时英国的局势还是不够稳定，而且在国际上陷入孤立。试想，对于这样一个杀掉和废除君主，打了多年内战，镇压爱尔兰人，容忍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的滋事，分成许多政治派别，宁肯要代议制政府的混乱也不要专制君主制之下秩序的国家，有什么可说的呢？有谁还能信任这样一个背弃盟国、订立《乌特勒支条约》、容许波旁王朝君主统治西班牙、容许法国主宰欧洲大陆和让法国威胁美洲的国家呢？可是，在46年之后的1760年，当举国哀悼乔治二世逝世之时，英国却证明了立宪制政府的优越性，建立了一个跨越世界的帝国，成为研究和探索方面的理性倡导者。

政治稳定的形成

到那时为止，代议制政府一般都很难存在较长时间。历史上每个时期都留有其失败的记录。希腊人的智慧、罗马人的务实、佛罗伦萨人的精明都不能保其长存。因此，18 世纪的英国的分权和统治之术能够延续至今，的确令人不得不倍加赞叹。 442

英国人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英国的宪政，特别是英国宪政中的分权制度说起。许多当今人士都认为三权分立是英国政治自由的关键，虽然他们对于三权的特定含义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三权是国王、议会和法院，有的人则认为是国王、议会和地方政府。事实上，英国并无所谓三权之分。英国的统治权，分布甚广。诚然，它操纵在国王、议会和法院手里，但各郡的郡督和治安法官、各教区的督察官和警卫官、主教区的主教和副主教，甚至从事商业事务的英格兰银行，都拥有权力。权力的广泛分布，使拥有权力的统治阶层参与国家治理。由于他们控制了英国的经济和社会，所以取得了英国政治的稳定。

假如权力分布太广，特别是对谁掌握最高权力没有取得共识的话，那么就会引起混乱。在理论上，虽然许多人都认为国王是最高行政首脑，但到发生危机的紧要关头，大权显然控制在议会手中。议会通过控制财政，可以随时令国王的政府停止运作。议会也有权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裁撤、创设或改组任何法院，以及罢免任何法官。大法官和总检察长都是议会的成员，国王在委任高级法院法官或内阁大臣时，须向议会的领袖们征求意见，当然国王对这种意见的接受程度，是 18 世纪英国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宪政问题。在理论上，国王可以随意任用或罢免任何大臣，而大臣们处理日常政务，也须对国王负责。但是，在出现更大问题或发生危机的时候，大臣们终归还是听从议会，因为只有议会投票批准拨款，政府才能维持运转。至于日常政务，则主要取决于国王的个性。就 1714 年至 1760 年而言，指的是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个性。



《乔治二世》，英国国王（1727—1760），作者查理斯·杰瓦斯（Charles Jervas）（1675—1739），爱尔兰人。油画，帆布画（*Guildhall Art Gallery, Corporation of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乔治二世既不聪明，也没有雄心，还不善与人交流，因为他性格内向、害羞胆怯，而且英语说得不好，但他并不冷漠无情。如果说乔治一世在公共场合显得木讷和刻板，那么他在私下场合却充满睿智和情趣。乔治一世的个性冷静、机敏、现实，而且在治国方面意志坚定。乔治二世在治国方面与他的父亲相似，但比较喜欢与人交往，脾气也更加暴躁，喜欢自以为是，情绪上更是喜怒无常，但是由于妻子卡罗琳王后（Queen Caroline）聪明活泼，他执掌下的宫廷还是生气勃勃。他也喜欢处理朝政，虽然头脑清楚但视野狭隘，好纠缠细枝末节，到了紧急关头，还得仰仗王后和大臣们的坚强意志。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不是傀儡国王。他们委任所有的军事官员，监督文职官吏，掌握职位的分配，掌控法院，决定外交政策，任命和罢免大臣，将大臣和议会都视为自己的奴仆。但是，他们的精力是有限的。1717年后，乔治一世便不再出席内阁的非正式会议了，而乔治二世也只是偶尔出席这种会议。到1760年，这个人数不多的内阁核心运用分配职位的权力建立起强大的内阁，连国王也无力予以罢免。1756年，乔治二世怒 443 道："当落在这帮混账手里时，我还能把自己看成是一国之君吗？"

英国宪政不仅使掌握土地财富的阶层取得了在议会和内阁中的支配地位，如治安法官在乡村中的支配地位一样，而且将代表权授予乡村中的"40先令"自耕农（拥有每年地租收入40先令的土地）和开放选区的市镇居民，并给予所有国民以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这种宪政允许财富发挥其作用，给予不满者表达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政治 444 稳定。

政治稳定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三个爆炸性问题——战争、王位继承、宗教——不复存在。而这三个问题却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造成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剧烈分裂。战争已经结束，汉诺威王朝继承王位已成事实，宗教上的分野如果依然存在的话，那么也不得不给予处于对立的教派宗教上的宽容。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路德主义使得高教会派托利党人不再可能镇压非国教徒，就像詹姆士三世统治时期的天主教使得他们不再可能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一样。然而，许多托利

党人企图将以上的两个不可能变为可能。那些要求詹姆士三世任国王的托利党人被称为詹姆士二世派（雅各白派），并被贴上叛国者的标签。1715 年，这些托利党人在英格兰北部登陆，与万名苏格兰兵会合，企图让詹姆士三世复辟。乔治一世于是将托利党人从国家和地方的所有政府机构中清除出去。他的儿子对托利党更加痛恨，延续了这个做法。其结果是将所有托利党人驱赶到欧洲大陆。被驱赶者甚至包括那些只是口头上讨论复辟斯图亚特王朝和为其国王干杯的王党分子。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叛国者，但他们都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按照神圣的誓言和他们对君权神授君主制和神圣的王位继承法的信念，他们都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但按照同样坚定的对被动抵抗和忠于合法当局的信念，以及出于实际利益，他们不能拿起武器反对汉诺威王朝。这样就造成了立场鲜明的托利党的产生。该党坚持英国国教教义，拥有鲜明的政策和拥护者，在 1722 年和 1734 年选举中分别获得 178 个和 149 个议席。但该党此时被剥夺权力，处于瘫痪状态，只得让位于辉格党的统治。

政治稳定的第三原因是 1714—1760 年的辉格党的一党制政府，其中 1719—1742 年是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政府。罗伯特·沃波尔爵士是出生于诺福克郡的一位乡绅，他酷嗜珍馐美味，喜爱高厦华堂，粗鲁但睿智，政治权力欲望很强。沃波尔知人善任的本领无人可及，这在处理南海公司案件上得到了充分表现。这家公司虽然名义上是为经营南洋商业而组建的，但实际上它组建的主要目的是以低利息再注资的方式处理庞大的战争债务。公司董事们发售的股票价格远远超过了公司的赢利能力。在公众得知这个消息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股票抛出。于是股票价格一落千丈，从每股 1050 英镑降至 140 英镑，接踵而来的便是公司的倒闭。辉格党政府内几位沃波尔的政敌也深深卷入此案之中，弄得身败名裂。沃波尔本人与此案无涉，很巧妙地出面为他们辩护。他的政敌们有的面子丧尽，有的在这时死去，权力突然出现一个真空。这位诺福克绅士求之不得，于是便将这个真空填了起来。他在议会深孚众望，只要取得乔治一世和 1722 年之

后的乔治二世的信任，使可成为英国权力最大的政治家。

沃波尔一方面说服议会投票批准乔治一世获得更多的王室收入，一方面把议会牢牢地控制在手中，运用其策略和精明，博得了国王的欢心。国王的宠信则使他在宫廷官职的委任方面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通过对宫廷和政府职位的分配，他建造出了一部强大的政治机器，在 1742 年他自己下台后尚继续存在。之后，他的职位由手腕不及他的亨利·佩拉姆（Henry Pelham）及其弟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继任，辉格党的寡头统治得以稳定地维持下去。佩拉姆兄弟来自 445 一个贵族家族。纽卡斯尔公爵是英国最富有的地主之一，任诺丁汉和米德尔塞克斯两郡的郡督，能够控制 16 个议员的选举。从 1722—1760 年，沃波尔、亨利·佩拉姆、纽卡斯尔三人和两位乔治国王合作。在他们支配之下，无数的职位、俸禄、荣衔、政府合同以及选举资助等等，都落到了他们的朋友手中。

这一制度给政治生活带来其所需要的凝聚力。19 世纪时的政党发挥了这种功能，但在乔治国王早期，自从沃波尔的辉格党的独占局面结束后，政党依赖由政治主张或利益而形成的凝聚力的程度已经减弱，更多地是依赖贵族间的联系和关系，因为通过这种关系能够得到法院、政府、教会、陆陆军等官职。沃波尔和佩拉姆兄弟深明个中道理，并竭力加以利用。1742 年，议员中有官职者计 142 人，其中在法院任职者 24 人，在政府任职者约 50 人，其余为任闲职或薪酬领取者。国王寝宫侍从年薪 500 英镑，御前绿衣侍从年薪 1000 英镑。政府机关里领薪但不上班的闲职薪俸也很高。对于既想拿高薪又想有权的人来说，446 最好的官职是财政大臣、大法官、枢密院大臣、掌玺大臣、两位国务大臣之一或其他内阁大臣级的职位。在这些大臣之下办事的，则有各部次长以及财政、海军、军械各部委员会的成员。对于议会的 30 个律师来说，有吸引力的职位则有总检察长、议会档案长（Master of the Rolls）和海军法庭法官。总计起来，有 50 名“专业人员”领取高薪，替政府料理事务和为政府的政策辩护。官职分配的范围也包括上议院在内。受封为一名神职的或世俗的上院议员，是最高的荣誉。上院的

26名主教，以及占上院议员1/4的担任宫廷职位的贵族，都效忠于辉格党领袖。

当时常听到的抱怨是职俸不够分配。但是除了以上职俸之外，还有其他奖赏：忠于政府的议员可以获得年金，在军中获得提拔、获得陆海军的军需承包合同。而且，如果他们在竞选时遇到麻烦，还可以取得政府的安全议席，或获得政府在财力、影响力方面的帮助。最后，效忠政府者还可以得到荣晋褒奖，如被授以爵士、男爵或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这种制度的影响力，超出议会的范围。政府控制了许多教区和大教堂肥缺的任命权。沃波尔常说：教会的肥缺对于政府来说像文官职位一样有用。文官职位多得很，各个级别都有，特别是海关、税务局和印花税局。当然更有体面的是被任命为郡督或治安法官。这些教会的、文职的、地方的官职任命，是与各地辉格党人士的家族的利益完全吻合的，其目的是选出关系良好的议员。这是一个由家庭关系、同乡邻里关系、贵族关系、相互义务关系以及势力所构成的世界。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势力体系的作用，当时评论家的估量过高。1742年，当议会指责沃波尔对西班牙战争应对失当而被迫辞职时，这个制度竟不能保全他。同样，1756年，当纽卡斯尔领导对法战争中的笨拙举止激怒议会时，纽卡斯尔也不能自保。在这两个事件中，乔治二世都全力支持他手下的大臣，但完全不起作用。这就是说举国权威最高的人和掌握全国官职分配权的人两者合在一起，也不能抵挡议会的发怒。沃波尔和纽卡斯尔的下台，充分表明了两点：内阁大臣最终必须向议会负责，官职分配制度并不能永远保证政党取得议会的多数。事实上，接受职俸的议员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候，都不曾超过150—160人；而且议员接受了职俸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不投反对政府的票。也许，还有40到50人——特别是担任陆海军职务的人——感到有义务支持政府，除非政府干得太差劲。而约有300名独立乡绅议员（辉格党、托利党都有）和约50名辉格党的造反者（不领职俸），并不欠政府任何人情。所以，官职分配制度是建立稳定的政府

所必需的一个重要基础，但不是足够的基础。与之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还有英国选举制度——选举 558 名议员组成议会的制度。

447

如果说英国的选举制度有助于政治稳定，似乎很难自圆其说。英国的选举制度的无序性质所显示的是无政府主义而不是秩序。议员中苏格兰占 45 人、威尔士占 24 人、英格兰占 489 人。英国 40 个郡选区，仅选议员 80 人，代表 16 万选民；203 个市镇选区，选议员 40 人，仅代表 10.1 万选民；英格兰的两个大学，选议员 4 人。在郡选区，所有拥有每年地租收入 40 先令的土地的人都有选举权。1761 年，拉特兰郡的选民人数为 800 名，约克郡的选民人数为 20000 名。如上所述，这个选举制度似乎井然有序。但 203 个市镇选区的选民资格和规模，就没有规则可言了。

市镇选区的差别甚大。为数不多的大城市选区的选民数以千计，另有的地方如塞勒姆旧城（Old Sarum），是并无居民的牧羊场。大多数市镇选区集中在英国南部。尽管各选区选民人数差别甚大，但选区大致可分为五种：自立选区（pot wallopers）、纳税选区（scot and lot）、自由民选区（freeman）、市政选区（corporation）和持产者选区（burgage）。在自立选区，凡不依赖济贫金为生的住户居民，都有权投票选举。在纳税选区，凡缴纳济贫税者，都有权参加选举。这种选举权较广泛的选区在 203 个市镇选区中仅占 48 个。选举权远为狭窄的，是 92 个自由民选区，在那里只有被市镇当局认定为自由民者，才有权投票选举。但这种选区的选民人数差别甚大，如凯莫尔福德仅为 20 人，而伦敦则为 7000 人。在 27 个市政选区中，只有市长、市政官及市议员拥有选举权，所以其投票选举时通常只有 30—40 人，从来不超过 60 人。持产者选区共有 29 个，只有达到持有特定标准财产者，才可获得持产者资格，并有权投票选举议员。大多数的持产者选区，都过于趋向于依赖某一个保护人，所以被称为口袋选区（pocket boroughs）。这种选区可以进行买卖，在 1761 年的时候，这类选区的行市价格为 2000 英镑。

各类市镇选区都处在那些有势力的保护人的影响之下。因为选举

人在500人以上的市镇选区，5个中只有1个，其余的市区选民要少得多，所以当地有势力的地主大户，能够操纵选举。他们的做法是利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平常对自己的尊重、倚靠或和自己的交情，但必要时他们也不惜采用请客和行贿的手段——萨塞克斯郡一个市镇选区的选举是49桶优质啤酒赢得的，另一个市镇选区则每票的标价为10英镑。依靠这种影响力，55名贵族和56名平民操纵了205名议员的选举，政府则控制了另外30名议员的选举。在较大的市镇选区参加竞选的议员，在竞选活动中得多花气力、多花钱财来操纵选举。从郡选区选出来的80名议员，大都出身于老的绅士家族，他们所代表的选区也很大，但他们的选区在乡村地区，其选民多依赖地方名门望族，其中有辉格党也有托利党，这些名门望族常常彼此达成谅解，在各选区里不相竞争。例如1761年，在314个选区中，只有53个选区有人竞选。

在这种制度下选出来的下院，以地主阶级占优势。1/5议员是英国或爱尔兰贵族的儿子，有1/6是从男爵或从男爵的儿子，其余的则大多数出身于绅士阶级。有1/3议员是专业人士，大多出自法律界、陆军和海军，他们也往往是贵族和绅士的非长子。下院议员中有50名是商人，他们差不多都是伦敦的富商，少数几个议员是在印度发了财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用钱可以买到特许状或在选举中获胜。选举体系并不是封闭的，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都可以进入，而且其人员储备巨大，但1760年时，他们还处于明显的少数，地主阶级则占了大多数。

448

地主阶级论人数为数甚微；论财富，则宽绰丰裕；论眼光，他们所见略同。当时约400个大户掌握了英国20%的耕地，年收入从5000至40000英镑不等；约有700至800个大户掌握了耕地的30%，年收入从3000至4000英镑不等。这些大户构成了地主阶级的精英。他们拥有地位，利用选民对他们的尊重在郡选区选举中稳操胜券，同时运用金钱和影响力操纵市镇选区的选举。地位稍低的是拥有30%耕地的3000户绅士，他们在选举时需寻求盟友的支持，其盟友包括在教会、

法律界任职或以军官身份领取半薪休假在家的地主阶级的非长子。他们之间的联姻、相似的教育程度、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掌控地方事务的势力，都表明他们与统治英国的政客们的阶级地位相同。他们势力很大，加之常涉工商业活动，于是招工商界和城市人士加入他们的行列。地主阶级和工商集团精英的社会经济结合及其对选举的控制，成为乔治国王统治早期英国政治稳定的基本原因，与当时英国的宪政、两位乔治君主的贤明统治、沃波尔和辉格党的支配地位以及官职分配制度所起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这诸多因素就可以解释英国政府为什么不仅在 1716—1756 年间实行了稳妥的（假如不是杰出的话）统治，而且在 1756 年能够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将大权交给抨击国王甚炽的威廉·皮特（老）（William Pitt the elder），这样一个在印度经商的商人的孙子，并且支持他的近乎冒失的政策，从法国手里把一个帝国夺过来。

赢得帝国

英国虽然在 1714 年时拥有一个新的且不稳固的王朝，在国际上也缺少盟友，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其两个传统的对外目标，即保护对外贸易和维持欧洲均势。在这两个目标上，乔治一世又加上了第三个目标：维护汉诺威邦国的利益。这一附加目标惹起议员们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不能构成英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其唯一目的应当是英国的自身利益。但是，外交向来不是那么富有理性，而在 18 世纪的欧洲，王朝的要务至关重要，国王的荣耀、外交大臣的虚荣心和英国民众的舆论也是如此。

从 1715 到 1721 年，在执拗的乔治一世和具有学者气质的斯坦厄普勋爵（Lord Stanhope）身上，国王的荣耀与外交大臣的虚荣心结合起来，共同确定了英国外交政策。这是一个大胆的、基于选侯利益的、纠缠不清的外交政策。在这其中，乔治一世坚持要维护汉诺威在德意志的利益，斯坦厄普坚持要维护英国的安全与和平。斯坦厄普希望能够通过维持欧洲既成体系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为了使英国成为这个


1800年英国的城市和资源
船厂
格拉斯哥
爱丁堡
北海
特威德河
煤
纽卡斯尔
泰因河畔
泰因河
煤
桑德兰
斯托克顿
蒂斯河
铁
约克
煤
利兹
赫尔
哈德斯菲尔德
煤
曼彻斯特
利物浦
谢菲尔德
棉花
特伦特河
钢
煤
爱尔兰海
煤
德比
诺丁汉
什鲁斯伯里
塞文河
莱斯特
诺里奇
乌兹尔河
阿伯里斯特威斯
伯明翰
煤
北安普敦
剑桥
煤
喀麦登
朗达
牛津
煤
卡迪夫
布里斯托尔
伦敦
巴斯
泰晤士河
多佛
煤
南安普敦
朴次茅斯
布莱顿
普利茅斯
0 30 60英里
0 30 60公里
英吉利海峡

体系中具有威力的警察，斯坦厄普力图保持强大的军队、维持很高的 450 税赋、与众多的盟国结成复杂的盟友关系。但是他的最宏伟的计划，即利用强大的普鲁士作为遏制俄国和奥地利的手段和作为新教联盟基石的计划，由于乔治一世的汉诺威与普鲁士在梅克伦堡问题上的争端而难以实施。取而代之的是与法国结成历时 14 年的同盟。这个同盟显然不合情理，因为法国是英国的宿敌。但是因为这个同盟根除了法国支持的查理三世夺取英国王位的威胁，所以乔治一世对此感到高兴。该同盟还使得欧洲的两大强国从 30 年的战争中得到恢复，重建军队和重聚财富。斯坦厄普因为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和他的宏伟计划而胆略大增，于 1718 年断然反对西班牙对意大利的领土野心。这个野心本来与英国人毫不相干，但却在同年引发了一场毫无用处的战争，并导致英国海军将领约翰·宾（John Byng）在西西里岛近海击沉西班牙舰队的大部分舰只。

斯坦厄普于 1721 年逝世。他的继任者汤森德勋爵（Lord Townshend）要继续执行斯坦厄普的宏伟计划，耗费巨大且十分困难。而且，将汉诺威利益置于英国商业之上和将英法同盟置于荷兰领土完整之上的做法，显然不得人心。当汤森德在 1730 年以较为弱小的英奥同盟取代英法同盟的时候，斯坦厄普体系的一半已经崩溃。1732 年，该体系的另一半——英奥同盟解体之后，英国不再积极介入欧洲事务。此时任国务大臣的罗伯特·沃波尔采取了孤立政策。他甚至坚持乔治一世在波兰王位继承问题上保持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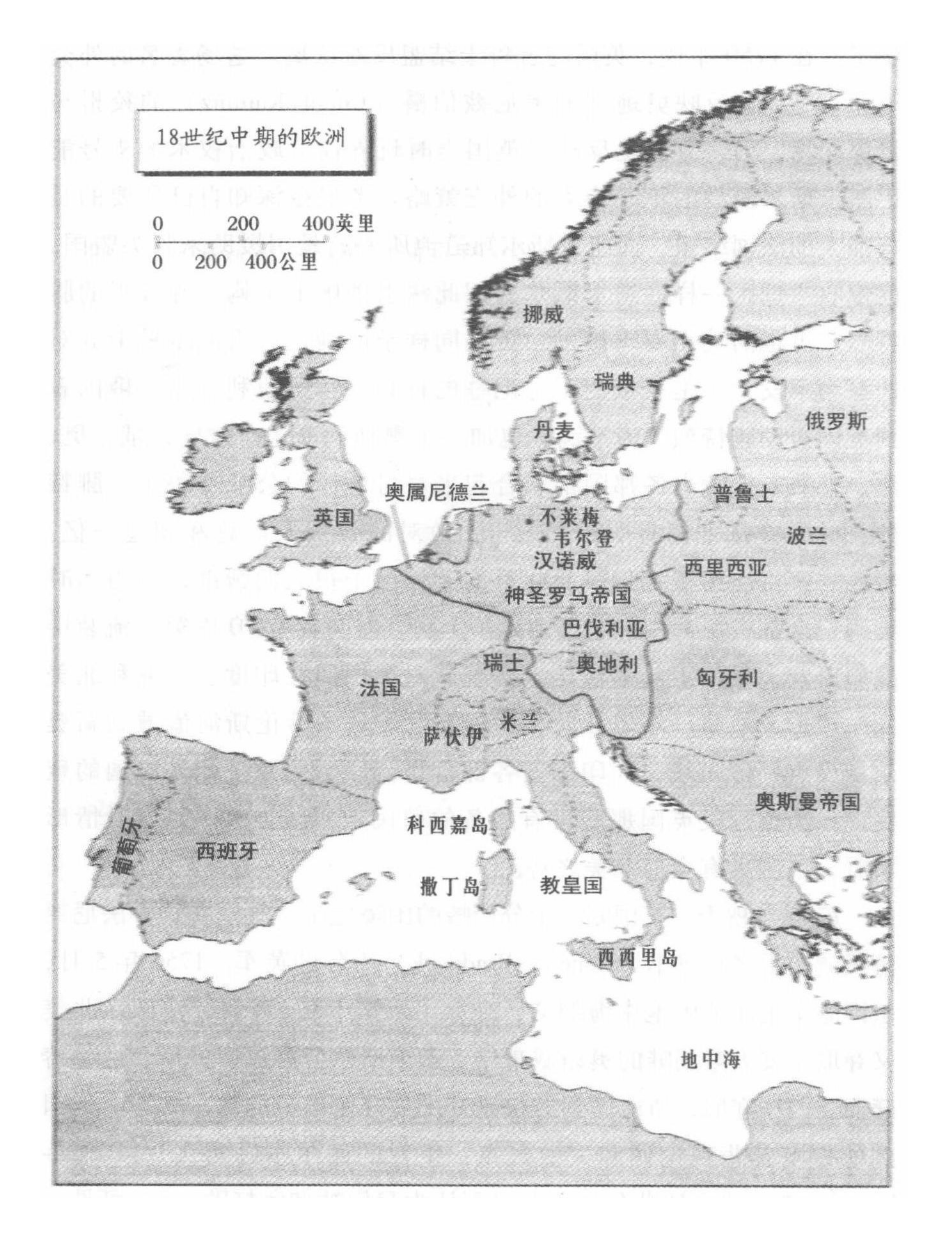
孤立政策开始并不得人心。土地税由 1727 年的 4 先令下降到 1732 年的 1 先令。对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破坏英国贸易的行径，沃波尔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使他遭人诟病。在西班牙抢夺英国船只的问题上，沃波尔耐心地通过谈判达成了 1739 年 1 月的《帕尔多协定》（Convention of Pardo）。这个协定的妥协性条款，阻碍了英国的通商，触发了威廉·皮特的激烈抨击和英国商人的无比愤怒。1739 年，议会决定对西班牙宣战。

西班牙战争既耗资巨大，又毫不光彩。英国没有获得大胜，没有取得领土，也没有能够迫使西班牙放弃夺取船只的做法。同样，英国在 1740 年参加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中也没有得到荣耀。沃波尔曾经向奥地利许诺，在奥地利国王查理六世逝世、其女儿玛丽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继位时出面帮助她的帝国。可是查理六世一死，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就在法国的支持下，动手分割奥地利，而英国议会并未接受沃波尔的劝告，出面驰援玛丽亚·特里萨。那些主张驰援特里萨的人说：英国不能听任有 220 万人口、13 万陆军和 80 艘军舰的法国灭掉奥地利而独霸欧洲。而沃波尔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欧洲并受到没有什么威胁，只不过是日耳曼诸侯想抢夺领土而已。议会逼他离职后，他向他的继位者说："这场战争是你们的了……，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得到享受。"结果，英国上无统一战略，下无英明指挥，苦战 8 年，处处失利。在这期间，外交家们没有能够缔结一个制胜的同盟，也没有达成和约。直到 1748 年，双方才同意以恢复战前状态为条件讲和。诚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这是"一场不可理喻的英—欧大疯癫"。

452

但是，这场战争也不是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传奇事件和历史教训。传奇事件发生在 1745 年 7 月，当时查理·爱德华（Charles Edward）在苏格兰登陆，宣布尊他的父亲詹姆士三世为英国国王，拉起一支军队，在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击败英军。他随即又侵入英格兰。英格兰人既没有出来欢迎，也没有起兵抗击，只是等候乔治二世的幼子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领大军从佛兰德返回。查理·爱德华亲王见未遇抵抗，便领兵直趋德比，准备在那里稍作休整就突进伦敦。可是到此地后他忽感胆怯，撤回苏格兰，在卡罗顿遭到惨败，逃进深山，然后逃回法国。坎伯兰公爵将传奇事件变成残酷屠杀，他下令对苏格兰败军大开杀戒。

这场战争的教训便是海上力量是决胜的关键。英国舰队的胜利，从海上将法国海军彻底肃清，从而控制了法国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地。



所以法国虽然在佛兰德获胜，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亚琛和约》(Peace of Aix-la-Chapelle)。

和平只维持了很短时间。1754 年，法国和英国又在印度和北美开战。1756 年夏，他们再在欧洲战场上交手，不过这次各自的盟友

变了。在1750年代，英国与普鲁士结盟反对法奥。这场著名的外交革命，一方面反映奥地利的考尼兹伯爵（Count Kaunitz）的狡猾与老谋深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当时玩弄议会政治权术的头号能手纽卡斯尔公爵的不断摸索的外交策略。考尼兹深知自己所要的是与强大的法国结盟，而纽卡斯尔知道他所要的是用援助来收买盟国，就像收买选区一样。纽卡斯尔采用此法引俄国上了钩。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也向英团要求援助，英国同样予以满足。法王路易十五对此深为不安，于是就接受了考尼兹的计划，和奥地利结盟。俄国看到英国援助腓特烈大为不满，也加入了奥地利一边。这样，俄、奥、法、瑞典、德意志各邦国都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公敌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拥有550万人口，敌对的各国人口总和超过一亿。普鲁士不可能指望人口仅600万的英国给予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英国把全部资源都用到殖民地战争上去，对付拥有70艘第一流装甲战舰以及大量护卫舰的法国。法舰队对英国通往印度、非洲和北美的航道形成威胁。不但如此，法国在北美从圣劳伦斯河流域到新奥尔良设有一道防线，同印第安各部落维持联盟关系。此外法国的殖民地兵力也远较英国那些没有战备的殖民地军队强大。照当时情形来看，法国大有全取北美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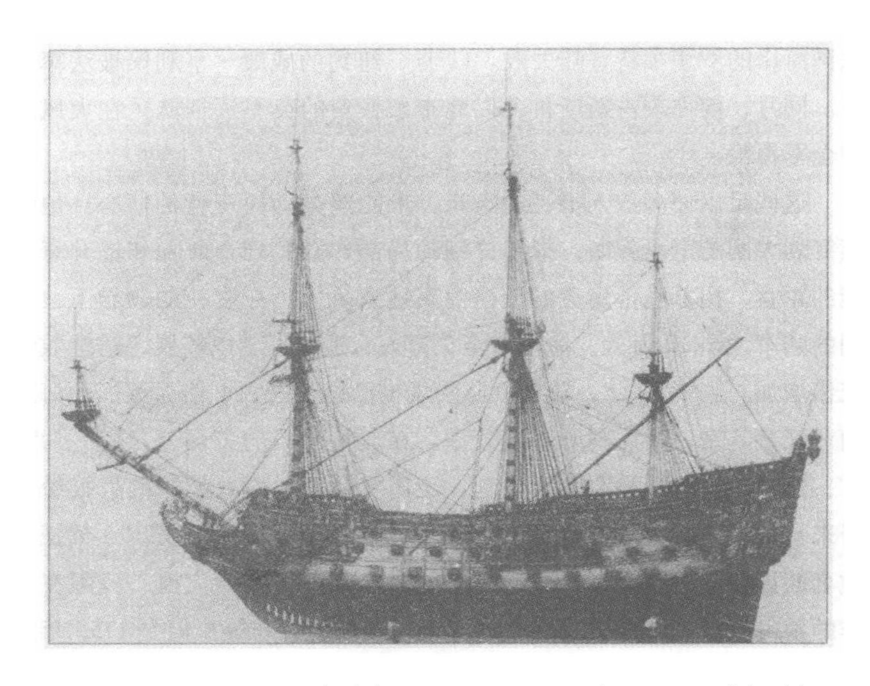
1756年秋天，英国陷入十分严峻的困境之中。法军在宾夕法尼亚消灭波布雷多克将军（General Braddock）率领的英军。1756年5月，法国海军击溃英国地中海舰队，夺取了米诺卡岛。8月，法国在北美又夺取了安大略湖畔的奥斯威哥堡。纽卡斯尔公爵惊慌失措、遇事踌躇而又因循守旧，所能做到的仅是处决失守米诺卡的海军将军。英国到处弥漫着悲观论调和失败气氛：年青的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urne）说，他看到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我们被彻底打败了”。可是一年之后，这种论调变得似乎不合时宜。对以往错误严加批评的威廉·皮特取代纽卡斯尔出任首相，但是，失败之势依然未得到扭转。6月，奥地利军队在波希米亚击败了腓特烈。7月，印度的加尔各答失守。9月，坎伯兰公爵向法军投降，宣布汉诺威和黑森中立。10月，英军在

453

法国海岸的罗切福特登陆失败。11 月，纽约的威廉·亨利堡被法军攻下。同月，前往攻占新斯科舍以北布莱顿角的英军远征队，在大风暴中全军覆没。

这些足以使多数人沮丧的灾难，未能丝毫动摇皮特的信心。他继续筹划大胆的全盘战略，拟出详细的局部作战计划，鼓励和提升有才能的军官，招募吃苦耐劳的苏格兰高地人入伍。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的陆军增至 10 万人，海军增至 7 万人，造船厂予以扩展，铸炮数量成倍增加。到 1759 年，英国舰队的规模已比法国大 1 倍。英国的海运商业旺盛起来，而法国则日趋萧条。在皮特治下的英国，人们一片繁忙，但是，这些活动要转为胜利，还需要时间。令人鼓舞的战报纷至沓来：福布斯将军（General Forbes）攻下达斯凯纳堡（英国立刻把它改名匹兹堡），克莱武（Clive）在孟加拉取得普拉西大捷，法国在西非的殖民据点戈雷岛被攻陷，以及布莱顿角的失守等。但是 1759 年夏天，法国对加拿大、印度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控制仍然非常牢固，而法军正向德意志地区推进，法国这时还在作越海攻英的准备。到 1759 年 6 月，英国仍担心其前途。

随后，英国很快接连取得胜利。礼拜堂里的大钟，正加霍勒斯·沃波尔所说，因不断敲击而磨得锃光发亮。7 月，英国占领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岛；8 月，英得联军在德意志的明登打了一个大胜仗；9 月，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以一支小部队登上阿伯拉罕高地，轻取加拿大的魁北克。法国首相舒瓦瑟尔（Choiseul）认定：唯一的办法是进攻英国本土。他下令将法国地中海舰队调与法国主力舰队在布雷斯特会合，然后以数百艘运输舰装载陆军渡海，攻取未设防的英国本土。可是，法国地中海舰队再也不可能到达布雷斯特。英国海军将军博斯科恩（Boscawen）趁法国舰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击沉其主力舰 4 艘，并使其他舰只搁浅。然而，还是有一支规模较小的法国舰队从布勒斯特出发了。英方的一支舰队利用黑夜航行，迫使法舰队退到基伯龙湾。英军队避开浅难、迎着劲风，驶入该海湾，将法舰全部击沉。这样，英国成了海上霸主。



这是英国海军的一线作战军舰，水兵经验无与伦比。正是凭借舰队，英国打下了一个帝国（*Science Museum/Science and Society Picture Library*）

但是，战争一直持续到1763年才结束。1761年，西班牙愚蠢地参战。英国立刻攫取了西班牙的古巴和马尼拉。法国也吃亏受辱，不但丢失了马提尼克，还让英国在自己的大门口的比斯开湾占领了贝勒岛。根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英国将贝勒岛、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和戈雷岛以及1749年以前在印度所夺取的法属商站交还给法国（但法国许诺不再设防）。英国得到整个加拿大和北美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全部土地，非洲的塞内加尔和西印度群岛的格林纳达、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和多巴哥岛。米诺卡岛也交还英国，此外英国还享有在印度自由行动的权利。英国从法国取得这么多属地，是因为在海上取得了胜利。而英国的海上霸权的取得，又是因为拥有更多由身经百战的军官和水手驾控的军舰。法国人也建造了同样好的军舰，也拥有同样出色的军官，但英国人表现了高超的航海技术。英国

454

军官和船员都具备较丰富的航海经验。英国对法国的海上封锁，通过将法国海军逼入自己的港湾和持续在法国海岸游弋，更加扩大了两军之间的差别。

英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凌驾于法国的海上优势的原因，还在于威廉·皮特、腓特烈二世和英法两国间在政治、社会和地理等方面的差异。在皮特的宽松指导下，英国各方面的才能都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反应迅捷的陆军将军、才能出众的海军将军和吃苦耐劳的文职官员，而且包括聪明的铸炮人、熟练的水兵和勇猛的士兵都是如此。地主阶级和商人阶级争相为战争提供财政支持。假如没有全盘战略，没有具体战术或充分的灵活性，这场战争就无法取胜。夺取大西洋的控制权和攻占魁北克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胜利，但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对法国西海岸港口的毁灭性打击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的高超防御行动。腓特烈十分英勇，并得到了英国的巨额财政援助。当时的说法是："美洲是在欧洲赢得的。"

455

皮特深知腓特烈的重要性。7 年间，腓特烈一直拖住了法国，使之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法国因而无法将财力、人力和精力用到建立强大的海军和防卫殖民地之上。法国的大臣和国王所要得到的是在欧洲的胜利，而不是在北美和印度的胜利。相比之下，英国则是一个以地主和商人利益为重，由贵族与中产阶级为主体，行之以代议制政府的社会。英国的海军军官可以出身中产阶级，最有才华的政治家可以身居要位，即使他们曾得罪君主也无妨，比如皮特在 1743 年就因为把汉诺威叫作"可耻的选侯邦"而得罪了乔治。因为英国有自由的议会，所以皮特能够而且确实执掌国家权力。路易十五决不能容忍这样好斗、无礼而又易怒的政客。其实大多数英国贵族也不能容忍，但是在 1756 年的危机当中，公众的呼声十分强烈，商业的要求十分强硬，议会只好提以由这位伟大的下院议员担任领导人。皮特有一次对议会说："一旦商贸出现危机，你就必须予以保护，否则你的国家将会完蛋。"法国的情况就与英国不同，英国的中产阶级对国家的财力和权力有重大贡献。这个中产阶级，最终将确定英国文化的性质和范

围。但在此之前，贵族社会的英国会以硕大的雄心和高远的志向，确定英国文化的理性原则和性质。

追求有序文化

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有文化的阶级具有相当一致的世界观。17 世纪的科学革命打破了这种世界观。人们终于认识到：物体的运动，不是因为它们有一种精神（essences），宇宙里没有所谓的最高天国；控制人体的是一个名为心的器官而不是所谓四种气质。但并非所有的旧观念都破灭了。科学和知识也展示了一个简单和理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然规律控制着行星；中国人、波斯人和欧洲人尊奉同样的伦理观；而且如约翰·洛克所言，实例的观察和推理的法则能够探测自然界的秘密。但是艾萨克·牛顿以数学的例证推导出宇宙运行的方式，才使人们对理性力量和自然秩序有了无限的信心。诚如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于 1734 年的诗句："自然虽有律，尘世暗无灯，天令牛顿出，人间获光明。"

对许多人而言，一切皆为光明——理性和自然的光明。依据自然的法则——伦理、审美、政治、历史的法则——人们可以建立想一个合理的社会化一种美好、优雅的文化来。理性和自然的法则，甚至可以挽救宗教。宗教被科学革命从伊丽莎白时代一向安稳的神坛上猛然扔下来，《圣经》中的启示说已备受怀疑，托勒密的宇宙论也破灭了。自然本身就是一个有灵性的造物者，多么光辉灿烂啊！沙夫茨伯里伯爵（第三）在 1711 年所写的《人性》（*Characteristics of Men*）里面赞颂道："啊，壮丽的自然，绝顶的美，无上的善，一切皆爱，一切皆可爱，一切皆神圣！"沙夫茨伯里是一位自然神论者，尚非人性的上帝，认为它像一个制造钟表的匠人一样，创造了宇宙，然后不再干预。对于自然神论者而言，自然规律不是特定的启示，而是显示上帝的存在。

456

在许多人看来，沙夫茨伯里对自然的赞颂，只是藐视《圣经》的真理。在他们眼中，真正的经典之作是 1736 年出版的约瑟夫·巴特勒

的《宗教谕论》（*Analogy of Religion*）。巴特勒是一位英国国教会的主教，他说自然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它也有瑕疵，正如《圣经》是不完美的启示一样。不过，正如《圣经》体现的是神圣的真理一样，自然中所体现的是灵性和秩序。自然中的瑕疵也许就是上帝更为宏大的计划里面的必需部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巴特勒的明智之见，将人的理性和神的启示合为一体，对先定说造成了威胁，正加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ley）于 1749 年所著的《人论》（*Oberservations on Man*）所说的那样。哈特利仅仅简要地承认神的启示，他的主要论点是：人对事物的认识，如对桌子、椅子、美、动和上帝等的认识，建立在理性和自然之上，与感官获得观点的途径相联系。道德规范同样如此。沙夫茨伯里和巴特勒都认为人类有一种先天的辨明是非的能力，但两人对这种本能的性质看法却不同；沙夫茨伯里认为这种本能出于自然的同情心和理性，巴特勒则认为出于理性和本能的道德感。与他们相反，哈特利否认这种辨别是非的本能的存在，他认为道德规范的产生只能来自美的行为与美的感觉之间的经验主义的联系。

理性和自然也能够对美进行界定。诗和绘画，像宗教和道德一样，也反映着自然法则。在 1711 年亚历山大·蒲伯所著的《批评论》(*Essay on Critism*)、1778 年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所著的《诗人列传》（*Lives of the Poets*）以及 1779 年乔舒亚·雷诺德爵士的（Sir Joshua Reynold）《艺术论》（*Discourses on Art*）里，都如此说过。在介乎这几个年代中间的一段时期里，所谓“古典主义”主宰了英国艺术界。古典主义认为，艺术反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蒲伯在诗里面找到了这一点，就是诗的平衡的韵律、韵脚、用词和理性的、超然的讽托境界。他认为诗的最高格式是中世纪的十节一韵的偶句诗体，他曾用以来写《人论》（*Essay on Man*），此书旨在辩说无论自然如何不可解、不完美、复杂无比，都和人的理性以及上帝的法则相吻合。约翰逊博士虽然认为蒲伯的理论有不少来自沙夫茨伯里，新的平淡无奇，但他也接受蒲伯的既定审美原则。约翰逊是书贩的儿子、牛津大学的学者，靠写文度日，著有诗、故事、传记和短篇散文，并以健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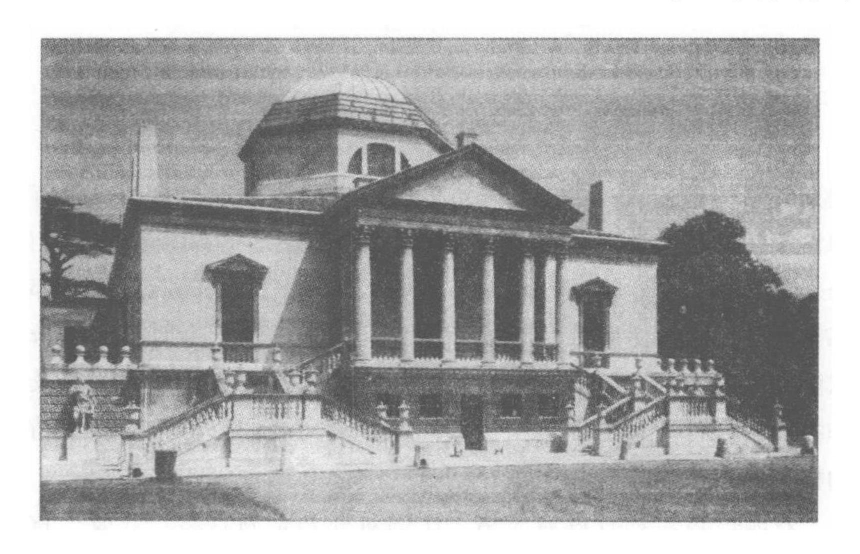


乔舒亚·雷诺德爵士自画像，油画，帆布画，长 127 厘米，宽 101.6 厘米。作于 1780 年，乔舒亚·雷诺德爵士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的画家之一（*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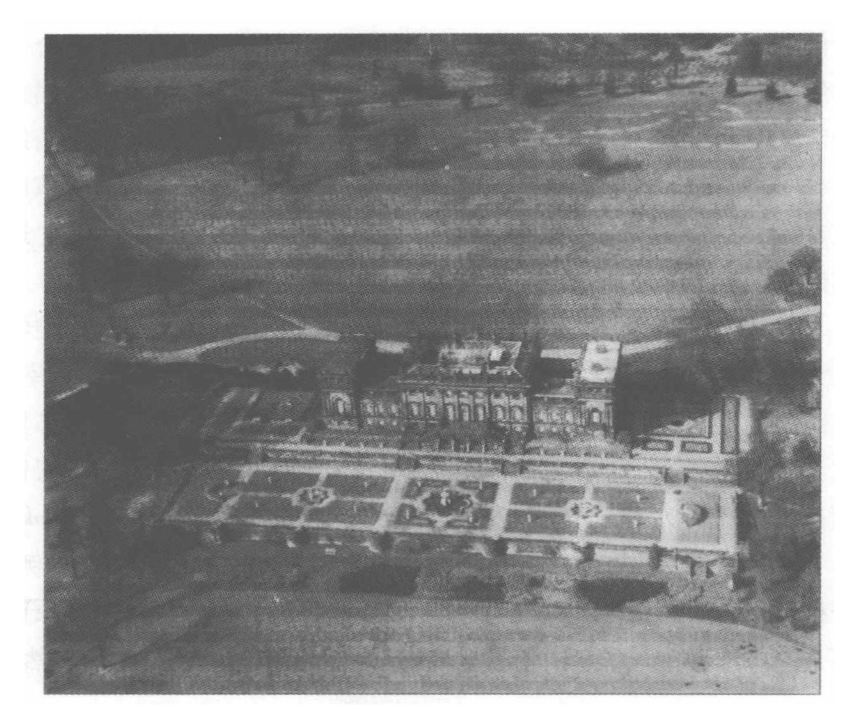
善辩闻名遐迩。1735 年，他编写的《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问世，声称编写这部词典旨在探求英文单词的正确意义，正如他编写《诗人列传》旨在探求诗的正确原则，编撰其他一切著作旨在探求举世皆通、古今不变的道德原则一样。在约翰逊看来，道德和诗歌一样也是建筑在理性的原则之上的：其有条不紊、追求品味、见事明达等等与理性和自然法则相吻合。乔舒亚·雷诺德爵士是 18 世纪英国最有名的肖像画家，他在《论艺术》里面说，在艺术里，

任何令人愉悦的东西，“都是和人的心智相吻合的，因此也是最合乎自然这个字最高、最好的意义”。他对有抱负的画家说：“理性应当自始至终作为主宰”。他给美下的定义是：美是伟大的艺术家心中始终存在的一个意念，它反映着“完美的自然状态”，引发“举世一致的正直和对美德的体验。”雷诺德自己的画作，像蒲伯的诗歌一样，通体优美、玉润珠圆、典雅高洁。 457

既然理性和自然揭示了宇宙的奥秘，显示了宗教、道德和美学各方面的真理，那么为何不将它们运用到人生的所有方面，如居室、花园和行为举止上去呢？这正是当时一些富人应用于建造帕拉第奥式大宅和具有诗意的花园，以及向儿孙灌输处世之道的理念。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s Palladio）的《建筑四书》（*Four Books on Architecture*）在 1713 年被译成英文，阐述罗马风格的数学比例、严格对称和严谨布局。这与克里斯托弗·雷恩认为的是几何形象而不是非规则形象与自然法相吻合，以及亚历山大·蒲伯“摹仿自然，



奇斯威克宅邸，它的楼梯结构对称、石柱规整、窗户均衡、饰有古典雕塑，堪称帕拉第奥式建筑的典范（*John Bethell*，*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规整的哈伍德宅邸花园也能反映出 18 世纪人们偏爱严谨和理性的建筑风格（*Simmons Aerofilms Ltd.*）

就是去摹仿他们（指古人)”的称颂古人的口气最为合拍。肯特的梅雷沃斯堡和伦敦附近的奇斯威克宅邸，都建于 1720 年代，它们充分表现了罗马式建筑的精确对称和惊人雄伟。梅雷沃斯堡每个部分都有四个相同的房间和壮观的陶立克列柱，反映了当时英国人所追求的完美秩序。奇斯威克宅邸的罗马式圆顶、中央八角大厅以及一排排的石像，让来访的英国贵族们像罗马元老们一样，享受了精致的格调和帝国的威权。

458

花园也必须具有古典风格、比例对称和崇尚自然。威廉·肯特（William Kent）是一位帕拉第奥风格的建筑师，他设计了牛津郡卢谢姆的花园，里面有排列整齐的树篱和喷泉、桥梁以及壮观的陵墓。其具体风格为实用、约束、规矩、中庸和准确。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在他 1774 年的《示子书》（*Letters to His Sons*）

中对这种观点表达得很有意思，虽然略带讽刺。他教导儿子的，都是有关世俗的事。他所推荐的有关"一个理性的人的优雅享乐"，包括进餐、游戏、谈话和女人——虽然每项都应适度和节制。他告诫其子，服饰要适合自己的身份；对女人要恭维其理解力；切忌偏见武断；不可放声大笑（大笑之声制造噪音）；遵循"是非基本准则"。此外他还应当认识到：完美蕴藏于"宫廷的高贵举止"之中。总之，追求幸福之道是要遵从"正当理性的原则，即伟大的自然法则"。

开明的英国人相信几乎一切都应以理性和自然为尊。那位博古的约翰·霍金斯爵士（Sif John Hawkins）相信理性会显示音乐基于和声，一如牛顿的光学基于数学。霍金斯一直没有找出这些和声，正如雷诺德一直没有找出他的美学原理。而切斯特菲尔德根据"正当的理性"所教给儿子的生活习惯道理，按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是"娼妓的道德规范和舞蹈师的举止风范"。 459

但是，理性在 18 世纪有可能成为一种腐蚀的力量。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38 年在其所著的《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里说，无论你用任何合乎逻辑的办法，也无法用理性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休谟尤其怀疑理性自身的作用。但他一经离开了其哲学高巢，对外在世界的生动确切的感觉立刻取代了令人怀疑的理性。他确认自然法则是一切的主宰，包括历史之内，远在纯粹的理性之上，展示了自然的真理。同样在蒲伯、雷诺德和约翰逊看来，美学之源不是理性，而是自然。约翰逊博士说："没有什么可以使大家都得到乐趣，并长久地享受乐趣。唯有一样，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的呈现。"休谟写道：如果你要了解法国人和英国人，就要研究希腊人和罗马人。为了描述那不变的人性，休谟在 1754 年出版了他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 1776 年发表了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第一册，还有许多其他学者写了大量关于过去历史的著作。 460

不过，18 世纪的英国文化过于生动、创造力太旺、差异太大、自

发性太强，不是任何一个自然法则能囊括的。贵族则可以欣赏蒲伯的精巧诗句、雷诺德的动人肖像和切斯特菲尔德的灵敏机智，但是中产阶级的人却喜爱威廉·霍格思（william Hogarth）的早期版画、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s）的小说和约翰·盖伊（John Gay）的《丐帮歌剧》（*The Beggars Opera*）中的淫秽歌词。在那些较低社会阶层中，卫斯理会教徒认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号召大家通过基督取得再生，要比到教堂里聆听巴特勒的《宗教谕论》要自然得多。当真说来，什么是自然，谁能断言呢？只是指大众性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霍格思的版画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Tom Jones*）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作品。它们也都是最新颖、最具开创性的作品。霍格思用一系列的绘画或版画去讲道德的故事。菲尔丁则把小说体裁引申为一种绵长而统一的故事叙述。霍格思用12幅以“勤劳与懒惰”（Industry and Idlness）为题的版画，描述虔诚恭敬的弗朗西斯·古德柴尔德（Francis Goodchild）如何从一个纺织学徒成为伦敦市长，461 而与其同为学徒、懒惰忤逆的汤姆·艾德尔（Tom Idle）却沦为罪犯，遭受绞刑。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反映的同样也是尘俗世界，紧张刺激，而以德行为依归。他讲汤姆·琼斯勇敢善良，坦诚开朗，而命运不定，祸福无常，或遇凶险，或遭陷害，但终逢爱侣，财富随之；而作恶的比尔菲（Bilfil）则因辱以终，为人所不齿。霍格思和菲尔丁的作品都不谈贵族，不涉及伟人英雄，他们也不把题材限于循规蹈矩和公平正直的人或事。恶人、娼妇、浪子、罪犯充满于霍格思的画面，同样，卑下的冒险家或粗俗的乡绅，在《汤姆·琼斯》里而也常常出现。

他们的故事虽然讲的都是尘俗的内容，他们的讽刺也常涉怪诞，但霍格思和菲尔丁身上乔治时代的气味十分浓厚，他们认为道德和艺术必须遵循特定的规则。霍格思在1753年写了《美的分析》（*Analysis of Beauty*）一书，追求古今中外美的通则，而菲尔丁《汤姆·琼斯》的许多章都有简短的引言，论述小说的真正规范和原则，其中之一便是“以自然本身为蓝本”。

菲尔丁的所谓“自然本身”却是五花八门、范围广泛，但他的道德观念也不免含混不清。的确，霍格思和菲尔丁都讲到美德有善果，恶行有恶报，但是他们也戏谑浮华，常讥讽富者、嘲笑权贵，对较低阶层表示同情。这都反映了新的读者、新的社会力量、新的观念和新的时尚。一个以理性和自然为基础的僵硬的古典主义已经行不通了。462 到 18 世纪后半叶，建筑家已经转向哥特式风格，诗人已经转向浪漫主义，花园设计师已经转向注重景色的别致。哲学家边沁在 1776 年年著的《政府片论》（*Fragment of Government*）里面，甚至称自然法则是形而上学的胡说八道。总之，18 世纪的梦想，即把文化统一在对上帝的论证、美学原理和是非观念这些以理性和自然为基础的东西之上的企图，是注定要破灭的。仅思想和艺术转变，就可以将它打破推翻，而且作为其基础的“养尊处优的一小群人物”根本无法抵挡新制度、团体和阶级的活力、世俗利益、广泛嗜好和层出不穷的疑问。

民众与统治者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臣民，大多数是都很贫穷，目不识丁，对大卫·休谟的哲学、乔舒亚·雷诺德的画作不感兴趣，也对大臣的倒台和盟国的改变不闻不问。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大事，不外是出生、结婚、死亡、贫困、打官司、经济发展和慈善布施所给他们带来的一点好处。

其中又以出生、结婚、死亡最为重要，因为此三者为喜怒哀乐之源，且和社会人口的增减息息相关。1690 年至 1720 年，英国人口增加很快；而 1720 年至 1750 年，人口增加则处于停滞状态，自此以后的二百年，英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1720 年之后人口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是疾病。若干世纪以来，疾病传染周期性地打断了英国人口的上升。此种情形，又发生于 1720—1721 年、1736 年和 1740—1741 年。流行的疾病有的是伤寒或天花，有的是疟疾或流感。在乡村地区，瘟疫可以使一个村庄的人口死掉一半；在伦敦，疾病造成的死亡率高出出生率一倍。伦敦的卫生情形恶劣，居室拥挤，劣酒泛滥，

使其居民易于遭受瘟疫的侵袭。杜松子酒为害尤烈。英国人饮用的杜松子酒，1740 年代为 700 万加仑，比 1780 年代的对这种酒课重税时的饮用量 100 万加仑多多了。有个医生说，每 8 个伦敦居民中就有 1 个死于过量饮用杜松子酒。喝酒费钱，人们用于买食物的钱就少了，进而导致营养不良，这又是引起死亡主因之一。

不论在哪里，死亡都是人生的现实。在当时，英国人每三个中就有一个不满 21 岁就死掉，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29 岁。从 1722 年至 1751 年，年死亡率是 34‰，而年出生率为 35‰，十分相近。从 1751 年到 1758 年，年死亡率下降到 30‰，而出生率则上升到 37‰。因此，人口增加很快，在多年来第一次没有被瘟疫所打断。除了牛痘接种之外，1741 年之后大的瘟疫停止流行的原因不明。当时的医药还很原始，医院也又脏又拥挤，决无阻止传染病流行的能力。当然也有较洁净的医院，如约克和曼彻斯特的医院，自然也对降低死亡率有效。卡多根医生（Dr. Cadogan）在《关于儿童的喂养和护理》（*On th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of Children*）中，呼吁大家要保证环境清洁，注重衣服保暖，讲求营养饮食。此书在 18 世纪 50 年代再版了 20 次。他和其他人的呼吁，对人们环境和营养的改善有很大的影响，使疾病不再那么容易猖獗。同时，经济状况的改善也使许多女子提早结婚，于是生育率也提高了。1717 年，英国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是 30 岁，此后逐年下降到 1825 年的 23 岁。工业地区工作机会的增多，也给早婚以刺激，像诺丁汉姆郡的出生率比乡村地区高 25%。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降低同时出现，带来了英国的人口激增。

与此有关的数百万人口对此事一无所知。他们更加关注的事情是避免贫困，几乎所有低于熟练工人的阶层都营养不良。在乡村地区，劳动者每星期收入只有 6 到 7 先令，在生活费用较高的伦敦，也只有 9 到 10 先令。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 12 小时以上。从 1700 年至 1730 年，乡村地区劳动者的 6 先令的一半要用于买面包，剩下 3 到 4 先令或用于买乳酪和肉，或用于付房租、购衣服、蜡烛和燃料。他们的单室茅屋地板很脏，常常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敞口炉灶，烧苔泥炭或草

根，所有饭菜都在这里烹制。伦敦的织工们的居住条件同样糟糕，通常连炉灶也没有。他们的单室住处与乡村地区一样拥挤不堪，这导致人们性生活混乱和疾病流行。他们常常遭受工商业振荡的打击，像乡村地区严冬时的情形一样，这意味着失业和沦为贫民。

大多数统治阶级都不喜欢贫民，认为他们在社会中令人生厌，而且每年要耗费100万英镑用于救济。以往，中央政府在权力强大之时，曾迫使伊丽莎白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绅士们善待贫民，但1688年以后，这方面的事务改由各郡的治安法官、教区委员会（vestry）和教区委员会的督察官（overseers）处理。这些官员都对贫民深怀恶感。他们愈来愈趋向于把救济对象限定于极为贫困，且愿意进入济贫院（workhouse）工作的人。这样的做法能够阻吓贫民申请救济，如果做不到的话，贫民至少可在济贫所给教区赚几个先令，使他们养成勤劳习惯。可是大多数工场既没有分工制度，也没有太多的活可干，而且十分拥挤。这种济贫院既不能创造利润，也不能培训贫民工作，所产生的只是贪污和暴虐。许多教区竭力谋求彻底解决贫民问题的办法，将他们出租给榨取贫民劳动的包工头。当教堂与教民之间的关系从父子式或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转变为金钱关系时，赚钱或省钱当然就成了追求的目标。所以，一切都可以“包”出去：教区可以和农民订合同，雇用贫民干活；可以与孤儿院订合同，雇用他们看管孤儿；可以与工匠订合同，收养少年人做7年学徒，或者在可能的时候，可以与大包头订约，让他们包用全部贫民。包工头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会克扣贫民的伙食和衣着，而从他们身上压榨出最大限度的劳动。这些承包方案，只有学徒一项广为推广。不过，工匠收用学徒的目的作为奴役劳工干活而不是培训其技能。其他各项方案通通失败，就像济贫 464 工场的实验一样。到该世纪的中叶，大多数教区干脆给贫民发放户外救济，北部地区每星期1先令，南部地区每星期1先令6便士。这当然远不够糊口，许多人只得去乞讨、偷窃或干其他犯法勾当。

英国法律的惩戒对象不但有贫民，而且还有自英国社会金字塔稍高层次的其他劳动者，如每星期挣10先令、住两层砖房的农民和工

匠。在汉诺威王朝早期的英国，既没有典型的工人，也没有一个清一色的无产阶级。那时的英国社会是一个若干团体组成的等级体系，相互之间呈垂直（如父子）关系，由地主或工场主而下依次至最低层。但是，随着这些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社会的垂直关系逐渐被划分富裕和特权阶层和较低阶层的水平线横切。这种社会分野也越来越显著。这种横切的标准，就是财产，特别是地产。地主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地产。小自耕农逐渐沦为佃农，农民降为农业雇工，圈地运动又将原来的公地圈掉，茅舍农不能再到公地里去挖泥炭取草柴，或放牧猪群。当时的狩猎法规定只有年收入 100 英镑以上的地主才有权狩猎，使成千上万的人都变成了偷猎贼。他们一旦被抓，便成罪犯。当时茶的海关税极高，每磅 4 先令，驱使约 2 万人每年把 300 万磅茶走私进入英国。

众多劳动者都陷入与财产、法律的战争，3000 名治安法官是英国的实际统治者。这些地方上的治安法官确实在治理国家。他们征税，建造监狱和济贫院，监管桥梁和道路，委任贫民督察官和公路巡查官，递解不属本教区的贫民出境，勒令私生子的父亲收养其子，将盲流、偷猎贼、盗窃犯和酗酒者关入监狱。他们还对有以下行为者处以罚款：不做礼拜者、亵渎神灵者、窝藏游民者、在公地盗取木柴者以及辱骂妻子者。

凡犯有最严重的罪行——盗羊、放火、杀人——的罪犯要送到季度巡回审判庭（quarterly assize）审判。该法庭由伦敦派来的一名皇家法官主持审判，到庭者有郡督、治安法官和高级绅士和一大群旁听人，场面肃穆庄严。穿着红袍的法官，先宣讲一番法律之尊严，接着判处偷猎贼和走私犯入狱。如果偷猎贼涂黑面孔以遮掩其真面目，或在皇家森林盗猎，则处以绞刑。这是《1723 年黑罪法》（Black Act of 1723）所规定的。该法起初仅适用于涂黑面孔在皇家森林偷猎者，法官们将其范围扩大为涂面或在皇家森林偷猎。这是一个认同绞刑威力的年代。1688 年只有 50 条绞刑法令；至 1820 年，这种法令已增至 200 余条。如偷窃别人身上物品价值 1 先令或偷窃

商店商品价值 5 先令者，都要上绞架。统治阶级也喜欢使用立枷、鞭笞和监禁等刑罚，用立枷来处罚酗酒者，用鞭笞来处罚盲流：“直抽至背部流血为止”，用监禁来处罚盗窃犯。他们认为重刑可以阻吓犯罪，犹如宽恕和慈悲能使人谦恭服从。虽然判处绞刑的法令增加，但 18 世纪里在绞架上处死的人并没有明显增加。这是因为陪审员、法官和内政大臣们，总是到了最后关头发慈悲。这样注重人情和灵活运用刑罚的做法，乃是英国父道统治的真谛所在。但是当被处以重刑的偷猎犯和走私犯并没有真正认罪时，法令的专断性质会激起他们的愤怒。此刻法律不再起阻吓犯罪的作用，而是使他们确信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那句格言的正确性——“法律压榨穷人，富人掌控法律。” 465

在 1720 年代，温莎森林的民众与王室猎场看守人和法官进行抗争，以保卫他们长期以来享有的拾柴、捕鱼和打猎的权利；在 1740 年代，苏塞克斯郡的走私帮派与皇家税吏为敌，以保住他们在上流社会垄断的贸易中的份额；1750 年，斯塔福德郡的农民和茅舍农捕杀了 10000 只兔子，根据狩猎法这些兔子属阿克斯布里奇伯爵（Earl of Uxbridge）所有。这些兔子糟踏了他们田地里的庄稼。在上述这些争斗案件中，法律都取得了胜利，偷猎者和走私犯都上了绞架，捕杀兔子的人也被监禁。下层人民为官府的权威所震慑，只得俯首听命，但最终会以暴乱、酗酒、犯罪和骚动的方式爆发出来。在绅士和商人平和安详的社会下，民众都是在生存线上挣扎，一旦病人、失业者、老人像许多人那样沦为歉收和高物价的牺牲品，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下去。生活艰难而残酷，获取温饱的挣扎永无休止。唯有酗酒（如畅饮杜松子酒）才能得到一点儿安慰，这种恶习成为流行病。各处的人们都是怒气冲天，而且抢劫、偷猎、仇杀、争吵、决斗和凶杀泛滥成灾。 466

对付这种遍布各地的暴力和暴乱的工具，有上层阶级的专制统治，还有慈善事业和经济的进步。慈善救济以捐资的方式为儿童办学校，为老人办救济院，为贫民办济贫院。这个英国的古老传统在 18 世纪延

续下来，建立的慈善基金就有 973 种之多。此外，其人道主义还造就了一种新的慈善事业，即慈善社的问世。慈善社每年筹集许多捐款，用于规模较大的慈善项目，如贫民教育和生活改善。热心的慈善家们创办的各种慈善学校和医院。但是慈善学校教的课程很少，大部分只存在了很短时间，而许多慈善医院只是在传播疾病。但其中也有取得很大成功的案例，最为突出的是著名的收养孤儿的慈善机构——伦敦育婴堂（Foundling Hospital）。它得到了霍格思、雷诺德、亨德尔（Handel）以及英国一些知名贵族的支持，拯救了数不清的儿童。但在改善穷人的状况方面，慈善事业远不能与经济进步相比。

1714—1760 年，经济进步虽然缓慢却很稳定。在农业方面，圈地制继续在取代敞田制，轮耕制的产量不断增加，牛羊的品种得到改良，田地排水和施肥也更为普遍。制造业也取得了进步。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发现了用焦炭而不是木炭熔铁的方法，托马斯·纽康门（Thomas Newcomen）运用了蒸汽推动引擎的办法；约翰·凯伊（John Kay）制成了飞梭，加快了织布的速度。安布罗斯·克劳利（Ambrose Crawley）在纽卡斯尔建了一座大铁厂，在苏格兰新哈丁顿（New Haddington）开办一家雇用 700 名工人的纺织厂。在北部，村民们用羊毛、亚麻和棉花生产更多的纺织品，布匹商人发家致富。但是，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并不同步。工业革命还没有出现。由于人口增长缓慢，对于商品的需求还很小。买面包的人减少，谷类价格就会下降；能做工的人减少，工资就会增加，而农业就一蹶不振。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被瘟疫击倒的幸存者来说，高工资和低价面包就等于生活水平的提高。1760 年之后，英国人口激增，物价再度上涨，农户和工匠兴旺起来，英国于是到了工业革命前夕。这时，乔治一世、乔治二世都已故去。他们的稳定统治没有受到革命的震荡。他们手下的政治家构建了一个以代议制政府、立宪原则和富人统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英国的造船主和海员们创建一支海军去赢得了一个帝国；同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创造了一种精致而优美的文化。革命和社会变革将是下一个时代的事。

467

阅读文献

Jeremy Black, ed. , *Britain in the Age of Walpole*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论文集中不同作者的8篇文章论述了这个时代的稳定，很有见地，特别是主编对外交政策的精辟分析。

Ragnhild Hatton, *Geoge I, Elector and King*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该书为乔治一世作了强有力的辩护，认为他是一位卓有才能的政治家、心地热忱的人物和握有实权的君主，与以往的看法很不相同。

Dorothy Marshall,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 London: Longmans, 1974. 这是一部经典之作的新版，详尽而深刻地剖析了1714—1784年的英国历史，以对社会生活的论述见长。

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该书对地主阶级的结构和壮大以及他们作为地产管理者、市镇官员、议员和社会领袖的日常行为作了清晰和深刻的阐述。

John B. Owe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 Totowa, N. J.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5. 该书对1714—1815年的英国历史作了精辟的考察和阐述，各章分别论及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参考文献很有价值。

J. H. Plumb, *Robert Walpole* : Vol. 1, *The Making of a Statesman* ; Vol. 2, *The King's Minister* , London: Cresset Press, 1956 & 1961. 这是一部经典的传记，揭示了辉格党崛起期间的政治内幕，以18世纪的视角观察和描述了精明老练的沃波尔。

Roy Por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London: Allen Lane, 1982. 这是一部社会文化史著作，认为18世纪是一个注重资本、物质和现实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等级的、世袭的、特权的和由习俗和传统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Pat Rogers, *The Augustan Vision* ,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

son，1974. 该书对18世纪中期英国的思想和艺术观点进行分析，指出与现代思想和艺术的区别。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in England, 1714—17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该书主要论述政治史，极具洞察力，开篇部分精确分析了18世纪早期英国的经济、社会和宪政基础。

A. S. Turberville, ed., *Johnson's England: 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Manners of His Age*, 2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3. 收录有30篇论文的论文集，内容涵盖范围包括陆海军、饮食、服装、体育、绘画、戏剧、教育和医疗。

468

Basil Williams, *The Whig Supremacy, 1714—17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这是一部对汉诺威王朝早期英国所作最清楚、最全面的著作之一。其较为陈旧的观点已有其新的编者 C. H. Stuart 更新，同时并未弱化其睿智的考察。

E. Neville William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nstit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该书汇集了最全面的有关18世纪英国宪政和政府的文献。

第十八章　英国经济和社会变革：1761—1815年

469

1760年，当乔治三世开始他长达60年的统治时，他没有理由认为这不是一个照样会保持稳定的时代。确实，在许多人看来，这时候还算稳定。到1820年，诺福克的农民还在轮耕，伦敦的律师照常出庭办案，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依然在输入食糖，萨塞克斯的绅士仍然在搞竞选，德文的水手驾船的方式与1760年毫无二致。在这60年中，拥有土地的乡绅和贵族也没有丧失他们的优越地位。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是全部都变的，连所谓的过渡时期也是这样；也没有一个时期是一成不变的，连所谓稳定时期也是如此。但是在许多人眼中，所发生的变化却是非常重大的，例如乡村劳动者的茅舍在圈地运动中消失；乡村儿童被送进棉纺织工厂做工；手工织机在机器织机面前败下阵来；小成衣工匠变成大工厂老板；农民因战时利润而致富，因此1820年的英国与1760年的英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的确，居住在一个由650万人迅速发展到1200万人的国度里，只此一点，就会令人感觉到巨大的不同。

人口激增只不过是乔治三世时期英国的若干变迁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它把蒸汽动力运用到纺织、炼铁、矿山机械和牵引轮船火车之上。重要性仅次于工业革命，而且影响更为广泛的是农业的

改良和手工制造业的扩展，真正将英国变为世界工厂。

人口、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变化，是英国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核心。这些变化，彼此互相影响，也和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其他变化交织在一起，构成19世纪英国的工业、城市、民主和帝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里，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一个人丁兴旺、万民温饱的国度。

470

人口与食品的同步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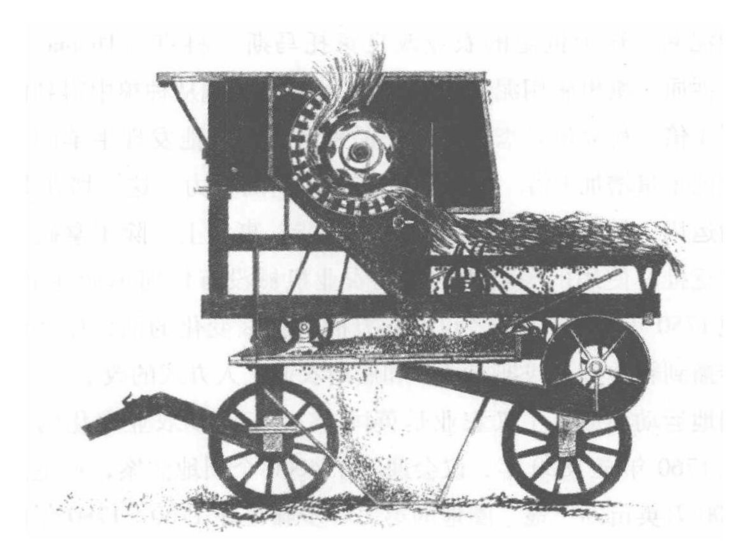
在英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件事情能够像1760年至1820年人口由650万骤增至1200万这样富有戏剧性。这一惊人的人口激增的原因，一方面是死亡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出生率的上升。这一点得到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们的认同。但是，对于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更重要，学者们意见不一。有些人口统计学家认为死亡率下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认为医药和医院两者的改进减少了疾病死亡。其他人口统计学家怀疑医药或医院减少死亡之说，认为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工业地区鼓励早婚，导致出生率的提高。还有学者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医药进步没有减少死亡率，不过他们依然认为死亡率降低是决定性因素。他们将死亡率降低归功于环境的改善，如住宅的改良、饮水的清洁、垃圾的处理、衣着的整洁，尤其是饮食的改善等等。人口激增造成粮食需求大增。农民们成功地满足了这一需求。

农民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增加耕地，并更有效地加以利用，重点是增加耕地。18世纪，英国粮食的增产幅度约为43%，刚刚能应付得了40—50%的人口增长。此项增产通过两个方面的途径实现，亩产增加10%，耕地面积增加25%。田地利用率的提高，则一方面来自圈地运动的推广，一方面来自都铎王朝以来农业技术的改良。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以作物轮作法的推广最为重要。在诺福克郡，人们用四年轮作法播种大麦、小麦、芜菁和三叶草，田地从不休耕。芜菁和三叶草都能增加土地地力，还能用作牛羊牲口的冬季饲料，牛羊粪便则可肥田。土地的改良方式包括改善排水条件和施用石灰、白

垩土和泥灰。这个世纪的农业改良家托马斯·科克（Thomas Coke）通过在沙质土壤里施用泥灰，在 15 年时间内将他从种粮中得到的收入增加了 4 倍。科克还是杰出的牛羊品种改良家，他发现牛羊的选种能使它们的重量增加 1 倍。马代替牛作为牵引的畜力。这一切在 1750 年已广为运用，但农业机械的改良尚未起步。事实上，除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广泛推广使用的脱粒机之外，农业机械没有任何革命性的变化。如果说 1750 年至 1820 年之间农业方面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就是老技术传播到新地方，或拥有地产和雇用农业工人方式的改变。

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农业是英国 18 世纪晚期农业变化的关键因素。从 1760 年至 1820 年，议会通过了 4000 个圈地法案，地主阶级圈占了 800 万英亩的土地。圈地的第一个步骤是在 1760—1780 年间，通过筑篱和合并的方式圈占大量敞田制耕地；第二个步骤发生在法国战争期间，通过筑篱方式圈占荒地和公地。一个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可以用最彻底的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农产品产量增加了，农业所需要的人手增加了，地租上涨了 1 倍，农村人口大增，而粮食价格下降。 471

但是，这些进展却付出了社会代价。小地产所有者再也守不住他们那几英亩地，茅舍农丧失自己的一小块园地，丧失公共牧场放牧和拾取谷粒的权利，丧失在荒地或森林砍柴的权利。如果按货币价值衡量的话，这些损失同大为增加的农产品和就业机会比起来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些损失是痛苦的、无法弥补的。诚然，议会派遣的圈地委员通常会给茅舍农一些金钱补偿，给被圈占部分土地的主人一小块圈地作为补偿，但是多数茅舍农很快就把钱花光，小土地使用者多半也没有钱来重新筑篱和耕作土地，往往将地卖给大地主了事。这些人有的沦为佃农，有的去城里或殖民地谋生，多数沦为乡村无产者。他们再也不能够到公地上去放养他们的牛、猪、鹅群，在小块地上开荒种菜，拾泥炭或草柴做燃料，而且也不能作为占地者搭建栖身的茅棚。失去燃料意味着他们连面包也不能烘烤，冬天只得挨冻。而没有牛和猪，南部的食物只有面包和奶酪，北部则只有麦片粥



打谷机（*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和雀麦面包。圈地运动，还使冬季的失业情况更加严重，将乡村的茅舍农迁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强化了茅舍农的孤独感和怒气。圈地运动虽然可是供应1200万英国人的口粮，但像许多经济增长一样，也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公平。

472　一些地主意识到了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也确实同意提供小面积的园地，但很少予以兑现。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农业权威阿瑟·扬（Arthur Young）写道："在20次圈地中，有19次发生损害穷人的情况，而且损害的程度极为恶劣。"事实上，圈地运动只是一个意义更深远的发展变化的一部分，这个变化指的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乡村无产阶级的出现。自从17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的地主们一直在购置越来越大的地产，将田地按越来越大的单位和愈来愈短的租期租给佃农。他们逐渐将地产作为企业来经营。地主将田地抵押出去，借款购买田庄，将圈地合并重整，然后缩短租约，提高租金，招进像磨坊主那样有事业心和资本家味道的租地农场主。于是，租种15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成为变成了乡村里新的三级经济结构——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关键角色。他们是眼光锐利、办事精明和冷酷无情的资本家。在战争中发家致

富后，他们就购置了漂亮的马车，盖起了宽敞的房子，摆出绅士的派头。当时最著名的记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关注这个情况，“当农民成为绅士时，农工就成为奴隶。”他们不再按年付给农工工资，而是改为按星期付工资，以便在下霜之后就将工人辞退。而且，他们也不再让农工住在他们家里。在北部，因为要与制造业竞相招募工人，所以，租地农场主每星期要付 11—13 先令的工资给农工。但是在南部，人口激增使工人供过于求，工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租地农场主每星期就只付 7—9 先令，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盈利。

市场经济和商业精神风行农村地区。地主与租地农场主的地租和盈利在 1790 年到 1820 年之间几乎上涨了 1 倍，而农工的实际工资仍然不变，仅够维持生计。在那些由一两个地主控制的封闭教区，茅舍或被拆除，或还没有建成。为什么要建那种房呢？那只会招引贫民而提高贫民的比例。于是，被剥夺的贫民就只能涌入开放教区的那种只有一个或两个房间的土筑茅屋，或挤到邻近城镇的贫民窟里去。这些地方都是拥挤不堪的，常常又冷又湿，在这样的地方，性关系的混乱不可避免。

18 世纪最冷的三个严冬，在农业歉收的 1795 年创造了最冷的记录。有些地主为了缓和一下新兴资本主义式的压榨，把那老一套的家长作风搬了出来。那时正值法国革命战争，面包的价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柏克郡的治安法官在斯宾汉姆兰德召开会议，投票决定对工资不敷生计的工人发放贫民救济金。议案出于慈善目的，反映了旧时代的乡绅的慈爱精神，但在事实上却产生了恶果。因为这诱使租地农场主们继续保持低工资，也使能够独立的农业工人去领取救济金。要是教区答应补足 2 先令，那么为什么要付工人们 9 先令，而不付 7 先令呢？要是教区把懒惰和勤劳者的工资拉平，那么为什么要卖力干活呢？《斯宾汉姆兰德议案》不是议会通过的法案，只是一个由柏克郡的治安法官们通过的议案，并没有在全国统一执行。但是在世纪之交，为低工资者提供教区救济的做法在南部普遍推行，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工人的赤贫化。尽管这种以救济金补助工资的办法 1834 年已经很少使用，但工人工资却没有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地主们越来越富裕， 473

农工却贫困不堪，他们的工资仅勉强维持生活，常常连住的小茅房也没有，使用公地的权利也被剥夺，成为被抛弃者和被压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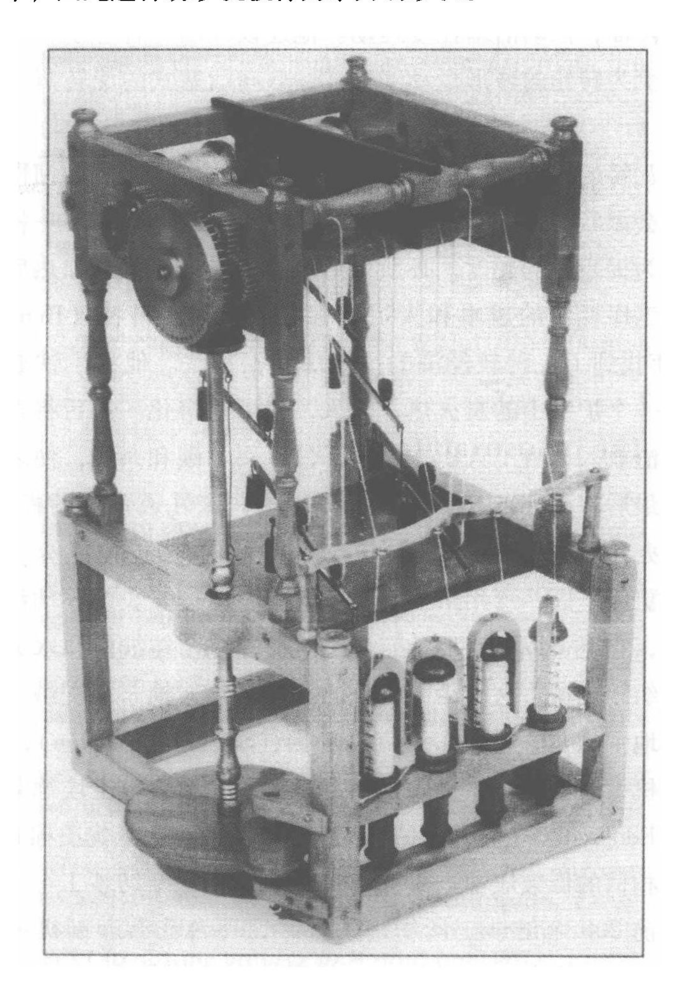
但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农民将谷物产量从1760年的1700万夸特增加到1820年的2800万夸特。产量大增的原因在于圈地运动的发生、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和有效农耕方法的推广，而不是因为农业技术方面出现了突破。如果说1760—1820年间发生了农业革命的话，那么这种革命发生在地产和劳动组织上，而不是发生在作物轮作制上。这种资本主义化程度更高的组织形态，与工业领域更为激烈变革完全一致。

工业革命

在1760年代，英国工业处于繁盛和扩展之中，但对于许多有雄心大志的企业家来说，仍速度太慢。他们感到不满的三个问题是：纺出大量成本低廉棉纱的能力欠缺；高强度精炼铁生产方面的限制（原因是木炭供应的下降和熔铁炉的不足）；动力（风力、水力、人力、兽力）供应不足。这些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几千年来，人们靠手指纺织，靠原煤冶炼，靠牛马和风车、水车磨稻麦或从矿井里拖煤，人们对这种劳动方式已习以为常。但是，1760年代的经济繁荣、企业活动和科技进步，使英国人确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18世纪早期的三项特别的发明，最有助于1760年代的技术创新：1705年托马斯·纽康门的蒸汽引擎，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的焦炭冶铁和1733年约翰·凯伊的飞梭。这三项发明，每一项都使后来的人做出新的发明。例如凯伊的飞梭，可以只需一个工人就能织出较宽的布，也织得更快。而织布效率的提高，加强了对棉纱的商求。迎接这方面的挑战的是：詹姆士·哈格里夫斯（James Heargraves），于1765年发明了纺纱机；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于1767年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哈格里夫斯的办法是在一个长方形架上，一头排列8个或10个竖立的纺锤，另一头是装有小轮的托架，8—10条梳好的棉花条子由小轮推出。纺纱的人一只手推动托架，另一只手转动纺纱的轮子。这是一个可同时纺多支纱的纺机，但仍用手工操作。而且纺出的纱线太弱，不适

合于用作织机的经线。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织机使用了机械力，能生产较坚韧的纱线。其法是将梳好的棉条从两套转轮之间推出。这两套转筒，每套有两个筒，一上一下，彼此抵住。棉花条子由两筒之间挤出。因为第二套转筒传得快一点，所以棉花便被纺成一条纱线。这条纱线牵到纺锤上，纺锤将线拧一下，使线得以加强。这样纺出的纱线坚韧，可以用作织机上的经线。这种纱线完全是机制品。由于推动纺纱机的是水车，因此这种纺纱机被称为水力纺纱机。 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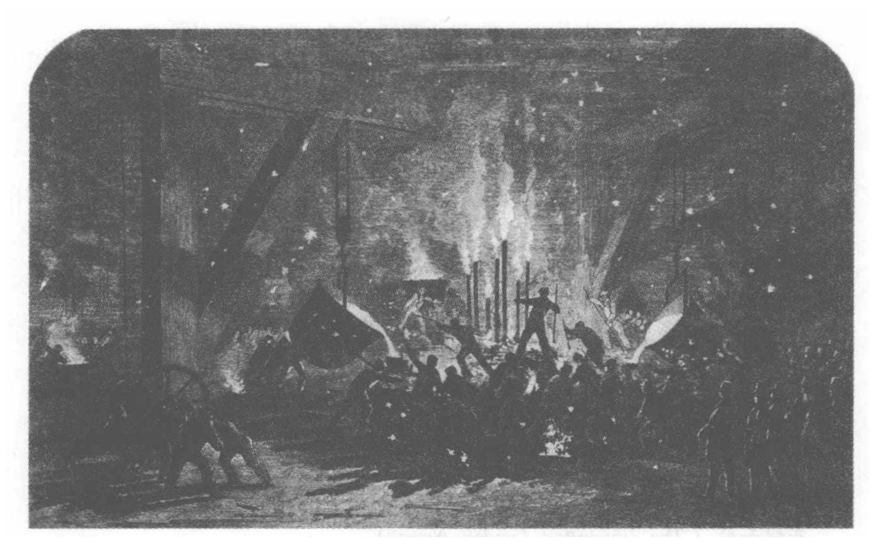
理查德·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纺纱机也可以用蒸汽引擎推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于1769年申请了一项专利。瓦特是格拉斯哥大学科学仪器制作工，学校给他一部纽康门引擎加以改进。纽康门引擎的问题是效能太低。它用炭火产生蒸汽，用活塞将蒸汽送入气缸，但没有直接利用蒸汽的膨胀力，反将冷水引入充满蒸汽的气缸，令蒸汽凝缩，形成真空，外部气压推动活塞向内运动，推动水泵运转。瓦特发觉冷却气缸所损耗的能量太大，于是他重新设计了一部引擎，将蒸汽膨胀压力依次直接作用于活塞的两面，推动活塞往复运动。他还设计出一种方法，将活塞的直线运动变为转轮的环形运动。这样，双向活塞式的旋转蒸汽机便产生了。

475

制造瓦特的蒸汽机需要一种比达比的生铁更加坚硬、韧性更强的铁。贵格会派教徒达比首次用焦炭——在窑里烧制的炭——将铁和矿渣分开。为提高铁的硬度，必须将生铁放到炭火里重新加热后在再锤打，这种工序耗费的成本和人工都很高。亨利·科特（Henry Cort）于1783年找到了一种较经济的搅拌法和碾压法。他将生铁放入转炉中，将另一个炉室中的炭火热量输入，使生铁熔化。然后将含丰富氧化铁的矿渣放入，由工人用铁棒搅和，以剔除碳和杂质，使之不再污染生铁，最后将铁水倒出，去掉杂质，由辗床轧成预定的板材备用。采用这种办法后，时间效率提高了15倍。炼出来的铁较为坚韧，制成的蒸汽机更为坚固，可用来抽水、从煤矿中吊运煤炭或驱动汽船和火车。同时，它还可以驱动那种骡机——一种综合纺纱机和水力机的优点制成的纺纱机械。这种动力机械的作用是织造棉布或呢绒。兰开夏郡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于1779年发明骡机，而动力织布机则是牛津学者、国教会教士埃德蒙德·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于1785年发明的。大量优质棉布，能以令人难以相信的低廉成本进行生产。1812年，一个纺纱工可以纺出新机器发明前200个纺纱工所纺出的棉纱，一台花布印制机可抵得上100名印花工匠的产量。1784年，每码棉布的售价为11先令，而到1832年降为1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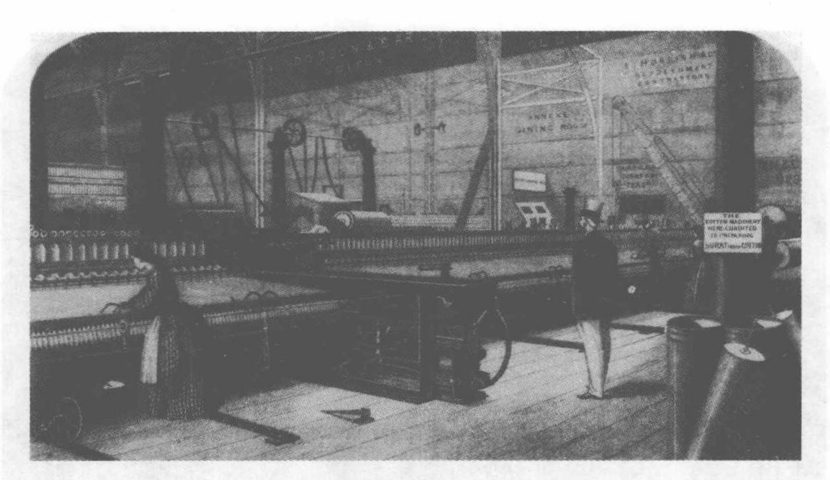
476



倾注铁水（*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765 年之后的 20 年中，这些机械方面发明问世，构成了工业革命的核心。一旦有了这个开端，技术进步便没有止境地发展，工业革命是一个不断前进和自我繁衍的过程。它所包含的不仅限于技术发明，477 还包括对资本、劳工和管理的系统化和合理使用。它要求悉心收集原料并把之廉价转运到工厂，以有效的劳动分工大量增加生产，注重大批量生产，努力降低成本和扩大市场。这种企业精神，最好以那位统筹全局的陶瓷业大王、斯塔福德郡伯斯伦城的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为例说明。他的座右铭是“凡事均以实验为重”。那种白地蓝花碧玉瓷器是试验了 1 万多次才烧制成的，他本人因此而一举成名。韦奇伍德通过严密的分工，降低了成本，以使其产品有一个庞大的市场。

乡村和手工工场经营者大力提高和改进工具和技术水平，其速度与工厂的发展不相上下，后者雇佣工人的数目更多。英国的经济变革并不是都采用蒸汽机或建立纺织厂。在 1800 年，投入使用的瓦特蒸汽机只有 490 部。1814 年，国王棉纺厂只雇佣了 10 万名工人，其中成年男子不到一半。而且，鞋匠比工厂工人的数目多 3 倍，裁缝与矿工、



19 世纪中叶，纺纱机比以前更庞大、更复杂、更高效，但仍离不开辊和锭（*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铁匠与炼铁工人的数目对比也是如此。到 1830 年，只有 10% 的劳工拥有在工厂工作的经验。

世界金融和贸易的扩展也是十分重大的事件。长期以来，以上两个方面一直是英国经济中最富裕的行业。巴林公司（Barings）和罗思奇尔德公司（Rothchilds）从西部的羊毛贸易和曼彻斯特的棉花投机生意中发财致富。此后，又通过战争期间对金银和政府债券及私人公司债券的投机经营，这两个公司成为 19 世纪两个最大的银行。对于英国经济变革来说，伦敦城的贸易公司和银行与北部的工业大亨同样重要。英国的贸易商、银行家、经纪人和保险商控制了世界金融和贸易。同时，英国商船队（早在 1776 年就有 9400 艘之多）控制了海上运输和海上商业活动。工匠和店主的活力和魄力与金融家和贸易商的财富和力量都要予以重视，特别是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尤其如此：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 18 世纪的英国呢？

478

工业革命的原因 工业革命源自于 18 世纪英国经济的四种特性。第一是资本、劳工和原料的充斥；第二是社会对制造品的强烈的需求；第三是英国经济没有过分的管制束缚；第四是阻碍经济发展的

瓶颈，通过发明创新能够消除。

充足的资本和劳力是经济健全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又都认为资本的积累尤为主要。如果数以千计的英镑和数以百计的劳工，就无法制造瓦特的蒸汽机，无法产生科特用于炼铁的反射炉，或用水力机装备一个工厂。幸运的是，18 世纪晚期的英国，两种条件均已具备。人口激增和粮食生产骤增，使英国有充足的人力供应给新兴的工厂；同时，商业、制造业和农业的繁荣兴旺也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工业资本还因为有 600 家地方银行和 70 家伦敦银行竞相增加放贷而大为扩大。1763 年，银行贷款的利率降至 3.75%。这时，用在国际战争和建筑乡间别墅的钱，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德国，都远远超过于用在制造水力机、纺纱机和蒸汽机的资本。所以，资本的供给情况，并不能成为解释工业革命何以出现于英国而不出现于欧洲大陆的关键因素。

关键因素也许是原料的丰富。但是这也有问题。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第一个突破是棉纺织方面，而英国根本就不出产棉花。第二、第三个突破是把煤转化为蒸汽动力和用煤炼铁。虽然这两个突破似都指向英国庞大煤矿的开发，但以煤炼铁是出于缺乏木炭，而发明蒸汽机则是由于缺乏水力和马匹。英国面临的挑战是资源不足而不是原料丰富。法国的大片森林使之具有巨大的产铁优势，所以不会探寻以煤炼铁的办法。1790 年以后，充足的资本、劳工和煤炭是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这并不能解释 1760 年代和 1770 年代的技术进步。

推动哈格里夫斯、瓦特、科特和资本合伙人去发明并制造纺纱机、轧铁厂和蒸汽机的是那对布匹、生铁和工业动力的巨大需求。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英国这样对标准化和高质量的制成品有那么巨大的需求。479 这种需求是大批量生产和巨额盈利的必备条件。而所以有这么巨大的需求，最显著的原因之一便是英国的海外贸易不断扩展。从英国开往欧洲、北美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和印度的船只都载满了出口商品。此外在那个世纪中叶，出口贸易出现停滞时，爱尔兰也成了一个好主顾。但是，最大的市场还是英国本土市场。1770 年，它消化了英国制造品

的77%。1770年，英国富人的数目比1701年时多。同时，英国开凿了更多的运河，河道的深度加大，道路改进了，这些都降低了布匹、铁器和瓷器的成本。在1000英里的内河航道之外，长距离的沿海航道，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道路交通网，都使英国成了世界最大和最完善的自由贸易区。这时英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比一个世纪以前上升了15%，是莱茵河流域和法国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而食品价格在1750年比1720年下降了15%，英国工人购买制成品的钱相对增多了。由于国民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都归于中上阶层及从事制造业的工匠们，于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得到扩大，如韦奇伍德碧玉瓷器、猎用枪支、精致刀剑、精美陶器以及各种服装都很有销路。

英国经济有利于工业革命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过度的限制。没有行会来告诉阿克莱特纺多少棉纱，没有市政委员会禁止使用动力纺织机，没有内地税妨碍通商，也没有任何村庄要求农民必须从事农业。英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重商主义的规则，《航海法令》规定英国的制造业者有独占殖民地商业之权，另外一些法令也保护英国本国的成衣业。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工商业的措施，废除了妨碍工商业的规定。由于既没有税征负担，又不受政府干预，也不受旧式行会或者新式工会的约束，因此工业革命是自由经济的产物。

法国的企业家们，虽然不像英国企业家那样不受约束，但还是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法国的重商主义；在理论上很有建树，但实行起来效力不见得那么大。法国也有迅速发展的海外贸易、日益增长的人口、不断提高的收入、对物质的强大需求以及充足的资本、劳工和原料，但是在18世纪，法国的商务状况、工资水平、市场需求和资本供应诸项，按平均人口来计，都不及英国。

同时，法国的企业家们也缺乏对一个企业家形成挑战的那三个瓶颈：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纺织工业区缺乏纺织工；生产熟铁缺乏足够的木炭；煤的开采和铁的冶炼缺乏更为强大和稳定的动力（当时的动力由马匹和水力提供）。上述对纺织、冶炼和动力的无比强烈的需求，这些瓶颈对于发明而言显然是一种刺激。纺织工人的缺乏只是地方性

问题，因为从整体上来说，英国当时人力过剩。但是，虽然只是地方性问题，却非常令人伤脑筋。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成衣创造商，越来越发现他们得到七八英里以外才能找到懂得纺织的村民。这些村民知道他们的工作和制成品在市场上的需求十分强大，便偷盗棉纱和布料，480 并且索取很高的工钱。而成衣制造商却不能迁徙到纺织工多而工价低廉的地方去，因为他们需要附近奔宁山脉的溪水来推动那梳理棉花和浆洗布匹的机器。如果有一种机器能够纺出棉纱，那就可以降低企业家们的成本，使他们不再受制于越来越高的人工成本。

炼铁业的厂主，则面临木炭价格越来越高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得亨利·科特等人设法用煤生产熟铁。如果成功，则煤的价值将更大，因为本来家庭取暖已使人感到煤的珍贵，更何况它已被广泛地用于生产玻璃、肥皂、食盐和染料。但煤矿的开采，本身已经碰到瓶颈：到1750年，表层可开采的煤层已经采尽。而要开采较深的煤层，就需要用于排水通风的大功率动力机。这种动力机应当不像一个煤矿所使用的500马力动力机那么笨重，也不像纽康门蒸汽机那么低效。瓦特的蒸汽机提供了解决办法，而煤炭生产的瓶颈导致了这项发明。

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需要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或彼此促进。1767年至1790年间，最重要的是国内市场的繁荣、海外通商的鼎盛和人口的增加，三者的相互影响引起了对商品需求的递增。而商品需求的增加，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体现在布匹、熟铁和动力的生产遇到瓶颈障碍的挑战的时候，其反作用力正好刺激人们发明水力机和蒸汽引擎。这种力量，也会反映到其他经济力量上面。比如，资本和劳工的充裕并不能直接解释纺纱机和水力机的发明，但可以说明英国修运河和公路的能力所在。这些运河和公路有助于降低原棉运到纺织工业区和纺织成品输出的运输成本。这对棉制品的价格下降起到了关键作用，导致需求的增加。同时，资本和劳工的充裕对于19世纪初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的到来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工业资本家兴建了庞大的造船厂、巨大的铁路网、多层厂房工厂和巨型的钢铁厂。

对于工业革命的原因，都是从经济力量的角度，如资本、劳工、

商业、需求、运输和生产等方面来分析的。然而，难道就没有一项社会的、政治的或文化的力量，可以帮助解释那些引起工业革命的经济变迁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其作用常与经济变迁相互混合，很难截然分开孤立看待。社会的力量，尤其如此。1760年的英国社会，虽然确切地说是金字塔型的，但它比欧陆国家的社会更为开放自由，更加流动不滞，阶级歧视也较少。贵族和绅士，商贾和农民，在巡回审判庭里常常自由来往毫无隔阂，商人和工匠们常在一块喝酒，贵族的幼子们常常经商，富裕的商人可以变成绅士。结果，一种企业家的雄心和精神弥漫于各阶级中。各阶级对某些东西如服装、瓷器、五金制品等等的共同嗜好，养成了人们对标准制成品的巨大需求，其数量大到必须用机器生产。英国的政治制度也有助于工业革命。英国议会里有很多热心改革自己田产的地主和发展自己业务的商人，他们可以保证圈地运动法案的通过，否决或废除妨碍商业的法案。英国经济之所以成为欧洲最自由的经济，与代议制政府有密切的关系。

481

这样，社会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给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构架，但是，这两方面的力量对新机器的制造者和探索者的影响，却不如对发明家和企业家思想观点那么直接。在这些发明家中，只有卡特赖特上过大学，但那时的牛津大学并未开设科学课程。詹姆斯·瓦特自学了科学课程，但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并不是一名学生或教师，而是科学仪器修理工。瓦特是一名修理工、实验员、革新者，如同许许多多的水车技工、锻工和乡绅一样，其一系列发明很少得益于物理学和化学在理论上的进展。科学进展能够带来技术进步的信念，确实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754年创立的皇家美术协会（Royal Society of Arts）就是明证。但是，那些具有开创性的发明并不是源自这些协会的出版物，技术进步也不是源自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在科学进展和科学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远在英国之上。然而，尽管牛顿的运动定律和波义耳的气体定律并没有导致瓦特蒸汽机和科特搅炼法的问世，但这些发明表明对于系统化考察和实验的普遍信任。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teste）、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和约

翰·洛克以此构筑出英国经验主义。有关实验方法合理性的信念甚至鼓舞了数不尽的企业家，他们在经济上的实验和对于盈亏的计算，同样有助于解释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的原因。

这些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观念，还有一种特性，即清教主义。当时活跃于工业革命中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半数是非国教徒，虽然英国人中该教派信徒只占 5%。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韦伯指出加尔文主义关于上帝召唤每个人都尽其所能的信念，使工商业者人人都变成了奋发图强的资本家，尤其是这种信念和清教的勤俭、勤奋、清新的道德观结合在一起时，作用更为突出。天主教国家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兴旺，使得这种理论颇令人怀疑。但是在这些年里，半数的发明家和企业家都是非国教徒，却是事实。对于其原因，一种观点认为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非国教徒的教育十分出色；另一种观点则以为非国教徒被排斥于军队、法律、政治、大学和国教教堂之外，所以不得不从事工商业以求出头。像发明家的实验主义和企业家的唯理主义一样，新教伦理显然也在发生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确切性质、影响的程度、来源何在，都不甚明显且很难把握。

工业革命的结果　从长期来看，工业革命将英国变成了一个富庶和城市化的国家。工业不仅创造了新的商品和服务，也把原有的商品和服务扩充了若干倍。工业建立了许多大城市，而用铁道、汽车和飞机将它们连接起来。工业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两个阶级都争取而且赢得政治权力，并争夺更大的国家财富份额。若干新技术——信息迅疾的报刊、电影、广播和电视——也使英国的文化发生了剧变。从长期看，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物质进步、政治权力和剧变的全民文化。但是，如果就短期而言，工业革命的好处是怎么样的呢？它在 1790 年至 1850 年间改善大多数人民的物质生活了吗？历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被称为“悲观派”的历史学家，起草了令人生畏的诉状来攻击工业革命：强迫儿童

482

每天工作16小时，将工人挤入贫民窟里，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摧毁了他们的手工工业，剥夺了他们的工具和尊严，将他们扔进没有灵魂的工厂和城市。被称为“乐观派”的历史学家，则针对以上这些指责作了强有力的辩护。[①] 工业革命创造了许多充满机会的城市：给千百万人口提供了工作，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并给予他们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更大的作用。这场辩论，展示了1790年至1850年间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许多方面，致使英国人民的生活的本质发生变化。

悲观论者的诉状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工厂和煤矿使用由蒸汽驱动的机器，许多这种工厂和煤矿使用童工，因为这样工资低廉。纺织工厂里的童工年龄是4—12岁。“6岁的童工并不少见”，一位1832年的目击者说。“5岁半的童工并不罕见”，一位在1842年参观了一家煤矿的人说。他还说有些儿童是4岁就入矿坑干活。煤矿和工厂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天12小时，在需要赶工时代工作时间会更长。在煤矿里年纪最小的童工被迫独自在完全黑暗的地方干满12小时。在纺织厂里，儿童要照看纺纱机，这项工作需要持续小心地看守，人必须来回走动。纺织厂和煤矿的工作条规非常苛刻，而且执行非常严厉。煤矿和工厂，对儿童来说都是有害健康的地方。儿童的母亲受雇做工，对家庭生活很有妨碍。当时在工厂城镇的贫民窟中干活的母亲，所生孩子中的1/5活不到1岁。由于60%的棉纺织工人是女性，因此所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十分惊人。童工长大后，常常被开除。他们身体虚弱，又未受过教育不适宜于干别的工作。这种工厂诚如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言：“黑暗的魔鬼工厂。”

悲观论者也抨击工业革命毁灭了手工行业，手工工匠纺纱、织布，打制钉子，织袜缝鞋，用他们的工艺满足数以百万的人的需要。在

---

① “悲观派”的观点表述最全面的见于约翰·哈蒙德、芭芭拉·哈蒙德（John and Barbara Hammond）、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和E. J. 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的著作。“乐观派”的观点则参见J. H. 克拉彭（J. H. Clapham）、T. S. 阿什顿（T. S. Ashton）和R. M. 哈特韦尔（R. M. Hartwell）的著作。

1790 年代和 1800 年代，这种手工工匠大多数都享受了巨大的繁荣，因为纺纱机大大地减少了他们所用的棉纱的成本，同时，冶炼锻造法也降低了铁杆的成本。手工工匠就是用这些降了价的材料来生产布匹、袜子、钉子等。在这个黄金时代，他们每星期的收入超过 20 先令，这种丰厚的收入当然会引起其他工人的羡慕并大量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也促使企业家们将纺织工和制钉工们集中在较大的厂房里劳动。甚至在动力纺织机、织袜机和制钉机还未广泛应用时，手工工匠已经发觉他们的收入减少了。蒸汽机的使用终于把手工工匠一扫而光，如拉绒厂就淘汰了用手工拉绒的手工工匠。

这些手工工匠以往都是在家里工作，收入很可观，社会地位也相当高。因为工厂里对工人管理太严格，他们认为有失身份，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手工工匠在 1830 年代宁愿以每天工作 16 小时而一个星期只拿 4 先令来保障他们的独立，他们的挣扎是注定要失败的。手工织机工匠是继农业工人和家庭仆役之后数目位居第三的就业者。迟至 1834 年，还有 84 万人以此业为生，但到 1850 年，使用手工织机工匠就寥寥无几了。中部地区数以千计的织袜工人和约克郡数以百计的手工拉绒工人，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因此，当 1811 年至 1816 年兰开夏郡、约克郡和中部地区的这种手工工匠因愤怒而将有些不守陈规的雇主们的拉绒机烧掉，将动力织机砸烂，将织袜机捣毁时，就不足为怪了。但他们企图阻挡技术进步潮流的努力是徒劳的。诚然，他们起初的困难，并不是源于机器，而是由于纺织工人人数猛增。可是，最后确是机器生产摧毁了他们的行当，这行当曾经给成千上万的手工工匠以衣食温饱，并且给予他们以自尊心和独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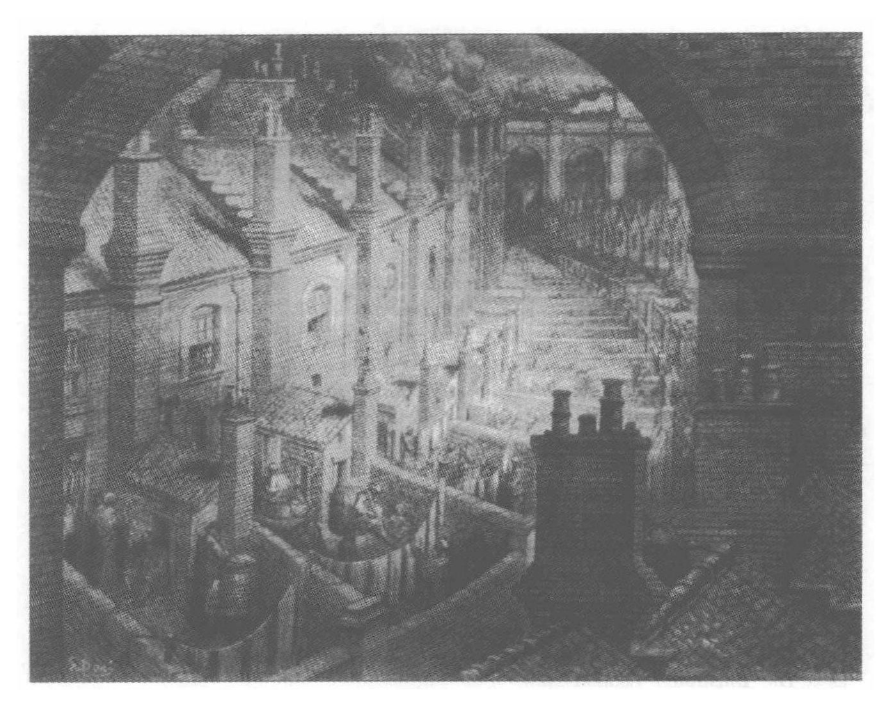
产业工人阶级所经历的最恶劣的处境，是居住在污浊、拥挤不堪和发展迅速的城市里。悲观论者所抨击的第三点就是城市里的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生活状况。1750 年，只有 1/5 的英国人住在 5000 人以上的城市里。而到 1850 年，这个比例增加到 3/5 以上。在这些年中，英国人口每 20 年增长 1 倍。1760 年，曼彻斯特的人口是 17000 人，而到 1851 年增至 367000 人，增长 21 倍之多。这类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并不是宜居

城市。起初，那种新建住宅要比乡下矮小潮湿的土筑茅屋显得更加宽敞和保暖，但是人越住越多，超负荷使用越来越厉害，情形很快就恶化了。居民常常一家六七口挤住在一间 12×10 英尺的房间里。炊事条件有限，自来水和室内厕所浴室根本没有，窗户并不多见，户外厕所和井都在院子里，而这地方垃圾成堆。居住者过分拥挤，性生活就难免混乱，环境太肮脏就会产生疾病。附近的酿酒作坊、硝皮作坊、洗染作坊和其他工厂污染了河水，使空气中浓烈的人畜便溺气味之外又增加了污染的气味。市区烟囱林立，吐出带硫磺味的浓浊黑烟。人们疾病丛生。1840 年代，每 45 个英国人中就有 1 人死亡，在麦克尔斯菲尔德的贫民窟里，每 20 个人中就有 1 人死亡。在曼彻斯特，工人的平均寿命是 17 岁，技术工人的平均寿命是 38 岁；而在乡区的卢特兰，工人可以活到 38 岁，技术工人可以活到 52 岁，还可以终身呼吸新鲜空气。被污染了的水而不是被污染了的空气，是致人于死的首恶，因为水里常常含有霍乱、伤寒和痢疾的细菌；户外厕所和院子里的粪便离水井、溪流和水塘太近，使工人阶级居住的贫民窟等同于死亡的陷阱。

4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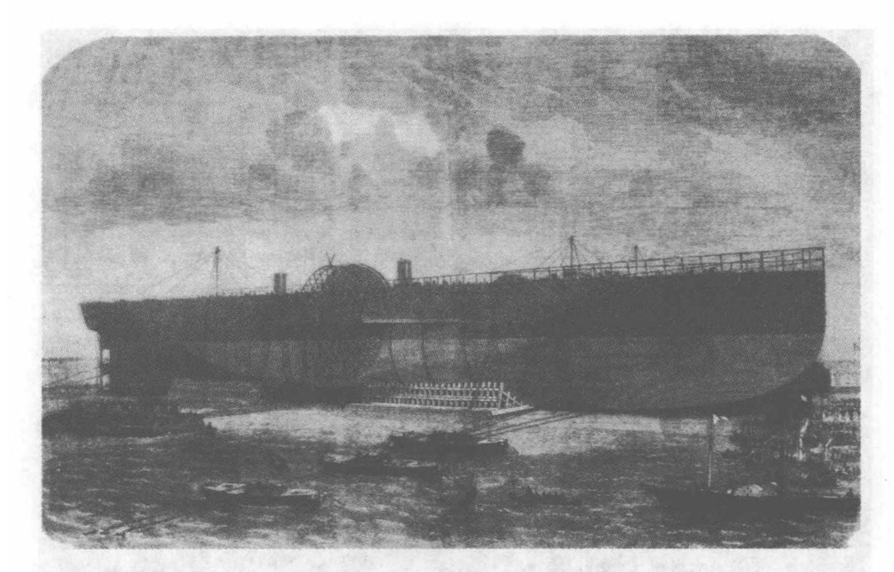
工业革命导致河流被污染（例如曼彻斯特境内的艾尔威尔河）、浓烟到处排放以及贫民窟拥挤不堪（*Engraving by Charles Roberts.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



正如古斯塔夫·多雷（Gustav Doré）描绘的那样，伦敦是一个以商业、手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而非一座巨型工厂，它也有条件恶劣的贫民窟（*Central S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随着英国城市化的程度提高，犯罪率也不断提高。1805 年，受审罪犯为 4605 人；1846 年，增加到 30349 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城市居民。城市酗酒者人数也在增加；因为杜松子酒和啤酒店是逃避悲惨生活的最好场所。公园和公共走道，像音乐厅、图书馆、板球场和足球场一样，都是若干年后才有的东西。学校也非常之少。1818 年的一次调查发现，城市儿童只有 1/4 受教育，而且是很有限的教育。城市里的人活着似乎就是为了干活。

但是，城市有时候连工作机会都没有。1826 年，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制造业城市里，30%—75% 的人处于失业状态。1842 年的萧条时期情形更惨。博尔顿有 60% 的人失业；在利兹，20% 的居民每人每



诸如“大东方号”蒸汽船，使用了瓦特的蒸汽引擎以及亨利·科特坚韧、廉价的钢铁，使英国掌控了海上通道，取得了商业繁荣和扩展了大英帝国（*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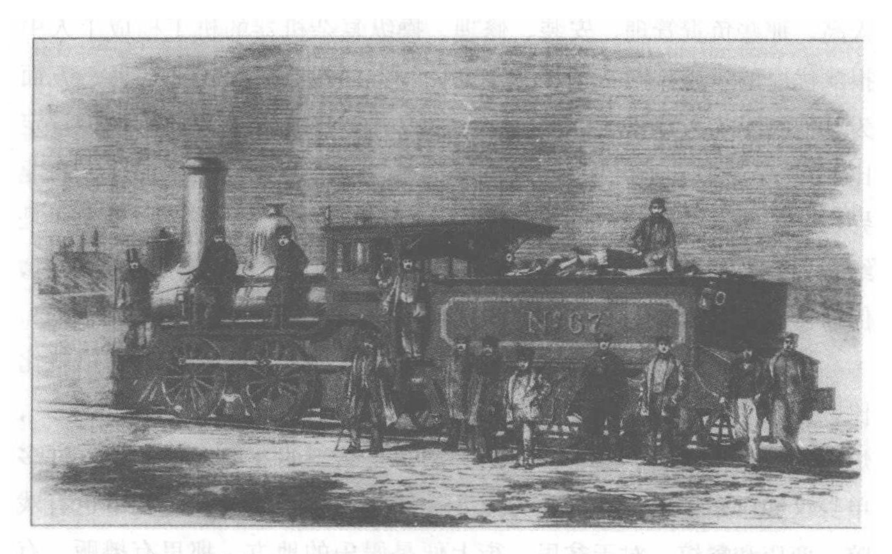
星期的生活费只有 1 先令。1801、1811、1816 和 1847 年都是萧条年份。它们是周期性的，与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周期性相合。 但是即使在繁荣的年份，也有许多工人就业不足。从 1800 年至 1850 年，棉业城市奥尔德汉姆的工人失业致使 40% 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英国知识最广博的新闻记者之一亨利·梅休（Henry Mayhew）于 1805 年估计：英国的工人阶级只有 1/3 “完全而经常性就业”，1/3 “半就业”，另外的 1/3 则“完全失业，偶尔代替别的工人去做一天工”。这种经常性的就业不足，加上有些时候的大量失业，是悲观论者所列举的第四项指控。

485

悲观论者的最后一项指控，是工人被隔离、孤立在无人情的工厂和举目无亲而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工人们不再拥有自己的工具，不能自行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和速度，也不能在自己的家里工作。他们得照管那开得越来越快的机器。稍有疏忽就得遭到罚款，有大的过失则会被开除。他们也不再住在那种乡村或小城镇里，受老邻居的照应和本地乡绅

或教区神父们慈父般的爱护。在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焦炭城市”里，雇主住在远处的郊外，与雇员互不相识。这种城市里贫富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人与人之间只剩下金钱关系，具有剥削性质，例如雇员必须在公司商店以高价购买食品和其他商品。这种做法被称为实物工资制，是雇主赚取额外利润的一种方式。它构成了冷酷和算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令工人们极为反感。 486

乐观论者的辩护　工业革命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其惊人的生产力。从 1782 年至 1852 年，英国工业生产每年增长 3% 到 4%。1850 年，英国的铁产量比 1800 年增加了 8 倍，原煤产量增加了 5 倍，布匹产量增加了 6 倍，而这些商品在 1800 年的产量已经远远超过 1760 年。1830 年，英国原煤产量占世界的 70%，布匹和铁产量各占 50%。英国的铁路，从 1825 年为了开矿而建筑的短短几条，发展到 1850 年的 6308 英里。英国的工业，有如象征丰饶的巨大宝库，从里面可以倾倒出无数价廉物美的制成品，从棉毛织品、毯子床单到杯



工业革命创造的另一奇迹就是铁路，这也是钢铁与蒸汽动力运用相结合的产物（*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盘壶罐、火炉铁架，一应俱全。为了满足燃料方面的需求，英国生产了廉价的煤。运煤的铁道和轮船，同时也运输新上市的农产品和廉价的粮食，并给工人提供快捷的交通。1800年至1850年间，英国的人487口虽然增加了1倍，但英国的人均收入，以物品及服务计算，增长了约85%。工业所供给英国的物资，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

工业革命也给英国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乐观论者的第二点辩护。诚然，1826年和1842年还有许多人失业，但在繁荣的年头，如1835年和1845年，制造业城市里的就业机会相当充分。在该世纪中叶，就业机会可以满足500余万人的就业需求，那就是说，可以为比1800年多1倍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且提高生活水平。这时的生活状况不见得比工业革命以前更差。有些纺织工厂还雇佣整个家庭，大约每星期一次付结25—30先令，这样高度收入是农村贫民闻所未闻的。这笔钱可以用来买肉，买优质的衣服，到酒店里喝杯啤酒。许多工人都觉得工厂温暖干燥，干干净净，比农工那又冷又湿的工作条件好多了。工厂里技术工人的收入无疑比农业工人高，那些负责管理、安装、修理、操纵复杂机器的机工构成工人中报酬优厚的贵族，同一场工业革命，一方面毁灭了手工业，另一方面为其他技术工人提供了许多机会。1850年，工人向上流动的途径肯定比1760年更多，不但技术工人如此，新兴城市里活跃起来的广大商业界也是如此。这些城市不论市内多么拥挤，煤烟污染多么严重，还是488给工人带来了一个较自由的天地。比起乡村来，人的寿命也许短一点，但活得有意思得多。城市生活的宜居环境，是乐观论者的第三点辩护。

早期的工业城市充满了刺激和乐趣。比如，曼彻斯特的酒馆就比比皆是。它们的外表都装潢华美，内部灯光辉煌，煤气灯光尤其明亮，炉火保持室内温暖。酒馆出售浓啤酒，是结识朋友的上佳场所。许多单身汉和已婚男子，都以此为家。曼彻斯特和其他较大的城市也有戏院、商店和餐馆。对于贫民，街上便是娱乐的地方，那里有摊贩，有货郎，有载满小玩意的车子，有演奏手风琴的乐师。不管工厂和宿舍如何拥挤压抑，这许多东西总算创造了一种工人阶级文化，提供了一

种自由、身份和社区意识。农业工人生活在乡绅和牧师的家长式的督导之下，喝醉了酒或不去教堂做礼拜要受罚。而城市工人则过着较自由的生活，一方面是家庭的兴旺，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

工人阶级意识本身便替工业革命作了辩护。将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列为工业革命的好处或功劳，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由工人阶级的意识所产生的工会和其他政治组织，都是为了抗议工业革命的不公平。工会特别反对的是工作时间过长、工资太低和工作环境太坏。从1790 年至 1850 年，工会的命运经过若干起伏。1799 年和 1800 年的《禁止结社法》（Combination Act）宣称工会为非法。甚至到 1824 年这些法令被废除后，工会还在遭受广泛的敌视和打击，并常常遇到法律方面的阻力。工人的罢工被破坏，活动费拮据。1834 年工会企图组织全体工人“大团结总工会”，遭到了失败。但是，尽管如此，工会还是成长壮大起来了，到 1850 年，技术工人已建成富有成效的工会组织。

工会的兴起，并不是唤醒工人阶级意识的唯一力量，激进的新闻报章，社会和教育团体，以及对议会改革的鼓吹宣传，都发生了作用。在伦敦和北部城市里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人权论》（*Rights of Man*）和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的《政治纪事报》（*Political Register*），工人们可以买到廉价版。也是在这些城市里，中产阶级人士成立机工社来教育工人养成自助的美德，工人们则成立合作社生产廉价商品，组织友谊社照顾生病、失业和年老的会员。最重要的是，城市里的工人们自 1818 年起一直鼓吹要争取选举权。虽然没有成功，但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

工业化的第五个有益的后果，是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和行政方面的改革。早期的制造业城市缺乏社会服务，行政治理也很差。但是，这些缺陷正好能引起改革。1835 年的《市镇改革法案》（Municipal Reform Act）废止了那种自行任命市镇统治者的做法，因为这已给英国城市带来贪污腐败。新法令规定全体房主选举出来的官员管理市镇。在 1790 年至 1850 年之间，许多地方改善法案都规定成立专门机构来

负责建立和改进污水排泄系统、用水供给系统、灯光照明系统和警察
489 系统等等。中央政府也对工业化所引起的挑战做出反应。1833 年的《工厂法》（Factory Act）规定纺织工厂不得雇用童工；1847 年的《工厂法》规定妇女、青年人每天工作不得超过 10 小时。1842 年的一项法令规定煤矿不得使用女工、童工。1839 年和 1847 年，政府决定拿出教育津贴来资助地方学校；1848 年的《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则促进改善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这项法律还明确规定必须用抽水马桶，并且必须用直径为 6 英寸的陶制上釉圆形水管，这也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之一。尽管这项规定并不引人注目，但其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

平衡双方的观点 在对悲观论者的指控和乐观论者的辩护作出最终的评判之时，首先要提出两个问题：工业革命到在多大程度造成了 1760 年至 1850 年之间的剥削和痛苦？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收益和负担到底是如何分配的呢？

如果对第一个问题作一个公正的回答，将对乐观论者的观点有利。这个时期的经济困难，大都与歉收、对法战争、战后的混乱，特别是与人口的翻番有关，而与工业化的关系则不大。1790 年代的歉收和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使得穷人更加贫穷。1810 年之后大陆市场的崩溃导致了失业。人口的剧增，特别是农业人口的剧增造成 1/5 以上的贫民寻求救济。有些国家，如爱尔兰，人口同样增加，但没有工业革命，人民所遭受的贫穷也更厉害。英国社会剧变所带来的城市恶劣和经济不公现象，只有一部分应归咎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蒸汽机和大工厂。条件最恶劣的贫民窟并不在工厂市镇，而是在诸如布里斯托尔这样的老城或过于拥挤的工业村庄。而差不多一架蒸汽机也没有的伦敦，城市弊病却相当厉害。伦敦的小工场，如同伯明翰和诺里奇的小工场在过去几百年一样，照样使用童工，和大工厂差不多。从大的方面看，大工厂使用童工，就像韦奇伍德（Wedgwood）的陶瓷企业或农业改良者圈地农场一样，不过是工业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最高利润，而对劳工

和资本所作的尽量合理的安排而已。

工业资本主义如何分配工业革命的负担和收益呢？答案并不一致，但验证了悲观论者的观点。1801 年，1.1% 的人口享受了国民收入的 25%，而在 1848 年，1.2% 的人口享受了国民收入的 35%。最富裕的阶层分享得最多。中产阶级所得到的也不少，这从他们所盖的华丽住宅、所买的精美家具和精巧艺术品就可以看出。根据报告，他们的富裕，与当时工人的状况形成强烈对比：1826 年和 1842 年，北方城市中分别有 35% 至 75% 的人失业，1/3 的工人不停地在找工作，农业工人每星期收入只有 8 先令，迟至 1850 年还是如此。经济史学家们声称，1800 至 1850 年之间国民实际平均收入增加了 85%，但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平均英国人”存在，占人口 1% 的最高收入者根本不是“平均英国人”。根据所得税申报数目表明，他们在这些年中所分享的国民收入份额增加了 10%。如果这些最富裕的人份额能够增加，那么他们以下的 20% 或 30% 的富人为什么不能增加其份额呢？他们很有可能也做到了这一点。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了，财富也增加了，他们建筑了堂皇的豪宅，建造了度假市镇，去欧洲大陆旅游，享受种种奢侈，在国外和国内投资数以百万计的英镑——所有这些都表明，中产阶级（远非工人阶级）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 490

我们认为，起诉者和辩护者都提出了过硬的论点，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个时期中的资本主义含有惊人的矛盾特性：作为经济推动力量时充满活力，而作为社会制度时非常不公。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能产生出新的技术，但是却不能控制城市的扩展或保证工人阶级的公平待遇。无论当时财富分配的确切情形如何，但这些财富至少足以用来给煤矿雇佣成年工人而不是雇佣童工，给城市修建下水道和供水系统，给最贫苦的工人多付几个先令的工资。

上层阶级不愿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信奉。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 1776 年发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为一种自然的和谐的法则所支配，在这种法则之下，个人的自由追求财富

的活动，必然促进所有人的福祉。政府绝对不应当妨碍这种供求法则，而应当推行一种自由放任政策（policy of laissez-faire）。同样主张推行这一政策的，还有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虽然他们不如亚当·斯密那样乐观。马尔萨斯在他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里说，因为食物是以算术级数增加（1、2、3、4），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1、2、4、8、16），所以最后必然导致食物短缺。只有战争、饥荒、疾病或道德约束，才能抑制人口增加。由于政府的贫穷救济只能鼓励贫民生育，所以应停止一切救济。大卫·李嘉图则深感人口的严峻压力，他在1817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指山，贫民旺盛的繁殖本能，会将他们的工资降低到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同意亚当·斯密的主张，认为政府干涉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随着工业革命的辉煌成就彰显自由放任主义的贤明，这些动听而合乎逻辑的理论自然博得了统治阶级的信奉。同时，这又恰与当时的关于贫穷不可避免和劳动是对人的天谴的看法合拍。这种看法是严肃宗教复兴的一部分，构成了与英国社会的经济变迁相平行的一种发展。

阅读文献

Jonathan D. Chambers and Gordon E. Mingay,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Batsford, 1966. 该书从技术进步、人口增加和城市市场扩大方面对农业革命作了阐释。

Phyllis Dean,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该书从农业、商业、金融和人口变化方面对工业革命的原因作了分析，并阐述了棉纺织、炼铁和动力方面的技术突破。

491

Michael W. Flinn, *British Population Growth, 1700—1850*, London: Macmillan, 1972. 该书对1700年之后出现的人口激增作了清晰、精确和简洁的叙述，认为其中的原因，与出生率上升相比，死亡率下降更为重要。

R. M. Hartwel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Economical Growth* , London: Methuen, 1971. 作者对工业革命作了透彻和严谨的阐释，并积极评价了其后果。

Pamela Horn, *The Rural World, 1780—1850: Social Changes in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该书对变革中的农业社会作了探索性的阐述，当时资本主义圈地取代了敞田制村庄，对法战争抬高了盈利，人口增加则将工资水平降到勉强维生的程度。作者在父权制与和谐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后者掩饰了剥削和敌意现象。

David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这是一部对工业革命作最佳分析的著作，特别强调对于标准化商品的巨大需求和英在繁荣的商业和社会方面的流动性。

Paul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nteenth Century* , London: Cape, 1961. 该书极为出色地阐述了作为工业革命核心的发明创造，并很好地阐述了旧的家庭制度和新的工厂。

Dorothy Marshall, *Industrial England, 1776—1851* , Lom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该书探讨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要转型，着重考察了社会的混乱、结构的崩溃以及所经历的苦难、创造的机遇和进步。

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6. 该书出色地描述了18 世纪社会——乡村、等级和父权等方面和新的社会和经济势力的兴起，这些势力将英国社会变为一个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阶级的社会。

Royston A. Pike, *Hard Times: Human Documen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New York: Praeger, 1966. 这是一部有关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条件的文献集，十分熟练地引用了皇家委员会、议会委员会和公务员的各类报告。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这是一部记述工人阶级形成的经典之作，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剥削的观点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工人阶级复杂性的剖析。

James Walvin, *English Urban Life, 1776—1851*, London: Hutchinson, 1984. 该书彻底考察了英国在75年中由一个基本上的乡村社会变为一个基本上的城市社会的过程；以及工人阶级虽然与其他阶级相比只获得了有限的和短暂的好处，但仍然保留了源于悠久的家庭结构的庆典和娱乐的方式。

第十九章　思想的变迁

492

1739年夏天，布里斯托尔主教约瑟夫·巴特勒，《宗教论论》的作者，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牛津大学林肯学院有一个名叫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人，在布里斯托尔附近一个矿村——金斯伍德（Kingswood）的空旷场地上向数千人布道。8月间，他约见这位年轻的宗教复兴者，对他说："先生，假托得到上帝的启示和赐予是一件令人可怕的事，非常可怕的事。"卫斯理并没有被吓住，他答道："我没有假托得到上帝的启示或赐予，我所得到的是任何一个基督徒所希望得到，也可以得到的，并为之祈祷的东西。"然后，卫斯理阐述了信仰得救教义的重要性。他说："圣灵灌输给每一个人一种信念：相信基督爱他，为他牺牲性命……因为基督的功劳，上帝才赦免了他的罪，他才能接受上帝的恩宠。"在哲学家巴特勒眼里，"圣灵的赐予"打开了宗教狂热的大门。

这种狂热是19世纪的基督教福音派教会主要部分，但对18世纪中叶的人来说是令人恐惧之事。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下的定义是："一种虚幻的信念，相信神会私下给他以启示；这是一种虚幻的信心，相信上帝会施恩宠或与自己交流。"巴特勒主教那天和卫斯理谈话结束时，命令卫斯理立刻离开他的主教区。但卫斯理拒绝离开，只有需要到其他地方布道时才离开。在此后的52年中，这种情形是很

多的。直到 1791 年他死去，他的旅程有 25 万英里之多——大部分情形是一边骑马一边在马背上看书，布道约 4 万次。与他的兄弟查尔斯（Charles）及另一位牛津同学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一道，他们三个人在世界各处创建了卫理公会，在英国复兴福音教义，重振非国教运动的威风，使大部分国教徒接受严肃的宗教，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统治阶级的观念。

493 巴特勒主教感到震惊是有道理的。卫斯理呼吁民众祈求“圣灵的启示和赐予”，构成和蒸汽机一样的革命动力。与工业革命一样，福音复兴运动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这一福音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英国国教已不能满足下层阶级的宗教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大家对国教枯燥的理性主义深感不满。因此，我们应当先仔细考察这个既富有又庄严的英国国教。

英国国教

对于许多在金斯伍德聆听卫斯理讲道的人来说，这是有生以来的头一回宗教体验。卫斯理和他的同事们的宣讲对象，是英国国教向来所不屑于顾及的广大男女，而不是那些到国教教堂去做礼拜的人。早期的卫理公会讲道者都信奉国教，他们出来讲道仅仅是为了填补教区牧师留下的真空。国教教区的教士数目很大——约有 13500 人。为了供养这些教士，国教会设置了 11700 个教牧俸禄区（livings），每年支出达 300 万英镑。教牧俸禄是指一笔来自教会土地的固定收入和特定教区征收的什一税。俸禄的数额差别很大，从一年几英镑至几千英镑不等像卡莱尔主教区的牧师俸禄平均额在 1747 年是 59 英镑。因为许多教牧俸禄低微，所以有的教士不止拿一笔俸禄——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一些牧师领取丰厚的俸禄，每年仅花 10 英镑雇用助理牧师，自己并不驻节本教区，而是住在牛津或伦敦。在多个教区领取多笔俸禄和拒绝驻节的做法已成通例，而不是例外。1780 年，德文郡 70% 的教区长都不驻节。很多教士领取一个以上富区的俸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需要，而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影响力。

许多领取多个教区俸禄的牧师雇用一两个薪水低微的助理牧师替自己管理其所属教区。

因为有领取多个教区俸禄的现象存在，所以许多教区是没有驻节教士。事实上，这样的教区大约有600个左右。许多在穷区任职的教区牧师和薪水低微的助理牧师，常常得办一所学校或农场以贴补生活，而那些领取多个教区俸禄的教士，则把时间花在陪乡绅们打猎和宴会上。他们对运动和社交的热衷，远过于看书和祈祷。他们所注重的宣讲对象，是在教堂的前排有租定座位的富人，而不是坐在后排板凳上的穷人。国教的多区领俸及有教堂无驻节教士的做法，使得国教教士往往就是那些受教育有限的、见解浅陋的庸俗之辈。即使在国教教会力量强大的乡村地区，国教亦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宗教的需要。而且国教在英国新生市镇中遭到更为彻底的失败。1751年，英国国教在曼彻斯特只有一个教区教会，要为2万人服务。1800年，伦敦的梅利本教区，人口有4万人，但教堂座位只有200个。到1812年，伦敦的非国教教堂数目已多于国教教堂，两者的数目分别为256个和186个。

英国国教不但没有能够为成千上万的穷苦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宗教服务，而且其教义和仪式也越来越难以给教育程度高和家境富足的人以启迪和感召。18世纪上半叶，上层社会国教徒所要的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包容的和实际的宗教。他们希望得到的教谕是道德伦理，而不是神学。他们厌倦了17世纪关于教义的激烈辩论，而希望他们教区牧师避免有关教条的、神秘的和冲动的说教。他们的要求，就是崇拜上帝，由教会施洗命名和举行葬礼，并得到道德至善之人的启迪。因此，善良的基督徒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异议。18世纪，这种看法称为宗教自由主义（Latitudinarianism），在主教、低级教士和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这一观点有很强的功利主义味道，将道德启迪的宣道，视为向下层民众灌输道德和引导上层阶级慈悲施舍的途径。 494

英国国教的宗教自由主义在推动严肃宗教方面乏善可陈。法国的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注意到：“在英国，根本没有宗教可

495 言。”巴特勒主教说：“基督教，现在终于发觉是一种虚构。”对于那些在精神方面敏感的人——如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对于那些感到失望的下层社会——如在金斯伍德聆听讲道的人来说，国教的无关痛痒的公式和对教区的忽视，既没有对他们的得救提供宗教上的担保，也没有给他们绝望的今生带来安慰。因此，有必要复兴一种狂热活跃而生气勃勃的基督教。

可是，这一复兴并没有颠覆英国国教。国教有它的弱点，也有它强大之处。其宗教自由主义的包容性和理性，令许多重实际的基督徒们感到满意，也使自然神论派、福音派和高教会派拥有生存空间。国教会的教区教士十分关照普通教徒。他们探望病人，管理学校，创办衣社，规惩过失，负责讲道，行洗礼和婚丧诸礼。在他们的牧导之下，乡村教区民众生活在关系密切的社区之中。不过，这样的教士究竟是少数。能够献身于国教改革或利用国教的资财去向贫民传播福音者更少。虽然在 1818 年至 1833 年之间议会的拨款促成了较大数量的教堂建造，但一直到 1836 年议会创立宗教事务委员会，才开始进行重大的改革。

英国国教和许多特权阶级的关系过于紧密，以至于无法进行改革。例如，地主有权自主任命半数领取教俸教士，国王的大臣们有权指派全部主教、约 50 名受俸牧师和约 600 名领取教俸教士。而主教们本身又有权支配其主教礼拜堂内大量高薪职位。英国国教，其本身即为英国国家既得权益之一，是英国政治社会宪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直到 1832 年为止，国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贵族阶级的地盘。所以，充任主教教堂、主教教堂的高薪职和富裕教区领俸者，均为贵族和绅士的幼子。而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只能充任贫穷教区、教堂里的低级牧师和收入低微的助理教士。可是，他们虽然没有跻身于绅士行列，却都有大学学位，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工业城市向工人布道。于是，这一个空档，就留给了那些真的相信上帝号召他们去宣布福音的人来填补。

约翰·卫斯理离开布里斯托尔并不是为了讨巴特勒主教的欢心，

而是要去向被国教所忽视的纽卡斯尔的造船工人、诺里奇的织布工人和莱斯特的织袜工人这些人宣扬基督的福音。这是需要勇气的。愤怒的人群向他嘲笑叫骂，将他推来拖去，将他哄下讲坛，丢石子打他，而治安法官们只当没有看见，教士们则在人群中煽风点火。卫斯理毫不畏缩，继续宣讲福音，每天4—5次。他的兄弟查尔斯、朋友乔治·怀特菲尔德以及门徒多人也同样不辞艰苦。渐渐地，越来越多下层阶级的民众接受了他的宣讲，相信了基督救世之说，加入了日益壮大的卫理公会。到18世纪50年代，对卫斯理的普遍敌意逐渐消失。而到18世纪80年代，他已变成了一个为全英国所敬重的人物。到他去世的时候，每星期有8万人花1便士去参加卫理公会的活动。

卫斯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基督施恩世间的开放神学、温和友善的宗教仪式和严密的组织体系。他吸收了路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的神学，主张世人释罪得救是出于基督的施恩，而不是出于世人的善举。但是卫斯理很聪明地将令人悲观的先定论删掉了。卫斯理认为上帝并没有在创世造人的时候，就将应当得救的人挑选好，而是通过基督的牺牲，才应允世人：谁能对基督有信心而成为圣洁的人，谁就能得救。对这些人而言，深知自身的堕落和罪孽，会感受到脱胎换骨的变化，获得新生、肯定得救的信念，甚至于达到基督徒的尽善境地。 496

卫理公会为追求神圣者提供积极参加宗教仪式的机会。礼拜堂传出赞美诗的嘹亮歌声，而这是教区教堂里所没有的。查尔斯·卫斯理亲自谱写6500首赞美诗，全都是有关上帝爱人的神诺。卫理公会的信徒们每星期参加会议，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获得归属感。对于允诺得救的神学和带来兄弟姐妹情谊的仪式，卫斯理新增了归属于一个有纪律的、集权的组织的安全感。卫理公会信徒们在地方分会里，还分成称为“班”（class）的小团体，每星期聚会一次，集体作祷告，研讨《圣经》，作自我检讨。每个参加班活动者，每3个月花1先令买一张票，如拒绝购买，便被除名。卫斯理主张宗教宽容，不要求信徒在信仰方面作任何保证。但他却相信道义上的是非善恶，对累犯者拒

绝售票。每班有班长，正如地方分会设理事以管理财务和会所。每年的年会选举各地分会的宣道人，三年一换。各地分会又分别组成7个巡回会团，所有的会团或会，统一由一个每年召集一次的牧师选出的年会管理，并服从卫斯理的统辖。从1789年至1791年，全部卫理公会的会务始终由一个人主持，这就是以自己的天赋和毅力创建该会的卫斯理。

约翰·卫斯理是一个非凡的人。他个子矮小，衣着整齐，恭谨自持，同时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精于神学，长于组织，从无失误。他的宣讲，不以辞令见长，但能引人入胜，具有专断的脾性。最重要的一点，他真切地关心那些饱受苦难的珍贵而脆弱的生灵。

卫斯理的父亲是高教会派教士，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女子，父母用清教徒严格教规将他抚育成人。卫斯理毕业于牛津大学，很有希望在国教会里爬上高位，却挑选了向穷人讲道的道路。但是，他并不是对国教抱有敌意，他一直坚持卫理公会作为国教的一部分。不过，大多数会友都感觉到他们在社会上和精神上与国教教堂里那些富有的教士及宗教自由主义已格格不入，所以宁可在自己简朴的教堂里，由他们自己的牧师主持举行领圣餐礼。卫斯理有几次在特殊的情形下答应了会友们在自己的教堂里举行领圣餐礼的要求。1784年，他还任命两个传教士前往美国讲道，并授权他们在美国主持任命牧师。此举违反了国教会有关只有主教有权任命牧师的教规。这件事，加上卫理公会教堂发放圣餐，就使得他们和国教分裂成为不可避免。于是，卫理公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

后来卫理公会本身也分裂了，这是卫斯理将集权式的组织和个人主义的神学结合在一起的结果。那个由以往各届年会选出的牧师所组成的年度大会，在卫斯理去世之后还继续用专断方式来主持会务。1797年，圣道会（New Connexion）宣布分离，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较民主的教会；1812年，原旨会（Primitive Methodists）分离，因为年会不许他们进行露营会议；1815年，圣经会（Bible Christians）分离，因为他们的讲道士到年会所不允许的地方去讲道。但是就大体而言，

卫理公会仍然发达起来。卫理公会会众，1796 年为 77000 人，1821 年达 23.5 万人，1851 年达 72.5 万人；还有许多人虽非会员，但在卫理公会教堂中做礼拜。

卫理公会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卫理公会教义、礼拜方式和友爱团结具有的吸引力，当然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法国革命和英国激增的人口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也有很大的影响。法国革命造成一种令人激动和焦虑的气氛。同时，英国激增的人口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也造成阶级和城镇的扩展，许多人离开原籍，在新兴城镇中流动，感觉孤独和心神不定。他们是一大群的职员、技术织工、鞋匠、机工、药剂员、工厂监工、小制造业者、小店主，都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如英国国教徒，同时又不喜欢非国教会的排外性。然而，这些人都急欲跻身于 498 最底层的工人阶级之上，其人生之路因为信奉基督教而发生变化。

但是，卫理公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他们是被解放了，还是被奴役了？是变得激进了，还是顺从了？以上影响均存在，如何发生作用取决于个人的素质和所处年代。对于毫无知识的矿工、酗酒的织工和居于贫民窟的鞋匠等这类寿命有限的人来说，在基督教神圣中获得新生和在死后能获得可靠的保证，那么入会无疑是一种解放。其解放也可以包含世俗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卫理公会也给予他们以道德伦理方面的训诫。例如，一个会员任班长或周日学校教师而获得信心。

对于一个第三代卫理公会教徒来说，如果他文化程度较高，事业也较发达，则宗教对他的解放意义是不大的。卫理公会号召服从上级命令，实行严厉的清教主义，宣扬地狱的恐怖，推行托利主义，谴责一切政治，这些都有可能，或者说已经打击教友们的政治和文化思想活动。卫理公会的活动，可以成为，或者说常常成为一种反革命的力量，但是因为英国工人大多数并不是该会信徒，而在 19 世纪的英国也未曾面临过任何革命，所以我们不能说英国的安稳定应当归功于卫理公会。同样，该会也不是防御过激主义思想与活动的灵丹妙药。1838 年以来，一些卫理公会信徒也曾参加了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宪章运动。卫理公会也有许多普通会员认为该会既然热衷于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

其组织应改造为工会或政治俱乐部。原旨会在工会运动中是特别积极。用这种间接的途径，卫理公会确实能够使英国的工人阶级产生一种有经验又有训练的力量和视野，大大有助于自由英国的形成。在那个新的英国里面，他们会在其他非国教会教派中找到盟友。

非国教会的复兴

1740 年到 1840 年之间席卷英国的福音主义宗教狂热的第二阶段是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和浸礼会（Baptist church）的复活。这两派，像长老会（Presbyterians）和贵格会（Quakers）一样，都衰落到宗教形式主义的境地。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数不断减少，教派会众的人数也日益下降。公理会和浸礼会的牧师们所关心的是先定论的本质、立场何在，而不是贫穷的人的灵魂。贵格会所争论的，则是教规和心灵的关系。长老会派的损失最大。理性主义将国教引向了宗教自由主义，也将长老会派引向了唯一神教义（Unitarianism）和没落。1729 年，汉普郡有 40 所长老会教堂；到 1812 年只剩下两所。公理会派和浸礼会派虽然严守正统之路，抵制了 18 世纪的宗教自由主义，但是从 19 世纪初开始，他们很明智地放宽了卡尔文派的先定论，而改持一种较自由的、注重经验和福音信仰的教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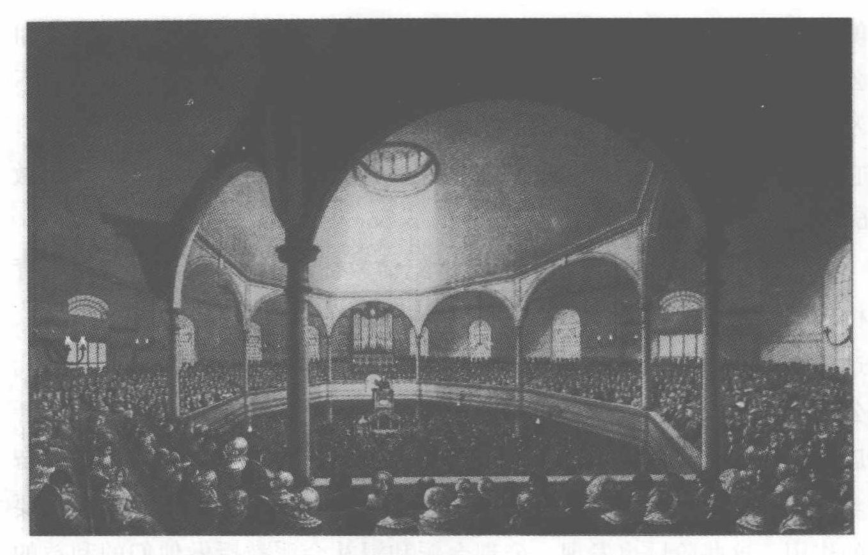
对有活力的基督教的热心传布，不但导致公理会派和浸礼会派的 499 崛起，而且在 1800 年之后还给贵格会派以及脱离了长老会的唯一神派教会注入了新的能量。从 1790 年到 1850 年，所有这些教派都壮大了。至 1851 年，非国教会（这时已包括公理会）共有 20399 所礼拜堂，能容纳 480 万人。而国教会拥有 19077 所教堂，能容纳 530 万人。英国的基督教信徒这时在国教与非国教中平分秋色。根据 1851 年的三个礼拜日的统计结果，在国教教堂参加礼拜者共计 370 万人，在非国教教堂参加礼拜者共计 340 万人（其中包括天主教徒）。

公理会派和浸礼会派教徒大量增加的原因，与卫理公会的兴起的原因完全一样：个人对基督救世的信心远大于国教的宗教自由主义；国教不能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人口的增加和城镇的扩大；普遍存在

的对法国革命作出的保守主义反应。就人数而言，卫理公会派可以和公理会派和浸礼会派相匹敌；但在财富和势力方面，卫理公会派则不及后两派。1815 年之后，公理会派和浸礼会派成了自由教会的领袖。它们在许多工业城镇中居支配地位，例如罗克代尔城，其教堂每周做 66 次礼拜，国教只做 6 次礼拜。

公理会派和浸礼会派拥有 17 世纪清教徒的经典和 18 世纪的教育机构，所以能够培养出卓有学识的牧师，在神学研究方面很有建树，这些都是卫理公会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大多数国教会教士也比不上。公理会派和浸礼会派也吸引了中下阶层。北部工业城镇人口中包括开店的店主、有技术的熟练工人、商务人员和专业人员，这些人都在奋斗之中，而非国教会所倡导的自助之德和社会友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阶层也发现，公理会派和浸礼会派教授做他们的利益的代言人，要比卫理公会派更加理直气壮。卫理公会的领导者们在政治上是托利党人，他们对国教很恭敬，唯恐被人呼作颠覆分子。与此相反，公理会派和浸礼会派的领导者都是辉格党人，他们与国家政权作对由来已久。这两个教派财力日益雄厚，自豪感和信心也与日俱增，因此便充当了英国争取政治和宗教自由的领导者。

在 1815 年，凡是拒绝到国教会领圣餐者，不得担任政府高级官职，也不得当选议员；而且也不能进入牛津大学读书，或取得剑桥大学学位。非国教徒必须缴纳教堂税，以供教区教堂修理房屋之用；也必须缴纳什一税，以供养国教教士。此外，必须请国教教士来主持他们的婚礼、葬礼以及婴儿的洗礼。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浸礼会和公理会派的领导之下，非国教派要求废止这些不平等待遇。因为他们的人数扩大了，财富也增加了，所以在选举时他们的选票对结果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828 年，他们与辉格党议员和激进派结成联盟，终于迫使议会废除了《宣誓法》和《市政机关法》，争得了当选议会议员和担任政府官职的权利。1838 年，他们又取得了主持婴儿洗礼和证婚的权利。虽然力争取消教堂税的斗争没有成功，但有些城市，因为非国教派教徒在教区委员会中占多数，常常拒绝征收此税。到 1856 500



构成公理会萨里教堂主体的并非教堂内的圣坛、彩色玻璃，也非礼仪和法衣，而是登上布道坛的布道者（*Guildhall Library*, *Corporation of London*）

年，宗教的自由与平等就变成了英国人生而有之的权利：牛津大学取消了入学的宗教考试，剑桥大学也取消了授予学位的宗教考试。

非国教徒不但变成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也缔造了一种以坚实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和思想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德行是俭朴、节制、正直、远见、自励和勤劳，在一个自由的经济制度下，这些德行可以产生最完美的结果。所需要的只是一些基本的体制，以帮助训练低级阶层的人学习这种自助的精神并循之发展。这些体制必须是自发产生自愿实行的，必须从自由人的能量中迸发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专制政府的强制规定。

这样，非国教徒建立了无数的教堂、礼拜堂、安息日学校和日校。他们也帮助建立机工协会教育工人，建立哲学研究机构以丰富中产阶级的知识。他们创办了许多报刊、出版社，助办了许多合作社、储蓄银行和节约社。他们也帮助举办慈善事业，建立医院、药房和浴室；少数信奉非国教的工厂主替工人办图书室、饮室和社交室，并协助举办读《圣经》班、音乐会。非国教会经常互相合作，共同推动这种活

动。例如，1814 年，它们成立了一个会社，到 1840 年，这个会社创 501
办了数以百计的工人学校，这些学校像其他自发的机构一样，都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个人主义的精神。在这许多基本的建树中，产生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认真的、清教的、坚决的、带野心并经常狭隘和功利的观念——非国教的道德观。

英国国教的福音主义

查尔斯·西米恩（Charles Simeon）是富有的律师的儿子，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毕业，享尽英国上流社会的各种奢华生活。但自从 1732 年受任为剑桥的圣三一教堂的牧师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严肃宗教的宣道士。同一年，汉娜·莫尔（Hannah More）在出版了她的最后一个剧本后，也从名噪一时的戏剧作家、霍勒斯·沃波尔的朋友，突然转变成了基督教福音主义改革家和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朋友。威尔伯福斯是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好朋友，1782 年，他毅然放弃了年轻时代的奢华生活，决计将每年 3 万英镑的收入、在议会里面的地位以及自己的组织天才全部贡献给福音主义。西米恩、莫尔和威尔伯福斯三人都是国教信徒，都有天赋才华和影响，在年轻时放弃世俗生活皈依宗教，也都成功地将福音主义的宗教传输给英国上层阶级。举例说，查尔斯·西米恩将他的宗教热忱传给了剑桥大学数以百计立志献身于教会事业的学生，其中有许多都取得了西米恩和富有的福音主义信徒们为了宣扬宗教而承担支付的教区俸金。汉娜·莫尔则在萨默塞特郡的考斯力普—格林（Cowslip Green）建立了许多安息日学校、日校及《圣经》研读班，以便将基督福音传输给贫苦民众。她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了许多小册子，售出达数百万本之多，其中宣讲了对基督的信仰、刻苦自励之道和社会服从之道。威尔伯福斯和一些富有的福音派的邻居们在伦敦附近的克拉彭公地（Clapham Common）计划成立会社，以改变英国人的生活，起草废止奴隶买卖制度的法案，过虔诚正派的生活。那些被巴特勒主教认为是怪物的教义，最后终于打进了教会、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核心。至 18、19 世纪之交，

在国教主教中，至少有 17 位主教支持威尔伯福斯对酗酒、赌博和戏院的攻击；而到 1848 年，一位福音派当上了英国国教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到 1830 年，虽然他们的人数只在国教会中占 1/8（1810 年为 1/20），但福音派成为国教的酵母。

上层阶级的国教信徒之所以像卫理公会派和非国教徒那样走向严肃的宗教，反映了他们对国教的不满和对自身玩世不恭、粗俗市侩的厌恶。在以往，统治阶级与国教相安无事，因为国教教义宽容，即使酗酒、赌博、斗鸡等也不予过问。但是到 1790 年，在福音主义的道德标准的挑战之下，这一切成了最不道德的过失。于是卫理公会派、非国教徒以及国教中的许多福音派，都相继有所表示，或以身作则，或布道宣讲，或著文立说，使上层阶级中较为自觉者越来越感到羞耻。宗教运动也如同时尚的转移一样，是有传染性的，可以借内在动力扩散开去。

502

法国革命之前，福音主义传播迟缓。法国革命以后，英国国内激进主义兴起，福音主义的传播速度加快。英国人看到法国的贵族一直追求享乐，玩世不恭，忽视贫民，现在却面对恐怖和断头台。英国本身的激进派煽动者同样感到惊恐，他们不是圣保罗的信徒，而是追随托马斯·潘恩的思想。福音派的感召力是针对那些拥护秩序反对革命的人，这种秩序由具有正义感的上层阶级和恭顺服从的下层阶级构成。福音主义还有一种吸引力，就是具有功能性、社会性和心理作用。威尔伯福斯 1797 年出版的《实用基督教》（*Practical Christianity*）一书之所以大受欢迎，不是因为高深莫测的神学，而是严肃的态度。坚定的虔诚和道德观消除了那个时代神学混乱所造成的怀疑倾向。书中要求的认真和纯正的举止，带来了社会进步和对已取得进步的道德确认。

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道德观，促成了教区、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慈善事业的兴盛。

教区的地位至关重要。正是在教区，教士们才成为羊群的牧人。如果一个福音派教士掌管教区事务，那么全教区就会行动起来。打牌、跳舞和看小说都像斗牛、酗酒和赛马一样受到严厉斥责。安息日必须恪守，不许写信，不许长途散步，这些规矩虽然严厉，但并非全都是消极

的。教区教士要去探视慰问贫民或病人，要管理学校，督办丧葬会及煤会、衣会事务。教区教士还常常兼管属于区行政长官职责的事，襄助济贫法令的施行，指挥公路交通和审断罪案等。一个福音派教士可以改变全教区的生活，但这样的区教士向来不居多数。所以，还有上百万的人没有被惠及，除非在教会工作的世俗人士通过慈善会社接触他们。

“我们这个时代是会社的时代”，詹姆士·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写道。他是威尔伯福斯在克莱彭的朋友，所谓“克莱彭圣人”（Clapham saints）之一。在此称呼之前大可加上一个“慈善时代”，因为“慈善”一词最能代表19世纪，正如“人道”一词最能代表18世纪一样。以全副热忱去改造德性、救济困苦和传播福音，这三点可以表明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全部工作。1798年，世风改进会（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创立，威尔伯福斯是主要的发起人。这个会社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维护安息日，不让它为杂俗活动如运动节目和跳舞会等所亵渎。此外，它也致力于改进一般道德准则。这个会社不过是福音派所成立的数百种会社之一。其他的会社也从事类似活动，如分发《圣经》小册子、挽救妓女、救济困难织工、促进节制欲望、改善监狱条件、慰问贫苦以及创办各种学校等等。办慈善事业是当时的一种风尚。1812年，包括贵族和从男爵在内的3000人出席一个安息日学校会社召开的募捐大会，济助3370个学校，共30万名学生。1814年之后，非国教徒和国教内的福音派在英国与外国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里工作，提倡办日校。但这些学校仍然不能满足一个人口激增的国家对教育的需要。其他慈善事业会社所取得的成功也与之相仿。当时所需要的是国家进行干预。但是关于这一点，福音派的意见并不明确。如果国家干预能够推进他们的目标，他们就赞成；如果妨碍他们的活动，他们就反对。 503

福音派对乔治三世的《1787年诏书》（Proclamation of 1787）表示欢迎，国王在诏书中谴责破坏安息日习俗的行为。福音派还称颂检察总长禁止斗鸡和斗牛的决定，支持议会1807年禁止奴隶贩卖和1833年禁止殖民地蓄奴。诚然，他们是废奴和禁止奴隶贸易运动的主要推

动者。关于奴隶制问题，福音派不怕国家介入，也不怕通过国家干预来禁止工厂和煤矿使用童工。但是在大多数问题上，例如教育，他们反对国家介入。他们的武器是由志愿者组成的会社，他们真正的职业是在英国和外国传播福音。到国外去布道或改革是福音派所热心从事的工作，无论是卫理公会、公理会还是国教，都组织国外传教布道会，向世界各地传播福音主义。

福音主义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改变了教区，改革了道德，废除了奴隶贸易，安慰了贫苦阶级，解脱了走入迷途的灵魂，维护了安息日，令成千上万的人更为节制，这对一部分人来说就是将毫无趣味的清教主义带入英国生活。这种巨大的力量，会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其中之一便是牛津运动。

牛津运动

1833 年，卫斯理兄弟在牛津大学组织卫理公会后一个世纪，又有一个笃信宗教的牛津学者团体形成了。他们在牛津的圣玛利教堂聚会，聆听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牧师的宣道。这位牧师是奥利尔学院的院士，所讲的题目是“举国背离国教的危机”。他说，英国国教正在危机之中，改革后的议会对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敞开大门。辉格党政府是一个世俗的、对宗教漠不关心的政府，却有权委任主教、改组国教财务、甚至影响国教教义——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议会不是恫吓要裁掉一半爱尔兰主教职位以及相应的教俸吗？这次讲道立刻在同情基布尔看法的人中间引起反响。这标志着国教复兴运动的开始，促成了广泛的对宗教的虔诚和认真，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英国之间有了天壤之别。

在响应基布尔呼吁的人之中，有两个也是奥利尔学院的院士：爱德华·帕西（Edward Pusey）和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他们两人都有文章发表于《时代书册》（*Tracts for Our Times*），这是一组系列小册子，对 19 世纪 30 年代的宗教观点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帕西是牛津大学的希伯来文教授，对德国神学和东方语

言很有研究。他在题为“洗礼”和“圣餐礼”的两篇文章里，指出基督徒通过这些圣礼，就能获得赎罪进入神圣境界。帕西坚持认为圣礼是英国国教的组成部分。在牛津运动的参加者看来，英国国教得到神启，宽宏慈悲，其主教和教士则是由圣彼得（St. Peter）的使徒继承，从而得到授权主持圣礼，拯救众生。福音派则反对这种说法。

纽曼（Newman）特别对这个教会表示敬畏和尊重。他出生于伦敦一个银行家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国教徒，15岁的时候改宗福音派。但在牛津大学，纽曼在与约翰·基布尔建立友谊和大量阅读之后，认定福音主义过于强调个人的经历和判断，主观色彩过浓，容易出现差错。这就会掀起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浪潮，对英国宗教形成威胁。而且，《圣经》能够展示上帝真理的信条也无法抵御理想主义，因为对《圣经》的解释千差万别，新的研究已指出《圣经》常有自相矛盾，存在不符历史事实之处。所以，要建筑坚固的壁垒以对抗自由主义的明枪暗箭，仅靠《圣经》是不够的，基督徒还需要教会的长老们多年积攒下来的智慧和教堂多年绝传下来的教义和教条。当年约翰·卫斯理正因为面对着一个奉行不知羞耻的世俗化和自然神论的国教教会，致力于将基督教真理建立在《圣经》和圣灵对个人的拯救基础之上。此时，纽曼所面对的是一个被理性主义瓦解的福音主义。于是，他将基督教真理建立在国教会的传统和基于恩惠的拯救之上，这种恩惠来自真正宽宏大量的、具有使徒相传的教会所从事的至善和神圣的工作。这样的教会的神圣工作，包括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圣职任命礼和忏悔礼等，强调的重点重新回到仪式、圣坛、圣服和蜡烛。对于许多国教徒和所有的非国教徒来说，这不免有罗马天主教的味道。

19世纪30年代，纽曼揭露福音主义的弱点，强调所需要的是信条和和圣礼。在牛津大学圣玛利教堂晦暗的光线之中，他用巧妙的言辞、感人的语调，发表了一系列打动人心的演说。他的这些布道，加上基布尔的诗、帕西的著作和布道词以及其门徒们的工作，把一个复兴的英国式天主教教会的思想传遍了整个英国。

这些思想也引起敌意。宗教冲突肇始于牛津大学，不久遍及英国，

而纽曼于 1841 年发表的《90 号小册子》（*Tract 90*）将冲突推向顶点。纽曼在这本小册子中说，《三十九条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中，没有一条直接有悖于天主教的信条。纽曼辞去牛津大学的职务，将奥古斯丁有关宗教分裂的言辞牢记于心，并于 1845 年皈依罗马天主教。而约翰·基布尔的笔调不如纽曼那么激烈，对现存的宗教制度的价值更为欣赏，依然保留国教徒的身份。其原因在于国教是德文郡赫士雷教区居民的宗教，而他在该区担任模范牧师达三十年之久。帕西也没有离开国教，还匿名捐献了 6000 英镑，用于修建里兹城的圣救世主教堂，这是英国式天主教行动的一个举措，目的是将国教及其拯救的恩惠施予工业化的英国。虽然纽曼和其他少数人归化了罗马天主教，但牛津运动的致力于复兴国教的大多数成员依然留在国教之内。结果是一个强有力的高教派得到复兴，且至今仍在积极活动，它对英国 19 世纪精神生活的重振，发挥了很大作用。

505

英国国教的复苏是一件可喜的事，使教堂的礼拜美观了，使教士的学识提高了，使思想精神化了，使民众的宗教信仰更坚定了。可是，它也强化了非国教倾向，使宽容的国教徒，如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等人争取非国教徒回归国教的梦想破灭。阿诺德是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的校长、伟大的改革家，力图将非国教徒和国教徒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广泛性特征的教会，其基础是所有人都接受的基督教道德观。英国国教中的宽容派人数众多，力量很大，强化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严肃宗教观念。在纽曼眼中，国教宽容派的理性主义具有反宗教的实质；而在阿诺德看来，纽曼的信仰、圣礼和信条全是浪漫主义的伎俩。事实上，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英国乔治王朝末期思想变革中的强大力量。

浪漫主义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三人，分别是律师、牧师和乡绅的儿子。1798 年，刚刚 20 岁出头的他们合出了

一本诗集，名为《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其中的诗歌感情之奔放、韵律之跳跃和意境之奇特，使读者无不为之惊诧，虽然许多人斥之为胡来，但也有少数人爱不释手。喜爱者大都是年轻人，像后来成为著名散文家的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y）。德·昆西认为这些诗歌是“无人涉猎的领域，充满着力和美——达到人们所从未想到的境界”。在这些诗里，一个正在成长的浪漫主义——一直为18世纪晚期新古典派理性主义（Neoclassical rationalism）所束缚——突然地爆发出来，其力量之宏大，有如约瑟夫·马拉德·威廉·特纳（Joseph Mallard William Turner）的海景画；其气势之雄伟，有如詹姆士·怀亚特（James Wyatt）所设计的哥特式的高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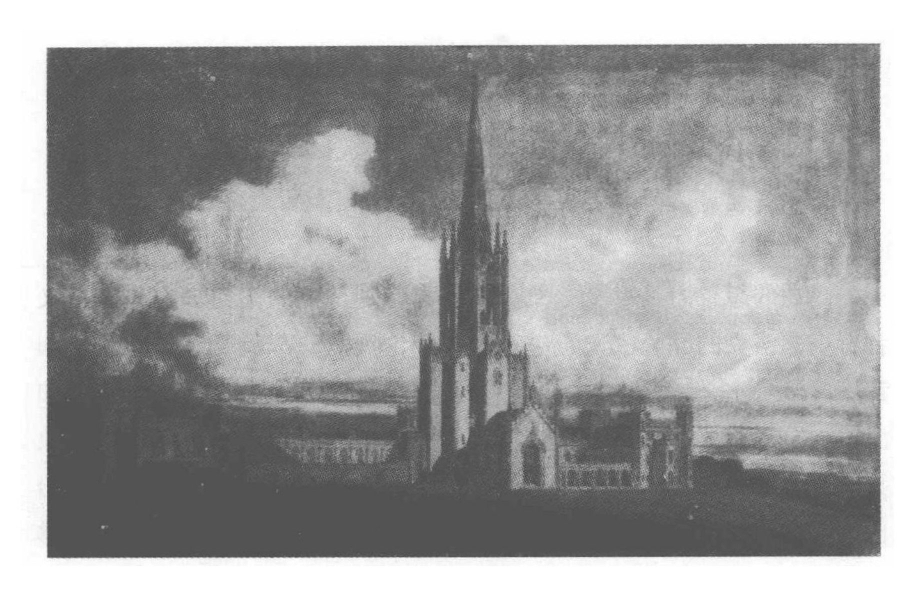
特纳和怀亚特都是世纪之交的浪漫派艺术家。怀亚特的丰特山大教堂（Fonthill Abbey）是1796年至1807年之间建筑的，而此时特纳正以生动的画面展现海上的惊涛骇浪和雪崩的暴烈无常。特纳的画，此时正向他19世纪20年代的风格转变，画布上黄的、蓝的、红的、绿的以及越来越深的各种颜色，将普通景色变为宇宙间力量的大碰撞，俨然史诗再现。这个时候，正是浪漫主义十分活跃的时代。1794年，伦敦的印刷业者、诗人和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发表了他的题名为《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的诗集，感情奔放，不愧开创之作。更精彩的是他自作插图，用素描和勾勒的笔法，画出希腊诸神、先知和天使像。1802年，沃尔特·司各脱（Walter Scott）爵士发表了他的《苏格兰边区歌谣集》（*Border, Minstrelsy*），这是用诗体写成的故事集中的第一本，内容是关于强悍的武士、剧烈的战斗、热烈的爱恋。后来他用历史小说的体裁继续描绘勇敢和爱情。这些浪漫主义作家在英国产生了文艺复兴，达到了都铎王朝以来的新高峰。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三位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拜伦（Byron）爵士。 506

这三位诗人在世上活得时间都很短暂，而且结局都有悲剧色彩。济慈的父亲是伦敦一家马厩的老板，雪莱则是苏塞克斯的地产继承人，都死于1821年。其中济慈死于肺痨，年仅26岁；雪莱29岁时在地中

海溺水而终。拜伦勋爵则在36岁时死于热病。拜伦长相英俊，又是勋爵，被认为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诗人，在当日伦敦的社交界出尽风头。然而伦敦社交界一经得知他和异父母妹妹恋爱的事后，便很快予以排斥，迫使他流亡国外，而这反倒促成他创作了最出色的讽刺诗篇《唐璜》（*Don Juan*）的诞生。1824年，他为希腊独立而战，英勇献身，不愧为一个浪漫诗人。



1825年威廉·布莱克根据《圣经》的《约伯记》的文字“撒旦在上帝面前出现及约伯的慈善之举”所作的插图，雕刻画，长22厘米，宽17厘米（*Fitzwilliam Museum,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The Brigeman Art Library Ltd.*）



特纳（1775—1851）和怀亚特（1746—1813）的绘画作品：《丰特山大教堂设计渲染图》，反映了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颠覆。水彩画，画纸为背面是亚麻的纺纸（*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Gift of Paul Mellon, USA,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Photo by R. Caspole*）

那么，浪漫主义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将《抒情歌谣集》、特纳的海景画、司各脱的小说、布莱克带有插图的《天真之歌》联系在一起呢？为什么怀亚特的丰特山大教堂，被艺术史家肯尼思·克拉克赞为“集 1790 年代的浪漫主义的全部精华于一身”呢？在许多批评家看来，这座大教堂至少有三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高超的想象、浓郁的情感和独特的个性。奥古斯都时期的诗歌和艺术也具有这些优点，但运用起来不免受束缚，它们要受正统的时尚、理性的规范和自然的法则的限制。而浪漫主义者则不理这一套。怀亚特的高塔违背了正统帕拉第奥式建筑的严格对称风格，一如特纳的印象派画风所描绘的海洋和天空，违背了乔舒亚·雷诺德爵士定下的理性和自然方面的法则。而亚历山大·蒲伯如果读了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Ancient Mariner*）的以下几行，又会作何解释呢？

507

深海真的腐了，天啊！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是啊，泥泞多足之物，
就在泥浆的海上蹒跚游荡。

高超的想象力是浪漫主义者观点中特别重要的东西。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洛克的经验主义、牛顿的机械论观点，都显得狭隘、肤浅和荒谬。浪漫主义者深入人的内心，在那里找到创造力、活力、直觉和洞察力，从而揭示了一个无法直接感知的境界。布莱克认为人的想象力"汇集了人类所有悟性的鲜活力量和主要媒介"；雪莱和柯尔律治也相信存有一个超自然的心灵和观念世界，只有用人的想象力才能够加以理解。济慈和华兹华斯都用更实在的说法来解说他们所理解的自然，但他们的自然不是一个无生气的、冰冷的牛顿式世界，而是充满生气的世界，其意义只能靠情感、直觉和诗意去感知。浪漫主义认为心智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充满了想象力。正如布鲁克所言：想象力"能够从一粒沙子看到整个世界、从一朵野花看到全部天宇"。人的心智使得威廉·华兹华斯将一轮落日视为"一种升华的情感、一种深深交融弥漫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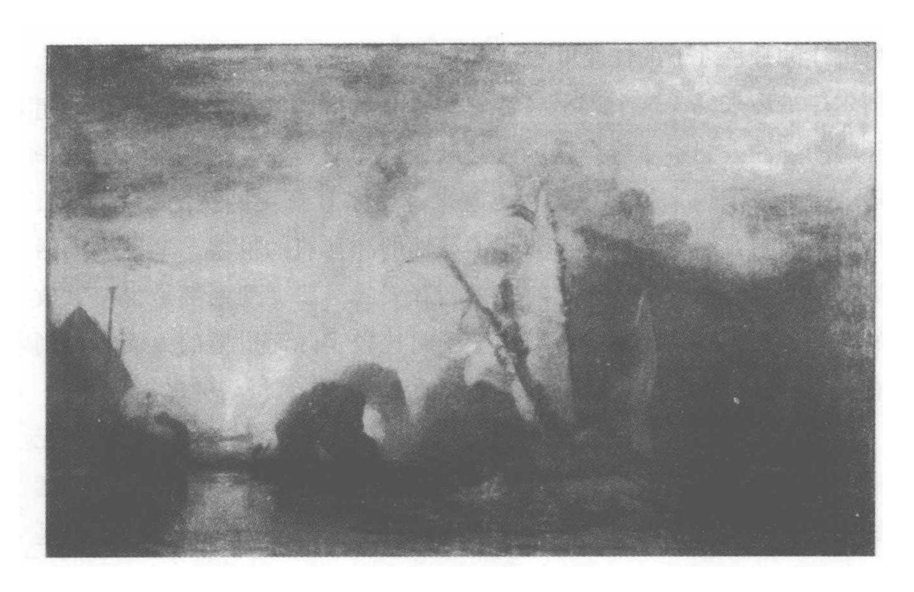
508

浪漫主义并不回避感情，自然本身就能产生感情。为了解这个自然，济慈求助于"神圣的内心感情"，而华兹华斯则大胆地表白：

将每一种自然的形式，岩石、水果或鲜花，都赋予精神上的生命，观看它们如何运用感情，不然就把它们与感情相联系。

浪漫主义精神的崇高情感不一而足。它可以表现为极度自我的和个人主义的，也可以像雪莱和布莱克那样，表现为有关全人类的、发散性乐观主义；它又可以像柯尔律治和拜伦那样，探索更为黑暗的非理性行为；它还可以上升到欢娱的高峰，也可以坠入沮丧的深渊；它也可以推动雪莱写下"炽热的狂喜"和"孤寂心房的颤动"，也可以

509



1829 年特纳创作的名画“尤利西斯对吕斐摩斯的嘲讽”显示出浪漫主义画家是怎么将“棱镜折射的光线”洒向世界（*National Art Gallery,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激发济慈对那永恒的美所带来的宁静的喜悦。最高阶段的浪漫主义，寻求摄取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殿堂的庄严肃穆、展现野外苍凉的自然景观、谱写象征宇宙善恶斗争的诗篇。所有这些都充满了感情，其中有敬畏，有怜悯，有恐惧，有畏缩，还有最后的永恒安宁。

浪漫主义者相信：想象力和感情带来真与美的发现，又导致个性的产生。他们酷爱客观世界里唯一和独特之物，正如他们欣赏艺术家的特有和个人的反应。倘若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看到他们背弃审美观念的法则，不遵守他所谓的“普遍性之博大”，必然会震惊骇异。但是，像布莱克这样的浪漫主义者早已不再崇拜约翰逊的法则了。布莱克曾说：“寻求常道，实风至愚。惟求奇异，乃致精美。”

浪漫主义者的个性尤为突出，创造出许多有关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意象。对于那些年轻而激进的人来说，有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及其自由与理性对专制与迷信的大搏斗。对于那些不太激进的人，则有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

所讲述的月色之下的怪诞世界，在那里生活着各种超自然的神秘之物。柯尔律治后来说，这个近乎寻常善恶是非的道德世界，只有用一种超经验的理性去洞察才能懂得。人们最为熟知的意象，则是出自华兹华斯之手。对于越来越都市化、也越来越受宗教怀疑困扰的英国来说，华兹华斯把自然写成活的、充满了灵性的和神启的世界，笔调生动活泼，像一付清凉剂，使人们仿佛来到春天的早晨，到处都是含苞欲放的花朵和朝阳照耀之下的芳草。至于对比较实际而世俗的人而言，则有司各脱的小说和拜伦的诗篇所描绘的更为现实和世俗的世界。

司各脱在浪漫主义作家中，拥有最多的读者。他说故事的本领无与伦比，笔下的苏格兰山地的酋长，写基督教十字军的英雄，写勇猛的武士，开历史小说之先河，反映了对过去的强烈兴趣，这种兴趣是浪漫主义的内容之一。司各脱建立了一座新哥特式的城堡作为自己的乡居，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返古就是逃避现实。而我们读拜伦那些指斥上层阶级的伪善和腐化的讽刺诗，则无人说他逃避现实。他的讽刺诗，采用的是古典式的押韵，整齐的格律和严肃的讥讽，都不是浪漫主义的风格。但在表面形式之下，涌动着诗人无所不在的浪漫主义热忱：有时嬉笑讥讽，同情被剥削的穷人、抨击残酷的君主、哀叹人的命运、讥讽人的愚蠢、怒斥宗教的虚假、嘲弄社会的伪善。然而，拜伦以欢快的纵乐笔调写道：

> 让我们享用美酒女人，开怀大笑，
> 明天再去祷告和饮用苏打水为妙！

政治上的浪漫主义有许多条路可走：布莱克、雪莱和拜伦走向激进主义，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和司各脱则走向保守主义。但是，不论走那一条路，浪漫主义想象力产生的意象都激发了当时英国的精神生活。

510 浪漫主义对 19 世纪初期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力仅次于严肃宗教的复兴。这两场运动，都是对 18 世纪停滞不前的正统观

念的逆反。德·昆西所欢呼的“无人涉猎的处女地的初次展示”，与改宗的威尔伯福斯的呼声并无分别。无论传统观念对亚历山大·蒲伯和巴特勒主教是如何的新颖动人，但到世纪之交，这种观念已变成形式主义的、呆板的、越来越行不通的东西。所以他们都感到从这种观念下解放出来。

浪漫主义同时也是许多新的和解放力量的反映。这种解放力量有：财富的增加、帝国的扩张、中产阶级的兴起、工人识字率的提高、城市的增加和扩大、教育的进步、交通的改善、旅行的增多，以及戏院、歌剧院、咖啡店、报纸、哲学研究会、印刷出版社的成倍增加。财富增加和建筑的兴起，增加了对新哥特式建筑的实验。伦敦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学校和专业种类，而这些都摆在织袜匠的儿子布莱克和理发匠的儿子特纳的面前。英国人开始旅行：特纳和华兹华斯去了阿尔卑斯山，雪莱、济慈和拜伦前往意大利。学识的增进也振奋了人们的兴致，新的视野被开辟出来了。甚至初期的法国革命也鼓舞了年轻的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的理想主义，但两人年纪大了之后，看出了法国革命的许多罪恶以及他们从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ley）那里所学的机械和经验哲学的肤浅。浪漫主义是一种复杂而多变的态度：它一会儿称赞君主的倒台和哈特利的联想律；一会儿又贬斥革命的愚蠢和经验主义的肤浅。由于建立在想象、感情和个性之上，浪漫主义总是面临陷入主观的危险。浪漫主义摆脱了18世纪公认的固定法则和有序的世界观，而企求建立自己的法则和秩序，结果就造就了一个丰富活跃、五彩缤纷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的规律性或一致性就少得多了。传统公认的世界观，也受到另外一种强有力的学术思想的冲击，那就是理性主义精神。

理性主义精神

从狭义上来说，理性主义是指在探求真理途径的方面，注重推理演绎而轻视实证观察；就广义上来说，理性主义是指一种信念：认为真理可从理性和观察两方面获取，但绝对不能从天启神示、神秘主义

和传统权威中求得。18 世纪晚期，理性主义还认为：人是理性的，而社会也是理性的，特别是当人受了正当的教育，社会经过贤明的设计后更是如此。这种理性主义以约翰·洛克的哲学为基础，尤其盛行于上层阶级读过戴维·哈特利的《对人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Man*）一书的读者之中。

然后，在 1791 年和 1793 年，这种认为理性能够带来社会进步的信念，在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和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的《政治正义论》（*Political Justice*）中迸发为一种政治力量，两本著作都持有人类能达到完善境地的乐观主义，后来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 1813 年发表的《新社会观》（*A New View of Society*）持同样的立场。

511

托马斯·潘恩是诺福克郡的一个教友会教徒的儿子，父亲是一个制衣裁缝。潘恩在美国担任新闻记者长达 15 年，后来回到英国。1791 年，他发表《人权论》作为对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的回答。柏克的这本著作出版于 1790 年，同样也激怒了威廉·葛德文，一位非国教派传教士的儿子，他因而写了《政治正义论》一书。柏克的见解是：现行的制度是好的，因为它们是对人们生活的复杂社会所作的明智而实际的调整。这样实用而经受过考验的安排，要比那些革命野心家从先验和空谈中演绎出来的未经考验的制度要明智得多。柏克指斥革命者为空谈理论的人，但袒护法国的君主和贵族削度，称之为明智的制度，这就极大地触怒了潘恩和葛德文，他们认为这些在法国引起革命的制度，在英国也可以引起同样的革命。

在潘恩和葛德文的眼里，英国的寄生君主、特权贵族、腐败议会、迷信教会、残酷法典、腐朽选区和专制地方官等，都是使人民不道德、使社会剥削成性的制度。潘恩说，应废除一切君主和贵族的压迫和特权，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恢复所有人的一切自然权利；要教育人民树立一种清楚的、理性的道德观念，再也不需要那帮迷信的教士（这一点在他 1795 年发表的《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里提出）；对

年老者应给予养老金，对家庭人口多者应发放贴补，对失业者应提供宿舍住宿和工场工作。在这些都完成之后，就精简政府，缩小开支，减少税收，简化法律，使社会成为一个人有其产的自由社会。这就是潘恩的乌托邦。葛德文则主张彻底废除一切政府和私有财产。如果人人都受了良好教育，不受社会腐败的影响，人类的理性就一定会导引人民走向善良，而他们的同情心和智慧力会促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公众的利益完全一致。

政府宣布潘恩的《人权论》具有煽动性，于是潘恩逃到了法国。但是，他的书出版3年之内销售了20万册。政府对葛德文的书没有过问：这书太贵了，工人阶级买不起。但是葛德文在知识界有自己的门徒，其中包括他的女婿——诗人雪莱，还有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Thomas Holcroft）。他们后来把葛德文思想的一部分传授给了罗伯特·欧文。

罗伯特·欧文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成了新拉纳克（New Lanark）工厂的厂主之一，这是英国最大的棉纺织厂。他用开明的方法来办这个工厂，给工人提供条件良好的宿舍、学校和工作环境。他用无数的文章、演讲和社会实验来宣传两个宏大观点：第一是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第二是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都是邪恶之物。第一个观点产生了一种决定论哲学，这种哲学否定人的自由意志，但给所有人以最乐观的希望：人人有机会受良好教育成为善人；第二个观点产生了他所热心的一种小型合作社社会，全部财产都归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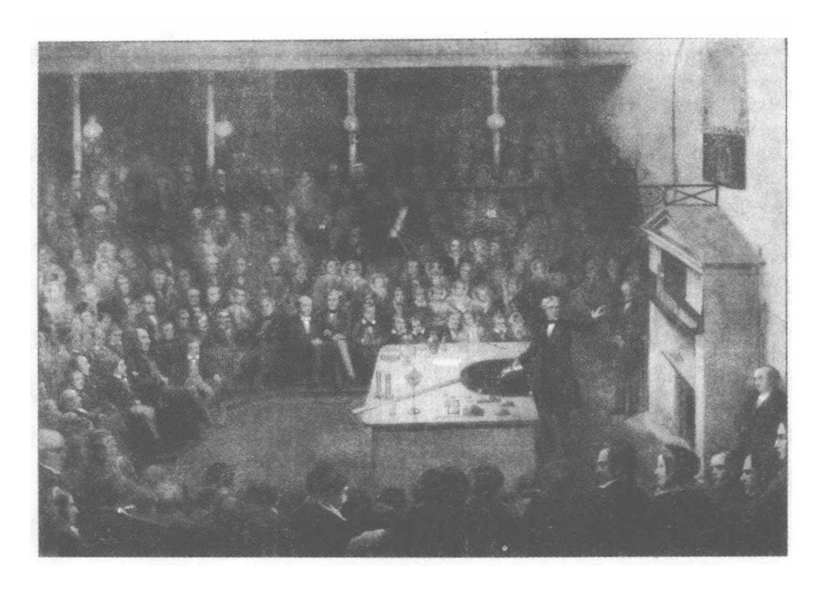
欧文丰富的理想主义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传播，促使成千上万的人去办科学馆、合作社和模范会社。但是他的思想有点混乱、肤浅和过分乐观。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这样评价欧文：“其始如一团气，其终似一股烟”。 512

边沁的思想最终并没有像一股烟那样飘散，而是留下了几部有创新意义的著作、大批未能发表的手稿、许多虔诚的追随者和一个名为功利主义的思想流派。边沁是一个离群独处的单身汉，拥有一份固定收入，同时十分喜爱猫和音乐。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边沁以宗教般的执着，每天用5—6小时的时间思考当时的伦理、政治的社会等重大问

题，并构想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作为一个理性、有效、幸福的社会的基础，从而得以名扬天下。这个系统基于功利原则——“至善”就是能给尽可能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他曾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分析伯克所认为代表古代贤者的智慧的那些制度，发现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无知、自私和非理性。为着消除这些弊病，边沁提出种种计划改良法律，改进监狱，重整教育制度，改造地方和中央行政机构，以及建立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此外，还得有一个由最大多数人民选出的议会，因为只有议会才能够制定给人民带来最大幸福的法案。

边沁把理性运用于分析政治问题、揭露弊端，将思想用于改革，所以能够获得社会上许多希望建设较合理社会的人士的支持；他对当时改革监狱、学校、济贫法、法庭以及议会本身，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对几个贴心信徒大加鼓励：其中最有名的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出版家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而他的儿子、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更有名气。詹姆士·密尔是苏格兰人，一位严格而顽固的理性主义者，他将理智用于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对约翰的教育。他在儿子 3 岁时就开始教他希腊文和拉丁文。当儿子 8 岁时，詹姆士·密尔与他长距离散步，考他有关希罗多德和柏拉图的问题。但他从不教约翰音乐和诗歌。以边沁和密尔父子为中心，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形成被称为激进派哲学家的集团，他们将功利主义带进媒体、文官制度、法律、议会等，努力将理性主义的精神和功利主义的原则应用于社会改革。

那些坚持严肃宗教或浪漫主义的人认为边沁过于机械、狭隘和物化。他有关监狱和济贫法的改革方案将人当作机器，而他的经济规律则将人当作货物。他虽宣称至善应完全以幸福为标准，但流于肤浅，同他看不起诗歌如出一辙。边沁的功利主义，像潘恩的共和主义、葛德文的无政府主义和欧文的乌托邦主义一样，表明了理性主义精神的局限性。事实上，到 19 世纪 30 年代，知识界经常阅读的杂志多半都贬斥这些理性主义者。而较合乎他们口味的，还是华兹华斯的诗歌、513 司各脱的小说、柯尔律治的先验论哲学、特纳的绘画和新哥特式的建



《迈克尔·法拉第在英国皇家学会礼堂作讲演》，作者：亚历山大·布莱克雷（1816—1903），英国人（*The Royal Institution,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筑。宗教界也视理性主义为基督教信仰的大敌。但是，如同牛顿时代一样，理性主义能够继续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19世纪头20年，有关化学方面的讲演很受欢迎。伦敦人都喜欢挤到皇家学会（Royal Institution）去听汉弗莱·戴维（Humphrey Davy）爵士的演讲，或者到伦敦城哲学学会（City Philosophical Society）去听戴维年轻的助手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演讲。戴维的父亲是一位木料雕刻匠，法拉第的父亲是铁匠，他们两人差不多都是靠自学成才。但是他们两人都以在化学和物理领域的发现而震惊了欧洲科学界。1807年，戴维分离出了钾元素和钠元素元素，1808年又分离出了钙、钡，硼、镁和锶元素。他后来发明了戴维灯，使得矿井工作更加安全。接着，戴维又发现了氯元素的特性，并与法拉第合作，首次将氯等气体转化为液体。法拉第成功地离析出碳氢化合汽油，提出电解的规律。1831年，他又作出了他最重大的发现：电磁感应。这个发现为发电机和电动机奠定了基础。

514　这些大量的发现绝不仅仅是一些奇迹而已，而是对许多传统概念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传统概念将热能当作一种物质，将光线看作一种不可量的流体，将化学物质视为特殊的个体。戴维是第一个打破这种唯物观念的人。他将热能描述为一种分子运动，将化学性能定义为分子的不同结构所产生的结果，认为物质是以“点原子”（point atoms）为中心，周围环绕着相吸引又相排斥的力量。法拉第在电学领域中继续了这一革命。他把电描绘成排列为线状的能量，直接作用于周边的粒子，其作用方式形同磁力线。30 年后，大物理学家克拉克·马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将法拉第的电磁场理论用数学方程展示出来，为现代物理学奠定了基础。

戴维、法拉第和其他科学家的诸多发明进一步提高了自然科学的声望。如同在皇家学会和伦敦研究所（London's Institution）一样，在伯明翰月球协会（Birmingham's Lunar Society）、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Manchester's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和伦敦林奈学会（London's Linnean Society）里，科学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员欢庆科学的奇迹和所有形式的知识进步，这一切重申了 18 世纪所宣称的理想主义的胜利。而且，尽管像福音主义、卫理公会和牛津运动这样的重大宗教运动的兴起，是对新生科学的鲁莽冲动、物质至上和精神凋零所作出的反应，但理想主义的前进却是铁面无私和颇有益处。理性主义宣布巫术为非法行为；认为疯子是患有一种疾病，而且是可以治愈的，他们并不是畜生，也不是不可救药；开始接种牛痘疫苗；发明蒸汽机和水力机；使得过去的历史更为可信和具有知识含量；使得法律更为公正和人道；并在迂腐盛行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始讲授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课程。虽然在程度上存有差异，理性主义成为更加普遍和强大的力量。通过廉价印售的百科全书、广益知识流通社（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的出版物以及许多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期刊杂志，理性主义使得 19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人的知识水平，远较 18 世纪 40 年代时为高。在 19 世纪初期的数十年中，知识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大众教育。虽然大众教育主要是以自

学为基础，但廉价大众读物的出版、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新教学法的采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学术领域方面，历史学的发展最为显著。19 世纪时上半叶，历史学界花费很大的气力以批判的视角阅读原始资料，发现和重构英国的过去。政府设立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组织专门委员会编辑无数的文件档案。地方的历史文物研究会社也收集文献资料、出版杂志。大学终于开始聘请著名学者担任历史学教授，出版界开始推出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著作，其研究范围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和诺曼时期的英国历史、英国宪法的发展历程、以及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国。这些都是有史以来首次用科学方法研究原始资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

这样，维多利亚时代受过教育的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乔治诸王时代已有很大时不同。乔治诸王时代的人们认为只存在单一的自然规律，人的本质也是一成不变；普天之下的战争和革命，不论发生在古希腊还是今日英国，其原因均大致相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过去的看法则不同。他们看到新的制度、新的思想和新的人民，一个个产生、发展、成熟起来，于是一个个不同的时代接踵而至。辉格派历史学家在这些发展中看到立宪政治和宗教自由的巨大进步，托利派历史学家，如柏克，则在历史中看到久经考验的智慧。在 19 世纪 40 年代，埃德蒙·柏克在被人引用和受人赞美方面独占鳌头。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历史特别尊崇。因此，1770 年至 1850 年之间英国的思想变革造就了新一代英国人，他们对宗教是认真的，对艺术和文学是浪漫的，对科学是唯理的，对过去的看法则是历史主义的。

515

阅读文献

Anthony Armstrong,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 Methodists, and Society, 1700—1850*,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73. 这是一部最为清楚和简洁的介绍性著作，对卫理公会、英国国教会和非国教派中福音主义的复兴作了最具鉴别力的考察。

Walter Jackson Bate, *From Classic to Romantic*,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6. 该书对由古代和文艺复兴继承下来的古典观念，向现代观念中的个人主义的重大演变，作了传统的、但依然深刻的阐释。

Ford K. Brown, *Fathers of the Victorians: The Age of Wilberfor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该书极为全面和生动地叙述了英国国教会中主要福音主义者的事迹，笔调讥讽尖刻，存有歪曲之处，但同样具有启示作用。

Owen Chadwick, *The Mind of the Oxford Movement*.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70. 作者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中最有学术性和洞察力的一位。他出色地介绍了高教会派在牛津的兴起，以及所产生的像纽曼和珀西这样的大人物。

Kenneth Clark, *The Gothic Revival*,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1928. 这是一部由最出色的艺术史家对英国“最有影响的艺术运动”所作的极具批判性的研究著作，专门考察了运动产生时代的社会和美学需求。

Rupert Davies and Gordon Rupp, *A Histor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Epworth Press, 1965. 这是一部有关一批学者坚持卫斯理宗教义的权威性史学著作，其重点集中在挽救所谓滥施恩宠的信仰和教义方面和对社会变革作出反应方面的经历之上。

Boris Ford, ed., *From Blake to Buron*, London: Cassel & Co., 1962. 该书的十几位作者针对诸如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济慈和拜伦这样的诗人，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诗人们天赋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写作的主题是什么？他们反映其所在环境的原因与方式如何？

516 Alan Gilbert,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 England*, London: Longmans, 1976. 该书探究宗教预期社会和工业背景的关系，特别是这种背景铸就非国教会与国教会之间冲突的方式。

Elie Halevy,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London: Fa-

ber, 1949. 该书从逻辑上透彻分析了政治经济学家和杰里米·边沁的思想以及自由放任经济与强势政府观念之间的冲突。

Colin Russell, *Science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1700—190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这是一部关于18、19世纪英国科学社会史的杰作，作者不仅阐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兴起，而且着重强调科学在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应用。

517 # 第二十章　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政治

1760 年至 1820 年，乔治三世统治着英国。在英国历史上，除了他的孙女维多利亚女王之外，乔治三世是统治时间最长的国王。他的实际统治时间只有 51 年，因为在 1811 年他因病退位，由他的儿子作为摄政王子来统治英国。在乔治三世统治的 51 年里，爆发了三次重大的革命——工业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同一时期，也迎来了两种影响最大的政治发展——议会对行政机构的控制上有了实质性进展；要求议会改革的民主力量不断增长。乔治三世去世时，这两个方面均未取得成功，但两者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1811 年，即将退位的乔治三世将否定这种不可避免性。自 1760 年以来，在任命大臣的问题上，乔治三世不是一次次战胜当时的政客们了吗？对于要求议会改革的每次尝试，乔治三世不都一一压制下去了吗？在他漫长的统治当中，乔治三世抵挡住了政客们和那些思想顽固的人们的侵袭。然而，尽管他取得了很多次斗争的胜利，但他失去了整个战争局势。由工业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使他的胜利仅仅变成了比鲁斯式的（Pyrrhic）胜利。但是在 1760 年，当乔治三世初掌政权时，在英国，很少人能够预见会发生这种事情。



乔治三世，1760 年至 1820 年在位。这幅帆布油画由苏格兰人艾伦·拉姆赛（1713—1784 年）所作，其规格为 249.7 × 163 厘米（*Scottish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Edinburgh, Scotland. The Bridgman Art Library Ltd.*）

乔治三世执政的学徒时期：1760—1770 年

乔治三世 22 岁时即位为王，他是自 1547 年爱德华六世以来登上王位时最年轻的君主。乔治有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但他又有清教徒般的决心，克服了自卑心理，成为一名强有力的国王。乔治的这两种性格势必产生紧张心态。乔治的情绪多变。有时他惰性十足，漠不关

518 心；有时性格孤僻，心情忧郁；有时兴高采烈，精力旺盛，但大多时候，他思想顽固，倔强不屈，并一直相信上帝与他同在。乔治三世比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更加重视国王的特权，他有一种仇恨党派的情感，特别仇恨辉格党。乔治三世决定不被党派人士所左右。他蔑视政客，称这些人为“工具”，用一种骑士的礼节来对待他们。

乔治三世有很深的宗教和道德情感，他是一个贞洁自持、忠心不二的丈夫，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堪称全国典范。然而，在世间的政客眼中，他有点吹毛求疵，有点自命不凡。他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君主（*bon vivant*），也不是一个时尚的人，而是一个强健、清醒和笃信上帝的英国人。乔治深受中产阶级的欢迎，被称为“农夫乔治”（farmer George）。

乔治三世统治的前10年是饱受折磨的。这给了他很多教训，其中之一便是，虽然他能够把他最亲密的朋友提到首相之位，但却无法让他坐得长久。1761年，乔治任命他以前的老师比特勋爵（Lord Bute）为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1762年，又任命他为国库大臣（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比特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很多

519 政治判断力：他告诉乔治三世，政党对于宪法而言是有害的。他上台掌权，致使辉格党的化身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和英国胜利的缔造者威廉·皮特相继辞职，这些举动使脾气极坏的乔治三世把纽卡斯尔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撤职了。这种对“无辜者的清洗”，肃清了比特执政的道路。但是，比特顿时丧胆了。由于害怕那些对他的飞黄腾达感到愤怒的政客，也害怕那些伦敦暴徒——他们痛恨任何傲慢的苏格兰人，比特辞职了。皮特余怒未息，纽卡斯尔已辞去职务、深受伤害，比特也已离去。乔治三世不得不转向、毕恭毕敬地求助于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那位专横的辉格党贵族坦普尔勋爵（Lord Temple）的弟弟。尽管格伦维尔冷酷无情、作威作福，是一个非常令人厌恶的人，但他却把政府管理得很有效率，并在下院中赢得多数人的支持。不幸的是，他那冗长的、过分说教式的、虚张声势的训诫，令乔治三世不能容忍。1765

年，乔治三世罢免了格伦维尔。

接下来组阁的是乔治三世的叔叔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四个月后，坎伯兰公爵去世，乔治不得不去找罗金汉侯爵（Marquis of Rochingham），但他只任职了一年。罗金汉在100多名辉格党人的基础上组建了内阁，其中又加入了格伦维尔的、皮特的和乔治三世的支持者。这后面的廷臣，被誉为“国王的朋友”（King's Friends）。但是罗金汉遵循辉格党的政策——和普鲁士结为防御联盟，结束英国孤立态势；取消苹果酒税（cider tax），以迎合乡村绅士；废除印花税，安抚美洲殖民者。罗金汉此举激怒了乔治三世，乔治三世强烈要求“国王的朋友”废除这个“水怪派系”（hydra of faction）。为了去掉这群水怪，乔治三世在1766年请威廉·皮特和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组建了一个广容内阁（broad-bottom ministry），从所有政党中网络最有能力的人任职。他们答应了，但这个广容内阁是软弱的、紊乱的。皮特在1766年成为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之后称病引退到上院，把政府交给了格拉夫顿（Grafton）。格拉夫顿是一位和善的公爵，他首要的爱好是情妇和赛马。接下来的四年，政府像只无舵的船——这几年，美洲殖民者因新增税收而越来越愤怒，伦敦市民也因议会排除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合法选出的下院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而愤愤不平。最终，在1770年，乔治三世请诺斯勋爵（Lord North）组阁。这一内阁持续了12年，震惊了每一个人。

尽管乔治三世执政的前10年看似是紊乱的、无足轻重的，但这并非没有意义。这10年中，人们看到的是：乔治三世想要破坏宪法，他决心不被政党所左右，任命和罢免内阁大臣时很少考虑到多数人的意见，他的这种决心不仅使无能的比特、愤怒的格伦维尔、怠政的皮特和放荡的格拉夫顿垮掉，而且使辉格党人在党内和其奉行的原则上，形成了一种更加坚定的信念——所有的内阁大臣都需在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然而，尽管乔治三世在任命和罢免内阁大臣上破坏了宪法，但他不希望通过利用官职、年金、荣誉和金钱收买议员的忠心，操纵

选举，从而破坏议会的独立性，以此来颠覆宪法。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不仅因为官职、年金、荣誉和金钱并不足以动摇议会，也因为这些做法，在乔治二世统治下的辉格党政府中，在最大的适当范围内被长期使用过，而且被认为是合乎宪法的。

520 1763年，政府以一张普通的逮捕令逮捕约翰·威尔克斯和其他48人，查封了威尔克斯办的报纸，并将他关入监狱，从议会中除名。这件事引起了对乔治三世的指责，说他也想颠覆英国人民的自由。议会完全支持对威尔克斯进行起诉，没有对激进的、写宣传册的人员产生影响——他们称乔治三世是暴君，也没有对埃德蒙·柏克——他称乔治三世是违宪的——笔下那缺乏证据的、说乔治三世颠覆议会的言行产生影响。柏克是罗金汉派的宣传能手，他在1770年撰写的《现状令人不满之原因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这本小册子中进行了指控，该书在论述政党是必须的和健全的这方面上，更具说服力。

18世纪60年代，尽管许多政治家和乔治三世一起谴责政党，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身就是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辉格党人公开地、带有攻击性地成为乔治三世威胁宪法的反对者，“老托利党人”和“国王的朋友”就像“托利”（Tory）这个词一样更加谨慎；他们带有詹姆士二世党人的余音。辉格党主张自由、强势的议会、守宪的国王、宗教宽容、以及在欧洲和海洋上奉行攻击性的对外政策；托利党主张效忠、强大的君主、英国国教、不设常备军、结束辉格党选举的腐败、终止议会、以及奉行较为温和的外交政策。在强势的贵族和政治家身边，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派系。有些派系相对独立，例如皮特派、格伦维尔派和贝德福德派（Bedfords）。其他派系，例如罗金汉派、福克斯派（Foxites），实质上是辉格党。

宫廷和政府中的大约180名成员也活跃在议会中，这些官职报酬很高，使他们成了听命于国王的人。另一端是大约80名坚决保持独立的乡村绅士，他们是来自不同郡县的议员，隶属于托利党或辉格党，没有共同的利益。18世纪60年代，辉格党、托利党、其他各派系、

宫廷和宠臣、以及独立人士，构成了一种不稳定状态：两党制似乎不存在了。但是，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两党制确实存在着。18 世纪 70 年代，在诺斯勋爵的领导下，老托利党、国王的朋友、贝德福德派和格伦维尔派组成了托利党，该党在小皮特和乔治三世的支持者带领下，一直到 1801 年都主宰着英国的政治。辉格党在罗金汉的领导下，吸收了老皮特和福克斯派的支持者，他们骄傲地颂扬埃德蒙·柏克富有雄辩的小册子中的主张：政党是一个实体，它是有益的，是有所追求的。公众舆论对此表示赞同。在咖啡屋里、在公众集会上、在竞选中、通过小册子、以及在伦敦的四个日报和六个周报上，人们宣称他们自己是辉格党人或者托利党人。党派势力的增长是无休止的，此中所坚持的是，内阁大臣应完全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国王负责。伦敦的许多新闻媒体也为约翰·威尔克斯有权留在议会而辩护。

1768 年，米德尔塞克斯郡传来了响亮而清澈的、为"威尔克斯与自由"而辩护的呼声，该郡是大约 70 万伦敦人的家乡。约翰·威尔克斯本身就是伦敦人，他是一个很富有的酿酒商的儿子，娶了白金汉郡一个乡绅的女儿为妻，花了 7000 英镑成为艾尔斯伯里（Aylesbury）选区的议员。虽然他当议员并不出色，但他好饮、好赌、好色，圆滑机敏、八面玲珑，办报纸大胆放肆且庸俗下流，这些使他臭名昭著。威 521 尔克斯拥有一份《北不列颠报》（*North Briton*），并自己当编辑。在第 45 期上，他攻击乔治三世所说的——迟来的和平是光荣的——全是谎言。另外，他还说乔治三世的母亲是比特的情妇。对政府来说，这样的侮辱诽谤超出了容忍的界限。他们以一张普通的逮捕令逮捕了威尔克斯，并捣毁了《北不列颠报》报馆。这张普通的逮捕令没有填明被拘人的姓名地址，其合法性存有疑问。逮捕威尔克斯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是议员，享有不受拘禁的特权。事实上，威尔克斯还是被释放了。他厚颜无耻到了极点，将第 45 期报纸重新发行，然后于 1764 年逃往法国。4 年之后，威尔克斯返回了英国，受审入狱，但这些事情发生在他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竞选议员胜利之后。乔治三世和内阁成员对他都愤怒不已。那下流的威尔克斯！那造谣诽谤者！那斜眼的浪子！ 522

议会对他的观点无法容忍。1769 年 2 月 2 日，议会将他除名，并下令进行新的选举。威尔克斯没有竞争对手，再次当选。议会又将他除名重选，结果又是只有他一个人候选，无人竞争，于是又当选，又除名。1769 年，在第四次选举时，才有一个名叫勒雷尔的上校（Colonel Luttrell）与之竞争，议会遂宣布此人为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议员，虽然他只得了 296 票，而威尔克斯得了 1143 票。乔治三世和政客们不顾米德尔塞克斯选民的意愿，径自宣布议会有权自行决定它自己的议员。这种武断，正如政府用普通逮捕令去捣毁报馆一样（法院在 1766 年已把此判为非法），是伦敦人所无法容忍的。伦敦的激进分子成立了“权利法案拥护者协会”（the Society of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他们进行群众集会，筹集捐款，向议会请愿，偿付威尔克斯的债务，并让他成为市长（Lord Mayor）。这是一次城市人民民主力量起来反抗贵族议会的行动。那些把威尔克斯重新选出来的选民，是中产阶级中的贸易商、零售商和制造业者。那些有自己的财产且收入在 40 英镑以上者，倾向于投票反对威尔克斯；不及 40 英镑的人，则易于投票支持威尔克斯。但也有富有的工商业人士支持威尔克斯的，就像那里一批贫寒的编织工一样，他们大约 6000 人，虽然没有选举权，但他们拥护威尔克斯，阻止反对者进入投票站。

在抗击议会武断压制英国选民的权利方面，伦敦并非形单影只。1770 年，乡村也开展许多集会，进行请愿，反对把威尔克斯除名。来自 14 个郡和 12 个自治区的约 6 万名选民，参加了支持威尔克斯的请愿活动。但是，这些抗议并非有很深的基础。到 1774 年，威尔克斯运动便销声匿迹了。这场运动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方案，尽管有那么多请愿书，但运动主要的社会根基是在伦敦。可是这一民主力量的爆发却产生了一个不祥的预兆：如果那些膨胀中的工业城市，连同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变成了小规模的伦敦，情况将会如何呢？如果乡绅中有一部分不满人士响应这些城市的力量，要求议会改革，情况又将如何呢？18 世纪 70 年代，要求改革的愿望很微弱，到了 18 世纪 80 年代，在美洲殖民地丧失后，这种愿望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美国革命：1770—1783 年

美洲殖民地的丧失，缘起于不列颠要强行将其容纳到大英帝国之中，但是在这个时候，地理上的隔绝、当地的经济利益、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和数十年来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忽视，这些都鼓舞着美洲殖民地的独立热情。殖民地的纳入需要在美洲建立一支常备军和一个固定的文官政府，而此两者的财政负担是通过向殖民地人民征税来解决的。美洲殖民者虽受英国统治，但长期以来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生活在相去 3000 英里的大洋彼岸，他们如辉格党般害怕暴君。对于他们来说，纳税供养一支骑在他们头上的常备军和一个统治他们的文官政府，这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 523

美洲殖民者对七年战争贡献极少，获利甚丰，对于为他们自身提供的保护和治理却未付分文，这对英国统治者来说，同样是不可容忍的。因此，议会在 1764 年通过议案，对向殖民地输入的糖蜜和白糖课入口税；1765 年，对殖民地所有合法的商业交易征收印花税；1767 年，又对纸张、颜料、玻璃、铅和茶叶征税，并扩大海关组织，以防走私。乔治三世和政客们都同意议会有对殖民地的统治特权以及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然而，并非所有的政客都同意征税的方式和执行的苛严。美洲殖民地对这些税收的反抗异常激烈，在这种反抗之下，英国政府罗金汉内阁于 1765 年下令取消《印花税法》（Stamp Act），格拉夫顿内阁于 1769 年下令取消纸张、颜料、玻璃和铅的关税。格拉夫顿政府保留了茶税以作为议会对殖民地拥有统治权的象征，正如 1766 年的《直宣法案》（Declaratory Act）中所表述的那样。不论是罗金汉、格拉夫顿，还是其他大臣，他们都没有残酷地对殖民地实施真正的征税。

事实上，英国历届政府的作为大多是即兴之作。例如，在 1772 年，为帮助东印度公司解决财政困难，议会允许该公司不经伦敦茶商与殖民地茶商之手，直接把茶叶运往美洲殖民地，廉价销售。波士顿的茶商们因茶叶运销不经他们之手而愤愤不平，他们将茶叶倾入海港。

波士顿的这种挑衅行动，加上其他殖民地发生的反抗暴动，遂促使议会于1774年通过4个强制法案：封闭波士顿港口；剥夺马萨诸塞殖民地选举总督属下的殖民地议会的权力；规定某些案件中的被告应送往英国接受审判；授予军队强制驻扎该民间住宅的权力。同年，议会通过了《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对天主教流行的加拿大而言，该法案是一个开明的法案，因为它承认了天主教。但是，对加拿大以南的殖民地来说，则是一种苛政，因为该法案规定强制征收教堂税，法庭不实行陪审制，总督以下不设民选议会。这个法案也适用于俄亥俄河流域（Ohio valley）的部分地区。到1775年春，殖民者在第一届大陆会议（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中会晤，马萨诸塞与英国人在列克星顿（Lexington）交火。美国革命开始了。

美洲殖民地与母国分离，虽然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18世纪60年代和18世纪70年代中，英国一贯地进行更为强有力的统治，或者始终如一地保持进一步安抚的策略，或许分离之事在18世纪可能不会发生。如果英国首先能够建立一支常备军和一个有效的文官政府，之后再强行征税，殖民地人民或许会屈服。另一方面，稳定地实施安抚政策，或许能够让殖民地成为帝国的一个独立的自治领域。无论如何，18世纪60年代的诸税并课激怒了殖民地人民。虽然后来许多税收被取消，但这只能在反抗声中激励他们的斗志。

524 反英之旗已举，殖民地人民此刻必须击败一个世界上的一等强国，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殖民地完全没有准备。在战争的第一年，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所统率的殖民地军队衣衫褴褛、装备不齐，其士兵的应募期为一年。英国倘若能够火急从事，在1776年初便调发大军，或许会赢得战争。但是，英国没有这么做。乔治三世作为英军的统帅，他负责招募士兵和选任军官，但他一再拖延，延误战机。诺斯勋爵作为政府的首脑，他负责筹集资金、组建海军、装备陆军和指挥战斗，但他行动迟缓，漫无头绪。直到1777年很晚的时候，英国方面才把军队调集到北美洲。即使到了此时，倘若他们能够贯彻孤立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战略计划，其占优势地位的兵

力仍有取胜的可能。他们原定计划是由伯戈因将军（General Burgoyne）率军从加拿大进攻纽约北部，豪将军（General Howe）同时自纽约城向北进军，与伯戈因会师。行军迟缓、小心谨慎的豪将军没有接到伦敦的明确命令，转而占领费城。因此，当无畏的伯戈因孤军深入时，豪将军与之相去甚远，失去呼应。于是，1777 年 10 月，伯戈因在萨拉托加（Saratoga）被击败。

萨拉托加战败的消息使法国加入了战争。英国已丧失了 1776 年至 1777 年间速战速决的机会，此时面临着两种可能性：要么允许美洲殖民地独立，要么拿出皮特的精神和英雄气概来进攻法国。此两者英国均未做到。乔治三世坚决不承认北美独立；诺斯勋爵几乎没有扩充海军，也不能鼓舞占有优势的英军士气战胜处在劣势的殖民地军队。因此，乔治・华盛顿的军队增强了自信心，军队人数日增，而诺斯勋爵的政府却陷入了混乱、迷茫，缺乏效率。此时英方最大的希望是双方能够相持不下，而这要看英方能否维持制海权。这时，一支刚刚打败英国救援中队的法国舰队控制了切萨皮克海湾（Chesapeake Bay），这意味着当不明智的康沃利斯将军（General Cornwallis）进入约克敦时，华盛顿的军队能够封锁已经形成的圈套。康沃利斯在 1781 年 10 月 19 日投降了。1783 年，英国在和约中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对于英国而言，七年的战争以失败告终。

在美国革命的爆发和战争的失败上，乔治三世负有重大责任，但他并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例如，在 18 世纪 60 年代的财政和关税政策、措施的制定上，乔治三世很少插手。他在私人信札中甚至未曾提及《印花税法》。在那段时间里，他对北美殖民地比对他的大臣们更要宽大仁慈。但 18 世纪 70 年代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使乔治三世感到愤怒，他曾极力要求诺斯勋爵和其他大臣们强烈镇压这些顽固不化的、被他误认为是孤立无援的激进分子。1775 年 8 月 24 日，他颁布了《平乱声明》（Proclamation of Rebellion），痛斥北美革命者。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四个强制法案，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都纷纷致信表示效忠，支持《平乱声明》。历史上的神话

几乎没有比乔治三世的暴政酿成了北美革命的神话更大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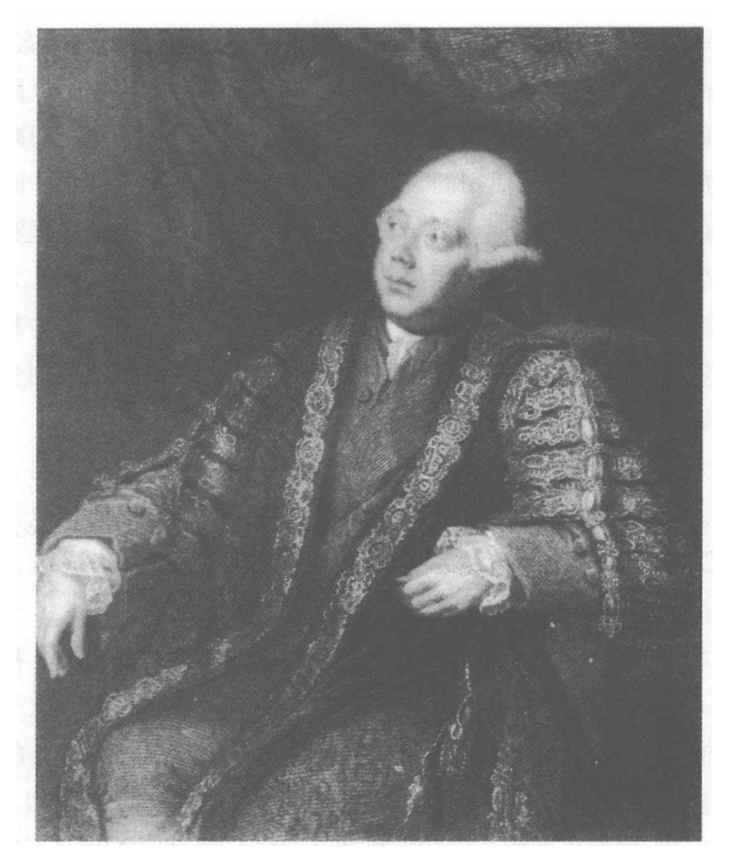
在战争的指挥上，乔治三世是一个更具决定性的角色。他的最大错误是支持诺斯内阁长达7年之久，在这期间，战争失败了。诺斯勋爵不但没有明确的战略，没有鼓励军心、振作士气，而且甚至连重整海军或选拔良将都没有做到。但是，乔治三世对他一直支持到底，正如他固执地支持一个败局已定的战争一样。1779年6月21日，乔治三世召集内阁成员前来，向他们陈述战争持续之必要性长达半个小时之久。只有到了1782年议会强迫诺斯辞职之时，国王才认识到，言和是不可避免的。

525

战争的失败和乔治三世对无能的诺斯勋爵的支持，激怒了英国具有独立精神的乡村绅士们，他们旧话重提，指控国王利用他的庇护使议会腐化。这种指责在1782年还是无稽之谈，正如在1770年的状况一样。但此时，这种指责更有吸引力，因为乔治三世和诺斯勋爵失去了帝国最富庶的部分，让国家蒙受了战败的耻辱，增加了债务，加重了土地的征税。约克郡的富绅、出身名门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克里斯托弗·威维尔（Christopher Wyvill）再次唤起了改革议会的呼声。从1780年至1784年，威维尔和他的身为乡绅、富商和自由职业者的朋友们，组织了各郡的联合会，签名请愿，要求削减花费昂贵、腐化堕落的官吏，减少闲职，缩短议会的会期，增加百名议员，分由各郡选举产生。1780年，他们获得了60000人的签名支持。但是后来，由威维尔组织起来的约克郡联合会（Yorkshire Association），像先前威尔克斯事件一样渐渐销声匿迹了，因为这种请愿都是基于对不幸的事件所表现出的愤怒：1769年米德尔塞克斯郡的选举；1780年美洲战争的领导失措。城市化和民主的思想此时仍然非常微弱，不足以构成一个坚实的、推进议会改革的动力基础。18世纪80年代初的真正问题，依然是那个多年来的老问题——治理英国的大臣应由谁来选任，是国王还是议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引起了1782—1784年的宪政危机。

1782—1784年的政治危机

18世纪，英国的宪法赋予了国王选派和罢免他所希望的任何大臣



诺斯勋爵，1770—1782 年担任乔治三世的首相（*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的权利。实际上，宪法同时也赋予了议会权利，通过否决财政补助金来否决任何内阁。如果国王坚持任用一个议会不同意的大臣，这两个原则使政府无法组建。幸运的是，这样的情况在乔治二世统治时期从未发生过。乔治三世和议会也同样庆幸双方都接受诺斯勋爵长达 12 年之久。美洲的丧失使诺斯丧失了信任，这因此对乔治三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再次引发了内阁责任问题。

1782 年 3 月，诺斯勋爵辞职。诺斯告诉乔治三世，他辞职是因为不能在下院取得多数。然后，他附加了一个宪法上的忠告：议会的意志“必将最终取得胜利”。国王只好向事实低头，请反对派领袖罗金

526 汉勋爵组阁。罗金汉答应了，但附有条件，要国王答应下列法案成立：剥夺税务官员当选议员的权利；禁止政府承建商进入下院；从国王文职人员的名单（King's Civil List）中削减若干闲职和冗职；削减由议会批准的、专门供国王使用的、聘用宫廷和政府仆役的基金。因为这些改革削减了政府的费用，故被称之为“节俭改革”，但其真实意图在于削弱君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罗金汉认为，这种影响力已大到危险的程度，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是对美和约问题。因罗金汉于1782年7月早逝，这个问题留给了继任的内阁主持者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urne）。

谢尔本勋爵是一个富有的大地主，他头脑机敏、见事明察、富有想象力。他对自由贸易和议会改革都有很先进的见解，但他也是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的拥护者，厌恶政党，对国王恭顺。他对同僚们傲慢自大，常常有事不和他们商量。一个月内，他的4个同僚相继辞职，其中之一是下院最出色的演说家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他是亨利·福克斯（Henry Fox）的次子。亨利·福克斯一度是老威廉·皮特的政敌。随着儿辈都成为议会的重要

527 人物，皮特家族和福克斯家族的对垒变得更加紧张、更加剧烈。1784年，年仅24岁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是拥有140名下院议员的谢尔本派中的一员，34岁的福克斯手下有90名下院议员，而诺斯勋爵手下则有120名。还有100余名无派系的、保持独立的乡村绅士。福克斯痛恨谢尔本不能与其他同僚合作，愤然辞职，加入了诺斯勋爵派。加上一些独立的议员，便迫使谢尔本勋爵辞职。

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英国没有内阁存在。福克斯不会与谢尔本合作。另一方面，如果诺斯勋爵和他的下属加入内阁，小皮特便不会继续留在谢尔本内阁。这种僵局导致了诺斯和福克斯进行谈判协商。这是野心勃勃的政客们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其结果产生了“声名狼藉”的诺斯—福克斯联合内阁，这令那个时代的人们大为吃惊。他们要问，保守的诺斯怎么能够和时而激进的福克斯携手合作呢？诺斯怎么能够和一个以尖刻言辞揭露其美洲政策的错误和愚蠢的人合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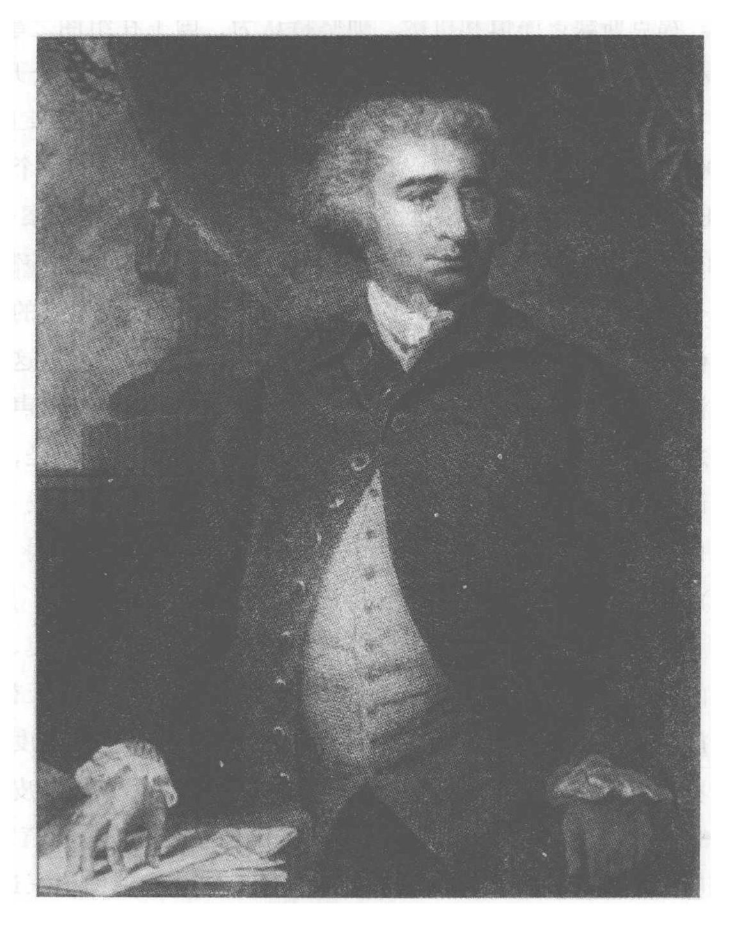
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就个人而言，为人温柔和善的诺斯欣赏极其讨人喜欢的福克斯，而福克斯对善于辞令的诺斯也同样赏识；第二，美洲问题此刻已经结束了。

除了一种情况之外，这将会是一个可行的联合内阁。然而，事实是乔治三世憎恨这个联合内阁。乔治三世特别不喜欢冲动、自负、脾气急躁、有时有报复心理的查尔斯·福克斯。他也知道福克斯将会操纵内阁。福克斯缺乏谨慎和机敏。他坚持认为，国王在组阁之事上没有发言权，将乔治的朋友瑟洛勋爵（Lord Thurlow）免职，公开表示蔑视国王，和年轻的、肆意挥霍的威尔斯亲王为友（他主张亲王每年应有100000英镑的庞大收入）。乔治三世是不会帮助这样的一个内阁。

1783年秋，福克斯—诺斯联合内阁提出了一个东印度议案（East India Bill），议案将会剥夺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政府的控制，把控制权转交给一个由7名委员和9名助理委员组成的机构。机构中所有的16个人，其任期为4年，他们将不会被更换，能任意行使任命权。这16个人都是福克斯和诺斯的属下。尽管民众对这种巨大的任命权大声反对，群起攻之，议案在下院还是以208票对102票获得通过。但是，不得民心的议案给乔治三世提供了一个机会。乔治三世先取得威廉·皮特出来组阁的允诺，然后对议案大肆谴责，并通过坦普尔勋爵（Lord Temple）表示，上院议员凡投票支持议案者都是国王的敌人。上院并不限制王权，而是王室的附庸，因为它是由效忠于王室的官吏、听命于国王的主教、恭顺惟谨的苏格兰议员、以及渴望得到更多荣誉和恩宠的贵族组成。因此，上院于1783年12月17日否决了东印度议案。次日，乔治三世免除了福克斯和诺斯的职务，将内阁印章授予皮特。

1784年1月12日，议会召开会议。冷酷、刚毅的皮特正值24岁，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严肃地否认他知晓或帮助国王进行密谋策划，虽然事实上他已应允国王出面组阁。这使支持联合内阁的人愤怒不已。国王的做法是违宪的；他秘密地扼杀了东印度议案，而国王在下院没有反对通过该议案。国王和上院议员侵犯了下院的权利。一种谴责那些行为的决议案以39票通过。皮特自己提出的一个印度议

528 案被否决了，将近3个月内，他屡遭失败，但是逐渐缩小了差数。皮特不在乎人们屡次叫他辞职，因为他知道，公众舆论所震惊的是：福克斯的辉格党人不仅加入了谴责出卖英国人自由的诺斯派托利党人的行列，而且福克斯派的辉格党人厚颜无耻地攫取了东印度公司的任命权。在议会中，乔治三世通过慷慨地使用特权、提拔任命、荣誉以及利用贵族阶层去帮助皮特，赢得了所需的支持。



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他是一位演说家、投机者、辉格党人，也是自由的辩护者（*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by Ken Welsh.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3月，国王解散议会，下令普选。国王和皮特不停地运用政府施惠，谨慎地鼓动公众舆论，并利用该世纪最能干的选举专家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出面活动，最后取得了胜利。福克斯—诺斯联合内阁中的96名议员失去了他们的议席，也失去了选举权最多的大城区和大郡中的席位。政府的庇护无疑帮助了皮特。在18世纪，强势的内阁没有一个在普选中失败的。像沃波尔和纽卡斯尔一样，皮特知道如何赢得财政部和海军部的选区。然而，最大的收获不在这样的选区中，而在于公开的选民之中——在郡和大选区中的选民——在那里，公众舆论显示了它至高无上的意志。 529

虽然皮特的胜利击败了福克斯—诺斯联合内阁，但是这个年轻的政客并没有能够立刻获得议会多数；1785年，下院4次击败了政府。但皮特没有辞职。1785年以后，皮特的多数越来越稳固了，他给乔治三世带来了一个长达18年的稳定政府。乔治三世和威廉·皮特打垮了查尔斯·福克斯和诺斯勋爵，这并不是企图颠覆宪法，虽然许多福克斯派的人都这样攻击他们。但是，这次击溃联合内阁确实使宪法的运用受挫。乔治三世对上院议员的恐吓，皮特屡次失败而不肯辞职，这些在许多人看来都是违反宪法的。国王和皮特的辩护是，福克斯和诺斯自身被他们“内阁的动乱”（storming of the cabinet）逼近了违宪的边缘。福克斯宣称国王在选任不重要的阁员时没有发言权，这是对国王建立政府的特权的否定。

事实上，英国统治阶层在宪法法规的精确运作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除了选任内阁大臣，统治阶层没有明确规定国王和上院在通过立法时的角色。此外，大多数人认为：议会对新成立的内阁应进行一次公平的投票测验，最终强迫内阁解散的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拒绝投票通过拨款法案。福克斯和诺斯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方法，因为他们害怕会疏远乡村绅士。 530

无论如何，福克斯—诺斯派的许多人转而投向了皮特这边，正如舆论的转向一样。福克斯与诺斯马基雅维里式地携手结盟，他对国王的过分要求，他的印度议案对任命权的霸占，他在除了推动他自己事

业前进之外一贯支持的任何事情上的失败，以及辉格党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议会改革，这些都使福克斯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当福克斯的名字被提出来的时候，伦敦人高呼：“不要莫卧儿大帝！不要印度！不要僭位者！”通过使用报纸、小册子、讽刺画报和示威等手段，皮特和罗宾逊充分利用了福克斯失去民心这一弱点。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政党，用来竞争和赢得对议会的控制。此后的若干年中，皮特成为强有力的首相，他提出了实行内阁责任制。乔治三世准许皮特去争取民心、组织政党和实施责任内阁制政府，他在为一个民主的、议会的和立宪的君主政治打下基础。1784 年，乔治三世击败了福克斯，1801 年迫使皮特辞职。乔治三世在内阁责任制问题上很少吃败仗，但却给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遗产，其后继者必须面对工业时代的压力。但是，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皮特和乔治三世必须面对法国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激进力量。

小皮特执政：1784—1806 年

从 1783 年 12 月到 1801 年 2 月，从 1804 年 5 月到 1806 年 1 月，有名的查塔姆伯爵之子主持英国政局。在将近 19 年的执政生涯中，他与英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作斗争。作为政治家，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保守地看待君主特权，以此来获得权力，并通过这些权力来提倡自由改革。他在处理每一个问题时都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仔细研究其各方面的细节，从而将之解决，从来不抱有先入为主的观点。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始终明白政治是门具有可能性的艺术。这种实用主义一旦与把握事实和分析问题的天才相结合，在平常时期执政是非常有用的，但当面临重大危机时，就不一定管用了。因此，从 1784 年到 1793 年，皮特主政大显才能，可到了 1793 年后，事实证明，他不能超越其实用主义的极限，也无法与其父———位伟大的陆军大臣（war minister）——的英明卓越相提并论。

1785 年，年轻的皮特权位稳固，此刻他面临三个问题：英国行政改革，贸易的扩张，和印度的统治。第一个问题是最迫切的。1786

年，英国政府所欠国债达2.38亿英镑。政府的税收制度向来效率不高，也不合理，这使得国家每年的收入很难支付各项支出，如毫无价值的闲职、冗余的部门、耗资巨大的陆海军费用、以及每年900万英镑的债务偿还。1783年，士气受挫、被打败的英国正一步一步走向破产；至1792年，皮特扭转了英国的局面。他在最初执政的8年内，把国家的年收入增加了近50%，削减支出达1000万英镑；1792年，他提出的预算是1950万英镑，其中100万英镑划入偿债基金。 531

皮特提高现行税率、增加许多新税、降低关税，从而实现了财政增收。降低关税增加年收入最多，大约有300万英镑。较低的关税使走私者获利减少，使货物价格便宜，因此增加了海关货物的流通量。农业和工业的进步所带来的繁荣，也增加了关税收入。新的直接税收，如马匹税、帽子税、花边税、钟表税、店铺税、煤炭税、窗户税，都增加了财政收入。店铺税和煤炭税引起了非常多的抗议，实用主义的皮特废止了这些税收，但是，因为窗户税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皮特予以保留，结果促使建筑者建造的公寓黑暗、阴郁，缺乏很好的空气流通。

皮特也让政府行政变得更加节约、更加有效，从而削减支出。他裁掉了许多尸位素餐者，特别是那些既无用、又无效率且开支很高的职位。有些职位被裁掉了，有些则合并起来拨归有薪俸的专职文官掌管，增加他们的工作量而不增加薪水。他合并了许多税收部门，设置了对收税官进行稽查的人员，建立了审计处以确保账目的可信，发展了现代预算思想，并不声不响地撤销了许多闲职。

皮特意识到，国际贸易的扩展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又能使英国繁荣，于是尝试使贸易摆脱繁重的关税限制。他的首次尝试遭遇惨败。与爱尔兰订立的贸易条约引起了英国制造业者的反对，他们叫嚷爱尔兰廉价劳工的产品会毁掉他们。皮特退让了，爱尔兰继续以一个农业国的身份作为工商业英国的附庸。和法国之间的自由贸易，结果较好。法国将大多数英国制成品的关税降低了10%或12%，反过来，英国减轻了对法国的葡萄酒和白兰地的关税。皮特还设立了通商局（Board

of Trade)，通过在西印度群岛设立自由港口来鼓励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所有的这些措施，表明了皮特自称他是亚当·斯密和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并非虚言。

印度的问题比较复杂。在印度，长期以来存在着治理不当、贪污腐败的现象，这是当地的环境和东印度公司的贪婪共同造成的结果。为了纠正这种治理不当，1784 年，皮特说服议会设立一个由 6 名大臣组成的印度事务监督局（Board of Control)，他们的任免方式与政府任免其他主要大臣的方式相同。该局会监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1786 年，柏克和福克斯派议员提出动议（皮特对其中的一个动议予以支持)，指控东印度公司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在印度的腐败统治。于是，皮特派康沃利斯伯爵（Earl of Cornwallis）前往印度担任总督。上流社会人士涌入威斯敏斯特宫（Westminster Hall)，听取埃德蒙·柏克谴责黑斯廷斯贪污腐败、专横统治、以及追逐权力的行为，而康沃利斯和东印度公司则继续推行黑斯廷斯在印度各地扩大公司权力的政策。当然，康沃利斯必须在皮特及其监督局的监察下行事，因此避免了先前一些无节制的行为。但是，在其政策上，没有任何根本性改变。英国没有任何深思熟虑的决策，印度出现了权力真空。英国发现，她毫无察觉地使印度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历史的进程是独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在美洲清楚明确的策略使她失去了帝国领土，而在印度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却使她得到了印度。

532

法国革命的爆发使皮特面临着一个比印度更为严重的危机。他一下子要对付国内的激进主义、爱尔兰的叛乱和对外战争。激进主义并不新奇。在 18 世纪 60 年代，伦敦人就喊出了“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口号，18 世纪 80 年代，约克郡人为“威维尔和改革”而请愿，但是这两次运动都昙花一现。他们的激进主义追溯的是古代英国的自由。法国革命和托马斯·潘恩改变了向后扫视的目光，唤醒各阶级人士展望那以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权利为基础的伟大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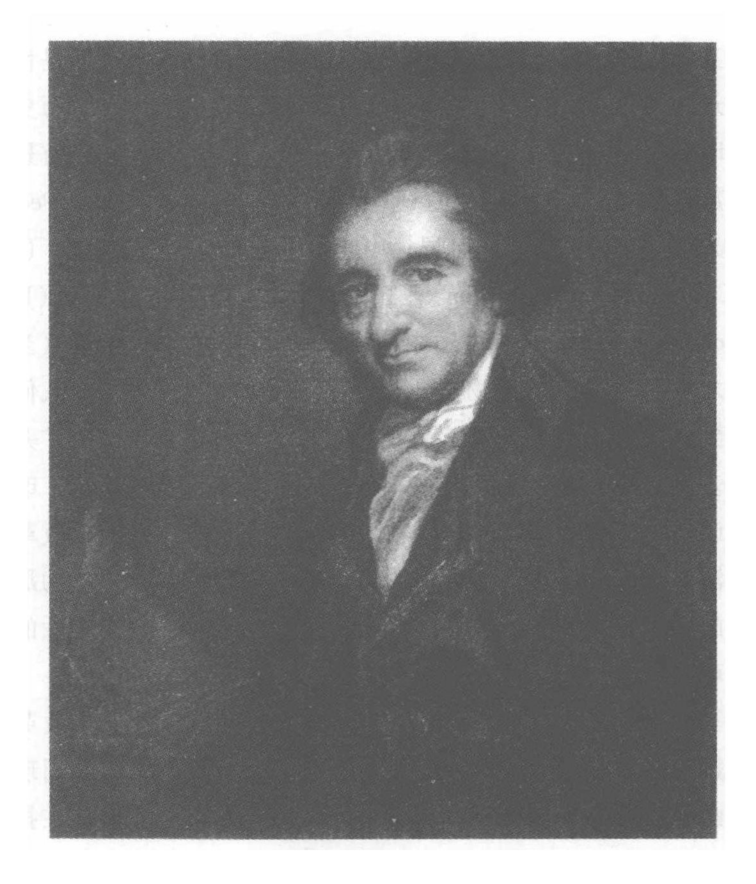
从 1789 年到 1792 年，政治家和诗人们一齐欢呼新时代黎明的到

来。福克斯宣称，巴士底狱的攻破是“最伟大的事件……那是世上从未发生过的事!”诗人柯珀（Cowper）展望那即将到来的“历史上最美好的时期”。各种各样的会社被组织起来，为这个光荣的前景而奋斗。贵族形成了人民之友会（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入社的人缴纳会费高达1.5基尼；中产阶级建立了宪法之音会（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工人们则成立了伦敦通讯社（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会费适中，为8便士。最后两个会社（当然不是人民之友会）喜爱的读物是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人们到处都能读到它，如在织工车间、阅报室、工厂——甚至在煤矿矿井中也能见到。到处都是要求改革的呼声——要求改革残酷的刑法、改革腐败的市政机关、改革不公平的税收、改革吃兼圣俸的教士，改革严酷的狩猎法、改革混乱的济贫法、改革不对非国教派人士开放的那些反应迟钝的大学，最为重要的是，要求对贵族控制的、无代表性的议会进行改革。

托马斯·潘恩的思想、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以及要求改革的呼声，鼓舞了许多人，也同样令很多人感到害怕。激进思想的涌现激起了反革命分子的恐惧与仇恨。1791年，在伯明翰，一群暴徒在托利党教士和治安法官的怂恿下，捣毁了许多改革派人士的住宅，其中包括科学家、哲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家。1791年，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力量已经很强大，1792年和1793年变得更加令人畏惧，因为法国革命转向恐怖、弑君、暴政，从而对英国和欧洲开战。战火的蔓延，尤其增强了统治阶级对托马斯·潘恩、法国雅各宾派、以及仅仅提到改革之人的敌视。

面对这种思想冲突，皮特的反应是加入镇压改革者的行列。1793年，他查禁了所有煽动性的刊物（特别是《人权论》），逮捕了宪法之音会和伦敦通讯社的领导者，1794年，他暂停执行《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该法令保证不经审判不得下狱。在爱丁堡参加会议的伦敦通讯社成员由一个明知没有陪审团的苏格兰法庭审判，他们被判有罪，随后被送去澳大利亚。那些在伦敦的成员由一个有陪审

533



托马斯·潘恩，他的著作《人权论》让许多人要求进行彻底的改革（*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团的法庭审判，被判无罪，他们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像英雄一样受到欢迎。

皮特并未被无罪的判决所吓住，他要求议会在1795年通过法案，禁止40人以上的一切集会，又要求通过法案，宣布胁迫议会者、对国王图谋不轨者、或者蔑视宪法者，皆属叛国罪。这两部法案的评论家指出，它们是自斯图亚特王朝以来侵犯自由最严重的法案。皮特还拥有一大批特工和密探（*agents provocateurs*），他们渗透到改革会社中。自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事件以来所不曾有的歇斯底里气氛，笼罩了英国。18世纪90年代，正如1678年和1679年那样，一种对敌

对的、强大的法国产生的恐惧，增强了英国人对法国人的外来思想——以前是天主教、如今是雅各宾——的恐惧。书店被清查、住宅被搜查、学校教师被开除、非国教徒被盘诘、出版界被责难。在萨默塞特，一个编筐工人因为说了“我希望法国人获胜”的话而被投进监狱。1799 年和 1800 年，皮特要求议会通过《结社法案》（Combination Acts），该法案规定，除了促进友谊的和互助物资的会社之外，工会和其他一切工人阶级组织都是违法的。 534

从某种意义上说，皮特的政策生效了。到 1795 年，皮特的策略压垮了贵族的人民之友会和中产阶级的宪法之音会。但是，伦敦通讯社抵抗高压的本领更强些。在手工工匠、店主、技工和学校教师的领导下，在成千上万的劳工——这些劳工忍受着 1795 年的物价高涨和手工业的没落——的支持下，他们抵抗皮特的政策，直到他们的领导人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那时，他们才停止斗争。皮特胜利了，但这是



托马斯·罗兰森（1756—1827 年），英国人，这是一幅彩色版画，“1793 年的对比；英国的自由还是法国的自由——哪个是最好的？”（*Visual Arts Library/ Museé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 Vizille , France.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

一场唾手可得的、没有意义的胜利。历史学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改革会社企图用暴力反对政府。很明显，他们所用的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劝说、请愿、示威。在这种情况下，皮特的实用主义没有准确把握当时的情形；相反，他以可能出现的政治状况为名义，听信了猎杀异端者的意见。

皮特也没有看到他实行的政策的长远后果。政治镇压的苦难，连535 同18世纪90年代工业革命带来的苦楚，使工人阶级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将会成为19世纪英国的一种主要政治力量。

威廉·皮特以一种非直接的方法同样促进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因此为19世纪的英国遗留下了第二个主要的政治力量。1782年，英国首次让爱尔兰议会全权负责任何涉及到爱尔兰内部事务的立法，这种特权只能引起爱尔兰人独立的愿望。政府也激励北爱尔兰的长老会教徒和广大的天主教徒要求与英国国教一样的宗教平等。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爱尔兰人要求自由和宗教平等的愿望更加迫切。1793年，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赋予天主教徒选举权，并允许他们担任政府官职。

一些性情较为急躁、思想较为激进的爱尔兰人组织形成了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并邀请法国派军进入爱尔兰。皮特迅速采取行动。他镇压了在北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迫使伦斯特的叛乱力量在法国进犯前爆发出来。伦斯特叛乱被残酷地镇压了，法国的进犯惨遭失败。皮特察觉到爱尔兰人用他们的议会作为争取独立的工536 具，决定废除它。皮特的政府提供贵族爵位、政府职位和金钱，保证贸易更加自由和解放天主教，从而说服爱尔兰议会投票中止自身的运作，并与英国议会合并。自此之后，爱尔兰将派100名议员和32名贵族出席英国议会，此后，英国议会将操纵爱尔兰的立法。从短期来看，1800年的合并法案（Act of Union）是一种巧妙且实际地解决爱尔兰人不满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该法案为压迫、剥削、暴行和叛乱铺平了道路。

皮特与爱尔兰交易的一部分是答应解放天主教——也就是说，准许天主教徒当选议员和担当任何政治的职务、文职和武职。皮特无法兑现这种诺言。乔治三世坚决反对天主教的解放。他再次宣布，那些提议解放的人不是他的朋友。皮特马上辞职了，于是乔治三世任命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为首相。阿丁顿在皮特忠实的支持下，在下院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在这个多数中，有许多人不仅不喜欢天主教解放，而且认为皮特作为战时内阁首相不称职。战争伊始，皮特便高估了英国的兵力，低估了法国的兵力，并错误地认为战争很快可以结束。他扩充军队的行动缓慢且缺乏效力，没有进攻法国的计划。皮特太缺乏想象力，以至于不能计划一个宏伟的战略；他太过妥协折中，以至于不能果断地掌控战局。依靠英国海军远远超过法国海军的优势，皮特指望英国提供的经济援助、精心策划的同盟以及欧洲国家的陆军来推翻拿破仑。这些外交努力是英国打败法国的中心所在，对此下章将进行全面论述。这些外交方面的努力表明，是外交而不是军事，合乎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脾气。皮特有一个思路清晰、有说服力、善于分析的头脑，有一种严峻、独立、冷酷的性情；他适合管理政客和官僚，而不适合开创一个更好的世界。尽管皮特拥护议会改革、自由贸易、天主教解放、废除奴隶贸易，但直至去世，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比不上他的政治压迫、托利党政治理想、以及对爱尔兰的剥削。

王室的弊病与王权的式微

1788 年、1801 年和 1804 年，乔治三世身患重病。1788 年的那次疾病，他完全康复了，但是后来的两次致使他衰弱、衰老、失明。1811 年，他的病情不能好转，议会宣布他的儿子——娇纵失正、挥霍无度、放荡不羁的威尔士亲王——为摄政王子。乔治三世死于 1820 年，摄政王即位，是为乔治四世，他统治英国直至 1830 年去世为止。从 1801 年到 1830 年，父亲身体不适和儿子道德丧失严重削弱了王室的特权。

和乔治三世同一时代的人认为，国王所患疾病是一种精神病。20世纪60年代，医生认为这不是精神病，而是卟啉病（porphyria）。当537身体产生过多的名为卟啉的色素时，人的尿液有时会呈现蓝色，四肢软弱，皮肤对强光敏感，患者会嗓音嘶哑、呕吐、腹泻。严重时，可以导致精神错乱、产生幻觉。乔治三世的医生记录的病状中，有很多上述现象，包括排泄蓝尿。历史学家也发现了乔治三世的先人患有卟啉病（一种遗传性疾病）的证据。

特别是在1806年皮特去世之后，乔治三世的疾病使他不能密切监督1806年至1815年间统治英国的内阁的组建及其运作。他的儿子——摄政王子，也很少关心政事。诚然，他吹嘘说，内阁大臣不过是他的仆人。1812年，他在组建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政府时发挥了作用，然而，除了在一些较为戏剧性的问题上（例如天主教的解放）之外，他很少发挥效力。1812年，在与辉格党的协商中，他非常无能，又无手腕，结果不得不依靠精明强干的利物浦勋爵——之后利物浦勋爵组建了为时16年的托利党政府。乔治四世的嗜好是享乐，而非权力。他宁愿在英国南部海滨奢华的布莱顿离宫（Brighton Pavilion）过着奢侈逸乐的生活，而不愿在威斯敏斯特过勤勉的日子。他一生的丑闻是众所周知的。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秘密的，娶的是一位平民、寡妇、天主教徒。第一次婚姻终止后，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和布伦瑞克女王卡罗琳（Queen Caroline of Brunswick）结婚。结果以关系破裂和公开争吵而告终。这些破裂的婚姻，连同他情妇众多、嗜好赌博、放纵的宴会、庞大的债务以及极端的托利党主义一起，使君主政体比以前更加不受欢迎。

此外，更多的非个人力量也导致了君主政体的衰落：由强大的首相直接领导的内阁政府的发展演变；政党的发展；公众舆论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在这三种力量中，内阁和首相职位出现的年限可能是最难确定的。内阁在沃波尔时代就已存在，但这些未能明确规定的团体，几乎没有集体负责的意识，沃波尔自己告诉下院说，他不是首相。至1815年，内阁在阁员组成、办事程序、集体负责意识上，已发展得

更为明确。在诺斯勋爵做了12年首相、皮特做了19年首相之后，这一职位的权力变得更强大了。此时，内阁对政府官员的控制更加稳固，内阁的政策更加明晰，在操纵议会上更加坚定，对国王的态度也更加大胆、无畏了。从1805年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在特拉法加（Trafalgar）取得海军大捷，到1813年威灵顿（Wellington）在西班牙的胜利以及1815年在滑铁卢（Waterloo）击败拿破仑，内阁的自信心增强了，因为它发现自己是战争取胜的策划者。不是年迈的乔治三世，也不是放荡风流的乔治四世，而是内阁大臣在制定战略、缔结联盟、颁发枢密诏令、使舰船服役、筹备军需、拟定预算。至1815年，内阁大臣掌管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完全独立于国王之外。

这些内阁大臣也是组织政府的人，他们逐渐根据政党的忠贞和政治问题来组建政府。1812年，乔治四世转而求助于辉格党，以除掉他父亲手下的托利党内阁大臣，但令他震惊的是，他发现辉格党要求的不仅是职位，也要求保证他们自由推行自己的政策。于是，乔治四世 538 转向利物浦勋爵和托利党，因为他和托利党的政策更加一致。广容内阁此刻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组织政党愈来愈不只是靠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对职位的追求，也看对重大问题的关注情况。格伦维尔勋爵和格雷（Grey）勋爵领导下的辉格党，逐渐在下院与诸如像律师塞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酿酒商塞缪尔·惠特布雷德（Samuel Whitbread）、改革家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之类的人联合，他们全都是平民，几乎没有什么贵族背景。他们到议会来是为了让法律更加理性、增进教育、赢得宗教平等、改革腐败的市政机关、以及消除浪费。罗米利、惠特布雷德、布鲁厄姆代表了在英国扩张的城镇中的新兴富豪，他们正在学习如何运用选举制度促进他们事业的发展。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是托利党的福音派新教徒，他给人们指明了道路，就像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和克里斯托弗·威维尔一样。威尔伯福斯是废除奴隶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鼓动者。多年来，他致力于唤起舆论来反对不人道的、残酷的奴隶贸

易，这些非洲的男男女女被塞进潮湿的、过度拥挤的、发臭的货舱中，很多人没有生存下来，幸存者被卖为奴隶。1807年，议会最终向公众舆论低头，废除了奴隶贸易。一种被唤起的舆论成为组织政党或政府的基础，威尔伯福斯会为此感到震惊。他和他同时代的人希望良心问题——比如奴隶贸易问题——能超越政党的路线。利物浦勋爵用这种方式对待天主教解放问题，允许他的支持者和大臣们对这一问题自由投票。但是，较为重大的社会、经济和宗教问题会成为政党联合的基础，威尔伯福斯无意中参与到了这一事态变化之中。

1780年，下院中有180名冗官，到1820年，仅有70名。这种政府庇护的减少与大型私有团体的减少并行，重大问题日益决定着竞选人或下院议员的党派。那些拥护支持宗教自由、更加人道的法律、更加自由的言论、改革腐败的市政机关、以及进一步限制王权的人们，与辉格党结成了同盟；那些拥护支持国教特权、君主政体、经受考验的旧法典、古老的市政机关、镇压激进主义的人们，与托利党同列。辉格党中的许多人此刻正在阅读边沁的著作，就像阅读洛克和布莱克斯通的著作一样，辉格党最终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自由党。而托利党抛弃了埃德蒙·柏克的主张，成为那个时代的保守党。

1815年，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歧还没有成熟。辉格党还是一个小党派，是处于防御地位的少数，有大约150名议员，在很多人的记忆中，辉格党是雅各宾派的朋友。他们的领导人格雷伯爵，早已不再提议会改革运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战争依然新鲜、清晰。这些令人们想起伯克的警告：篡改过去运行得还算不错的制度，势必会有危险。统治阶级也害怕工业城镇的发展会带来不满的民众、高傲的工业巨头、539 非国教徒的教堂、以及激进的新闻舆论。在这些年中，一种深刻的保守主义思想吞噬了统治阶级。举杯庆祝国王和圣坛的声音响遍全国，在巡回法庭上、在城市酒会上、在教堂庭院中、在伦敦的俱乐部里，这种声音处处可见。甚至有人祝贺那荒淫无度的摄政王子。

在这样一个保守气氛浓厚的时代，没有人敢说国王不应享有任命和罢免大臣的特权。但是，更深刻的现实问题是其他方面的事情。对

法国恐惧的记忆逐渐消失，对改革的要求增加了，在议会中，政党的划分更加急剧，反映了一个广泛的、更加多样的选民团体的划分。乔治三世极力维护他选任大臣的权力：这种权力让国王不会沦落成傀儡。但是，当他于1820年去世时，这种特权也迅速消失了。他自己的疾病、他儿子的懒惰与不受欢迎、强大内阁的出现、政见分明的政党的兴起、有发言权的舆论的增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很快使内阁大臣完全对议会负责成为必然。乔治三世是一个精力充沛、积极主动的国王，但是，即便他不辞辛苦地维护君主政体，也不能阻挡住在他漫长的、动荡的统治时期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

阅读文献

John Brooke, *George Ⅲ*, London: Constable, 1972. 该书是一本记述全面、通俗易懂的传记，分析了乔治三世的优缺点，这些特点使他没有成为暴君而变成了一个有巨大才能的国王，虽然书中不乏一些严重的错误。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与内米尔（Namier）的著作相比，该书更加深入地研究了18世纪60年代的政治，因为它运用了报纸、小册子和会议资料展示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存在。

Ian Christie, *Wilkes Wyvell and Reform*, London: Macmillan, 1962. 该书生动地分析了18世纪60年代和18世纪80年代有关议会改革的辩论，研究了它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它鼓舞人心的思想，以及它为什么失败了。

Archibald Foord. *His Majesty's Opposition: 1714—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该书最全面地研究了1714年至1830年间，为了使内阁大臣对下院负责、而非对国王负责所做出的许多尝试和失败。

Albert Goodwin, *The Friends of Liber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该书以同情的心态研究了1789年至1797

年间，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对英国的影响。

B. W. Hill,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rties, 1742—1832.* London: Allen & Unwin, 1985. 该书对政党进行很好的解释，证明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不仅继续存在于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而且它们为议会政治提供了基础，通过这些论证，对刘易斯·内米尔爵士（Sir Lewis Namier）认为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很难生存的观点提出质疑。

Sir Lewis Namier,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540 *George Ⅲ*, London: Macmillan, 1951. ——. *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61. 这两部经典之作分别出版发行于1929年和1930年，打破了辉格党的虚构故事，包括乔治三世的专制统治、政党的存在、思想的作用、辉格党的智慧、托利党的愚笨、以及时代的堕落。

Richard Pares, *King George Ⅲ and the Politic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该书深入考察了国王和下院在内阁责任问题上出现的戏剧性冲突。

Steven J. Watson, *The Reign of George Ⅲ*,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该书是《牛津英国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的一部分，尽管深入探究了政治史，特别是法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可在经济史和思想史上的研究较为薄弱。

第二十一章　法国革命年代的外交与战争

541

1789 年至 1848 年，革命威胁着欧洲的君主和贵族结构体系，给欧洲传统的外交与战争模式涂上了污斑。力量强大的资产阶级、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崭新的技术、民主的思想、以及民族主义的强烈愿望，搅乱了强权外交的平衡，长期以来，雄心勃勃的君主和老谋深算的大臣运用不同程度的合理性与技巧实践着这种强权外交。大规模的军队，被改进的枪炮和新型战略战术，自由、平等、爱国主义对人们的鼓舞，此刻震撼了欧洲。然而，旧的外交方式，正如中欧旧的君主政体一样，还在顽强地坚守阵地。甚至在革命的法国，尽管有着平等主义的理想，但也没有提出新的外交体系。形成联盟和部署军事力量依旧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因此，1789 年至 1856 年，英国的政治家们所面临的，不是去创造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而是运用旧的外交传统去牵制和操纵新的革命力量。在这方面的努力，第一步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步，是从法国君主政体的衰落开始的。

法国革命战争

1793 年 4 月至 1815 年 10 月，除了两次短暂的间歇外，英国和法国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作战。第一次间歇期开始于 1802 年 3 月，达成了《亚眠和

约》(the Peace of Amiens), 仅维持了14个月的和平; 第二次开始于1814年夏, 随着1815年2月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 (Elba) 而结束。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令人沮丧的战争。最初的14年, 法国在欧洲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第二个阶段是战争陷入僵局的时期, 从1807年到1812年; 542 第三个阶段是最终打败法国的时期, 从1812年到1815年。

1793年至1807年, 这个漫长的开始阶段是英国外交和战争记录上最令人沮丧的时期之一。威廉·皮特组织形成了三次联盟来阻止革命时期法国的扩张, 而这三次都很丢脸地失败了。第一次联盟是从1793年至1797年, 第二次从1799年至1801年, 第三次从1805年8月至12月。每当一种巨大的力量威胁要控制欧洲以及占领低地国家之时, 形成联盟是长期以来英国外交的一个主要法则。伊丽莎白一世和威廉三世曾组织了这样的联盟, 遏制腓力二世和路易十四的势力。因此, 皮特也遵循这种英国外交策略的基本准则。1793年, 皮特协助组建了一个联盟, 其中包括四个强大的国家: 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 也包括一些力量较小的国家, 比如荷兰、撒丁尼亚 (Sardinia)、两个黑森 (the two Hesses)、汉诺威、巴登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将近1亿, 与拥有2800万人的法国相对抗。

在这个联盟中, 英国利用她不断增长的制造业、改良的农业和世界贸易, 为其军队和联盟的军队提供军需。至1795年, 皮特希望建立一支283000人的军队, 把法国驱逐出低地国家。英国及其同盟国对这次失败负有责任: 盟国退出了联盟; 英国管理不善。

1795年4月, 普鲁士与法国签署了一个单独的和平协定。5月, 荷兰退出, 与法国结盟。6月, 被击败的奥地利军队撤离了低地国家。7月, 西班牙退出。只有俄国留了下来, 但是, 她和普鲁士一起, 把注意力集中在瓜分波兰上, 而非集中精力对付法国。联盟的瓦解是因为皮特的政府贻误了战机。虽然在军队数量上和军队训练上存在着欠缺, 但是, 他们派遣军队对法国南部军港土伦 (Toulon) 进行封锁, 去帮助在旺代 (Vendee) 的保皇党人的起义, 去夺取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占领地, 只留给了联盟军队的指挥者约克公爵7000名英国士兵和22000名黑

森和汉诺威士兵，依靠这些兵力来收复低地国家。普鲁士的60000名将士并没有投入战斗，因为英国延迟了军费供给。与此同时，法国军队满怀革命的热情，他们把约克公爵的军队赶出了低地国家。

1796年和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战胜奥地利的消息压倒了从伦敦传来的消息，拿破仑的胜利给第一次联盟致命一击。在伦敦，许多人祝贺征服了法属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圣卢西亚（St. Lucia）和哥德洛普岛（Guadeloupe），祝贺征服了被荷兰占领的好望角、锡兰（Ceylon）和科伦坡（Colombo），这些征服反映了英国在海上的霸权，正如拿破仑的胜利反映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一样。1796年，从爱尔兰传来的消息同样是令人沮丧的，因为英国孤立无援地对抗法国及其新同盟西班牙和荷兰，对付这三个国家的海军。富有革命性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要求法国和西班牙侵入爱尔兰，以支持起义。法国进行了两次这样的尝试：第一次是在1796年12月，大风阻止了这次行动；第二次是在1797年2月，这一次，杰出的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爵士（Sir John Jervis）用15艘军舰击败了对方的27艘军舰。一年之后，在1798年5月，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叛乱了，占领了许多城镇，他们与法国密谋策划，只能被残酷地镇压。

543

法国在大西洋遭遇挫败后，转而进攻意大利、地中海和埃及。拿破仑的征服引起了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和俄国沙皇保罗（Tzar Paul）的嫉妒，以至于皮特的经济援助使奥地利和俄国加入了第二次反法联盟。英国的舰队投入了战斗。在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领导下，在尼罗河战役中摧毁了法国的地中海舰队。1799年，奥地利、俄国和英国形成了第二次同盟，对抗革命的法国，普鲁士则保持了自私自利的、缺乏远见卓识的中立。在“皮特的黄金”的帮助下，联盟一开始取得了胜利。当奥地利和俄国清除了法国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势力之时，这个消息非常振奋人心。但是，后来奥地利和俄国起了争端，力量被分化，联盟遭到失败。沙皇保罗怒而退出联盟，皮特将兵力部署得太分散，面对卷土重来的拿破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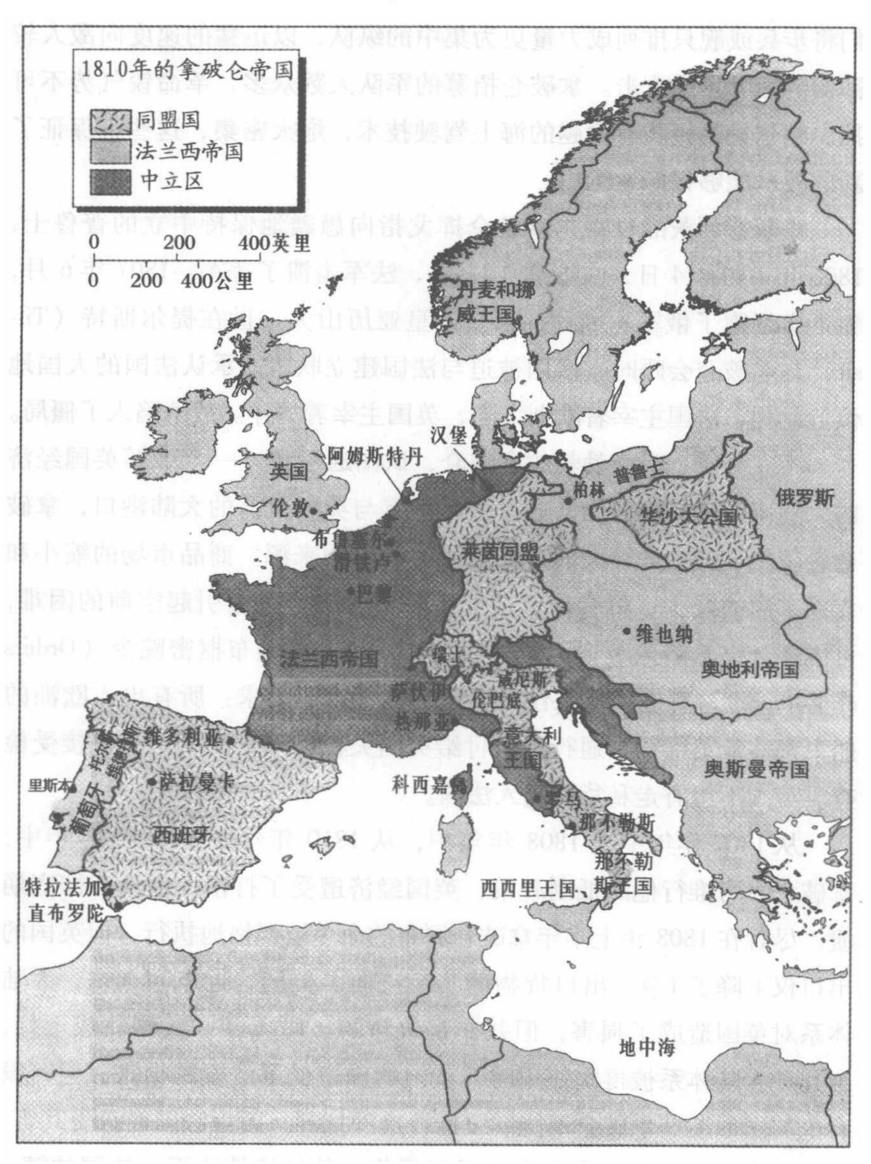
奥地利再次遭到失败。第二次联盟瓦解了。

543 前两次联盟土崩瓦解有多种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俄国沙皇凯瑟琳二世和保罗一世、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和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和软弱。这4个人都只顾在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谋取利益，而不是遏制法国。除凯瑟琳外，他们都是治国无能的统治者，缺乏直接指挥军队的能力，思想保守，缺乏鼓舞人心的理想与个人魅力。联盟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法国有庞大的军队，他们人数众多，战士爱国热情高涨，领导者有杰出的指挥才能。皮特所面对的革命力量，是他父亲或者马尔伯勒（Marlborough）都从未遇到过的。皮特没有一个腓特烈二世或尤金亲王（Prince Eugene）帮助他领导欧洲联盟。前两次联盟失败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皮特决策错误和领导软弱。他把太多人的精力和生命都浪费在了对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的征服上，而殖民地已不再对欧洲的势力均衡产生重大影响了。他也没有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把所征募到的军队用到了太多的地方去。

因此，1802年，皮特的后继首相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接受《亚眠和约》。这个和约将英国夺取的所有殖民地，除锡兰和特立尼达岛（Trinidád）之外，其他的如数奉还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同时，和约允许法国掌管萨伏伊（Savoy）和意大利北部，并能够在荷兰保持一支法国军队。这样，英国便承认了法国在欧洲获得优势，没有任何一种海外力量与之相抗衡。和约同时要求英国把具有战略价值的马耳他（Malta）归还给圣·约翰军团（Knights of St. John）。

事实上，阿丁顿从未真正放弃马耳他。他拖延交出马耳他，后来此事变得遥遥无期了，因为不肯安分的拿破仑不仅巩固了他在欧洲夺取的土地，进一步扩张了殖民地，而且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舰队，准备入侵英国。1803年3月，英国深知拿破仑不会维持和平，于是向法国宣战。1805年，英国劝说俄国和奥地利形成第三次联盟。但很快这个联盟便烟消云散了。拿破仑获悉奥地利和俄国正在备战，于是便以惊人的速度挥师从海峡港口（Channel ports）行军至多瑙河一带。

12 月 2 日，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他击败了联军。2 个月以前，在 10 月 20 日，英国最伟大的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在直布罗陀（Gibraltar）附近的特拉法加（Trafalgar）摧毁了法国的核心舰队，他在这次辉煌的战役中献出了自己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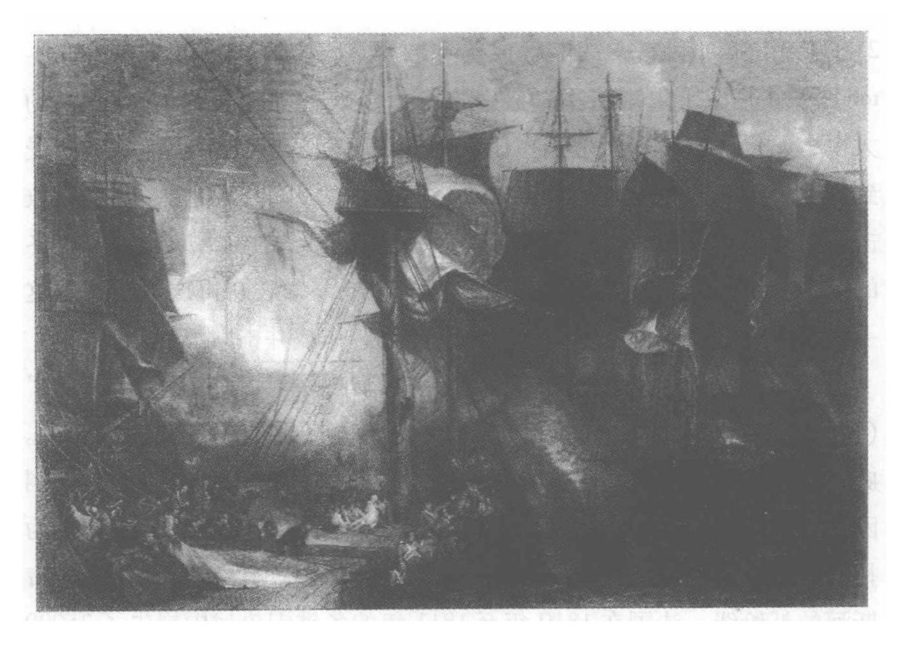


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取得的胜利和纳尔逊在特拉法加取得的胜利，是法国革命战争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两次胜利，而且都采取了相同的战术。传统的战术，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都是召集步兵或舰只排成长列，两军前线平行，然后进军。拿破仑和纳尔逊改变了这些战略，他们将步兵或舰只排列成力量更为集中的纵队，以迅猛的速度向敌人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攻击。拿破仑招募的军队人数众多，革命锐气势不可挡；纳尔逊的舰队有优越的海上驾驶技术，炮火密集，这些都保证了新的战术能够很好地运用。

奥斯特利茨战役后，拿破仑挥戈指向愚蠢地保持中立的普鲁士，1806 年 10 月 14 日，在耶拿（Jena），法军击溃了普军。1807 年 6 月，他再次赶跑了俄军。因此，当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斯特（Til-546 sit）与拿破仑会晤时，俄国被迫与法国建立联盟，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此刻，法国主宰着欧洲大陆，英国主宰着海洋。战争陷入了僵局。

不安分的、野心勃勃的拿破仑，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毁坏英国经济的大陆体系来打破僵局。通过关闭所有与英国贸易的大陆港口，拿破仑希望使英国丧失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食物来源。商品市场的缩小和食物来源的减少，将会使制造业者和商人破产，会引起空前的困难，可能还会突然陷入革命。英国于 1807 年 11 月颁布枢密院令（Orders of Council），对这种抵制作出反应。这些声明要求：所有出入欧洲的船只都需从英国购买通行证，付给英国关税，同意在英国港口接受检查。英国不想有走私货物进入法国。

从 1807 年年中至 1808 年年中，从 1810 年年中至 1812 年年中，拿破仑大力推行他的抵制政策，英国经济遭受了打击，但没有彻底崩溃。尽管在 1808 年上半年拿破仑颁布的命令被严格地执行，但英国的出口仅下降了 1/4。出口货物的 3/5 流向了美国、近东和远东，大陆体系对英国造成了损害，但并非是致命的。1811 年，英国收成不好，当这种大陆体系被再次使用时，英国的确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但并没 547 有令英国崩溃。拿破仑不能继续推行这种抵制，因为法国也深受其害。法国的商人、制造业者和农民受到损伤，他们愤愤不平；法国的糖、



英国最伟大的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1805 年，他率领的舰队在特拉法加打败了法国舰队，取得了胜利（*The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咖啡和棉花的消费者也深感生活困苦而愤怒不已。拿破仑不得不放松大陆体系，运送葡萄酒和小麦到英国，以换取某些被许可的进口货物。拿破仑还面临着一种情况，即欧洲的海岸线是一个筛子。为了堵住这个筛子，他不得不征服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要压制德国人和俄国人。拿破仑在这种尝试中自取灭亡。

为了强迫西班牙执行大陆体系，拿破仑以其兄弟约瑟夫代替了斐迪南国王。为了强迫葡萄牙做同样的事情，拿破仑派朱诺将军（General Junot）的军队前往里斯本——在那里，只看见了英国的舰队与葡萄牙海军和国王一起，顺着塔古斯河（Tagus River）向巴西缓缓驶去。此刻，拿破仑掌控了欧洲的每一个港口。

在拿破仑权力达到顶峰之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叛乱了。革命者向英国求援，英国答应派遣一支舰队、3 万士兵、还有一位年轻的将军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一起前往里斯本。1808 年 8 月

21日，韦尔斯利——一年后成为了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打败了朱诺将军。盛怒之下，拿破仑统帅大约160000人的548 大军，入侵西班牙。但是，在比利牛斯山下面的交通中心，拿破仑受到约翰·穆尔爵士（Sir John Moore）率领的30000名士兵的勇猛攻击，精力严重分散，在把反叛势力驱逐出西班牙之前，又遇到了严冬的侵袭。1809年，在扫除西班牙反叛之事上，拿破仑再次失败了，这一次是因为他再次分散精力，需要同奥地利作战并击败奥地利。

1810年，拿破仑依然士气受挫，愤怒难平。为了扫除"英国豹"（English leopard），他向西班牙派出了三支军队。他差点儿就成功了。威灵顿公爵且战且退，尽管给法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最后还是被围困在了里斯本。但是，他在此有一道法军无法攻破的防线，被称之为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Torres Vedras）。英国海军也保护了他通往塔古斯河的补给线。法国在1810年至1811年的冬季围攻战中损失了25000人，不得不撤退。1811年夏和1812年夏，威灵顿乘机率军进入西班牙，在冬天迅速退守到葡萄牙。面对威灵顿军队的飘忽不定和西班牙无所不在的游击队，法国军队渐渐灰心丧气。1812年，威灵顿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击败法军，1813年又在维多利亚（Vitoria）击败之。"英国豹"把法国鹰从半岛驱除出去。

英国在半岛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种因素——英国海军、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以及威灵顿和他的军队。从最初的出兵之时，到严冬退守至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海军一直是英国军队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海军还帮助那些游击队，他们的骚扰削弱了法军的力量。法国革命将法国人强大的爱国主义力量释放了出来，这时候，通过征服，革命也唤起了蕴藏在欧洲其他国家人民心中的一种类似的爱国主义。20年来，法国人的民族国家思想破坏了欧洲的势力均衡。但是，它在西班牙、葡萄牙和俄国唤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激起了一种创造新势力均衡的力量。利物浦勋爵的保守政府发挥了其才智，命令威灵顿及其军队与这种革命势力联合，威灵顿公爵以其精明和机敏领导了这个联盟。

在反法战争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提供食物，给予庇护，刺探情报。他们像游击队一样，也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英勇地进行斗争。威灵顿尊重他们。他对自己的士兵也很尊重，关心他们的需要，赏罚公正，英明地领导他们。他认真研究战略战术，发现拿破仑用兵的两个最大的优点——军队的快速机动和以优势兵力攻击对方虚弱之处，但此中也存在着弱点。拿破仑军队的灵活机动，是因为其轻装行军和就食民间，他能够集中兵力，是因为他以大量的军队攻击对方仓促布成的战线，而对方依据的是传统的军事方法。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法军几乎没有食物可以利用，他们不得不运送大量的给养。威灵顿也避免了一切可以以优势兵力打破他的战线的战斗。他采取逃避战术，直到他看到法国阵地的弱点；之后他会突然袭击。他训练有素的火枪手也明白，直到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时才开枪射击。1815 年 10 月，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战役中，英国火枪队阵线坚固，他们致命的射击给拿破仑冲锋的队伍以重创。威灵顿 549 公爵的战略和战术合理，他坚定地统帅部队，而且组织和计划周密，这些都帮助英国首次赢得了半岛战役的胜利，后来，在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之后，又夺取了滑铁卢战役的胜利。

半岛之战虽然富有戏剧性，但这次战役并非决定性的战役。英国和法国双方继续他们激烈的经济对抗，这使双方卷入了另外的战争。英国在遥远的西方与美国作战；法国在遥远的东方与俄国交战，而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的失败。

为了对法国进行封锁，英国强烈主张其对公海的权利。于是，英国迫使与欧洲通商的美国船只使用英国港口，向英国纳税，而且在公海上，英国能够进行违禁品搜查。英国还逮捕任何他们怀疑是很早从英国海军逃走的水兵。最终，这些专横的措施使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忍无可忍，于 1812 年 6 月中旬对英宣战，这时美国尚不知在同一个月中，英国已把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去除了。经过了在北美五大湖地区（the Great Lakes）和公海之上的非决定性战斗之后，经过了谈判桌上的激烈争辩之后，双方于 1814 年 12 月 24 日签署了和约。

对英国来说，1812 年的战争是小事情；对于法国而言，这场和俄国的战争是一场大突变。拿破仑对俄国逃避大陆封锁体系而感到不悦，对他无能力迫使英国投降而感到沮丧，于是决定征服大陆上最后一个独立势力。1812 年，俄国广阔的草原地带、严寒的冬天、以及顽强的防御摧毁了拿破仑的大军。1813 年和 1814 年，德意志和俄国军队，受到新爱国主义的激励，彻底击败了拿破仑。此刻，联盟面临的任务是重建欧洲。

卡斯尔累和欧洲的重建

卡斯尔累勋爵（Lord Castlereagh）是一个高傲的、冷漠的贵族，是一个眼光敏锐、手腕高超的外交家。1812 年，他担任外交大臣。在拿破仑远征俄国惨败后，卡斯尔累认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和英国的结盟可以击败革命的法国，能够重建欧洲。然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仅仅是因为联盟目标明确，团结稳固。前三次联盟的失败，部分上是因为他们缺乏领导。1813 年和 1814 年，卡斯尔累成为了这个同盟的领导者。他明白，第四次联盟不同于前三次，因为这次战争，正如他提出那样，是一次“民族性的战争”。因此，他以英国慷慨大度的资助和威灵顿军队的军事参与，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广大的联盟，英国在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为了确保同盟的成功，他于 1814 年 1 月前往欧洲。到了 3 月初，他说服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签署了《肖蒙条约》（the Treaty of Chaumont），其中规定英国保证每年提供 500 万英镑的经费，每一个同盟国，包括英国在内，都保证提供至少 150000 名士兵。卡斯尔累欢呼道：“这是一种多么非凡的力量啊！”该条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20 年内，签约国定期召开会议，主要是观察法国有没有进一步制造战争的迹象。3 月底，巴黎沦陷，拿破仑投降了。

550

卡斯尔累的下一步工作是，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普鲁士哈登贝格王公（Prince Hardenberg）、以及奥地利梅特涅伯爵（Count Metternich）一起，商谈欧洲和平建设的问题。对于卡斯尔累而言，这种和

平的根本条件是：要公正、明智地对待法国。法国应该是欧洲体系中的一个强大、独立的成员，但必须受到一系列强国的牵制。在 1814 年 5 月的第一次《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上，他成功地达到了这些目的。这个条约保持了法国 1792 年的国界，归还了除多巴哥岛（Tobago）、圣路西亚（St. Lucia）和毛里求斯（Mauritius）之外所有的殖民地。波旁王朝君主路易十八复位，但是必须以立宪为条件，这一决定出自于亚历山大神秘的自由主义，并非来自卡斯尔累苛刻的托利主义。卡斯尔累的主要贡献是，他坚持要有一个奥兰治王室（the House of Orange）统治之下的、版图扩大的尼德兰王国（Netherlands），其中包括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内，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阻止法国扩张的屏障。普鲁士的版图扩大了，特别是在莱茵河流域的势力更加强大，它和新的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中立的瑞士、强大的撒丁、占据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一起，对法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包围圈。

遏制法国的政策是战后协议第一个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给战胜国以补偿。从理论上讲，遏制政策和补偿政策都反映了一句格言：果实是属于胜利者的。俄国获得了芬兰、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波兰。英国得到了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马耳他和毛里求斯。普鲁士吞并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萨克森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莱茵河流域的领土。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北部的领土、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和德意志南部的领土。大部分协议都在各国参加最伟大、最辉煌的外交聚会——维也纳会议——之前就已达成了。在维也纳，各大国外交官在舞会、宴席、密谋、以及莫扎特的歌剧中，认可了早已作出的安排，达成了新的协定，并完成了欧洲的重建。欧洲重建所依据的，是一种势力均衡的旧原则和一种集体行动的新精神，这种新精神以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这个词来表达。

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他将法国人重新集结起来，以及他在滑铁卢的失败，这些使拟定第二次《巴黎条约》成为必要。法国对拿破仑的热烈欢迎和战事再起，在英国民众之间以及在欧洲各君主首脑之

间引起了强烈的复仇情绪。冷静沉着的卡斯尔累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的协助下，抵挡住了这种情绪。第二次巴黎条约在法国国界问题上仅有较小的变更。对于卡斯尔累来说，一个强大的法国对当时被称之为“公正均势”（just equilibrium）的外交而言，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在建立这种均势的过程中，卡斯尔累无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新兴力量。他根据势力、而不是根据民族主义来加以思考、判断，因此希望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势力加强，愿意让尼德兰把比利时纳入进来，也希望普鲁士拥有在莱茵河流域更广阔的领土。他深怕自由主义，551 帮助反动的波旁家族登上了那不勒斯和马德里的王位。这些措施的结果并未一直稳定住局势。1820年和1822年，那不勒斯和马德里发生了革命；1830年，比利时对荷兰宣战，到1848年，意大利北部兴起了反对奥地利的运动。为了镇压那不勒斯人民，梅特涅召集一次列强会议。这种做法，反映了卡斯尔累想运用这样的会议来牵制任何一个扰乱欧洲势力均衡的国家。这种思想体现在第二次巴黎和约的第6条中，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卡斯尔累的思想观点是最富创造性的。但是，在梅特涅和亚历山大的操纵下，会议体系变成了一种在某些国家内镇压自由主义的工具，卡斯尔累认为，这种举动是对协调外交的一种曲解。

事实上，卡斯尔累勋爵利用定期的列强会议来阻止战争的思想胎死腹中了。1818年，在亚琛（Aix-La-Chapelle）举行的四个战胜国会议，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仪式，它欢迎法国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强国参与进来。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于1820年末在特罗波（Troppau）举行，1821年初在卢布尔雅那（Laibach）休会，这次会议是为了镇压那不勒斯、皮德蒙特（Piedmont）、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的自由主义革命。卡斯尔累勋爵没有参加会议，他反对这种镇压自由主义的政策。尽管不支持革命，但他依然认为，强国干涉弱小国家的内部事务，会存在极大危险。然而，三位东方独裁者坚持这种策略：1822年9月，他们在维罗纳（Verona）召开会议，目的是协商镇压西班牙革命。在他们会晤前的一个月，卡斯尔累自杀身亡，给他的继任者遗书训令，反对使

用列强会议作为破坏西班牙宪政的工具。

卡斯尔累是第四次反法同盟、两个巴黎条约、四国联盟、维也纳会议、以及欧洲协调思想的创始人和建筑师，也正是他，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协调。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不再相信通过会议来进行外交，而是因为他认为梅特涅和亚历山大曲解了协议的目的：从原有的为欧洲国际关系创造一个新的公法体系变成了现今的镇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样的做法，离团结的欧洲越来越远，只会把欧洲分成反动的力量和革命的力量两个阵营。1822 年 10 月之后，调停两种力量的任务落到了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身上，他聪明睿智，能言善辩，是一个让许多人憎恨、又让许多人喜欢的自由主义托利党人。

乔治·坎宁的外交政策

坎宁在身为外交大臣的 5 年中，面临着四大棘手的问题：西班牙问题、西属美洲问题、葡萄牙问题和希腊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涉及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革命的爆发，都疏远了英国与欧洲的联系。第一个问题始于 1820 年，西班牙军队反对他们的国王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他是波旁王朝的国王中最反动、最专制、最愚蠢的一个成员。他们强迫斐迪南颁布了一个民主宪法，该宪法远远超出了西班牙人民所能运用的能力范围。在维罗纳，亚历山大请求列强进行干预。坎宁告诉英国在维罗纳的代表威灵顿：“在任何形势下，这样的干涉，英王陛下将不愿参加。”会议并没有决定进行干涉，但是法王路易十八（Louis XVIII）急于帮助波旁王朝的家族成员赢得胜利，于是扬言要入侵西班牙。

552

在此期间，坎宁在议会内外发表好战性的演说，反对那些胆敢镇压宪政政权者。他希望运用被煽动起来的舆论来胁迫法国。这种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卡斯尔累是不会赞同的，而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也感到了民主化的危险。法国没有被演说空言所吓倒，出兵镇压了革命。对于坎宁而言，这是外交的一次重大失败。

法国军队可以占领马德里，但是正如许多法国保皇派人士渴望的

那样，法国政府没有把波旁王朝的君主派往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已经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坎宁认为，法国控制了西班牙，得到了痛恨一切革命的神圣同盟的支持，这便威胁到了这些新的共和国。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坎宁请求美国和英国一起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反对任何欧洲势力进入新大陆。美国总统詹姆士·门罗（James Monroe）没有答应。他转而接受了他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意见，宣布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在门罗宣言里，美国宣称新大陆从此不在任何欧洲列强侵略行动的范围之内。这个宣言及时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纲领，随着美国海军势力的增强而变得更具效力。

然而，1823 年，门罗主义在道义上的权威高于军事上的影响。美国海军不能够阻止来自欧洲的侵袭；只有英国海军才有力量阻挡旧世界干涉新世界。在与法国大使波利尼亚克亲王（Prince Polignac）进行的几次长期而艰巨的交谈中，坎宁利用了这一事实。波利尼亚克深明此意，并保证法国不会利用其对西班牙的占领在南美洲建立君主统治。坎宁秘密将谈话的备忘录发放出去，目的是让新的美洲共和国明白，英国是他们的保护者和朋友。1824 年，坎宁还说服了内阁，使其承认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三个共和国。

坎宁很快发现他正在维护葡萄牙的自由主义。1826 年 4 月，国王约翰六世（John VI）——他在 1820 年革命之后给葡萄牙颁布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去世，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多姆·佩德罗（Dom Pedro）。佩德罗甘愿做巴西国王，把他 8 岁的女儿玛丽亚（Maria）册封为女王，让他的妹妹伊莎贝拉（Isabella）摄政。佩德罗也给了葡萄牙一个更加自由的宪法，并把玛丽亚许配给了她的叔叔——专制主义者多姆·米格尔（Dom Miguel）。这黑色幽默最后的一段将葡萄牙推入了内战，这正是斐迪南七世最乐于插手的。斐迪南给米格尔提供援助和军队；坎宁要求斐迪南停止此事。尽管斐迪南保证不再帮助他们，但实际上还在
553
照旧行事。于是，坎宁派英国海军和 4000 名士兵前往里斯本，这一决议在下院赢得了议员的起立鼓掌，保住了葡萄牙的立宪政府。

坎宁遇到的所有棘手问题中，希腊革命问题是最难处理的。首先，这个问题和更大的近东问题纠缠在了一起。长期以来，英国都认为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无论多么腐败和专制，但都是一个无价的屏障，可以用来阻止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以及从地中海到黑海之间海峡的野心。许多英国人认为，这种控制会威胁到英国的贸易，威胁到陆上通往印度的通道。1821 年，希腊人反抗土耳其的统治，沙皇亚历山大提议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坎宁拒绝召开会议，但他的确表示要加入俄国反对土耳其的行列。土耳其 10000 人的军队、捷报频传和残忍的暴行，在整个欧洲激起了一种代表希腊反抗者利益的大希腊主义情绪。坎宁知道，沙皇尼古拉（Tzar Nicholas）想以牺牲土耳其的利益来得到领土，这种领土的获得危害了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影响力和贸易，但是他也明白，装作合作也是控制俄国的一种方法。

1826 年 3 月，坎宁和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允许希腊成立自治政府，土耳其苏丹（Turkish Sultan）仅仅保留名义上的帝王（Lord Paramount）称号。土耳其将接受希腊每年的进贡，并且拥有任命官员的权力。坎宁劝说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把它作为 1827 年 7 月 6 日伦敦条约的一部分。坎宁打破了保守的联盟，把俄国和奥地利分割开来，维护了希腊的自由权利，孤立了梅特涅——他长期以来认为坎宁是“扫帚星”和“祸害”。8 月 8 日，年仅 57 岁的坎宁去世，他确信他已为希腊赢得了自治，阻止了俄国在近东的扩张。1827 年 10 月 20 日，科德林顿海军上将（Admiral Codrington）率军舰进入纳瓦里诺海湾（Navarino Bay），他超越了训令，击沉穆斯林军舰，因此绝对确保了希腊的独立自主，并在国内赢得了地方大希腊主义运动的欢呼声。但是，坎宁的辞世和威灵顿的软弱鼓动了俄国对土耳其宣战。俄国得到了少量土地，在君士坦丁堡增强了影响力，这些被写进 1829 年的阿德里安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中。

乔治·坎宁的外交政策依赖于英国外交政策的两个传统目标：通过适当的欧洲势力均衡保障英国的领土安全；利用强势的海军和帝国

的力量保护英国的商业。在保卫维也纳条约规定的领土协定上，在维护四国同盟——如果有必要的话——遏制好斗的法国的权利上，坎宁从未踌躇、迟疑过。这两个政策都是维护欧洲的势力均衡，以保证英国的安全。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坎宁都是卡斯尔累忠实的追随者。

1812年至1827年间，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领土协定没有受到威胁，因此坎宁认为没有必要召集四国同盟会晤。但是，在近东、葡萄牙和美洲，英国的商业的确需要得到保护和进一步增强。英国出口商品的5%输送到了南美洲，强大的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在近东发迹，东印度公司盘剥了印度的财富。几乎没有人知道：建议给予南美共和国以事实上的承认、或督促希腊交战双方寻求解决办法以避免事态扩大，这不只是坎宁一个人的决定，这也是保守主义者卡斯尔累的主张。卡斯尔累和坎宁也同意支持土耳其，这与支持神圣同盟毫不相干。贸易（无论是地中海的或美洲的）、英伦诸岛和帝国的安全，都使卡斯尔累和坎宁的外交政策有了连续性。

554

但是，在追求这两个目标上，坎宁在三个方面背离了卡斯尔累的政策：他更喜欢采取孤立主义的立场；他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更加友好；他更愿意谋求公众舆论的支持。确实，在1821年，卡斯尔累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的问题上不惜与四国同盟绝交，因此把英国置于更加孤立的地位。但是，他决不会像坎宁那样说，“对于同盟来说，读懂了英国，你就对我的政策找到了线索。”他也不会像坎宁那样说，“愿上帝使葡萄牙所建立的宪政自由……繁荣昌盛”，也不会说，“我仍旧是一个民族独立的热心支持者。”无论是在政治集会上面对欢呼的群众，还是面对议会，坎宁都公开说这些话，他的言论出现在王国的各种报纸上。作为一个18世纪的贵族地主，卡斯尔累勋爵谨慎地、秘密地处理外交，认为外交是国王和内阁大臣的事情，与公众无关。坎宁是一个伦敦女演员和穷绅士的儿子，他喜欢唤起舆论来推动他的政策。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托利党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出生在一个以选举的议会而不是以世袭的国王作为最高权力的时代。因此，他试图领导舆论，又要反映舆论。例如，在促使坎宁支持葡萄

牙和西班牙的自由主义以及希腊的革命之事上，被激起的公众热情比关注英国的商业或领土安全更关键，因为支持葡萄牙的米格尔派和近东的土耳其，同样能很好地维护两者的利益。19 世纪 20 年代初，在地中海东部的英国商人敌视希腊人，而与土耳其人友善。对安全和贸易的深思熟虑，尚不足以解释坎宁之所以支持国外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因。这种支持也反映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以及英国人对宪政的骄傲。

在举杯庆祝宪政自由之胜利和专制君主之衰败的许多场合，得以彰显的正是这种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在伦敦，在议会中，在各郡，在新闻界，这些庆祝之声越来越普遍，随之而来的是对乔治·坎宁的称赞和祝贺。外交政策反映了国家利益，也反映了舆论之风；它反映了政治力量，也反映了文化力量。在英国，那种驱使拜伦保卫希腊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远远不止存在于他一个人的心中。大希腊主义社会团体在全国兴起了。多才多艺的坎宁在青年时代就写过抗议土耳其奴役希腊的诗篇，他对此不能不响应，特别是当他赢得起立欢呼时。民主的时代即将到来，坎宁第一个认识到外交政策不能不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在他的辉格党继承者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执政中，这点变得更加明显。

帕麦斯顿勋爵在外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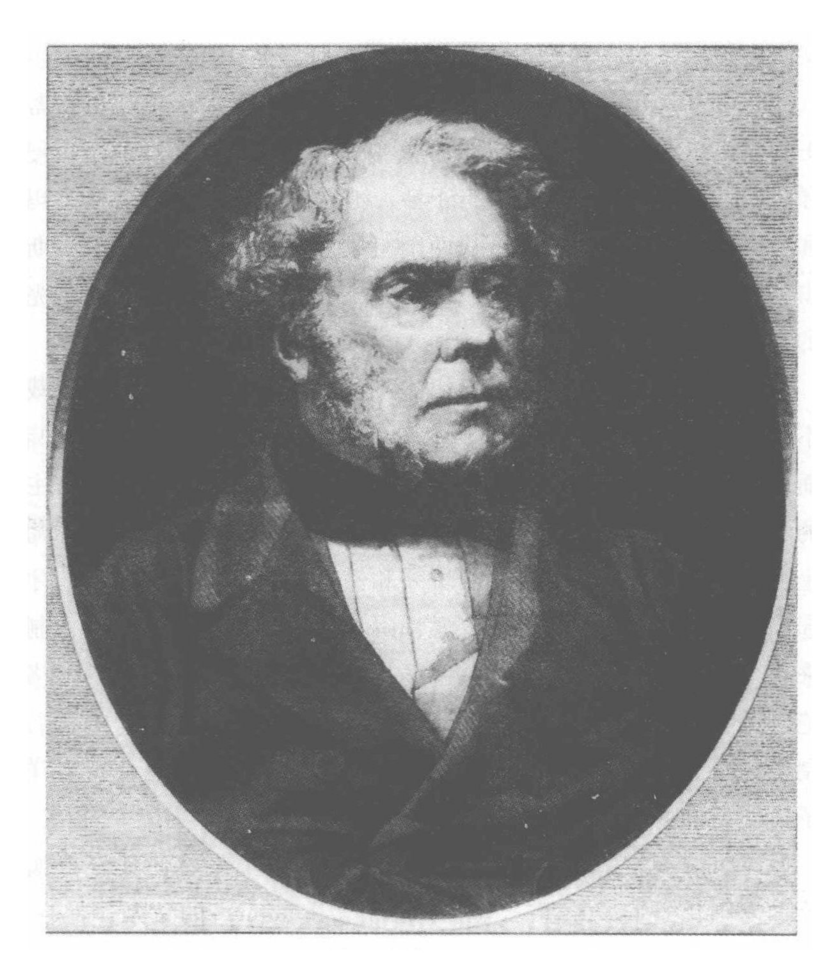
555

卡斯尔累勋爵把外交看作是一场象棋比赛，“王后”和“车”的移动是为了达到对力量的合理利用。卡斯尔累认为，他最精明的一步棋，是通过移动比利时和荷兰这个“车”来保卫奥兰治王室；这会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但是，王朝国家的日子指日可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逐渐不允许在外交棋局中把国家作为棋子来使用。例如，信仰天主教的比利时人民有他们自己的动力和爱国心，一种将民族主义、天主教、革命热情和对荷兰的仇视糅合在一起的莫名其妙的情绪。1830 年，比利时反抗奥兰治王室。这次反抗打破了卡斯尔累用比利时和荷兰保卫奥兰治王室的棋局，创造

了一个法国极想填充的空白。1793 年，这种急切的想法导致了战争。如今，战争又一次快要来临了，这给新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带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帕麦斯顿是一个 47 岁的爱尔兰子爵，有庞大的地产，热情奔放的性格，并长期担任陆军大臣。通过依靠比利时的民族主义力量，通过坚持比利时的独立自主，他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解决办法让比利时感到满意，又遏制了法国。但是，创造一个独立自主的比利时不是件容易的事。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决定统治比利时，而且他得到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同情，专制主义国家反对任何篡改 1815 年维也纳和约作出的决定。法国也想吞并低地国家的土地。

为平息这些冲突，帕麦斯顿勋爵使用了卡斯尔累所采取的方法中的一招，召集列强驻伦敦大使，按照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的精神行事。他们的确这么做了，但并非很容易、或很迅速地去做。波兰发生的反抗牵制了俄军，这使得常常优柔寡断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变得更加犹豫不决了。因为荷兰和法国都不能向俄军和普鲁士军队求救，帕麦斯顿勋爵的地位更加强势了。在协商比利时新的边疆和新的国君时，帕麦斯顿明智地运用了这种强势地位。法国三次想从中获利，第一次是在 1830 年，法国反对比利时独立的思想；第二次是在 1831 年，法国坚持新王路易·腓力的儿子被册封为比利时国王；第三次是在 1832 年，法国在比利时保留军队。这些军队是为了驱逐 1831 年 8 月侵入比利时的荷兰军队，和英国海军一同了介入这场冲突。每次遇到危机，帕麦斯顿勋爵都告诉法国要接受会议决定，否则英国会立即向法国宣战。英法联合所造成的类似的威胁，最终使荷兰同意建立一个由萨克斯—科伯的利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 of Saxe-Coburg）统治之下的独立的比利时。在处理比利时问题中，令许多人惊奇的是，帕麦斯顿勋爵懂得细节，他具有透彻的洞察力，并在谈判中富有耐心和灵活性，他把这所有的特性与一种面对战争而不退却的坚强结合在一起。他利用会议体系进一步加强了确保欧洲和平的势力均衡。



帕麦斯顿子爵，1830 年至 1840 年、1846 年至 1851 年担任外交大臣；1855 年至 1858 年、1859 年至 1865 年担任首相（*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帕麦斯顿勋爵对欧洲协调的关心，很少表现在他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策上。1833 年，在葡萄牙，年轻的玛丽亚女王的立宪政府，依然面对着她的叔叔米格尔统帅的专制主义军队。这种情形在西班牙重演，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的叔叔唐卡洛斯（Don Carlos）领导着专制主义势力。起初，帕麦斯顿许诺保持中立。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计谋而已。很快，他便让英国海军人员帮助玛丽亚女王 556

的父亲多姆·佩德罗与米格尔作战，就像他让陆军上校德莱西·伊文斯（Colonel De Lacy Evans）率领一支英国志愿军去保卫克里斯蒂娜女王和自由政府那样。当西班牙的唐卡洛斯为了支援米格尔而入侵葡萄牙时，帕麦斯顿断然公开进行干涉。他策划成立一个同盟，由玛丽亚和克里斯蒂娜两位女王和英法两国组成，努力把米格尔和卡洛斯驱逐出半岛——最终他们成功了，从而加强了比利牛斯山南部的立宪政府的力量。

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四国同盟，令神圣同盟的独裁君主不悦。欧洲变得比以前更加壁垒分明，一面是立宪政体的拥护者，一面是专制主义的保卫者。但事实上，新的四国同盟并非针对君主专制的各国而成立的；相反，它尝试阻止法国和英国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土上的对立。唐卡洛斯重返西班牙和保守的宪章主义者在葡萄牙的兴起，使英法双方的对立死灰复燃，因为法国此刻想通过支持专制主义来获得在半岛的影响力。这是一场徒劳无功的尝试。由于唐卡洛斯的绝对无能，君主专制主义在西班牙失败了；由于英国的势力，君主专制主义在葡萄牙也失败了。立宪政府在两国的胜利使这位得意洋洋的子爵受到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双方的欢迎。

557

他对迈海迈特·阿里（Mehemet Ali）的政策没有使他赢得如此的欢迎。阿里是埃及总督，是伊卜拉欣（Ibrahim）的父亲，他在19世纪20年代蹂躏了希腊，1834年征服了叙利亚。对叙利亚的征服激怒了土耳其皇帝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Ⅱ），理论上讲，马哈茂德二世是埃及总督的最高上司。奥斯曼帝国看似行将就木了。19世纪20年代，土耳其丧失了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今日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也失去了塞尔维亚和希腊。1833年，俄国在土耳其的政策上和海峡的使用上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对于帕麦斯顿而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将会使俄国在近东占据优势。1839年，尽管一个土耳其海军上将和伊卜拉欣的军队发生叛变，但是埃及控制了土耳其全部舰队和叙利亚这个富庶的行省。法国答应

给伊卜拉欣及其父亲以全力支持，奥斯曼帝国即将分为两部分：埃及的那一半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土耳其的那一半将由俄国掌控。帕麦斯顿认为，这种分裂对英国贸易是一种打击，是一种无法容忍的耻辱。为了阻止分裂，帕麦斯顿组成了一个英国、土耳其、俄国和奥地利的四国联盟，派出英国舰队，这支舰队在1840年掌控了贝鲁特、西顿、艾可（Acre）。叙利亚人也发动叛乱，反对伊卜拉欣的暴政，迈海迈特·阿里请求休战。所有叙利亚的国土和舰队都返还给了土耳其，迈海迈特·阿里保证继续做土耳其皇帝麾下的埃及总督。帕麦斯顿在外交上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他也比以往更加紧密地把英国拴在了对腐败的、暴虐的奥斯曼帝国的防卫上。帕麦斯顿用一个古老的观点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即土耳其是在近东防止俄国野心的最好屏障。

从1841年至1846年，托利党人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担任外交大臣，尽管外交政策缺乏活力，但也并非没有效果。阿伯丁以其明智和审慎，不仅和美国签订了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Webster-Ashburton Treaty）来划定在缅因州一带的加拿大边界，而且缓解了法国在外交失败中产生的伤痛。但是，没有形成任何联盟。英国变得孤立了，这种事实没有让帕麦斯顿（1846年帕麦斯顿重返外交部）比坎宁产生更多的焦虑不安。在工业、商业、海军和帝国力量上，英国不是没有对手吗？帕麦斯顿勋爵也把英国立宪政体视为骄傲，这种骄傲使他对巴黎、马德里和那不勒斯反对专制君主的自由主义给予支持——其中在后两个事件上，他甚至到了给反叛者提供武器地步。但是，他总体上没有支持革命：1848年，他反对匈牙利、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发生的革命。他认为，法兰克福议会商讨的统一的德意志，是未成熟的，是不能实行的。他不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朋友，如果这种运动威胁到欧洲和平的话。作为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外交大臣，他晓得战争的可怕。他最先考虑的事情是和平，他最害怕的事情是战火 558 四起。于是，他想在意大利、德意志地区（the Germanies）和巴尔干半岛建立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势力。无论奥地利帝国多么专制，它仍然

是一种维持稳定的力量。在德意志北部，普鲁士也是如此。强大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也会遏制一个专制的、帝制的俄国或者一个不稳定的、革命的法国所引发的任何侵略行径。

帕麦斯顿不支持意大利北部和欧洲中部的革命，其原因之二是他无能为力。英国海军无法行驶到布拉格、布达佩斯、米兰和法兰克福，只能到达里斯本、卡迪兹、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意大利北部和欧洲中部的国家，不像葡萄牙、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及那样，它们不能摆脱列强的影响。

帕麦斯顿也是一位议会民选议员，是一个向议会负责的大臣，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的英国人，是一个商业、工业和海军都举世无敌的国家的外交大臣。尽管念念不忘英国的传统利益，但是帕麦斯顿的外交政策也对英国的强国地位和大国偏见很敏感。他常常在准备派遣舰队，时时刻刻准备保卫英国的威望。就像外交胜利引起人们的欢呼那样，他赢得了沙文主义的议会和新闻界的掌声。在比利时危机中，维持适当的势力均衡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在葡萄牙和近东事件上，他思考最多的是关于保护贸易的事情。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贸易也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在这种纠纷中，帕麦斯顿派出的两艘快速帆船击沉了29艘武装的中国舢板船。然后，英国迫使中国与之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尽管这意味着购买相当数量的鸦片，这些鸦片是英国之前从印度买进的。

有些时候，比如在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事件中，帕麦斯顿明白英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肆意采取极端沙文主义的做法。国家安全和保护贸易渠道，很难解释帕麦斯顿采取的强硬外交政策，他要求——甚至到了以战争进行恐吓的地步——希腊向唐帕西菲科支付31000英镑。唐帕西菲科是一个英国籍的西班牙犹太教徒，他的房子在雅典被愤怒的希腊人所烧毁。保护唐帕西菲科不是英国安全所必需的。对保护英国疆土和英国贸易而言，同样不需要支持西班牙的立宪运动者和坚持其他国家结束奴隶贸易之必要。这些政策与其说反映了国家自身利益，更不如说反映了公众舆论。帕

麦斯顿在作关于唐帕西菲科事件的演讲时吹嘘说，正如一个罗马人声明他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就可以得到保障一样，一个英国公民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保护，“英国强大的力量将保护他免受不公平和不公正。”

19世纪中叶，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盛的国家。它的人民都城市化了，有文化，又很富足；新闻言论自由，开明，深受欢迎；它的立宪政府在欧洲最为古老。在技术上、科技上、以及文学上，英国人可以、也的确为他们取得的非凡成就感到自豪。这些事实促使英国人形成了一种自命不凡的家长式作风和一种骄傲自大的爱国主义，这两者在同样骄傲自大和家长气十足的地主帕麦斯顿勋爵的外交政策中得以充分展示。

通过继承爱尔兰贵族的数千亩土地，帕麦斯顿掌控着数百个佃户。559 正如他幸运地继承了广袤的土地和头衔一样，他有幸继承了先辈们的才智和弹力，很自然地养成了高傲的家长派头。他认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一切都自然地由他来支配；在外交部中，欺侮职员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让大使们久等，在宪政问题上教导独裁统治者，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然，他总是招人讨厌，得到了浮石勋爵（Lord Pumistone）的诨号。尽管在唐帕西菲科事件上或对待他的职员上骄傲自大，但是当发生欧洲危机时，他还是能够克制自身、审慎细心、承担责任的。他不仅对适当均势之必要性有很深刻的理解，还明白为了确保列强会议制度运作，大使级会议也是很有价值的。他不是孤立主义者，他认为暂时的联盟和欧洲会议是有用的。他说，“永久的联盟或永远的敌人”正在损坏“那些我们有义务去遵循的利益”。1851年，他的解职削弱了英国外交政策，促进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这是40年来欧洲首次的重大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

1852年，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从土耳其那里为罗马天主教徒提出要求并获得了更多的权利，由天主教神父在圣地照看圣殿。土

耳其的让步激怒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声明，希腊和俄国的东正教教徒是圣殿的保护者。尼古拉还声称，他是居住在奥斯曼帝国中1200万基督徒的保护人。为了履行这些宣言，1852年5月，他派傲慢、专横的缅希科夫亲王（Prince Menschikoff）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长期担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勋爵（Lord Stratford）的帮助下，苏丹和缅希科夫解决了圣殿纠纷——但是，沙皇声称是1200万基督徒的保护人的问题没有解决。

对于苏丹及其顾问而言，沙皇的宣言对土耳其主权造成了无法容忍的侵犯。于是，当沙皇和苏丹宣布他们不能协调的要求时，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了君士坦丁堡。帕麦斯顿勋爵希望英国政府在伦敦召开大使会议，同时告诫沙皇，任何侵犯行为都意味着战争。然而，内阁否决了他的提议。阿伯丁勋爵作为首相，掌控着外交政策。他采取了让事情自由发展的办法，同时等待着奥地利外长和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大使在维也纳会晤所做出的决定。7月28日，他们发出维也纳照会，再次确认了1774年条约和1829年条约中模糊不清的、让沙皇引为宣言之根据的部分。早在10天之前，俄国占领了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这两个独立国家。土耳其和俄国的军队此刻在多瑙河两岸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从5月21日到7月21日这两个月内，温和厌战的阿伯丁没有采取任何举措，这使尼古拉一世不清楚英国在何种情况下会参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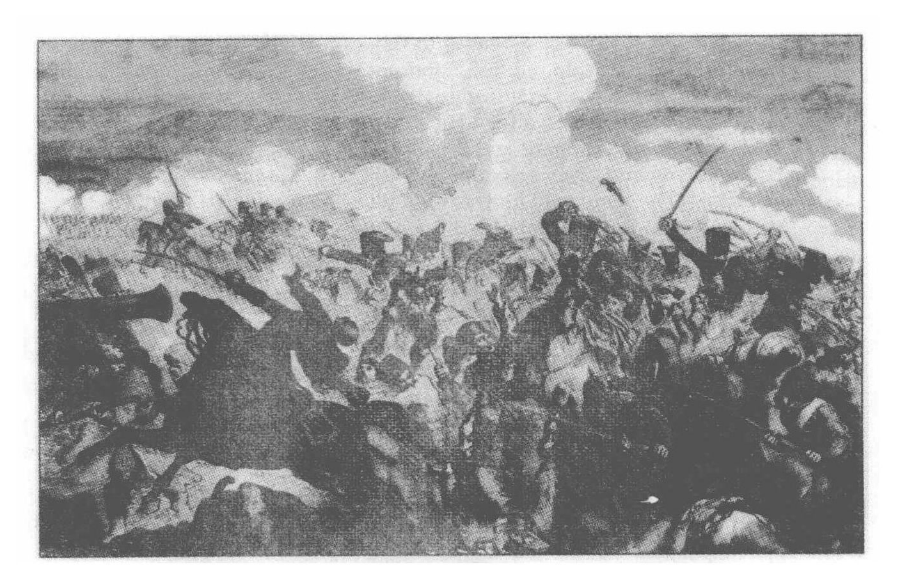
7月21日之后，关键性的决定权掌握在斯特拉特福德勋爵和苏丹手中。斯特拉特福德勋爵表面上极力主张调停，私下却建议苏丹坚持己见。在和斯特拉特福德勋爵磋商之后，苏丹接受了维也纳照会，但条件是，明确基督徒的保护要“由土耳其宫廷（Sublime Porte）”担保——也就是说，由苏丹来担保。这种限制性条文令沙皇感到不满。谈判继续进行。9月，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Buol）劝说沙皇放弃保护基督徒，保证基督徒会享受某些豁免权。拿破仑三世表示愿意接受，但是英国外交部长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劝说拿破仑三世说，这是个诡计；因此，英法拒绝妥协。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带

560



尼古拉一世说，俄国熊只想成为土耳其的保护者；英国，包括《庞奇》（*Punch*）在内，都表示怀疑（*Punch Limited*）

有一种恩赐口吻的维也纳照会侵犯了土耳其的领土，俄国占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些事件使战争升温到狂热的程度。10 月 23 日，土耳其对俄宣战。11 月 30 日，俄国的黑海舰队击沉了土耳其的舰队，伦敦的报刊称之为“西诺普屠杀”（Massacre of Sinope），尽管这不过是宣战后的一次普通的战斗。至 1854 年 3 月，英国公众舆论对俄国的侵略非常愤怒。同一个月中，英国加入了法国、奥地利、土耳其的战线，反对俄国。



卡迪甘伯爵的轻装骑兵旅团傻里傻气的冲锋，依然能战胜俄国的炮兵（*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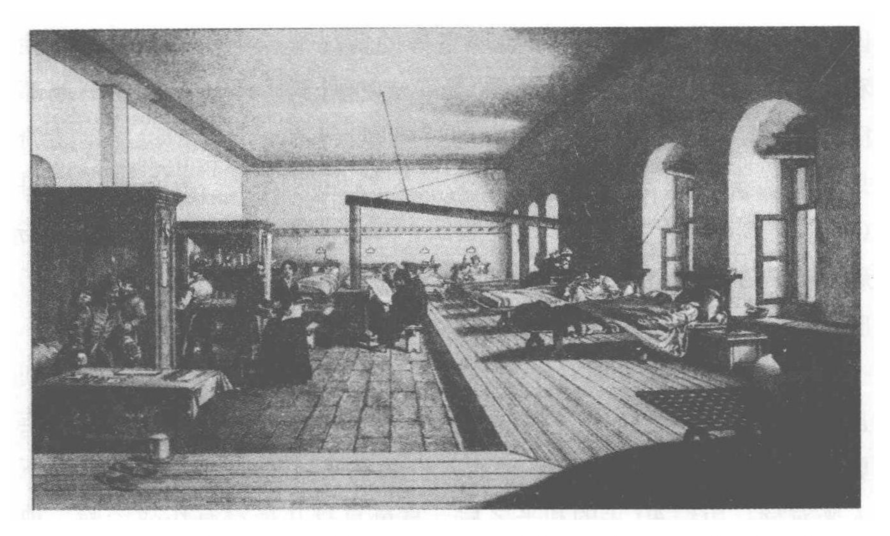
561 这是一场无益的、没有必要的战争，标志着欧洲协调的崩溃和英国领导地位的衰退。阿伯丁政府在1853年春时太被动，到了秋季又太急躁。沙皇尼古拉并不希望开战。倘若尼古拉的虚张声势在春天被制止，或许他会屈服，正如他在秋季所做的那样，但是，正是在秋季，英国的公众舆论为了响应俄国的野心存在威胁这一论调，那激昂的情绪和好斗情绪，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所有不同类别的、所有不同阶级的英国人竭力支持战争：诗人丁尼生（Tennyson），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曼彻斯特的棉花巨头，伦敦的码头工人，各郡的乡绅，特别是新闻界人士，他们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有名望地位之人感到厌倦，迫切想为上流社会的读者带来些刺激。

1854年9月，在经过6个月的准备之后，5万名英法联军在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他们装备不良，给养不足，指挥不力，然而，在那个秋天他们取得了三次战役的胜利：阿尔马（Alma）、巴拉克拉瓦（Balaklava）、英克曼（Inkerman）战役。阿尔马战役是英

国步兵在没有骑兵、也没有英明指挥的情况下，勇往直前取得的胜利。在巴拉克拉瓦的胜利，靠的是一支小型步兵师（苏格兰高地部队第93师）的英勇抵抗、斯卡利特将军（General Scarlett）重装骑兵旅团的英明战术、以及历史上最为莽撞的骑兵——卡迪甘伯爵（Earl of Cardigan）的轻装骑兵旅团——的冲锋。英克曼战役是一场顽强的步兵肉搏战，依靠米尼耶（Minie）的来复枪队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562 但是，这场战争带有一种悲剧性的反讽意味。取得的这些胜利是依靠步兵——著名的“红色作战队列”（thin red line）——的英勇作战，并非英明的指挥，然而，步兵在平日里被许多官员当作下人来对待。历经40年的和平之后，官员自身几乎没有作战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如傲慢自大的、令人厌恶的卡迪甘伯爵，用金钱来买官晋爵。在他们的统领下，士兵过着悲惨的生活。士兵的军饷是一周7先令，其中一半的钱用来支付每天1磅面包和3/4磅肉这样一成不变的伙食。士兵拥挤地住在阴暗的营房中，缺乏便利的生活设施，如果不听话，就要被处以100—300鞭的惩罚。他们不得不在国外度过2/3的军旅生涯，有时像塞拉利昂（Sierra Leone）这样的地方，死亡率高达75%。

士兵日常的生活困苦不堪，然而比起英克曼战役后克里米亚的冬天，那算是幸运的了。暴风雪撕裂了他们的帐篷；霍乱、痢疾和疟疾给军队带来灾难；病卒塞满了脏乱拥挤的医务船舱；药品缺乏；食物、衣服和燃料供应不足；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和她带领的护士于1854年11月到来，她们减轻了士兵的伤痛，但无法弥补上至内阁和议会、下到克里米亚官员这种总体上的管理不善、贫穷吝啬、冷漠无情和效率低下的状况。英国士兵饱受统治阶级的虐待，为他们战斗，赢得了缺乏谋划、缺乏指挥的战斗的胜利，他们出现在这个可怕的冬天，士气高昂，足以能够占 563 领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迫使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受和平，使其放弃成为奥斯曼帝国基督教徒的保护者的任何念头。



一所清洁的医院，直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们的到来，它才成为现实。这幅平版画由辛普森（W. Simpson）绘制（*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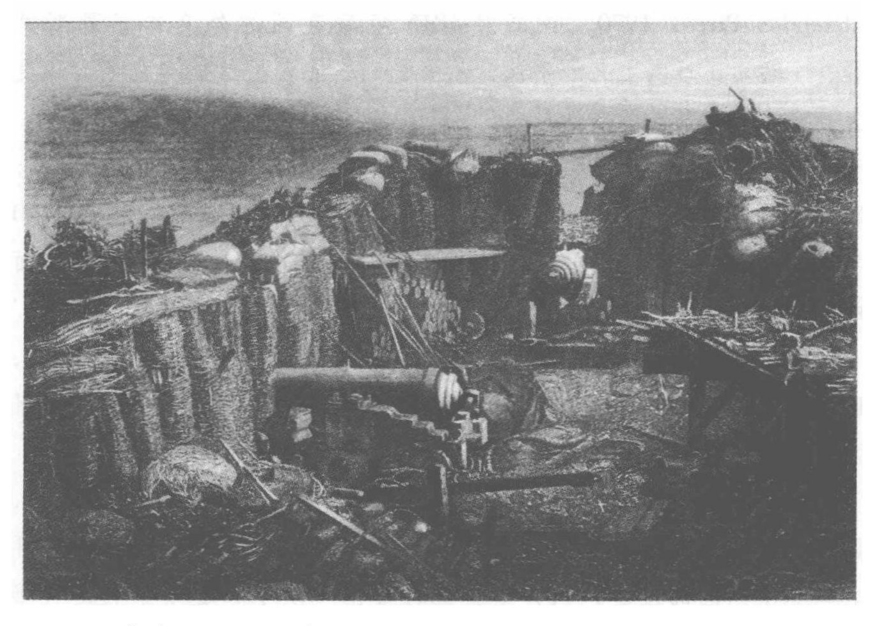
在从法国革命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67年里，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时而是干涉主义，时而是孤立主义；英国一会儿与独裁君主联盟，一会儿与革命者联合。然而，那时的政治家和现如今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改变的背后有一个核心主线，即推动英国国家的自身利益。这是统一的主题、至上的原则、最终的目标。它最纯粹的形式便是保卫英国国土的安全，这导致皮特对革命性的、扩张的法国开战，也让卡斯尔累去签订维也纳协定，从而巧妙地达成了一种遏制法国、巩固低地国家、重新划定德意志、以及保卫英国安全的势力均衡。

推动英国国家的自身利益，也意味着对其世界贸易的保护。小皮特说："英国的政策就是英国的贸易。"卡斯尔累、坎宁和帕麦斯顿也都这样认为。为了保护英国在南美的贸易，托利党人卡斯尔累支持革命的政府，坎宁答应以英国海军保护他们。为了把贸易扩展到中国去，帕麦斯顿发动了鸦片战争。对英国自身利益的保护，无论是保护国土、还是保护商业贸易，都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的原则。

现实可以是一件令人扫兴的事情，正如革命的法国占据低地国家；也可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就像打开南美和中国的门户推进英国的商业贸易。

以现实为后盾的原则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因而，这就诱使人们在一些小事情上极力使用这些原则，就像使用口头禅一样。1822 年后，英国的外交家渐渐经受不住这种诱惑。在那之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两种缺乏理性的力量——英国的公众舆论和英国的国力。坎宁是第一位对这种力量做出反应的人；之后，帕麦斯顿也这么做了。当坎宁宣布他支持葡萄牙的自由主义者时——即使葡萄牙专制主义者胜利也不会对英国国土或贸易产生任何威胁，市政厅内欢呼声阵阵。在维护了唐帕西菲科之后，当帕麦斯顿把英国人比作罗马人时，这种欢呼声更大。

整个世界突然和英国国家的自身利益紧密相连了。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 7400 英里长的陆路商道，俄国在近东被彻底击败。鉴于英



轻装骑兵旅团的冲锋是 18 世纪骑兵战中最后一个辉煌篇章；塞瓦斯托波尔围攻见证了 20 世纪堑壕战的开始（*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国的海上力量，这件事的前因和后果是毫无关联的。英国的公众舆论陶醉于英国的国力——特别是那无敌的海军。真正蕴藏在英国保护南美共和国、葡萄牙自由主义者和希腊的革命者背后的，并非国家安全，而是在大西洋、在塔古斯河、以及在纳瓦里诺海湾那势不可挡的海军力量。英国能够使迈海迈特·阿里蒙羞、赢得鸦片战争的胜利和支持意大利革命者的真正原因，是其在贝鲁特、在广州、以及在那不勒斯不可战胜的舰队。没有了海军，这些地方无一会和英国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1822 年至 1856 年间，指导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扩大了。安全和贸易保持不变，不过加上了一种反映英国工业和海军力量的全球性政策。于是，为 19 世纪晚期英国的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阅读文献

Kenneth Bourne, *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该书对 1815 年后英国的外交作了最新阐释——运用了写实主义的手法，笔锋锐利，使人相信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自身利益的理性思考。

Ian R. Christie, *Wars and Revolutions, Britain, 1760—181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该书中讲述 1760 年至 1815 年英国外交的章节，对已有的外交提出了最为清晰、最全面的观点，也是最新的学术观点。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该书保守地阐述了重建欧洲势力均衡的维也纳会议、卡斯尔累的角色、以及梅特涅和基辛格这两个推行实力政策的英雄。

565

J. A. R. Marriot, *The Eastern Ques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该书系统地研究了英国长久以来坚持不变的职责——保护土耳其以免于俄国的压迫，认为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和迪斯累利是英雄人物。

Lane Poole, *Life of Stratford Canning, 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88. 尽管已有许多人描述了这位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重要的外交大使，但没有人能像本书一样，用更熟练的手法来分析坎宁的外交。

R. W. Seton-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New York: Macmillan, 1937. 尽管书中的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但这本书仍旧是一本最清晰、最完整地阐述1815年至1914年英国的欧洲外交的书籍。

Harold Temperle,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ning, 1822—1827*, London: G. Bell, 1925. 该书是一本记述乔治·坎宁的权威性著作，对坎宁的性格、思想和外交进行了刻画，并且描述了他如何建立了一种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英国政策。

——, *England and the Near East: The Crimea*,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36. 该书详尽地叙述了1829年至1878年在近东的英国，很好地概括了土耳其的制度、军事活动和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特性。

Sir Charles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agh, 1812—1815*, London: G. Bell, 1931. 该书敏锐地分析了1812年至1815年改变欧洲版图的那些政策，很好地描述了实施这些政策的主人——卡斯尔累勋爵。

——, *The Foreign Policy of Palmerston, 1830—1841*, London: G. Bell, 1951. 该书由一位历史学家写成的名作，在分析研究事物上，他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正如帕麦斯顿作为外交大臣那样强硬。

Joel Wiener, ed., *Great Brita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 of Empire, 1689—1971,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Chelsea, 1972. 该书最全面地搜集了关于英国外交的档案：是一本关于议会演讲和讨论、条约、电报、信件的精选选辑。

566

第二十二章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改革

法国革命遗留给英国的是极度的保守。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英国统治阶层无法从法国革命的恐怖以及它所引起的一连串战争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他们畏惧变革。1815年，他们对利物浦勋爵的托利党政府感到满意。正是这个政府打败了拿破仑，将会让最反动的乡绅和高贵的伯爵感到欣喜。严厉的卡斯尔累担任外交大臣兼下院领袖，他是梅特涅忠实的朋友和议会改革的顽固对头；度量狭窄的西德默斯勋爵（Lord Sidmouth）一丝不苟地主管内政部，他长期以来都是乡村绅士的宠儿；平庸的范西塔特勋爵（Lord Vansittart）在财政部尸位素餐；威仪堂堂、镇定过人的威灵顿公爵也位列内阁；最靠得住的莫过于64岁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他坚定地维护这个统治集团，一如他顽固地反对改革，这给予保守主义的力量甚至大于法国革命。这是个最有特权的统治集团，它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1%的英国家庭拥有80%的土地，他们的孩子在公学或大学读书，他们从事牧师职业的兄弟掌管着这些学校，这些家庭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完全把英国国教、议会、法院、地方政府、高级文官（high civil）、军事职位以及这个王国的政府，看作是他们独占的排他性的领域，就像《狩猎法》规定他们、也只有他们可以猎取野兔、山鹑和雄鹿一样。

在这个极具特权的统治集团的外围，存在着其他的力量：正在萌生的浸礼派的、公理会的和卫理公会的小教堂，以及贵格派的和唯一神教派的礼拜堂；富裕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数量日增、思想独立的中产阶级银行家、律师和外科医生；庞大的伦敦——拥有大量的报纸和出版公司、博学与博爱的上流社会成员、贵族们尚未触及的郊区；最后还有庞大的、散乱的工人阶层，其范围包括未雨绸缪、用互助团体的形式来免除疾病或死亡的熟练工匠，生活疲惫、苦难深重、工资低廉的熟练工人和状况不断恶化的纺织工人——他们组织了秘密工会，还包括失业工人、流浪汉、以及向来人数众多的乞丐。这许多其他力量与统治集团的冲突远远超过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勾画出了整个 19 世纪英国的轮廓。这场冲突始于最保守的、最有权势的托利主义。

567

保守的托利主义

1816 年，利物浦勋爵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财政问题。为了支付有史以来耗费最大的战争，政府将税收增加了 5 倍，公债上涨到 8.61 亿英镑，还发行不值钱的、不能兑换黄金的 1 英镑面值的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政府虽然努力降低支出以缩减税收，但是它仍旧认为必需征收 5% 的所得税。战时的所得税税率是 10%。对辉格党人、激进派人士和托利党中的乡村绅士来说，税收还是缩减得不够；他们因此否决了所得税。为了平衡预算，政府连续发行了三年公债，随后又增加了很多商品的税收，如茶、咖啡、胡椒、麦芽酒、可可、羊毛和酒精——这些都是递减税，它们与许多更古老的税——比如对煤、面包和房屋的征税，一起重重地落在了穷人的肩上。在辉格党人和激进派人士看来，加税是一种罪恶，它妨碍经济，压榨穷人。紧缩开支、削减靡费是他们的口号。

比预算不平衡更严重的问题是经济萧条。每年大约 4000 万英镑的战时开支的终止与农业歉收和大批退役的海陆军士兵搅在一起，导致经济濒临崩溃。价格、租金、利润、工资以及就业人数都暴跌，使民

众普遍陷入困苦。1816 年的大雨使马铃薯腐烂，谷物受损，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这种苦难是难以承受的。利物浦勋爵的政府用 1815 年通过的《谷物法》来应付地主的要求，禁止一切外国谷物进口，除非英国谷物价格达到每 1/4 英担 80 先令。政府没有为工人做任何事情；西德默斯勋爵说，用经济法规干预经济是有害的。面对这样冷漠的政府和令人绝望的生活状况，工人们群起抗议。在东盎格利亚，农民砸毁机器、焚烧粮仓；在英国中部地区（Midlands），工人们破坏牧场；在伦敦，激进分子提出了普选权的要求。各地纷纷成立汉普登俱乐部（Hampden Club），它们的名字是用来纪念约翰·汉普登的，他拒绝向查理一世缴纳船税，俱乐部里的工人都在读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的《政治纪事报》（*Political Register*），每期都越来越多地暴露寡头政府的腐败。在兰开夏郡，数以百计的失业工人每人背着一条毯子，前往伦敦，向国王控诉议会仅代表压迫他们的人。在距离伦敦还有一日路程的时候，士兵们驱散了这些“背毯者”（blanketeers）。这时的气氛因阶级仇恨而格外紧张；有人认为革命即将爆发。

5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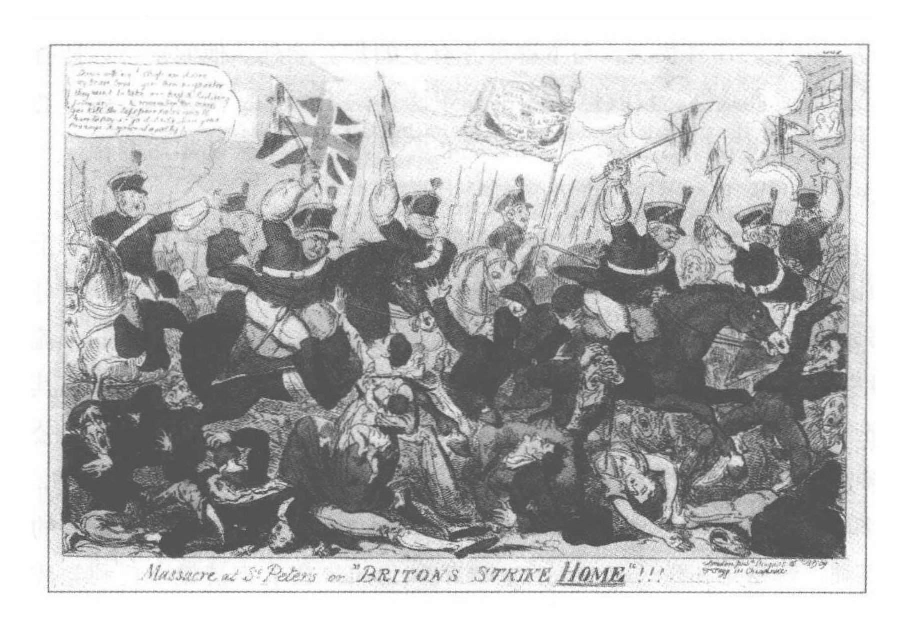
政府以强制性的立法应对上述情况。它再次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禁止任何大型的公众集会。1817 年的高压政治和 1818 年的经济繁荣使国家趋于平静，但是 1819 年的经济萧条又让工人的不满复苏。再次兴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曼彻斯特。亨利·亨特（Henry Hunt）是一个善于煽动和广受欢迎的演讲者，他对彼得卢场（Peterloo Feild）的 6 万名示威者说，民主宪政会让经济和社会弊端消失。他宣称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腐败的政府，反对为了充实地主的腰包而抬高面包价格的《谷物法》。曼彻斯特的地方官员吓坏了。他们命令义勇骑兵——一种地方性的、非职业的保安骑兵——去逮捕亨特，他们照办了，但却踩踏了数百名民众，致使 11 人死亡。在骑兵向民众冲锋之前，这是一场和平集会；之后便成了暴乱。结果让工人们痛恨，让统治阶层胆寒。议会通过了有名的——或者说不光彩的——《六条法案》（Six Acts）。此刻，地方行政官们可以禁止任何

50人以上的户外集会，与本郡事务有关的集会除外。他们也可以搜查民居以清查武器，没收煽动叛乱和毁谤性的出版物，拘禁其作者，通过重税禁绝廉价出版物。政府下决心要压制公众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工人阶级表达自己意见的两种主要手段。

然而，压制并非易事，托利党人从卡罗琳王后事件中明白了这个道理。1820年，乔治三世逝世。他的死亡使乔治四世与其妻卡罗琳分别即位成为国王和王后。卡罗琳与其丈夫早已失和，她在欧陆的风流韵事众人皆知，她成为王后令乔治四世感到厌恶。新国王本人也因其放荡行为而臭名昭著，他坚持政府应该为办他好离婚的事情，在《公祷书》（Prayer Book）上除去卡罗琳的名字，不让她参加加冕礼。1820年6月4日，卡罗琳抵达多佛（Dover），要求她作为英国王后的权利。辉格党和激进派在议会、报纸和公共集会上支持她。托利党政府努力为国王办理离婚但没有成功，他们太害怕了，甚至企图禁止支持她的公共集会。最后他们给卡罗琳50000英镑，让她离开。卡罗琳离开英国，一年后去世。

辉格党支持卡罗琳，很少能揭示出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差别；如果辉格党掌权执政，他们可能也会努力争取离婚。从这件事情真正透视出来的是，在支持卡罗琳的事情上辉格党第二次与公共舆论站在了一起。乔治四世恼怒政府没有热心办理离婚的事情，一度建议组建一个辉格党政府。若是在几十年之前，辉格党人可能会接受；但是1820年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与民众拴在一起。人民不能容忍他们支持那个因行为放荡而臭名远扬、自私自利、吝啬小气、且有极端托利主义思想的乔治四世。辉格党领袖曾经领导过反对《六条法案》和托利党压迫的斗争。辉格党传统上是英国自由、商业利益和不从国教的支持者，这时他们发觉自己与英国的自由主义力量联结在一起。诚然，辉格党人在1820年似乎能成为一个自由政党的领袖。这种发展趋势直到19世纪30年代（或许到19世纪50年代）才出现，而在那之前，虽然利物浦不是有意为之，他却组建了一个比较自由的政府。促成这件事的，是最强有力的保守党人卡斯尔累勋爵的自杀。

569



“圣彼得广场大屠杀”，1918 年托马斯·泰格（Thomas Tegg）刊印。统治阶层的义勇骑兵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上从集会要求改革的人们身上踩过（*British Museum,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自由托利主义

利物浦任内阁首相 15 年，他是个非常机敏的政治家。从 1809 年到 1822 年，英国处于极端保守的时期，他靠卡斯尔累、西德默斯、范西塔特、埃尔登和威灵顿执政；之后，从 1822 年到 1827 年，随着国家日见繁荣、人们对革命的恐惧逐渐减退、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他依靠乔治·坎宁、威廉·赫斯金森（William Huskisson）、约翰·罗宾逊和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执政——他们都是托利党人，但都是温和的托利党人。才华横溢、野心勃勃的坎宁代替卡斯尔累任外交大臣兼托利党在下院的领袖。他支持南美诸共和国、欧洲的立宪主义者以及天主教解放，赢得了自由主义者的声誉。赫斯金森是长期以来是下院的经济学教师，当他提出降低棉纺织品、羊毛织品、铁、煤、生丝和羊毛的关税的议案时，阐述了

570

经济学的原理。因为从外国进口廉价的原材料有利于英国的制造业者，也因为英国货比外国的商品畅销，所以英国人乐于看见关税降低和商业扩张。顽固的托利党乡村绅士是不会反对的，只要不触动他们的地租。但是，当利物浦、坎宁和赫斯金森主张谷物进口价格的浮动标准定在60先令左右而不是80先令，并以这个标准作为进口保护价格的时候，他们就指责新的自由贸易原则是险恶的自由主义阴谋的一部分。

他们甚至担心皮尔在内政部的很多改革。他不但通过法案改善监狱、创立城市警察队伍、改革刑事审判，还极力主张大力减少死刑。大约有200条法令规定，约600种罪行要被判处绞刑。辉格党人在塞缪尔·罗米利爵士（Sir Samuel Romilly）和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的领导下，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倡导减少死刑，但他们的法案屡次被西德默斯和卡斯尔累挫败。但是现在，皮尔任内政大臣，而卡斯尔累和西德默斯都离开了，辉格党原来的创制变成了托利党的法规。

1827年，利物浦病了，坎宁成为首相。他依靠皮尔、赫斯金森和罗宾逊的过人才能组建了一个自由的托利党政府。他甚至诱使三个辉格党领袖参加。两党制有些混乱了。辉格党的领袖们悲叹他们的政党被“拆散”和“消灭”了；自由主义的托利党人想要结束那“可恶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分”。1827年伦敦激进派的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宣称：“没有辉格党，没有托利党，现如今只是空谈。”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宗教和外交政策上的分野造就了特征鲜明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乔治三世时期，关于王室特权和法国革命的深刻分歧加深了两党的分化。坎宁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赫斯金森进步的政治经济学、皮尔的法律改革，这些能结束这种分化吗？

1827年，有人说可以。皮特、利物浦和坎宁的政党不是融合了历史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将支配和分裂19世纪欧洲的历史思想体系吗？公学、大学和统治集团不是把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威尔伯福斯派、皮尔派、赫斯金森派中的人才争取到托利主义的阵营了吗？1827年的情况似乎如此，但是，1827年是一个独特的年份：自由托利

主义仅是昙花一现。坎宁在8月去世了。他才智过人、备受英国商人崇敬，可是他的主张，对极端的托利党人而言太自由了，对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而言则托利气味太浓。极端主义者可以接受皮尔中庸的监狱和法律改良，也可以接受赫斯金森降低制造业产品的关税，但是一说到降低谷物的关税、废除实施绞刑的法律、解放天主教徒他们就极度不安。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对皮尔、赫斯金森和利物浦感到不满，因为他们三人在恢复货币金本位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反对地方银行发行纸币——这些政策减少了货币量，因此（许多乡村绅士认为）降低了物价，导致了经济萧条。到1828年，当威灵顿继任首相之时，极端主义者厌倦了自由的托利党人，准备反叛。

571 辉格党人、激进派和中产阶级也不再对自由托利主义抱有幻想了。它的改革太温和了。赫斯金森宣扬自由贸易，可他不敢废除最主要的关税——《谷物法》。皮尔合并了数百条刑事法规，但是偷盗5英镑或伪造纸币的罪行仍然要被判处绞刑。1824年，坎宁支持激进派的法案，废除1799年和1800年的《结社法案》（Combination Acts），它规定工会为非法组织，但是一年以后，他通过一个法案，否定了工会支持罢工的权利。自由的托利党人既务实又有效率，但是他们太狭隘、太缺乏度量、太宥于党派之见。

“自由主义者”一词在英国最早用于19世纪20年代。它来源于西班牙，在那里它指的是那些反对专制主义为自由而战的人。1820年，把自由主义称之为一种“可憎的原则”的皮尔，预言它势必增长。坎宁的政府用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法律和行政改革来顺应这种增长。但是自由主义也意味着天主教解放和议会改革。

天主教解放问题一直是利物浦勋爵政府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坎宁支持解放，但是皮尔认为爱尔兰需要“一个忠诚的、专制的政府”，所以他反对解放。大多数托利党人和大多数英国人都和皮尔持相同的观点，然而到了1828年，天主教的爱尔兰彻底下定决心解放天主教——也就是说，天主教徒有权进入议会，有权担任高级文武官职。在克莱尔（Clare）郡的一次补选中，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当选下院议员，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是个一流的演说家，还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按照法律，他不能受任。但是如果他被拒之门外，爱尔兰人就会反叛。皮尔和威灵顿认识到了这点，他们强制通过了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 of 1829），该法案赋予英国的天主教徒选举权（爱尔兰天主教徒早已有选举权），赋予所有天主教徒担任军职和高级文官的权利。托利党乡绅雷霆震怒。他们开始谈论各郡需要有更多代表进入议会，必须把优秀的、可靠的、独立的、与大多数英国清教徒合拍的人选为下院议员，而不要那些来自腐败选区的阿谀奉承之人。他们开始谈论议会改革。

温和派的人也谈论这些事情。他们极力主张把东雷特福德（East Retford）和彭林（Penryn）这两个腐败选区的议会席位划归曼彻斯特和雷特福德郡分区（Hundred of Retford）。威灵顿和皮尔拒绝了，赫斯金森和他的支持者都退出了政府。威灵顿落得两头不讨好。他在天主教解放问题上惹怒了极端的托利党人，在东雷特福德和彭林的问题上引起温和派的愤怒。分裂削弱了威灵顿政府，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当英国选民依据未经改革的选举权选出的议员中有半数支持某种程度的改革之时，这条裂缝更严重了。选民们这时对辉格党人和激进派更有好感，他们曾在法国革命的年代中、在彼得卢事件的日子中、在卡罗琳王后事件的骚乱中，挺身维护英国自由、维护非国教徒的权利、维护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新思想的传播、新阶层的崛起和自由出版物影响力的增强，使英国必须认真解决议会改革这一问题了。 572

《1832年改革法案》

1832年6月7日，国王威廉四世在他即位的第二年，签署了著名的《1832年改革法案》（the Reform Act of 1832）。它对英国宪政的改革力度比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大。有56个自治市镇向议会选送2名议员的权利被废除了。这些自治市镇中的大部分在南部，居民人数都少于2000。其他30个能够选举2名下院议员的自治

市镇失去了1个名额，威姆士（Weymouth）的代表从4名降为2名。总共有87个自治市镇丧失了选举144名下院议员的权利。

支持托利党的威廉四世和托利党占多数的上院都极不喜欢这个法案，但因为公共舆论的压力，都不得不接受。上院认为这个法案激进到了危险的程度。它不仅否定了古老的市民市镇机关选举下院议员这种历久弥尊的权利，而且赋予22个新的自治市镇选举两名议员的权利，赋予其他21个自治市镇选举1个下院议员的权利。代表43个自治市镇的65名议员，有8个来自伦敦的自治市镇，28个来自工业城镇。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以及棉纺织、钢铁和毛纺织中心，如今在政府最高权力部门里有了代言人。其余65个自治市镇的界限被重新划定，以便较多的人能够选举。法案对未来最惊人的影响是，它给所有自治市镇规定了一个选举资格的标准。任何成年男子，租有或拥有一处每年价值10英镑的住所，如今都可以投票选举。郡选举权也有所改变。从此之后，凡有价值40先令不动产的人，不论城乡，皆可参加选举，不像以前，只有缴纳土地税的才能投票。这个选举规则唯一的例外，是在自治市镇投票选举下院议员的不动产持有者；他们不能参加郡的选举。1864年，城镇中没有选举下院议员的不动产持有者占郡选民的近1/5，剩余的是：乡村的不动产持有者；每年收入10英镑以上的公簿持有农；根据长期租约租地、持有土地价值10英镑以上的，或者根据短期租约租地、持有土地价值50英镑以上的。在改革法案颁布以前，每10个成年男性中有1个（或者大约400000人）可以参加选举，康沃尔（Cornwall）的许多议会自治市镇和192000人选出44个下院议员，而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Leeds）和设菲尔德（Sheffield）的541000人一个都不能选；法案颁布之后，每5个人中有1个（大约700000人）能选举，4个工业城市正好提名选举8名下院议员。这个覆盖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改革法案的确有一些激进条款，这一事实是充斥其中的保守条款所不能掩盖的。

法案的保守条款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下院和格雷伯爵的辉格党多数派希望说服地主阶级，让他们明白该法案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比

如，郡选下院议员如今的数量是253而不是188，相当一部分来自那些几乎向来都支持托利党的地区。同样具有保守性的条文是，之前参加了议会自治市镇选举的不动产持有者，通常在郡的选举中第二次投 573 票，法案否定了这项权利，清除了乡村各郡中的某些城镇选民。第三个保守的特征是，它保留了大约50个小自治市镇，它们要么完全是口袋选区——即操控在一个人手里，要么由地方有影响的家族掌握。这些自治市镇大部分位于英国南部。作为城市的米德尔塞克斯、兰开夏和约克郡的西赖丁郡（West Riding of Yorkshire）的人口，等于乡村的白金汉郡、牛津郡和南部10个郡人口的总和，这3个城区只有58名下院议员，12个乡村郡县却拥有174名下院议员。控制下院的还是地主而不是制造业者。塞特福德（Thetford）有选民146人，赖盖特（Reigate）有选民184个，仍然可以选举下院议员，唐斯卡特（Doncaster）和克罗伊顿（Croydon）有超过10000人的选民，却没有代表名额。选举资格方面的某些改革也是保守的。民主的选举权都被废除了，这些包括按居民税拥有的选举权、户主选举权、以及在爱尔兰拥有40先令不动产便可选举的颇为民主的选举权——所有保留下来的都是有市民权的常住居民，间或有些民主的投票权，但是这种权利只能及身而止。最后一个保守条款是托利党人钱多斯勋爵（Lord Chandos）强行加进去的。他的修正案给租地价值50英镑以上却无地契的人选举权。因为无地契的承租人的租地期限以一年计算，愿意按照地主的意愿选举。总而言之，法案保持了土地的优势。

尽管改革法案的部分条款很保守，但它的确结束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中产阶级如今成为掌握权力的年轻搭档，腐败选区被大量废除，最危险的是，它开创了修正选举权的先例。贵族权力堡垒的城墙虽然还没有被夷平，但是裂缝已经出现了。托利党人深知这点，所以他们痛恨法案。罗伯特·皮尔爵士说它专横武断、荒唐放肆。威灵顿补充说，最危险的是带给“城镇中最低等的居民莫大的影响力”。甚至辉格党人也惊慌失措。法案一被宣读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格雷内阁大喊：“他们疯了！他们疯了！”

很多掌权者都认为这个法案激进到了危险的程度，这个事实引出了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有9/10议员代表土地阶层的下院、清一色贵族的上院、还有托利党的国王，他们会通过法案给中产阶级更大的权力，以至于最终导致民主政治呢？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两年的政治戏剧当中。它的开场涉及了下院，牵扯到怒气冲冲的极端托利党人，位高任重（*noblesse oblige*）的辉格党人，还有两场大选。第一场大选发生在1830年的6月和7月。选举的结果各有胜负。一些辉格党人因为拥护议会改革再度赢得选举；一些托利党人因为支持天主教解放而落选。选民们反对地方权贵。有些以往几乎没有发生过竞选的郡，这次因为改革的重大问题也有人竞选了。小乡绅、农民、各种各样的不动产所有者都坚持他们的独立性。人们对旧制度的谴责从来没有如此普遍。最严重的不祥之兆就是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的伯明翰政治联盟（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和亨利·布鲁汉姆（Henry Brougham）在约克郡的当选。

阿特伍德是银行家、五金商人和用低息贷款应对经济萧条的坚定支持者，他把工人和雇工组成一个高效的政治机器来煽动改革，这项工作在伯明翰做起来比较容易，因为这里的制造业公司规模小且实行家长制管理。在曼彻斯特，那些棉纺织业公司规模庞大，雇主和雇员的隔阂很深，不可能组成政治联盟。利兹出现了政治联盟，尽管要晚至1831年11月。但是，利兹人在影响巨大的《利兹水星报》（*Leeds Mercury*）的编辑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领导下，于1830年和约克郡的不动产所有者联合起来，选举可敬的亨利·布鲁汉姆为下院议员。布鲁汉姆是苏格兰人，大律师，辉格党知识分子，公益事业的领头人。阿特伍德和布鲁汉姆、自由主义的出版物、政治联盟、不安分的不动产所有者、对旧制度的弊端充满愤怒的那些人，都对旧的选举制度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抨击。

574

1830年7月召开的议会尽管有新增的改革派议员，但仍然是托利党占多数，尽管是勉强的多数。要不是一些愤怒的极端托利党人，威灵顿还可以继续主管政府。他们认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下院是不会通

过天主教解放法案的，在11月15日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投票中，有足够数量的极端分子抛弃了威灵顿，使他的政府垮台。如今轮到辉格党执政了。长期以来受人尊敬的辉格党领袖、66岁的格雷伯爵出面组建政府。他是改革的拥护者，甚至在改革被视为叛国的时候，也是一个没有被权术阴谋和升官发财腐蚀的政治家。他有耐心、有智谋、有声望和勇气让充满分歧的下院、满是敌意的上院和托利党的国王都接受改革。格雷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组建一个英国历史上贵族化程度最高的内阁。13个内阁成员仅有4名是下院议员，只有一名来自中产阶级。格雷说，这13名内阁成员拥有的土地比以往任何一个内阁的成员拥有的都多；但是，1831年3月1日，他们提出了一个议案，否定土地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辉格党内那些位高任重的成员也对《1832年改革法案》贡献甚多。辉格党人历来与非国教、商业、城镇和大众事业是同一阵线，不论是17世纪排斥主义者（Exclusionists），还是18世纪威尔克斯的拥护者。自从彼得卢事件以来，他们的口号里就包括了议会改革的要求。

不过，辉格党支持改革也不是完全没有私心。在两党制度下，在野党无时不想以支持大众事业赢得竞选。为了在1830年的竞选中获胜，相当多的辉格党人转向改革；在1831年5月选举期间，甚至有更多的人转向改革。改革突然变得流行起来——它成为最重要的大众事业。1831年5月之所以进行选举，是因为4月20日第一个改革议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款在下院被否决了。此次失败导致格雷坚持要国王解散议会，以便专门针对改革的问题举行一次选举。

1831年5月举行的大选成为改革取得胜利的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它使格雷内阁在下院获得了140个议席的多数。各郡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改革。反对法案的郡下院议员只有6个重新当选。开放的自治市镇也支持改革。托利党在英国和威尔士那些封闭的自治市镇获胜，可是却失去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自治市镇。辉格党人并不耻于利用政府的影响、打国王的招牌、威逼利诱和行贿受贿。但是无论手段如何，结果非常明朗：选民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改革。9月22日，下院以 575

345票对236票通过了第二个改革议案。10月8日，上院以41票多数予以否决，由此把英国推入了一场政治危机。

德比（Derby）、沃塞斯特（Worcester）、布兰德福德（Blandford）和蒂芙顿（Tiverton）发生暴动。伯明翰有10万人高声抗议；伦敦的有7万人示威游行；莱斯特（Leicester）、波尔顿（Bolton）和利兹组织了政治联盟；诺丁汉（Nottingham）的暴徒向纽卡斯尔公爵的宅第纵火；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他们烧毁并哄抢了海关、税所、主教宅邸、监狱和通行收费处；布兰克本（Blackburn）的政治联盟在讨论进行武装集会。这些骚乱让有些上院议员改变主意，但是人数还不够多。1832年3月24日，经过数月的社会冲突和政治谈判之后，下院提出第三个议会改革议案。上院不顾民情激愤，于5月7日拒绝通过。上院依然顽固不化。格雷早就告诉威廉四世，战胜这种顽固不化的唯一办法就是威胁他们要赐封大约40名新贵族。国王答应了，但仅仅把这当作最后的棋子，甚至5月7日还走不到这一步。于是，格雷5月9日提出辞职。

向来忠于国王的威灵顿试图出面组阁。阿特伍德在伯明翰召集了有20万人参加的抗议大会。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和他的支持者在伦敦张贴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公爵，挤兑黄金！”还附有如何将钞票兑换成黄金的说明。普莱斯的想法是将英国银行的黄金兑空，迫使政府改革，或出现金融混乱。10天的时间里，英国银行便从金库中拿出了160万英镑的黄金。国王让步了，他决定增封40或50名新贵族。贵族不喜欢让贵族阶层的数量膨胀、地位降低，也不喜欢改革，而两者相比，他们对前者的厌恶程度更甚，于是便通过了议案。国王的威胁说明了贵族为什么会同意改革法案。可是国王为什么会同意呢？或许部分答案在于他惧怕革命，但比这更关键的是，当时完全没有可能组建一个政府来替代格雷政府。即使伟大的威灵顿公爵、滑铁卢的英雄也不能组建一个反对改革的政府。英国必需有个政府，宪法早已强调政府应享有下院大多数的支持。1831年5月的大选、英国宪政的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力量的压力，所有这些糅合起来使改革势不可挡。

改革孕育了改革。1835 年市政法案（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 Act of 1835）自然而然地随着《1832 年改革法案》产生了。改革后的议会成员很难容忍比之前的国家寡头更有寡头政治和朋党气息的市政机构之继续。大多数自治市的统治团体都是内部繁殖的自治机构——常常从古老的同业行会中挑选继任者。他们丧失了和本城镇居民的联系，往往效率低下，挥霍无度，将纳税人的钱财耗费在奢华的宴会上，而不是用来修建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排水沟。1835 年法案废除了这些古老的自治机构，在 179 个自治市镇成立市镇议会取而代之，市镇议会由纳税达到 3 年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权资格比《1832 年改革法案》中规定的 10 英镑的选举权资格更加民主。选民选出市镇议会后，市镇议会又选举一个市长和若干高级市政官。由于任何人没有足够的财产都无法成为议员或高级市政官，所以，自治市的市政府还是掌握在中产阶级手里。



改革运动正是在自治市镇这种喧嚣的选举中获得了坚不可摧的力量（*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576 成为济贫法的贫民救济委员甚至都不需要拥有财产。《1834 年新济贫法》(the New Poor Law of 1834)的通过减小了寡头政治在乡村的影响力，正如《市政改革法案》在城镇的情形一样。新济贫法宣布所有地方纳税人都可以选举新济贫法公会的贫民救济委员，委员们有权管理贫民救济事宜。民主政治已经延伸到了乡村，但不是全部的民主。《新济贫法》与《1832 年改革法案》和《市政法案》一样，也有偏袒财产和寡头集团的条文。在选举时，缴纳济贫税数额大的人比数额小的人得到的票数多。治安法官依据职权（*ex officio*）自然成为贫民救济委员。这样的安排使贵族、乡绅、贫民和零售商人在执行济贫法上成为搭档，尽管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之后，选举贫民救济委员时，贵族和乡绅往往被等级更低的人战胜，他们对此感到厌倦，也就退出了。

当然，1832 年到 1835 年，英国的民主政治还没有到来，但是在全国、城市和乡村的选举中，成千上万以前从来没有行使过选举权的英国人，如今正在决定由谁来统治他们——有时自己甚至也变成了统治者之一。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它使有了选举权的人愈加渴望更进577 一步的改革，使选举权被否定了的人愈加气愤。新获选举权者的活力和未获选举权者的愤怒，不久便导致了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

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

1839 年 2 月 4 日，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们在伦敦查林十字街(Charing Cross)的大英咖啡馆（British Coffee House）集会。他们集会的目的是宣传《全国宪章》（National Charter)，它包括 6 点：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同等的选区有同等的代表，每年召开议会，下院议员无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下院议员应付给薪水。代表们都体面大方、衣冠整洁、沉着稳重，可是到了咖啡馆，他们被迫离开他们指定的房间，另换了一个。他们指定的房间被预订给了另外一组代表，后者代表中产阶级，打算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反谷物法联盟。联盟对《全国宪章》的六点内容毫无兴趣：它希望废除所有限制谷

物进口的关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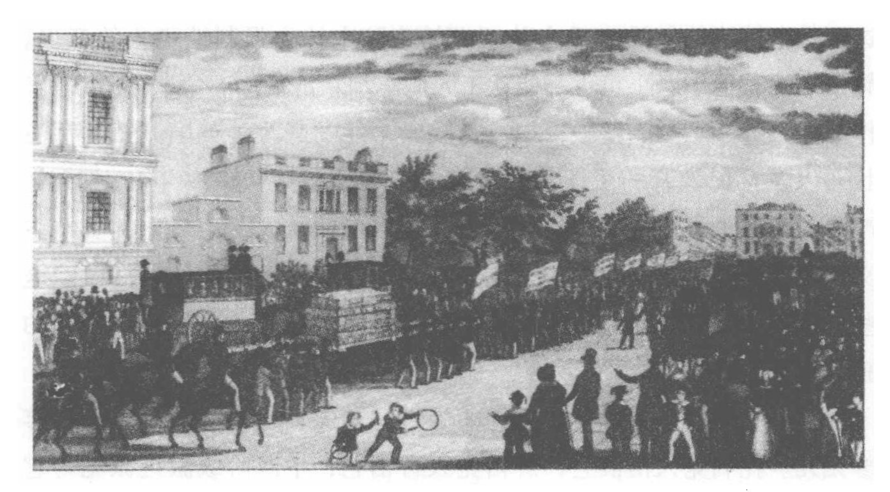
历史上不乏巧合之事。一家伦敦咖啡馆对预订房间的时序安排上的错误却带来了两大全国性运动的正面遭遇，这两场运动在后来的10年让英国人的生活天翻地覆。这次巧合也具有象征性。中产阶级代表们争得了最好的房间，后来也在议会中取得了胜利；工人阶级的代表们被安排到了次等房间，他们的运动最后也遭遇了失败。但是在1839年，前去参加宪章派大会（Chartist Convention）的代表们并不能未卜先知——他们满怀激动地通过议会贯彻宪章中的内容、解放工人阶级。

1838年和1839年，全国各地都聚集了大批工人，就宪章中的6点内容提出要求。到处都有高举火把的游行者、势若长龙的游行队伍和规模浩大的集会。格拉斯哥（Glasgow）的一次游行队伍有2英里长。在约克郡西赖丁工业区的皮普格林（Peep Green），有25万人为宪章高呼，伯明翰也有20万人。这些数字有可能夸大了：《晨报》（*Morning Advertiser*）声称曼彻斯特的集会有30万人，另外一位编辑则估计有5万人。宪章派的集会不仅仅局限于工业城市；在萨默塞特的巴斯，一次集会有6万人参加，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德维兹（Devize），一次集会有4000人参加，这两个郡都有不断衰落的纺织工业。除了声势浩大的集会之外，还有会员聚会（membership drives）、演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报纸，以及模仿卫理公会的班会（class）的小团体。政府受到了震动，但不是很严重。它不仅知道上层阶级赞成普选权的人不会超过1/20，而且，如北方武装力量的指挥官所说，“他们的威胁……很可怜。只有半个弹药筒、半个长枪，没有钱也没有训练……他们要进攻的人却统帅有方、财力充实、训练有素……每人有60发子弹。”

为什么会酿成这场运动？为什么会有这些呼声？我们必须从两个基本事实中寻找答案：一个是数量庞大且能表达自己主张的工人阶级在政治方面的挫折，一个是经济萧条。政治上的挫折很多而且很严重。578
第一个就是《1832年改革法案》，很多工人曾为这个法案摇旗呐喊，但是它却否认了他们的选举权。他们感觉上当受骗了。

在北部掀起了另外一场斗争，要求实行10小时工作制。1831年，一名约克郡地主的代理人理查德·奥斯勒（Richard Oastler），发现了英国纺织厂里童工的悲惨状况。奥斯勒是一个托利党人、福音派新教徒，他充满了燃烧的、愤怒的激情，发誓不把这些邪恶的事情消灭绝不罢休。其他许多人加入了他的行列，不久整个工厂区组建了很多短工时委员会（Short Time Committees），全部要求每天工作10小时。1833年，辉格党通过了一个《工厂法》（Factory Act），但只是针对童工的。法案禁止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9至13岁的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被限制在8小时以内，对成年人没有任何规定。工人们再次感觉上当受骗了。

一年后，辉格党政府又一次激怒了工人阶级。它通过了《1834年新济贫法》，赋予伦敦的3名委员权力，让他们组建济贫法公会，建立济贫院，以及命令济贫法公会的贫民救济委员不要给有劳动能力的人予以救济，除非他们进入这种肮脏的收容所里。整个英国到处都有使用手摇纺纱机的织工、编制工（framework knitter）、造钉工、花边织工、以及其他的手工艺劳动者，对收入正在下降的他们来说，领取几先令的教区救济金犹如天赐鸿运。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业城镇也有太多的失业工人，以至于济贫院无法容纳。这些情况类似的城镇都有一种地方自豪感，都有地方官员和自己对待穷人的办法；他们憎恶来自伦敦的那些说教者。新济贫法是严苛的、中央集权化的，实施该法可能带来的情况招致了广泛的、充满斗争气息的抵抗。在布拉德福（Bradford）和奇利（Keighley），济贫法助理委579 员遭到了人身攻击；在托德莫登（Todmorden），一帮暴徒焚毁了忠于贫民法的贫民救济委员家里的家具；在埃兰德（Elland），妇女们将这样的贫民救济委员滚进雪地里。很多新当选的贫民救济委员拒绝执行伦敦委员们的命令。对工资少得可怜的织布工、针织工和工厂里的失业工人而言，济贫院里的状况恐怖得难以想象。然而，到了1838年和1839年，辉格党政府已经在制造业地区强制推行了新的济贫法公会。工人阶级再次失败了。



宪章派游行，表达他们要求所有人都得到选举权的宏大请愿目标（*The Museum of London*）

新的贫民救济法对建立工会也很不利。1834 年，多彻斯特（Dochester）的 6 个农业工人被判处流放，原因是他们在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中遵守了自己的罢工誓言。1837 年，格拉斯哥棉纺织工人罢工的领袖也受到了同样的处罚——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战俘营。辉格党政府支持这样的处罚，因为辉格党、托利党和中产阶级激进派都不喜欢工会。雇主们不但破坏了罗伯特·欧文 1834 年组建的全国团结工会（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Union）——在建立全国性工会方面，这是一次崇高的尝试，它声称有 100 万会员，而且摧毁了根基更牢固的工会——棉纺业工会、建筑业公会和煤矿工人的工会。在 1831 年和 1832 年两个经济景气的年头，人们可以看到工会的扩张，但 1837 年和 1838 年贸易的恶化导致了罢工的失败和工会的解散。

激进报刊是工人摆脱挫折的一条出路，它是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最重要媒介。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们也确实取得了胜利。辉格党将报纸的出版税从 4 便士降到了 1 便士。政府对每份报纸都抽税，长期以来使报纸太贵，工人们买不起，结果非法出版物风行。有不止一个宪章运动的领袖因出售未贴印花的报纸而在监狱中度日。辉格党人在 1836 年之前一直没有结束 4 便士的印花，之后还继续给报纸贴印花，

这两件事情让他们没有机会从工人的头脑中抹去强制性税收的意识。辉格党的其他小恩小惠也不能让工人们忘却新济贫法、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失败、工会的解散，抑或是政府未能丝毫改善英国城镇的污浊状态以及贫民教育的匮乏状况。工人们到处碰壁。1838年和1839年严重的经济萧条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的男女们抗议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对传统工作方式、对他们所珍视的习俗、家庭和共同体的威胁。这些抗议表明他们捍卫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也表现出一种刚刚觉醒的独立意识。

但是，要实现宪章的要求并非易事。首先，统治阶层的支持者寥寥无几。托利党人憎恨它，辉格党人害怕它，中产阶级激进派觉得它太极端。起初还有一些中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支持——在伯明翰，有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在伦敦，有功利主义的下院议员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约翰·里德（John Leader），约翰·休谟（John Hume）；在利兹，有《利兹时报》（*Leeds Times*）的主编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然而，大多数中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信奉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支持新济贫法，反对10小时工作日，害怕普选权。宪章派一开始也在运动方式上存在分歧。1839年伦敦代表大会（London Covention）的领袖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鼓吹自我改善和道德的力量，而朱利安·哈尼（Julian Harney）和布隆泰·奥布莱恩（Bronterre O'Brien）则相信长矛和步枪。580 1839年7月，下院以235票对46票决定对他们的请愿置之不理，这打击了相信道德力量的宪章派人士。11月，使用长矛和步枪的时机到来了。在蒙莫思郡（Monmouthshire）的纽波特（Newport），100名武装起来的威尔士男子揭竿而起。这场反抗斗争很快被镇压了。到了1842年，当经济萧条使宪章运动复苏的时候，它变得更加团结了，而且找到了《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和它的编辑弗格斯·奥康诺（Feargus O'Connor）作为运动在全国的喉舌。《北极星报》的发行量居地方报纸之首。《北极星报》的强有力呼吁、该报编辑的雄辩演说、还有其他宪章派宣传者让宪章运动的事业起死回生了。于是，又开始举

行庞大的集会、召开大会、进行请愿，然后又遭受挫败。宪章运动再一次消沉，但是还不会消失。1847 年的经济危机让它第三次复苏，导致了 5 月 10 日在伦敦南部肯宁顿广场（Kennington Common）的大规模集会，这场集会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和数量庞大的军队驱散，随后宪章运动就在经济繁荣和政治改革中销声匿迹了。威廉·科贝特说："我不相信你能煽动一个吃饱了肚子的人。"

尽管宪章运动失败了，但它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结果：它使工人阶级有了更多的身份意识和自豪感，它营造了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氛围。这两种结果都无法进行具体的衡量，但都非常重要。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在 1867 年、1872 年、1884 年赢得选举权和无记名投票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工人阶级独立性和自主权的提早宣传，而这两点都是宪章运动的思想。10 小时工作日、教育补贴、《公共卫生法案》（the Public Health Act）、地方工会对强制进行济贫院试验的拒绝，所有这些还有其他更多的变化都反映了宪章运动的压力。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的抗议并非完全徒劳无益。

反谷物法同盟与那些宪章派一样，也依靠吃不饱肚子的人来鼓动民情。当糟糕的收成导致面包价格昂贵时——就像 1838 年至 1842 年一样——饥饿和困窘的人们坚决反抗排斥外国谷物的法律。议会 1828 年通过了这样一个法律，规定国内谷物价格在每夸脱 50 先令的时候，要对外国进口的谷物征收 36 先令 8 便士的税收。这是一项非常高的税，在收成糟糕的时节，它使面包更贵了。它也成为联合起来的中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者和工人阶级宪章派人士进行斗争的最佳问题。

但是，宪章派与反谷物法联盟没有任何关系。对很多宪章派成员来说，更便宜的面包无非让工厂主支付更少的工资。很多宪章派成员厌恶反谷物法联盟，想方设法破坏反谷物法联盟的集会。1839 年，反谷物法同盟都不能在自己的地盘曼彻斯特集会；在北部某些集会厅里突然上演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土地阶层依然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也反对反谷物法联盟。1838 年，下院以 300 票对 95 票反

对废除《谷物法》。反谷物法联盟遇到的种种困难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宪章派占据了集会大厅，而贵族占据着议会。可是，1846 年，《谷物法》被废除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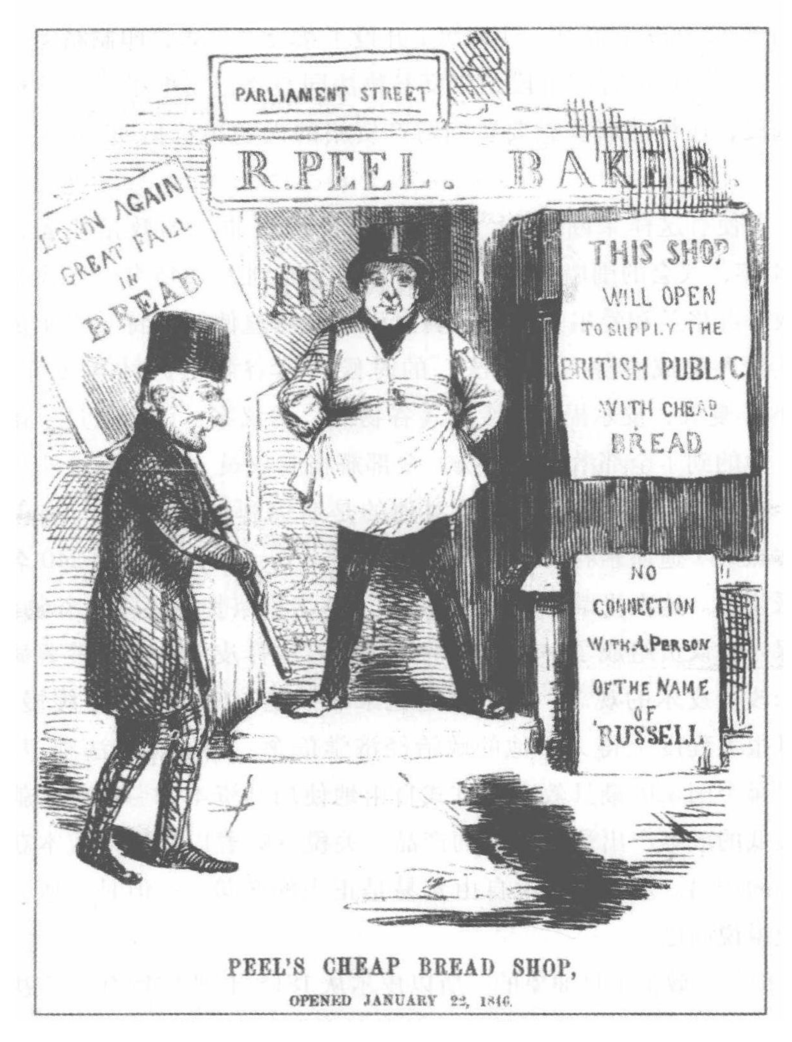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是反谷物法联盟拥有良好的组织，并坚持不懈地运用道德的、经济的和选举的力量，其次是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自由贸易理论的胜利，按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观点，主要是后者。反谷物法联盟是一个无比强大、甚至不择手段、效率极高的施压团体，当反谷物法联盟的爱尔兰打手们用煤气管把宪章派成员从自由贸易的集会上赶出去的时候，宪章派就领略了它的厉害。某些刊物被反谷物法联盟收买，辱骂反对联盟的知识分子。他们进行选举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有两名棉布业制造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进入议会，他们在议会里把 1839 年到 1842 年这个 19 世纪最严重的长期萧条归咎于《谷物法》。如果高关税废除了，欧洲的谷物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入，面包的价格就会下降。便宜的面包会让工人有更多余钱购买制造业产品。向英国出售谷物也会使欧洲人得到更多英镑，从而拿这些英镑去购买英国的丝织品和钢铁制品。制造业将会恢复、失业的人将会重新得到工作，经济萧条将会结束。在 1842 年，没有人知道经济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尤其是所有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述论证看起来头头是道。事实情况比华而不实的论证更可信，英国的小麦产量的增长比人口增长慢得多，这就意味着只有从国外进口便宜的谷物才能控制面包的价格。

1843 年，经济繁荣、农业丰收、面包便宜、还有人们吃饱了肚子，这些使前面的那些论证不堪一击。宪章运动向经济繁荣低头了；反谷物法联盟又将如何呢？绝对不低头！其富有的拥护者如是说。1843 年，雄伟的自由贸易大厅（Free Trade Hall）在曼彻斯特落成，首次集会便筹集到 5 万英镑。同年，反谷物法联盟印刷了 900 万本小册子，主办了 650 次演讲，派了 156 个代表团去议会，出版了一份名为《联盟》（*The League*）的期刊，出钱在其他的报纸和杂志

上插入426000篇报道。针对女士开设了茶会、义卖，印制精美的订阅卡。其中最厉害的手段是，反谷物法同盟登记了上千名支持他们的选民，还帮助那些想要达到财产资格的人购买价值40先令的不动产。

即使有这样果断坚决、效率高超且组织非凡的政治机器，到1844年，议会的围墙还是没有被冲破。只有到了1845年，英国小麦歉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马铃薯发生枯萎病迫使罗伯特·皮尔爵士和其他人赞成废除《谷物法》的时候，《谷物法》才被废除了。1846年夏天，皮尔提出了废除《谷物法》的议案，议会通过了该议案。他的到了全部激进派议员、全部辉格党议员（除9人以外）和100名保守党议员的支持。反对他的是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和本杰明·迪斯累利勋爵（Lord Benjamin Disraeli）领导的240名保守派议员。这次投票分裂了保守党，100名投票赞成废除《谷物法》的保守党议员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被称作皮尔派。马铃薯病害并未改变皮尔的观念，只是逼迫他采取措施。他的转变是缓慢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政治经济学信念。比较优势法则声称，如果每个国家以最具效率的方式自由地使用其资本和劳动力，就会以最低的成本产出最大数量的产品。关税意味着以较高的成本获得较小的产出。皮尔早就说自由贸易是正当的政策——但是，他只抽象地说说而已。

但是，政治不是抽象的，所以皮尔从1815年到1845年都坚决支持《谷物法》。可是后来辉格党的领袖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在1845年11月宣布支持自由贸易。很多辉格党人实际上早已采取这样的立场。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辉格党不可忽视的力量将同那个可怕的政治机器——反谷物法联盟——联合。当面包价格面临上涨、马铃薯缺乏、爱尔兰和苏格兰人在饥饿中挣扎的时候，两个政党都会以便宜面包为竞选口号。即使皮尔决不转变观念，辉格党人和激进主义者也会废除《谷物法》。事实上有很多事情与皮尔的转变有关系。 582



《庞奇》把罗伯特·皮尔爵士描画成制作便宜面包的面包师，以此庆贺他向谷物自由贸易的转变（*Punch Limited*）

在废除《谷物法》后的10年当中，每年从外国进口的谷物都会翻倍，极大地遏制了不断上涨的面包价格，使英国的工人、外国的农民和地主可以从英国购买更多制成品，因此或许有助于解释1847之后年严重的经济萧条的结束这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还有，因为外国谷物的价格也上涨了，而英国农民也进行了很大技术改良，所以，在19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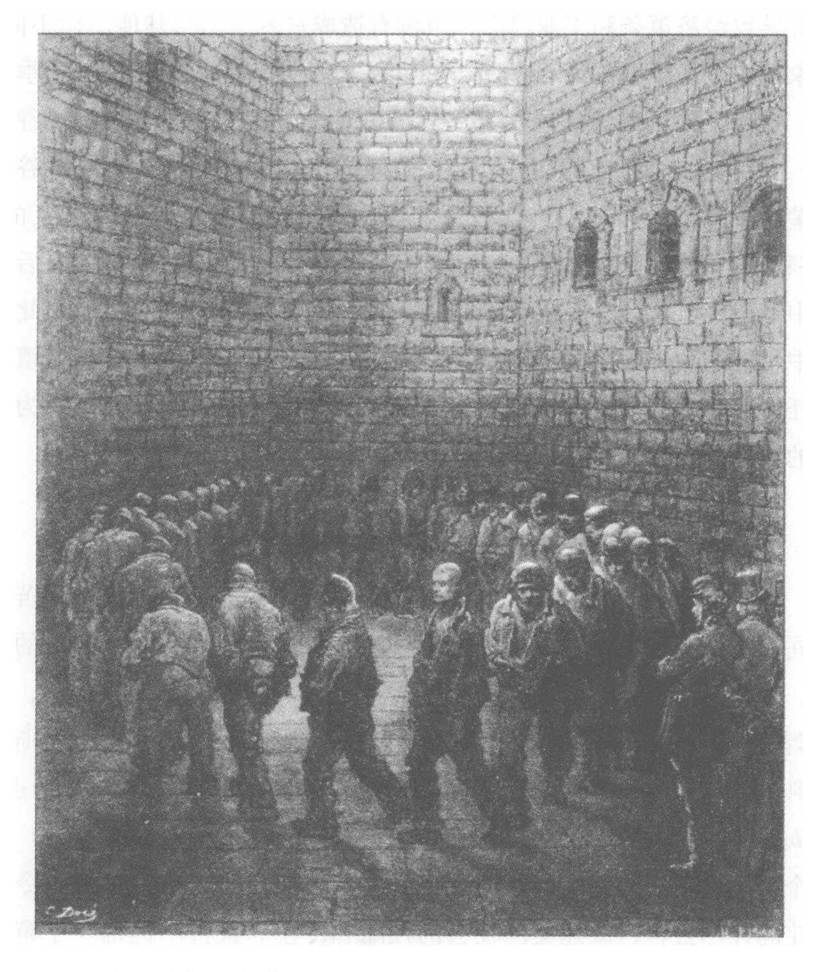
纪70年代，铁路和气船把北美洲更便宜的谷物运来之前，英国农业并没有遭遇致命的灾难。

反谷物法联盟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夸大了《谷物法》的效果。它既没有导致经济萧条和工业停滞，也没有造成贫困。但与其他法律不同，583 它象征着土地阶层的特权垄断，不管是对教会、军队，还是对四季法庭。支持废除《谷物法》的那些人的演说充满了谩骂的语言。《谷物法》象征着一个骄傲的、古老的、傲慢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对谷物的垄断激怒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后者认为所有的垄断都是不公正的。《谷物法》的废除表明被《1832年改革法案》引领到了议会大厅后面的中产阶级，这时已经决定走到前面来，分享英国的领导权。在此过程中，他们和土地阶层一起担负起对付贫穷、犯罪和整治肮脏城镇的责任。这个新兴的统治伙伴在努力解决上述问题的时候，无意间为英国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福利国家的奠基

19世纪初期，许多英国人都忍受着他人的残酷和冷漠。遭受苦难如同家常便饭，它会降落到每个等级的人身上，也可能是很深重的苦难。这样的情况促使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塑造了很多人物形象，如《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中那个残酷的济贫院院长、《尼古拉斯·尼科尔贝》（*Nicholas Nickelby*）中那个可恨的塾师、《教堂钟声》（*Chimes*）中那个冷酷、精明的法官、《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那个苛刻的工厂主。这些普遍存在的苦难也促使政府发表了许多令人惊诧的详尽报告，叙述英国社会的残酷和冷漠。报告不但描写了童工和城镇污秽这种赤裸裸的罪恶，而且调查了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和缝隙中的陋习。他们描述了疯人院、监狱和客船里的恐怖情形。报告中说，在某个疯人院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木制的栅栏。大多数栅栏里的病人都全身赤裸地躺着，所有的人都躺在杂草上，盖的东西只有一条毯子。到星期六，一些病人就被拴在栅栏上，直到星期一堆积的粪便被拖布和冷水清理掉的时候，才把他们解开。大多数疯人院的管理人

都认为精神病是无法治愈的，经常简单地用铁链和皮带把精神失常的人禁锢起来。有少数人认为精神病是由血液中的胆汁引起的，所以会给他们放血。



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1832—1883年），法国人。其作品“囚徒放风”（Newgate-Exercise Yard），摘选自威廉·布兰夏·杰罗德（William Blanchard Jerrold）著《伦敦：一次朝圣》（*London a Pilgrimage*）。由赫里奥多·约瑟夫·皮萨（Heliodore Joseph Pisan）雕刻，1872年出版（雕刻版）（*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英国336所监狱里的生活状况同样触目惊心了。监狱生活中罪恶的起源，是不加区分地将各色犯人囚禁在同一个阴冷、沉闷、脏得难以置信的监牢里。在监牢里，老练的犯人会教新的罪犯犯罪技巧。监狱里没有罪犯区分、没有教育、没有隐私、也几乎没有什么纪律，有的只是相当严重的酗酒、赌博、斗殴和不道德的性行为。里面状况跟运送移民前往美洲的客船里的船舱一样跟地狱似的。1820年，利物浦的船只上运走了20000人，这些船的平均载重量只有250吨。其中一条船上只有36个舱位，却载了260个人。死亡率有时要达到50%。船只上供给缺乏、饮用水稀少且泛着恶臭、挤得要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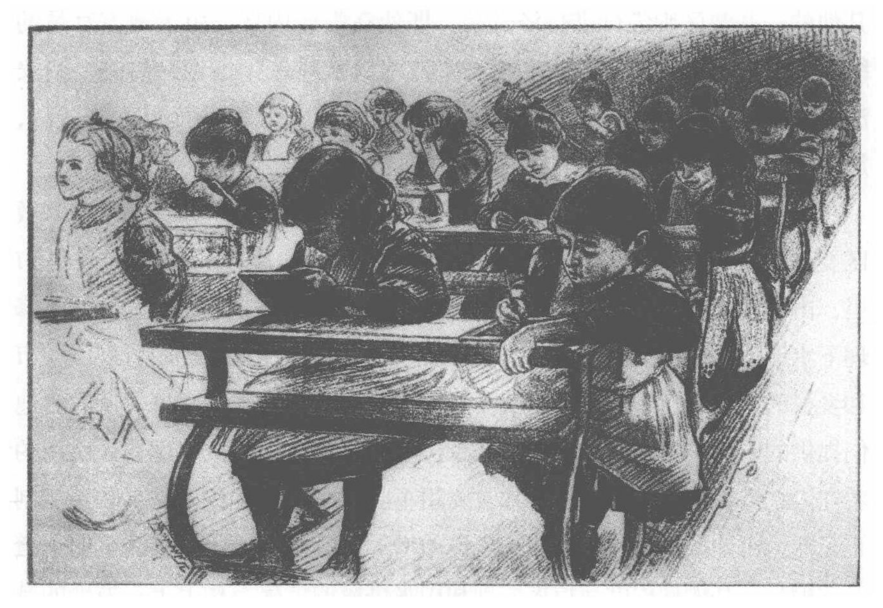
这是一种悲惨的、冒险的航行，但是出发的人宁愿去赌命也不愿意到贫民院里去。贫民院的数量很多，甚至在《1834年新济贫法》实施之前就有，这都是些阴沉悲惨的地方。很多贫民的确能在贫民院之外接受救济。但是1834年之前，英国和威尔士的15500个教区对贫民的救济都 584 不一致；有些教区用救济金补助工资，从而诱使挣工资的人去当贫民；其他的一些教区则尝试推行济贫院。即使在教区内部，由于地方官员的统治很随意；一个治安法官会给一个流浪汉赏赐一顿饱饭，另一个治安法官则会把他鞭打一顿。这种随心所欲、时而宽大、时而严苛的做法，加剧了济贫法对工人阶级的恶劣影响，也让济贫的费用越来越高。

地方政府的权力混乱，既不统一也没有效率。乡村里，治安法官和教区委员会（包括贫民监督、教堂执事和巡警）是最重要的掌权者；城市里，由市政机构和自治市镇的法官掌权，不过不断有铺路的、管灯的、修理下水道的或由专门的议会法案创立的改良委员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城市和乡村的这些掌权者大多不领薪俸且自行任命，不受中央中枢的监管。他们提供的服务也不一致。除了少数乡村里的巡警和一些城镇里花钱雇用的看守人之外，没有警察队伍。常常要用军队来制止暴乱。可是军队不能制止犯罪，犯罪数量随着城市化和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增长。很多城镇的街道 585 非常糟糕，其糟糕程度与垃圾清理和用水供应的情况不相上下；另外的城镇在这方面能得到保障，但同样也没有统一的管理。

导致英国人生活中到处是残酷和冷漠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混乱的、

业余性的地方政府系统，这点可以解释监狱和济贫院的情况，以及犯罪率上升、疾病横行的原因。二是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默许了客船、工厂和矿场中的罪恶。三是地方的自愿捐助制度导致了对教育和慈善职业的忽视。自愿捐助制度认为私人机构——不论是教会、医院、慈善会、互助会、煤社或施粥处——是为自由的人们获取社会需要提供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比如，英国的青年应该由教会自愿出力来教育。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教会对此力不从心。1807年，非国教徒和自由派牧师组建了“英语与外语学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1811年，英国国教成立了“国民会”（National Society）。两者都旨在教育贫民的孩子，但皆无建树。1840年，《教育杂志》（*Educational Magazine*）称伦敦工人阶级的孩子有4/5都没有受过教育。北部城镇有1/3的孩子没有上过学，其余的只上过那种周日学校，或者拥挤在那些无知的塾师维持的日校中（有个塾师给他的地理课订制了两个地球仪，每个半球一个）。

586



英国国教创办国民学校的热情，远远超出了它为英国提供一个健全的、普遍的公共教育体系的能力（*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当然，冷漠和残酷并非什么新情况；它们存在了数个世纪。这个时候的新情况是人们坚持认为应该减少冷漠和残酷，哪怕这样会让中央政府更为庞大。例如，1833 年，议会投票赞成设立监察员，执行工厂不得雇用幼小儿童的法律。1847 年，议会规定所有青年男女每天只能工作 10.5 小时。1842 年，议会设立矿业检察员，以防妇女和儿童在这些黑暗、危险的地下坑道里工作。1849 年，议会增加了矿业监察员的人数和权力，以减少每年导致近 1000 名矿工死亡的事故。铁路和轮船的事故也导致很多人死亡；为了对它们进行监管，议会设立了铁路和商船队监察员。出境移民管理员从 1803 年以来对客船进行监察。到 1847 年，他能全权要求客船提供足够的空间、供给、饮用水、以及安全保障。在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全盛时期，议会还是颁布法令规定致命的事故、剥削儿童、旅客的旅行条件恶劣这些情况应需要国家的干涉。 587

议会还授权中央政府监督照顾贫民、罪犯和精神病人的公共机构。政府通过了《1834 年新济贫法》，授权 3 名委员和 12 名以上的助手监督 500 多个新的济贫法联合会（Poor Law Union）中选出来的济贫员。委员们坚决执行新法，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能在济贫院之外获得救济金，已婚夫妇必须分居于不同的收容室，圣诞晚餐不再有牛肉和梅子布丁的待遇，这些激起人们怒地谴责这个可憎又残酷法律。济贫院里的情况很严酷，但是它的使用明显不是很普遍；事实上，整个 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4/5 的救济金都发给了济贫院外的贫民。委员们也促进了很多方面的改善，减少了臭名昭著的冷漠和残酷事件的数量，改善了卫生保健和教育状况，采用了更严格的、但比较公平的救济金发放标准。

议会于 1835 年和 1845 年设立的监狱监察员和疯人院委员也有相同的作用。疯人院委员不容许满是栅栏的房间存在了。如果一个犯人一天转动一个毫无用处的曲柄没有达到 14000 次的话，就要克扣他的食物，监狱监察员禁止了这种事情。

旧式地方政府的很多方面比较仁慈，新式的中央行政机构的很多

方面反而比较严苛，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形成惯例。权衡二者的利弊，很明显，中央行政机构使公共机构更合理、更有效、也更文明。政府不仅遏制了工业领域的剥削、改造了公共机构，还雄心勃勃地保证每个公民都能拥有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安全的邻里环境，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就会得罪某些掌权者；教育领域要触及英国国教；公共卫生领域要触犯自来水公司和改良委员们，警政方面要遭到地方当权者的妒恨。因此，议会小心翼翼地前行。它没有用新学校取代教会学校，而是以资助教会学校的方式促进教育发展，在改善卫生和安全方面则赋予地方新的权力——当然每件事情都要受中央的监督。1839 年，政府任命了 2 名教育监察员，拨款 30000 英镑。到了 1852 年，已经有 20 名教育监察员和 200000 英镑的拨款。1848 年，议会设立了综合卫生理事会（General Board of Health），有医疗和工程方面的监察员，1856 年，议会授权内政部设立警察机构监察员。从 1833 年至 1856 年，政府设立了大约 20 个中央委员会、理事会或监察团，全部都关系到女王陛下臣民们的福利。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已经为英国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这个福利国家的目标谨慎、权力有限，它的基础是工业资本、地方政府和自愿性权力机构的协调合作。监察员的数量少且职责有限。1842 年，政府只任命了一个监察员监督英国为数众多的矿场。疯人院委员不能指令各郡建立公共精神病院，卫生理事会不能命令城镇改善下水道和用水情况，除非该城镇的年死亡率超过了 23‰。那些几乎无权的教育监察员也很遇到很多阻碍，因为地方自愿出力并不能建立足够的学校以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英国人不愿意加强、也不愿意削弱地方政府和私人权力机构。结果中央和地方就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地方和私人机构提出创议，负责日常事务；中央政府提供建议、监察、报告和拨款。

588

有时，为了改革地方的公共或私人权力机构，中央政府会直接干预地方政府。地方上有数千个机构需要这种改革，从小慈善机构到英国国教、牛津和剑桥大学，都需要改。1820 年，议会设立了一个慈善

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1840 年，该委员会完成了它的第 32 份也是最后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涉及慈善机构中的管理不当、效率低下和贪污腐败。报告中说，捐资设立的学校里未曾教过半个学生，济贫院的基金花在了济贫院董事的宴会上，捐赠给孤儿、寡妇的资金从来都没有落到实处。1853 年，议会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委员会协助牛津大学进行自身改革。这看起来是对私有财产的惊人干涉，但是也有先例可循。1836 年设立的教会委员会（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就是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协助国教废除领薪俸牧师的兼任制，终止主教教堂内教士们的挥霍浪费，调整主教收入方面某些非常突出的不平衡。无论是大学还是灯塔，抑或是主教教堂，政府都加强了干预，目的是迫使他们进行自身改革。因此，帮助社会进行自身改革的委员会与保护个人免遭剥削和冷漠的政府部门一起，成为行政革命的一个方面。

589



正如《庞奇》生动描绘的那样，被污染的泰晤士河成了一条通往死亡的污水沟（*Punch Limited*）

这场革命的第三个方面是提高文职部门本身的办事效率。根据绩效选拔的职业人员逐渐成为英国的文官，他们享有薪俸，受过职业训练，取代了之前那种不拿薪俸未受训练的文官。在城镇中，由选举产生且具有责任感的卫生委员会来履行卫生服务职责，这项工作之前长期以来被自行任命的委员会搞得一团糟。1855 年，议会设立了文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在文官选拔任命的绩效体系中引进了考试。中央各部门都进行了改组，用固定的、统一的标准来维持它们的公正和效率。

这场行政革命的起因是从 19 世纪早期就已开始活动的、深远的历史性力量。其中的 4 种力量尤其重要：工业和城市社会的成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一股混合了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风潮，官僚政府内部产生了一些渴望更多改革的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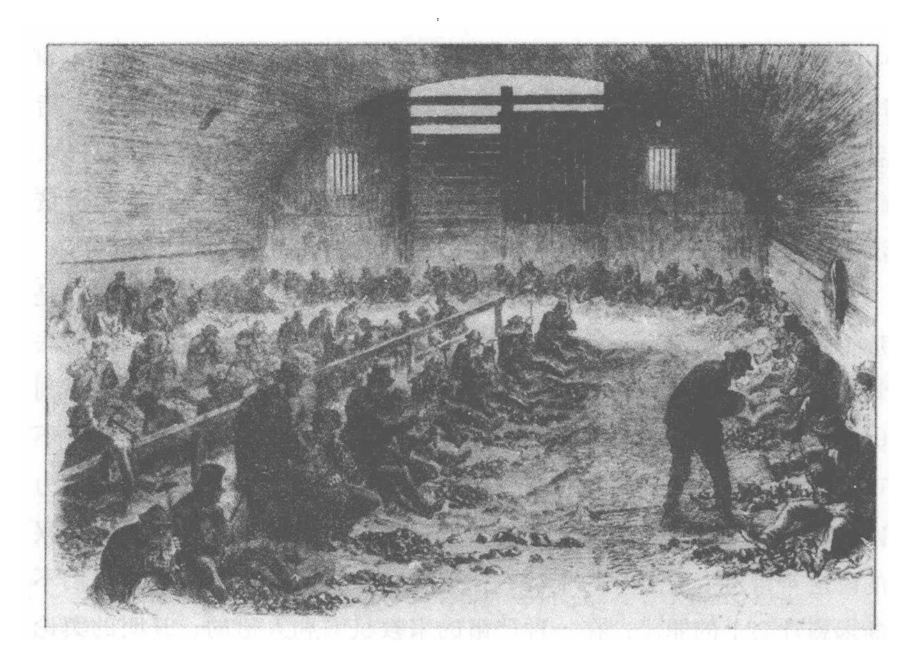
工业革命无疑滋生了很多罪恶。童工和肮脏的城镇从未如此集中、如此明显、如此可怕，就像在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工业城市中的一样。这些城市也产生了富裕的中产阶级和特征明显的工人阶级，他们都不愿容忍这样的罪恶。工人阶级为 10 小时工作日热情奔走，中产阶级成员则资助并组织学会和卫生协会。工业和科学的进步产生了财富和技术——有了釉质的管状下水管道和为矿山通风的蒸汽机——使得容忍这些原有的弊病成为不可宽恕的事情。

城市化的英国也产生了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前者认为将精神病人赤裸裸地拴在木栅栏上和满是坏事情的监狱都不能让人接受的事情；后者宣称教育可以减少犯罪，较明智的贫民救济可以减轻贫困，文明的监狱和疯人院可以改造罪犯、治愈精神病。人道主义的冲动来自于四面八方——福音派信徒、高教会派教士、信奉世界主义的伦敦人、进步的激进主义者。或许最能彻底代表人道主义的就是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他是一个伯爵的儿子，他的父亲很少照顾他，他从笃信的保姆和虔诚的妻子那里找到了福音派信仰的真理和力量。这使他终生都热忱地为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服务，不管他们是工厂、矿山和贫民窟里的孩子，还是恶劣的疯人院里的精神病人和传染病横行的城镇

中的垂危之人。1848 年，他成为综合卫生理事会（General Board of Health）的委员，与埃德文·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共事，后者是理性主义者和边沁的信徒。查德威克书写了《1832 年工厂报告》、590 《1834 年济贫法报告》和《1842 年卫生报告》的大部分。他还是济贫法委员会（Poor Law Commission）的秘书和综合卫生理事会的委员。

查德威克与其他功利主义者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规划。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技术专家、社会工程师，他们为监狱、学校教育、济贫法管理、少年管教所、法律改革和工业训练精心制定的那些计划对福利国家起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福利国家一旦开始，这个过程就绝对不可能停止。经常性的调查暴露出了更多弊端，层出不穷的报告和活力四射的行政官员建议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在这个工业社会中，新兴的阶层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官僚政治时代，行政官员们不断揭露社会上的罪恶；在一种严肃的宗教氛围和人道的、开明的舆论风潮中，要求改革的压力非常大。

福利国家的成长只有部分是政党问题。对于 10 小时工作日、禁止矿场使用童工、新济贫法、监狱和疯人院的改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托利党和辉格党支持和反对的参半。但是在设立教育监察员和支持综合卫生理事会的问题上，情形就不同了。从 1839 年到 1854 年，保守 591 党人对两者都持反对态度。辉格党人在这类新机构上的提案数量也要多于保守党，后者唯一提案设立的新机构是教会委员会。如果根据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来衡量的话，这种现象就是自相矛盾的，拥护自由放任学说的自由主义者是大部分中央集权性质的改革法案的发起人，而支持家长式统治的保守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提案反而是最少的。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托利党的家长式统治是地方性的和私人的，它的基础是私有财产、教会和地方，它们都极为妒恨中央集权，而自由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包含了一种诱人的理想，即政府可以对社会进行改革，从而使受过教育的、健康的、得到了社会关怀的公民可以不再依赖政府。在英国繁荣昌盛时期，如 1848 年到 1879 年，这种梦想并非太不现实。在此期间，资本主义、自愿捐助制度和政府的短暂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贫穷是一种罪恶，要通过砸石块这种繁重的劳动来赎罪。(*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结合，给许多人带来了福利和进步。一个充满了危机和变动的时代过去了，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和平安康的时代。

阅读文献

Derek Beales, *From Catlereagh to Gladstone, 1815—1885*,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作者对研究对象的阐释非常出色，其视角极具独创性和想象力。

Asa Briggs, *The Age of Improvement*,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9. 该书作者是19世纪英国史研究领域的泰斗，他对1780年到1867年间英国的大事的评论充满了智慧；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解释，赞扬了当时新兴的阶级和先进的思想。

Michael Brock, *The Great Reform Act*, London: Hutchinson, 1973. 该书对近代英国最重要的改革做了最好的记述，认识到了改革

背后那些力量的复杂性。

S. G. Checkl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Longmans, 1966. 该书对经济社会史家、人口统计学家、地理学家的许多专门性著作做了睿智的分析，且把这种分析置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政治背景之中。

Derek Fraser,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该书全面、可信、清晰地记述了那些促使福利国家形成的许多特别的改革，这些改革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力量。

Elie Halevy,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Vols. 1—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2. 这4卷著作最全面地记述了1815年至1850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大多数观点都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

K. T. Hoppen,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 1846—1886*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该书是新牛津英国史系列中的一卷。作者用精炼的语言阐释了他的观点，试图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进行分类。对爱尔兰问题作了极好的处理。

Roy Jenkins, *Gladstone* , London: Macmillan, 1995. 该书作者才华横溢，是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牛津大学的校长，作者叙述了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格莱斯顿出的一生，对格莱斯顿赞赏有加，但也不乏批评。 592

George Kitson Clark,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该书分析了促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形成的诸因素；着重强调宗教因素，但也十分强调人口和工业因素。

Norman McCord,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该书仔细、公正地考察了反谷物法联盟，包括它的目的、领导者、组织、中产阶级特性、以及它的策略，正如它的目的是崇高的那样，它的策略是残酷无情的。

E. A. Smith, *Lord Grey, 1764—18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该书是一本感情细腻的、给人启发的传记，讲述了伟大的辉格党首相格雷，他领导通过了1832年的改革议案。

Dorothy Thompson, *The Chartist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该书对宪章运动进行了全面、深刻且具有同情心的阐述，阐述中引入了社会和文化因素。

Joel Wie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4. 该书第1卷和第2卷涵盖了1760年至1870年的历史，收录了一些档案文件，对研究国会改革、慈善、工会和谷物法的废除富有启发性。

第二十三章　繁荣昌盛的时代

5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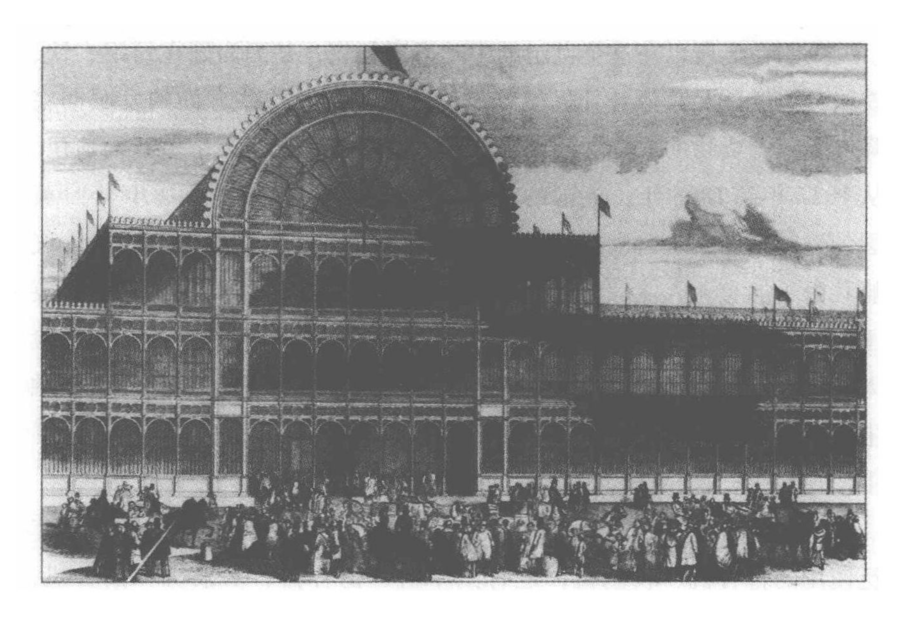
经济繁荣是界定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最重要的事实。《谷物法》被废除，克里米亚战争，《1867 年改革法案》，都是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并未像经济繁荣一样，它们没有改变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英国人民的生活。从 1843 年至 1873 年，英国人安享着经济的繁茂增长，这种增长仅在 1847 年、1858 年和 1867 年短暂的危机中遭到破坏。这是一个富庶的、且愈来愈富的时代。1850 年，英国的五金制造占世界的 40%，棉花和铁的产量占世界的一半，煤炭产量占 2/3。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纪录，但是接下来的 30 年，英国的钢铁、造船和铁路保持着同等水平。到 1870 年，英国产出的钢铁占世界的一半；到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拥有了世界 1/3 的商船；同一时期，英国建造的轮船和铁道占据了世界更大的比例。一位美国代理商说，整个世界“必须从英国获得铁道用铁，因为那里产出的速度非常快，又非常完好”。英国也在化学制品、电器、机械器具、以及建筑上——建造桥梁、高架路、隧道和大厦——都取得了显著进展。19 世纪晚期，英国在自行车、缝纫机和照相机的制造方面也位居世界首位，这是英国不断发展的工业的一部分。1851 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额为 5. 23 亿英镑；1870 年，达到 9. 16 亿英镑。这样的经济奇迹意味着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人均收入达到 32. 6 英镑，同一时期，法国人均收入为 21. 1

英镑，德国为13.3英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丰饶角（cornucopia）。

水晶宫：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丰饶角

1851年，英国丰饶角所产出的无数产品的样本，都可以在伦敦的水晶宫中看到，水晶宫是1851年大型博览会——也是历史上首次世界594 性展览会——的会址。水晶宫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用金属和玻璃建成的大型建筑物。这是一个空气流通、光线充足、优雅迷人的仙境。它的设计师是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一个从园艺家成为温室设计师的人。水晶宫占地18英亩，由34英里的钢管和900000平方英尺的当时能够制造出来的最大的方块玻璃建造而成。使用这批量生产的预制构件，2000名工人在22周内完工。当维多利亚女王于5月1日为展览馆揭幕时，水晶宫内布满了世界的工业品和艺术品。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说，这超越了阿拉伯故事（Arabian romances）的梦境。

在英国本国的陈列品中，最引人的是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工程奇迹。这里有：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纺织棉花的自动走锭精纺机（self-acting mules）；700马力的船用发动机；重31吨的光彩夺目的机车；能够举起1144吨的水压机；各式各样的抽水机、起重机和压力机；隧道、桥梁和汽船的模型；还有不计其数的蒸汽机——这是机器万神殿中的至尊之神。这里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显示了英国经济繁荣的秘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这些惊人的创造物相媲美。这新型的、被改进的自动纺织机依旧为英国提供生产棉线的力量。从1840年到1880年，技术的进步使每位棉纺工人的产量增加了2.5倍，使英国占据了世界棉纺工厂2/3的生产595 力。被改进的蒸汽机、电缆、升降机、抽水机和通风机，导致煤炭产量的大幅增加，煤炭成为棉花的劲敌。1810年，5万名英国矿工产煤1000万吨，一个世纪之后，100万矿工可开采2.87亿吨煤。



水晶宫，1851年博览会的场所，世界上第一座大型金属和玻璃建筑（*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在陈列品中，有一台抽水机是亨利·贝西默（Henry Bessemer）设计的，他是一位与钢铁工业没有关联的发明家，但却使钢铁工业发生了革命性进步。1856年，他改进了吹风的程序，不再向外围吹风，而是直接吹向熔化的金属，因此提高了金属的热力，使其更接近液态，从而更容易控制其中碳的比例，更容易把金属炼成钢，且造价便宜。在伯明翰工作的查尔斯·威廉·西曼斯（Charles William Siemans）和皮埃尔·马丁（Pierre Martin）又分别于1864年和1871年进一步改良了炼钢程序。到了1870年，英国的钢铁产量占世界的一半，产煤量也占世界的一半。

贝西默和马丁—西曼斯炼钢程序不能用于磷含量丰富的矿石。1878年，两个威尔士人，西德尼·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Sidney Gilchrist Thomas）和他的表兄西德尼·吉尔克里斯特（Sidney Gilchrist）发明了可以用于冶炼磷铁矿石的炼钢程序。因此，这使磷铁矿石非常丰富的法德两国可以与英国在钢铁业中进行竞争。

英国在之所以在这个世纪的中叶遥遥领先，是因为她在纺织、铁、铁路、造船以及其他各种机械方面的惊人创新。这些方面的发明彻底降低了英国货物的成本，使她在航运和造船业中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从1837年到1865年，英国的汽船产量增加了12倍。到1870年，英国创建的轮船航班占世界的一半，生产着几乎全世界的航班所需的气船。由于拥有无人能敌的商船队、帝国和工业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英国在世界市场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她作为全世界银行家和保险人的支配者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伦敦市是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产生了数量更加庞大的、也更持久的财富，胜过“世界工场”中的煤炭、棉花、铁和船只所产生的财富。

博览会还包括了应用于农业的展品。代表性的有这个时候已经广泛使用的打谷机、收割机，还有割草机、扬谷器、切根机和播种机，后面的4种机器要用笨重的、力量很大的蒸汽拖拉机牵引。博览会上不太引人注目、但同样实用的展品是一种大批量生产的有孔排水管，用它在黏性非常强的英国土壤中排水，极大地增加了可以利用的可耕地数量，因而提高了农业产量。新的机器、排水装置、化学肥料和改良了的畜牧业创造了新型农业，产量颇丰的农作物给农民带来了固定的利益，给地主带来了足够的租金，给普通人民带来了便宜的食物。这个时期真是高效施肥农业的黄金时代。

对一个敏锐的经济学家来说，水晶宫东大厅的尽头能给他提供英国繁荣的第三条线索。这里的展品代表了英帝国的产品。东印度公司的展品令观光者神迷，特别是那颗重186克拉的科伊诺（Koh-i-Nor）钻石。铜制和竹制的物品展现了几十年来的时尚，手纺车揭示了印度的落后以及对棉花的需求。在印度，和中国一样，手纺车无法和兰开夏最新的自动骡机相媲美，四轮马车和舢板也绝不可能比得上铁路和汽船，后者是交通运输的奇迹，它们将英国的制成品带到这些最遥远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1840年鸦片战争为英国贸易打开了中国大门。印度早已是英国独占的地方。1875年，英国购买了苏伊士运河，随后又控制了埃及。英国修建的铁路、供水系统、海港、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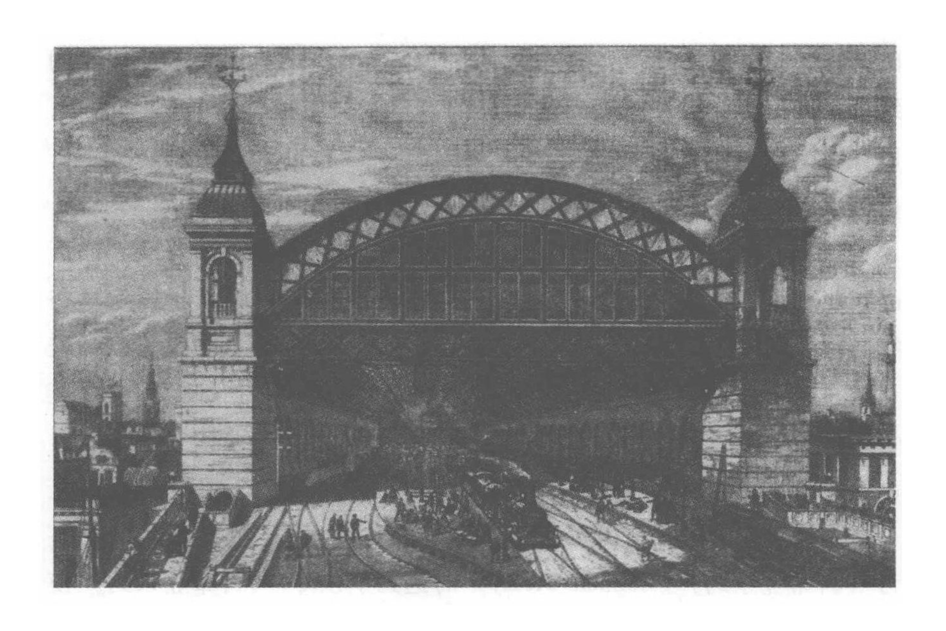
596

的纺织品、金属制品和英国的资本很快使英国在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中占据了优势。英国向南美洲的出口和投资成倍增长。1871 年，向英帝国内其他地区的出口要占英国出口总量的 23%；到 1877 年，占 5%。真是一事顺利，事事顺利。

在水晶宫内的帝国展品和水晶宫中心之间的地方陈列着欧洲的产品。1851 年的时候，英国已经不再惧怕欧洲国家了。1846 年废除《谷物法》，1849 年废除《航海条例》，英国宣布她信仰自由贸易。欧洲进口的货物越多越好；因为这只能给货物生产者英镑，让他们用这些英镑购买源源不断地流出国门的英国货物。英国繁荣的第四个原因是自由贸易的推进。从 19 世纪 20 年代削减关税和 19 世纪 40 年代皮尔进一步削减关税开始，自由贸易所向披靡，到 19 世纪 60 年代和法国签订《科布登条约》（Cobden Treaty）时达到了顶峰，《科布登条约》使英国对法国的出口到 1870 年时翻了一倍。博览会中来自世界各国的货物展品就是自由贸易的丰碑。



富人们拥挤在水晶宫观看一个空前繁荣的奇迹（*Guildhall Library, Corporation of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气势宏大的火车站成为这个时代新的殿堂（*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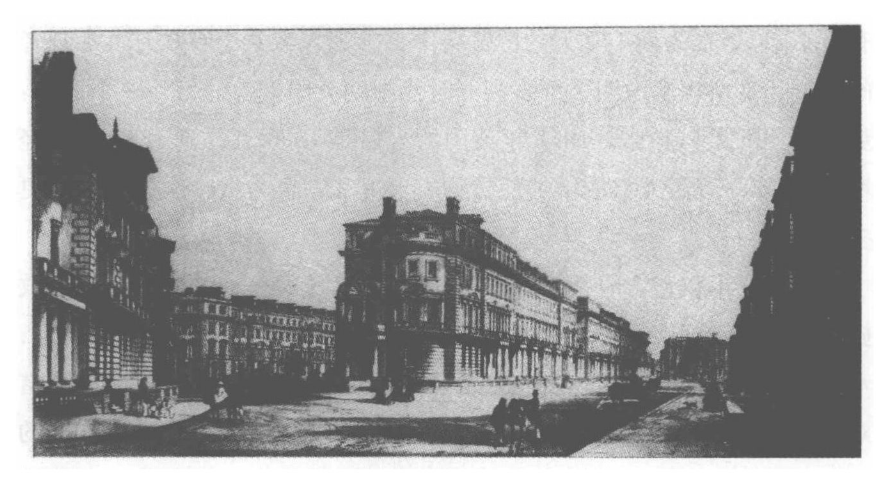
597　黄金在博览会的展品中是常见的展览项目，不论是在珠宝、金属器皿展览中，还是在令人难忘的金块展览中。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人类就崇拜黄金。在《1844年银行法》（Bank Act of 1844）中，议会要求英国银行以其库存的黄金作为扩张和紧缩钞票的依据。其他国家也把黄金作为发行货币的基础。因此，当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被发现后，货币的数量剧增。有更多的人口袋里的钱多了，有能力并愿意设法购买更多物品。因此，从1848年到1873年，整个世界的物价都上涨了。当然，英国还有其他不以黄金为依据的货币形式，比如支票和汇票，在这个经济扩张的十年当中，这些票据发行量的增加也使购买力增强了。旺盛的购买力反过来使销售额上升、价格上涨、利润丰厚、自信倍增、投资扩大、经济更加繁荣。

博览会的票价是1英镑、半克朗或者1先令（一周内每天的票价

有所不同），在为期 140 天的博览会中，参观人数共有 600 万。参观者的数量和富裕程度说明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繁荣的另外一个原因：势不可挡的人口膨胀。1811 年英国的人口是 1000 万，到 1881 年已经增加到 2600 万。人口的增加使货物需求上涨，也为货物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

博览会不仅包含着揭示英国繁荣之因的线索——工业优势、高效施肥农业、帝国市场、自由贸易、黄金的发现和人口的膨胀——而且，水晶宫中陈列的各种古怪稀奇产品也显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财富对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三种意义深远的社会进展中看到：交通运输的革命、城市化、消费品的激增。 598

交通运输的革命将以前被独立的地区和各郡——甚至与世隔绝的教区——所分隔的社会连接成一个整体。铁路是博览会的核心展品之一，也是这个时代的奇迹，它深刻地改变了生活。1850 年，铁路列车的承载的旅客周转量是 6740 万；到 1879 年，这个数字就是 4.9 亿了，这种增长速度意味着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迁移、可以变换工作、走亲访友，可以去乡村。铁路还把伦敦的报纸杂志带到外省，把戏团、演说家、音乐会钢琴家、官僚和律师带给他们。他们带回伦敦的是外省的工会代表、政客、商业代理、食物和制成品。沿海航线和大河中的汽船也推动了交通运输的发展，把便宜的煤炭带给那些原先冰冷的公寓和住宅。1838 年的“大西方号”（*Great Western*）是第一艘完全铁制汽船，也是第一艘用螺旋桨驱动的汽船；到 1870 年，这样的汽船将英国的货物和乘客带到全球各地，其中有些乘客一去不复返：从 1853 年到 1880 年，它们运载了 250 万移民前往新的家园。汽船也从国外带回了世界工场所必需的原材料和食物。到 1870 年，英国一半的肉类、羊毛、乳制品，一半以上的粮食，所有的原棉，都从国外进口。交通运输在每个地方都发挥着作用，在任何地方它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繁荣的关键。



肯辛顿公园地产，新的伦敦西区的地产之一，这里曾是富人居住的地方
(*The royal Borough of Kensington ε Chelsea Libraries and Arts Service*)

599

追求安逸：维多利亚时代社会

交通运输的革命是城市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居民的国度。1851 年，有 54% 的人居住在城区；到 1870 年，达到了 70%。伦敦的郊区发展最快，1861 年后的 20 年中，人口翻了一倍。到 1900 年，5 个人中就有 1 人居住在规模更大的伦敦。其他城市的人口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正在向郊区迁移的中产阶级也只能部分逃离城市，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旧在城市工作，所有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着城市文化。生活严肃的人出没于戏院、歌剧院、音乐会、公共演讲，参观图书馆、博物馆；生活不太严肃的人则在餐馆、宜人的花园和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音乐厅中寻找乐趣。音乐厅里有耀眼夺目的煤气灯、幽默的讽刺短剧、美酒佳肴、优美的流行音乐，很快便受到人们的青睐。喜好运动的人去观看板球和足球，罪恶的人去逛妓院，喜好暴力的人去看拳击比赛，贪杯的人去酒吧和啤酒屋。还有公园、动物园、令人难忘的宏伟建筑和公共纪念馆。但是，城市的主要吸引力向来在于工作，有些工作有相当高的报酬和薪水。

那些有足够的好运气能得到这种工作的人可以买一栋意大利风格



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富丽堂皇、豪华排场、杂乱无章、奢侈浮华。托马斯·曼·贝恩斯（Thomas Mann Baynes）（1794—1854 年），英国人，“哥特式客厅”，创作于 1850 年左右。画在纸张上的铅笔水彩画，其规格为 39.4 × 52.1 厘米（*Mallet Gallery,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的半独立的别墅，或者在靠近郊区的地方买一幢四五层高的豪华的联立式房屋。联立式房屋侧面的墙壁和邻居家的侧墙毗连，地下室有整齐的厨房、食物储备室、酒窖；第一层为大厅、餐厅、客厅和图书室；以上各层是一大家人的卧室和仆人居住的阁楼。1850 年，英国有仆人 348000 个，1870 年，有 130 万。在伦敦，每 15 个工人中就有 1 个是仆人。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需要两三个仆人，就像如今的郊区居民都需要脱水洗衣机和洗碗机一样。房屋的背后是一个宜人的花园。这样的住宅在英国并不新奇，但到这个时候数量非常多，这是中产阶级人数爆炸的结果，也是善于投机的建筑商的活力和创造力的成果。

工匠阶层的住房发展也呈扩张趋势。他们的住房不像“暴发户”（*nouveau riche*）的别墅那样排场，而是简单的两层式排房。这种房

屋通常有四个房间，上下各两间。房子不是很宽敞，也没有华丽的装饰，但是如果收拾整洁的话，也是很不错的住处，比好多工匠原先住的那种廉价公寓要好得多。房屋带有厨房，里面有铁制的炉子，前面的房间里有壁炉，或许还有个沙发，几个芦苇做的椅子，一张结实的餐桌，楼上两的房间都有床——所有的陈设都很简单，但是与农业工人居住的那种狭窄简陋的小房子或者廉价公寓里那种拥挤的单人房间相比有天壤之别。工匠们的小楼里既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装着热水设备的浴室——不过，伦敦郊区的富人住宅里也没有这样的设施。富有的伦敦人到了19世纪90年代才有了抽水马桶，但是很少有人能有舒适的浴室。对于工匠们而言，厕所在屋外，洗澡在大浴盆里，或者在公共浴室和洗浴室中。公共浴室和洗浴室遍及城市化的英国，像公园、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成为城市生活的新型幸福源泉之一。

600 从1850年到1870年，大多数城镇都未能利用议会赋予的权力来消除他们所在城镇中的污秽和肆虐的疾病，结果死亡率几乎没有下降：在伦敦，甚至从21‰上升到了24‰。不过，到了19世纪80年代，公共卫生服务已经成为地方市政府中效率比较高的部门了，卫生状况的改善得到了保证：道路铺平了，打扫干净了，并用煤气灯照明，普遍修建了下水道，纯净的自来水流向了更多的家庭。同时流向这些家庭的还有日常的消费品。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丰饶角如果不能生产家具、服饰、金属器具、陶器、小饰物、食物、酒、烟草，就丝毫不能施展它的本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的客厅有“社交型”沙发和“面对面”的沙发，都装了很好的软垫；有日本式的多边茶几；精致的壁炉架上搁着华丽的钟表。餐厅有最新式的餐桌，带有可以延长的活页，雕刻精美的桃花心木餐具柜，里面摆放着来自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陶器厂的各色器皿。藏书室里铺着华丽的地毯，挂着厚重的帷幔，精心制601 作的书桌上摆放着很多用来分书的小格架，还有带圆形弹簧的包皮座椅，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发明，成为中产阶级崇尚享乐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个时代也崇尚舒适。有些图书室里有舒适的角落或者炉边高背

长椅，旁边摆书的书架，饰以些许饰物和小古董。这些表面看起来都很昂贵，事实上并不一定。看起来富丽堂皇的家具上的装饰性外表往往是用纸（*papier mache*）装潢的。大批量的生产模式已经开始应用。有些天花板上细致入微的雕刻其实是用橡胶（*gutta percha*）浇铸的，这是一种来自马来亚橡胶树（Niato tree）上的材料，在沸水中会变软，在室温中又会变硬，看起来和木材一样。家具上也经常用它来模仿名贵的木雕。当然，人们的喜好并非无可挑剔，不同地方、不同阶级都有差别，甚至前后十年也不一样。富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欢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设计，常常认为比较折中的风格更加气势雄伟。

卧室也力求舒适。用黄铜和铁制成的床架是点缀的中心，夜壶上有华美的装饰，洗濯臀部低浅浴盆可以用水罐注水。19 世纪 90 年代之后有了抽水马桶和带有热水管道的浴室。卧室里厚重的桃花心木制衣橱有华丽的雕刻和装饰，衣橱里衣服塞得满满当当，因为富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很讲究穿着。妇女的衣服很多。有白天穿的衣服，也有晚礼服，衣服设计精心，有带骨架和垫衬的紧身胸衣，缀有很多刺绣的花边。户外的衣服是短上衣和披风，以及羊毛、天鹅绒和薄细棉布制成的外套；帽子有斗篷式的、褶皱式的和闪色丝绸的，手套有小山羊皮制的、小鹿皮制的和细羊毛的。追求人工雕琢的美，而不是崇尚舒适，这决定了妇女的服装风格。紧紧束在身上的蕾丝胸衣和大大的花边衬裙塑造出来的形体活像一个沙漏——高胸、细腰、张扬的裙子——这样的美丽优雅是以健康、舒适和灵活性为代价换来的。在 19 世纪 50 年代里，花边衬裙被硬衬布衬裙取代，后者用盘成笼子般的细铁丝把裙子撑起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完全被关在笼子里——但是男子则不然。他们的衣服以舒适为目的。无论是白天穿的双排扣礼服大衣还是晚上穿的燕尾服，他们一般都穿黑色的。颜色和样式只体现在背心或者马甲上，即使这些讲究后来没有了，人们习惯于用同样的布料裁剪上衣、背心和裤子。亚麻衬衣上的荷叶边也被丢弃了，领子改低了，领结向比较窄的领带靠拢。这种服装暖和且舒适，但是它的颜色深沉庄重，很适合律师或者忙于赚钱在郊区买别墅的商人穿。

602



用丝带系起来的紧身胸衣让她们拥有纤细的腰身，衬裙把整个裙子撑了起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工匠家里的家具、服饰、瓷器和厨具无法和别墅里的相提并论，但是他们也在追寻同样的舒适安乐，他们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丰饶角溢出来的东西中获益，使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从未知晓的高度。很多人，但绝对不是所有人，从英国经济的极度繁荣中受益匪浅。从1850年到1870年差距拉大了，就像从1800年到1850年的情况一样。1870年，只有0.48%的人拥有全国26.3%的收入，10%的人拥有全国收入的50.6%。这10%包括殷实的中产阶级，制造业者、大商人和收入在150英镑到3000英镑的职业人员。在他们之下是收入在60英镑到150英镑之间的中产阶级下层，包括职员、布商、经理人、售货员和会计师，再下面是熟练工和半熟练工的世界，如收入90英镑的珠宝工匠和器械制造工，收入70英镑的刀剪工匠和玻璃工匠，收入50英镑的火车司机和棉纺工人。在1868年至1873年经济繁荣之前，熟练工和半熟练工的收入一直落在中产阶级后面，直到这时，他们的实际工资才涨了将近25%。1873年之后，世界粮食和原材料价格

急剧下降，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19 世纪 70 年代也是技术工匠的时代。尽管他们的住宅越来越暖和，人口的拥挤程度降低，家具数量日益增加，但是一般情况下仍然是阴沉灰暗的。到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廉价的有轨电车和铁路使更多雄心勃勃的工匠离开城市前往郊区——住进有五六个房间的排式住宅中，其中的许多住宅装有别墅中才有的抽水马桶和浴缸。但是社会中更低的第四阶层无法享受这些便利的生活设施，他们有时候被称作“残余阶层”（*residuum*）。



穷人的生活简单、拥挤、凄惨（*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Pictur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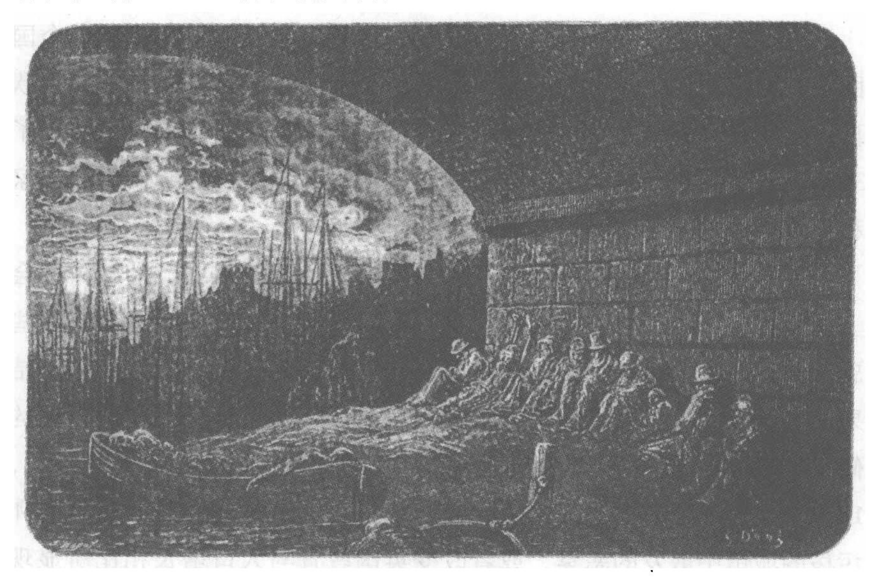
残余阶层数量庞大，成分复杂，特别是在伦敦。19世纪中叶，它包括每天只工作部分时间的劳动者、失业的人、不能受雇的人、工资微薄的工人、街头人士——包括沿街叫卖的小贩、毒品小贩、捡破烂的（年老的、得病的、孤儿）、小偷和娼妓——从字面意义上看，他们是社会的残余。他们住在贫民窟里——有些以最低的工资为生，有些依靠微薄的救济金，有些靠施舍和乞讨，很多人则靠在603垃圾堆里捡食物或小偷小摸为生。他们住的房间很糟糕。在格拉斯哥，有将近1/3家庭是全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有时候一个屋子里住着10个人或15个人，有些人住在没有窗户、只能在稻草上睡觉的屋子里，警察们认为这样的屋子连猪都不能住。在利物浦，有1/3的家庭住在地窖里；在伦敦，每天都有80000人购买每晚或每周的票在又脏又不通风的宿舍中寻得一张床位；运气更坏点的要在桥洞或铁道的拱桥下面过夜。在伦敦，大多数工人挤住在曾经是漂亮的别墅、如今是失修的被进一步隔开的房间里，还有的人住在灰暗阴604沉的廉价公寓里。在这些拥挤的房间里，家具稀少、没有自来水管和下水道，住在其中的居民几乎分享不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财富，而他们数量却占全国人口的1/4以上。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许多忙于布置自己别墅的人对这些贫民窟漠不关心，就像他们对街上的污水池、坑坑洼洼的街道、工作过度的童工和失业的困境一样无动于衷。他们把儿童从矿场和工厂里清理出来后，就忘记了在裁缝店和专门为别墅里的妇女缝制裙子和漂亮服饰的妇女用品商店里，很多儿童每天工作12、14、甚至16个小时。

他们也几乎没有为穷人做什么事情。1858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868年再次发生，这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稳定。在那些经济萧条的年份里，失业的职员和工匠发现他们正滑向被剥夺了应有权利之人和无家可归之人的行列。很多零售商和小制造业者面临着破产以及贫穷的奇耻大辱。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并非像那些堂皇的别墅和厚重家具的所表现的那么可靠。无数郊区居民勉强维持

着富有的门面，每年 80 或 90 英镑的收入要精打细算，尽管如此，他们明白深渊——城市贫民窟——就在脚下。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繁荣所产生的郊区，不但没有把各阶层联结起来，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分化。郊区不仅把别墅里的银行家与工匠屋棚里的印刷工匠或机械工人分隔开来，而且分隔了郊区的工匠与普通工人和残余阶层。在某种意义上，铁路、有轨电车、廉价货物和商业贸易将英国连成一个整体，将康沃尔、诺森伯兰与伦敦连接起来，将 605 消费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新的交通和新的制造业又使社会碎化了，把各个阶层分散在成分复杂且具有排他性的邻里当中。这似乎成为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肥沃土壤，这种阶级斗争于 1849 年和 1871 年撕裂了巴黎，引导德国工人去拥抱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没有发生阶级斗争。相反，英国虽然有严重的不平等和对下层的严重忽视，却产生了一种社会共识。



最悲惨的莫过于无家可归。由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雕刻

(*The Ancient Art & Architecture Collection Ltd.*)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共识

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未能争取到英国工人。从1842年宪章运动的革命暴动到1910年工团主义者的罢工，这期间，处于静态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对他们的雇主产生威胁。中产阶级甚至不再谩骂贵族。如果马克思听到中产阶级颂扬贵族是英国天然的统治者，看到工人们效仿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立自强，他或许会感到沮丧。虽然不免有紧张和敌对，但当时的确衍生出一种社会共识，一种阶级调和，它的确使人们对作为社会根基的基本价值观产生了相当重要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奇迹，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丰饶角是一个经济奇迹一样。当然，社会共识的出现主要得力于经济奇迹，因为经济繁荣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大厦的四大支柱中最重要的一个。其他的三大支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维多利亚时代的无数种慈善事业、以及自立和恭顺的文化。

关于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的很多内容前面已经作了交代。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在1851年到1881年几乎翻了一倍的国家可以令很多人欣喜，特别是在富人更富、工人阶级也更富（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5%）的情况下。残余阶层确实遭受了苦难，但一个更有作为的国家和慈善机构采取行动缓解了他们的困苦。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央政府开始积极采取行动减少社会上的罪恶，当然它的权力有限，措施也不完善。不过，中央政府那些忠于职守的官僚和热心的改革者仍然在敦促政府进一步向前发展。结果通过了一些改善城镇的地方法案和一些改革工厂、监狱和疯人院的修正法案，给初等学校大量拨款——与1847年的10万英镑相比，1862年拨了84万英镑——但是他们远不能根除对童工的普遍剥削和污秽的城镇中散发的恶臭，或者改变英国教育与人口增长相比所显现出来的匮乏。这是一个迟钝和冷漠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格莱斯顿于1860年宣布“反对改革”。多数城镇政府在改善下水道、街道、排水沟和供应自来水方面行动迟缓，而且死亡率仍然很高：长到5岁的英

国儿童有1/4夭折，其中大多数是城市中的儿童。1866年，议会最终通过了一个卫生法案，强迫地方当权者运用他们的权力清洁城镇，1871年，议会设立了地方政府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Board），赋予它监督地方卫生理事会和济贫法公会的权力。《泰晤士报》宣布卫生事业的新时代到来了。 606

1867年，也就是第二次议会改革法案通过的这年，预告了10年的社会改革。《1866年工场法案》（Workshop Act of 1866）将儿童从50或50人以上的工场中清理出去，而1874年和1878年的《工厂法案》（Factory Act）则规定所有工厂工人每周工作56.5小时。星期六下午不用工作，法定的假期增加了，工厂更加安全干净了。议会还废除了《主仆法案》（Master and Servant Act），该法允许雇主将顽固反抗的工人拖到治安法官跟前，在那里他即使不被监禁，也会被罚款。议会也通过了《1871年工会法案》和《1875年工会法案》。这两个法案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保证工会基金免予民事诉讼，确保他们进行和平纠察的权利。地方政府委员会也允许济贫法公会向济贫院之外有劳动能力的人发放救济金，推动他们改善为数众多的工人所依赖的医疗服务。1861年，英国有81%的医院病床在济贫院里。新的福利国家——尽管还是有限的——如今愿意治愈疾病，帮助穷人了，不再只是惩罚他们了。

议会还决定国家应该补充和增加非官方的教育投入，以培养5到10岁的儿童。《1870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 of 1870）规定，凡是学校数量不足的地区，地方学校管理委员会（local school board）都要用税收创办一个初等学校。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自愿设立的学校不予废除。议会仍然给他们大量拨款，这样就有了两套学校体系——一个是完全靠地方税收和学费维持由地方学校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学校，另一个是靠学费、捐款和中央政府拨款维持的教会学校。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学校里的宗教课程不能包括“教理问答或教义条规”，而接受中央拨款的教会学校必须对那些不信这种信仰的学生以及那些父母反对这种信仰的学生免除宗教课程。作为妥协，仍然允许英国国

教——国家给予它极大的资助——教育英国绝大多数儿童。这是一种不温不火的妥协。直到1880年，学校教育才成为强制性的义务，1891年不再收学费，1902年才有了一套公立中等教育体系。英国国教在初等教育中占支配地位，就像它控制着中产阶级的语法学校和上层社会的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那样，这不仅强化了英国国教会的作用，而且把原先很多非国教徒拉拢进来，所有这些都增强了英国国教的社会认可度（consensus）这种认可度本来已经很高。但是这注定了工人阶级中的很多人要忍受数年的糟糕教育，过着孤独的分离的生活，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对慈善事业的依赖就更加严重，而慈善事业是维多利亚社会大厦的第三根支柱。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慈善事业范围广阔、种类繁多。慈善机构分发的救济物要超过公共救济。不管是由理事们资助和管理的慈善机构，还是由社会团体运行的慈善机构，都涉足甚广。他们在城镇的广场上建造了引水器，给女仆们分送《圣经》，启动全国的救生艇事务，为已退休的女家庭教师建造住所。他们资助的学校多达3000所，从最差的教会学校到牛津最好的学院，为大多数英国的男孩和女孩提供教育。在伦敦，大约有600个慈善机构努力通过教会、洗浴室、医院和妓女收容室（伦敦有30家，专门援救妓女）让人们脱离不贞、堕落、疾病、肮脏和罪恶。其他的社会团体努力改革法律、改善监狱、建设模范之家、保护动物、确保大多数虔诚的人遵守安息日。最后，慈善机构设法减少赤贫，要么施舍乞丐两个便士，为老人提供济贫院，要么由地区慰问团每周发放补助金。

607

善行义举的大量迸发到19世纪60年代达到了炽热的程度。其迸发的原因可以用三个事实来解释：城市化、经济繁荣和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城市集中了社会中的罪恶，使它们变得具体而可怕。饥饿难耐的孩童、令人怜悯的老人、烂醉如泥的妓女、粪臭冲天的院落，霍乱的威胁，这些不可能被轻易地丢弃。一个兼任下水道委员会委员、反对庞大政府的富有的城市银行家，是不会用立法的方式解决上述问题的，而是设法资助孤儿院、老人济贫院、妓女收容所、模范之家计

划和洗浴室。一大笔捐款能够减轻拥有大量金钱的负罪感。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富裕制造业者把5英镑钞票投向济贫募捐箱时说："做好事真奢侈啊!"

这个制造业者还说这样做让他"感觉很好"。毫无疑问确实是这样。但是这算"做好事"吗? 当时的财政大臣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宣称这种慈善行为助长了欺骗和狡诈，引诱人们脱离工作。英国的慈善事业的确有点随意，很多施舍都不加选择。为了补救这些缺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慈善家们于1869年成立了慈善组织协会(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目的是要在施舍时弄清原因和轻重缓急。它的建立有3个前提假设：个人应该为贫穷负责，不加区分的救济败坏了穷人，国家的救济是不加选择的。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说明这些前提假设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慈善事业并不能应对经济危机和城市的贫穷。例如，慈善机构用30年时间来建造模范之家，共建成25000个，却只能满足伦敦6个月的发展带来的需求。慈善事业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但它的慷慨救济的确能减轻大量残余阶层成员的困苦。要想长久分享维多利亚时代的收成，办法不是乞讨、拾荒或者济贫院，而是自立。

城市化的、资本主义的、提倡自愿的英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上进的机会。它为有雄心的人创设了一系列机构：机械研究会、科学协会、禁酒协会、进步协会和辩论会。它还产生了图书馆、阅览室、书摊，里面有蜂拥而至、源源不断的便宜报纸、杂志和书籍。知识水平日益提高的人们在印刷世界中培养出了娱乐与获取知识的饕餮胃口。那个时代的口号就是自我完善。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中，能够上进之人也包括了提高了技术的工人、学会了清算账目的职员、进行自学的律师、变成了建筑师的泥水工、当上工头的纺织工人。自立也引导工人们组建了互助会和工会。 608

有400万工人参加了互助会或丧葬会。丧葬会保证了工人们有体面的葬礼，互助会既保证葬礼也援助生病的工人。后者还举办宴会、庆祝会，进行游行，这些都为工人提供了欢乐、友谊和自豪感。1884

年，大约700000人加入了由消费者自己持有和运营的合作商店，从而建立了一个类似互助会的团体。合作商店犹如储蓄银行，培养了节俭的风气。到1887年，这类银行有160万储户，大部分是上层工人阶级。

工人们为了增加他们分享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参加了工会。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运动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工会的发展更能为工人谋取福利的。工会的历史要追溯到18世纪最初的10年，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它的失败仍然多于成功。1850年以后，工会才确立了自己作为新工业社会恒定成员的地位。工会中领头的是技术工人，特别是木匠和英国称之为工程师的工人，包括制造修理机械的工人、操控机械的工人和造水车的工匠。玻璃工人、镀锡工人和冶铁工人也像木匠和工程师一样，组织起来全力以赴争取提高工资，降低工时，避免罢工，充实工会财力，以及雇佣能干的管理人员。工会管理人员顺利地对1867年工会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rade Union of 1867）施压，使它发布了一个公正的报告，一定程度上对工会主义有利。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繁荣带来了数量更多的工会，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委靡时期，很多工会瓦解了。非熟练工人一直要到19世纪90年代或者更晚的时候才组织起来。

工会的领袖们都是能自立并有独立性的人。他们有教养，而且恭顺。恭顺和自立的结合创造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共识的准则。这种准则将商人和工人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自由党的基础。

自由党的形成

1859年6月6日，290名辉格党人、皮尔派和激进派下院议员在伦敦圣詹姆斯街的威利斯寓所（Willis's Room）开会。当帕麦斯顿勋爵（1855—1858年担任首相）扶着他的政敌约翰·罗素勋爵（1846—1851年担任首相）走上讲坛的时候，他们发出了愉悦的欢呼声，因为这标志着辉格党不同队列之间的相互靠拢。当威廉·伊万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的副手西德尼·赫伯特（Sydney Her-

bert）与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双双登上讲坛的时候，他们再次欢呼，这表明皮尔派的大将和激进派的先锋都将在帕麦斯顿的麾下服务，而他们两人向来讨厌帕麦斯顿的沙文主义和轻浮作风。当他们四人宣誓在一个联合的自由党内共同行动时，与会的人又一次欢呼。他们的欢呼声承载着希望，希望一个联合的党能结束长达 13 年的政治混乱。这种混乱状态从 1846 年到 1859 年支配着英国政治，它起源于两种政治事实：第一，格雷勋爵的政府（1830—1834 年）、墨尔本勋爵的政府（1834—1841 年）和罗素勋爵的政府（1846—1851 年）不是只代表辉格党，而是代表着一个由辉格党人、激进派和自由派杂糅而成的联盟；第二，保守党已经因《谷物法》分裂了。当时的枢密大臣查尔斯·格伦维尔（Charles Greville）说："政党的末日到来了"，这种评论令人回想起乔治·坎宁当政的时候弗朗西斯·普莱斯对政党的看法。

609

但是历史的时钟绝对不可能往回走。从 1832 年到 1846 年，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已经开始慢慢地尝试发展政党组织机构。在议会中，格雷和墨尔本已经将辉格党人、改革派和激进派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以承诺改革为基础的议会自由党，而皮尔则将分裂的托利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了议会保守党，它以现代保守主义原则为基础，这些原则能够吸引中产阶级。政治家们早已洞悉不能赢得议会多数的政府就得垮台，而没有议会党就不能赢得议会多数。

他们还懂得了议会外的政党组织有助于大选获胜。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各家族和选区选民协会的全部选举工作都由付给薪水的党派代理人来协调，受雇的地方代理人负责登记选民和管理选举工作。保守党人也在伦敦设立了卡尔顿俱乐部（Carlton Club），辉格—自由党则设有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双方都对报纸进行控制，希望能够影响舆论。两个全国性政党已具雏形。两个政党也反映了——虽然很粗略——不同的态度、传统和利益。数十年来，选民们已经看惯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标语，听惯了他们的花言巧语。辉格和托利党家族之间的对抗也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了。另外，英国似乎越来越分裂为

两个社会，一个是旧式社会，一个是新式社会，前者以乡村地主阶级、古老的贵族、英国国教、军队为基础，后者以商人阶层、城市文化、不从国教和职业阶层为基础。政治混乱的确是19世纪50年代标识，不过这种混乱发生于正在萌芽的政党制度内部。

从1846年到1859年，有6个内阁统治过英国。1852年和1858年的两个保守党内阁，均由德比勋爵领导，是少数党的内阁，它们之所以能够继续，是因为辉格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内部存有分歧。1852年，保守党赢得了290个席位，辉格—自由党得到了319个席位，皮尔派有45个席位。皮尔派在1846年之前都是忠实的保守党人，如果他们能够加入德比内阁——德比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放弃了恢复《谷物法》的希望，那么两党制度将会在传统的界限上得以恢复。皮尔派里有皮尔领导的保守党内最能干的人，该派拒绝加入德比内阁。他们不能忘却迪斯累利领导的那些人曾推翻他们敬爱的领袖，就因为他废除了《谷物法》。他们对改革也很感兴趣，如果不是对改革穷人的状况感兴趣，也肯定是对改革克里米亚战争的溃败暴露出来的那些迫切需要改善的机构感兴趣。皮尔派的分离给在保守党内造成了人才的真空，这使迪斯累利有机会成为保守党在下院的领袖，并在1852年成为财政大臣。皮尔派中的某些人，像格莱斯顿，不愿意和一个他们认为是没有道德的冒险家共事。政治上的创伤，就像那些妒忌的情人的创伤一样，很深，愈合很慢。

610 1852年，德比勋爵成为首相，大部分原因是高傲的皮尔派再也无法忍受约翰·罗素勋爵庸碌无能的内阁。他们的投票让罗素内阁垮台，就像一年后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让德比内阁垮台一样。1852年12月，唯一的可行之道似乎就是最有能力的辉格党人和皮尔派组建一个联合内阁。从1852年12月到1855年2月，皮尔派的阿伯丁勋爵出面主持这个人才济济的内阁。这个内阁在处理内政方面效率很高，但是在外交方面不仅错误地卷入了克里米亚战争，而且对战争领导不当。舆论对这些严重错误的抨击打倒了皮尔派、辉格党人和自由派组成的阿伯丁联合内阁。果真应验了迪斯累利的话："英国人不喜欢联合。"

但是谁来统治呢？问题的答案——帕麦斯顿勋爵——令许多人大吃一惊。迪斯累利惊呼："一个骗子，完全没有用的糟老头。"布赖特附和说这是个"骗局"，他不喜欢帕麦斯顿的轻浮。帕麦斯顿确实有些轻浮，但他不是骗子。作为阿伯丁勋爵的内政大臣，当他的同僚们犯了愚蠢而严重的错误之时，他却表现出活力和效率。他的胜利也让公众感到高兴，他们将他当作约翰牛的化身。帕麦斯顿一直统治到1858年2月，这个时候议会否决了一个法案，该法要求对卷入外国阴谋的英国公民予以处罚，帕麦斯顿因此被赶下台。是年1月，一个名叫奥西尼（Orsini）的意大利人向拿破仑三世投了一颗炸弹。炸弹没有炸死拿破仑三世，却招致他要求帕麦斯顿通过一个法案，处罚任何参与此类阴谋的英国公民。帕麦斯顿答应了上述要求，可他的批评者的沙文主义情绪比他还厉害，他们不仅挫败了法案，而且推翻了政府。德比、迪斯累利和保守党人又作了一年少数党的看守政府。一切都变幻不定。政党的界限似乎不再按照思想意识来划分。比如，德比很热心地邀请帕麦斯顿加入保守党，而迪斯累利则自愿让詹姆士·格雷厄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去领导下院，如果格莱斯顿能加入保守党的话。格莱斯顿非常不喜欢帕麦斯顿的沙文主义，更厌恶迪斯累利的机会主义。他像哈姆雷特一样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犹豫不决。约翰·布赖特也对帕麦斯顿怀有敌意，同样摇摆于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有了这样意志坚强、思想独立的领袖，就不可能有两党制度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1859年6月6日，在威利斯寓所里，当辉格党人、皮尔派、激进派和自由派的领袖们走上讲坛的时候，那290名下院议员才要大声欢呼了。

格莱斯顿加入了自由派，原因是意大利战争的爆发，以及帕麦斯顿明确支持意大利为保卫自由而反抗反动的奥地利。自由主义者们热情支持欧洲人民获得自由，也急切希望他们能以独立的民族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这种激情长期以来激励着他们。1859年，上述激情加上当时英国需要建立一个与德比和迪斯累利的政府相比偏左一些的政府，才让辉格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团结在了帕麦斯顿的周围。格莱斯顿

加入自由派担任财政大臣的决定对自由党的联合非常关键，也反映出布赖特给格莱斯顿一个精明的暗示，提醒他帕麦斯顿是一个75岁的老头，格莱斯顿必然是他的继任者。

帕麦斯顿在1859年到1965年领导着重新联合起来的自由党。这届政府的政绩平平。但在这几年以及前后几年中，英国的自治市镇和各郡逐渐持有自由党的态度，生长出自由党的协会，这些协会是一个

611 全国性政党关键的基层组织。英国自治市镇中自由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严格的阶级界限前进。对1857年选举中罗奇代尔（Rochdale）的924个选民的研究，显示了以下分类：①

	投票支持自由党	投票支持保守党
职业人员和商业者	88	106
技工	133	95
经营酒业者	28	118
资本家	34	54
零售商	167	102

1867年之后，大多数工人获得了选举权，罗奇代尔的工人也分为支持自由党的和支持保守党的。但是尽管资本家和工人的选票都分投给了两个政党，但还是有些很明显的分别：技工和零售商投给自由党的选票确实多于给保守党的。当然，有个事实很重要，就是工人们都不支持宪章派或社会主义者的第三党。无产阶级证明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预言在英国不能成立。无产阶级要么投票给自由党，要么给保守党，前者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也反对消除不平等现象的大多数措施，后者坚持等级原则和遵从原则，因而支持财产和权威，希望维持现状，不管现状如何不公平。技术工匠和店主们支持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主要原因是维多利亚中期的社会繁荣。马克思叹息道："长期的繁

① John R. Vincent, *The Formation of the Liberal Party*. (London: Constable, 1966).

荣让工人们丧失了斗志”，产生了“追求物质享受的无产阶级”。

实际上，比较富有的工人和小店主具有中产阶级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会把付给优厚报酬雇主和买他们东西的富人当作剥削者。只要社会能够给勤俭节约、谨慎自制的人予以回报，使其得以提升，并给他们的子女上进的机会，他们不会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就是不公平。周日学校、礼拜堂、机械研究会、日校、出版物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团体都反复灌输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规范。中产阶级也征募工匠和小店主——特别是非国教徒——进入一些废除奴隶的、进行行政改革的、废除教会税的和倡导世界和平的社会团体。

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参加此类社会团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更喜欢酒馆、英国国教和保守党。决定政治倾向的是宗教信仰，而不是阶级立场。1850 年之后非国教徒的数量猛增，壮大了自由党的队伍。世俗主义者的数量虽小，也同样增加了自由党的阵容，他们的道德虔敬和对国教的憎恨与非国教徒的态度非常接近。19 世纪 60 年代，这批道德坚定、立场激进的人喜欢阅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1859 年出版的《论自由》（*On Liberty*），喜欢约翰·布赖特对贵族的猛烈抨击，也喜欢威廉·格莱斯顿对意大利监狱中的残酷现象和罗马教会的错误所 612 表现出来的义愤填膺。不辞劳苦的工匠和店主、自力更生的工厂主和职业人员、从事改革运动的编辑、认真的知识分子以及很多教派里虔诚信仰宗教的人们，他们都从自由主义中看到了一种姿态——既谴责托利党集团的排他性特权，又允诺给新兴团体平等权利和更多机会。上述各色人等和新兴团体也从直率豪爽的格莱斯顿身上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气势非凡、口才超群、果敢坚定的代言人形象。虽然有时候他在等级社会和平等社会之间更倾向于前者，对耗费不大的小规模政府的热情远远胜过社会改革，但是人们对此都无所谓；他们只听到回响在整个英国的报刊和公共讲堂里那些如雷贯耳的词语。他对真理、公正、自由和人类的热爱使他成了自由主义的化身。像那些被人们狂热追捧的英雄一样，他满足了他的支持者们的心理需求，其中之一便是兑现了自己诺言，给那些道德完好和政治可靠的人选举权。正是这

个承诺将人们引回到议会改革的问题上。

《1867 年改革法案》

自由党在帕麦斯顿的带领下赢得了 1865 年的大选。大选中选出来的 358 名自由党下院议员和 300 名获胜的保守党下院议员中，很少有人为以议会改革的名义进行竞选。1865 年的时候，改革是不受欢迎的，一年后它仍然是不合时宜的口号。迪斯累利说改革会把“一群自私自利、身份卑微的平庸之辈”引进议会。1866 年，保守党人和叛离的自由党人挫败了格莱斯顿的一个温和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将自治市镇的选举权资格由 10 英镑降低到 7 英镑，给各郡中租赁房产价值 14 英镑的人选举权。法案如果实施也只能在原来 100 万选民的基础上增加 156000 选民。一年之后，同一个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赋予 938000 名新选民选举权。所有城市户主从此获得了选举权；民主政治已经来到了城市化的英国。送这个礼物的不是自由党，而是保守党，不是格莱斯顿，而是迪斯累利。这是一个矛盾的、不可思议的改变。它反映了三种力量的集合：第一，不断增加的民主政治需求；第二，已经在野 30 年的保守党的挫折与失意；第三，灵活狡猾的本杰明・迪斯累利高明的议会策略。

很多人畏惧民主政治，但其他人则慢慢地开始需要民主政治。在帕麦斯顿执政的年代里，熟练的技术工人忙着组建工会和争取高工资，普通的非技术工人则安分守己，同时，统治阶级也对现行的选举制度感到满意，在这种制度下，1/5 的选民——大约占人口的 3%——选举半数的下院议员。当时 396 个自治市镇中有 246 个与土地有关联，其中的 51 个还仍旧是家族型的，他们对这种制度也没有任何异议。从宪章派 1848 年的最后一次示威到 1867 年海德公园（Hyde Park）动乱，这期间没有发生过要求更广泛的选举权的大型集会。但是，有些沉默的力量却在活动，它们能使这种要求在短期内变得非常可怕；在一个有很多新兴阶层的社会中，这是一个不会自动消失的问题。

613

从 1849 年到 1866 年，有 5 个不同的内阁讨论过这个问题，有 6

次呼吁议会改革。其中一次是德比勋爵和迪斯累利的保守党政府1858年提出来的。他们的议案是保守的，很容易就被否决了。但是舆论风潮逐渐转向赞成扩大选举权。比如，格莱斯顿就转向了改革，因为有一个工程师联合协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的代表团到财政部咨询关于将其基金投入邮政储备银行的事情，他们的办事效率、节俭作风和聪明才智令他折服。工匠阶层实际上已经变得很了不起了。他们不是粗暴蛮横的宪章派，而是有责任感的、温和的、有教养的工人。有些是济贫法的贫民救济委员，有些是改良委员会的委员，其他的成为市镇议员、或互助会、合作社和禁酒协会的管理者。1866年，格莱斯顿提出议案，迈出了履行承诺的第一步，给所有道德完好和政治可靠的英国人在道义上赋予选举权。

但是，这个议案让很多人闻风丧胆，甚至是自由党内的某些人。其中之一便是罗伯特·洛厄（Robert Lowe），他是一个自由商人，在行政和法律问题上是一个边沁主义者。在他看来，这个法案使议会大门向工人阶级敞开，而这个阶级最有可能包罗“贪婪、无知、酗酒……［和］冲动、缺乏思考、残暴的人”。帕麦斯顿的追随者中有24人赞成上述看法，他们加入保守党，否决了格莱斯顿的提案。保守党成员之一克兰伯恩勋爵（Lord Cranborne），未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和首相，担心工人阶级一旦赢得权力，就会要求经济平等。他认为这样会让财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1866年7月，畏惧民主政治的势力与要求实现法案第一部分的势力对决，前者获得了胜利。

这场胜利迫使自由党政府于6月25日辞职，保守党上台。要求扩大选举权的人和畏惧其扩大的人之间的冲突尚未解决，此刻又与这个已经当了30年少数党、在野长达28年的政党的挫折失意与雄心壮志纠缠在一起。他们能统治英国吗？他们不是愚蠢的政党吗？他们不是一个连经验丰富的行政人才都没有的政党吗？在野多年之后，德比勋爵认识到保守党如果要证明自己的决心和勇气，必须果断行动。他也知道在1866年改革情绪已被煽动得很高，不可能平息下来。1866年7月，有20000人不顾政府禁令，冲垮海德公园的围栏，在公园里举行

大规模集会。在其他地方，有将近 100 万人参加了 6 次集会，倾听约翰·布赖特的演讲，要求更广泛的选举权。格莱斯顿警告迪斯累利和洛厄，“巨大的社会力量裹挟着它们的能量和权威勇往直前……向着你们冲来了。”在北部，那些社会力量包括中产阶级，他们在改革公会（Reform Union）中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要求改革。改革同盟（Reform League）和同业理事会（trade councils）则更加纯粹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呼声。同业理事会情绪尤为高昂，因为在霍恩比诉克洛斯(*Hornby v. Close*）案件中法院说工会是非法组织，并追究它们的经费。

614 这年的春天和夏天，遇上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and Gurney Bank）破产、金融恐慌和牛瘟。到了秋天，德比看到改革的浪潮已成泛滥之洪水。一个希望获得善于治国之声誉的少数党不能逃避现实。但是要怎样才能面对挑战呢？克兰伯恩勋爵和那些畏惧民主的人又会怎么样？保守党人不是把格莱斯顿要求 7 英镑城市选举权资格法案否决了吗？当时的境况是进退维谷。德比为了应对困境，向迪斯累利求助，尽管迪斯累利使出了机灵、欺骗、大胆的手段，表现出厚颜无耻、机会主义和勇敢无畏，但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也得益于完全混乱的、不确定的状况，还有运气。

从 2 月 11 日到 3 月 18 日，迪斯累利共向议会提交了 3 份计划。第一个计划中的决议太含糊，导致了议院的恼怒。第二个计划清楚明了。将城市选举权资格降低到 6 英镑，比格莱斯顿的选举权资格少 1 英镑。但是他赋予上层阶级某些“花样选举权”（fancy franchises），即，给所有交纳直接税达到 20 先令的人、或者有 50 先令存款的人、或者达到特定教育资格的人以选举权，抵消了他送给工人阶级的这笔礼物。这个法案太保守，无法赢得大多数的支持。迪斯累利随后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法案。这第三个法案给自治市镇中所有亲自纳税的户主以选举权。居民选举权是自由党的主张，会得到他们的投票赞成，这正是迪斯累利的少数党政府所需的投票。但是，保守党这边怎么办呢？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迪斯累利看到所有自治市镇的居民中有 2/3 不直接交税，而是由房东代交的，因而不能得到选举权。（事实上，不

直接交税的人只有35%。）迪斯累利也保留了“花样选举权”。事实上，这个法案是一个十分保守的、限制性的法案，这使得很多下院议员接受了它。

然后就开始变戏法了。迪斯累利接受了一个又一个废除他的“花样选举权”的修正案，也接受了亲自交税的户主们的要求，在这方面很少有魔术师的魔术手法能比得上他。保守的保护性条款一个个被推翻了，剩下的是一个民主的法案。自由党人也提出并通过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废除45个小自治市镇，把他们的席位转让给大的城镇和各郡。这样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法案，它将选民人数从71.7万增加到220万。迪斯累利得到了部分保守党人的投票，因为在那个戏剧性的时刻，他使他们成为胜利者。战胜格莱斯顿多么令人兴奋！比布赖特精明多么令人愉悦！赢得公众的喝彩多么令人欣喜！大多数人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如果是势在必行，为什么保守党人不去获得信誉呢？如格莱斯顿所警告过的，社会力量已经使改革成为仅仅是时间早晚的事情。1867年，骚动、大规模集会和亢奋的中产阶级让时间大为缩短。当时的偶然事件使拼命想成功的保守党执政，使非常灵活地操纵议会的迪斯累利执政，上述事实有助于解释土地阶层把选举权送给城市工人阶级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这并不是任何托利党的民主信念带来的结果，也不是出于工人阶级将来会给保守党投票这种长远的考虑。相反，它是那些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和那些清楚地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特征的社会态度所带来的成果：也就是，一个越来越善于表达、人数不断扩充、自我意识日益觉醒、力量日渐增强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还有不断增强的信念认为，除了当权者之外的其他人应该拥有更多机会和权利，包括分享政府的权利。这些是《1867年改革法案》背后的自由力量，聪明的迪斯累利用它赢得了保守党的胜利。这是他与格莱斯顿长期竞争中的首次胜利。

615

迪斯累利对决格莱斯顿

1868年2月，德比勋爵因健康原因被迫辞去首相之职，64岁的迪



本杰明·迪斯累利，1868 年、1874—1880 年

担任首相（*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斯累利成为英国首相。10 个月之后，自由党在 11 月的大选中获胜，约翰·罗素勋爵辞去党魁之职，59 岁的格莱斯顿随之成为首相。到达了英国政治职务的最高层时，迪斯累利欢喜雀跃地宣布："我已经爬上这根滑溜溜的竿子的顶点了。"严肃的格莱斯顿当选时说，他"委实不够资格"，但是他承认"上帝认可和宽容我，自有他的用意"。

616 这两位政治家完全不同。迪斯累利是犹太血统，但受的是英国国教的教育，在世界性城市伦敦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二流的文学家，有祖上留下来的财富和伏尔泰的思想风格。父亲将年幼的本送到一个一神论的学校，15 岁之后他没有上大学，而是自学。格莱斯顿的父亲是一个苏格兰长老派的辉格党人，在利物浦的船运中发家。他用自己的财富买了一块乡下地产，成为国教徒和托利党人，把他的儿子送到伊顿和牛津，使他在高教会的虔诚、坚定的托利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

的严肃中得到培养。1832 年，严肃庄重的格莱斯顿年仅 22 岁，便从一个口袋选区进入议会。两年后，也就是 24 岁的时候，皮尔授予他官职。迪斯累利则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在 1837 年成功进入议会之前，他 4 次竞选都失败了，其中两次以激进派的身份竞选。33 岁的他有很多冒险经历可供追忆：在股票投机中损失了一笔财产，做报纸生意破产，与两个已婚妇女有风流韵事，与一个比他年纪大很多的有钱寡妇结婚，还出版了 3 本小说。以他的才智和魅力，他在文学沙龙中赢得的赞誉要多于皮尔或议会给他的。皮尔简单粗暴地拒绝给他官职，议会在他首次演讲时把他轰下台。这种冷落仅仅使他以更坚定的决心实现他在 1834 年向墨尔本勋爵说的话——“我要当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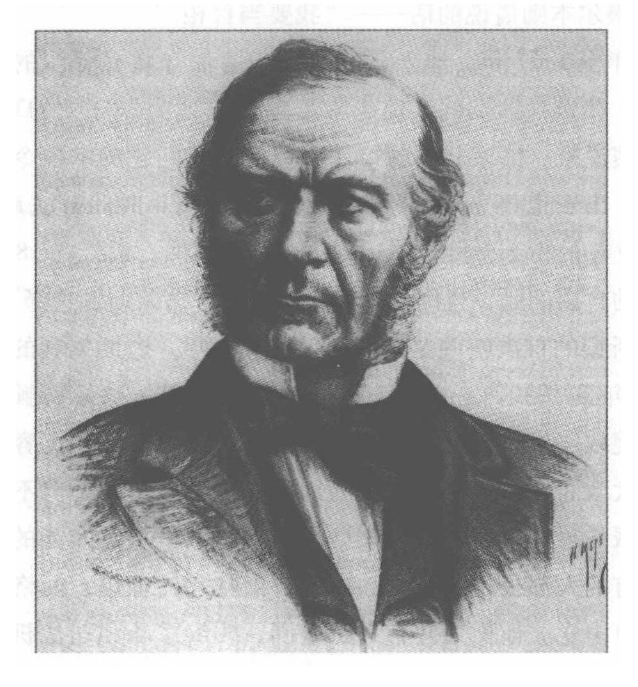
1846 年至 1867 年，迪斯累利成功成为保守党在下院的领袖，但不是首相。在当领袖期间，他经常形单影只地为保守党的事情辩护，驳斥一些演说家。格莱斯顿的口才和他对财政问题的掌控令其同僚们惊为叹之，出于道德立场的原因，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辞去政治职务，这种道德立场的精细微妙让他的同僚们感到困惑。最终在 1859 年，由于意大利的自由问题，也因为反感迪斯累利，格莱斯顿选择了自由党。

格莱斯顿的首次组阁是 1868 年到 1874 年。迪斯累利的第二次组阁是 1874 年到 1880 年。这两任内阁都大有成就。格莱斯顿的措施有三种——使政府机构更高效更公正的措施，扩大自由和宽容的范围的措施，扩大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措施。一个效率高、但不庞大的政府是皮尔派的最高理想，而格莱斯顿是皮尔派里最有才能的人。政府应该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公开，这是自由党人的理想，而格莱斯顿如今领导着自由党。他扩大文官考试范围、改组军队和司法机构、改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在这些方面实现了上述理想。

军队急需改组。英国的军队庞大、混乱、不公正，有时候还很残忍，比如存在着鞭刑。军队将军事职务卖给富裕的贵族，往往对其功绩缺乏重视。陆军中尉（Lord lieutenant）任命乡郡地方军官时也优先考虑社会阶层而不是军事才能。在正规军中服役 21 年的人和 6 个相关的机构围绕着正规军的管理进行了一番争吵。格莱斯顿的陆军大臣

(Secretary for War)、皮尔派的成员爱德华·卡德韦尔（Edward Cardwell）用枢密令和议会法案禁绝了军职买卖与和平时期的鞭刑，将各郡的民兵归于陆军部（war office），使陆军总司令（Commander in 617 Chief）担任所有陆上军队的最高统帅，并直接对陆军大臣负责。他还把服役期限缩减为兵役 6 年，后备役 6 年，按照行政单位来组织团级单位，给他们装备先进的马丁—亨利（Martin-Henry）后膛式来复枪。这些改革为现代英国军队奠定了基础。

英国混乱重叠的中央诸法院也需要改革。《1873 年英国司法法案》（English Judicature Act of 1873 ）对此进行了改革，把中世纪的王座



威廉·格莱斯顿，1868—1874 年、1880—1885 年、1886 年、1892—1894 年担任首相。由亨瑞·梅耶雕刻，1985 年发表在“画报”（Le Journal Illustre）上（*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

法庭、财政署、民事诉讼法院和衡平法院的职能全部置于最高司法法院（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管辖的一个中央法院。中央集权制、现代化和高效能是新的口号，这些口号也能用来形容《1871 年地方政府法案》（Local Government Act of 1871），该法案将监督地方政府的主要中央机构合并发展为一个力量强大的地方政府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Board）。格莱斯顿的政府还坚持认为，自此之后，所有政府人员的任命都要经过文官考试。自由党人决定：政府应该是有效率的，为此宁可少一点贵族化；社会应该是所有职业都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社会，不管他归属哪个阶级。

自由党人还通过了一些增加自由的措施。1872 年通过的一个法案，同意选民无记名投票，使他们在选举时免予地主和雇主的胁迫。《1871 年工会法案》（The Trade Union Act of 1871）也让工人们免受雇主的胁迫。它推翻了霍恩比诉克洛斯（*Hornby v. Close*）案件令人憎恨的判决结果，宣布工会是合法的，使它们的基金与互助会基金享受同样的保护。政府还废除了爱尔兰清教教会（Protestant Church of Ireland），削减爱尔兰土地财富上的税收。占全国人口将近 4/5 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因而不再向这个富裕的教会缴纳什一税，这个教会宣称自己是“全国性的”，但实际上只是为 1/8 的人口服务。 618

无记名投票、工会以及废除教会的诸法案增加了选民、工人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自由，而没有扩大中央政府的职责，也没有侵蚀自由党人的自由放任信念。但是，在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方面，自由党人也通过了很多法案，带来了显著的政府干预。1870 年，他们通过了一个教育法案和一个商船法案（Merchant Marine Act），前者要求建立地方教育委员会下属的学校，后者强调船只必须担保安全。1870 年，他们通过一个法案保证爱尔兰的佃农在农业改良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并授权法院调整不合理的地租。

更好的学校、更安全的船只、更公平的地租，尽管它为孩子、乘客和佃农带来了更多自由，但也以意味着更庞大的政府。调整地租毫无疑问是对财产权的侵犯。格莱斯顿坦陈起初他发现这种想法有点站

不住脚。一个使自己囿宥于道德准则的人，绝不会妄想兼顾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坚定信仰与自私的地主和船主必须要由国家控制的现实。在一群自由党最坚定的支持者、非国教徒的激励下，格莱斯顿也开始相信醉汉应该被制止。《1872 年执照法案》（the Licensing Act of 1872）限制了酒馆的数量和开放的时间。哲学方面的连贯性很少能成为政党的品质。在《执照法案》中，自由党人的改革冲动终于战胜了他们关于自由人民社会的理想——人们在晚上 11 点之后可以自由畅饮。如何通过政府的强制创建一个自由的社会，至今还是自由党人的一大难题。

1874 年以后，迪斯累利和保守党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但他们没有为此感到极度痛苦。1874 年，迪斯累利因竞选中战胜格莱斯顿而得意洋洋。此时，下院有 352 名保守党议员，243 名自由党议员和 57 名爱尔兰议员。迪斯累利组建的内阁在才干方面毫不逊色于 1868 年的格莱斯顿内阁或 1841 年的皮尔内阁。将近 40 年的自由党统治结束了。保守党再次显示出活力，统治了 6 年。这届政府通过的社会立法多于 19 世纪的任何一届政府。它通过了两个《工会法案》（Trade Union Act），十分受工会欢迎，一个保证了工会和平纠察的权利，另一个废纸了《主仆法案》（Master and Servant Act），该法案允许法院把工人视为低等的仆人。政府还起草法案推动住房建设、保证食品和药品卫生、加强公共卫生服务，更好地管理互助会。1876 年有了清理河流污染、增加商船安全和义务教育的法案。1878 年，议会通过了一个《工厂法》（Factory Act），将以往有关法令归纳其中。这是一个不凡的履历，反映了一种运用政府力量实现公平、公正社会的愿望。

然而，它没有反映出一种特征明确的托利党家长式统治。迪斯累利固然在他的小说中表达了家长式统治的理想、在 1872 年和 1873 年的演讲中，流露出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但是，当他 1874 年组建内阁时，却没有社会改革的计划。1874 年之后，议会通过的法案大多数反映了一种超党派的、超意识形态的处事方法。王室委员会对社会弊端进行调查，公众舆论被鼓动起来，公职人员设计改革措施，下院议员

619

大声疾呼要求采取行动，部门大臣告知内阁和首相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其中一个部门大臣是内政大臣罗伯特·克罗斯（Robert Cross）。他是一个兰开夏郡的商人，一个自由放任的忠实信徒，一个一流的讲求实效的行政官员，政府大多数社会改革法案的设计师是克罗斯而不是迪斯累利。

这些改革同样不太有效。规划它们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而非集体主义的。比如，《工匠住宅法案》（the Artisan's Dwelling Act）和《纯净食品法案》（the Pure Foods Act）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它们只是允许城镇去建设房屋或者任命一个食品监察员，但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87 个城镇中仅有 10 个在最小的限度内做了一些住房方面的改进。《食品和药品法案》（the Food and Drug Act）在很多地区都是无效的。有些改革干脆是拿来讨好特权阶层的。政府规定实行义务教育的原因是，英国国教的学校需要学生，以便收取更多学费。

社会改革的道路并不能显示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差别。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都不会赞成根本的社会改革，或者设法运用政府权力对最底的第四阶层——残余阶层的状况进行重大改善。两个党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分歧。相反，他们的分歧在保加利亚大屠杀上，在爱尔兰问题上，在迪斯累利的风格和格莱斯顿的道德上。

1876 年，土耳其还统治着今天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她当时面临着一系列受压迫的基督教臣民的反抗。在镇压其中一次反抗的时候，他们屠杀了 12000 名保加利亚人。格莱斯顿书写了一本慷慨激昂的小册子，谴责这种残酷的暴行；小册子三个星期里便卖出了 200000 册。情况不断恶化，到 1877 年 5 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之时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迪斯累利认为俄国干涉的目的在于攫取海峡的控制权，因而支持土耳其。对迪斯累利以及他的前任帕麦斯顿而言，强大的土耳其是近东势力均衡的关键，是英国通往印度的通道的保障。迪斯累利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和格莱斯顿的道德原则使英国舆论产生了自《谷物法》问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1878 年春天，迪斯累利出席了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由俾斯麦充当公正的调解人，

俄国、奥地利、土耳其和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使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割让给俄国，邀请奥地利掌管波塞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将保加利亚的其余部分留给土耳其，但是在其核心部分设立一个基督教的总督。英国又一次支持土耳其遏制俄国势力伸入地中海东部。

对格莱斯顿而言，独立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比一个未经改革、也无法改革土耳其更能遏制俄国。而且，土耳其的压迫是不道德的，而格莱斯顿对道德看得很重。1879 年和 1880 年，作为中洛西亚（Mid-Lothian）苏格兰选区的议会候选人，他在一系列公共演说中一次又一次第表达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上千人倾听了他的演讲。620 他的女儿说，所有苏格兰人都愿意听他演讲。他的演说被竞相刊登于报纸上。他对罪恶的谴责犹如晴天霹雳，他的理想主义是崇高的，他的道德是纯洁的，对工人阶级的赞美溢于言表，对土耳其的可怕行为义愤填膺，严厉责难上层那 10000 名追求享乐的人。他对真理和正义的呼吁高贵而动人，但是他却忽略了贫民窟、失业、贫穷和工资微薄的工人。格莱斯顿把辉格党贵族、国教乡绅、不从国教的制造业者、激进派店主、新兴的工人阶级联结在一起，不是对社会改革的呼吁，而是呼唤他们中的许人共有的东西：一种改良的经历，一种自立的道德规范，一种严肃的宗教，以及潜藏在其恭顺外表之下的一种对孤傲的、排他的、享有特权的贵族的敌视。

迪斯累利也进行激动人心的呼吁，这种呼吁也有利于联合保守党。1872 年，在水晶宫，他问听众们是否希望英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他把印度称为帝国的明珠，并在 1876 年使维多利亚成为印度的女王。迪斯累利知道英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对帝国的赞美中。在水晶宫演讲中，迪斯累利还热情洋溢地谈到工人阶级，那些由保守党于 1867 年赋予了部分选举权的阶级。他说他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都用支持者的情感和渴望把各自的政党团结起来。

在 1880 年的选举中，格莱斯顿的崇高道德似乎比迪斯累利对帝国的赞美更具有吸引力；自由党人获得了 352 个席位，保守党 238 个，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62 个。尽管选举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萧条造成的，与两个人的演讲才能无关，但这是一次决定性失败。1879 年，北美和东欧的廉价谷物导致英国谷物价格暴跌，英国农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失业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严峻的现实加上保守党对自身组织的疏忽，促使自由党获胜。

有救世情怀的格莱斯顿和迅速振作起来的自由党统治了英国 6 年。这个时期并不辉煌：国内经济萧条导致民怨沸腾，国外亦有较大的挫折。1881 年，在马尤巴（Majuba Hill）战役中，南非的布尔人打败了英国人，取得了德兰斯瓦（Transvaal）的独立。格莱斯顿和内阁讨厌帝国的负担，然而在 1882 年，他们却无意中卷入了对埃及的占领。政府派出“中国的”戈登（Gordon）带着为数不多的军队前往苏丹。1885 年，多次拖延派遣援军之后，马赫迪（Mahdists）屠杀了戈登和他的军队。诸事都不顺利，尤其是爱尔兰和爱尔兰的下院议员。在查尔斯·斯图尔特·帕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的铁腕统治下，拥护政治独立的爱尔兰下院议员一再妨碍下院的事务。爱尔兰佃农在北美谷物的冲击下破产，当他们因无力支付地租而被驱逐的时候变得很暴力。他们烧毁房子，谋杀地主，集结于帕涅尔身后。

帕涅尔的母亲是美国人，他从小受清教的教育，毕业于剑桥大学，他使 1870 年成立的地方自治联盟（Home Rule League）与 1879 年组建的、更加活跃的爱尔兰土地联盟（Irish Land League）联合起来。他是一个威严的领导人，完全献身于争取爱尔兰自治的事业。由他指挥的持续的煽动破坏了格莱斯顿的和解政策，格莱斯顿向那些希望监禁帕涅尔的人让步。但是，监禁帕涅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格莱斯顿释放了他，随即达成了一个协议，称作基尔曼哈姆（Kilmainham）“条约”。在条约中，格莱斯顿承诺通过《欠款议案》（Arrears Bill），根据该议案，10 万名爱尔兰佃农将被解除债务；帕涅尔这边则承诺保持和平。事情看起来进展顺利。后来在 1882 年 5 月，爱尔兰极端分子刺杀了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Phoenix Park）散步的新任爱尔兰首席大臣（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弗里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 Fred-

621

erick Cavendish）和他的次长。这次谋杀败坏了爱尔兰自治论者的名声，也使人们对暴力阴谋产生了怀疑。此后三年，帕涅尔放弃了对议会事务的蓄意阻挠，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爱尔兰国家联盟（Irish National League），并利用他的 86 张选票分别与两个党讨价还价，以使他们让步和妥协。1885 年 6 月，他与保守党合作，使格莱斯顿的政府倒台，但他几乎没有得到什么。

1885 年的选举之后，他利用爱尔兰自治论者的 86 张选票打败保守党，召回了格莱斯顿。格莱斯顿在 1886 年提出了《地方自治议案》（Home Rule Bill），要在都柏林成立一个爱尔兰议会和一个爱尔兰行政机构。爱尔兰议会和行政机构将管理爱尔兰的内部事务，但不涉及防卫、外交、或者关税与国内货物税。格莱斯顿多年以来都拥护意大利、波兰以及那些被压迫的民族的独立，因而他决定（遗憾的是他很少与其他人磋商过）爱尔兰应该得到自治。这样他与他的同僚们逐渐疏远，也远离了公众的英属爱尔兰的信念，他发现 92 名自由党人，包括激进派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与他的意见不能调和，这种立场导致 92 名自由党人中的大部分人成为自由党统一派成员（Liberal Unionists），并最终倒向保守党。格莱斯顿使他辛辛苦苦联合起来的自由党再次分裂了。1846 年，他目睹了罗伯特·皮尔爵士使保守党分裂；如今他使自由党人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自由党分裂的结果是，保守党在此后的 20 年里统治了 17 年。

政党是力量强大、难以捉摸、无法预料的实体。保守党与上层阶级关系密切，热爱既定的制度，尊重权威，珍视过去的智慧，自小皮特开始，到玛格丽特·撒切尔之时，一直保持了自身的延续性。自由党诞生于 19 世纪 50 年代，在格莱斯顿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在 20 世纪工党掌权之前逐渐衰落。自由党势力壮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它联合了所有的阶级，二是它强调个人主义、机会均等、公正和道德的思想体系。这些理想在一个变幻不定、经济繁荣和严肃认真的宗教社会里极具吸引力，但是这些作为一个党的基础却不够稳定和持久，不如一个从传统、既定的制度、臣民的恭顺、以及贵族阶级和财阀阶级——

他们的利益与现状捆绑在一起——的支持中汲取力量的党。当工人的阶级意识日益强烈和坚定自信的时候，自由党的联合就土崩瓦解了；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主义和福音派新教的道德良心屈就于在集体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力量时，自由主义就衰退了。但是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自由主义还要再次繁盛起来。

阅读文献

622

Geoffreyn Best, *Mid-Victorian Britain, 1815—1875*,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该书是一部英国社会史，主要研究家庭、出生、婚姻、死亡、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作者的视点很有趣，也很尖刻。

Robert Blake, *Disraeli*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7. 该书在迪斯累利的传记中是最好的，作者对这个复杂的政治家持赞扬的态度，但也尖锐地批评了他前后不一的品行和他的过失。

J. D. Chambers, *The Workshop of the Wolrd, 1820—1880*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钱伯斯善于清晰地讲述历史，他以高超的手法描述了英国制造业、商人、银行家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时代的社会经济。

Francois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该书直截了当地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经济，作者是法国人，他没有把任何东西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详细地说明了各种制度，极为巧妙地简化了很多复杂事情。

Harry Hanham, *Elections and Party Managemen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Disraeli and Gladstone*, London: Longmans, 1959. 该书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政治进行了翔实、敏锐、出色的论述，作者深入选区，考察了候选人、选民、政党和政党组织。

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8. 该书从经济方面解释了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以及它对那些从资本主义中受惠较少的阶层的严重影响。

Philip Magnus, *Gladstone*, London: Murray, 1954. 该书富于同情地刻画了这位伟大的议员，讲述和观察他的宗教热忱、政治号召力、非凡的勤奋以及复杂的心理。

L. B. 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973. 该书很好地再现了一个时代，用活泼的散文形式书写，优雅娴熟，因而是书写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英国历史的著作中最有启发性、最有趣味的。

Paul Smith, *Disraelian Conservatism and Social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 该书对迪斯累利领导下的社会改革进行了探究性和批评性的研究，坦率地承认迪斯累利并未有力地推动改革，而且改革也没有为穷人做什么，这种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Douglas Southgate, *The Most English Minister: The Policies and Politics of Lord Palmerston*, London: Macmillan, 1966. 该书是研究帕麦斯顿的一部最好的单卷本著作，作者在外交政策研究上追随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Sir Charles Webster），但是对帕麦斯顿的研究具有敏锐的眼光和独创性，帕麦斯顿从托利党转向为辉格党，最后加入自由党。

John Vincent, *The Formation of the Liberal Party*, London: Constable, 1966. 该书对自由主义和自由党作了杰出的分析，作者精明、现实、丰富、尖刻的评论解构了古老的神话。

第二十四章　维多利亚时代风尚

623

19 世纪，英国人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霸权、世界性的帝国和政治上的民主，而且形成了一种令人敬畏的风尚，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风尚（Victorianism）。对于英国人的生活而言，这种风尚像全民普选或工业奇迹一样重要。它是复杂的——有时诚挚、精干、沉着、高尚，有时则沾沾自喜、养尊处优、随遇而安、俗不可耐；有时宽容大度、独立自主、诚实无欺，有时则武断专横、随声附和、虚饰伪善。它会热情地追求英雄的和美丽的事物，或者习惯于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尽管它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受过教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们的风尚中包含着一种道德精神上严肃认真的核心。这种严肃认真把他们和 18 世纪不严肃的先辈们区分开来。人们不会把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误认为是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也不会把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Alfred Lord Tennyson）误看作詹姆士·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在道德精神上严肃认真，其最大的原因是福音派新教的复兴，这种复兴造就了卫理公教派（Methodism），使非国教徒（Dissent）得到复兴，并感化了英国国教近 1/3 的信徒。但是，福音派新教的复兴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之人道德认真的唯一支流：高教会派的普西（Puseys）和纽曼（Newmans），广教会派阿诺德（Ar-

nolds）和金斯利（Kingsleys），以及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乔治·埃利奥特（George Eliot）这样的世俗论者，他们同样是合乎道德的。事实上，道德认真并没有因为神学的衰退而丧失了力量，因为许多人在道德中发现了代替物。那种自立的道德给人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也能提高他们的道德认真的程度。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经济发展和学术思想发展的相互作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都从勤奋、俭朴、纯洁、诚实和正直不阿等美德中使自身获得进步。那种发挥作用的美德，成为道德宝典中固有的原理。人们发现同样的道德宝典也存在于《圣经》之中，他们从卫理公会礼拜堂中、从公理会的宗教仪式（Congregational services）中、从英国国教的学校中，都可以读到这种道德宝典。没有任何一本书对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影响能够与《圣经》相媲美。1837年，当维多利亚成为女王时，普通民众对人世的看法，是以《圣经》所讲的道理为坚实基础的。《圣经》告诉他们基督是神圣的，他因为世人的原罪而舍身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圣经》告诉他们上帝在6天之内创造了世界，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繁衍出来的，存在着天堂和地狱。1901年，当维多利亚去世时，《圣经》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性主义和经济繁荣昌盛的侵蚀，被城市生活的愉悦和人们寿命的增长所削弱，它失去了绝对正确性，也失去了它所确定的宗教信仰。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损失。尽管理性主义在很多方面破坏了宗教信仰，但是公众把无往不克的科学看作是祸首或英雄。科学的成功是惊人的。科学的征服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它是定义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主要因素之一。

624

科学的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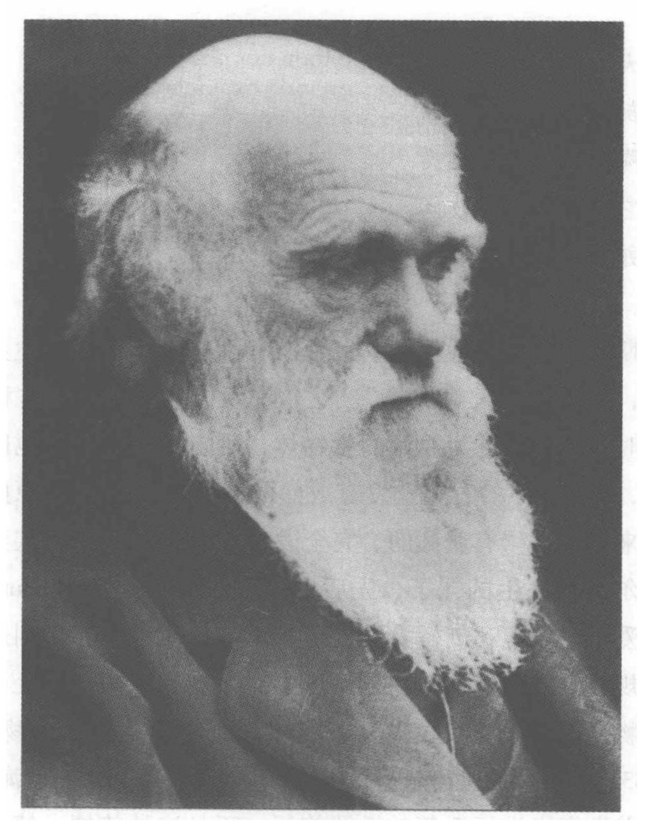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方面最伟大的著作，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该书于1859年出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神学家们喊叫说，《物种起源》恶意中伤，漠视宗教，它否定了《圣经·创世记》。科学家们则宣称，该书是革命性的巨著，

它阐明了世界许多物种的起源。事实上，《物种起源》的确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它确实说明了物种的进化，但是，这种进化遵循的是自然界千百万年的演变方式，而不是上帝6天造物的教义；它遵循科学规律，而不是上帝的旨意。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本书令人惊骇，因为他们相信：混沌初开之时，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种生物，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他们从小就熟读、听惯了《圣经》中的《创世记》和密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说教。在密尔顿的《失乐园》中，人们可以读到：

大地遵从指令
剖开她多产的腹部
降生出无数的生灵
它们有完美的肢体
并且完全发育成熟

查尔斯·达尔文告诉他们，上帝没有创造出“无数的生灵……完美的肢体，并且完全发育成熟”。达尔文说，亿万年前，这种生灵不存在。那时存在的是更为原始的生物体，后来，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中，“有肢体的、完全发育成熟的”生物是从这些原始的生物体进化而来。一些“有肢体的、完全发育成熟的”生物，甚至已经灭绝了。达尔文是医生的儿子，先后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的公立学校、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几乎没有受到过生物学方面的正规教育或训练，但在剑桥读书时，他和导师一起处事，研究附近的植物群和动物群。这些激发了他采集和研究自然生物的热情，使他在1831年加入了比格尔号（*H. M. Beagle*），这是一艘海军船只，奉命到南美洲海岸进行5年的勘测旅行。正是这种热情，使他研究在阿根廷采集的化石标本，使他研究在远离厄瓜多尔（Ecuador）的加拉帕哥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上的龟类。一种古老的化石——大懒兽科（Megatherium），与现存的犰狳（armadillos）有区别，但又与之

625 相类似，就像一个海岛上的乌龟与其他海岛上的乌龟既有不同、又有相似一样。物种不仅在种类上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相关联的。有些物种，像大懒兽科，它们灭绝了。或许物种并非如此永恒的！当达尔文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化石的时候，他想知道它们能不能形成生物种类的巨大演替，每一个种类都经历了百万年之久的进化。当他采集到相关联的、但不相同的物种之时，他也想知道，它们的相似性是否反映了它们有共同的祖先，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否也说明了它们对不同环境的适应。



查尔斯·达尔文，他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震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Photograph by Julia Cameron/Corbis*）

1836年，达尔文满载标本，来到英国。他和富有的韦奇伍德（Wedgwood）家族的小姐、他的表妹结婚，后来隐居到肯特郡的一个乡村居室。在那里，达尔文生儿育女，收集标本，出版了大部头的关于藤壶（barnacles）和珊瑚礁的著作，与动物和植物的饲养培育者进行探讨，他也遭受了在潘帕斯草原（Pampas）染上的锥虫病（Chaga's disease）之苦。他还从事各种哺乳动物的胚胎研究，发现各种胚胎存在着有趣的相似之处。例如，猿猴的胚胎与人的胚胎相似，这种相似性远远超过了其与犬之胚胎的相似程度。这些相似是否揭示了一种进化链呢？还有，在许多生物身上保存了原始而无用的器官，就像某些甲虫长有萎缩了的双翼一样。这些器官是否在一个不同的进化阶段中曾经使用过呢？胚胎的近似和器官的退化，当把绝迹的生物所留下来的化石标本和相关联的现存物种的变异结合起来，这便提供了证据，证明了生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演变。 626

但是，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释这许多深奥莫测的变化呢？达尔文推测，那些在与食物短缺的斗争过程中、在与食肉动物厮杀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最好的生物，导致了新物种的演变。1838年，达尔文读到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时，这种观点更加根深蒂固了。马尔萨斯的观点是，因为人口的增长比食物的供给要快，这便发生了一种生存竞争的永恒现象。达尔文长期注意到，一个地方的动植物总是维持着一定的数量，虽然它们繁殖下来的后代总比所能供给食物的速度要快得多。很明显，有些生物存活了下来，有些则死掉了。达尔文也注意到，它们的后代没有两个是绝对相同、完全无异的，每个都有个体的变异。难道说正是这些变异在决定谁生存的吗？例如，长颈的哺乳动物能够吃到高树上的叶子。它们能够历经干旱而存活下来，因此，是它们，而不是那些短颈的动物，才会繁衍后代。这些后代会是长颈的，有些因遗传变化的偶然因素，颈又更长了一点，它们又能度过下一次旱灾。最后便进化成了长颈鹿。同样，与环境相适应的灰兔和跑得快的狼，它们的进化是因为它们能够存活下来。例如，最初颈更长的、或者皮毛更灰一

些的动物的出现，只不过是遗传中的偶然现象而已，但事实是，它们以及它们具有优点的后代能够繁衍下去，并进化成新的物种。这种事实是由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所决定，即自然选择规律。于是，达尔文推出了两个理论：一个是进化论，认为世间万物，繁多种类，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点慢慢进化而来的；另一个是自然选择理论，坚持认为这种进化由两种因素决定——那些决定遗传特征的偶然性变异和能够很好地适应特殊环境的生存能力。

上述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并非原创。1789 年，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Erasmus）发表了《植物园》（*Botanic Garden*），这首长诗庆祝“进化”的种种创造。自 1749 年至 1822 年，法国科学家——布丰（Buffon）、莫佩尔蒂（Maupertuis）、拉马克（Lamarck）——对进化作了详细说明。1844 年，苏格兰人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在一本畅销书《创世遗迹》（*Vestiges of Creation*）中使进化理论普及流行，引起了流言飞语。从 1785 年的詹姆士·赫顿（James Hutton）到 1830 年的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地质学家指出，地球上的山脉和峡谷、河流和海洋，都是慢慢地、持续发生演变的结果。赖尔还提出了那些令达尔文迷惑不解的关键问题：胚胎的相似性问题，相近物种的变化，不同的分布状态和对环境的适应，已灭绝物种化石的存在。达尔文在比格尔号船上读到了赖尔和拉马克的著作。当他研究化石和乌龟时，达尔文运用了根据进化理论研磨的思维透镜。

事实上，进化的思想已经是常识了。在历史学、哲学、人类学、627 考古学和社会研究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发展的、成长的和进步的。人类自身不也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演变，德国历史学家赫德（Herder）认为民族国家与生物种类相同，都是独特的有机体发展的结果。在英国，历史学家追溯英国制度的演变，他们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制度开始，经由中世纪各阶段，再到近代的制度类型。随着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出现，历史学在进化方面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考古学家亨利·莱亚德（Henry Layard）从他在近东的发掘中发现，伟大的文明会有兴起和衰

落。1848年，莱亚德出版了《尼尼微》（*Nineveh*）一书，第一年便销售了8000册。人类学家们记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以及人类漫长的历史。1846年，尼安得特尔人（Neanderthal man）头骨的发现使人们必须用万年为单位来计算人类的历史。近代社会也是按照阶段一步步前进的。在法国，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说那些阶段是宗教信仰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主义阶段；在英国，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他1850年出版的《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一书中，主张人类社会是根据进化原理来进步的，这些原理之一便是适者生存。所有这些思想观点，都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前已出现了。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人的思想潮流不仅建立在新的进化论前提之上，也建立在旧的牛顿学说的前提之上。一直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信念是：普遍法则存在于一切自然现象之中，机械法则主宰着整个宇宙中运动的物体，这些法则能够以经验主义来衡量，能够以机械运动方式来加以说明。1808年、1839年、1849年，道尔顿（Dalton）、法拉第（Faraday）、焦耳（Joule）分别以其气体、电流和热力这些法则震惊了学界。1843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他的《逻辑原理》（*Principles of Logic*）一书中，甚至坚称宇宙的发展定律能够从历史中找寻，因此把19世纪的进化观念和17世纪恒定不变的宇宙定律观念糅合在了一起。这种糅合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提供了后盾，为达尔文的理论勾勒出参考框架——这也是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理论框架。1858年，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给达尔文发送了一篇论文，文中华莱士（独立于达尔文之外）概述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达尔文对华莱士完全保证，这是一个联合发现。和达尔文一样，华莱士生活在充满进化假说和牛顿学说范式的氛围当中。也像达尔文一样，他抓住了新近地质发现和生物发现所产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从这些假说中，从积累的资料数据中，从呼吁要求解决的问题中，达尔文和华莱士的伟大发现到来了。

这些发现对创世记冷眼相看。甚至达尔文也认识到了这点：他告

诉一位友人说，他首次指出物种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像承认了一桩谋杀。对于这桩谋杀，许多神学家们对他进行谴责，科学家们对他进行公然抨击。天文学家约翰·赫谢尔（John Herschel）把自然选择称之为“杂乱无章的法则”；地质学家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说法则的一些部分是“完全错误的”；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断言，它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论据上是不充分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进化论和自然法则的正确性，但是在1859年则不然。达尔文的理论是一个出类拔萃、有学问有头脑的推测，这种推测归功于他的直觉和当时的思想潮流，同样也归功于他所观察的实物中存在着内在的规则。

628 同时，批评达尔文的人说他缔造了一个机械的、物质的、毫无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偶然性所造成的，部分是不讲道理的决定论所造成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世界是由比达尔文的发现更大的现象——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胜利——造成的结果。达尔文是众多伟大的科学家中的一员。在物理学方面，詹姆士·焦耳（James Joule）、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和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焦耳和开尔文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包括晦暗悲观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该定律认为世界上能用于作功——温暖一间房子或发动一台机器——的能源会不断地、不可避免地减少。正是这个定律，而不是自然法则，让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Alfred Lord Tennyson）变得那样悲观。但是，物理学家是令人佩服的。热和能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正如电磁感应——因为克拉克·麦克斯韦这样的天才人物——能够用数学计算一样。按照物质动力学原理——根据分子和原子，麦克斯韦说明了能量理论，他又把热、光波和电磁力统一归结为能量场论，从而取代了旧的以物质质量为主的牛顿学说。在讨论法拉第的电解试验中，他甚至写下了“电的分子”，这种分子是由汤姆逊（J. J. Thompson）于1897年发现的，被称作电子。从法拉第和焦耳，到克拉克·麦克斯韦和汤姆逊，物理学家能与达尔文在自然法则上的发现相匹敌，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法则

很大程度上是机械论的和物质论的。

科学征服了每一条阵线。外科手术达到了精湛的水平，这一成就帮助心理学家发展了神经解剖学，研究大脑的功能，在脊髓神经里确定各种反射神经的位置。麻醉学也发展起来。医生能够隔离导致疾病的细菌，对一些由细菌造成的病症找到了医治方法。药品首次被认为是科学的、有效的。这是科学的另一个胜利，它正如英国在工业上取得的显著成就——奇迹般的蒸汽机、机器设备和化学上的进步——一样，是显著的、有益的。

各种科学组织形成了。业余爱好者带着蝶网和地质锤涌到乡下。喜好读书的人们购买、阅读大量的科学读物，无论是艰涩难懂的、还是普及性的书籍。大量的商品充斥着英国的市场，证明了人是自然的主人，但同时也有一连串的科学事实表明：人是自然机械力的奴隶。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正如罗马守门神（Janus）一样有两张脸孔，而且都是令人敬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必须面对的，正是这无往不胜的科学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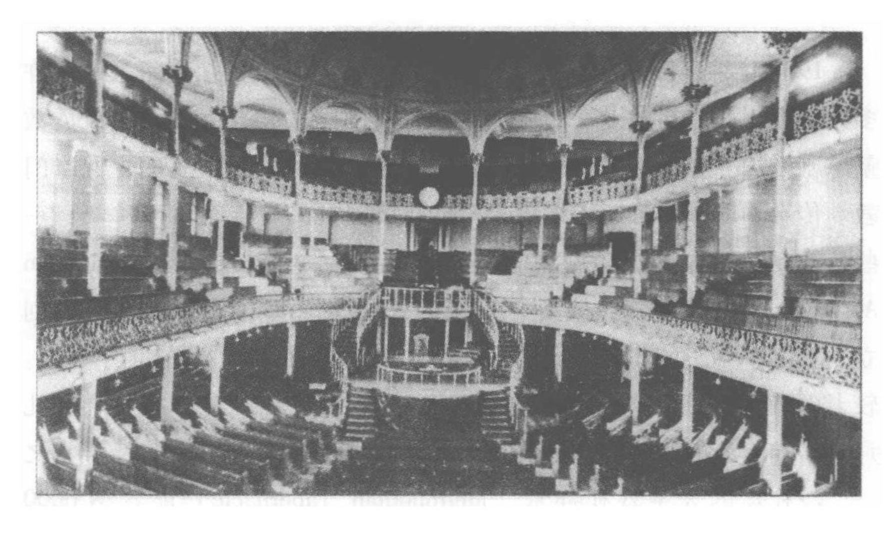
宗教与怀疑

1901 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时，她的大多数臣民信奉宗教——许多人热衷于此。在她漫长的统治时期，英国国教和自由教派的成员数量急剧增加。新的教派出现了，也有些教派是从国外引入的，像摩门教。传教士向世界各地传布福音，也在英国贫民窟传教。1844 年，一些信教虔诚的亚麻布匹商创立了基督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1877 年，威廉·布斯将军（General William Booth）创立了救世军（Salvation Army）；如今，这两个组织活跃在世界各地。较老的教会，其教堂数量增加了。从 1861 年到 1901 年，浸礼会的礼拜堂增加了 3 倍，公理会和罗马天主教也增加了 2 倍。这些礼拜堂之一，浸礼会的大主教礼拜堂（Metropolitan Tabernacle）能容纳 6000 人。该教堂伟大的牧师查尔斯·司布真（Reverend Charles Spurgeon）一生向 1000 万人布道，并将其讲稿传给了 5000 万读者。事实上，布

629

道的演说词成为民众欢迎的读物，能与小说相提并论。卫理公会教士休·普赖斯·休斯（Hugh Price Hughes）感召了皈依者。19 世纪 90 年代，他发动的新前进运动（New Forward Movement）在伦敦西区有显著进展。英国国教在它的教区和主教礼拜堂里，在它的学校和大学里，都能保持它的信徒。宗教信仰，虽然很少有字面意义的理解，但它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数百万英国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人不去教堂做礼拜，也几乎没有宗教信仰，这是贫穷、无知、被忽视的结果，而不是思想怀疑所致。当然，思想怀疑的确侵袭了受教育阶层。日益膨胀、向各方面渗透的理性主义，在一些受教育者中间造成了一种自觉的、热忱的、进取的不可知论。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世俗化的渗透和扩张，它反映了财富、人口、文化修养、城市、寿命、娱乐的增长，特别是各种各样知识的增长。这是一种世俗化，它允许宗教信仰与怀疑同步发展，允许信教和不信教并行前进。由此引起的冲突斗争造成了社会的紧张与不安，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无论他们如何对物质上取得的胜利成果感到满足，都不能逃避这些影响。



浸礼会的大主教礼拜堂（*Courtesy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London*）

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一部分，在不信奉国教派宗教信仰的增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自由教派的教徒增加了一倍多，从不足100万人增加到200余万人。在1800年，他们的教堂数量有限，为数不多；到1901年，他们富丽堂皇的教堂已容纳8788825个人做礼拜，这能与英国国教拥有的7236427个席位相提并论。公理会和浸礼会的教堂也变得更加统一化，卫理公会的教堂则更为民主。对于卫理公会而言，改革并非易事。1849年，牧师杰贝兹·邦廷（Reverend Jabez Bunting）开除了3个牧师，成为他专制统治中的一部分。接踵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叛，这使卫理公会失去了50000个正式的教徒，但这也导致了民主改革，为俗人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接下来的50年里，卫理公会增加了340000名新教徒。分裂结束了，联合起来的卫理公会教众将近100万人。 630

长期以来，俗人在公理会和浸礼会中占主要地位。缺乏统一是这两个教会都存在的问题，他们通过创立公理会总会和浸礼会总会、召开年度会议、创办会刊、设立伦敦办事处，来解决这一问题。1892年，自由教派理事会（Free Church Council）的成立同样也促使他们更为统一。1897年，自由教派理事会会长、才华横溢的卫理公会领导者休·普赖斯·休斯讲到，该理事会的目的是将基督教的法律运用到人生的任何方面。自由教派发扬了休斯引以为荣的“非国教徒的良心”的口号。这种号召成为一种令人敬畏的、像清教徒一样严格的力量。它向一切形形色色的罪恶宣战，而追求、奉行种种美德。它向家庭、店铺、贫民窟、郊区和一切政治场合进军。在家庭中，它带来了家庭祈祷，阅读《圣经》，把安息日奉为神日，支持严父的家长地位。它劝导许多工人进行自我改善，厉行戒酒。它为城市的中产阶级人士提供了一种社交和知识活动的集中地点。在没有电影、电视的年代，礼拜仪式、讲道、开会、社交集会和慈善活动，成为教徒生活的中心。非国教徒的良心也感召了慈善事业。慈善事业中最有名的是卫理公会的巴纳多博士（Dr. Barnardo）开办的许多孤儿院，也有许多其他慈善事情。自由教派人士甚至到贫民窟里面去设立布道所，企图减少那

里的污垢和贫困。休·普赖斯·休斯宣扬“基督是社会的改革者”，与此同时，公理会1883年出版的《伦敦安乐园外的悲惨呼声》（*The Bitter Outcry of Outcast London*）一书震撼了全国人民的良心。

非国教徒的良心没有回避政治。他们将所奉行的基督法律推行到各市议会，组织了和平团体，要求店铺在安息日关门不做生意，呼吁减少酒店，抨击营私舞弊。非国教徒的良心统治了伯明翰、利兹、莱斯特、布拉德福以及其他诸多城市。非国教徒也向议会派送议员，他们成为自由党的中坚分子。1890年，他们在议会中的力量已非常强大，以至于终结了查尔斯·斯图尔特·帕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的政治生涯，因为他犯了奸淫罪。正如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评论说，“从长远来看，英国的政治将会遵循非国教徒的良心。”

帕麦斯顿勋爵只说对了一部分。英国国教依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1870年和1902年，英国国教在教育问题上击败了非国教徒。这两年所通过的教育法案，维护了英国国教对全国半数以上的、以儿童为教育对象的初级学校的教育权。对国教教区内的人民而言，他们长期以来已习惯于国教用的公祷文、安息日晨祷、晚唱、村民洗礼仪式和婚丧仪式。国教很自然地提供了一种温和的、令人感到满意的宗教信仰。然而，在这种大声的、过分炫耀的争论中，国教或许帮助削弱了这种信仰。

631

正是教会的这些争执，常常成为头条新闻。最富戏剧性的争执之一是从长袍、蜡烛和熏香问题上引发的。仪式主义者的争论是从牛津运动强调圣礼重要性开始的。牛津运动始于牛津，在那里，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和其他人士撰写小册子，论述英国国教是一个有着十二使徒信仰的天主教教会，它独立于国家和罗马教皇之外。只有国教所规定的正规仪式，才能赋予教堂以基督教亲临的意义。于是，高教会派教士在举行圣餐礼时，要身着白色法衣，将圣餐桌布置成神坛，用蜡烛进行装饰，使用熏香和圣水。罗马玩意儿！教皇臭味！偶像崇拜！评论家们大声叫喊到。1850年，这种呼声转变

为暴乱。但是，国教所受的损失还不止于此，这些仪式迫使许多人纷纷脱离国教。1874 年，担忧的议会通过法案宣布这些是非法行为，惊恐的主教命令结束这些仪式。一些高教会派教士反对法案，他们被关入监狱。反过来，这又激怒了国教区的人民。这些民众住在单调乏味的城镇，他们在教堂富丽的集会、光彩的法衣、圣坛、蜡烛和燃香中找到了一种美，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常见到的。在不止一处的国教区里，他们竞相要求释放被监禁的教士。仪式主义保存了自身，成为英国国教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教义问题上也存在着争议，高教会派再次成为领导者。1847 年，埃克塞特（Exeter）主教亨利·菲尔波茨（Henry Phillpotts）拒绝承认一位福音派新教徒持有国教教产，因为这位牧师不承认受洗礼是人的性灵复活的全部原因。同年，菲尔波茨和大多数主教反对一位广容教派的教士汉普登博士（Dr. Hampden）受任赫勒福德（Hereford）主教，尽管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1851 年，伦敦主教说服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将另外一名广容派教士 F. D. 莫里斯教授（Professor F. D. Maurice）开除，因为他怀疑永罪。这些争吵使新闻报刊对教会人士的互相攻击揭丑大感兴趣，而对于保卫宗教信仰是不利的。一些国教教士对教义固执到愚顽的程度：在萨福克（Suffolk）村，一位教士拒绝埋葬一位非国教徒的婴儿，因为其未受洗礼。村民哗然骚动，这个教士吓得躲在他所建造的 9 英尺高的花园围墙后面。

尽管受到这些争论带来的伤害，但国教在悄悄地变得强大起来。教士离职领薪、兼职复薪、以及待遇严重不平等的现象减少了。从 1828 年到 1900 年，议会也给与了非国教徒较大的平等。在 19 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取得了在教区坟地自行埋葬其家人的权利，也取得了就读牛津、剑桥的权利和免缴教会税的权利。英国国教停止了压迫。它也开始不再是贵族和乡绅他们懒惰的年轻儿子们的天堂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教士们，从教堂牧师到主教，都变得更为专业化。他们在神学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更加献身于教区的工作。牛津和剑桥不再把持教士的教育；教区的神学院此刻已培养出了尽职尽责的教士。 632

新培养出来的教士也进入了城市里的穷人区，传播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和弗雷德里克·莫里斯（Frederick Maurice）在1850年创立的温和基督教社会主义。1877年，斯图尔特·黑德勒姆（Stuart Headlam）创立的圣马太公会（Guild of St. Matthew），1884年，塞缪尔·巴尼特（Samuel Barnett）创立的汤因比礼堂（Toynbee Hall），这两者都设在伦敦东区的贫民聚居区，两者都致力于减轻贫困。在黑德勒姆所创办的刊物《基督教改革者》（*The Christian Reformer*）中，他提出了社会应更公平的主张。这一呼吁在1889年得到了基督教社会同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的响应，它所倡导的格调要更高一些。这个组织始创建于牛津，它拥有教士1436名。其会长是一位牛津著名的神学家布鲁克·韦斯科特（Brooke Westcott）。韦斯科特出身于剑桥的三一学院，与芬顿·霍特（Fenton Hort）和约瑟夫·赖特福特（Joseph Lightfoot）是同学，他们三人给英国国教带来了一种学术性的、现代化的神学，一种把《圣经》研究和社会福音相结合的神学。它是一种社会福音，并非与卫理公会教士休·普赖斯·休斯和公理会教士约翰·克利福德（John Clifford）所说的福音大相径庭。这种福音更多地以“登山训众”（Sermon on the Mount）的道德为基础，而不是以圣保罗使徒书信中的神学为根基。这种道德表明，世俗化甚至存在于教会中间，它会侵蚀教会信仰。

对工人阶级和他们不信仰宗教而言，这一切并非都是有益的。这从两方面表现出来：多年以来工人阶级对宗教的无视和冷漠；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宗教产生的新怀疑。近乎异教徒的工人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国教教会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贫困、柔弱的人们眼中，国教代表掌握财富和权力的阶级。教士代表地方法官和济贫法贫民救济委员，他们有权将犯法和不遵约束的人关入监狱和送入济贫院。许多教士对收取礼拜座位钱、教区税金、丧葬费和什一税都非常认真，而对贫民的事情则随便得多。家财殷实、常与贵族来往的主教们，总是反对改革。国教教会依旧是有钱有势之人的教会。公理会、浸礼会教堂里的精英们也都有钱有势，尽

管身处较小的品级中，但他们是制造业城镇里的人。这些清教主义教堂里的神学，对于工人而言，常常太过狭窄、太过冷酷、太过教条化。卫理公会简单而有感情的要求，最能迎合工人阶级的宗教需要，但主要迎合他们中间情况较好的那部分人。休·普赖斯·休斯最大的成功是在伦敦西区，而非东区。

出现在 1850 年至 1880 年的福音派新教的第二次复兴，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在大多数人眼中，宗教信仰是繁荣的反映。在经济萧条期间，卫理公会的信徒减少，而在繁荣时期则增多。宣扬纪律、勤劳和节俭的宗教信条，能够在社会上和在心理上发挥作用。它的清教主义伦理能让工人更好地工作，让商业更加繁荣昌盛。对于已经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人们来说，这种伦理给出了一种受人尊敬的公式。他们的整齐清洁、循规蹈矩，与那些衣衫褴褛、酒气熏人的工人截然不同。卫理公会成了中产阶级的教会。在 1892 年,《卫理公会时报》(*Methodist Times*)说："在我们教堂的任何理事团体里面，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人代表是件极为罕见的事情。"东区传教士和宣传基督的布道者，这些作为社会改革的人们，远远不足以修补那条鸿沟——它把工人从自由教派的有钱人和英国国教中的特权阶层中分离出来。 633

正是这种事实，有助于解释威廉·布斯的救世军和劳工教堂获得成功的原因。布斯的救世军深入贫民区，在那里设立支部，他们不但进行济世救民、劝善惩恶的布道，还向贫民捐助汤食和床位，使他们能果腹安身，并在赏心悦目的庆典中，让穿着彩色制服的军乐队奏起教堂颂歌来激发贫民的兴致。劳工教堂给有知识的工人讲社会主义的道理、伦理方面的思想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却丝毫不谈神学。他的救世军因能温饱安身而维持了下来。劳工教堂却昙花一现。世俗思想较重的工人可以从自行车俱乐部和足球俱乐部中找到友谊，从音乐馆和娱乐场中找到快乐，从工党和工会活动中找到社会主义。可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一种伦理上的严肃认真，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自由教派的理想。结果，英国工人从未发展到欧洲工人阶级的那种强烈的反教权主义。但是，英国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既不相信基督的神性，也

不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

英国上层阶级的一些人也开始不相信基督教故事的真实性。到1900年，不可知论预示着维多利亚知识界中新正统学说的到来。这种思想，连同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对宗教的普遍冷漠，使1886年以后去英国教堂的中上层人士减少了。怀疑主义普遍深入人心。它反映了三种强大的知识力量：对理性的呼吁；严肃的基督教的伦理需求；各类知识的进步。

上述三种力量的第一种——对理性的呼吁，是此前已有的力量。在中世纪，这种力量构成了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力量激励着弗朗西斯·培根的梦想——通过经验科学促进知识的进步。18世纪，大卫·休谟展示了对理性的呼唤如何能导致宗教怀疑。中世纪，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牢牢控制了理性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宗教信仰和理性的学说都有独自的范围，这种范围庇护了宗教信仰。但是，到了18世纪末，托马斯·潘恩、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杰里米·边沁否认信仰有其庇护的范围。19世纪，这种富有进取性的理性主义变得更加强大。哲学家批评得越来越厉害。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不向任何权威屈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倾向，要求对一切事情都要问“为什么”。1843年，他出版了《逻辑原理》，证明了知识是从仔细的观察和准确的推理中寻求出来的，而非从历史的或神秘的神灵启示中得到的。他还引申了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理论，认为一个科学时代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宗教时代和玄学时代。其他学者引申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和乔治·弗雷德里奇·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学说，或者翻印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伟大著作。许多支流汇成了理性主义思潮的大河。

许多信奉宗教的人士接受了培根对宗教信仰和理性的区分，因而接受了这种对理性的呼吁。然而，有些基督教徒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使他们谴责这种划分，说这是自由主义者的胡说八道。他们常常是福音派新教的子弟，从福音派新教那里，他们吸取了对公正和热情这样

634

理想的虔诚信仰，而这种理想和旧式神学是格格不入的。19 世纪 40 年代，两位年轻的福音派新教徒对这种调和表示担忧，一位是小说家玛丽·安妮·埃文斯（Mary Anne Evans），很快以乔治·埃利奥特（George Eliot）的名字而闻名；另一位是詹姆士·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后来成为研究英国都铎王朝的历史学家。弗劳德的怀疑使他在 1849 年出版了《信仰的报应》（*The Nemesis of Faith*）一书，该书震惊了信教者，并在牛津当众焚烧。使埃里奥特、弗劳德、以及许多其他的人士烦恼的，是赎罪的不公。无辜的耶稣要去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这公道吗？因为耶稣的这一牺牲，许多罪孽深重的人就可以升入天堂，这公允吗？上帝将许多有德行的人降入地狱，而仅仅因为他们在某时、某地、某种偶然原因不再崇信基督教，这样的上帝公正吗？这种通过宗教信仰得到的公平，与在登山训众中大慈大悲的道德相去甚远。

历史研究也对基督教产生了怀疑。乔治·埃利奥特在 1846 年翻译戴维·弗雷德里奇·斯特劳斯（David Frederich Strauss）的《耶稣的一生》（*Life of Jesus*）一书时，便遇到了这种情况。斯特劳斯用史学的严谨标准研究四福音。他发现四福音中所载的神奇故事没有事实根据，对耶稣一生的描述前后不符，复活的故事是一种神话。该书引起了 19 世纪宗教思潮的革命，这种革命又因 1862 年法国小说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名作《耶稣的一生》（*Life of Jesus*）而更加广泛。受过教育的维多利亚人，也读了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文明、关于地质学和生物学最新发现、以及关于世界上各种宗教的学术研究的著作。知识的大增、历史时间的延伸和地理空间的推广，使他们的意识境界更为广阔。旧石器时代和古代社会使发生在加利利（Galilee）的事件显得微不足道。对理性的探究、严肃的道德、以及进步的知识，从各种角度引起了对基督故事真实性的怀疑。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进展导致了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达尔文私下地、悄悄地丢掉了宗教信仰；对于其他人而言，像 T. H. 赫胥黎（T. H. Huxley）和查尔斯·布拉德洛（Charles Bradlaugh），他们高声

地、公开地抛弃了宗教信仰。事实上，赫胥黎创造出“不可知论者”（agnostic）这个词，把它应用在那些声称他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的人身上。查尔斯·布拉德洛是1860年国家世俗会社（the National Secular Society）的创始人，他不加谦虚地告诉下院，誓言对他来说没有约束力，因为他是一名无神论者。深深的宗教信仰和愤怒的下院拒绝承认他的言论。这是种不合时宜的争论，它使布拉德洛及其无神论的同伴在宗教信仰很强烈的地方建立了地方会社，抨击宗教信仰。布拉德洛的地方会社很快就衰落了，但是不可知论并未没落。19世纪30年代，12名最优秀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成为英国国教中的教士；在19世纪80年代，12名最优秀的毕业生成为了不可知论者。在整个知识界，出现了同样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未必很彻底。

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不可知论者。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一种更广泛的、更有哲学性的信仰来代替他们失去的耶稣复活之信仰，这种更广泛的、更有哲学性的信仰建立在道德、直觉、或历史的进程之上。例如，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找到了上帝。历史和历史英雄——那些像但丁、路德、克伦威尔一样的人，都揭示了上帝的道德法则，一种惩恶奖善的准则。信仰是永无止境地接受精神的和道德的准则——它隐藏在肤浅的、短暂的感性世界背后，操纵着人们的命运。在卡莱尔于1833年至1841年出版的作品《裁缝雷萨图斯》（*Sartor Resartus*）、《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英雄和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中，他运用他的博学多识、铿锵有力的写作风格、以及他反复重申的观点（认为历史、理性、自然和道德准则，所有的这些揭示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震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他对神的、道德的世界进行明确地断定，这对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还有许多其他人士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样，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的自由基督教深深影响了数百名拉格比公学（Rugby）的学生们。阿诺德告诉他们，宗教的真理并不存在于神学里面，而是“存在于一种确定的道德境界里

面……”。阿诺德代表了广教会派运动，该运动想把基督教置于一个理性和自由的基础之上。1860 年，7 名牛津的广教会派人士出版了《杂说与评论》（*Essays and Reviews*），将这项任务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给基督教故事一个象征性的和隐喻的评注，他们调和了基督教与《圣经》评论之间、基督教与新地质学之间的矛盾。正统主义把这种调和斥作是十足的邪教，但这种调和却是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

卡莱尔历史中的上帝和托马斯·阿诺德的伦理基督教，并没有消除所有人的怀疑。1851 年，年轻的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发行了《怀念》（*In Memoriam*）；1867 年，托马斯·阿诺德的儿子马修（Matthew）发表了《多佛海滨》（*Dover Beach*）。这两首诗反映了在怀疑的世界里对宗教意义的搜寻。丁尼生写出了“怀疑和恐怖”，“没有上帝的深渊”，以及“不再相信”的声音。阿诺德哀叹那“信仰的海洋”渐渐衰退，“怀疑之风”突袭而来。但是，正如乔治·埃利奥特和 J. S. 密尔一样，丁尼生和阿诺德都坚持认为，生命有一种宗教意义。丁尼生和阿诺德相信，在他们自己之上，存在着一种超宇宙的力量；埃利奥特和密尔认为，耶稣的伦理是人类的宗教。

诗人对超宇宙力量的直觉，卡莱尔历史中的上帝，自由基督徒相信耶稣的伦理是基督教的本质——这些观点以及类似的多种看法，创造了一种宗教现代主义，这种现代主义与那些仍有生气活力的传统信仰一起，使 19 世纪的宗教比之前或此后的都要严肃认真。但是，它不能持久。现代主义诚然调和了科学理性与宗教之间的矛盾，但这是抛弃了基督教视为中心的神的启示这种信念才办到的。传统主义者保留了这些启示，但他们只能否定最令人信服的科学理论。现代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都面临着经济的增长，日益延长的寿命，以及城市生活中诸多引人入胜、使人不复思念来生的乐趣和享受。但是，这是 20 世纪的事情了。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从未如此大幅度衰落，以至于不再成为限制女王陛下臣民的道德和风俗的最重要力量。

道德和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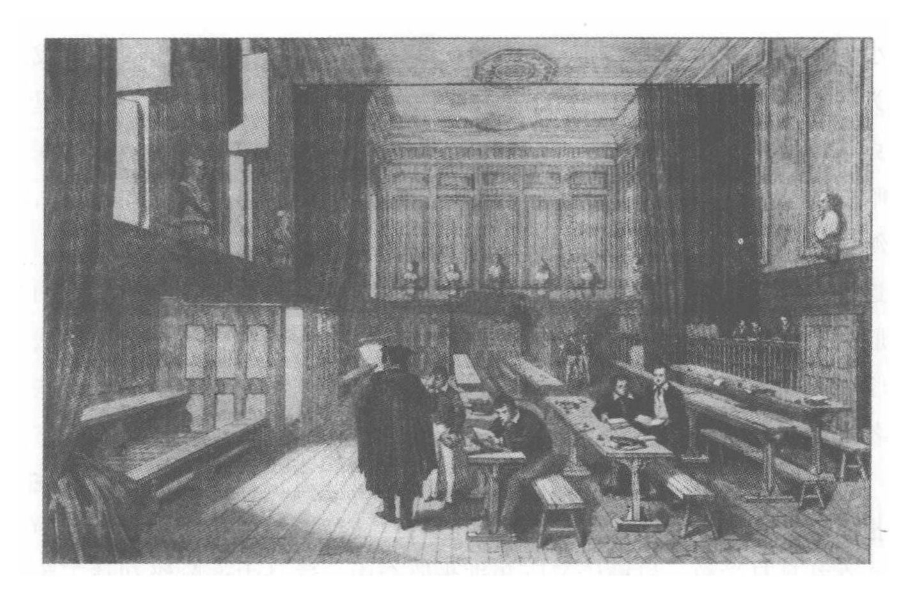
严肃的道德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中心。它限定了无数臣民的特点，限定了统治社会的风俗。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觉性，使人们远离了18世纪松散的文雅举止。通过教士的宣讲、家长严父的训导、教师的教育、法官的申诫、诗人的颂扬，这种严肃性渗透到了各个阶层。它的中心在中产阶级和福音派新教的宗教信仰中，但它扩散到了上至贵族阶层、下到工人阶级中间。它体现了所有宗教信仰的观点，也体现了哲学的大部分观点，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不可知论的。

636

当然，这种道德并不能约束每一个人。仍旧存在着纵情享乐的贵族、崇拜财神的商人、无视道德规则的工人，也存在着被贫穷驱使走向维多利亚时代下层社会的乞丐、扒手和妓女。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太复杂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太漫长了，以至于不可能只形成了一种道德或一种社会风尚。当时有很多的道德观念（以及非道德观念）的存在，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秩序和风俗。然而，大约从1840年到1880年，某些伦理价值和某些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形成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紧张热烈的道德准则。

这种准则强大的根基在于福音派新教徒的家庭中，在于改革的公立学校中，在于更加严肃认真的牛津和剑桥大学里面。对于众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言，家庭是神圣的。家庭是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锻炼形成人的性格的学校。当时的家庭，有祈祷、读经、严肃的家规，这些使它成为一个结构严密的小单位，远非18世纪早期那种松散放纵家庭所可比。这种家庭中标准式的父亲，必然固执地坚持严厉而虔诚的清教信条，这种信条会使某些人，比如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拒绝送他们的儿子上公立学校，这种学校以恃强凌弱、争吵斗殴、鞭责体罚、性关系混乱而闻名，不重读书、宗教，学生学业荒废、信仰沦丧。当托马斯·阿诺德在拉格比、C. J. 沃恩（C. J. Vaughan）在哈罗（Harrow）、克里斯托弗·沃兹沃斯（Christopher Wordsworth）在温切斯特，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把死记硬背的希

637



在大型公立学校中，富家子弟学习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气概（*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腊和拉丁文的教学、扰乱性暴力和恃强凌弱的习气、对宗教信仰的忽视、以及饮酒和性的堕落去除，代之以更广泛地、更多地要求课程、改良的纪律、每天礼拜、严格的道德、热情地参与足球、板球、划船、拳击和体育运动之时，重要的是减轻了严肃认真的父亲们的痛苦。长期以来带有教训意味的说教、西塞罗的演讲、以及英国过去的历史，加入了一种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制度中，年长的学生命令和欺负年轻者，向他们灌输所有普遍存在的、毋庸置疑的特权保守主义思想。因此，这些花费高昂的英国国教寄膳宿学校，以及许多效仿的学校（一些非国教徒的），成为权力机构的未来统治阶层——商人和制造商的儿子们加盟进来——的训练场所。到1902年，已经有64所这样的学校，它们致力于使人形成一种具有男子气概的、神圣的、基督教的特征。

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是托马斯·阿诺德得意门生之一，在他的一本名为《汤姆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 Days*）的

小说中，这些新思想赢得了广泛的欢迎。1857年该书首次出版，它成为一本经典之作，只有弗雷德里克·法勒（Frederic Farrar）的《埃里克，或点点滴滴》（*Eric or Little by Little*）才能与之相媲美。法勒在哈罗教书。这两本书颂扬了一种以基督教和爱国气概为基础的道德，颂扬了一种幼稚的、活泼的、但却是纯真地追求生活和成功的热情。这些理想目标以较为成熟的形式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些理想目标以较为简单的形式在文法学校中获胜，这种文法学校在追求敬神之道和良好的学习研究上与公立学校相竞争。在这些各式各样的学校和大学中，上层和中上层学生一起成为了统治阶级。

638

在制造业阶级中也产生了一种极为类似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在报纸编辑者、图书销售商和印刷业者的学徒身上能够找到痕迹，其中心在礼拜日学校、机械传习所和进步协会中，这是中产阶级和技工阶层较有抱负的子弟们寻求自我提升的地方。例如，在沃克先生（Mr. Walker）所办的《普雷斯顿卫报》（*Preston Guardian*）的印刷所里，3位年轻的学徒学到了报馆的技术、规程和自力更生的能力，这些使他们成为了《利物浦信使》（*Liverpool Mercury*）、《普雷斯顿导报》（*Preston Pilot*）、《利兹水星报》（*Leeds Mercury*）的主编。《利兹水星报》的主编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曾就读于当地文法学校（早些时候，沃兹沃斯也就读于此），他加入了一个理性协会来“增进思维能力”，喜欢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籍，到公理会教堂做礼拜。在贝恩斯的成长过程中，开明思想与福音派新教的虔诚精神结合起来，就像苏格兰出版家罗伯特·钱伯斯和威廉·钱伯斯（Robert and William Chambers）的情形一样。钱伯斯兄弟以其艰苦努力和聪明睿智，从爱丁堡书商的学徒开始，后来成为了《钱伯斯爱丁堡日报》（*Chambers Edinburgh Journal*）的发行人和主编，该报纸广泛流行于整个英国。他们的社论全是一些“自助”（Self Helpfulness）、“正确行为”（Right Conduct）、“储蓄银行”（Savings Banks）和“纯洁”（Chastity）之类的题目。

1859年，另外一个自学成才的苏格兰人塞缪尔·斯迈尔斯（Sam-

uel Smiles）在《自助》（*Self Help*）一书中颂扬同样的美德，这本书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到 1900 年，该书销售了 25 万册。1900 年，斯迈尔斯也出版了《品格的力量》（*Character*）、《金钱与人生》（*Thrift*）、《人生的职责》（*Duty*）和 5 卷本的《工程师传记》（*Lives of the Engineers*）。在斯迈尔斯眼中，工程师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是神化了的勤奋、聪明、规矩、尽责的人。像阿诺德一样，斯迈尔斯也是一个相信自我控制和严守纪律的人。人类并非天生善良，人的天性是懒惰和多欲。做人的第一步是抵制这些癖性，第二步便是养成俭朴、守时、勤奋、清洁、严谨、谦恭和遵从的习惯。这些习惯一旦习得并成为洁身自好的信条，便深深扎根在中产阶级人士的心目中，就像基督教的刚毅植根于上层社会的人们心中那样。两者是有区别的，但这只是清教道德不同功能的表达。

这种道德也渗透到部分工人阶级当中，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称之为体面人士的那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能够在编织工的陋室中找到，在农民的厨房中找到，也能在阿诺德的拉格比学校、在沃克的印刷工中找到。确实，年轻的约瑟夫·莱夫斯利（Joseph Livesley）正是在普雷斯顿的一个编织工陋室里，发现了纺织业的萧条意味着穷困和饥饿，唯一的出路是自立、节俭和精明谨慎。他的精明谨慎是至关重要的。精明谨慎使人们从卖奶酪中获得小利、更加节俭和更多存款、以至更大的利润、最后达到成功，无论是一名奶酪批发商、还是《道德改革者》（*Moral Reformer*）———种宣扬完全节欲戒酒的期刊——的编辑，都是如此。到 1862 年，莱夫斯利和许多像他这样的人，造就了 100 万名绝对戒酒者。

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获得了一种正如中产阶级向他们宣传的道德准则和受人尊重的地位，但是，究其原因，正是他们自身。他们的文化也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一种紧密结合起来的核心家庭为中心，在这个家庭中，父亲经常带着皮鞭，是绝对的最高权威，从年龄最大的到年龄最小者、从男性到女性都被按等级来管理。当然，家庭是小规模的——如果非常贫困，家庭只有一个楼上房间、一个楼

639

下房间组成的联立房屋；如果是富裕的家庭，会有两个楼上的房间、两个楼下的房间组成的联立房屋，这两种房屋的所有房间都是狭小的。对于一个六口之家或七口之家（到 1900 年，是五口或六口之家）而言，住所的狭窄需要一些适合的行为规则——有序、严肃、清洁、共用、合作、尊重——这些规则也是必需的，因为他们的资源刚刚够维持生计。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懒散的、酗酒的，或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忽视的），他们落到了堕落者和品行端正者的分界线以下，但是，因为 4/5 以上的人生活在贫民窟之外、并且有工作，那些有自身规则和传统的家庭和邻里，形成了充满友爱、关心、容忍和自立的一种文化。然而，这种文化绝不激进，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正当的领域。

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力量的强大和影响的广泛，源自于它的有用性。在经济上，它带来了成功和社会的进步；在知识思想上，它增强宗教力量，减少怀疑；在心理上，它为一个酗酒、污浊和放荡的世界带来了秩序和清洁。在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之下，维多利亚时代的种种美德使人们得到工作，兴旺发达。1849 年，新闻界人士亨利·梅休（Henry Mayhew）说，就业稳定的人是“开明通达、富有远见和不酗酒的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已结婚成家，家庭干净整洁。他们属于尊老助残的商业性社会组织。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适合男子的运动，比如板球运动。托马斯·阿诺德不辞辛苦地教人勇敢、刚毅。这使年轻人在将要进行自身改革的政府机构中、在大有前途的职业中、在商业界、在帝国中获得成功，

1851 年，对于英国的百万家庭仆人（仅次于农业工人的第二职业）而言，严谨、勤奋、谦恭、依从和整洁，不仅仅使他们显得很有魅力，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对于来自乡下的家庭侍女而言，道德训练始于家庭灶房的严格规矩——其严厉不亚于任何公立学校的纪律，而最终成为把比顿夫人（Mrs. Beeton）的《家庭管理守则》（*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奉为真理的主妇。该书有 64 页对仆人的职责进行了说明。

强调自制、纪律、谨慎以及一种贞洁的生活，这也意味着一个在

心理上更加安全的世界。未改革前的公立学校和伦敦的贫民窟，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这种学校里有打架斗殴，学生往往恃强凌弱，老生欺负新生，还有性游戏；贫民窟则有暴力、酗酒、污秽、罪恶、卖淫和乱伦。一个时代道德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前一时期有缺陷的风俗产生的心理剧变。"稳重的、节制的人"，能给醉汉的孩子带来平安。在白金汉宫，维多利亚女王从她稳重、节制的丈夫艾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身上，从一种受人尊重的生活中，找到了儿时与她那些不道德的、淫乱的叔辈们的生活中未曾有过的快乐。醉汉的孩子、荒淫无度者的侄女、公立学校中反抗欺辱和同性恋行为的学生、以及绝对禁酒者家中的寄宿者，他们都在一个有秩序的、讲纪律的、有道德的生活中找到了快乐。20 世纪，人们反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社会的过分拘谨和假装正经，常常忘却那导致热心、认真的清教主义习俗的道德沦丧。

在很多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得益于它严格的道德。不仅工作与成就的福音创造了一个经济繁荣昌盛、知识惊人涌现的时代，而且，它所坚持的诚实，为公众生活带来了正直的高标准；独立思想的养成，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个人主义；呼吁比自我更高的理想，造就了帮助百万民众的慈善事业和政治家风度。甚至它提出的严格纪律和勇敢无畏，也产生了既表现在工人和士兵身上、也表现在实业家和殖民地总督身上的那种禁欲主义、自制精神和责任意识，从而增强了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的力量。这种道德意识并非呈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或冷酷的面目。安宁恬适的火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不辞劳苦的工人、真正的基督情感、以及唱圣歌和做祷告的安息日，这些都为无数的家庭带来了一种深深的、令人愉悦的满足。 640

但是，事情有另外的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也有危害作用。它常常是残酷的、麻木不仁的、以及过分严格的，这三种特性造成了许多痛苦。它对不听话的孩子和犯了过失的大人的确是毫不宽容的。如果这种严格的条律走向极端、或者成为制度生活中的一部分的话，那就变得残酷了。严酷的济贫院对穷人进行一种极为严厉的惩罚。踏 641

水车、隔离监禁和减膳监禁，给英国监狱中的犯人带来更多的痛苦，而非让他们改过自新。对青少年犯罪的鞭笞也是一样。鞭笞是一种常见的惩罚方式。行政长官对年少的偷猎者，军官对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常处以鞭笞刑罚。父母用桦条鞭打叛逆的儿童，就像学校教师用教鞭训斥学生一样——伊顿公学的约翰·基特（Eton's John Keate）每日鞭打10个孩子。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有一种酷虐的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鞭刑；不带手套进行50回合的拳击赛；济贫院严酷条规中的冷酷无情；强制性的家规；以及男人无视女人。

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认为，女人是低劣的，并让她们习惯于这一观点。当时最有名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声称，男人是行动家、创造者、发明者；女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美好的秩序、供摆设用的”，供赞美吹嘘的。当时最伟大的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在他的诗歌《洛克斯利大厅》（*Locksley Hall*）中所歌颂的一位女英雄，是因为她完全顺从于她粗野的丈夫。伟大的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反对赋予女性选举权，因为这将会玷污她们的纯洁。在《给英国的母亲们和女儿们的信》（*Letters to the Mothers and Daughters of England*）中，萨拉·埃利斯（Sara Ellis）建议女性“满足于低于男子的地位”，并认为好的男子具有接近“天使的性情和能力”。博学的科学家们告诉她们，女性的细胞有一种特殊的遗传基因，这使女人处于被动地位；博学的医生告诉她们，女性在经期容易无精打采和冷酷无情，如果她们成为医生，会危害她们生育孩子的能力。

642

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的妻子们也忍受着丈夫的专制。直到1874年和1882年《已婚妇女财产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s）通过之前，女性结婚时带来的任何个人财产和她之后获得的任何东西，都绝对归属于她的丈夫。如果分居，对孩子的监护权同样绝对属于丈夫。关于是否应该离婚、或者甚至在妻子是否能离开家庭的问题上，丈夫对他的妻子同样也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J.S.密尔1869年著的《论女性的屈服》（*O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书和《英国妇女评论》（*the English Women's Review*）这

样的女权主义期刊的激励下，在无畏的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和难以约束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领导下，女权主义运动被唤醒，它成功地赋予了女性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并削减了丈夫在离婚上和在对孩子的监护上的权力。另外有一些法案结束了丈夫监禁、或束缚妻子的权力。

对于上层女性而言，减少法定的专制法案，并没有减少作为完美夫人的空虚生活带来的专制。在一个到处都有保姆和仆人的家庭里，完美的夫人不应在做家务中弄脏裙子，也不应在管教孩子时把她得体的脾气变得急躁。对大多数女性而言，找一份工作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便非慈善工作也是如此。1893 年，50 万以上的妇女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慈善工作——当地的煤炭厂，制衣厂，综合俱乐部；城镇中的医疗诊所和医院；教堂的唱诗班，集市，访问团体；伟大的国家改革事业和世界传教组织；以及在农村照料离群的猫和狗。慈善机构并不是仅有的工作场所：一些人在新兴的政党中工作，还有一些在当地的政府部门工作。诚然，许多女性忍受着长时间的空闲时光，但是，一些无名的妇女被禁锢在没有人情味的市郊，成为患幽闭症的家庭主妇，这便是女性的宿命，这种情形在一战后比战前更为常见。

在维多利亚时代，最为残酷的命运落到了未婚女子的身上。年龄在 20—40 岁之间的女性，有 42% 是未婚女子。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未婚女子被称作“累赘”（redundant）。如果运气好，她们会成为家庭教师。这是一种斯文的职业，但也是一种孤独、薪水不高、地位低下的工作。如果不做家庭教师，未婚女子便成了兄弟家庭中的一员。在这样的家庭中，她们和家庭主妇一样，不能参与男子们餐后的谈话。在用完甜点之后，男人们退席，喝酒去了，有时候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性生活的乐趣也不是文雅的妇女所拥有的；她们的医生告诉她们，正当的女人没有性的要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性观念非常原始。人们告诉男孩子，夜间遗精是一种疾病，手淫会导致神经病，性交过度会导致性能力丧失。女孩无法知道性知识，男孩则从仆人、寄宿学校的男孩和妓女那里学到性知识。

643

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太过苛刻。其结果便是，下层社会的人对道德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上层社会的人则假冒伪善。许多伦敦人都不遵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亨利·梅休估计，在10个伦敦工人中，仅有一个品行良好。其余的大多数，比如薪酬不高的缝纫工人和成衣裁缝，都在纵酒和放荡中寻求慰藉。而和他们一起混日子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地下世界的庞大人群，如捡破烂的、乞丐、叫卖小贩、推车贩、扒手、入室抢劫者、赌徒、骗子、妓女和贩卖色情作品者。每天晚上，他们都从伦敦东区的那些黑暗的住所鱼贯而出，在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和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周围的、被煤气灯照得明亮的、罪恶的大街上开工行事。

扒手和妓女的数量最多，这两种行当都能吸引年轻人。小而轻巧的手指能够让男孩子扒取有钱人的财物，年轻女孩的处女诱惑能从好色之徒那里得到大笔的赏钱。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所刻画的法根（Fagin）扒手帮的情形，和弗朗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在《我的秘密生活》（*My Secret Life*）中描述的女孩为了买香肠卷而变成妓女的情形一样真实。1851年，警察估算，在伦敦有8000名妓女。这不过是海底冰山冒出水面的尖顶而已——亨利·梅休估计妓女的数量为80000名。尽管妓女的客人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但上层社会也与之公平分享。因为当时的社会鄙视男子没有十足的收入就结婚，所以当时男子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6岁。在这个年龄之前，许多男子要解决性需要，便去找被贫穷逼作妓女的女孩寻欢作乐。

贫穷驱使着很多其他人去犯罪。济贫院的管理者宣讲自立、勤奋的道理，但是，经验表明，流汗做苦工、一星期只拿5先令，这怎么也比不上扒一个价值3英镑的表。最能干的扒手成为了他们帮中的“头面人物”，他们有别墅、仆人和酒窖。如果有魅力，他们会成为诈骗者；如果胆大无畏，可以入室抢劫；如果是一介武夫，可以做勒杀抢劫的强盗，也就是行凶抢劫的路贼。这些犯人既能和体面人一起出入赛马场、舞厅和上层社会场所，也能和不体面的人一起出入在斗鸡场或狗打耗子场。上了年纪和反复坐监，致使许多人变成乞丐。庞大、

多样的地下世界，有其等级和领导，甚至也有伦理道义。如果把这种道义或生活的品质浪漫化，这将会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生活是不稳定的、悲惨的。但是，地下世界确实有它朴实、坦白豁达的一面，这与上层社会中许多人的伪善之言和虚伪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许多来自上层社会的人，他们的施舍滋生了恶习，他们那些工资微薄的行业驱使着一些穷人走向犯罪。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中层阶级和上层阶级总是不能符合他们宣扬的道德标准。一些人违反了这种道德标准，一些人把这种标准转变成呆板的惯例。那些支持腐败的慈善事业的教士反对贪污受贿，破产的商人教训人们要节俭，光顾妓院的人不在他们的画室中讲"性"这个字。诚然，伪善之人仅占少数。但是，在贫穷和不公触目惊心的英国社会，在那些如此贪心地追求富贵和名望之人的清教信条和虔诚背后，存在着更多的虚言和伪善。对财神的崇拜最为强烈。1874 年，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强烈揭露英国物质崇拜的著作 644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其主题便是这种财神崇拜。第二种强烈的追求，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查尔斯·狄更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揭露了这种追求，该书是一本描写暴发户的小说，书中的维内林格（Veneerings）是"住在伦敦新区新房子里的新贵"。那些不稳定阶层所崇拜的追求，引发了不少偏见，当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和查尔斯·布雷德洛（Charles Bradlaugh）于 1861 年因散发关于节制生育的书而被法庭判决入狱之时，当一名医生在 1881 年因推销 6 便士一本的《为妻手册》（*Wifes Handbook*）而被撤销执照之时，一些人为之高兴。《为妻手册》这本讲性的禁书，富人购买无妨，穷人购买就太危险了。一种关于社会阶层和两性的双重标准，危害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风尚是多方面的。它有意志坚强的理想主义者，其中有很多参与到了女权主义运动中去。约瑟芬·巴特勒是最勇敢无畏的人之一。她为妓女的权利而辩护。1864—1869 年的《传染病防治法案》（Contagious Disease Acts）规定，妓女必须进行强制的阴

道检查，而士兵——常常是疾病传染源——却不用检查。巴特勒夫人和她的支持者迫使议会取消了该法案。安妮·贝赞特夫人更进一步——巨大的一步——要求普及生育节制。她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尽管遭到了迫害。至1911年，上层和中层家庭仅平均拥有2.8个孩子。妇女的胸衣和紧身系带也随之消失。女性此刻有了她们自己的学校和期刊杂志，在牛津和剑桥有了她们自己的学院。她们身穿宽松的裙子或短裤打网球，进行划船比赛，参加曲棍球比赛，以及进行爬山运动。新成立的教师学院培养了女体育教师，她们对新中学里的女孩进行体操训练。女性也能成为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和医生，到了1901年，其人数大约212个。这是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的悖论之一，它既引起了男性的沙文主义，也引起了女权主义运动；既产生了无情的资本主义，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它常常是苛刻的，也通常是宽大的，有时无情，有时高贵，但从不懦弱，也从不乏味。它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它能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艺术和文学上的品味产生好的影响，也能产生坏的影响。

品味与心态

对于许多人而言，“维多利亚时代风尚”意味着一种缺乏品味的、庸俗乏味的艺术——感伤的绘画、自命不凡的哥特式建筑、装饰华丽的家具、招眼的壁纸、拙劣的小艺术品（*objets d'art*）、以及小古玩等肆意蔓延。指责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庸俗粗陋是一句老话。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其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便称中产阶级为“庸人”，斥责他们思想狭隘、崇尚实利、对美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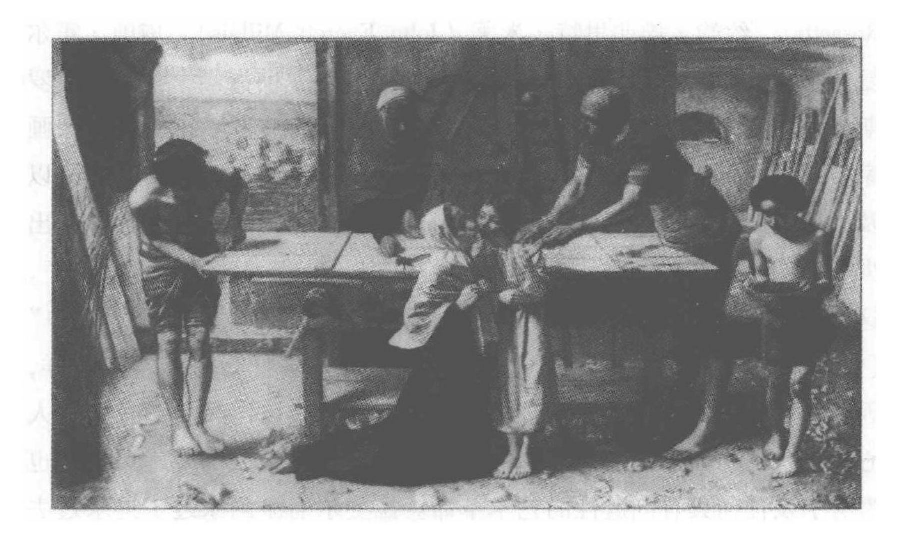
这种指责所言属实吗？如果以追求美所花的精力和深入程度来衡量对美的爱好的话，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如果根据审美的特性来衡量的话，在一定条件下，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花费在绘画上的精力和强度能够用英镑和先令加以衡量，也能用艺术杂志和画廊观众来衡量。维多利亚时代

645

的人在购买艺术品、观看艺术品、阅读艺术和谈论艺术上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是前所未有的。维多利亚时代使更多的画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之前或此后的时期都不及这一时期。艺术期刊杂志如雨后春笋，私人画廊成倍增长。贵族购买大幅历史画，乡绅喜好户外运动生活画，富裕的中产阶级喜爱提高德行的家庭画。小资产阶级满足于雕刻艺术，工匠则看画报，当时的绘画被很粗劣地复制到像《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这样的报纸上。知识较高者，则去画廊，去的人往往很多，甚至在新作展出时，收费达 1 先令。人们非常渴望欣赏到威廉·弗里思（William Frith）的最新作品，以至于安装防护栏是有必要的。

当然，这并不是名作。然而，1848 年，7 名自称是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的年轻画家，反对皇家学会对绘画艺术的把持和历史画高踞画坛的地位，而推崇风景画。他们取材更加质朴和简单，每个细节都用写实的手法。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约翰·埃弗里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是三名拉斐尔前派画家。约翰·罗斯金是他们的支持者，是他们许多思想灵感的启迪者。拉斐尔前派画家希望返回到拉斐尔之前的意大利画家所用的表现自然的精确方法以及摄人灵性的境界中去。他们极度精确地画出草的每一个叶片，画出少女头上的每一根头发。因为他们作画的帆布上都涂上了湿湿的底子，这给他们的作品以一种鲜亮感。米莱的作品“基督在父母家中”（Christ in the House of His Parents），因为将基督画得和常人一样，因此遭到了虔诚信徒的强烈抗议。但有人认为，该作品新颖且振奋人心。一次强烈的争辩随之而来，但没有引发任何重大的艺术风格，也没有引发任何具有创造性的艺术革命。拉斐尔前派画家过于追求过去的作风，而不能获得创立法国印象派的那种原动力和创造力。到 1854 年，这种反叛之声消失了，运动也匿迹了。罗塞蒂一生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那如梦如烟的画和诗都有一种引人入胜的、令人难以忘怀的美。米莱和亨特依靠绘画致富。此两人在叙事画中最受欢迎。

在英国，叙事画由来已久。贺加斯（Hogarth）在18世纪开创了叙事画。在维多利亚时代，叙事画从未上升到绘画艺术的热门，但它却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品味和心态。这些绘画讲述的故事扣人心弦，它庆祝人生中的好事，描绘富足的生活，宣扬高尚的道德，散发给人许多温暖的情感。没有哪个画家描述庆祝生活的充裕能比威廉·弗里思更好，也没有任何一幅画比他的“德比赛马日”（Derby Day）更加神情兼备。这幅画中，把各类阶层的所有类型的人混合在一起：杂技演员、乞丐、吉普赛人、贵族、农场工人、窃贼、以及各种中层人士。这是一个庆祝节日的人群，人们集合起来参加全年最大的赛马；它是一个和谐的人群，决不危害到已确定的各个等级阶层；它是一个健全的、竞争的人群，适合于一个健全的、竞争的时代。它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繁荣昌盛，运用同样至关重要的方式，威廉·贝尔·斯科特（William Bell Scott）的作品“钢铁和煤炭”（Iron and Coal）反映了工业的力量和劳动的美德。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爵士的作品，“基督在父母家中（木匠的店铺）”，1849—1850年（*The Tate Gallery Millbank, London/Art Resource, NY*）



威廉·P. 弗里思（1819—1909 年）的作品，“德比赛马日”，1856—1858 年（*Tate Gallery, London/Art Resource, NY*）

许多叙事画都宣扬道德，但是很少像霍尔曼·亨特的画“良心觉醒”（The Awakened Conscience）那样如此具有戏剧性。在一个杂乱的客厅里，一个女子坐在一名男子的膝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夫妻很少采取这种姿势，它预示着通奸。突然，女子认识到她的风流韵事是有罪的。画中的一只猫正在和一只鸟玩耍，这提供了另外的一个线索：调皮的情人正在玩弄女子的感情。线索在叙事画中经常会出现。一封有黑边的信意味着噩耗，赛马意味着赌博上了瘾。这些种种线索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叙事画和小说所描绘的戏剧性场面的画龙点睛之处，也是这种戏剧性所蕴含的感情的象征。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是用来装饰中产阶级人士的客厅的。无论是描写家庭的叙事画，还是莱顿勋爵（Lord Leighton）的大幅历史雕版画；无论是戴维·罗伯茨（David Roberts）闪光的地形景色画，还是名画家兰西尔（Landseer）所描绘的心爱的狗，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绘画受到尊重，希望绘画有教训意味，希望绘画使人感到安逸舒适。

6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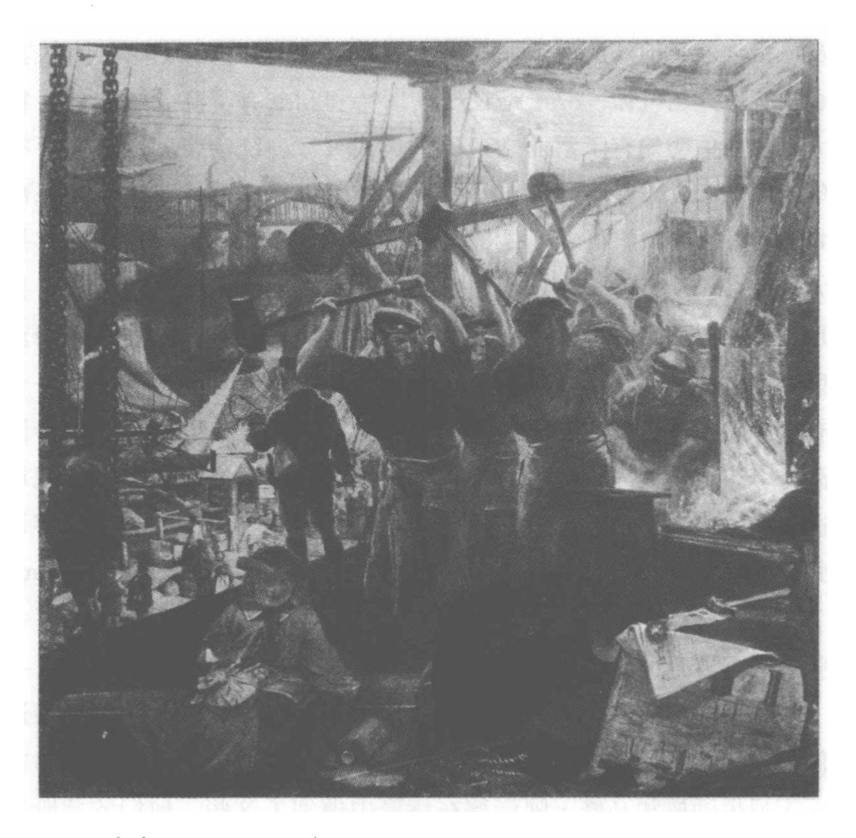
647

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也希望他们的建筑庄严巍峨、给人以深刻印象。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说伟大可能存在争议，但至少可以说宏大。他们的建筑数量多、种类繁、耗资大。建筑师的数量相当多，这些建筑师大多是自学成才，他们乐意提供服务。同样宏大的是那难以置信

的、丰富多样的建筑风格——乔治时代的、哥特式的、古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埃及式的、摩尔人式的。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也很多，有铁、铜、平板玻璃、混凝土、悬臂、预购件。各种书籍、杂志、评论、争辩也同样非常多，许多人妄想为风格杂乱状况找出秩序。但是，就风格统一化的意义上而言，井然有序的状况从未来临。

维多利亚时代没有创造出一种统一的风格，其原因是导致分化的力量太过强大了。乔治时代的风格有非常美好的秩序和理性，但其自身历经了浪漫主义的、工业革命的、历史知识进步的浪潮的攻击，未能存留下来。奥古斯塔斯·韦尔比·皮金（Augustus Welby Pugin）是一位研究中世纪时期的学者，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主张把哥特式作为主体风格。建筑家——如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ilbert Scott），有建造庞大的哥特式建筑——像圣潘克拉斯旅馆（St. Pancras Hotel）——的天赋，乔治·斯特里特（George Street）因建了许多美丽可爱的哥特式教堂而闻名。这些不同形式的哥特式风格赋予了英国城市一种重要的观感，但是，当面临竞争对手热心于古典风格、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巴洛克式的风格时，哥特式没有可能成为主题风格。

但是，为什么会复兴呢？为什么不尊崇本土风格呢？为什么不推崇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的水晶宫这种实用风格呢？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风格的确取得了进展，但是，它大都只是应用在最关注其功能的地方，如工厂、火车站、仓库、船坞、温室。许多这类的建筑既美观、又实用。查塔姆海军船坞（Chartham naval dockyard）所用的现代单纯美的风格，以及圣潘克拉斯和帕丁顿（Paddington）庞大的铁和玻璃结构的铁路库房，仍旧能给游客以深刻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看来，这些库房，如巨大的铁路桥梁和船坞，都是崇高卓越的。那些规模宏大的和带有纪念意义的，那些缀满装饰的和富丽堂皇的，都能吸引并令达官贵族、实业巨头和建筑师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简洁实用转移到装饰和宏伟上来。无论古典的、还是哥特式的，如果它能令人震惊，那就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通过综合不同的风格能够使人敬畏和赞叹不已，这就更好了。庄严壮丽的议会把皮



威廉·贝尔·斯科特（1811—1890年），苏格兰人。他的作品“泰恩河畔的工业：钢铁和煤炭”，大约在1861年绘制。这是一幅帆布油画，其规格为185.4×185.4厘米（*Wallington Hall*，*Northumberland*，*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金（Pugin）的哥特式装饰和查尔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的文艺复兴式设计结合在一起。

装饰华丽、雄壮威严的维多利亚建筑，就像它体现的折中主义和偶尔略带的庸俗品质那样，反映了取得成功的、自学成才的、缺乏正规艺术教育之人的品味。英国没有法国那样的建筑学校，也没有一个强势的君主设计一个巴黎或柏林。英国的建筑师已尽力以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展现了他们的豪情。世界上主要的实业家需要巨大的工厂，于是在利兹，羊毛大王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以笨重的

648

埃及风格创建了他的厂房。那些棉花、羊毛和铜铁中心城市的市政府，也必须有惊人的气派——于是在曼彻斯特和利兹有了高耸屹立的哥特式大厅，在伯明翰有了富丽堂皇的古典式大厅。统治帝国的人需要有豪华的俱乐部，于是沿着巴尔马尔（Pall Mall）建造成了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和旅行者俱乐部（Travellers' Club），这些建筑物都是意大利风格。一个购买了巴台农神殿（Parthenon）所需的大理石、且又是学术中心的帝国，需要一个气势磅礴的博物馆，因此在布卢姆茨伯里（Bloomsbury）建立了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这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古典式建筑。成功的自鸣得意甚至传染到了不信奉国教派身上。在信徒人数超过国教教徒人数之后，不信奉国教派便把规模适中的、像盒子一样的教堂转变成了巨大的教堂，比如浸礼会溶哥特式、罗马式、洛可可式风格为一体的大神殿（Metropolitan Tabernacle）。这类庞大的建筑，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但它们代表了一个骄傲的、富足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不免言过其实、过分夸张。

649

正是那些诗人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强烈地感受到、具体地表达出他们时代的经历和心态。在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和马修·阿诺德在诗篇中做到了这些，他们的诗既悲观又肯定，诗中时而对上帝怀疑、对人生彷徨，时而热心于道德的真实性、享受大自然之美丽。这些特点告诉了我们一种紧张状态，即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科学和工业的新时代捉摸不定。丁尼生的《怀念》深入探索了悲痛和绝望的领域；阿诺德的《多佛海滨》有一种较为柔和的抑郁之感。基督教信念的丧失是两者的关键所在，尽管丁尼生从丧失信仰中恢复过来，而相信一种“永无休止的旅程”正引导人们“远离神的旨意”；阿诺德认为“永恒的不是我们”，这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时代，以此来慰藉自己。在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华丽的诗句里，也透露了一种非神的宗教，它能历经理性和科学而存留下来。布朗宁是一位柏拉图理想主义和基督教道德的信徒，他的诗中充满了积极的价值标准，但是这种价值标准更多的是从过去的时代、而不是在当前的时代发现的。

650



威廉·霍尔曼·亨特的作品，“良心觉醒”（*Tate Gallery, London/Art Resource, NY*）

当前的时代具有不断变化的不确定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困扰着丁尼生、阿诺德、以及当时许多普通人士。工业城市吞噬了村庄，铁路破坏了风景。伦敦变成了畸形的大都会，议会欢迎工业的轰鸣声。高教会派、低教会派、广教会派之间的争吵，以及不信奉国教的争辩，这些使宁静的宗教信仰变成了巴别塔（tower of Babel），这座未建成的通天塔很快被圣经批判学和自然科学连根毁掉。毋庸置疑，繁荣是有的，但它给穷人带来了痛苦，使富人变得傲慢。旧的必然性和忠诚消失了。阿诺德悲伤地说，“真实”变成了“柔软、无常、模糊、多

样和可疑”，而人生则“的确没有了享受，没有爱，也没有光芒”。失去一向珍惜的旧东西，是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一位年轻朋友的死，使丁尼生在他的诗篇《怀念》中写下了深深的忧伤。这首诗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诗篇，因为它非常深入地探究了时代的忧虑，在这个时代里，旧事物看似注定灭亡，新事物则令人畏惧。

维多利亚时代也是一个奋斗拼搏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的诗，很少有完全绝望的——那样的诗篇到了20世纪才有。悲伤和忧郁是有的，但也有奋斗拼搏和道德征服。《怀念》这首诗中既有奋斗拼搏，也有悲伤，它在结尾保证：精神力量将会战胜物质力量。在维多利亚人看来，世界上有许多巨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在商业上、在帝国领土上、在政治上竞争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战斗的时代，不仅表现在军事上，也表现在知识上和道德上。在马修·阿诺德的“渐渐变黑的平原”上，“军队在黑夜里发生冲突”；丁尼生则把大自然描绘成“红色的牙和爪”。然而，阿诺德依然抱有希望，理性和知识将会带来“甜蜜和光明”，丁尼生则在《轻骑兵的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中赞扬英国士兵的英雄品质，他也赞美任何人在努力做到自知、自我克制、遵从道德秩序上的英勇行为。布朗宁也歌颂战斗的兴奋，奋斗拼搏和征服的愉快。在《蔡尔德·罗兰》（*Childe Roland*）中，布朗宁用强劲有力的诗句写道：“激情太过强烈，乃至镣铐无法束缚。”

丁尼生和布朗宁讲述了中世纪关于风流韵事和骑士气概的有趣故事，正如阿诺德描述的古希腊故事一样。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不仅写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忧虑及其所带来的道德上的争执，而且也表达了在一个富裕的、多姿多彩的世界里，旅游、书籍、期刊杂志和价格低廉的版画面向如此多的人们开放所带来的喜悦之情。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也带来了一种在诗篇中表达的纯粹之美的快乐，无论是在丁尼生刻画的绚丽意象和田园情趣中，还是在布朗宁所描绘的戏剧性、紧张、振奋的韵律中。英国人的审美感，在视觉艺术方面很弱，在音乐的创造上更微，可在书面文字表达上则很强盛——于是便有了壮丽的诗篇，

于是便有了登峰造极的成就——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

19 世纪 40 年代，查尔斯·狄更斯大约一年写一部小说，首版（在杂志上连载刊登之后）平均发行 30000 本。开普顿·马里亚特（Captain Marryat）和夏洛蒂·戈尔夫人（Mrs. Charlotte Gore）一年写两本小说，最动情的能销售 30000 册以上。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爱看小说，特别是那些吸引人的爱情故事和冒险故事。到 1858 年，连载小说的期刊杂志吸引了 300 万的读者。到 19 世纪 90 年代，小说每本 4 先令，可以畅销到任何地方。25 万人也能从私人流通的图书馆中读到标有记号的小说复本，而急速发展的公共图书馆每年借出 2000 万册以上。 651

读小说的维多利亚时代人，是当时繁荣的、流动的世界中的一部分人。当时的人们从事了新的工作，住进了新的城市，拥有了新房子，提升了社会地位，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购买了大批新东西，获得了选举权，进入了政治领域，去参加演奏会，去音乐厅，听演讲，以及参与各种运动项目。有很多事物是新奇的，令人手足无措的，甚至使人感到害怕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有三种作用：它提供了一幅那个社会的地图，提供了一幅那个社会的画面，提供了一幅那个社会的全景图；通过揭示一种现代生活的意义，它帮助这些流动的人们找到了一种共有的东西；最后，它让他们感到愉悦。

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所提供的是一幅无所不包的、人群涌动的、各式各样的、真实的社会全景图。它涉及所有阶级和任何地方。对于大部分小说而言，一个特定的地点是至关重要的，它说明了小说的真实性。描写过去中世纪时期的历史传奇故事已经过时；现在，人们阅读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巴彻斯特塔楼》（*Barchester Towers*），了解一个主教教堂城镇的细微差别；读伊丽莎白·加斯克尔（Elizabeth Gaskell）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得悉曼彻斯特的工厂生活；读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雪莉》（*Shirley*），欣赏到了约克郡工业城镇里面的生活；或者读狄更斯的《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领略庞大无比的商业都市伦敦。

许多小说家同样把焦点集中在他们最了解的阶级上——那些中产阶级的身上。但是，有些小说家超越了地点和阶级的界限，特别是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的《名利场》（*Vanity Fair*）和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的著作。

在《亚当·比德》（*Adam Bede*）中，爱略特研究了乡村人物，在《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则考察了伦敦的上层社会。然而，正如在《米德尔马奇》（*Middlemarch*）中所描写的那样，新的城市中，乡绅、银行家、医生、教士、技工和太太们，他们摩肩接踵在一起，这显示了乔治·爱略特作为一个绘制社会图画者的天才。爱略特以科学家的精确描绘出了城市中的社会阶层，以大艺术家能够掌控的同情心去刻画每一个人如何努力和社会团体沟通，如何适应社会制度。她试图在她刻画的人物中找出思想的准则，从阶级的冲突中找出社会潜在的规律。在《弗罗斯河上的磨坊》（*Mill on the Floss*）里，她看到了一个美好的社会，这是一个有着“葡萄美酒和天鹅绒地毯”的社会，有着歌剧院和“梦幻舞厅”的社会，这个社会建立在“毫无芬芳味，但闻机器轰鸣声，矿井里染身，熔炉旁擦汗……的国民生活缩影”之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毫不畏缩地批评富人。狄更斯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所写的默德尔先生（Mr. Merdle），“的确是最大的伪造者，是最大的盗贼，曾把绞刑架骗到手”。《名利场》里的有钱人，用萨克雷的话说，是“贪婪、傲慢、卑鄙、绝对自满的人物”。特罗洛普笔下的铁道大亨梅尔莫特（Melmotte）是一个诈骗犯，到处招摇撞骗。但是，真正使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感到惊骇的，是那些向默德尔和梅尔莫特献媚奉承、躬身屈膝、赞美吹嘘之人。

尽管小说家揭露了富人的缺点和社会的不公，但是他们没有宣扬进行革命。正像乔治·爱略特描绘的“毫无芳香味，但闻机器轰鸣声”一样，加斯克尔在《玛丽·巴顿》中、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也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但是她/他们没有提出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宣扬改变人心，给与更多的慈悲，给与更温暖的感

652

情。他们的读者和评论者，正如他们自己一样，是中产阶级人士；甚至连过分的揭露也应当避免。一些评论者认为，《名利场》在披露上层社会的愚行和邪恶上太过无情了。一些评论者指责狄更斯品味很差，他在《雾都孤儿》中如此淋漓尽致地描述罪恶的世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对性爱、热情和男性的暴虐描写得太过直白坦率而接近危险了。小说应当结局愉快。人们特别满足于那带来幸福家庭生活的婚姻，或者一个仁慈的神父挽救了一个孤儿。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沐浴在这种多愁善感的情境中，使那些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不公和无力消除这种不公现象所引起的紧张心情得以释放。

维多利亚时代更伟大的小说家也试图从时代变迁的潮流中寻找一些意义，给与那些沦落其中的人们一些认同。女小说家尤其能做到这一点。19 世纪 40 年代，伊丽莎白·加斯克尔、乔治·爱略特和勃朗特姐妹——夏洛蒂、安妮和艾米莉——成为主要的小说家。另外，也有许多女性加入了二流小说家的行列，她们中的许多人，像勃朗特姐妹、爱略特和加斯克尔一样，试图为生活在一个出头机会很少、评价不利的社会中的女性寻求地位。在加斯克尔夫人的《露丝》（*Ruth*）和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奇》所刻画的多萝西亚（Dorothea）中，以同情的笔墨刻画出了这种寻求，但是采用的是老套的形式——对于多萝西亚而言，人生的意义是在道德上决心要"为米德尔马奇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所表现的程度和热情更加强烈，但是并没有拒绝道德和习俗，勾引被断然拒绝，故事以结婚而告终。

男人同样生活在迷惘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在描写打击伦敦市民的那些神秘的、非人力的、萦绕心头的力量方面，能够比狄更斯更有才赋。他笔下的伦敦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拥挤不堪的世界，这里的大多数人相互之间不能建立联系，许多人像年轻的奥利弗·特威斯特一样无助，陷入犯罪的生活，或者像保罗·董贝（Paul Dombey）一样，"内心空虚得发痛，一切外部事物是如此冷酷、赤裸、陌生。"

在狄更斯后期的小说中，他没有给当时的社会提供清晰的意义和简单的认同公式，仅仅对人性中所有的奇异、残忍和高贵作了较为深入、更加悲观的探索。在这些后期的小说中，他用发挥想象的天才、以一种才华横溢的风格、以喜剧演员的感觉、以一种无人能及的同情心，来描绘伦敦的世界。

尽管狄更斯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法，但他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快乐。维多利亚时代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也是如此。他们是无与伦比的讲故事能手：诙谐、讽刺、生动、悬疑、浪漫、动人心弦。无论小说优劣，它都能给数百万人带来长时间的愉悦。小说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正如戏剧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和电视对于我们一样。确实，小说也有它的竞争对手，如音乐厅和巡回演艺的剧团，以及 19 世纪 80 年代，W. C. 吉尔伯特（W. C. Gilbert）和亚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的小歌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欢各种娱乐活动。但是，小说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小说能独自在书房撰写，能在客厅或图书馆的角落里阅读，小说允许个人去创造他/她自己幻想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是一种逃避，或者是一种寻求，但是，无论它是什么，它都是单个人的活动。因此，它反映了坚定的自立品质，这种自立和道德上的严肃以及对人生的认真，一起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核心。

653

阅读文献

Richard Altick, *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3. 该书是一本研究水平很高的书籍，其研究范围涉及阶级体系的分析和这个时代的主流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还包括对新闻、书籍和性的讨论。

Asa Briggs, *Victorian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该书对 8 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进行了迷人的人物描写，描述了两件戏剧性事件，这些事件产生了维多利亚时代多种多样的思想、热情追求和道德，也形成了它们的普遍特点。

William Burn, *The Age of Equipoise*,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该书深入研究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乡村的一面，也深入研究了职业、教区长的住所、公馆和农舍、法庭、俱乐部、以及公众办事处。

John Burnett, *Useful Toil, Autobiographies of Working People from the 1820s to the 1920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4.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籍，它让工人用自己坦直的、朴素的、尖锐的言语表达了他们的希望、担忧、梦想、焦虑和抱负。

Jonathan Gathorne-Hardy, *The Old School Tie: The Phenomenon of the English Public Schoo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植根于那些公立学校，盖索恩—哈代描述了这些公立学校，深刻理解了它们的重要性和特异品质。

John Harrison, *The Early Victorian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该书是一部涵盖面广、揭露社会的历史著作，它特别突出了工人阶级和他们忍受和克服的环境。

Walter Houghton,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该书出色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状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对其主导思想观点和态度看法进行了分类和分析，甚至有时候这种观点是矛盾的——例如，“批评性的精神”和“坚信的思想意志”。

William Irvine, *Apes, Angels and Victorians*,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9. 该书活泼、鲜明地论述了达尔文对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和宗教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强调了 T. H. 赫胥黎革命性的著作。

F. M. L. Thompson,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该书富有见地地叙述了清洁的、有秩序的、节制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它是一本极好的社会史著作。

Martha Vicinus, ed. *Suffer and Be Still: Women in the Victorian 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该书由13位权威人士运用同情心和洞察力分析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妇女的角色，无

论是被忽视的女家庭教师、被虐待的妓女、过度工作的店铺女孩、还是百无聊赖的妻子，均有所涉及。

G. M. Young, *Portrait of An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该书是一部经典的肖像画册，非常简略，但充满着鲜亮的知觉感和刺激的思想观念，都聚焦在勾画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人物的特征上。

第二十五章　大英帝国

655

维多利亚女王于1837年登基之时，英国成为帝国已有时日。12世纪，亨利二世统治安茹帝国（Angevin Empire），其地域由阿基坦盆地直至爱尔兰。其子查理寻求在遥远的巴勒斯坦建立王国。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均夺取法国大片领土，但又失守。1558年，随着加莱的陷落，英国在欧洲大陆建立的帝国烟消云散，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掠取西班牙的美洲土地，征调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夺取爱尔兰，指派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占领纽芬兰。1583年，汉弗莱·吉尔伯特把纽芬兰变为英国在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从纽芬兰开始，到18世纪末叶，英国已经占据了许多殖民地，其殖民帝国的范围从加尔各答延伸到多伦多。

两个强烈的欲望导致这样一个殖民帝国的建立：英国商人牟利的欲望和英国人移居国外的欲望。移居国外似乎成了英国人的习惯，不论是到马萨诸塞建立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s），还是在西印度群岛积累财富都是如此。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也发现殖民地有利可图。他们在重商主义的原则鼓励下，在议会通过了许多贸易法令和航运条例，规定殖民地的贸易全部由英国商船承包，殖民地必须从英国进口所有制成品。

美国革命将殖民体系打开了巨大的缺口。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对帝国所依赖的重商主义原则发起攻击。斯密指出：垄断性条例阻碍经济发展。同时，殖民地耗资巨大，也可能引发革命而丧失控制权。所以到18世纪末，英国的帝国热情冷却下去了，但是帝国本身，却由于对法国的战争而扩大了，战争使英国夺取了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印度洋的锡兰、毛里求斯和塞舌耳群岛，加勒比地区的多巴哥和圣卢西亚，北海的赫尔戈兰，以及地中海的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

656 从建立海外帝国之初，寻求强权就一直是征服的动机之一，与商业和殖民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在法国海军和西班牙海军在特拉法加海战被摧毁之后，英国取得了对公海的绝对控制权，英国海军的蒸汽动力铁甲舰巩固了这个优势。当然，英国海军的优势由来已久，确保帝国向外扩张。1769年，航海探险家库克船长（Captain Cook），提出对新西兰的主权；1787年，福音主义者、废奴运动领袖在非洲西岸创立塞拉利昂殖民地；一年后，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其殖民地，用以发配犯人；1792年、1795年和1799年，浸礼会、公理会和国教会又组织传教团，向非洲、亚洲派遣第一批传教士。传教团持续不断的活动也是帝国扩张的又一个推动力。

随着帝国的成长，对帝国的批评也日益尖锐。到1850年，强大的制造主阶级和新政治经济的追随者，合力废除了谷物和食糖关税，并废除了航海条例，自由贸易思想推翻了重商主义学说。中产阶级的激进派也对殖民地耗费太大而毫无用处进行抨击。亚当·斯密写道：殖民地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负担。其他人则谴责殖民地导致了无谓的战争和流血。威廉·格莱斯顿在许多问题上持有同样的立场，甚至连迪斯累利也对殖民帝国持怀疑态度。他在1852年说："这些讨厌的殖民地真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石。"

然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缓对新的殖民地的攫取。自由贸易主义者，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的支持者，敦促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有计划有系统地殖民、在加拿大推行自治和联邦制、在印度推行实用主义的法

律、以及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即使这需要诉诸战争手段。帝国的扩张反映了帝国内部支持扩张的力量，要远强于（伦敦）怀疑帝国的思想力量。这些支持扩张的力量，与英国的海军势力、工业强盛和世界性联系汇合在一起，就使得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最富的、人口最多的帝国，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构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英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的基础。

大英治下的和平

1900 年的大英帝国，包括了世界 1/4 的人口，将近世界 1/4 的土地。其多样性丰富多姿，在地貌、气候、动植物以及文化与民族等各方面差异很大。自从 1880 年，新增物种达 95 个之多。米字旗飘扬在北极的冻土带、尼日利亚的热带雨林、南部非洲的草原和风雪交加的喜马拉雅山口。在新西兰，阿尔派恩山峰下举目可见英格兰式的风光；在锡兰依山傍湖的美丽首都康提（Kandy），耸立着大理石庙宇，市场充斥各地的奇珍异物和来自他乡异域的人们；南太平洋的斐济群岛共有 250 个小岛，较大的岛屿上分布着红树林、甘蔗种植场和火山。殖民地的面积大小悬殊，澳大利亚是一个大洲，印度也是一个次大陆，657 而放逐拿破仑的圣赫勒拿，不过是南大西洋上的一个微型小岛。海岛和港口是轮船的加煤站。不论是地中海的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大西洋的百慕大和哈利法克斯，还是远东的新加坡和香港，或印度洋的亚丁，来往轮船都可以在船舱里装满煤炭、麦酒、腊肉和果酱。虽然大多数殖民地对英国是赔钱的负担，但有的殖民地也给英国带来巨大的财富。例如在 19 世纪 60 年代，澳大利亚黄金产量占世界黄金产量的 1/3，羊毛也满足英国的 1/6 需要。1900 年，全世界每 3 个矿工和采石工就有 1 个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工作。1913 年，英国海外投资 39 亿英镑，差不多有一半投资在帝国境内；而英国 60% 的棉布和总出口的 19% 输往印度。

多样性是帝国境内多种文化的标志。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和南非的布须曼人（Bushmen），都还没有超越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水平，而印

度的印度人和埃及的穆斯林则已具高度文明，在艺术、文学、哲学、技术和政治等方面都驰名世界。帝国民族之繁杂，也如万花筒一般。所采用的语言和方言数以千计，而所信奉的宗教派别和崇拜仪式也达数百种之多。政治统治方式，也各不一样。英国人向来不仿效罗马人在帝国内建立统一的法律和政府。他们采用40多种政府制度来进行统治，其中大多是专制式统治。在马来半岛各邦，英国实行间接统治，尽管在苏丹的宫廷里有英国的政治代表参与统治。在印度，统治形式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在非洲，经营贸易的公司往往治理大片版图。这些统治机构，有英国军队为后盾。指挥这些军队的是总督或将军，在战场上领兵作战的则是分派到帝国各地的战区军官。年轻的牛津和剑桥毕业生都通过了殖民部或印度事务部的考试，从而有资格当低级行政长官，管理全世界1/4的人民。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的毕业生在帝国开始职业生涯。

大英帝国不是一个法律实体。在埃及，一个小心翼翼掩饰的假象就是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只担任埃及国王这一国家正式统治者的顾问。埃及法庭使用穆斯林法律，正如乌干达采用部落法律和香港采用中国法律一样。然而，在帝国的任何地方法庭里，有冤屈的人都可以最后上诉到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其法官在伦敦受理上诉，并不执行一个全帝国通行的法律，而是保证不同法律的公正实施。司法委员会确保案件得到公平审理，司法程序按既定安排执行。这个司法委员会连同全民效忠的英王，以及象征帝国权力的军队，使得构成“有形帝国”的各个部分，不论是王国、公国、保护国、自治领、宗主国、直属地、租界还是势力范围，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

此外，还有一个无形帝国的存在。其形式就是英国货物、人员、服务、文化、思想等等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个角落。货物的种类包括便宜的棉制品、钢铁制品、铁道设备和水运船只。服务则包括银行、保险、运输和通讯等等。在世界各地都有伦敦劳埃德公司的经纪人办理船只保险，都有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办理贷款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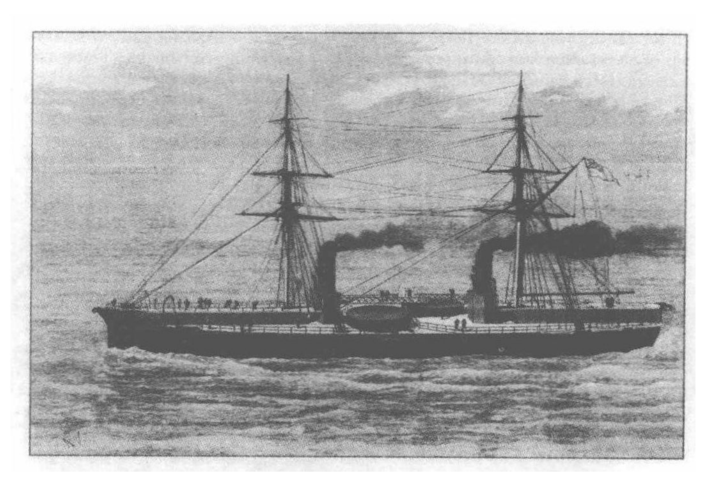
658



在最辉煌绚丽的东方国家朝廷，能干的英国人很快成为朝廷的帝国统治者（*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Picture Library*）

英国的轮船、电报和海底电线扩展到世界各地。1902 年，一条连接新西兰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电缆铺设成功。这条环绕世界的电缆铺设线路只经过英国属地，从而赢得“全红色线路”的名声。英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利弊并存。例如在阿根廷，英国修筑航道工程和铁道，组织并经营起牛肉工业。但是，英国的廉价纺织品也毁掉了阿根廷小手工纺织业工人和纺织品商贩的生计。如同许多拉丁美洲的其他共和国一样，阿根廷变成了英国的经济附庸。英国的金融势力、工程技术和廉价制造品，使得英国的经济势力在世界上所向披靡。英国的资本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这个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之间的界线难以分清。例如，1836 年和 1857 年英国和波斯的通商条约、1838 年和 1861 年英国和土耳其的通商条约，就把波土两国纳入了英国的政治势力范围。

观念和人口的输出，同样令人震惊。在 1815 年到 1914 年之间，英国迁移出境的人口达 2000 万。他们涌进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为美国、南非和西印度群岛增加了人口。甚至连福克兰、百慕大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也建立了英国定



如果没有装甲轮船、海军以及商船队，现存的大英帝国版图就会缩小很多（*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居地。英国人还移居到亚洲的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亚和中国；近东的开罗、德黑兰和巴格达；南美各国的首都以及非洲全境。甚至欧洲城市如佛罗伦萨、罗马、尼斯、巴黎等等也有一定规模的英国移民。富裕的英国游客前往世界各地，品尝下午茶，摆出一副沾沾自喜的优越架势。他们大都惹人讨厌，因为总是那么居功自傲、岛国心态和以保护人自居。英国人最早登上阿尔卑斯山；创造了许多新的运动项目，如草地网球、足球、橄榄球、壁球，并在比赛中取胜。他们还发展旅游业，通济隆公司（Thomas Cook & Sons）设计、建造并经营通往维苏威火山顶峰的缆车。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英国轮船都在载运20万名旅客和同样数目的商船水手。全世界一半的商船悬挂英国国旗。此外，英国传教士在世界各地建筑教堂、学校和医院，到处宣扬基督教义。随着一个更为世俗的时代来临，英国大学接踵而至，提供西方文学、历史、哲学和科学课程教育。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英国人，都自命不凡，组成自己的圈子，暑季前往山间别墅，那里有自己的网球场、跑马场和俱乐部。

1841年，刚到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旅行到北婆罗洲的沙捞越。布鲁克风度翩翩，办事迅捷，意

志坚强，急于改善局面，沙捞越破产的统治者愿意让位给他以挽危局。660 于是布鲁克与他的侄儿作为沙捞越的白人统治者睿智地掌握统治权达 45 年之久。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于 1854 年到中国，在长达 54 年里负责建立和管理中国海关。布鲁克和赫德是这个时代众多英国人的代表，他们过人的精力使他们远赴外国；他们出色的本领、坚强的意志和处理事情的精明，又使他们成为当地的统治者。正如卡斯提尔人在 16 世纪从西班牙出海创建了庞大帝国一样，这些英国人才能出众、胆识过人、英勇坚毅，的确是具有创造力的精英人物。

自治领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英联邦中骄傲的成员。英联邦是那些至今仍效忠于伊丽莎白二世的独立国家的联合体。它们之所以效忠，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国民是具有英国血统，而且享有自治的主权。1837 年时，它们都没有自治权，也很可能不够忠心。那时的统治机构，是驻扎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两城、由英王指派的钦定委员会，该委员会人少权大，在行使统治权时完全不顾当地民选立法会议的意见。在下加拿大殖民地，钦定委员会由英国人、新教徒组成，而人民则大多数是法裔、天主教徒。这种统治机构办事不负责任，效率低下，民众对之非常气愤，以致立法会议拒绝投票通过税收法案，并发生了更为暴力的骚乱。上加拿大殖民地也有骚乱发生。难道加拿大也要走美国的革命道路？伦敦的辉格党政府非常担心，遂派遣德拉姆伯爵（Earl of Durham）前往进行调查和提交报告。

这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伯爵和他的激进派助手们提出了著名的《1839 年德拉姆报告》（Durham Report of 1839），建议扩大加拿大的自治权；上、下加拿大合并；行政机构须更多地对民选立法会议负责。1840 年的《加拿大法案》（Canada Act）法案规定上、下加拿大合并，创立两院制立法会议，其中一院民选产生，另一院则通过任命组成，但回避了行政机构向民选立法会议负责的问题。然而，责任制政府却由此时产生。当时，辉格党内阁的殖民大臣格雷伯爵（Earl Grey）和加拿大

总督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所任命的加拿大部长，都支持民选立法会议的下院。在此之前，新斯科舍（Nova Scotia）已采取这个原则。当加拿大走向联邦制国家时，这个原则得到普遍采用。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规定将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合并，建立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 of Canada）。到1876年，横贯东西的铁路建成；草原地区各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也宣布加入。于是，加拿大成为最强大的自治领。

如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处温带，人口稀少，土地资源丰富，因此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移民移居。这些移民同样要求建立独立和民主的政府。1850年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法案》（Australian Colonies Act），规定6个殖民地各自通过民选产生立法会议，而1852年的《新西兰法案》（New Zealand Act），规定新西兰创立两院制民选立法会议，6个省则各自建立一院制民选立法会议，行政部门仍然对英国派遣的总督负责，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像加拿大的情形一样，总督面对的是桀骜不驯的政治人物和决心已定的人民，所任命的部长也都支持立法会议中的多数派。这样，议会制政府成了英国最成功的输出品，但推行范围只限于以英裔移民为主的殖民地。

661

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地域辽阔的殖民地，这种议会制政府与美国创立的联邦制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这种政府制度实行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享权力，其分权的均衡程度远远超过英国的制度。澳大利亚土地面积几乎与美国相等，但远不及美国土地肥沃，而且在1901年成立联邦制政府。新西兰的土地面积与英格兰相近。1876年，联邦制政府让位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政府，各省政府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民主平等的社会走向兴盛。1860年，澳大利亚首先推行普选制。1893年，新西兰成为大英帝国中第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在福利国家方面起了领先作用。两国都推行了养老金制度，建立了劳工纠纷仲裁法庭，对大地产主征取重税。新西兰走得更远：政府拥有矿产和铁路，销售人寿保险，负责土地转让买卖，规定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存在强烈的种族歧视。两国都制定法律驱逐亚洲人，没收土著人和毛利人的土地，并消灭这些民族的文化，而且像加拿大对待北美印第安人一样残酷无情。假若土著居民的数量众多，自治制度的推行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大英帝国第四个自治领——南非的悲惨历史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南非于1910年加入英联邦，1961年退出。现在它是一个专制的、种族主义国家，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没有朋友。它之所以走上这条发展道路，是因为南非本土的黑人比澳洲的毛利人和土著人或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数量多得多，力量也大得多。但其力量又没有大到足以击败白人殖民者的程度。白人殖民者主要由布尔人构成，他们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信奉基督教加尔文宗。布尔人在17世纪移居南非，到1808年英国夺取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以保护通往印度的航道时，他们已在南非站稳了脚跟。随着布尔人和其他白种移民数量日益增多，力量日益强大，他们对良田沃土的不足而感到不安，并对于英国人不再将黑人视为事实上的奴隶而感到愤怒。为了逃避这些困扰，布尔人在1835年开始了北上大迁徙。结果他们在北方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共和国：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为了阻止布尔人的扩张，英国人在其东面建立了纳塔尔（Natal）殖民地，在其西面建立了两个托管殖民地——贝专纳（Bechuanaland）和盛产钻石的西格里夸兰（Griqualand West）。到1877年，迪斯累利政府企图并吞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在1880年的大选中，格莱斯顿宣称反对这个计划，但当选之后，却将之付诸实施。这是由于来自人权主义者的压力，他们知道布尔人对黑人残暴，所以要遏制布尔人的势力。 662

这场吞并大大激怒了军事上强大的布尔人。1881年，他们消灭了兵力空虚的马朱班山英军守军。此时，英国在南非处于两个进退维谷的局面：是并吞这两个共和国，还是承认它们的主权？是实行托管制（由伦敦直接统治）以保护黑人，还是实行自治制度让白人用民选立法会议来压迫黑人？英国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形势恶化了。英国一方面承认了两个布尔共和国，一方面又宣布其隶属于英国，而

实际上却无力执行这一宗主权。同时，英国政府正式授权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组建英属南非公司，允许该公司（以及一伙寻找黄金的冒险家）进入德兰士瓦以北的地区。在这伙冒险家中，最为狡诈是罗得斯的代理人詹姆森博士（Dr. Jameson），他从马塔贝莱人国王手中骗取了一纸条约，为白人征服黑人铺平了道路。这时英国已将两个布尔共和国四面包围，于是宣称英拥有对整个南非的最高权力。布尔人当时因开采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而积累了财富，坚决维护其独立地位，并宣称不给移居其境内的其他白人以选举权。这些移民，当地称为外侨（*uitlanders*），人数越来越多——1896 年约为 44000 人。他们都心怀不满，罗得斯、詹姆森和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都对布尔人怀有戒心。1895 年罗得斯和张伯伦误以为外侨将会暴动，就派詹姆森率 500 人侵入德兰士瓦。詹姆森的偷袭成了笑柄，并没有任何人发动暴动响应，詹姆森被俘，罗得斯面子丢尽，张伯伦只是巧妙地加以掩盖，才没有丢官。南非的最高权力将属于布尔人而不属于英国人，似乎已成定局。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是牛津大学高材生，在埃及受到克罗默勋爵的指教。在他看来，布尔人取代英国人的最高权力及其所引起的反响，势必削弱大英帝国。1897 年，张伯伦委任米尔纳为南非高级专员。1899 年，米尔纳要求外侨在德兰士瓦居住 5 年以上者享有当地选举权。布尔人提出的条件是必须居住 7 年以上方可获得选举权，并宣称已在德兰士瓦立法会议通过了这项改革法案。米尔纳又提出新要求：设置最高法庭，以明确英国的宗主权。布尔人则提出折衷方案，米尔纳予以拒绝。他提出了一道最后通牒，要求德兰士瓦必须承认英国的宗主权以及英国干预德兰士瓦事务的权力。布尔人拒绝接受，于是布尔战争（ Boer War）于 1899 年 10 月爆发。

这场战争持续了 3 年。英国调来 40 万军队，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才击败了 6 万布尔人军队。英国还用集中营来压服平民。约 11.7 万名平民被驱入境况悲惨的集中营，其中 2 万人死去。到 1910 年，英国人取得布尔人的同意，建立南非联邦（Union of

Soufh Africa)，即帝国的第四个实现统一的自治领，但是，除了开普殖民地以外，只有白人才有选举权。约80万白人（其中近半数为布尔人）统治320余万黑人。

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者始终没有找出一个建立非白人自治领的方案。他们在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其他产糖的岛上都曾试过，但一无所获。19世纪中叶，他们受到德拉姆勋爵报告的鼓舞，在西印度群岛推行类似的自治方案，但规定了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选举权。结果政权掌握在少数白人手里，完全不顾及黑人的利益。英国人对由于巴西和古巴糖价的低廉、地主的低效管理以及自由贸易的实施在西印度群岛所引起的极端贫穷，也毫无对策。18世纪殖民制体系中最为富饶的地带，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帝国的贫民区。1865年，牙买加黑人发动骚乱，杀了18个白人，埃尔（Eyer）总督以残酷的手段予以镇压，处死了将近600名黑人，焚烧他们的1000所房子，不分男女一律施以鞭刑。这次骚乱敲响了当地民选立法会议的丧钟。牙买加从此变成皇家殖民地，其统治方式形同托管地。

印度及其东邻地区

1784年，皮特的《印度法案》（India Act）规定，在伦敦设立一个政府委任的管理局，派遣一名总督常驻加尔各答，以掌控东印度公司。同年，该公司统治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的工厂。1784年的法案宣告不得以任何方式占领土地。当时的公司仅有约2000名雇员，控制的地区面积不及印度的1/30，并面对印度的1亿多人口。这样，要建立一个帝国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征服活动还是不断地进行下来。这种征服活动有时采用缔结条约的方式，有时通过常驻顾问的阴谋活动，而更经常的是诉诸武力。英国发动四次战争将远在次大陆南端的迈索尔（Mysore）变为附庸土邦。18世纪90年代，经常为公司的征服活动出力的是位于迈索尔北边的一个土邦——海德拉巴，其面积约与英洛兰和苏格兰合起来一样大。但海德拉巴阴谋不断，迫使东印度公司出兵将其军队击溃，将其统治者置于公司的控制之下。海德拉巴

以北是马拉萨（Maratha）酋长们的地盘。他们实力雄厚，如果联合起来，可以将英国人赶出印度，但是他们内部争战不已，彼此削弱，于是公司于1818年取得了对他们的控制权。这样的例子，在印度的其他地区不断重复着。

到1830年，东印度公司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了印度全境，只有西北地区及毗邻尼泊尔的乌得（oudh）除外。到1856年，公司的军队征服了缅甸南部，并企图吞并尼泊尔和阿富汗，但没有成功。东印度公司征服这些国家和地区，与英国官方厌恶征服行动的信念相冲突，而且与该公司首任总督所规定的公司应以和平通商为原则取利的方式背道而驰。1784年，公司既无心创立帝国，也没有来自议会或伦敦商人的压力。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问题的答案在于英国的富强和印度的羸弱，以及这种强弱不均所产生的影响。公司在初期只想从通商中赚钱，但是，一旦碰到许多迎面而来的问题，如政府的贪污腐化、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债务的庞大、冲突的连续不断、土匪的抢劫和战争等等，公司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恢复秩序。其雇员于是变成顾问，负责招募军队，筹借钱款，管理财政，664 征收捐税，组建联盟，并接管破产者的产业。依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和瓦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经验，代收税赋的利润十分丰厚。他们发现这一诀窍，正值公司贸易业务不济之时。东印度公司一旦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就卷入了战事和改革之中。于是，与好战而腐败的邦主治下的动荡不安的治理区域日益广泛的接触，就像一股巨大的推动力，把公司推向了帝国的道路。

不过，外部推动力并非全部原因所在。随着东印度公司势力的日渐强大，它本身也自然地产生出一种相当巨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不是来自伦敦，而是来自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当局拥有印度最为精良的军队，指挥官们急于开战。同样，印度次大陆最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急于展示治国的本领。从1790年到1860年，一个个杰出的总督来到加尔各答上任，请看：1798年，威灵顿公爵的兄长、独断专行的韦尔斯利侯爵（Marquess of Wellesley）；1828年，改革家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声称“英国的伟大应当建筑在印度的幸福之上”；1837年，富有侵略性、后来征服了阿富汗的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1848年，那个好修铁路．暴躁骄横的达尔胡西勋爵（Lord Dalhousie）。所有这些总督都是贵族、地主、认为肩负着统治别人的天赋使命，到任之后都接到伦敦不断的抱怨，说他们把公司推向帝国之路。

总督手下总有几员像信德的征服者——查理·内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那样的猛将。内皮尔吐露直言：“我们无权夺取信德，可是我们得这样做，那是一笔又合算又有用的混账买卖。”内皮尔的战绩十分辉煌。他统领2200人（其中英军只有500人）和13门炮，击败了人数达22000的俾路支军队。另一次战役他的队伍杀敌5000人，己方才损失270人。武器精良和训练有素，对英属印度的缔造起着重要作用。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上的汽船、1870年后长达5000英里的铁路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印度教王公或穆斯林头领从来都没有得到这些交通工具。而当这样的交通工具与经验丰富的帝国主义者所掌握的行政技能和精明的外交手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统一的印度应运而生。

一旦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总督们就召来帝国主义的其他势力——传教士、投资商、汽轮航线推销商、苧麻种植场主以及不断增多的在印度文官系统中任职的英国官员。这些势力在总督的指导下，使19世纪上半叶成为了一个按照西方价值观进行改革的时代。例如，殉夫制（*suttee*）和劫道制（*thuggee*）被禁止了。殉夫制是印度教的习俗，它将寡妇焚于亡夫的火葬堆上，劫道制认为劫杀路人是一种为宗教所准许的礼仪。英国宣布这两种习俗为非法，并禁止了溺杀婴儿和不准寡妇再嫁的陋习。英国人还改革了土地法，结束了原来维护村有土地制度和佃租制度的社会习惯法而代之以新法。有的地方实行耕者有其田，有田的农民称为“莱特”（*ryots*），其他地主绅士称为“柴明达尔”（*zamindars*），他们把田租给佃农耕种。在市场经济中，土地成了私有财产，像五谷一样可以买卖。

英国还改革了印度的刑法。1834年，英政府派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辉格党政治家、聪颖过人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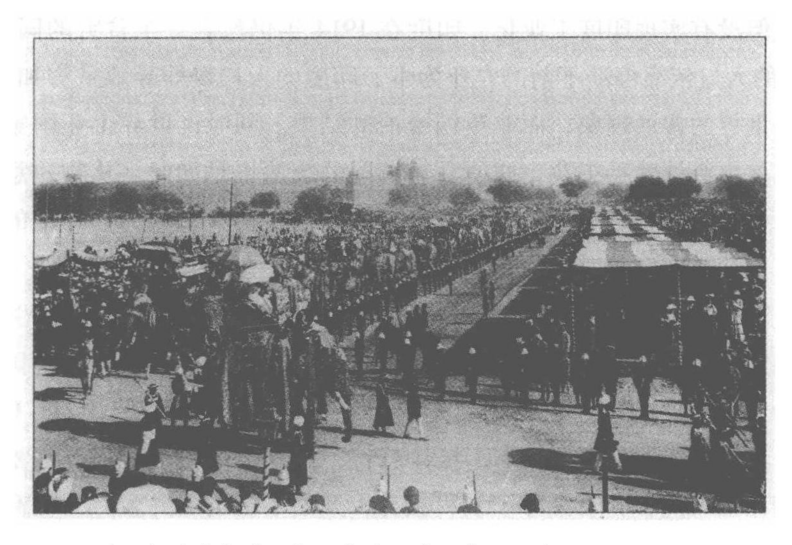
665 bington Macaulay）前往印度，清理印度的习惯法。他起草了一部刑法法典，反映了英国公法的精华和边沁所主张的简明性、普遍性、有效性的原则。麦考莱拟就的著名的《教育备忘录》（Education Minute）十分注重实际，主张政府设立的学校用英文教授西方文学和自然科学，以取代东方语言和文学。在一个多达数百种语言的次大陆上，选用英文是很实用的，但《教育备忘录》却傲慢地忽略了印度和伊斯兰教的文化成就。麦考莱的改革，如同土地改革、铁路电报输入、棉纺织工厂的兴办、传教士的活动以及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英文报纸印刷所一样，都表明英国在按西方的模式改造印度。

变革终于引起了可怕的爆炸。1857年5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军所辖土著部队突然哗变。士兵听说他们所用的子弹弹壳顶部上面涂有牛油或猪油，而顶部在装火药时得用口咬下来。印度人吃牛肉与穆斯林吃猪肉一样是罪过。弹壳上涂的油，实际上是植物油（虽然以前曾用过牛油），但谣言本身已到处流传，特别是当时军队拖欠土著士兵军饷，指挥他们的英国军官又日见傲慢，不负责任。而且，土著士兵还被迫到印度境外作战，参加灾难性的阿富汗战争。在印度以外地区，他们的种姓制度就会受到损害。孟加拉土著士兵信奉印度教，他们的古老习俗受到传教士和地方官员改革的威胁。达尔胡西伯爵（Earl Dalhousie）肆无忌惮地吞并了许多印度邦国，根据重占土地法令掠取土地，重创许多印度统治者和地主。所有这些怨恨终于导致了土兵叛变，受到德里和奥德民众的支持。

这场起义来势迅猛。5月，三个团的土兵叛变，杀了英籍军官，直奔德里，赢得守军响应，见到白人就杀。在坎普尔（Cawnpore），土兵答应让400名英国平民安全撤离，但随后就把他们统统杀掉了。然而，兵变遭到失败，因为英军指挥官用电报下令在其他地区解除土著军队的武装，铁路将忠诚的增援部队迅速运来。高超的技术再次成就了帝国。英国极为残酷地镇压了兵变，表明英国人也会撕下文明的面具。但是，镇压时间很短，新任总督坎宁勋爵（Lord Canning）坚持只有那些经法律裁定的杀人犯，才予以惩治。

这次兵变深刻改变了英属印度。英国议会最终撤销了东印度公司，从此英国通过其总督和印度文官制度来施行其统治。驻印度的英国军队增加了，并规定1/3士兵和全部军官必须是白人。全力西化的政策也转变为建立较宽松和超脱的家长制政府。这场兵变使印度统治者增添了一层怨恨和恐惧，也加深了他们的负罪感，唯有靠家长制统治来缓解。从1857年到1914年，家长式统治进行了这样的试验：这种统治本身是仁慈的、有效的、具有解放意义的，还是自私的、无效的、具有压迫性的？

英国历史学家记述的是一个进步的历程：引入现代医药和人民健康、人口比19世纪增加1倍、1914年铁路长度达4万英里、兴修水利和开垦3000万英亩土地、开办纺织厂、黄麻厂和钢铁厂、出口从1834年的800万英镑增至1910年的13700万英镑等等。此外，他们还记述了文化思想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进步、学校和大学的设立、受过科学教育的新知识阶层的出现、训练民主政治的民选委员会的产生、前所未有的公民自由的授予，而最重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有秩序的、和平的印度的诞生。 666



列队行进的象群，向正在德里举行官方入城式的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寇松勋爵表示敬意（*Mansell Collection*, *TimePix*）

印度历史学家记述的则是一部贫穷和压迫的历史：不但回顾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赤裸裸的掠夺，而且认为这个公司本身就是造成后来英国进行干预的印度混乱的一大原因。英国人的干预及其所带来的军队和行政机构，一年耗费印度人数百万英镑——1913年为1940万英镑。干预也破坏了印度原有的公共村居生活，招来了地主、中间商、税吏、高利贷者，诸多负担泯灭了当地人民的改良愿望。1914年时，农民仍然像1800年那样贫困。从1877年到1900年，1500万人死于5次大饥荒。英国机织品扫荡了18世纪号称是世界上最精美的印度丝、667 棉织品。印度的冶铁和造船工业，也被英国的同业击败了，而印度原有的均衡经济形态，变成了几乎一边倒的农业经济。

英印历史学家都道出了很多实情。英国的统治是一种利弊并存的统治。它确实带来了和平，建立了秩序和统一，并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历史上的水利工程都比不上英属印度的4万英里运河系统，将贫瘠的印度河流域变成广袤的沃土。然而现代化只进行了一半。英印当局开凿了运河，但是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以激发农民积极性；建立了黄麻工厂，但没有实现印度工业化。印度在1914年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度，4/5的人口依靠停滞不前的农业为生。印度的人口爆炸导致贫穷加剧，这是世界的普通现象，而非英国统治的结果。同时，世界工业国家的制成品也会摧毁手工业，即使没有英国的统治也是如此。从物质意义上来衡量，英国历史学家对于帝国统治的肯定很有说服力，印度的和平、良治政府和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阶层就是明证。

取得进步毋庸置疑，但是，英国统治者对印度教传统和伊斯兰教传统完全漠视，未能允许印度向自治方向发展。在20世纪初，英国没有给予印度一个民选议会，而是给了托利党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寇松在1899年至1905年任总督，是专横统治的化身。寇松的政绩相当辉煌，为农民办了农村银行，开凿了运河，并且大力提高行政效率和改善教育。但是，他把印度当幼童一般看待，未能推动（由自由党政府推行的）印度人在地方政府中象征性地发挥作用的进程。寇松对俄国极为恐惧，下令征服西藏，该地毫无经济价值，但能够满

足他本人或英国政府的一个坚定信念：英国担负着帝国的使命。

印度处于英国人帝国意识的中心位置。印度几乎是一种神秘吸引力的中枢，迪斯累利在为维多利亚女王获得印度女王尊号时就体会到了这一点。取得具有古老的、东方色彩的、奇香异味的印度的控制权本身，就是夺取更多土地的理由所在。而且，印度是大宗财富的来源，其自给自足的军队对于扩张而言又是做武器使用。英国深信，通往这座英国皇冠上的无价宝石的所有道路都必须确保安全，因此，英国进攻埃及，染指东非，在地中海与俄国发生冲突，在南非与布尔人开战。与印度通商的好处，也驱使英国侵入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婆罗洲、香港和中国的部分地区。

英国政府攫取这些土地并非出于什么系统的计划。和印度的情形一样，英国采取了零打碎敲掉方法；同样由地方的局势所引发；而且每处的情形也不相同。1816 年，斯坦福德·拉弗尔斯（Stamford Raffles）个人出资买下了新加坡岛。他认准这个地方是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通商的战略要地。东印度公司将他解职，伦敦也对他进行批评，但他还是将新加坡留在手中。英国从 1824 年、1852 年和 1855 年分 3 次战争才夺取了缅甸。第一次战争起于具有野心的缅甸兴兵侵入孟加拉的阿萨姆省；第二次是缅甸的一个王公欺侮英国人，英印总督迅速乘机兴师问罪；第三次则是上缅甸的残暴的西博王公（King Thebaw）与法国人阴谋勾结，又嗜杀成性。英国很快 668 赢得了这三场战争，也首次在战斗中投入那种从长江到尼日尔河广泛使用的汽船，证明这种武器将为英国赢得帝国。1874 年，英国人开始逐渐向马来诸邦渗透。

到 1898 年，英国常驻马来代表的势力已强大到组建一个联邦，由一名英国常驻将军及其文官系统实施统治。吸引英国人进入马来亚的因素是内战、海盗、继位纠纷、华人秘密会社和宝贵的锡和橡胶，推动英国人进入的该地段力量来自新加坡、商人、海军军官以及独断专行的总督们，他们受到的培训就是如何统治其他地区。帝国越大，当地的局势动荡的次数也随之增加，这就给新兴的殖民地

统治阶层提供了机会，借此动用英国海陆军来恢复当地秩序，确保商业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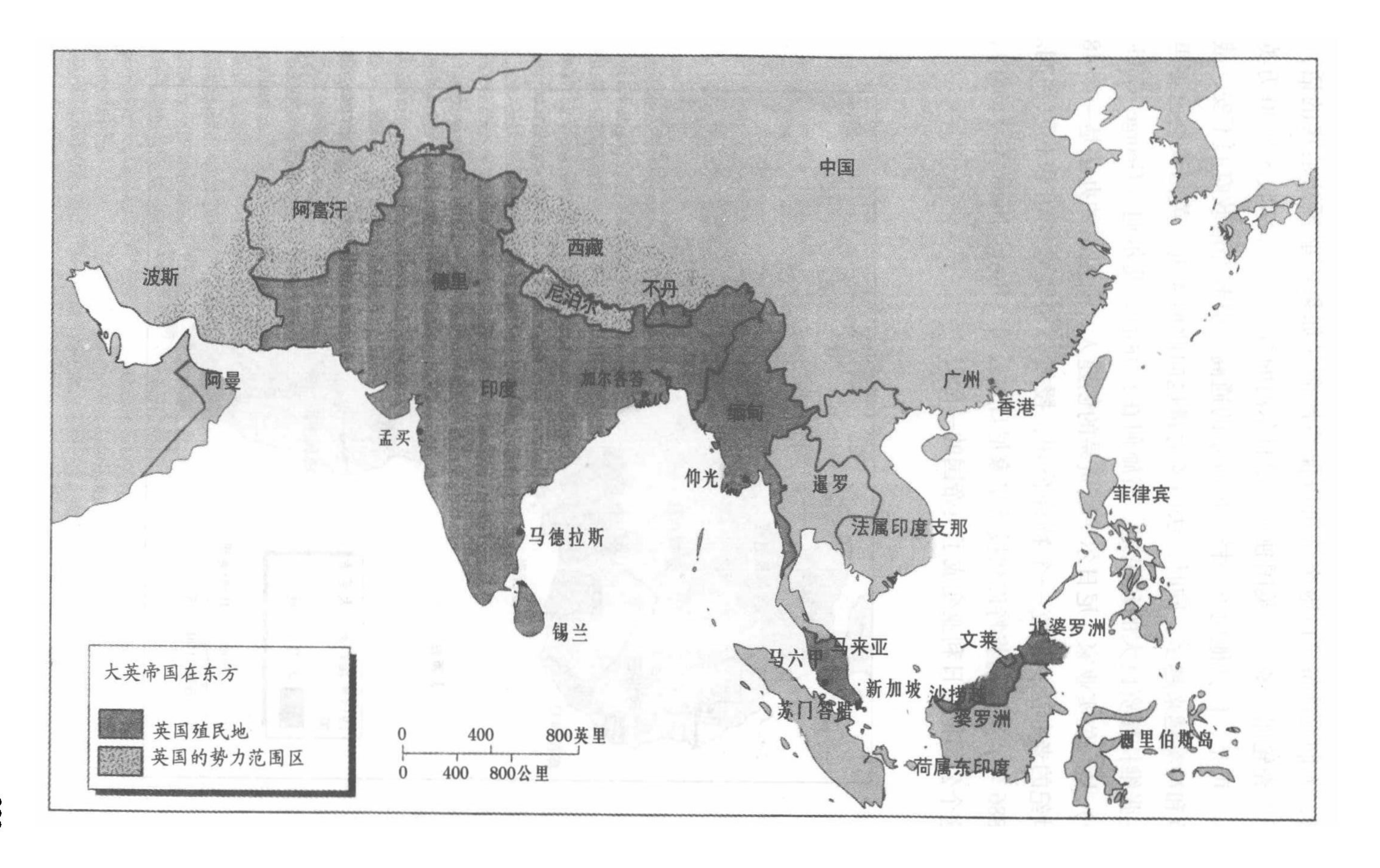
1874年，英国甚至夺取了斐济群岛。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是因为当地的动荡。英国觉得对恢复秩序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斐济群岛具有战略价值，也因为美国和德国有可能侵入这个群岛。采取的具体模式依然如故，就连伦敦表示不愿吞并的装模作样也是老一套。1882年。这个模式在埃及重演了一遍，于是拉开了列强瓜分非洲的序幕。

瓜分非洲

1664年，英国在非洲西海岸的冈比亚建立了一个商站。正如贸易把他们带到了世界各地，英国到冈比亚也是为了贸易。同样，英国还在黄金海岸建立了一串商站。到了18世纪末，传教士和慈善家也尾随而至，大力使非洲人改变宗教信仰，并强烈要求废除奴隶贸易，那些商站最初就是为了这种贸易而建。1787年，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们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之间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成立了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家园，并希望将其建成一个模范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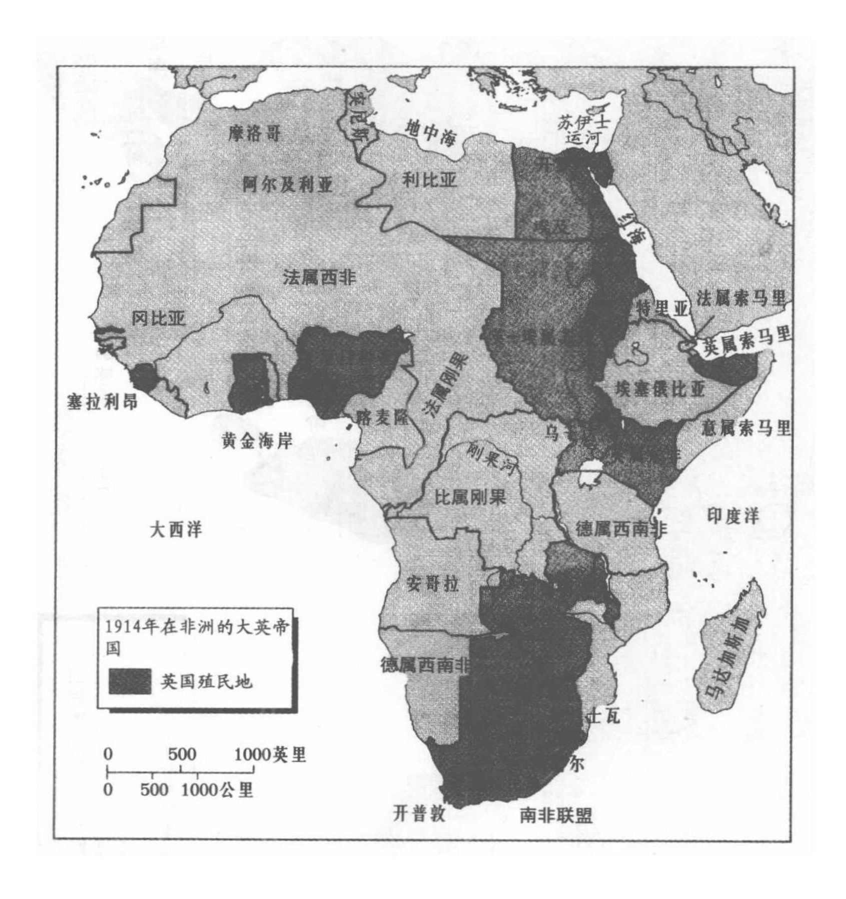
在废除奴隶贸易之后，英政府发现耗费高昂的商站再无用处，便把它们移交给一个商会。1829年，商会派乔治·马克莱恩（George MacLean）船长前往监管商站。马克莱恩虽然没有官职，却长于仲裁海岸土著部落之间的纠纷，对它们实施间接统治。这种统治和继续进行的贸易使得英国政府将商站收回，以申明其最高权力，并与方提（Fante）部落联合对付阿桑蒂（Ashanti）部落。结果在1873年，阿桑蒂部落将方提部落击溃，危及英军。英国的尊严处于危险之中。为维护英国的尊严，英军前线指挥官、殖民部大臣、国防部、伦敦新闻界以及公众都要求镇压阿桑蒂部落。

沿海岸前行，就是尼日尔河三角洲，此处盛产棕榈油，但疟疾流行，动荡不安。所以直到1805年，第一个欧洲商站在尼日尔河流域建成，而且探险者中也有人患疟疾死亡。但到19世纪后期，通过实验和差


中国
阿富汗
西藏
波斯
德里
尼泊尔
不丹
阿曼
印度
加尔各答
缅甸
广州
香港
孟买
仰光
暹罗
菲律宾
法属印度支那
马德拉斯
锡兰
北婆罗洲
文莱
马来亚
马六甲
新加坡
沙捞越
苏门答腊
婆罗洲
西里伯斯岛
荷属东印度
大英帝国在东方
英国殖民地
英国的势力范围区
0 400 800英里
0 400 800公里

错，人们发现每日口服奎宁可以保住性命（如果不能预防疟疾的话）。凭铁壳轮船的威力，英国独占了尼日尔河的贸易，一年净收入为30万英镑。可是，像其他地方一样，尼日尔的通商也引起部落政府的不安，战争和冲突越来越多。同时，法国的力量也向此地逼近。英国议会已不再主张维持耗资巨大的殖民地。措施何在？乔治·戈尔迪（George Goldie）是一位实业家、尼日尔垄断贸易的创建人，所提出的办法是一个18世纪的老办法：成立一个特许公司，授权公司实施统治和获取利润。1886年，英政府将特许状授予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这个公司把尼日利亚变成了英帝国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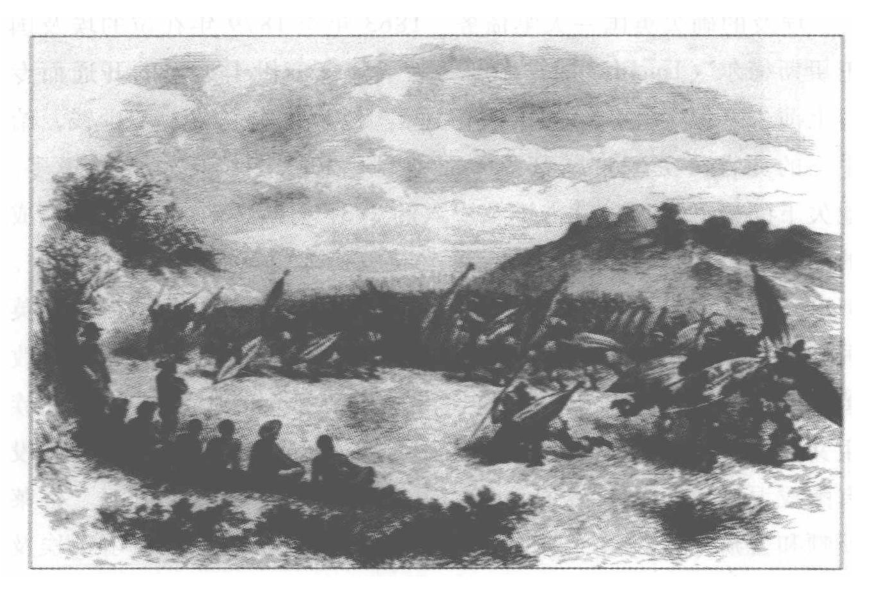
670



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就是授予戈尔迪特许状的那位英国首相，他发现贸易公司在非洲进行掠夺很有用处。他在1889年又授予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一个特许状，由他统治赞比西盆地。戴维·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在1858年至1864年之间曾在这个地区探险考察，他的武器就是日服两片奎宁。很多传教士在利文斯顿探险活动之后便尾随而至。索尔兹伯里，一个和气、擅长于哲理而玩世不恭的贵族，对传教士和商人不甚关心。他告诉这些人，如果他们进入危险地带，政府不会提供保护。但是，索尔兹伯里却给罗得斯特许状，允许他北进。他这样做是为了巩固英国在南非的最高权力，以遏制布尔人，其次是为了防止德国的力量渗入非洲。

671

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成为帝国，在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k）的统治下，于1884年兼并了德属西南非。同年，德国殖民协会（German Colonization）派卡尔·彼得斯（Karl Pe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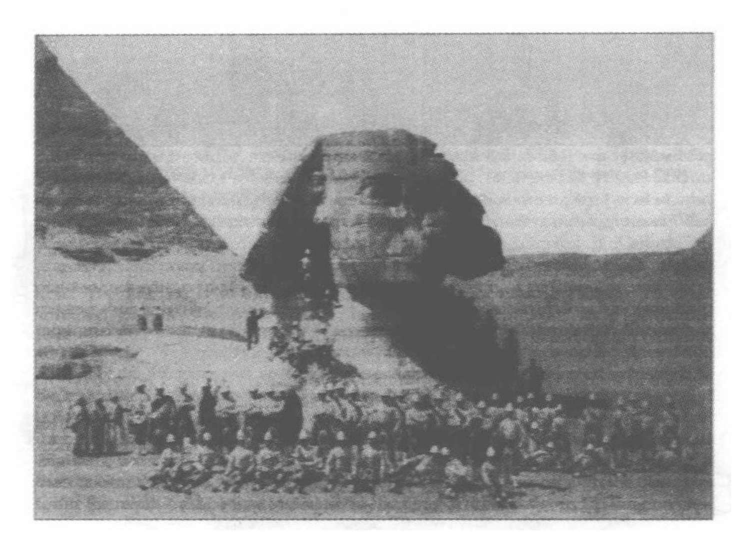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非洲人的印象：原始、低人一等（*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前往东非。法国和葡萄牙同时也在扩张。俾斯麦崇尚秩序，于1885年召开柏林会议，以确定吞并土地的规则。其中主要的一条是，任何一国不能将尚未实际占领的土地宣布为自己的领土。接着瓜分非洲便正式开场了，这令索尔兹伯里大为震惊。他对人说，1880年的时候“没有人能想起非洲”，而到1885年却人人为了非洲而争吵不休，他声称不明白其原因何在。这话有点言不由衷，因为正是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开启了瓜分的过程。

与往常一样，英国政府声称无心再侵吞其他领土，只是为情势所迫。假如英国不派出军队，埃及便不会还债，无政府状态就会发生，苏伊士运河也会受到威胁。格莱斯顿为了使议会批准拨出230万英镑军费，用于支付出兵埃及的开支，便大讲埃及的“混乱情形”，说英国的使命是将“文明生活的福音”传给埃及人，强调英国有必要保护运河。议会以275票对19票批准出兵。1882年8月16日，英军击败阿拉比上校率领的埃及军队。

672

埃及的确欠英国一大笔债务。1863年至1879年在位的埃及国王伊斯梅尔（Ismail）挥霍无度，为了庆祝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而专门上演朱塞佩·威尔第的《阿伊达》。他改善农业花了不少钱，给手下的贪官污吏们赏赐甚巨，而他自己和众多嫔妃也开销极多。他欠下的债务仅利息就占埃及岁入的2/3。于是一个由欧洲人组成的清债委员会接管了埃及财政，政府主要部门都有外国顾问进驻。但这一措施不起作用，伊斯梅尔开除了顾问，照样大肆挥霍。英国和法国强迫他让位给其子陶菲克（Tewfik），但情况仍然没有改善。国内形势酝酿成熟，阿拉比上校及下属军官发动了一场民族主义革命，要求埃及人治理埃及，不许外国人参与。这次反抗没有酿成混乱，没有导致旧债不偿，也没有危及苏伊士运河。格莱斯顿和公众主张英国不要干预。迪斯累利在1876年涉及占领埃及问题时写道：这是一个“空想”。结果英国还是介入了。英国当时所说和后来坚持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苏伊士运河。



1882 年打败埃及军队后的英国军队（*Pascal Sebah*，*Hulton Archive*）

早在 1875 年，迪斯累利政府就从伊斯梅尔手中买下了苏伊士运河 44% 的股份，英国向来依靠其对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和奥斯曼帝国的声望来作为主要屏障，来对抗俄国对通往印度航道的威胁。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英国影响的削弱，埃及在保护运河方面的意义更加重大。格莱斯顿手下的外交大臣说，首相对埃及政策发生改变，“他首次承认我们必须保护苏伊士运河”。

如同对骚乱的恐惧一样，战略上的担心，一方面出于主观的感觉，另一方面起于客观的事实。所谓主观的感觉，就是当事人对局势的判断。格莱斯顿是一个基督教徒，认为伊斯兰教徒落后于时代；他是一个地主，秉承柯尔律治的家长制哲学思想；他是一名英国外交官，曾担任驻爱奥尼亚群岛高级专员。格莱斯顿还是一位首相，其内阁成员只知以势力范围考虑问题；他是一个自由党人，该党因爱尔兰问题出现分裂；他的国家深深为帝国感到自豪，他的外交部下属人员夸大埃及的无政府状况，而他的海陆军对阿拉比的队伍占有明显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怀有幻想，以为对埃及的占领只会持续一两年时间。674
一个声称无心占领埃及的英国政府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是可以理解的。



1875年，迪斯累利政府为英国买下了通往印度航道的要道——苏伊士运河（*Punch Limited*）

帝国的扩张，往往呈现一种自发倾向：毗邻的疆土总是令人垂涎。对埃及而言，就是指苏丹。在很大程度上，伊斯梅尔的奢费产生于并吞苏丹的野心。有一个名叫马赫迪的伊斯兰教领袖，自称救世主，率众起义，直接威胁到驻扎在喀土穆的英军。1884年2月，英政府派遣以在中国作战而出名的戈登将军前往救援。戈登延误时机，以致被包围，1885年1月为叛军所杀。两天之后，英国的增援部队才到达。援军之所以来迟，是因为格莱斯顿与克莱默勋爵及援军司令加尼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未能达成默契。格莱斯顿命令克莱默解决埃及财政问题后便离开。克莱默控制埃及国王和埃及达24年，对埃及实行家长式统治，像寇松在印度一样，这些举措改善了生活，但未能使埃及做好自治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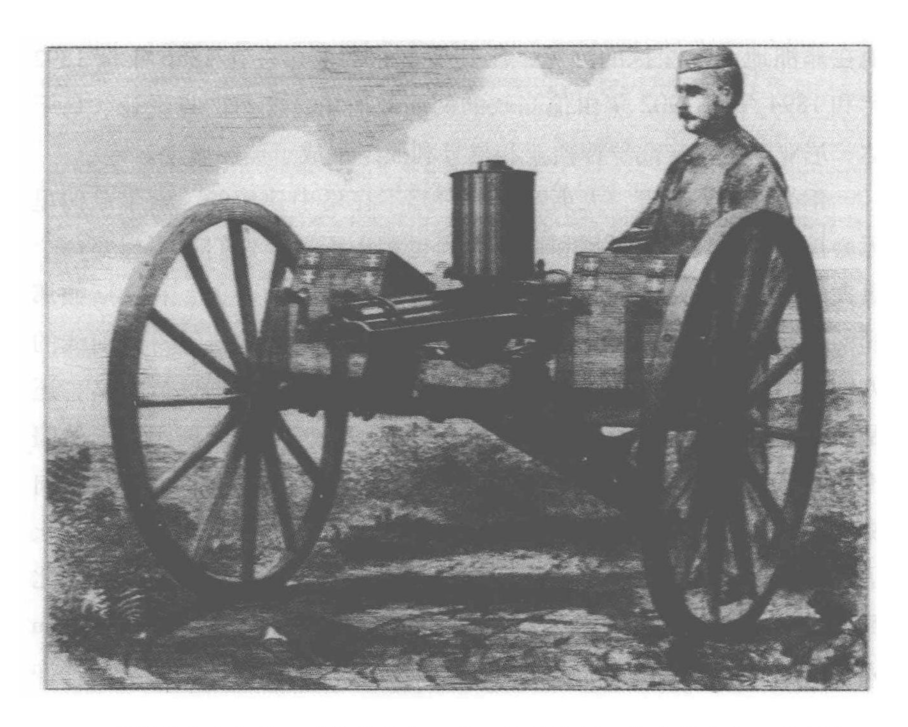
格莱斯顿政府于1886年倒台，索尔兹伯里勋爵接管执政权。直到这时，保守党也没有比自由党更倾向于扩张。在议会里，索尔兹伯里轻描淡写地说他想不起来非洲的湖泊的名称，大概是沼泽之类。然而，

他在非洲地图上涂抹的红色，比其他首相都要多。在 1886 年至 1892 年和 1894 年至 1902 年由他当政的两届政府里，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尼亚萨兰、东北罗德西亚和尼日利亚，都成了英国属地。

正如许多人所言，大英帝国是在心不在焉中建成的。索尔兹伯里无心扩展帝国，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也相去不远，他们都不想要一个更大的帝国，但是他们都无法抵制像戈尔迪那样的商人、利文斯顿那样的传教士、沃尔斯利那样的将军和罗得斯那样的总督等身处前线的人们提出的要求——前线需要军事支援。无论是国内的民族主义，还是外交方面的均势政策，都不会听任其他国家攫取本应属于英国的疆土。因此，当德国的卡尔·彼得斯进入今日的坦桑尼亚，葡萄牙人向赞比西河上游进发，法国人在尼日利亚动手之时，索尔兹伯里都阻止了他们的行动。他指示莫桑比克的英国领事达成有关尼亚萨兰及东北罗德西亚的条约，授予印度洋上的轮船大王威廉·麦金农（William McKinnon）成立英国东非公司（British East African Company）的特许状，令其进入肯尼亚和乌干达；还给了戈尔迪独霸尼日利亚的特许状。

德国对东非的野心是当时最大的挑战，索尔兹伯里的对策，就是答应把北海的赫利戈兰岛让给德国人以交换非洲的肯尼亚和乌干达和对桑给巴尔岛苏丹的保护权，德国接受了这个交易。

与法国做交易则很不容易。1897 年，法国的马尔尚（Marchand）上尉从刚果进入尼罗河上游。经过 18 个月的跋涉，穿越丛林和沙漠，马尔尚和 7 个法国人以及 120 个塞内加尔土人在法绍达（Fashoda）升起了法国国旗。两个月之后的 9 月 19 日，英国的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率领着一支大军，与马尔尚和 7 名法国人交涉，明确告诉法方：苏丹和尼罗河上游属于英国。基奇纳的主要敌人从来都不是法国人，而是拥有 5 万人的德尔维希部落（Dervishers）军队。这支军队在 1885 年歼灭了戈登将军的军队。与基奇纳军队的武器不同，戈登的士兵没有马克沁机枪，这是一种后部装弹的连发枪械。根据年轻的丘吉尔的报道：一场 5 小时战斗的结果是“连响金属造成的地狱”，11000 名德尔维希人的尸首“堆积如山”。英国和埃及一方的阵亡仅为 675



早期的格林机枪，同装甲轮船一样，都是强有力的帝国主义工具（*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80人。这种后部装弹的连发枪械与奎宁一起，揭示了欧洲人在数世纪接触之后，得以在仅仅16年之内就瓜分非洲的原因。

英国的领土，从开罗至乌干达，尼亚萨兰至开普殖民地，在非洲东西海岸拥有大片地区。索尔兹伯里说，获取这些领土都是出于战略需要：乌干达和苏丹控制了尼罗河水道，对埃及农业至关重要；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则遏制了布尔人，他们的扩张对英国控制南非构成了威胁。而南非和埃及一样重要，都是通往印度航道战略要地。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英国军队就必须开到荒无人烟、草木不生、沙石遍地的前哨基地——法绍达，这个地方离伦敦、孟买和开罗都有数千里之遥。

676 尼罗河及其资源，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很早就有一种魔力，几乎像通往印度的航道那样诱人。为着保护这条航道和河流，格莱斯顿夺取了埃及，索尔兹伯里征服了苏丹，这两个地方无论从市场还是从投资

衡量，都没有多大经济价值。1892 年，麦金农的公司支出 8 万英镑，收入 35000 英镑。大多数的非洲殖民地在经济上对趾高气扬的占领者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因此，夺取这种殖民地，战略价值是唯一的原因。这也是通晓哲学的索尔兹伯里所提出的理由。但是，索尔兹伯里的看法，与格莱斯顿一样，都是其所处环境所决定的。索尔兹伯里生长于英国这个工业、技术和帝国势力都占有无与伦比优势的国度，生长于欧洲这样一个工业竞争、军备竞赛、外交角逐和民族主义都驱使人们以帝国为荣的地方。这许多事件汇聚起来，就使得 19 世纪 80 年代及以后的英国产生了一种狂热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与帝国

1883 年，约翰·西利（John Seeley）爵士出版了《英国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书，唤醒了无数英国人对帝国荣耀的意识。其他一些作者也打开了帝国主义狂热的闸门。1885 年，有关帝国的自治领应当结成一个更紧密联盟的主张，促成了帝国联邦同盟（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的创立。1883 年，W. T. 斯特德（W. T. Stead）担任《蓓尔美尔街新闻报》（*Pall Mall Gazette*）的编辑。1363 年，W. E. 汉利（W. E. Hanley）创办了《民族观察报》（*National Observer*）。这两种刊物部是倡导推进帝国的事业。而这个事业在 1899 年的时候赢得了更大的读者群，这一年开办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是发行 50 万份的第一家廉价、制造轰动效应的日报。1891 年，有关建立地域辽阔的帝国贸易区的新重商主义思想，又促成统一帝国商业同盟（United Empire Trade League）的成立。接着在 1903 年，约瑟夫·张伯伦发起帝国关税运动。1887 年，英国政府和热心支持帝国的人士召开了第一届殖民地大会（Colonial Conference）。1891 年，G. A. 亨蒂（G. A. Henty）出版了他的《炮轰亚历山大》（*Bombardment of Alexandria*）和《进兵喀土穆》（*The Dash for Khartoum*），这是 30 种儿童通俗读物中的两种。1900 年，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向英国民众宣讲：适者生

存是进步的阶梯。1899 年，诗人鲁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敦促读者：

> 承白人应负重任
> 遣精兵出征沙场
> 嘱爱子离家远行
> 辟乐土不求报偿

帝国主义的狂热成为不可遏止的洪流。塞西尔·罗得斯在 1899 年说：“自由党和保守党争先恐后，以表明本党才是最伟大、最狂热的帝国主义者。”

1897 年，整个帝国共同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60 周年。来自帝国的各地的 5 万名军队，排成服装整齐鲜艳的队列，从斯特朗特经舰队街行进到圣保罗大教堂。女王发电报向全帝国的庆祝活动致谢。伦敦民众夹道欢呼。公众十分重视帝国的地位。在与布尔人发生战争之时，英军在马菲肯（Mafeking）被困 6 个多月，民众极为焦虑。1900 年 7 月，援军解围消息从南非传来，伦敦民众倾巢而出，举杯畅饮，狂欢庆祝。19 世纪末，民族主义在英国达到狂热的顶点，法德两国也是一样。其最为流行的表现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这种情绪渗入了社会各阶层、每种宗教和所有的政治党派。激进派人士如查理·迪尔克（Charles Dilke）在一本名为《更伟大的英国》（*Greater Britain*）的书中歌颂帝国主义的美德。自由党首相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竭尽全力为帝国辩护。保守党更坚信帝国主义的正义性，连费边社会主义者、剧作家萧伯纳（G. B. Shaw）也声称：“一个费边社成员在理论上必然是一个帝国主义者。”

677

三种势头强劲的发展：英国思想和社会潮流的发展；国外经济竞争和外交抗争的激烈；帝国这一决定性事实的影响，对这种狂热的帝国主义作出了解释。英国的思想和社会潮流的发展十分繁杂，其范围从纯学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品，如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掌控热带地区》（*Control of the Tropics*），到基普林的诗歌和音乐厅里的侵略扩张主义歌曲等等。当然，还有基督教福音主义传教士不断呼吁教徒前往殖民地去感化异教徒。人道主义者仍在继续他们的工作：从18世纪末以来就大力反对奴隶贸易或要求保护土著居民。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新出现的伪科学，宣扬盎格鲁—撒克逊人至高无上的地位。新的人类学也宣称白人优越于有色人种。到1900年，这种信念就贯穿于帝国主义思想。城市化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教育的普及，在城市中产生出一批缺乏归属感、孤独无聊、厌烦城市生活的居民，他们爱看报纸、传记、小说，从中得知基奇纳的战绩、利文斯顿的英雄主义、基普林的印度故事和塞西尔·罗得斯难以置信的巨大财富。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因帝国而得到提高，但是他们幻想中的生活更加丰富，以作为英国人而感到自豪无比。

德国作为经济、军事和帝国主义强国的崛起，法国对沙文主义的顽强和不懈的追求，俄国对近东的威胁，都令英国人和他们的领导者感到不安，也使他们的帝国主义调门越唱越高，更加竭力为之奋斗。德国商船将德国货物运销世界各地，促使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商人组建帝国联邦同盟，要求推行帝国关税制。对于像索尔兹伯里这样的玩弄外交游戏的老手来说，德国的崛起、俾斯麦令人生畏的同盟、德法两国侵入非洲的行动，都对势力均衡产生了莫大威胁。英国公众的民族主义、商人的经济恐惧和政治家的外交活动，都面临紧张和挑战。而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建立强大的英帝国。

英国已经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的事实，也使得英国人成为忠实的帝国主义者。一个多世纪以来，帝国的存在已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部 678 分，确立了英国人作为世界最优越的民族的形象。数百万英国人移民海外，定居于自治领，统治印度，与中国通商，在非洲传教，在拉美发财致富。移民回国探亲或寄回的家书、帝国官员任职完毕归国，给一代一代英国人带回帝国的风土人情、盈物财富和激动人心的事物，那些宣扬英国业绩的书报小说强化了这种印象。一百多年来，贸易和投资给母国带回了财富。旅游团搭船周游世界，在开罗、亚丁和孟买

停泊上岸，住进英国的旅馆。这尤其使得在国外担任军事和行政职务、领取薪金的统治阶级，感到十分光彩。这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又是一个多个方面并进的经历。

帝国的现实存在，有助于解释帝国主义潮流，而不是这种潮流解释帝国的现实存在。帝国的建设过程始于1583年创建纽芬兰殖民地，止于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布尔战争和1919年国际联盟托管制度除外）。帝国的十分之九的属地，是在帝国主义成为大众热潮之前攫取的。帝国通过一块一块属地的获得而稳步、逐渐地形成，如同珊瑚礁的形成过程一样。不断占领土地的主要动因，是英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自1740年至1815年之间，欧洲大陆上的毁灭性战争，使得列强的国力大为削弱，从而任由英国海军称霸世界、自由自在地在世界各地修建商站。英国工业革命又将海军和商业优势推到近乎垄断的程度。

在这个英国势力无与伦比的第一个世纪中，贸易对帝国的推动最大，将英国人推到拉各斯、仰光、曼德勒，并染指尼日尔河、恒河和长江流域。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推力因素，像朝圣者、探险家、传教士、反对奴隶贸易者、成千上万想获得土地的人、被强迫流放的罪犯、卷款潜逃者以及想升官发财的海陆军官等等。但是，其推力都是来自一个“利”字：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消息刚被提及，成千上万的人就立即上路；玻利维亚有得到纺织品合同的微小机会刚刚出现，马上招来了一个曼彻斯特的经纪人；锡兰办咖啡农场有利可图的说法刚一传出，伦敦的资本随即到达。当时的投资和通商的力量是如此强劲，以至于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中强调帝国主义的主要动力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造就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精英阶层，由投资者、商人和制造商组成，都是些急于牟利发财的人。资本主义因其财富分配不均、工人购买力低下，所以出现产品过剩。这种消费不足使精英阶层不得不到国外去寻找市场，说服其政府去攫取更多的属地，以作为产品市场、投资目的地和原料来源地。列宁颇为注意霍布森的论点，他在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论点。

由于商人在帝国初期活动中居于关键的地位，也由于许多商人确实从帝国获得利润，所以霍布森的书便一直成了对帝国主义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之作。但是我们如果将帝国发展的过程一步一步地仔细考察，便会发现伦敦的银行家和曼彻斯特的棉织品经纪人的作用不大或未起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突出的，则是在当地应付混乱局面的英国人。伦敦并没有人下令斯坦福德·拉弗尔斯买下新加坡，指示詹姆斯·布鲁克去当沙捞越王，或者要求印度的总督们去接收数百个土邦的领地。同时，伦敦的商人也没有促使新加坡的总督去劝说本不情愿的殖民部准许其治所迁入马来亚。伦敦的投资人也没有向殖民事务部施加压力，以允许沃尔斯利将军向阿桑蒂人开战，或者批准并吞斐济群岛。这两次行动都是因为当地发生了战事和动乱，促使当地的英国行政官员力劝殖民事务部采取行动。经济上的获益使成千上万英国人移居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但并没有银行家和实业家策动他们这样做。而且，银行家和工业界大亨也没有力劝格莱斯顿夺取埃及或下令米尔纳发动布尔战争。

商人并非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比如在马来亚和缅甸，当地英国商人的安全和荣誉需要保护，这一点与当地的传教士、移民和英国地方官员们的需要相一致。这就需要派遣更多的军队，或者给相邻的部落酋长、印度王公、苏丹配上几名英国顾问。19 世纪，英国卷入了无数这类地方纠纷，件件都有酿成骚乱的可能。在这些地方任总督或者专员的人通常都是军人，他们都根据帝国统治的需要接受培训，确信白人的优越性，他们历处之地距伦敦都有数千英里之遥。在发明电报和开通苏伊士运河之前，从印度或南非发一封信到伦敦需要几个月时间，回信又需几个月。假若殖民部或者印度事务部耽搁一下，一年就过去了。大英帝国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实际上大多归功于许多当地的一线人员所作出的必要决定。

不过，帝国扩张虽然大部分肇始于地方局势，但大权还是控制在英国政府手中。在兼并缅甸或贝专纳兰之前，首相和内阁必须予以批

准。尽管新的殖民地作为投资市场或出口市场令人失望，但仍有一些资本家发达起来，更多的资本家还抱有获取巨大利润的坚定期望。这种期望在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之中，在德国和美国商品到处充斥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紧迫。虽然罗得斯夸张地声称：如果没有国外市场，就会发生国内战争，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强有力的信念，即更大的帝国对消除经济衰退有益。同样强有力的信念认为，更大的帝国在战略上十分必要。

对于战略地位的肯定，常常掩饰了家长制统治。英国的统治阶级对英国人治理落后民族的责任方面。持有奥林匹亚式的信念。这种信念有许多根源：最牢固的根源便是英国优势明显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实力。第二个根源是帝国治理成功的成就和帝国当局形成的治理习惯。乌干达的创建者、尼日利亚的缔造者弗雷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生于印度，长于印度。帝国诗人基普林的背景也是这样。布尔人的征服者罗伯兹将军，也在印度度过了一生中前40年的时光。力主英国应统治马来亚的那两位新加坡总督，在非洲和印度学会了作战与行政之术。南非开普殖民地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在指挥布尔战争中的作用最为重要，其才干是以前在埃及克莱默勋爵手下工作时培养出来的。不过，英国人的家长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来的土地贵族统治英国农民和爱尔兰农民的经验，这个贵族阶级又在新办的中学和大学里接受这样的教育：统治别人是自己的天职。格莱斯顿不愿并吞埃及，卡纳万勋爵（Lord Carnarvon）也迟迟不肯占领马来亚，而索尔兹伯里则看不上非洲。但是，在当地官员要求他们派兵干涉维护治安时，他们都答应了。格莱斯顿曾在埃及问题上表示：英国必须带来“文明生活的福音”。

680

民族主义以及家长制都发挥了作用。民族主义直到19世纪末年才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力量，但到底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公众舆论很少迫使政府干涉或出兵，但是一旦一个地区被占据或军队卷入战斗，大不列颠的荣誉就需要顾及。贵族和平民之中，还存在着一种强大的种族主义。黄金海岸的沃尔斯利将军写道：“非洲人像猴子，他们是毫无

用处的种族。” 1849 年，托马斯 · 卡莱尔宣称：欧洲人比非洲人聪明，劣等民族必须服从于优等民族。其实这也是 1900 年绝大多数英国人所持有的观念，这种观念适合于统治阶级的家长制统治和下等阶级的沙文主义。大英帝国造就了一个帝国主义的民族。

阅读文献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 Vols. 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年的第二版，对于这个世界最大帝国创建的权威性和爱国主义的概述，作了许多改动和有价值的补充。

Phlip Curtin, *The Image of Africa : British Ideas and Action , 1780—1850*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该书深刻地探究了英国帝国主义最丑陋的方面——强烈的种族主义和对非洲黑人所持的傲慢的家长主义的观点。

D. D. 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 1930—1914* ,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该书对导致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社会、个人和经济力量作了均衡的和细致的分析，对投资的作用（而不是贸易的作用）提出了质疑。

Daniel R.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这是一部简要的、但最具启示意义的著作，研究了技术进步推动 19 世纪帝国主义的方式。

John Hobson, *Imperialism : A Study* , Ann Arb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8. 作者在书中首次明确表明：导致帝国主义的要素是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对于市场、原材料和投资地带需求。

Paul Knaplund, *The British Empire , 1815—1939* ,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1. 这是一本内容广泛、质量上乘的关于大英帝国兴起的教科书，着重阐述不同的种族、文化、民族和地理因素演变为多样性的大英帝国。

W. David McIntyre, *Colonies into Commonwealth* , London: Brand-

681 ford press, 1966. 该书极为清晰地阐述了大英帝国的形成、向英联邦的演变及其帝国的衰落，对于近来研究概况和不同观点的概括十分出色。

James Morris, *Pax Brittanica : The Climax of Empire* , London: Faber, 1968. 该书并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而是从总体上生动地概览1900年前后处于巅峰期的大英帝国，笔调丰富多彩、激动人心，具有睿智的洞察力。

Mark Naide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 1783—1965 : A Short History* , Reading, Mass. : Addison-Wesley, 1970. 该书对英国帝国主义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阐释，列出了大事汇要，分析了英国人与土著人及其制度的关系。

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 *Africa and tile Victorians* ,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61. 该书提出了强有力的、有学术含量的但有所夸大的观点：促使英国主宰非洲的主要动因的战略因素，特别是对通往印度航路的关注。

Joel Wiener, ed. *Great Britain :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 of Empire , 1689—1971* , Vol. 3.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4. 这是一部有关1852—1913年间大英帝国重要文献汇编的资料集，内容包括一些政府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的报告、条约、函件、宣传品以及支持和反对帝国的演讲稿。

第二十六章　危机时代：1875—1914年　682

从1847年到1873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大多数英国人享受了资本主义的好处、议会政治的优越性、大英帝国的显赫和维多利亚式道德的睿智。这是一个稳定、安全和充满自信的时代。当然，它也存在危机和焦虑，但危机都可以解决，焦虑也可以抑制。1873年后，经济和政治事件开始动摇维多利亚时代万事俱佳的信念。1873年，物价、利润和收入开始下跌，超出正常的幅度。到1896年，虽然商品价格下跌并不是持续性的，但商品价格跌到1873年的1/3以下。1879年，廉价谷物涌入，租金也大大下降。在1884年至1889年之间，技术工人的失业率达7%，非技术工人则更高。

经济繁荣和增长依然持续，但速度放慢起伏不定。有时下降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致使人们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好处产生怀疑。经济的暴涨暴落，造成了危机四伏的气氛，且蔓延到社会和政治中去。工人们变得具有战斗性，他们组织工会，发动罢工，以争取较高的工资，组织社会主义和劳工的政党。企业家们则组织起来破坏工会活动。妇女没有选举权，开始采取暴力行动。爱尔兰人没有自治权，变得好战起来。同时，良知危机出现，因为经济持续繁荣，而居住情况恶劣，贫困有增无减，老人与病人生活困苦，失业人数日增，这些人都处于无助的状态。一个相信经济繁荣、不干涉主义和自助精神的安定时代，

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紧张时代。在这许多危机之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英国经济状况。虽然英国还是经济巨人，但是与美国和德国的竞赛中已经落在后面。

683

落后的巨人

从 1873 年到 1914 年，英国资本主义是世界经济中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且与谣传相反，还是一支不断增强的力量。但它的部分动脉已开始硬化，致使年轻的美国和德国对其支配地位展开挑战。由于在报纸的头条新闻中，坏消息比好消息多，所以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均低估了英国从 1873 年到 1914 年的经济实力。但是，一个有眼光的记者会坚持请他的主编先生考虑英国经济在四个方面的实力：经济力量的不断增长；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其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支配地位；英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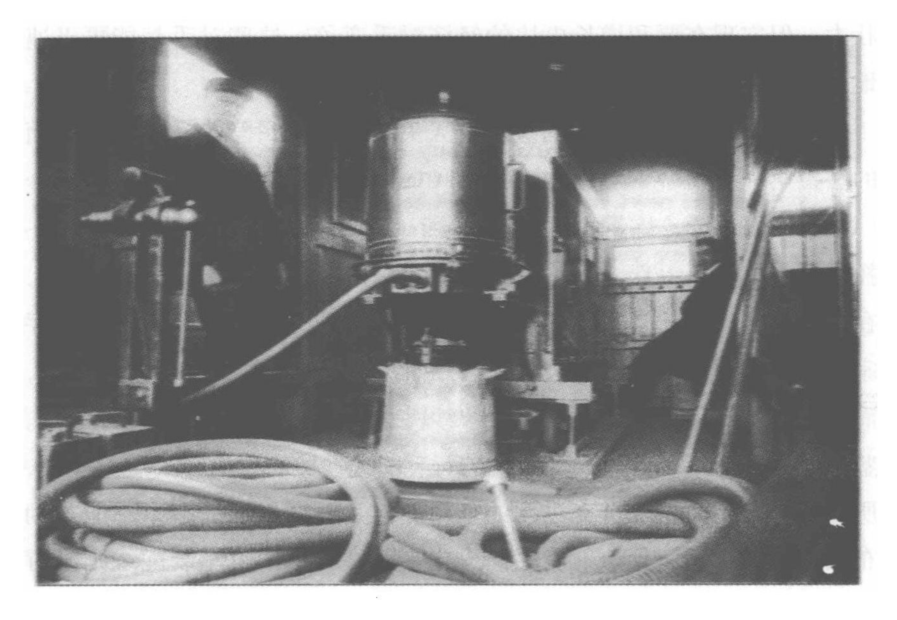
在 1870—1914 年间，英国经济增长缓慢，平均每年人均增长率为 2.2%。但增长是肯定无疑的。这个时期工业经济的所依赖的两种主要原材料：棉花和铁的产量增长近 1 倍；羊毛和煤的生产，增长 1 倍以上；而造船产量则增加两倍半。从 1871 年到 1911 年，纺织工人的人均产量增加 35%，生产钢铁的成本由 1860 年的 40 英镑降到 1895 年的 4 英镑。1911 年，英国生产世界棉制品的 59%，汽车的出口量大于进口量，生产钢铁等效率与美国相匹敌。1871 年，英国年产总值为 7.82 亿英镑，到 1911 年，按物价不变折算，则达 19 亿英镑。产值增加的主要部分来自服务业，特别是来自更加高效方便的百货公司和连锁商号的增长。此外，产值增加还来自海外，富人得到了投资的巨额红利，一般民众则享受了廉价食物。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两种新的动力，即来自电和内燃机的动力。此外，化学进步、精密机器、机械化和装配线，还带来了许多新的产品。英国对化学工业的贡献很大，如行销各地的肥皂、油漆、肥料和炸药。英国在高精密机器制造方面也很突出。英国工业的天赋体现在金属和机器制造之上。1870 年之后，英国继续生产硬度越来越

高、品质越来越好的钢铁。这些钢铁经由改进的车床、铣床和磨床的加工，生产出各种工业机器，以及缝纫机、时钟和自行车（仅 1913 年就生产了 15 万辆）。

英国海外投资高达 40 亿英镑，几乎与德、美、荷、比 4 国海外投资的 55 亿英镑总额相当。英国商船独霸海上，英国银行为整个世界提供服务，英镑和黄金一样坚挺，帝国是巨大的商品市场。英国每年出口总值为 6.35 亿英镑，进口总值为 7.69 亿英镑。但由于有 3.67 亿英镑的无形收入，所以仍然拥有 2.39 亿英镑的顺差。无形收入的大部分来自海上运输，还有相当部分来自海外投资、世界一流的银行家、经纪人、保险家和金本位英镑的受托保证人，这些构成了世界金融的基础。

1870 年，英国的人均收入，按 1913 年的物价计算为 26.8 英镑，684 至 1910 年则为 48.2 英镑。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1870 年至 1900 年之间的最大经济事件，就是食品和制造品价格的下降。小麦价格下降 50%，肉类和乳制品价格下降 10%，商店里货物丰富，廉价的商品有：



电力奇迹推动了真空吸尘机的发明（*Hulton/Archive*）

成衣、机制鞋、玻璃器皿和陶器、五金制品；中等价格的商品有：手表、自行车、照相机、缝纫机；高价的商品有：留声机、汽车、吸尘器和洗衣机。1914 年的生活水平，比 1870 年的时候高近两倍之多。

可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新技术的采用不够积极，经济衰退开始出现，收入的差距较为悬殊。

"经济增长放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英国不但与美国德国较快的增长率相比是如此，而且与英国 19 世纪初期的增长率相比同样如此。1819 年至 1853 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3.5%，1870 年至 1913 年，仅为 2.2%。1870 年至 1913 年，英国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为 2.1%，美国则为 4.9%。在 1880 年，英国年产钢量占世界的 1/3，而至 1902 年，仅占 1/7。不过，这 1/7 的数额为 500 万吨，而早年的 1/3 仅为 100 万吨。1870 年，英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 41%，而到 1914 年，仅为 30%，但因世界贸易总额为 5 亿英镑，而非 4 亿英镑，所以对外贸易的绝对值下降有限。这位经济巨人虽然仍在壮大，但它现在要和增长更快的经济对手竞争，这些对手都能更迅速地采用新技术。

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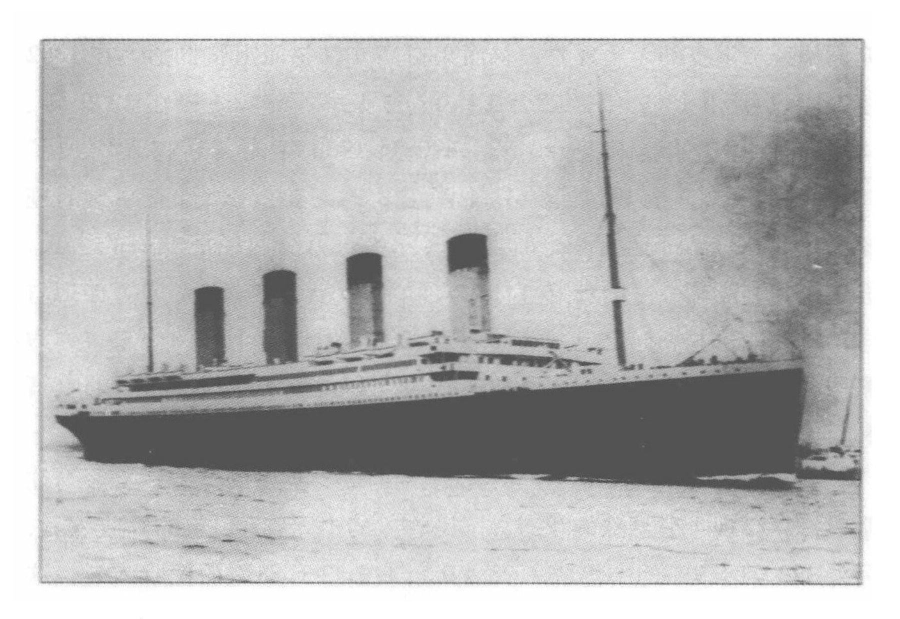
英国采用新技术行动迟缓，令人失望。英国科学家——电力方面的法拉第和克拉克·麦克斯韦尔（Clerk Maxwell）、染料方面的珀金（W. H. Perkin），炼钢方面的贝西默（Bessemer）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Gilchrest-Thomas）——都在发明和探索方面引领欧洲。可是，在工业上领先的却是德国和美国。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经济的批评家，指责英国使用的技术效率低下，如纺织用旧式纱锭，炼钢用平炉，而德国采用效率更高的炼钢炉、纺纱机和索尔维法（Solway Process）。鉴于平炉较适用于英国的硬质铁矿石、旧式纱锭纺出的纱线质量优异，所以使用原有的技术自有过硬的理由。但是，索尔维法根本不能与勒布朗克法相比，而且拒不使用标准化零部件和推广汽车装配线则没有任何理由可言。

经济大起大落是第三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一种

充满疯狂和沮丧的矛盾现象，忽而兴奋高亢，忽而沮丧低落。在 1882 年、1889 年和 1899 年，工会工人的失业率不过 2%；在 1879 年、1886 年和 1910 年，则达 10%。1870 至 1900 年，实际收入增加了 35%；而自 1900 至 1914 年，则下降了 8%。这些起伏没有平息的迹象。议会和媒体都把前一个时期的实际收入上涨和经济发展的增长、而物价和利润却下降的现象，称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而把后一个时期物价和利润上升、实际收入和经济发展却下降的现象，称为繁荣。这些描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和爱德华时代所特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

当爱德华七世在 1901 年成为国王的时候，英国的经济不平等与往常一样，呈现十分悬殊的状态。国民收入的 1/3 归于 3% 的高收入者，另外 1/3 归于 9% 的中等收入者，其余 1/3 归于 88% 的低收入者。这种分配不均，加上 1900 年之后实际收入下跌 8%，似乎证实了卡尔·马克思的预言，资本主义社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将会引起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关贫者愈贫的预言，到后来没有出现，因为实际收入的下降只是暂时现象。可是，英国工业生产领导地位的丧失可不是暂时现象，在采用先进技术迟缓也不是暂时现象。

任何对英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分析，均需弄清楚两个事实：第一，英国不可能永远近乎垄断制造业；第二，英国并未导致 1873 年至 1896 年间世界物价的下降。1870 年，英国控制了下列产品生产的比率高达 75%，包括棉花、铁轨、白铁、马口铁、机车、轮船和煤。一旦其他国家实现工业化，哪怕是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都无法维持原有的垄断地位。同时，任何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都无法避免所谓的“大萧条”。19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的繁荣，主要是来自于对钢厂、铁路、船坞、码头和仓库的大量投资，而这些资本又来自于炼钢技术的新发明。这些钢厂、铁路、造船厂、码头、仓库等的修建，意味着需要雇用大批工人。他们的工资收入推动物价上涨，特别是当这批资本的投入还未能立即增加消费品的生产。1873 年后，这类车船仓库的投资减少了，工人被解雇，收入也出现下降。同时，世界各地的车船码头又以 686



"泰坦尼克号"之类的巨型轮船，使英国成为第一大航海与世界贸易帝国（*Hulton/Archive*）

前所未见的规模将大量廉价货物抛入市场。而且，在1898年阿拉斯加发现金矿之前，一直没有找到新的金矿。后果就是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供应量下降，可消费的金钱减少，导致物价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利润降低。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工厂、船坞、铁路的扩建工程放缓，于是失业增加。但是，到1890年左右，化学工业、电力和内燃机等方面的新发明，又引起对新工业的大量投资。1900年之后，黄金供应量增加，修造房屋热潮又起。新的一轮经济增强循环到来了，虽然这更多的是对美德两国经济而言，而不是对英国经济而言。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每个工人的生产力每年仅增长0.6%，而德国增长2.6%。而且，德国年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1%，而英国仅为2.2%，差距之大，令人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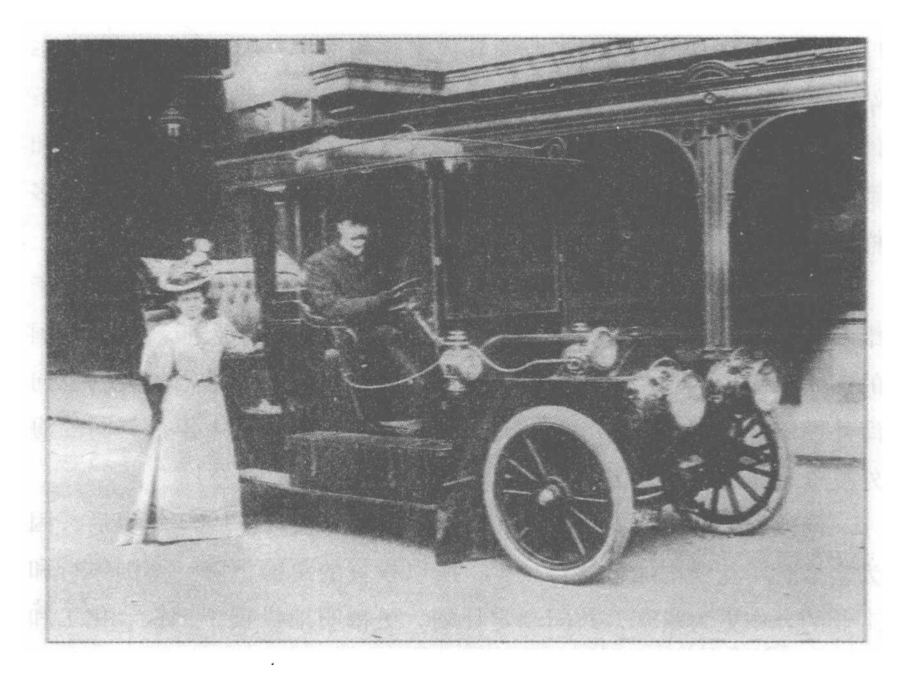
687 英国经济的许多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英国不能与德国和美国经济的增长并驾齐驱。英国是工业化的先驱。英国建造了第一座使用"骡机"的纺织厂和最早采用贝西默式平炉的炼钢厂。这些盈利工

厂，均与棉纺工业和炼钢工业的其他工序相连接，因而都坐落在大车站、仓库和煤场附近。而要新建一座工厂，就意味着丧失许多有利条件。尽管这些老厂的效率不能和采用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和新式的纺纱机的新厂相竞争，但仍能获利，这就打消了人们改进和多样化的愿望。

合理的对策，是兴建新式工厂和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是，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守旧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做法过于大胆。如果英国的钢铁和棉花不能在欧洲竞争，可以运到帝国和亚洲推销。英国也向海外投资，如1913年，其储蓄的一半投资海外。1914年，英国的海外投资总额约等于其国内工商业资本的总和（土地除外）。

伦敦的金融机构，很久以来一直注重海外投资。1900年以后，因为富裕阶层花钱增加、储蓄减少，所以投资的总额下降。德国银行和工业的合作更为紧密，共同制定计划，更精明地投资于钢铁、化工和电力方面；甚至把很多钱花在科学研究上面，而英国人就没有这样做。德国的努力产生了效果，一些大企业联合组建卡特尔，在各所在行业占支配地位。在英国，家族企业依旧盛行，此种企业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经营纺织厂方面很有效率，但对经营汽车厂就不行。沃尔斯利公司4000名工人每年只生产3000辆汽车，这一事实很充分表明了1913年美国产车462000辆、而英国仅产13000辆的原因。

历史学家对于英国巨人如何衰弱下去的问题莫衷一是。许多史家持批评立场，指责英国墨守家族企业制度、忽视装配线和实行商品标准化、坚持旧式工厂的旧制、厂主缺乏祖辈的经商意识、教育未能培养出足够的工程师和企业家。每年英国大学培养的工程师不足200人，而德国则超过3000人。其他历史学家则持不同观点。他们否认英国的工业受到任何缺乏科学技术的影响，虽然英国培养的工程师较少。他们也不认为经商技能一代不如一代，否认家族企业必然无效率和传统主干工业——棉纺织业、采煤业、炼钢业、造船业必然衰败或阻碍新产品出现的说法。在1914年，棉纺织业是一个达到鼎盛的工业；煤的产能等于德国，而优于欧洲其他国家；莫里斯牌汽车在价格和品质上



第二次工业革命最辉煌、最令人兴奋、最具革命性的成果，就是汽车的出现（*Hulton/Archive*）

都与福特公司的T型汽车不相上下，而拥有汽车的比例，与美国不相上下；英国的人造丝工业优于德国，而英国所造的船舶吨位占世界的一半。同时，英国保住了世界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国民收入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但是，国民收入并不平均，许多人陷于贫困之中。

688

贫民

1819年，从商人变为业余社会学家的查理·布思（Charles Booth）声称：30%的伦敦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他的估计并不是来自道听途说，因为他和他的助手曾拜访过成千户贫困人家。调查贫困状况是一个传统办法。1797年，弗雷德里克·伊登（Frederick Eden）爵士出版了《贫民现状》（*The State of the Poor*）。1851年，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出版了《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London Poor*）。这两本书所描写的社会，都比布思所看到的要穷

苦得多。19 世纪 90 年代的平均国民收入，要比 19 世纪 50 年代高 1 倍。可是，所谓贫穷，是相对于个人期望或邻家的财富而言。所以在 1889 年英国还有不少贫民，而且人们比以往有更大的热忱去进行调查。公理会派教师安德鲁·默恩斯（Andrew Mearns）牧师在 1883 年出版了《伦敦安乐园外的悲惨呼声》（*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同时，救世军的创办人威廉·布思也出版了《英国最黑暗的角落及其出路》（*In Darkest England, The Way Out*）。两书都表现了对伦敦贫民的悲惨生活的深切认识。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人们不同，两位作者都认为社会以及个人，都应对贫困现象负责。这些问题 689 的产生，不在于贫困懒惰的无业游民本身，而在于制造这种贫困懒惰的城市，伦敦城看上去熙熙攘攘，但冷酷无情。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贫穷不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是一种可以减轻的现象。毫无疑问，对伦敦城里的贫民窟，必须采取措施，因为一些贫民窟的状况在 19 世纪 90 年代甚至比在 50 年代时还要糟糕。



1889 年伦敦的一个贫民窟（*Hulton/Archive*）

按照查理·布思的说法，伦敦有3000人住在8人或以上合住的房间里，有50万人住在3人或以上合住的房间里。威廉·布思说，这种贫民窟“充满着疟疾，臭气熏天，毒害很大”。墙壁和天花板满是污垢，呈黑色。窗户用破布堵住，虽挡了冷风，但也挡了新鲜空气和光线。房间里有时只有一把破椅子、一张粗糙桌子、一张垫着破布的床、两口箱子和一块放在砖堆上的板，有的房间甚至连一点家具也没有。煤价很贵，房间时常因无火而冰冷难耐，很少生火煮食，因而街上有很多叫卖热食的贩子。饮用水则或取自污浊的水槽，或取自每星期两次、每次供水20分钟的户外水管。同样令人沮丧的是，随着街道拓宽、铁路、码头、仓库、办公楼和商店的修建，本来已经稀缺的工人住房被夷平，房租上涨。到1900年，伦敦将近一半的工人阶级需要将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这样用于购买其他必需品的收入所剩无几。一个人穷到不能支付房租，便沦入所谓的“难见天日的十分之一”的半野蛮的地下世界。用布思的话说他们是“打短工的工人、游荡者和半罪犯”，许多人只有拥挤在泰晤士河的堤垣上或铁道桥梁的涵洞里度过寒夜。他们宁肯这样，也不愿去住那济贫法联合会（Poor Law Union）的临时寝室的板床上过夜，按规定第二天需做锤石子的苦工。

690

查理·布思将所有为了得到最低生活所需而挣扎的人置于贫穷线以下。在伦敦，这包括每星期只有20先令甚至更低费用的一般家庭，20先令中有14先令用于食物，3—4先令用于房租，其余则用于衣服、照明、燃料和（为了避免生活太无聊）饮酒及赌博。这样，许多人家没有能力去买张半便士报纸、到公共酒馆去饮一杯淡啤酒、买一张电车票或给孩子们一便士零花钱。另外70%的人所拥有的漂亮服饰和其他一应俱全的好东西，他们是无力购买的，只能以忧郁的目光回敬。贫民的饮食非常单调乏味，令人难以下咽。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是一位巧克力制造商，曾调查过约克贫民的状况。他发现约克贫民的食物“绝对无法果腹，……每日全吃些一样的东西：早餐是面包、剩油和茶；午餐是面包、黄油和茶；晚餐是咸肉、面包和

咖啡；只吃一点点鲜肉，再没有旁的东西”。他们所穿的衣服，也同样不够。他发现约克人有28%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这和布思称伦敦30%的人是贫民的比例相近。

造成这种贫困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低工资。朗特里指出：52%的贫困源于微薄的工资。而最低的工资和最严重的贫困存在于血汗行业和伦敦东区的临时工之中。1888年，议会将那些克扣工资、令工人在不卫生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的行业称之为“血汗”行业。在小裁缝店、妇女服饰店、毛皮服店里，地板上满是污垢，空气里灰尘飞扬，又不流通，臭气熏天，男女工人和童工每天工作12小时，周工资约5—15先令。在火柴、绳索、制帽和纸盆厂里，年轻女工每星期约挣7—10先令。有些工人在家或后院搭的棚子里干活，如缝衬衫、锤钉子或打制锁链，收入也是7—10先令。工资较高者的行当包括刻制锉刀、给器皿上釉和装填火药，但这些都是危险性工作。锉刀上的尘屑和釉彩中的铅都对工人的身体有害。装火药者身上得涂上油脂、裹上报纸，头部得包上毛制的绷带，眼睛得戴上护目镜，尽管如此还是难免在那氯气充盈的工作室里被烧伤。低工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劳动力过剩，特别是在伦敦，而且在年轻女工中最为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经常性失业，40%的工人因此而陷入贫困。码头工人工资较高，但只有当正常工作时如此。所以，为了得到那一份工作，人们“像野兽一样争斗”。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工作不足，也就拿不到21先令的周工资。社会的底层是苦海无涯的10%——人数约达300万的失业工人、临时工、游手好闲者、浪荡子、罪犯和疯人。工人阶级的成分并不一致，占总人数10%的底层并不知道占总数15%的工人贵族的生活情况，临时工和血汗劳工也不了解在有工会的行业中能稳定就业的工人的生活情况。可是，所有人都害怕老年来临和生病。2/3的工人在一生中会有一个时期沦为贫民。对于年老和患病者来说，唯一的指望就是求救于济贫法执行人和慈善机构组织，而两者都不足以养活他们。由于贫民窟产生疾病、阻碍发育，牙病、发烧、忧郁症、佝偻病比比皆是，所以患病者众多而健康者稀少。伦敦的公立小学里儿

691

童的平均身高，比贫民窟中同龄儿童的平均身高要高出5英寸。在布尔战争中，贫民窟应募的人有60%因体检不合格而遭淘汰。在格拉斯哥的贫民窟里，差不多每个儿童都患有佝偻病。



伦敦的两个流浪儿（*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1911 年的失业者（*Mansell Collection/TimePix*）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最初 10 年，占英国人 1/3 的下层所遭受的贫困并非首次出现，而新奇的是贫困在众多贫民窟的蔓延，以及这种贫困状况和当时其他人的富有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这两种现实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产生贫困现象意识的基本原因。令人可怕的贫民窟，给有良知和有良心的人以重创。鉴于 44 年中国民收入增加了 1 倍的情况，产生如此悲惨的状况实在是一种可耻的事。进一步加重人们羞耻心的还有两个要素：近代基督教徒和理性主义者对社会病态的更加关注；旧的解决方法的明显失效。查理·布思是唯一神教派教徒，朗特里是贵格派教徒，威廉·布思是公理会教徒，而卡农·巴尼特（Canon Barnet）是国教徒，创建了伦敦东区的托恩比堂（Toynbee Hall）。他们更多的是从社会和道德的视角、而不是以神学的视角看待基督教。另一方面，他们也得应付来自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竞争，如海德曼（H. M. Hyndman）、比阿特里斯·韦伯（Beatrice Webb）和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布思调查贫穷，是由于海因德曼宣 692

称有20%的人处在贫穷线以下；而帮助布思进行调查的，则是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安尼·贝赞特是世俗主义者，组织火柴工厂年轻女工进行改善待遇的斗争。火柴厂呈现着不平等和剥削的鲜明例证：火柴女工每星期工资只有4先令，而厂主赢利却达23%—38%。像安妮·贝赞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挺身奋斗，其道德上的勇气给自由主义基督徒提出挑战。后者已经将基督描绘为一个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改革者，以此来充实其基督教义。理性主义者和基督教徒都发现贫困普遍存在的严峻形势及其种种原因，这些都是对那种认为贫困源自个人失败的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观点形成了讽刺。许多人确信过时的济贫法、自愿的慈善工作都远远不够。他们也面对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已经获得选举权的工人正在组织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

工党的崛起

1844年，加入英国工会的工人约60万。30年后，其数目超过了400万。这一增长，是确立现代英国和解放工人阶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其重要性不亚于民主的成长。但是统治阶级里则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条毁灭之路。在他们看来，这是危机时期里的最大危机。诚然，在1871年和1875年，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府都曾分别通过法案，保护工会的基金，并允许工会设置纠察线之权，但是，受法律保护的工会是"新式"工会。这些工会是技术性的木工、工程师和印刷工人组成的工会，力图避免罢工，办理保险，保全财富，讲究体面和温良恭俭让。一般非技术性的普通工人——如码头工人、矿工、铁路工人、煤气工人和农场工人则更为咄咄逼人。1874年，新成立的英国工会大会（TUC）（全称为Trade Union Congress，又译英国职工大会。——译者）号称有会员120万，但是到1884年，因为雇主们运用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不景气解散或削弱工会，其会员数目减半。

可是经济一旦复苏，工会又复活跃，罢工随之增加。起点是1888年由工资十分微薄的火柴厂女工发动的罢工。1889年，伦敦煤气工人

罢工，组织工会，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伦敦以外各地的煤气工人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伦敦码头工人也举行了罢工。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说，“我们现在处于不流血的内战状态。”由于雇主一方下决心毁灭工会，所以码头工人的罢工比煤气工人更为艰难。不过，澳大利亚工人汇来3万英镑捐款，舆论界因揭露社会贫穷现象而同情罢工，并在曼宁大主教（Cardinal Manning）和伦敦市长的调停下，工人终于取得了每小时工资由4便士增加到6便士的胜利，工会也获得承认。英国其他港口的码头工人的工会和许多矿工工会也都获得了承认。这些码头工人、矿工、煤气工人和火柴女工，大都不是技术性工人。他们所建立的工会会费很低，欢迎非技术性工人参加；工会许诺组织激烈的罢工以争取提高工资，而不是争取老年保险计划。这一类普通的工会，形成了“新工联主义”（new unionism），在工会大会里与那些曾经是“新式”的工会相竞争，而后者事实上已变为“旧式”工会。

1892年至1910年期间，新工联主义遭受了惨重的失败。雇主们 694 向它宣战，加强其已经十分强大的雇主联盟，成立全国自由劳工联合会（National Free Labourers Association）作为破坏罢工的工具，出版小册子谴责工会的阴谋，迫使工人签署永不参加工会的协议，争取媒体和法院站在自己一边。而且，罢工风声一动，他们马上就关闭工厂。用这种办法，资本家在1897年击败了矿工和工程师的罢工。对工会更为不利的是法院在1893年和1901年间作出的三项裁定：宣布工会的纠察和抵制行动为非法之举；宣布工会必须对罢工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裁定威尔士铁路工会对发动的针对塔夫威尔铁路公司（Taff Vale Railway Company）的罢工所造成的23000英镑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最后一项裁定成为法律，则将来的罢工必令工会破产。但判决此类案件的法官差不多全是保守党，于是工会在1906年的大选中，支持自由党或工会的议会议员。

这次大选选出了29名工党议员，并使自由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自由党政府通过了工会仲裁法案（Trades Dispute Act），规定工会设立纠察线为合法，并规定工会基金不承担赔偿之责。在获得法

律地位后，工会大力保护工人，使之不受实际工资下跌影响。1909 年至 1913 年，生活费指数上升了 9%，而工人的工资增加缓慢，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这样，工人参加罢工，踊跃加入工会。1910 年至 1914 年，工会大会会员增加了 67%。

与此同时，许多工会领袖对保守党和自由党日益失去耐心。1893 年，约有 120 个工人代表——大都是工会会员——在约克郡的工业城布拉德福德集会。集会的召集人是基尔·哈第（Keir Hardie），他是一个家庭女佣的私生子，8 岁就当了一名小听差，稍大在一个煤矿里当风门工。哈第在一个夜校里学会了读书写字，对矿场的恶劣情况感到震惊，组织了苏格兰矿工工会（Scottish Miners Union）。1892 年，他成为最早当选议会议员的工人，不属于任何党派。哈第进入议会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一反传统，拒绝礼帽和正式服装，而是身着黄色呢裤和哔叽夹克，头戴普通呢帽。基尔·哈第确信工人政党一定能够成功。另一个代表则持相反的看法，这就是音乐评论家、费边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剧作家的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萧伯纳说这样的政党只是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翻版。直到 1893 年，社会民主同盟枉费 14 年功夫，想把英国改造成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同盟的创办人亨利·海德曼是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著有《大家的英国》（*England for All*）一书，其思想来自马克思。他常常穿着大礼服，戴着礼帽，站在街头宣讲马克思学说。社会民主同盟的盟员大都是英国社会主义者中最没有耐心的人物。例如码头工人罢工的领导者汤姆·曼（Tom Mann）和本·提内特（Ben Tillet），1887 年特拉法加广场失业大抗议的英雄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和钱皮恩（H. H. Champion），乌托邦社会主义蓝图的作者、名艺术家、设计师和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费边社与社会民主同盟存在很大差异。从 1883 年开始，前者就主张建设一个民主的、渐进的、和平的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其社员中，有伦敦知识阶层里面最优秀的分子，如社会调查的先驱韦伯夫妇（Sydney and Beatrice Webb）、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格雷厄姆·沃拉

斯（Graham Wallas）、学说渊博而温文尔雅的记者休伯特·布兰德（Hubert Bland）。十多年来，伦敦的这些富有才华的社会主义者对1880 年代以来的社会困苦情况作出反应，力主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的财富则应当用来接济所有国民，但实际上收效甚微。这些渊博学识者遭遇失败的原因何在，而哈第这个自学成才的矿工又怎么能够成功呢？然而，哈第和他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确实取得了成功。萧伯纳虽然心存疑虑，但他仍然坚持下来，协助起草了社会主义党纲——一部很实用的党纲，提出了一个党名，基尔·哈第坚持以不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为条件。基尔·哈第和独立工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三项困难的使命：赢得工会的支持；把大多数争辩不休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赢得工人的选票。 695

基尔·哈第和他的 120 名工人代表大多数来北部工业地区，那里是工厂工人、工会和非国教会的家乡。哈第意识到他们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其中许多人来自保守党，更多的是属于自由党的格莱斯顿派，一些工人是议会中的自由党议员，被称作自由—工党分子（Lib-Labs）。1895 年至 1898 年，工会大会击败了哈第一年一度的动议，要求工会为独立工党候选人提供财政上的支持。直到 1899 年。这项动议才得以通过。其原因是因为工会对保守党再也忍无可忍。保守党的资本家指使狗腿子内奸破坏工会。保守党把持的法院判决工会设置纠察线和抵制行动为非法。保守党政府在消除贫困方面乏善可陈。自由党在救助工人方面同样无所作为。1891 年在野的时候，自由党应允实施大量改革；但 1893 年和 1894 年执政党时候，自由党又是无动于衷。更有甚者，虽然北部选区的绝大多数选民是工人，但自由党所推选的议员候选人都是工商界人士和专业人士，而没有推选工会负责人或工人。这类工商界人士和专业人士，一向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对集体主义抱有敌意。这就使得工会领袖们意识到：他们所需要的正是独立工党。

哈第于 1899 年大选中获胜，意味着工会将会在财政上支持独立工人代表竞选议员。这就使得各派社会主义者再度有兴趣重归于好。

1900年，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分裂和混乱局面。在伦敦，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依然强大；同时，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同盟（Socialist League）却极力推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北方，有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和他办的报纸《号角报》（*Clarion*）、约翰·特雷弗（John Trevor）以及一些工人教堂和工人组织会。布拉奇福德的《快乐英格兰》（*Merry England*），将社会主义描绘为一种伙伴情谊。他主办的《号角报》内容生动和广受欢迎，他还开办了自行车俱乐部，这些都替社会主义争取了大量民众，其感召力远胜于社会民主联盟渲染的马克思主义和费边社大规模的研究。正如在组织和机构上存在分歧一样，他们的思想背景也是同样复杂的。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来说，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攻击资本主义的丑恶和自私的著说最为重要；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最主要的则是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作者抨击了不劳而获的地主和地租。许多社会主义者都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然而，对其他人而言，资本主义缺乏公正性，贫民应该获得救助，工人阶级有权公平分享所生产的财富。这些信念根植于非国教派的宗教之中，特别是卫斯理派。1900年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简称LRC）的成立会议，便在伦敦的纪念大厅举行，这个大厅正是非国教派的礼拜堂。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决定，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名额，独立工党为12人，社会民主联盟为2人，费边社为1人，工会为7人，执委会的构成与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时各派人数的比例相当。

696

1900年时，劳工代表委员会相当脆弱，面临着通常导致第三党走向毁灭的任务：赢得选举。虽然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之后称工党，Labour Party）未能获得与自由党同等数目的选票，也没有赢得同样次数的大选（1910年大选中，工党只获40个议席，自由党则获得273个议席），但它深深扎根于体现日益增强的工人阶级文化的俱乐部、友谊会和工会之中。发展势头转向工党一方，特别是当自由党难

以支持八小时工作制或工会的罢工权利时，长期以来作为自由主义堡垒的矿工联合会（Miners Federation）于 1908 年转到工党一方。

而且，自由党在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方面行动迟缓、效率低下。直至索尔兹伯里勋爵及其保守党当政，方才有了解决以上问题的最初机会。

保守党执政的十七年

1572 年至 1611 年，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及其子罗伯特（Robert）负责为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管理政府事务。为此，罗伯特受封为索尔兹伯里伯爵（Earl of Salisbury），并以所得财富扩建豪华的哈特菲尔德宅邸（Hatfield House）——罗伯特在乡间的豪宅。自 1885 年至 1901 年，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及其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又在王权之下执掌英国国政 20 年时间（仅有 3 年时间由自由党执政）。在哈特菲尔德宅邸，罗伯特·塞西尔和他的智囊们所讨论的，并不是策划如何向维多利亚女王献计以赢得她的欢心，而是研讨如何赢得在 1867 年和 1884 年取得了选举权的工人们的选票。傲慢孤僻的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保守党 5 次参选，其中 1886 年、1895 年和 1900 年 3 次轻易取胜，而 1885 年大败，1892 年虽赢了自由党，但却败于自由党和爱尔兰人的联盟。仅就英格兰而言，保守党连胜 5 次。民主政治没有带来社会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带来的是贵族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这些贵族的祖先曾经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手下效力。

对于这一矛盾的解释，首先应明确指出当时英国的民主仍然受到限制。有选举权的人仅限于自己拥有住宅或租用住宅年租金达 10 英镑以上者，而且在选区的居住时间必须达一年以上。能够符合这种条件的人，5 个成年男子中只有 3 个。同时，有些人，特别是富人，有权投票两次或三次——一次以住宅主人的身份，再一次以某种企业主的身份，也许第三次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许多住在城市郊区的富人享有这种多重选举权。这些人大多被格莱斯顿的激进的言论吓坏了，他

声称要率领“群众来反对上等阶级”，还坚持爱尔兰应当准予自治。697 精明的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看到了中产阶级对格莱斯顿深感失望，力劝保守党人组织“乡间别墅托利主义”。保守党人如法炮制，果然从 1885 年至 1906 年，英格兰居住在郊区的富裕中产阶级大多投票支持保守党。

自由党内部的不团结，更加剧了这一势头，这是保守党执政达 17 年之久的第二个原因。1886 年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不但分裂了自由党，迫使 92 名自由党议员脱党，形成自由党统一派（Liberal Unionists），而且失去了数以百万计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将爱尔兰人视作懒汉酒鬼，将失去爱尔兰视作失掉大英帝国的第一步。大多数英国人都赞同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看法，认为爱尔兰人在自治方面的能力并不比霍屯督人（Hottentots）更强。1899 年，为大英帝国而战的布尔战争，更加深了自由党的分裂：一方是主战派、以罗斯柏里勋爵（Lord Rosebery）为首；另一方是反战派，由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领导。索尔兹伯里是非洲帝国的创立者、爱尔兰自治的死敌，利用帝国光芒和爱国心，使数以千计的选民投向保守党的怀抱。这种诉诸帝国荣耀的感召力，是保守党占据优势地位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是保守党具有家长主义和贵族政治的形象，能够赢得所有阶级的恭敬。这种恭敬在乡村地区最为突出，农业工人都会支持当地贵族的候选人。《1884 年改革法案》（1884 Reform Act）规定给予乡村房主以选举权；《1885 年重划选区法案》（1885 Redistribution Act）又分给乡村更多的议会，这大大加强了那些崇尚财产的选民的选举力量。不过，就是在城市选区，在伦敦和兰开夏，当地反国教势力较弱，爱尔兰人移民众多、招人厌恶，当地的英格兰工人仍然投保守党的票。工人喜欢保守党的原因，在于该党拥护帝国事业，支持酒业，反对爱尔兰自治，而且其宣传口径绝无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子。对许多工人而言，贵族是他们的天然统治者、管理者或“自己人”。工人期望贵族在国内和帝国各地都实行良治。

从 1886 年至 1892 年和 1895 年至 1906 年的两段时间里，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他的外甥阿瑟·贝尔福为英国工人建立了这样的政府。索尔兹伯里是一个家境富裕、疑心很重、言语爽直的贵族，处事精明但持悲观主义态度，十分怀疑进步的可能性、民主党的可延续性和大胆改革的有效性。贝尔福则文雅而温和，但同样高傲、多疑和务实，在索尔兹伯里内阁中任爱尔兰大臣。在“不畏缩、不动摇”的指令下，贝尔福推行的政策是软硬兼施，既严厉执行 1887 年的《镇压法》(Crimes Act)，希望以此镇压暴力行动，又通过帮助农民买地、修筑铁路、设立促进工业委员会，以“凭借施恩来扼杀自治”。软硬两个方面都收到了成效，但只是暂时的。

《镇压法》的施行减少了暴力行动；而慷慨的《土地法案》(Land Act) 则给佃农们提供只需 12% 首付的低利息贷款，形成了一个小地主阶级，成为新爱尔兰的经济栋梁。保守党给爱尔兰带来了长达 20 年的良治。同时，帕涅尔（Parnell）的倒台也带来了和平。帕涅尔与凯蒂·奥谢（Kitty O'Shea）夫人的私情的曝光使爱尔兰民族党与他划清界限。民族主义党本身也疲惫不堪。帕涅尔时代的鼓动、期待和失败，令暴力转向平静，软硬兼施政策得以奏效。但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热潮并没有泯灭。1900 年之后，民族主义展示于都柏林主教剧院上演的威廉·巴特勒·耶茨（William Butler Yeats）、格利高里夫人（Lady Gregory）和乔治·莫尔（George Moore）的戏剧之中，也体现在盖尔同盟（Gaelic League）振兴盖尔语的努力之中。来自伦敦的不畏缩不动摇的强硬立场，无法消泯爱尔兰人要求自治的决心。索尔兹伯里和贝尔福提供了良治，进行了重要改革，造就了富裕农民，但是，这些政策在长时期的作用只不过是增强了爱尔兰民族主义。 698

索尔兹伯里政府也在英格兰进行了许多改革，如提高政府的效能，但未能解决的较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索尔兹伯里最有革命性的改革是《1888 年地方政府法案》(Local Government Act of 1888)。在 1888 之前，治理乡村地区的权力集中在 27000 个独立的地方当局之手，而权力最大的是执政官（magistracy），通过委任而不是选举产生。《1884

年改革法案》规定，乡村地区的房主拥有选举议员的权利。既然他们有权选举议员，为什么不能选举地方官呢？于是要求建立民主的地方政府的压力增强，使得索尔兹伯里政府设立了60个郡政委员会和62个市政委员会。这些民选的委员会接收了大部分原属于27000名地方当局执掌的权力。

索尔兹伯里的政府还进行了其他改革。在既有利益集团又有官僚体系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里，议会每年都要审理更多的法案。在索尔兹伯里执政的年代，议会通过了许多法案，修订或加强了过去的有关工厂、矿山、什一税、卫生、住宅、工业安全、商店欺诈、虐待儿童以及分配土地给工人等等问题的法案。所有法案都具有进步性，但是，它们只是触及了贫穷、困苦和剥削等问题的表面而已。1895年索尔兹伯里说，没有问题比英国社会状况问题更重要。他特别急于建造新住宅，但是直到1910年总共才建造了18000个单位的新住宅。与大多数保守党人一样，索尔兹伯里十分相信自助的美德、财产的神圣和地方政府的权利，也非常害怕中央政府权力过大和税收太重。虽然1891年保守党政府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所有教育免费，但他甚至反对义务教育，认为这是干预家庭自由。索尔兹伯里不无调侃地告诉他的朋友：如果保守党不这么做，自由党就会这么做。他坦白地承认，通常是迫于压力才采取行动。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喜欢老办法、旧制度和既得权益。为他作传的人承认，他的社会政策十分薄弱。

索尔兹伯里的外甥贝尔福更赋有胆略和想象力，在议会通过了革命性的《1902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 of 1902），在英国创立了公立中学制度；接着又通过了《1903年劳工补偿法案》（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of 1903），规定工人如在工作时间受伤，雇主应负赔偿责任。《教育法案》之所以得以在议会通过，是因法院1901年裁决地方学校的董事会不能动用为中学经费而征收的税款。英国的中学教育十分缺乏。学校董事会以及其他权力机构极力设法从地方税款中获得补充，以满足中学教育的需要，而法院判决使得此路不通。贝尔福

699



富裕的统治阶级是英国保守党的堡垒，他们正在参加亨利赛舟会 (*Mansell Collection/TimePix*)

主持通过的《教育法案》，取消一切校董事会，将所有小学与中学（包括国教学校、天主教学校、以及寄宿学校）一律划归郡政委员会所属的教育委员会管辖，其经费从地方税收拨款。非国教徒对此表示不满。有 80 人因为拒绝交纳用于国教学校、天主教学校及寄宿学校的税款而遭监禁。被捕者抗议说，向他们抽税以供宣扬假的宗教，是不公正之举。这项法案使得非国教徒无比愤怒，想方设法在选举中击败保守党。他们的努力是 1906 年自由党击败保守党的原因之一。

保守党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工会不满贝尔福未能促使议会用立法方式纠正法院对塔夫威尔铁路公司案的判决，这项判决规定工会设置纠察线为违法，认定工会应负责赔偿罢工所造成的损失。贝尔福在社会问题上也毫无作为，而是将这类问题交给贝尔福内阁中唯一的自由统一派成员——约瑟夫·张伯伦处理。张伯伦是持激进立场的伯明翰 700

市长、格莱斯顿政府中推动进步的阁员，他很久以来就主张社会改革。1892年，他提议老年退休金的资金来源由国库拨款解决。1902年，贝尔福派他处理工业事故问题。张伯伦的解决方案就是《劳工补偿法案》，规定雇主付给受伤工人半薪。有一段时间，张伯伦将其莫大的精力和过人的智商全部投入到建构保守党的社会哲学。但是，他做了殖民大臣后，便宁肯将他的精力用于大英帝国的事业。结果，本应当用于救济老年与病人的资金和努力，都用在了布尔战争之上。1903年5月，张伯伦为了进一步加强帝国的团结，增加帝国的岁入，保护英国的工业，提议将帝国变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只对帝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征收。这是一项从本质上进行调整的提议，如果实行，势将推翻自科布登（Cobden）和布赖特（Bright）以来即已推行、且给英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的自由贸易政策。这种增长的放缓、德国和美国货物的竞争、帝国团结的希望以及学者们对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批评，导致张伯伦和其他官员决定对谷物征税2先令、对肉类和乳产品（咸肉除外）征税5%、对制成品征税10%。

贝尔福声称，他主张向那些对进口英国货物课以重税的国家采取报复措施，但反对不加区别地一律对帝国以外的国家的货物征收关税。可是，如果要想让帝国自由贸易区能够对像加拿大这样的殖民地感兴趣，那么对帝国以外国家一律课税就是必要的。事实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对这个提议兴趣不大。张伯伦的计划从殖民地得到的支持甚少。对计划表示支持的是那些主张对外国货课税10%的制造商和狂热的帝国主义者，这两种人都是保守党选区里的积极分子。张伯伦在1903年辞职，他的大多数同盟者在这些选区里获胜。在议会下院，贝尔福努力地在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之间保持平衡，坚决反对征收2先令的谷物进口税和5%的肉类和乳制品进口税，认为这对一个几乎有一半食品靠进口的工业化国家来说，会导致政治上的灾难。这次关税改革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自由党在1906年大选中的胜利，关税问题所起的作用远大于《教育法案》。这次大选结束了保守党17年的良好而有效率的统治和某些有价值的改革。但是这些年中所存在的

问题，如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最下层的1/3的国民的贫困、老年人、患病者和失业者的病苦以及严重的住房问题等，都几乎没有任何改善。此时轮到自由党来应付这些问题了。

自由党的机会

自由党于1906年1月赢得了英国有史以来大选的最大的胜利。该党赢得401席，统一党157席，工党29席，爱尔兰民族党83席。由于 701 工党和爱尔兰民族党是自由党的朋友，所以此次大选实为统一党的惨败。保守党此时因主张与爱尔兰的统一而称为统一党（the Unionist）。统一党的157席，甚至比不上非国教徒的近200席。非国教徒到处与保守党对抗，因为他们对《教育法案》感到愤怒，该法案将公款拨给国教学校和天主教学校；他们和其他选民也反对保守党有关公共酒馆和酒类销售业的法律。尽管学校问题和酒类问题使保守党受损，但关税改革问题造成的损失最大。保守党认为，一个享受廉价进口食物和原料，而有大宗制成品出口并从国际贸易与金融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国民，竟会要求征收关税来限制这些进口和出口，真是愚不可及的主张。而“自由贸易危险”的口号，正是自由党团结所需要的号角。这甚至使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背弃保守党而转投自由党。

对于1200万食不果腹、居住恶劣和贫困不堪的国民，保守党也没有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保守党的法官，报社老板和雇主，对工会持敌视态度，但这对保守党没有什么好处。在这次大选中，工人投自由党和工党的票者都较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事实上，选民以经济分野的情况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诚然，工人的选票并没有全部投给自由党，但是工党在所取得的进展，是因为自由党和工党选前有约，在35个选区里面，只让工党的候选人单独和保守党候选人竞选。可是大多数工人还是支持自由党：有23名工人代表成了自由党的议会议员，或称自由—工党（Lib-Lab）。许多中产阶级也支持自由党。这次自由党的大胜真是令人惊异而费解的事，因为该党1915年之后，再也未能执掌英国国政。

1906年，自由党党员成分之复杂，并不亚于该党所代表的思想。在该党401名议会议员中，有贵族、乡绅、制造商、律师、店主、矿工和工会会员。国教徒、非国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自由思想者以及禁酒会员、土地税热心支持者、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强烈反对帝国主义者、伦敦费边社社员和威尔士卫斯理会信徒等等，都在自由党内十分活跃。这些人代表老的自由主义，也代表新的自由主义，但大多数拥护老的自由主义。老的自由主义，对国内主张自由和平等，对国外主张和平和民族自决，其所指的自由，是指世俗和宗教权利、自由放任主义经济、低税和民主。平等，是指机会平等，而非收入平等；是指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非所有权平等。总之，任何特定的阶级、教会、大学或者学校系统都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在格莱斯顿的影响下，自由党对和平和对民族独立的热衷，使之支持爱尔兰自治——虽然并不是每个自由党人都热心于此。同样，并非所有的自由党人都认为自由是无条件的自由放任经济：对社会平等的关注使得许多自由党人支持“新”自由主义，即国家必须通过创造就业、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建造住宅、设立养老金、规定最低工资等方式，更公平地分配经济和社会成果。自1906年至1908年，亨利·坎贝尔—班纳曼领导着这个成分复杂而思想有分歧的党；而从1908年至1915年，这个艰巨任务又落在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身上。

702

1906年之前，阿斯奎斯是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派，而坎贝尔—班纳曼则是小英格兰主义者（Little Englander），但是在1906年，坎贝尔—班纳曼很精明地任命阿斯奎斯为财政大臣，同时，他任命另外两位自由帝国主义者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和霍尔丹勋爵（Lord Haldane）分别担任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这样，就维持了自由党的团结。坎贝尔—班纳曼是一个精明的苏格兰商人，但不擅辞令，思想并不进步，也不是社会改革的实施者。可是，他得到了自由党各派的拥护，领导着一个人才颇多的内阁，紧紧地掌握领导权，牢牢控制议会的主导权。坎贝尔—班纳曼富有胆识，宽宏大量，给予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独立地位，也敢于让议会通过工会自己提出的议案，规定

豁免工会在有关罢工损失的诉讼中的赔偿责任。阿斯奎斯则比较冷静，更令人生畏。他是议会辩论的大师，其论点总能点出问题的要害。他具有耐心，又能采取合理的折衷办法，能够用冷静平和又不屈不挠的方式，使许多争议很大的议案在议会获得通过，避免了许多危机。阿斯奎斯生于约克郡一个经营毛纺织的非国教徒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并与一位门第甚高的富家小组结婚。他喜欢桥牌、宴会、汽车和游艇，但不热衷于社会改革——虽然并不坚决反对。阿斯奎斯有一个绰号叫“走着瞧”，因为他奉行这一格言。他还遵循坎贝尔—班纳曼的意旨：“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我们且缓步前行。”他们两人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引导者而不是推动者。

坎贝尔—班纳曼的责任，便是确保老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那些社会弊端能首先得到解决。于是，他提出有关教育、工会、多重选举权和土地问题等 5 项议案。《1906 年教育法案》规定所有获得地方税款资助的学校为公立学校，只能讲授无宗教偏向的宗教课程。可以例外的是人口 5000 人以上的市镇，学校（主要是天主教学校）学生的 4/5 必须信奉同一种宗教。这项规定是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政治让步，因为自由党需要他们的选票。《1906 年工会争议法案》（Trades Dispute Bill of 1906）免除工会在法院民事诉讼中的所有赔偿责任（友谊会早就获得此项免责）。这样，工会罢工不再意味着破产。此法案还承认设置纠察线为合法行动。

《1906 年多重选举权法案》（Plural Voting Bill of 1906）规定拥有多处财产的人在选举时投票不能超过两次。事实上，原来大概有 50 万人可以投票两次以上，而有 400 万成年男子却根本没有投票权。《1907 年苏格兰土地法案》（Scottish Land Bill of 1907）含有保护佃农的条款，不允许不公平退佃。而《1908 年住宅执照法案》（Licensing Bill of 1908）则规定减少公共住宅的数目。议会上院或采用具有破坏性的修正案，或通过否决的方式，将除了《工会争议法案》之外的全部法案予以封杀。工人的选票对已衰弱了的保守党来说太重要了，以至于该党不敢再继续与工会作对。1867 年和 1884 年的改革法案开辟了英

国政治的新时代，其政治基础不再是只有50万选民，而是300万选
703 民，其中大多数是工人。与之相比人数要少得多的是温和改革派、力主土地改革的老自由党人和对《1902年教育法案》感到愤怒的非国教徒。所以，上院议员将他们的法案送终了事。

上院并非只是起消极作用。1908年，上院通过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工资委员会法案》(Wage Board Bill)、《失业工人法案》(Unemployment Workman's Bill）和《劳工安置法案》（Labour Exchange Bill)。丘吉尔由阿斯奎斯任命为新的贸易大臣，阿斯奎斯则于同年4月接替病入膏肓的坎贝尔—班纳曼，出任首相一职。丘吉尔的第一项法案规定设立由雇主和雇员各派同等人数组成的委员会，以确定约50万血汗工业从业人员的最低工资，这些人包括裁缝工、花边工、制链工和纸盒工。第二项法案规定地方政府组织扶贫委员会。解决失业问题，但这个法案后来收效甚微。但是丘吉尔的第三个法案却颇有建树，该法案规定设置180个职业介绍所，十分有利于失业工人找到新的工作。丘吉尔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精明强干，出自贵族名门，父辈均为勋爵、公爵之类，年届33岁就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记者、探险家和政治家，认为他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俾斯麦主义宏图”的组成部分，正好能满足工业英国的唯一要求，同时也构成了丘吉尔自己命名的“新”自由主义的要素之一。

虽然阿斯奎斯对俾斯麦主义没有像丘吉尔那么热衷，但是他还是关注社会困苦，重视工人选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1908年提出的《养老金法案》（Old Age Pension Bill)。与往常一样，他的行事风格是保持低调和注重实际。法案规定的津贴金额十分有限：对70岁以上单身、各项收入每星期不超过10先令者，政府养老金的津贴金额为每星期5先令；对已婚夫妇，政府养老金的津贴金额仅为每星期7先令6便士。然而，其原则具有革命性。国家不再把贫民分为应当获得救济的和不应当获得救济的两种，取消了在济贫院工场工作的前提条件，决定所有年逾70的贫民都能领取养老金。

为了支付这些养老金，维持丘吉尔的职业介绍所和工资委员会，

建造战舰以应付德国的威胁，财政大臣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必须寻求新的税源。他发现这个税源就在富人的收入之中，特别是那些财富来自土地的富人收入之中。劳合·乔治提出了“人民预算案”（people's budget），规定对拥有 100 英镑以上财富者，征收 1%—15% 的遗产税；对收入超过 500 英镑以上者，征收 4%—20% 的累进所得税。最令人震惊的是三种土地税：一种是税率为 20% 的土地增值税（在土地出售时征收）；一种是税率为 10% 的租佃土地增值税；还有一种是按照未充分开发土地的价值按年度征收的地税，这种土地的价值包括地下的矿产价值在内。

“人民预算案”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原则，即运用政府的征税和支付权力时务必精打细算、具有自觉理念，促进国民收入更加公平的分配。对富人征税是为了救助穷人。劳合·乔治在去德国考察一番之后，也成了俾斯麦主义的拥护者。他是农民之子（父亲在他才 1 岁时就去世了），由经营鞋业的舅父在威尔士的村庄抚育成人，灌输浸礼会教义和自由党政治。这个村庄占统治地位和压迫村民的是英国国教乡绅、牧师和学校校长。虽然出身寒微，但劳合·乔治自信力之强，胆气之壮，才华之高，都不下于丘吉尔，通过自学成为一名律师。诚如丘吉尔所言，劳合·乔治的吸引力、魅力和说服力，使他成为无与伦比的干实事的大师。 704

劳合·乔治干成的一件实事就是《1911 年国民保险法案》（National Insurance Act of 1921）。这个法案规定，凡失业者，不论男女，由国家每人每星期发放 7 先令；凡患病者，每人每星期领取 10 先令，13 个星期之后，每星期领取 5 先令；女性患病者，每人每星期领取 7 先令 6 便士。此项保险计划，仅适用于 225 万工人。按规定，每人每星期交纳保险金 4 便士，雇主另交 3 便士，国家提供 2 便士。此项保险计划，在国家监督之下，由对友谊会、保险公司及工会负责实施。劳合·乔治以确保既得利益者和医生的重要地位，来消弭他们的反对。

《国民保险法案》是福利国家的基石。自由党建设福利国家的进程始于 1906 年对学校儿童供应免费餐食、1907 年对儿童进行体检、

1908 年实施养老金制度，此外还有 8 小时工作制、矿工固定工资制以及丘吉尔的职业介绍所和工资委员会。虽然福利制度减轻了部分国民由于疾病、年老、失业和过劳所给引起的困苦，但也确实开始对部分工人征税，而 1910 年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比 1890 年下降了 11%。而且，工人阶级还不得不面对上涨的物价、周期性的失业和敌对的雇主，他们破坏罢工，传统的家长式作风弱化。自由党创建福利国家，一方面是为了对付工党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回应官僚的刺激。因为，推动《学校餐食法案》（School Meals Act）的是一位工党议员，而儿童体检则是一位官僚暗地里塞入一个大法案的杰作。工党在 3 次地方补选中连续获胜，给自由党以警告：他们必须像丘吉尔对阿斯奎斯所说的那样行事，即以社会改革来对付社会主义。

对于大多数社会改革措施，保守党并没有予以反对。迪斯累利的党虽然不是发动社会改革的党，但其党员也不是一群毫无同情心的专事反对帮助贫民的人。不过，保守党不能接受其中一项措施，即对土地和巨额财产征税。因此，该党于 1909 年 11 日否决了人民预算案，将英国拖入了 1832 年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之中。

这是两个多世纪以来，上院第一次否决财政议案。到 1909 年时，此类否决已被视作违宪之举。这次上院还否决了有关教育、土地、多重选举制以及酒类方面的议案，这使下院感到无法容忍。于是，自由党在下院立刻通过一项决议，指责上院的否决为违宪。阿斯奎斯宣布解散议会，把纠纷交给国民定夺。在 1910 年 1 月大选中，选民的答复不置可否。他们选出来 275 名自由党议员和 273 名保守党议员。而 82 名爱尔兰民族党议员和 40 名工党加上 275 名自由党议员，对于上院来说是致命的，因为这三个政党中没有一个能容忍将英国命运放在 653 名贵族（其中大多数是保守党人）手中。1910 年 4 月，下院通过了《议会议案》（Parliamentary Bill），剥夺上院否决财政议案的权力，并限定上院否决普通议案的间隔不得少于两年。如果下院在连续三个会期中通过同一议案，此案即成为法律。5 月，上院否决了《议会议案》，就像 1831 年 5 月否决《改革法案》一样。倔强的上院议员不肯

705

放弃否决议案的权力。

唯一能够打开僵局的办法是由国王发出任命一个新的上院的威胁。但由于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在 5 月 6 日去世，这个步骤只得延后。新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不愿任命新的上院议员。为使国民的意愿得到清楚表达和具有决定性影响，新的一场大选于 1910 年 12 月举行。这次选民选出自由党议员 272 名、保守党议员 272 名、工党议员 42 名和爱尔兰民族党议员 84 名。爱尔兰民族党议员握有打破平衡的力量，要求阿斯奎斯答应通过《爱尔兰自治提案》，后者表示同意。为解决争端，保守党与自由党双方领袖举行会议讨论，但没有成功。阿斯奎斯最后告诉贝尔福：乔治五世同意任命约 500 名新的上院议员。于是，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上院。1911 年盛夏，政党氛围炽烈，有如当时的气温。上院成为这场大戏的中心，上院议员分成了"筑篱派"（hedgers）（愿意妥协者）和"掘壕派"（ditchers）（决心战斗到底者）。如同 1832 年的情形一样，上院拼斗到底的结果不仅不能推翻议案，反而引入数百名新上院议员，使得贵族掉价。最终，上院不得不通过《1911 年议会法案》（Parliamentary Act of 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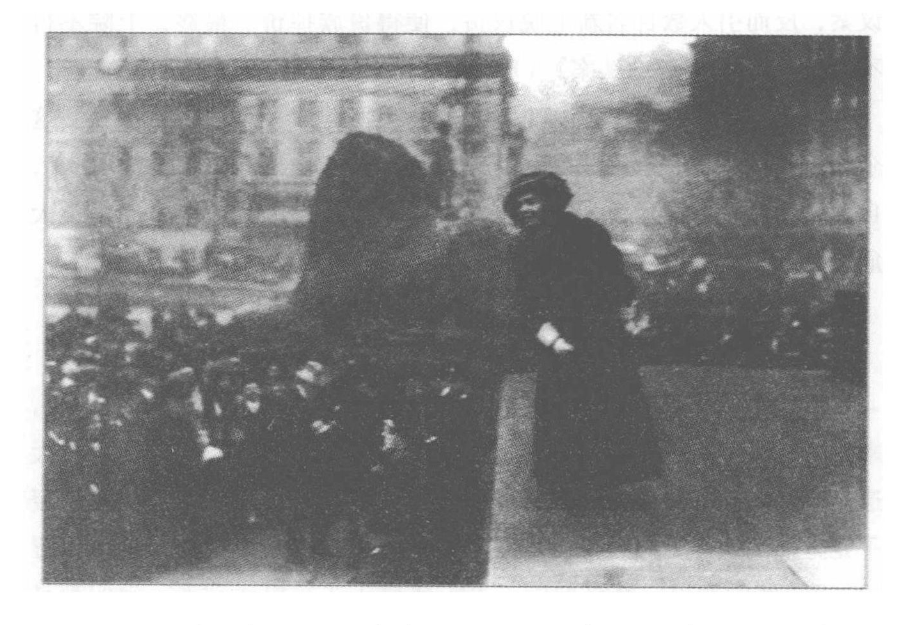
自由党在 1906 年和 1911 年之间将英国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对国民福利的重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自 1912 年至 1914 年，自由党则没有什么建树，因为该党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应付三个重大危机之上。这些危机源自妇女、工人及保守党的骚动。

妇女、工人和保守党

1912 年 3 月 1 日下午 4 时，一群穿着讲究的妇女、各带暖手笼，来到海马科特街、斯特兰德街、摄政街、邦德街等几条伦敦的主要大道。突然间到处传来乒乓乒乓的砸碎玻璃的响声，原来她们一齐从暖手笼里抽出铁锤，向大街上富丽堂皇的商店玻璃橱窗砸去，造成了近 400 万英镑的物损。警察拘留了 124 名战斗选举权运动者。她们都是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的成员，这个组织是 1903 年由潘克赫斯特母女（Pankhursts）创立的，其中母亲

是埃米琳（Emmeline），女儿是克丽斯特布尔（Christabel）和西尔维亚（Sylvia）。她们的助手是热心于妇女选举权的积极分子：经营工厂的安妮·肯尼（Annie Kennie）、富家太太佩斯维克—劳伦斯夫人（Mrs. Pethwick-Lawrence）、牛津大学毕业生埃米莉·维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到1914年，这些妇女仍然怒气未息。自由党政府曾多次拒绝提出有关妇女选举权的议案，也拒绝给予充足的辩论时间，以使一名议员以私人名义提出的妇女选举权提案得以在下院通过。到1914年为止，这些战斗选举权者焚烧了107所房子（包括牛津大学船艇俱乐部），划破美术馆陈列的画，辱骂阿斯奎斯先生，用锁链将自己锁在白金汉宫的栏杆上，将点燃的布团塞入邮筒里，用硫酸在高尔夫球场草地上烧出“给妇女选举权”的字样。潘克赫斯特夫人相信砸玻璃是“近代政治运动上最有价值的争辩”。埃米莉·戴维森相信：牺牲自己的生命会有更强的说服力。1913年6月4日，在德比马赛中，她冲入英王御马的奔蹄之下，献出自己的生命。

706



佩斯维克—劳伦斯夫人在特拉法加广场发表讲演，争取妇女选举权（*Hulton/Archive*）

最终，英国妇女在1918年赢得了选举权。她们的胜利，部分是因为在战时曾为国家积极出力，但主要是因为不断地大声疾呼，从而迫使阿斯奎斯在1914年7月向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保证，议会一定给予她们选举权。潘克赫斯特母女和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这些战斗选举权运动者，并不代表全部参加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妇女。到1914年，53000名妇女加入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Society of Women's Suffrage）的480个支部。这个妇女组织认为和平诉求比砸玻璃更有力量。这些按法律行事的"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指责那些砸玻璃的"战斗选举权运动者"造成了运动的倒退。要不然，为什么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议案1911年在下院的二读中以167票多数通过，1912年反以14票之差被击败呢？战斗选举权运动者反驳说，这两个议案毫无用处，因为阿斯奎斯政府不肯将议案提交下院三读。而且从1867年开始，议会对妇女选举权问题一次次地进行辩论，结果一事无成。砸玻璃行动至少令政府明白：这一次不能再搪塞下去了。 707

战斗选举权运动者的暴力行动，一方面产生很大的推进力，一方面也造成部分人对妇女选举权的反感。整个说来，她们的行动加速了妇女选举权的实现。因为纵火和划破美术品虽然令许多人感到愤怒，但如果不采取暴力行动，议会很可能会拖延下去。但是，对于暴力行动的影响，人们无法用精密的尺度加以衡量。同时，暴力行动也无法像水龙头那样随意开关。砸玻璃和游行集会，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也是妇女解放的一种象征，表明妇女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她们不再安于当维多利亚型的旧式夫人、当漂亮笼子里面的小鸟或者当装饰豪华的客厅内身穿束胸紧身裙装的主妇。战斗选举权运动者便是反抗这种奴役的反叛行动，克丽斯特布尔·潘克赫斯特为此写道："多么令人兴奋啊，战斗的狂热。"暴力行动可以成为一种自我表现和解放，一种对新的身份和新的权力意识到肯定。从1910年到1914年，这种情况不仅在妇女们中如此，在工人中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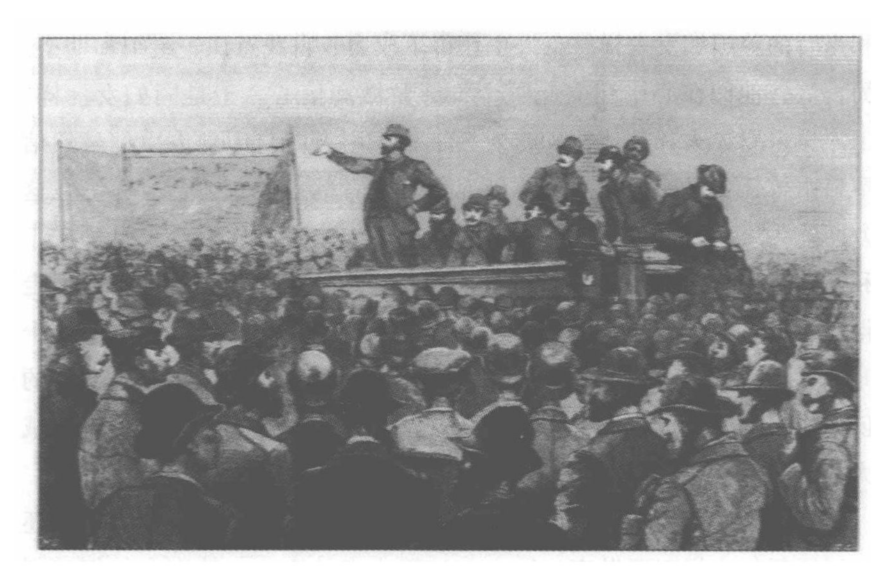
1910年夏秋两季，一波波的罢工浪潮席卷英国各地。矿山、船

厂、码头、铁路和作坊里的工人相继罢工。南威尔士的矿工一直坚持到1911年8月，最后饥饿才将他们赶回矿山，罢工失败。1911年，南安普顿和赫尔的海员和司炉工、伦敦的码头工人、百蒙德希（Bermondsey）的糖果店女工全部罢工，火车工也再次罢工。1911年的罢工，总计起来损失了1000万个工作日，数目十分惊人，但还比不上1912年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矿工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的再次罢工所损失的4000万个工作日。对于矿工而言，结果令人欣慰，因为议会为之设立了工资委员会，规定男子最低工资每日为5先令，童工为2先令。工会会员人数随罢工而迅速增加。1910年，工会会员为250万人；至1913年，则为400万人。会员人数之所以增加如此之快，是因为非技术工人的组织变成了普通工会。其中，有130万工人属于矿工联合会（Miner Federation)、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National Railway Union）和运输及普通工人工会大会（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这三大工会于1914年组成了三角联盟（Triple Alliance)，声称如果联盟发动大罢工，国家就会瘫痪。1912年全国发生罢工850次，至1914年7月达到近940次。工人的愤怒，威胁着自由党英国的生存。

工人激怒的主要原因是实际工资下跌，在物价上涨时期，资方却不肯增加工资。自1909年至1913年，物价上涨9%，这个上涨率显然超过工人工资的增长率。工人在1913年有能力购买的食物、衣服和燃料，都少于1909年。而1909年，他所能买到的仅仅是最低限度的必需品。这种下降造成了痛苦和愤怒。这些罢工中的许多次，都是为了工资：矿工要求保证每日工资不低于5先令，码头工人要求每小时8便士。与铁道工人一样，码头工人还争取资方承认工会和同意集体谈判工资。

骚动的背后还有别的原因。例如，工团主义学说（syndicalist doctrine）就影响了伦敦和利物浦的码头工人、南威尔士的矿工和都柏林的运输工人。汤姆·曼恩（Tom Mann）是利物浦1911年罢工的领导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则是1911和1912年伦敦码头工人的领导者，这两位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的英雄在1910年组织了强大的运

708



一个新的工会——煤气工人工会正在举行集会（*The Illusrated London News*）

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他们两人都是工团主义者，此外还有库克（A. J. Cook）和吉姆·拉金（Jim Larkin），前者是南威尔士的矿工领袖，后者是都柏林的运输工人领袖。工团主义是法国哲学家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的杰作，主张工人用总罢工使经济瘫痪，然后夺取工厂、商店、银行和土地。下一步则是废除国家，创建一个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以工人协会为基础的社会，由工人协会控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梦想，曼彻斯特中央工人学院（Manchester Central Labour College）甚至讲授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工团主义号召暴力行动、总罢工和公有制，吓坏了统治阶级和为数不少的工人。

工团主义对普通工人而言，远不及他们面临的现实那么重要，如实际工资的下跌、长工时的延续、资方对于集体谈判的拒绝、以及暴发户的显富。当每天的怨气积成怒火，对工党的不耐烦又火上加油，于是工人采取了直接行动。自由党的保险计划从他们那里每星期扣除 4 便士（养老金也一样），工人不断下降的实际工资却没有任何增加。

和当时的英国妇女一样，工人也获得了权力、自我意识、组织和期望。简言之，他们在心中建立起了个性、骄傲和信心。于是同妇女一样，709 工人也采取纵火和其他行动，毁坏了不少财产。自由党大臣们虽然信奉自由放任主义，但不得不积极充任调停者的角色。劳合·乔治在这方面最为成功。他以劝说、诱惑和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平息了矿工和铁路工人罢工，并以此增强了政府职能和集体主义的趋向。但他走得还不够远，没有让工人分享爱德华时代资本主义积累的财富。这个时期的工人，教育程度比以往高，组织更为严密，期望更高，所受的创伤也更重，难怪他们要不时举行暴动。但奇怪的是，穿大礼服、戴大礼帽的保守党富豪们，这时也要发动反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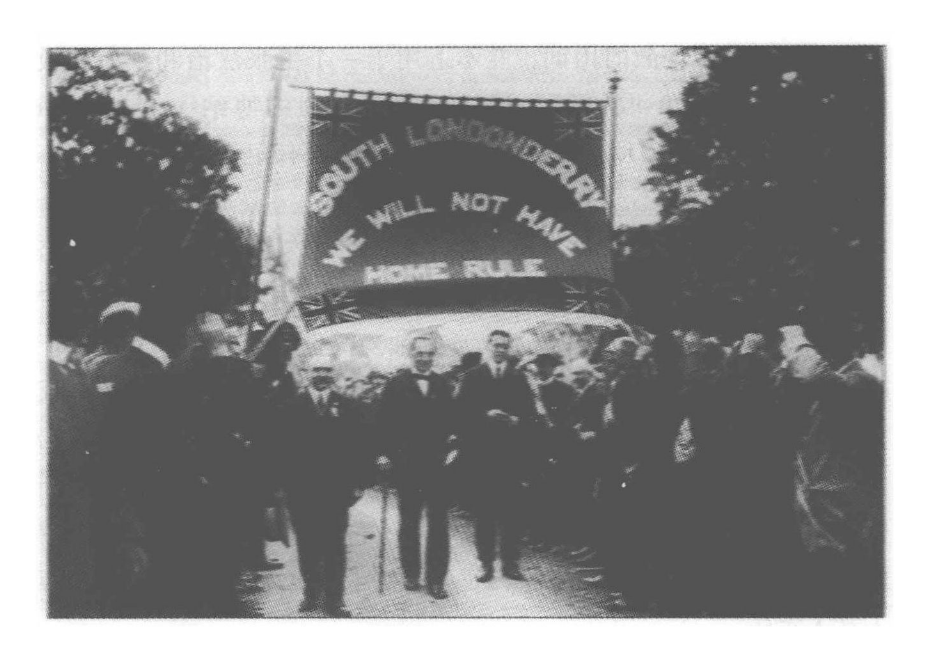
保守党人的反叛，是为了爱尔兰。长久以来他们就讨厌，这时还是讨厌任何人提起要抛弃皇冠上的这颗古老的宝石。特别令他们感到恼火的是的，是厄尔斯特（Ulster）及其88.6万新教徒有可能就此失去。这几十万强悍的新教徒，是爱尔兰问题之所以成为欧洲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的三大因素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370万要求自治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其中69万生活在厄尔斯特）；一个是几百年来统治、剥削爱尔兰人的英国人。1912年4月，阿斯奎斯提出《爱尔兰自治议案》，爱尔兰天主教徒和英国人正在以温和的方式解决争端。这项议案规定爱尔兰（包括厄尔斯特）拥有自己的议会和行政机构，有权处理几乎所有的内政问题，而外交、国防、某些经济与警察事务，则由英国议会管辖。议会中爱尔兰拥有45名议员名额。这是一个温和的、实质性的将权力移交给都柏林的举措，英国公众早已被爱尔兰冲突弄得烦躁不堪，对这个解决办法并不怎么讨厌。议会中的82爱尔兰兰民族主义党议员（其中16名来自厄尔斯特）都赞成议案，虽然也有来自厄尔斯持的另外17名议员表示反对。阿斯奎斯为了履行对爱尔兰议员的诺言，于1911年1月正式提交议案。1912年和1913年，下院两次通过该议案，但上院均予以否决。1914，当下院行将连续第三次通过该议案时，上院的否决将失去效力。这个结局，早在1912年就已十分清楚，促使保守党领袖酝酿反叛。

反叛是一个偏激的用词，并不适用于一个主张法治和秩序的政党。然而，1908 年取代贝尔福任保守党领袖的博纳·劳（Bonar Law），于 1912 年 7 月宣布："我决不能想象听任厄尔斯特失去而不作任何反抗，我们不会支持这样的议案。" 博纳·劳是厄尔斯特一个苏格兰长老派教徒之子，出生于加拿大，到苏格兰接受教育，在格拉斯哥经商，个性异常坚强。他坚决拥护大英帝国，主动在议会告知厄尔斯特力量党（Ulster Forces）领袖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保守党将会支持他的任何行动，无论是符合宪法的还是违反宪法的都包括在内。卡森是一位深沉的、无情的和天资出众的政治家，十分痛恨爱尔兰自治。为了反对这种自治，他准备率领厄尔斯特志愿军与国王陛下政府的合法当局开战。同时为了影响问题的解决，卡森从财政上支持保守党，而且动用了在厄尔斯特的一支 10 万人私人军队。

厄尔斯特志愿军的发展使爱尔兰志愿军力量日益强大。到 1914 年，其人数超过 10 万人，拥有武器装备。除非阿斯奎斯和军方采取断然行动，内战看上去迫在眉睫。但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1914 年 3 月，驻扎在都柏林郊外克拉的英军 82 名骑兵军官中有 60 人辞职，不愿参加与厄尔斯特反叛者的战斗。这简直是一场兵变，但上级并没有予以处罚，因为国防部和总司令和其他上级指挥官都批准了他们的辞职。克拉兵变收到了军方的庇护。阿斯奎斯罢免了国防大臣和总司令，但没有撤销其他军官的职务。而且尽管他自己兼任国防大臣，但从 3 月到 7 月，他恪守惯常的"静观其变"的对策。阿斯奎斯出席有关会议，采取拖延手法，发表模棱两可到关于将厄尔斯特归入统一的爱尔兰的言论。他对博纳·劳和卡森说，厄尔斯特 9 郡中有 6 郡可以与都柏林分离，期限为 6 年，之后由人民在大选中投票决定其命运。博纳·劳和卡森连这样的让步都不肯接受，准备进行内战。幸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免除了这场灾难。

710

如果不是大战爆发，那么究竟是阿斯奎斯的忍耐和拖延抑制了卡森和博纳·劳的决心，还是爱尔兰不免一场血战，那就很难说了。第



爱德华·卡森爵士（居中）与年轻的史密斯（居右）在厄尔斯特参加一个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的集会（*Hulton/Archive*）

711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党分裂，保守党当权，厄尔斯特的6个郡取得了与爱尔兰分离的地位。厄尔斯特的88.6万新教徒欢天喜地，但在厄尔斯特9个郡中的7个郡中占人口多数的69万天主教徒却不是如此。在此后的40年中，他们丧失了若干公民权，只能做较差的工作，忍受新教徒的统治。然后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发动武装暴动，直至今日仍处在与厄尔斯特新教徒的争斗中。假若当初阿斯奎斯采取断然行动，或者保守党没有利用厄尔斯特来对抗爱尔兰自治，那么爱尔兰历史上的这个问题，或者可以如美国南部诸州在历史上的问题一样获得解决。英国的保守党阻止了这样的解决。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想让厄尔斯特的新教徒获得好处，也因为他们自己喜好暴力，这一点恰和妇女运动的暴力派和工团主义者一样。这三批人的心理倾向——和自由主义南辕北辙的心理倾向——直至1914年8月英国卷入世界大战才宣告终止，因为这场战争造成的暴力威胁破坏性更为巨大。

阅读文献

George Dangerfield, *The Damnable Question : A Study of Anglo-Irish Relations* ,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该书记载无法避免的冲突，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对英国予以批评，对两者关系中的更深层的力量和悲剧性的后果作了深刻和尖锐的剖析。

Roger Fulford, *Votes for Women : The Story of a Struggle* , London: Faber, 1957. 该书对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战斗作了全面公正的阐述，并无哗众取宠或强迫灌输，而是充满睿智和同情。

Bentley Gilbert,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 : The Origin of the Welfare State* ,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44. 该书对于1906—1911 年间自由党通过的福利方面的立法及其背后的力量，作了探讨和分析。

John Grigg, *Lloyd George : The People's Campaiqn , 1902—1911*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该书以艺术化的笔调记述了激进的劳合·乔治的事迹，包括他的理想主义、正直诚实的禀性、争取平等的斗争和同情穷人的善心。

E. H. Hunt, *British Labour History , 1815—1914* ,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1. 该书记述了普通工人的境况和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工会的成长，而史学界却严重忽视工会问题的研究。

A. L. Levine, *Industrial Retardation in Britain , 1880—1914* ,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1. 该书仔细评估了 1914 年之前经济放缓的程度，当时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但经济增长点速度低于美国和德国。

Patrick O'Farrell, *Ireland's English Question* , New York: Shocken Books, 1971. 该书以练达、清晰的观点分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独立的取得，其观点完全基于爱尔兰的立场。

Henry Pelling, *The Origin of the Labour Party : 1880—1900* , London: Macmillan, 1954. 该书研究了导致工党诞生的思想、经济、社会

和政治力量，并且探索了这样的政党能够在英国、却不能在美国取得成功的原因。

712 E. Royston Pike, *Busy Times: Human Documents in the Age of the Forsythes*, New York: Praeger, 1970. 这是一部文献集，展示了各个阶级的生活，其家庭预算从30先令一星期到1万英镑一年不等，生动记载了血汗劳工的生活。

Donald Read, *England, 1868—1914*, London: Longmans, 1979. 这是最近的一部概述这个时代的著作，极为生动；以探究政治发展见长，同时全面展现了社会历史，具有启发意义。

Paul Thompson, *The Edwardians: The Remaking of British Socie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著作，基于对当事人的采访，具体而生动，所涉及方面包括：酗酒、宗教、犯罪、闲暇、政治、阶级、教育和社会流动性及其不足。

第二十七章　英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71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75万英国军人战死，将近200万人受伤，还有好几十万人伤重致残。许多人患上了战争带来的新疾病——弹震症，只能在精神病院度过绵长的岁月。战争的各种打击长久地留在前线的士兵的记忆里。这些来自这次最恐惧的战争的记忆，包括泥泞的战壕、吞噬生命的炮火、死亡的阴影、无休止的瞭望、无谓牺牲的愚昧攻击，以及压在人心上的沉重感受——战争的毫无意义。

国内的战线也受到重创。德国的齐柏林飞艇和飞机炸死1413人，炸伤更多，炸毁房屋无数。德国潜艇迅速击沉英国轮船，以至于要切断英国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定量配给、征兵入伍和战时社会主义都已实行。全面战争第一次将全英人民卷入战争的漩涡。

全面战争和前线的前所未有的恐惧，也使这股震荡波对许多根深蒂固的英国信仰和制度造成冲击。进步不再是必然的了。人类的天性，再也不是理性和善良的了，而正如维也纳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是非理性的和神经质的了。所谓耶稣基督的宗教，在德国教士们祝福战争的时候，变成了欺人之谈。文明和礼仪似乎都丢弃殆尽，道德成了宣传人物的花招。什么都在变。妇女不再是家庭主妇，她们在军火工厂里开机器，她们争得了选举权，她们也吸起香烟来了。工人们组织了更强的工会，要求分享更多的国民收

人。新思想和新团体，成为这4年来许多令人困惑的事物的溶化剂。英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4年能够与这4年相比，不论从人们的牺牲和悲剧方面来说，还是从国家的信仰所受的打击来说，都是如此。这场战争是英国人所经受的创伤最深的经历，关闭了19世纪四平八稳的714 大门，开辟了通向20世纪动荡不安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英国会卷入这场大毁灭之中呢？

英国参战的原因

1911年7月24日，爱德华·格雷爵士要履行一项令人不快的使命：向内阁会议报告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据格雷看来，“这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曾经独立自主的国家所发出的最为严厉的公文”。诚然，与悲剧本身同样可悲的是，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于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和夫人，但这些民族主义者与塞尔维亚政府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奥地利并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提出这一最后通牒，而向来深深卷入塞尔维亚事务的俄国，对此完全不能接受。格雷对于战争的预言令内阁大为吃惊。塞尔维亚是那么遥远，那么微不足道。英国为什么要支持俄国——这个一向与英国在波斯、阿富汗和远东相对抗的国家呢？

的确，为什么要卷入欧洲无止境的纠纷呢？许多内阁成员和更多的自由党人都怀有孤立主义的情绪，这正是坎宁（Canning）在19世纪20年代所大力奉行，而后来又激起无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谴责卷入欧洲纠纷的那种孤立主义。同样的孤立主义传统，也确立了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外交政策。英国的海军统治了海洋，英国的货物畅销全世界，大英帝国扩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欧洲大陆是那样的分崩离析，英国根本不需要什么盟国。

但是到1904年，局势已发生改变。一个与孤立主义对立的传统卷土重来，主张利用联盟造就一种有利的力量平衡；伊丽莎白女王、威廉三世国王以及马尔伯勒和威灵顿大军的精神，也都还存在。布尔战争暴露了英国的军事弱点和孤立形势。德国势力日

益强大，一心一意建立海军与英国抗衡，且拒绝英国方面通过谈判达成全面谅解的建议，以及用粗鲁的办法威逼法国等等。这许多因素合在一起，迫使英国在1904年和法国就两国间纷争多年的许多殖民地问题达成"谅解"。1907年英国又和俄国达成了同样的谅解，解决了在波斯、阿富汗和远东的争执。但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同盟。唯一的同盟，是英国与日本于1902年达成的英日同盟。不过，在1906年之后，英法通过双方的军事安排，加强了"谅解"。两国同意法国海军负责巡逻地中海，英国海军则防卫英吉利海峡与法国海岸。另一个相当随意的承诺，则是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将对法国陆军的左翼提供支持。这只是一个非正式的承诺，直到1911年告知英国内阁，但英国的承诺，使本国在道义上承担了保卫法国的责任。

英法与英俄之间的双边谅解，加上法国与俄国之间于1902年达成的防御同盟，就构成了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的基础。与之对立的是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因为意大利是不热心、而且靠不住的盟国，所以对立的双方是中欧两个德语国家与俄、法、英三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奥两国处于被包围的境地，但这种境地是它们自己造成的。德国在1870年夺取了阿尔萨斯—洛林，酿成法国对德国的永久敌意；而奥地利在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则激怒了塞尔维亚，羞辱了俄国——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的保护者。德国则通过染指摩洛哥和加紧海军建设，而完成了这种包围。

715

事实上，这种包围对德皇和他的大臣们在心理上的影响十分有限。他们对包围无所畏惧，这一点在德国对好战的奥地利表示强硬的支持之上得到了清楚的反映。德皇和他的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Hollweg），不仅为奥地利提供侧翼保护以确保其可以恣意妄为，而且敦促它尽快将塞尔维亚平定。即使两国驻英国的大使通报了格雷首相对战争的预测，即假如德国进攻法国，英国将很难不去支持法国之时，这两国仍然照干不误。

格雷是一位睿智但不够强硬的外交家。他不是帕麦斯顿。帕麦斯顿早就会要求德国告诉奥地利后退，否则就等着开战吧。不过，甚至连帕麦斯顿的这一招也不一定管用，德皇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对弱小的英国远征军不屑一顾。格雷宁愿用会议的方式，而不是用最后通牒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意图在 1913 年之后愈加强烈，因此当时他在伦敦主持召开各国大使会议，帮助解决了巴尔干战争危机。格雷用以防止战争发生的主要办法，是力劝英、德、法、意出面调停当时的争端。但这个办法不会奏效，因为运用列强会议和欧洲列强协商一致的方法早就过时了。现代国家形成之前就饱受陆军、海军、关税、同盟和殖民地问题的困扰，不再对这个想法感兴趣。无论德国和奥地利都反对这种想法，最终并迅速投入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了。奥地利得到了德国的侧翼保护，已决心灭掉塞尔维亚。俄国知道法国必定支持自己，也决心保护塞尔维亚。爱德华·格雷该怎么办呢？一些人如《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评论员，就主张宣布中立，另一些人如外务部的艾尔·克罗（Eyre Crowe）爵士，则坚决主张宣布支持法国，以便阻止德国开战。

对这两种主张，格雷都没有采纳。他不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大臣，而是一个为人诚恳正直、沉默寡言、秉性拘谨的英国绅士。他毕业于温切斯特（Winchester）公学和牛津大学，酷好垂钓。在外交大臣的任内，格雷表现出对欧洲形势的精湛深刻的见解，牢牢控制他的属下，在外交上机智灵活。但他缺乏勇气和想象力，不善于驾驭人际关系和操纵局势。他的政策，谨慎而温和，这正合他的性格，也反映出英国内阁、自由党和公众舆论所存在的深刻分歧。那些主张站在法国一边的人不多，主张参战保卫俄国的人更少。在 8 月 2 日的内阁会议上，反对和支持参战的票数是 12 票对 6 票。假如格雷宣布英军将参战支持法国，阿斯奎斯内阁必然倒台，或者至少格雷认为如此。整个工人运动、半个自由党和多数公众都反对英军支援法俄两国。伦敦特拉法加716 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要求英国严守中立，就像自由党的报纸（仅一家除外）全都要求中立。在剑桥大学，80 名教职人员加入了新成立的

中立同盟（Neutrality League）。

8 月 1 日，劳合·乔治说，95% 的英国人反对参战；到 8 月 4 日，他却说，99% 的人支持参战。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议会投票决定对德宣战。内阁因反战而辞职的只有两位大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舆论会翻过来呢？造成这个剧变的原因，是德国进犯比利时，英国则对该国中立不受侵犯负有责任。一个国家卷入战争，常常出于道义，或出于利害关系，德国军队突入比利时这一蛮横张狂的非正义行径，使英国别无选择，并不得不正视本国的安全和力量平衡。德国击败法国和占领低地国家，对英国形成巨大威胁。一想到德国中欧帝国的出现，英图人就倍感震惊，这与腓力二世、路易十四或拿破仑在低地国家的存在一样可怕。英国的外交政策有一个中心原则，那就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能独霸欧洲。当 7 月 26 日格雷向内阁报告英国对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时，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样的威胁已经近在眼前。一星期之后，当英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进行战争动员和宣战之时，颇为震惊的英国公众才意识到，英国决不能听任法国溃败。当 8 月 30 日英国对德宣战时，人们欢呼拥护，正如维也纳、柏林、莫斯科和巴黎的公众反应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德意志帝国的兴起。这个国家强大、富裕，奉行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其雄厚的国力促使专制的皇帝、掌权的军人和沙文主义的政治家统一行动，支持另一个专制国家奥地利，以致卷入了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帝国寻求解决内部由民族对立引起的纠纷。俄国此后也许会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但在 1914 年，其战争动员只是为了保卫塞尔维亚的独立。德国一方面纵容奥地利压服塞尔维亚，一方面又拒绝出现解决争端的会议，并悍然对法俄宣战和进攻比利时。英国处此情形之下，已无回旋余地，要么对德宣战，要么听任德国独霸欧洲。

战略的混乱：1914—1915 年

在德国将军史里芬（Schlieffen，卒于 1906 年）的敏锐的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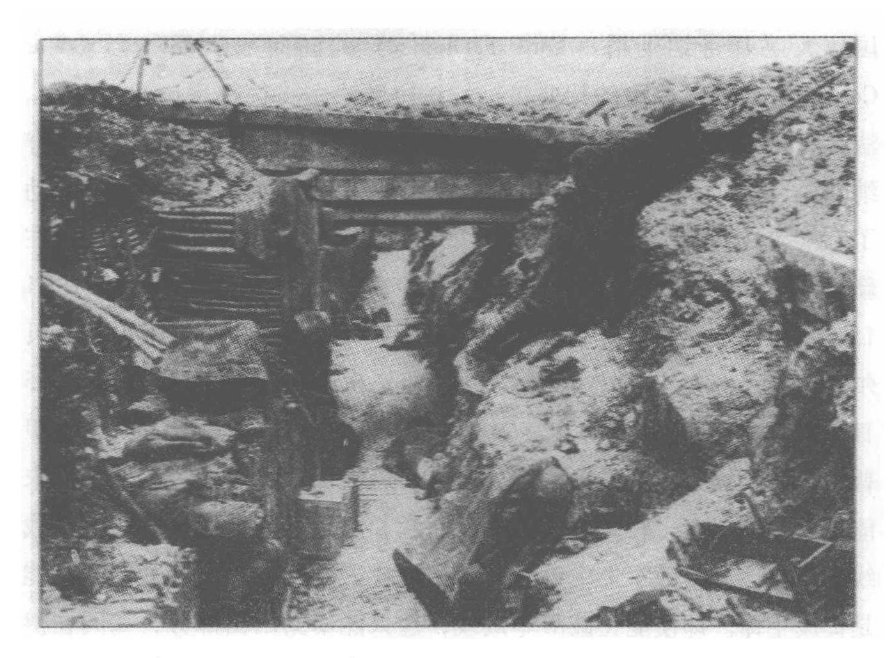
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平坦开阔的农田，是攻入法国的最易捷的入口。德国要在东西两线作战，必须迅速击溃法国，以便挥师打击俄国。取道阿尔萨斯—洛林以西的密林、堡垒和山地进攻法国是一条艰难之途。在这一地带的小规模左翼德军，只是缓缓推进，其作用像一扇门的折页，那门便是庞大的德军右翼，得以打开比利时和欧洲的北部和西部的通途。德军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包围巴黎。自8月6日至17日，11000列火车运载着300万以上的德军越过莱茵河。一个717 月之后的9月9日，这300万德军，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最精锐的部队，攻到巴黎城以北以东的马恩河（Marne River）被挡住了。两个月后，他们后撤5英里至50英里不等，形成一条从瑞士直到北海的战线，与英法联军据壕作战。直到1918年3月，两军的作战进退范围不超过10英里。德国未能获得迅速的胜利，否则欧洲历史将会改写。

史里芬计划的失败原因何在？德国批评家指责毛奇（Moltke）将军的指挥混乱无力。法国历史学家则称赞霞飞（Joffre）将军在撤退中坚持作战，称赞加利安尼（Gallieni）将军仓促组建军队、用巴黎出租车将军队运到前线。其他评论者则强调德军过多的力量集中在右翼——如史里芬所主张——阻塞了已经拥挤不堪的运输及补给线。而英国远征军也不无功劳。英国远征军约有10万人，于8月20日赶到前线，8月23日与德军在蒙斯河交战，将强大的德军阻挡数日之久。德军指挥官克卢克（Kluck）将军说，“要不是英军抗击，我本来会攻下巴黎”。英军在蒙斯河战役之后，向南撤退到马恩河，他们所负担的任务，即含混不明却又十分重要。他们从蒙斯河下来，第一步是向北缓进，进驻防一段从北海到瓦兹河（Oise）的100英里长的战线。10月23日至11月11日，在比利时后来成为两军血战地点的伊普尔（Ypres），英军奋勇作战，使得德军未能向西挺进、取得海峡各港口。英军损失了约5万人，但挡住了德军。

1915年初，驻法英军总司令约翰·弗朗奇（John French）爵士和

国防大臣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共同向战争委员会（War Council）建议：战略的首要目标，在协助法军将德军逐出法比国境。法军总司令霞飞将军已说服弗朗奇将军，接着弗朗奇将军也说服基奇纳勋爵，称这一点可以做得到。于是，联军一连向德军战壕阵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第一次从3月10日到13日，由英军阵线南端在新沙培尔（Neuve Chapelle）发起进攻；第二次从4月24日到5月31日，在伊普尔发起进攻，第三次在5月9日，在新沙培尔附近的欧贝尔脊地（Aubers Ridge）发起进攻，但三次都失败了。但是，9月15日，英军在卢斯（Loos）又一次进攻，再次失败，损失6万人，与伊普尔战役的损失相当。损失十分巨大，但教训并未汲取。重炮轰击未能摧毁防御工事，轻武器的射击反而激起更顽强的抵抗；而对狭窄战线的进攻，导致敌军集中兵力；起初的攻击受挫之后坚持冲锋，只能是徒废生命。即使能突破敌军战线，这只能暴露凸出部分，如同在伊普尔一样，招致德军炮火的轰击。基奇纳勋爵已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承认“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欧贝尔脊地战役之后，他又下了一个结论：“这样的阵线是无法攻破的。”可是到9月，他又同意在卢斯的进攻，并说“即使这样的进攻会使我们受到巨大损失”。机关枪的屠杀扫射使守方占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这种优势还来自钢骨水泥工事、带刺铁丝网、后膛装弹枪支、来复线弹道钢制炮管和发出巨响、爆炸力极强的炮弹。

意识到西部战线无法突破后，许多人就想绕到敌人的后方开战。温斯顿·丘吉尔就是最早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之一。他找的地点是达达尼尔海峡——地中海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峡。攻下这个海峡和君士坦丁堡，参加德国方面作战的土耳其就会投降，军火和补给品就能自由运往俄国和东线。而且，攻下君士坦丁堡能鼓起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士气，驰援塞尔维亚，动员巴尔干国家参加协约国作战，导致奥地利的崩溃。德军参谋总长说道：“如果海峡被攻下，我们的战争就必败无疑。” 718



四年来，年轻的男人们都被困在战壕中，陷入严酷、泥泞、毫无希望的僵持状态（*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说法过于夸张，指出协约国并没有战争物质可供俄国，俄国本身的问题太大，靠物质接济根本无法解决，而巴尔干半岛地势险峻，绝非进兵的通衢大道。不管怎样，海峡没有能攻下来。保卫达达尼尔的狭长形加里波利半岛始终没有易手。每次进攻总是为时太晚，所投入的兵力也太薄弱。1915 年中，至少有三次进攻本可以攻下加里波利。3 月 19 日，第二次海上进攻本来能够击溃为数不多的土耳其守军，因为他们的弹药和水雷都快用完了。结果英方下令停止进攻，因为那位海军上将司令官看到 3 艘旧式军舰被击沉而感到胆怯。5 月 6 日至 8 日，如果作战指挥得法，一定可以击败土耳其守军。但是那没有头脑的指挥官，连敌人的机关枪阵地在哪里都没有弄清楚就下令士兵闯入敌人的火网。最后，在 8 月 6 日至 7 日，英军偷袭半岛，在敌后登陆，大有希望将土军包围，可惜那位 61 岁的将军不曾上过火线，混乱无章贻误战机。到 1916 年 1 月 8 日，英方撤出半

719

岛。此役伤亡人数高达25万人。

虽然在加里波利的贻误损失巨大，但最致命的贻误还是来自伦敦。战争委员会最初依照弗朗奇和基奇纳的意见，把力量集中于西线。随后，加里波利请求增援，而西线又证明无法突破，于是那些不称职的将军又将军队调走。这些指挥官既无明确的战略，又无轻重之分；既没有坚强领导，又不能掌控战局。海军舰队司令费希尔勋爵（Lord Fisher）不肯派铁甲登陆艇前往加里波利，因为他要留着在波罗的海登陆，但这只是他想象中的战事。黑格（Haig）将军则设想在荷兰登陆。劳合·乔治则支持法国方面在希腊北部的萨洛尼卡登陆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确付诸实施，前后费时3年，徒耗人力物资。许多个师的部队，从1914年至1918年间被派往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作战，有胜有负，但都劳而无功。

1915年是最令人丧气的年份。不错，意大利参加了协约国方面的战争，英国控制了制海权；但其他方面情况都很糟糕——在法国，在加里波利，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在曾遭到齐柏林飞艇轰炸的英国本土，情况无不如此。英国军火弹药短缺，战略混乱，首相举棋不定，文官受军方威逼，军方对新战术无知，公众行事如常，工会不肯放弃固有权力，一些人大发战时横财，志愿从军者越来越少，人们认为战争毫无意义。很显然，英国国内战线的问题如不解决，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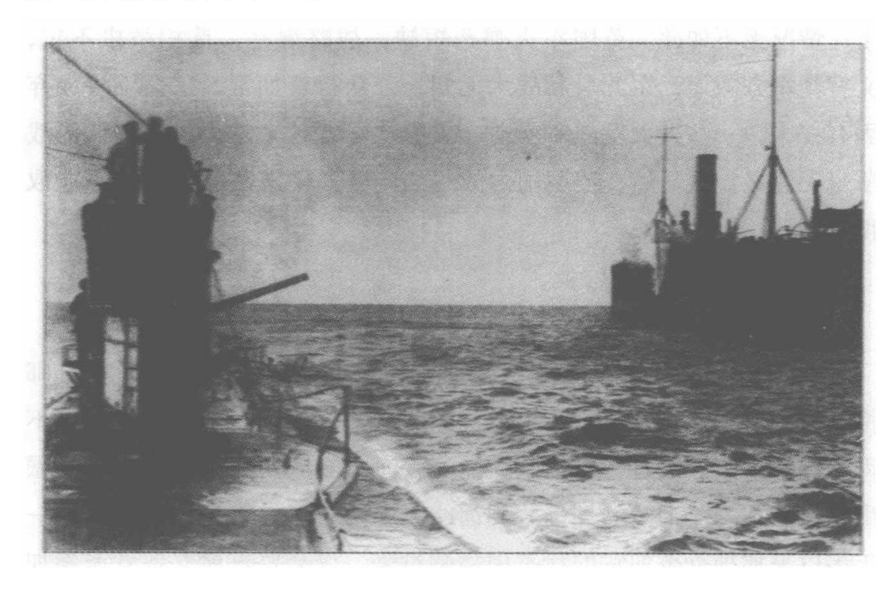
国内战线

1915年5月14日，诺斯克利夫勋爵的《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抨击阿斯奎斯政府，指出由于弹药严重缺乏，新沙培尔的攻势不得不提早结束。同日，费希尔勋爵辞去海军舰队司令职务，而不是派出舰只前往急需增援的加里波利前线。这两个事件将英国人从开战一年多以来那种行事如常的状态中猛醒过来。议会要求建立各党派参加的更强大的政府。阿斯奎斯于是组织了一个联合政府，其成员为自由党12人，保守党8人，工党1人，还有基奇纳勋爵。阿斯奎斯还设立

了一个新的军火部，由劳合·乔治任大臣。于是，劳合·乔治负责解决阻碍前线作战的弹药短缺问题。

物资的全面匮乏成为英国国内战线的中心问题。匮乏的物质种类有火药、机关枪、大炮、帐篷、沙袋、皮靴、军服和钢盔，还包括制造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原料，如铁矿石、化学原料、羊毛、皮革、苎麻和食糖。成千上万官兵的阵亡造成了兵员的匮乏，兵员的补充又造成了工人的匮乏。船只也不够，因为在1917年的上半年来，德国潜艇每月击沉英船60万吨，远超英国所能补充的船只吨位。这些损失意味着进口量减少，这又造成原料和食品的匮乏。自开战之时起，房屋匮乏的问题一直存在，但没有公众住宅建筑项目来加以解决，因为国家战时税源也减少了，而自1915年7月起，国家每天的税收减少300万英镑。在这次大战中，国库支出增加了6倍，原先的6.5亿英镑国债增加到74亿英镑。所得税提高至每英镑6先令，奢侈品税则提高至33%。除了上述诸项匮乏以外，将军和政治家的想象力、精力、理解力和决断力也十分匮乏。

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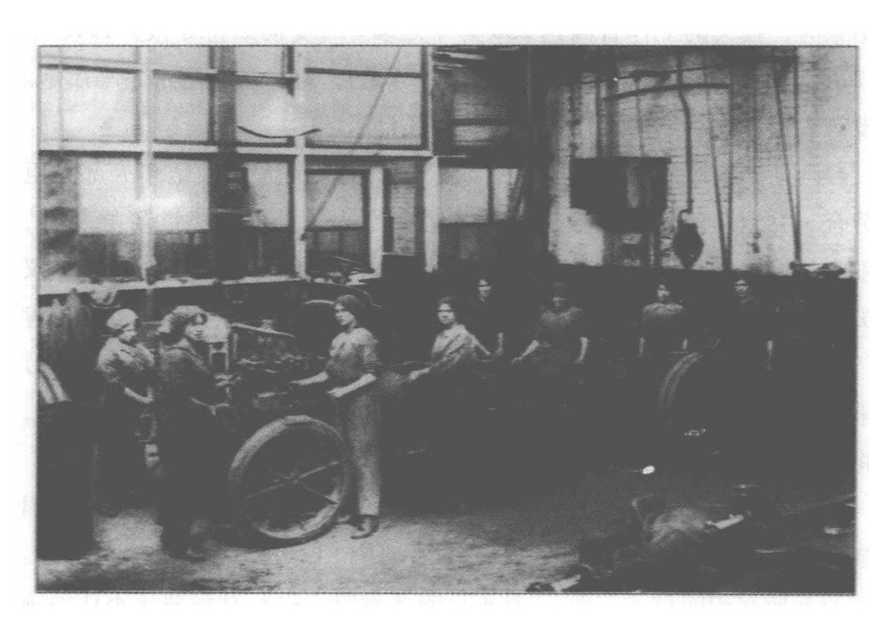


一艘U型潜艇正在向商船开火（*Hulton/Archive*）

8月初，国防部确实就已经下令禁止一切用于制造爆炸品的化学原料出口，并征收一切此类化学原料，但除此之外，并未采取其他有力措施。在自满的国防大臣基奇纳勋爵领导下，国防部的动作迟缓。该部官员严重低估了一个人数猛增了10倍的军队的需要。基奇纳勋爵盲目征兵，也导致了军事工业人力匮乏更加严重。到1915年6月，战争所迫切需要的弹药工人有1/5从军，造成了开工不足。军队所需要的工业品，每一项都供应不足。基奇纳的国防部却显得吝啬和不可理喻，拒绝定购斯托克斯轻迫击炮——当时最有杀伤力的新武器之一；只给每个营发给两挺机关枪，而英国陆军学校在1919年就建议每营配备6挺机关枪。基奇纳还不鼓励坦克的研发，说那是“不错的机器玩具”。

721

赫伯特·阿斯奎斯从1914年8月到1916年1月领导国内战线，劳合·乔治则从1916年1月至战争结束担当相同的使命。阿斯奎斯是和平时期的一流首相，却是战争时期的二流领导人。劳合·乔治是一



近百万名妇女加入制造战争胜利武器的行列，图中为部分妇女照片（*Hulton/Archive*）

位卓越的战时领导人，却在之后的和平时期令人失望。阿斯奎斯尽管与新自由党人一样认为政府能够减轻贫困现象，但在内心里他笃信维多利亚时代的两大信条：社会事务上的自愿捐助主义和经济事务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因此，他和基奇纳形成一致意见：政府应当依赖英国人的爱国自愿精神，而不是实行征兵制，而工业方面也不宜干预。但严峻的局势和弹药、船只、食品、服装、皮靴和技术工人的短缺，迫使阿斯奎斯采取最初的、尝试性的管理战时经济的措施。比如，1915 年5月，他设立了军火部（Ministry of Munition），与工会达成协议，决定大批量购买食糖和实行信贷控制。但政府的举措行动迟缓、零乱无章，多是短期行为，完全没有计划或战略。比如，与工会达成的协议确实废止了一些限制性措施，招募了女工和技术工人，得到了不举行罢工的承诺作为交换，政府则承诺限制厂主的利润和给予工人在管理方面的发言权。但这些承诺都是自愿性的，并没有得到遵守。价格和利润不断上升，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工资，引起多次罢工。到战争结束时，损失的工作日高达250万个之多。《曼彻斯特导报》1916年12月1日揭露道："没有一件事是有预案的，每一项决定都是马后炮。没有人指导战事如何进行，完全是放任自流。"

722

阿斯奎斯政府中最积极和最奉行干预主义的大臣就是军火部大臣劳合·乔治。他创办了数不胜数的公办军火工厂，大批购置原材料，限定价格，举行工资谈判，成倍地提高生产量。这不仅打动了许多议员，而且驱使诺斯克里夫勋爵（Lord Northcliff）和麦克斯·艾特肯（Max Aitken）爵士（即后来的比弗布卢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采取行动，联合那些对战局不满的自由党人和不肯安分的保守党人，将阿斯奎斯的联合内阁赶下台。

12月1日，劳合·乔治要求组织一个三人最高委员会处理战时国事，由他本人任主席。虽然阿斯奎斯仍任首相，但不参加这个委员会。阿斯奎斯起初同意了。但12月4日的《泰晤士报》社论要求不让他领导战事大伤了他的自尊心，阿斯奎斯坚持要维护自己的"有效领导"。这一要求导致了保守党阁员辞职和内阁的倒台。乔治五世请博纳·劳

出来组阁，但他不接受，因为保守党是少数党。博纳·劳极力推荐劳合·乔治组阁，于是劳合·乔治成为首相。劳合·乔治邀请保守党和工党加入联合政府，立刻统筹了战时力量。他具有老威廉·皮特的充沛精力和温斯顿·丘吉尔无所畏惧的精神。他们三人是现代英国的三大战时领袖。劳合·乔治增设了4个新部：航运部、劳工部、粮食部和国民服务部；建立了一个由5名大臣组成的、高效的战时内阁；设立了一个航空局，其下新设皇家空军编制，不隶属于海军或陆军；邀请能力最强的企业家参与政府事务；推动议会通过了许多法案以扩大政府的权力。阿斯奎斯的战时社会主义与劳合·乔治的战时社会主义相比，那真是平淡无奇。自克伦威尔以来，任何一个英国领导人都没有享有这样大的权力。在战争结束时，议会和政府已经添设了10个新部、160个局和委员会。

劳合·乔治尽量不去动用这些权力。他宁愿妥协而不愿强制，主张合作而避免冲突。这并不是因为集体主义理论的影响；相反，他是一个天生的问题解决者。1917年，为使罢工矿工复工，他一方面将他们的工资有所提高，一方面将矿产国有化——事实上只是纸上文章。为了使船厂老板迅速提高生产能力，他提供了成本外加利润的合同，加上爱国热忱的鼓动，还请格拉斯哥能力最强的船厂老板出任航运大臣。他将食品配给交给粮食零售商经办，将地方农业委员会交给地主主掌。这样，他收到了预期的效果。1917年，造船厂新造的商船在100万吨以上，农民也多耕了100万英亩的土地。英国航空工业的迅 723 速发展，使英国皇家空军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强于德国空军。皇家空军的飞机每小时的飞行速度达140英里！土地的地块调整——将土地调整为1/4英亩的面积，增产粮食80万吨。丘吉尔在军火部造出了数百辆新式坦克。这种武器是他在1914年海军司令任内研发出来的，到1918年就用于突破德军防线。

这些因战时巨大需要而出现的成果，使英国的经济处于紧张状态：一方面出现通货膨胀，一方面导致"替代"，即用非熟练工人，特别是女工，替代原先熟练工人操纵机器。1917年秋天，通胀加上替代，

连同工作时间延长、住房环境恶劣、西线战事受挫和俄国革命消息的传来，引起了工人情绪不满和罢工。劳合·乔治采取措施，压低物价，补贴小麦和土豆价格，配给供应稀缺食品，给工人发放奖金和限制利润。结果，工资的增长首次超过物价的增长，工人的实际收入提高。虽然通货膨胀依然存在，工人不再是这场昂贵战争的主要负担者。

劳合·乔治通过赢得海上胜利来解决匮乏问题。到1914年12月7日，英国海军已经在公海上清除了德国海军。当天，英国海军在福克兰群岛附近击沉了由冯施佩伯爵（Count von Spee）率领的巡洋舰编队，仅1艘逃脱。1916年5月30日至31日，英国的北海舰队与德国舰队遭遇于北海日德兰岛近海，英国海军控制了战况，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英舰被击沉14艘，损失兵员6000人，德国海军则损失11艘舰艇和兵员2500人。德国海军不但损失较小，而且逃脱了全军覆没的结局，所以此役可算是一个战术上的胜利。英国舰队在谨小慎微的海军上将杰利科（Jellicoe）指挥下，在5月30日晚上错过了一个可将德国舰队全歼的大好机会。次日清晨，德国舰队已悄然溜回本国军港，再也不敢出海。至此，英国仍然是北海的霸主。英国依然维持对德国的海上封锁。日德兰之役迫使德国海军再次使用潜艇战术，以切断英国的战争供给。1917年2月起，无限制潜艇战拉开大幕。德国潜艇对与英国通商和航行于地中海、北海和大西洋的协约国船只，一律击沉。4月，盟国损失的船只增加到60万吨，而同月被击沉的德国潜艇仅两艘。英国的食品储备只够维持6个星期。虽然在护航方面，海军已有现成的办法，正如陆军能用坦克攻克壕沟一样，但海军部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正如陆军部无法解决僵持不下的战壕战问题一样。

海军司令亨德森（Henderson）曾一度用武装渔船护卫运煤船越过英吉利海峡，在4000艘运煤船中仅损失了9艘。而海军部继续宣称，海上护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劳合·乔治不是一个墨守陈规的首相，他私下咨询了海军部一些下级军官，发现护航能够做到。于是他下令海军部护航，此举获得惊人的成功果。1917年9月，商船损失降至20万吨，德国潜艇的损失则增加到前所未有的10艘，这对德方的打击很

大，因为潜艇损失虽然易于补充，但水手的补充却不易，而且现有水手的斗志也难以维持。这样英国再一次取得了海上战争的胜利。 724

为了战争的胜利，劳合·乔治确立了对海军部的权威。但是，他对陆军部却无法确立同样的权威。他早已对一再猛攻德军西部阵线的是否明智感到十分怀疑，但因英王欣赏驻法英军总司令黑格将军，而他的托利党同仁们也都欣赏黑格，所以他由于自己的身份而不便提出批评。同时他在战略方面的信心也不如老皮特和丘吉尔，他对他们二人能够压服将军的做法颇不以为然。结果，西线的若干悲剧，以及最后的胜利，便都是陆军方面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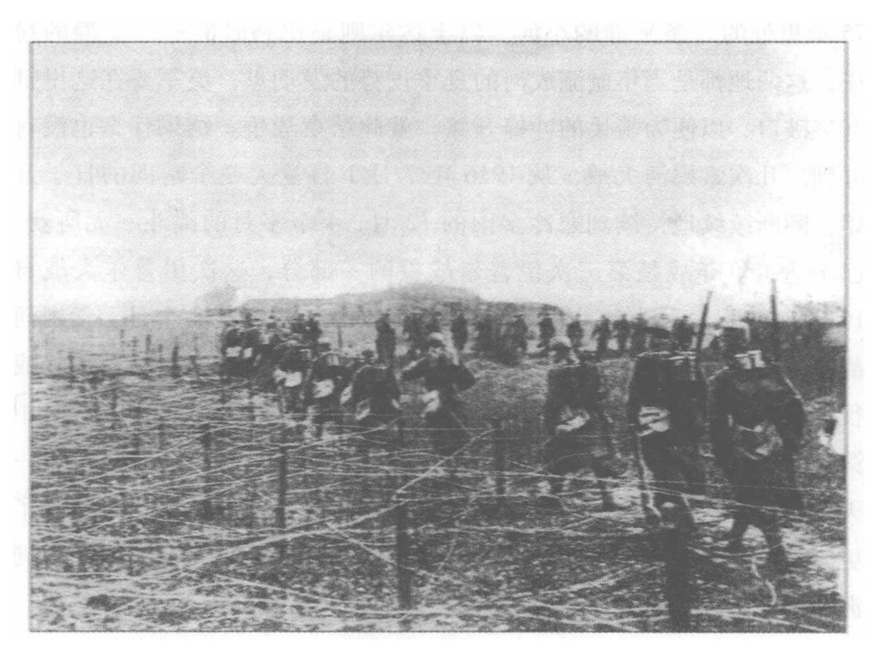
西部战线：1916—1918 年

索姆河（Somme）和巴士达尔（Passchendaele）这两个地名，作为恐怖或徒劳的象征深深铭刻在英国人的脑海里。索姆河是巴黎城北75 英里处的一条平静的小河，巴士达尔则是比利时的一个安静的村庄，这两地都是当年血流成河的夏季攻势的发动点，英军要在这里打开突破口，以便为骑兵的冲锋开路，就此结束战争。结果什么也没有办到。几次索姆河大战，从 1916 年 7 月 1 日夏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开始，断断续续地持续到寒冷多雨的 12 月，4 个多月的战斗一无所获。巴士达尔争夺战是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一部分，这次伊普尔大战自1917 年 7 月 1 日开始，在佛兰德泥泞的平原上进行了 3 个月。索姆河战役重复了 1915 年坎佩恩（Campaigns）战役的错误，而巴士达尔战役则重复了索姆河的错误。索姆河战役中，英军伤亡约 42 万人，其中第一天就伤亡 6 万人：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英军伤亡 34 万人，其中第一天伤亡 31000 人。联军在索姆河只推进了约 2—3 英里，多处推进到了更开阔的地带；在伊普尔，联军阵线推进了 4. 5 英里，只夺取了如同泥潭的巴士达尔村。

在上述两次战役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战役中，英军最高指挥部一再使用失败的战术：攻势发动之前向敌阵集中炮轰一个星期，其作用只是惊动敌人；错误地判断炮轰可以摧毁敌方大炮和机枪阵地，但敌

方炮火未遭摧毁；随即下令大队步兵进攻，士兵们负重达66磅，在大白天缓慢地行进。但敌人的战壕和机枪阵地是用了两年的时间精心构筑，完好无损。当英军刚从战壕里爬出来，德方的机关枪手就掩蔽部里出来就位。机枪的火网犹如割草机一样将一波波冲锋者成片撂倒。英军没有用突击队发动突袭，也没有发动夜袭，还根本找不到敌阵弱725 点。他们依靠无比的勇气，以密集的队伍蜂拥而上，冲入凹凸不平、到处是弹穴铁丝网（英国将军对此从未做过考察）的地带。这是将18世纪的旧式战术应用到20世纪的机械化战争之上。有时，大规模进攻也可以突破敌阵，但毫无用处，因为没有后备部队上来扩大战果。

为什么英军最高指挥部坚持运用这种损失重大的错误战术呢？为什么他们会一误再误呢？答案就在于大部分军队，特别是英国军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和传统意识。将军们都受到各种战争的熏陶，头脑迟钝、僵硬不变。基奇纳和弗朗奇都是60多岁的人了，罗伯逊和



铁丝网极为稠密，对于行进的部队是一种致命性的危险（*Hulton/Achive*）

黑格都在55岁左右。基奇纳是印度和埃及数千万人的帝国统治者、苏丹的征服者和南非焦土政策的发明者，在英国广受尊敬。但他冷漠专断，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固执程度只有毫无幽默感和脾气暴躁的弗朗奇将军与之不相上下。弗朗奇素来自以为是、愚昧无知，没有受过参谋工作的训练，时而优柔寡断，时而鲁莽冲动，只得由黑格将军取而 726 代之。黑格出生骑兵，恪守保守主义。但保守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他们面对一些困难，毫无解决的办法。加里波利战役失利之后，谁也不认为可以再抄德军的后路。唯一可以攻击德军的地方就是西线，而这是大批德军据壕死守的阵线。不过，英军如何才能不付出重大牺牲而大败德军呢？有些人说，可以用坦克。但基奇纳不肯使用坦克，黑格则对坦克持有偏见。这位英军总参谋长认为坦克是“冒险的革新”。丘吉尔最早在海军部力主使用这种武器。1915年，斯文顿（Swinton）上校和内阁战争委员会（War Committee）都持同样主张。

1916年9月15日，黑格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将坦克投入索姆河战场，受到重创。他将坦克分散于进攻的步兵营中，而未依照斯文顿的主张，将大量坦克集结起来投入战斗。1917年11月，黑格在康布雷继续坚持原有战术，381辆坦克推进了4英里，攻到了德军战线后面的空旷之地。但这些坦克都停住了，有的抛锚，有的被敌炮击毁，其余的则未能得到后备坦克和步兵的增援。这种坦克速度缓慢，只装备一挺机关枪，装甲很薄，其用途是跨越壕沟和弹坑、冲破铁丝网和清除机关枪阵地。坦克的装甲不厚，又容易抛锚，所以只能帮助步兵突破阵地，却不能对抗敌人的炮火。尽管不能成为解决西线的关键武器，也不能代替步兵，但是坦克在1918年10月几次决定性战斗中，成功地突破了德军阵线。不过，坦克投入战斗的时间应该大大提前，数量应该大幅度增加，武器应该火力更强，而且装甲也应该更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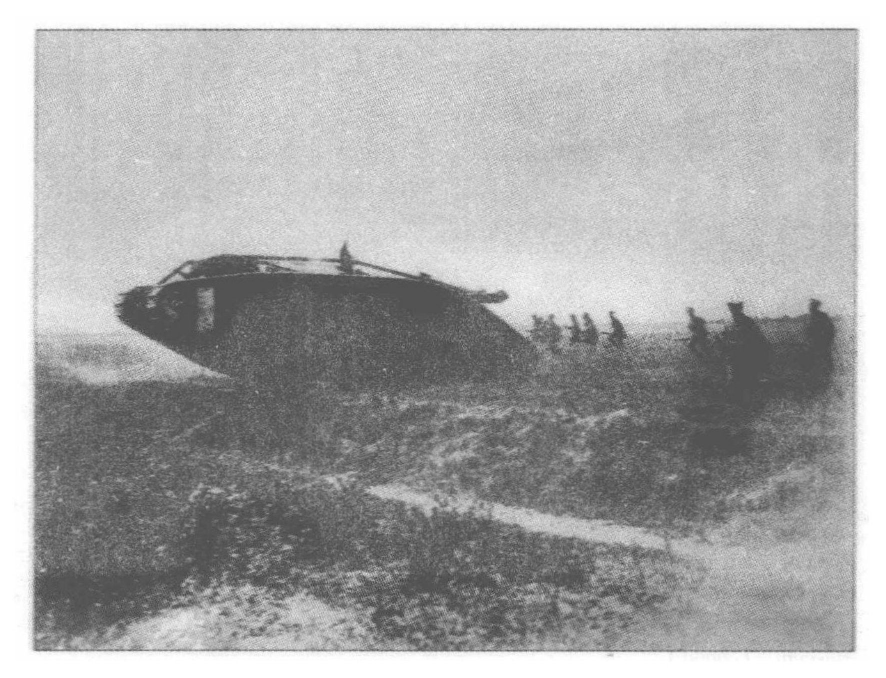
黑格将军的个性，也可以帮助解释索姆河和巴士达尔两役的失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像克伦威尔一样，相信得到了上帝的指引。1914

年任国防大臣的哈尔丹勋爵（Lord Haldane）表示，黑格是百年来最优秀的军事天才。但其他人认为他顽固愚钝、刚愎自用。黑格行军精于恪守时刻和后勤补给，却不善于战术的施展和地形的利用。他从来不仔细考察战场的地形地貌。他和麾下的士卒一样勇气十足，嗜杀无度。从1915年起，黑格坚信两大信条：战争的胜利只能在西线赢得；获取战争胜利的途径只能是拼消耗。到1917年，他寄希望于用骑兵冲锋来取得突破，相信“铁棒磨成针”的道理，认为协约国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打破德军顽抗的临界点。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两人对严峻的基奇纳和顽固的黑格的妥协退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索姆河和巴士达尔战役的恐怖和徒劳。

1918年，协约国通过消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况令人感到恐怖。英国的坚忍不拔终于把德国拖得精疲力竭，当然自己也几乎被打败。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的爆发使东线德军可以腾出手来，有可能赶在美国到达之前击败西线联军。1918年2月，鲁登道夫（Ludendorff）指挥的德军作战部队比联军多20万人。在西线北段，他机灵地利用铁路运输，以62个师的德军对付26个师的英军，以2508门重炮对英军的976门重炮。鲁登道夫把力量集中于英法两军阵线衔接处，取得突破。于是，德军第二次攻到了马恩河一线，可是这次进攻又被联军挡住了。黑格下令兵士坚守阵地，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美军在阿戈纳森林拥有坦克数量上的优势，英军坚守亚眠，终于改变了战场局势。8月8日，鲁登道夫报告德皇，战事已败。11月11日，双方签订休战协定。

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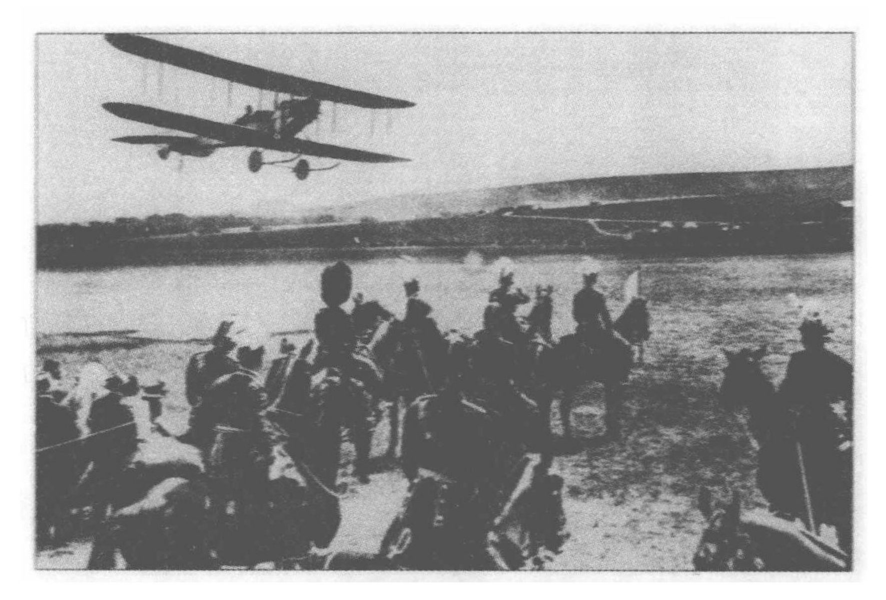
虽然协约国方面起初的部署不当，但在人力和物资上拥有优势，将德军的士气和资源消耗殆尽。这场战争并没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消耗战是制胜的主因。初期，法军不惜巨大牺牲，挡住了德军的攻势；随后，1916年起，则是那些从普通公民中征募、仓促训练而成却表现出吃苦耐劳、十分顽强的英国军队，在并不高明的指挥之下英勇作战，终于耗尽了德军的力量。1918年3月和4月，如同4年前的伊普尔之役一样，英军在阿拉斯（Arras）和亚眠两地挡住了德军最后的攻势。



基奇纳公爵称坦克是一种“不错的机器玩具”。在1918年黑格将军大败德军的战役中，坦克功不可没（*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最后，英军总司令黑格将军显出了他的战术家本色，指挥步兵和坦克，用行家的战术和丰富的想象，打了几个月的漂亮仗。

英国未经充分训练的部队，其士兵所表现出的无比英勇，与他们在战壕生活中表现出的坚忍精神交相辉映。战壕既泥泞潮湿，又寒冷恶臭；到处是虱子、耗子，充斥死人死马的尸臭味。威尔夫里德·欧文（Wilfred Owen）上尉写道，在巴士达尔的两英里半长的战壕中，“没有一寸干地——水深平均达两英尺左右”。欧文是当时战地诗人中最出色的一位。在他的壕沟掩体里，约有一两尺深的水和4英尺高的空间，25个人挤在里面忍受德军为时50小时震耳欲聋的炮轰。外面，“执勤的哨兵……被轰得无影无踪”，到处都是烂泥，“三尺、四尺、五尺深的烂泥塘像八足章鱼将人吸住”。他后来写道：“我有12天没洗过脸、脱过靴子、或睡过一次好觉”。随后，在一次敌军攻势之后，他写道：“满地爬着的，蠕动的，全是受了伤的躯体”。在停战之前4 728



同坦克一样，飞机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用于实战（*Imperial War Museum*，*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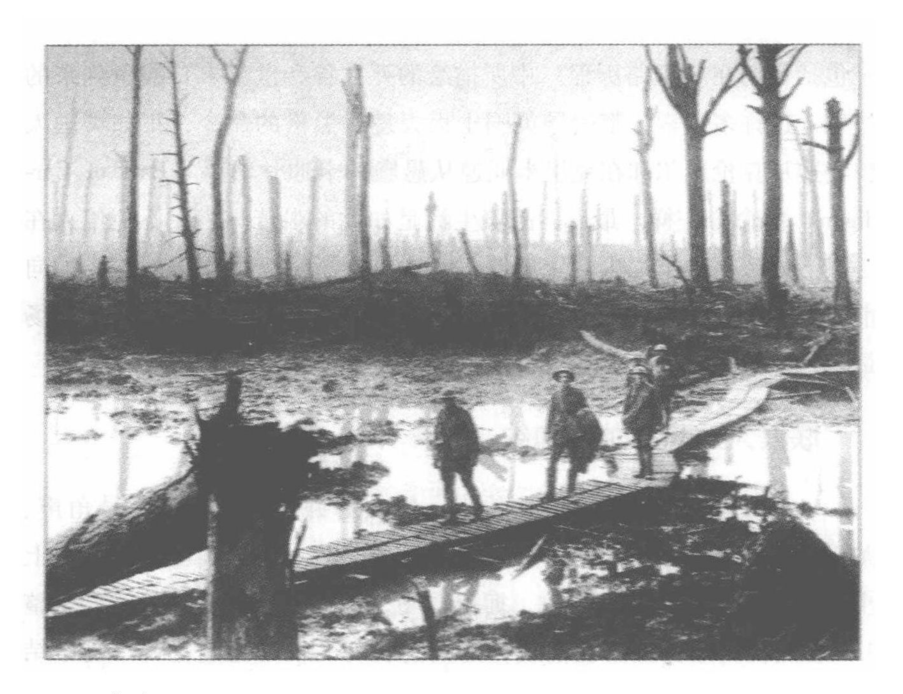
天，一颗德军子弹射杀了欧文上尉。

在没有战事的时候，战壕生活单调，索然无味，吃的是罐头牛肉和炖菜，再就是无休止的等待。到1917年，日复一日的站岗执勤和徒劳无功的进攻，令士兵们产生了战争永不会结束的念头。另一位战地诗人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上尉说："大家都有战事无止境的感觉。"他也称1916年是一个"绝望之念日深，可怖之景愈见"的年头、一个"疯狂之举大行其道"的年头。战壕生活令人窒息。布伦登说：这种生活"将你和人生常见的场景和景象截然分开"。而且，它展现了"两种世界，一种是战壕之上的弹坑地带，这是一种呈糊胶状、无形无态、令人观之心死的荒野；一种是战壕之下的恶臭不堪、满涂烂泥、烛火照明的木架支撑的壕沟，这里是死者陈尸腐烂的地方"。战壕也是响声刺耳的危险之地。在威尔夫里德·欧文写下了"尖啸声，汇成令人发狂的万弹齐落的轰鸣"之时另外一位战时诗人，西格弗里德·塞松（Siegfried Sassoon）则将索姆大战前的炮轰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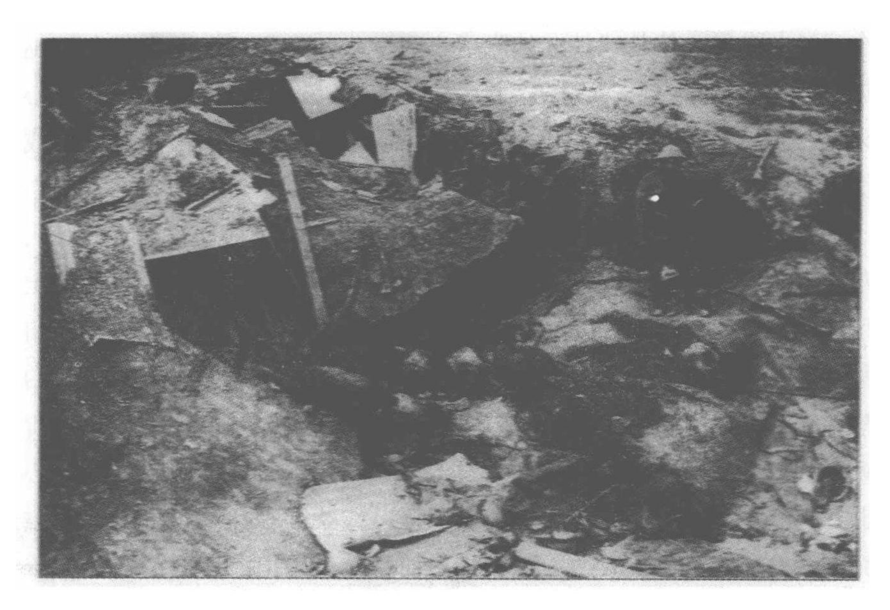
729

作一场龙卷风，从其“持久的隆隆之声”中，人们可以听到其中“哒哒哒的机关枪响声”。那天夜里，“害怕死亡和伤残的念头占据了心头”。另一位上尉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写道：“我看不出能逃脱死亡或伤残的过硬理由。所有理智都让我无法作此感想。”

虽然这些进攻愚蠢徒劳而且伤亡惨重，而且战场上泥泞、潮湿、寒冷、恶臭、响声和度日如年的景况使得法军发生兵变，但英国的士兵们还是坚持战斗，表现出一种对病苦和死亡置之度外、自古以来前所未有的职业军人精神。为什么英军具有如此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精神呢？其原因颇难断定。英国社会的严格的阶级制度，以及下层阶级平时被训导出来的恭顺，肯定发挥了作用。同时，英国人的爱国心也有影响，一方面会沾沾自喜令人生厌，或狭隘狂热毫无抑制；一方面也会发展为不畏强敌的勇敢精神。而且，英国根深蒂固的清教传统中包含了先定论和使命感、不求享乐的人生观、杀身成仁的观念，甚 730



战线后方是泥泞、荒凉和垫路木板；靠近战线处只有泥泞和废墟（*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现实就是：死亡（*Imperial War Museum*，*London*）

至包括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所描绘的死亡谷和世界末日战争到来的快感。这许多因素，都引导英国士兵去遵从黑格的命令，正如英国人曾经遵从克伦威尔和在克里米亚遵从愚蠢的卡迪甘伯爵（Earl of Cardigan）的命令一样。最后，战壕生活是如此的艰苦难堪，不免使人在心灵深处产生毋宁死去寻求解脱的意念，它激励士兵爬出战壕，冲向前方。我们还需要找出更多的动机，才能解释英国士兵为什么在这场最惨烈和持久的屠杀性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空前勇敢。

联票大选和凡尔赛和约

11月11日，停战的消息传来，教堂的钟声、喇叭声、号角声、茶盘敲击声、哨子声、歌声和呼喊声响成一片。人们涌上街头，挤上出租车和公交车，拥入酒馆，拥抱接吻，挥舞旗帜，举杯畅饮，整整3天在庆祝击败德国。在前线，士兵们表现的较为克制，苦难终于结束的解脱感就已经足够了。劳合·乔治一向是最精明的政治家，他立刻决定利用民众的欢庆情绪和对“战场的胜利者”热烈崇拜心理，在

731

12 月举行大选。因为议会已经 8 年没有改选，超过了合法期限 3 年。

劳合·乔治也作出了一个决定其命运的决定：以联合阵线领袖的身份竞选，而不是将自由党重新团结起来。他不愿意跟自由党搅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是阿斯奎斯在党内的牢固地位，原因之二是 1918 年 1 月的摩里斯事件。摩里斯（Maurice）中将是一位军事指挥官，在《泰晤士报》指责劳合·乔治对议会说谎，证据是劳合·乔治称 1918 年 1 月在法国作战的英军的人数多于 1917 年 1 月。赫伯特·阿斯奎斯笨拙地对此项指责进行调查。这实际上就是对劳合·乔治的不信任，虽然阿斯奎斯予以否认。不信任案以 293 对 108 票被否决，但本已不和的自由党人更加分裂。劳合·乔治应允以联合阵线领袖的身份竞选，又将自由党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成为选区联合阵线候选人的办法，是要收到由劳合·乔治和博纳尔·劳的联合背书函件。阿斯奎斯称函件为“联票”，所以这次选举又有“联票大选”（coupon election）之称。此类联票式的函件，共发给自由党籍候选人 159 份，发给保守党籍候选人 364 份，故有 229 名自由党籍候选人未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在 1916 年劳合·乔治出任首相时，自由党和保守党议会议员人数大约相等。此次劳合·乔治以联合阵线领袖的身份竞选，大选选出保守党议员 386 人（有些保守党候选人并未得到联票）和自由党议员 136 人，其结果只能使自由党受到损失。阿斯奎斯派自由党当选者仅 26 人，这对于 1906 年曾获 401 席的政党来说是一种羞辱。联合阵线既然是以 364 名保守党议员为主组成的，那么劳合·乔治难免为保守党人所左右，而那 26 名阿斯奎斯派自由党人也无法阻止工党取得主要反对党的地位。

这次大选产生了另一个决定命运的影响。大选正值英国国民对德国怨恨最炽之时，导致劳合·乔治和他的联合阵线作出了要确立严酷和平的承诺。劳合·乔治发誓要德国必须全部负担战争费用。贸易大臣埃里克·格迪斯（Eric Geddes）高呼：“我们必须把德国人轧干榨尽”。一位来自工党的政府成员巴恩斯（G. N. Barnes）说：“好吧，就由我来把德皇吊死”。这种反德狂热局面，使劳合·乔治来到巴黎时所拟定的对德和约，要比他私下预想的要严厉得多。这次大选也选出了 225 名新议员，保守党领袖斯

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看上去“在战争中脱颖而出、铁石心肠之人”。1919年4月，共有200人联名给劳合·乔治发了一个电报，责备他对德国过于软弱。

其实，劳合·乔治对德国并不软弱。可是，为了应对法国的克里蒙梭（Clemenceau）以及他的严苛和约，劳合·乔治却成了德国的温和保护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常和劳合·乔治联手阻遏克里蒙梭。732 而在其他场合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又是死对头。这三位伟大的领袖掌控了1918年1月至6月的巴黎和会。77岁的克里蒙梭是一个精明狡猾、固执己见、富于爱国心、疑心重重之人，他对权力看得很重，对乌托邦理想不予置理。他永远不能忘记在他的一生中，德国曾两度侵入法国领土。他最重要的两点要求是：绝对确保德国不再侵略；强迫德国支付法国巨额赔款。威尔逊和克里蒙梭存有重大分歧。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不是愤世嫉俗之人，确信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他对和会的愿望也有两个：创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确立以民族自决为基础的和平。为达到这个以及其他目标，按劳合·乔治的说法，威尔逊也可以是一个“固执己见、难于通融的偏执者”。

与威尔逊、克里蒙梭两人相比，劳合·乔治都大不相同，他既不像克里蒙梭那样过于猜疑和复仇心切（他的选举演说不在此列），也不像威尔逊那样耽于空想和过于轻信。劳合·乔治思维敏锐、注重实际，成为三个人中最具洞察力的人。但他的地位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遭到削弱：他有好要计谋的名声；英国不再是世界最大工业国和海上强国的事实。劳合·乔治最想达到的目标有两个：一个解除武装但保持领土完整而民心无怨的德国；一个稳定的欧洲。参加凡尔赛的四强及其许多专家却没有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其原因在于：受战争蹂躏的欧洲过于复杂；复仇和恐惧心理过于强烈。

《凡尔赛对德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 with Germany）是他们辛劳的结晶，报界对之并无好评。20年后的又一次世界大战，似乎验证了《和约》的失效。不过，《和约》本身虽有不足，但也有长处。

对于《和约》，我们可以分三部分来进行分析：版图的重划、安

全的安排、德国的赔偿。

关于欧洲版图重划，《和约》并没有不智之处。德奥两帝国战败之后重划欧洲版图，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强大的民族站起来了，其中有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他们要求成立自己的国家，虽然占人口少数的德意志人混居于他们之中。法国、丹麦和比利时都提出重新获取领土。丹麦并吞了石勒苏益格北部；比利时并吞了面积不大的奥伊彭和马尔梅迪；波兰取得了一个通向海洋的走廊，其中居住了许多德意志人。和约制定者认背离民族自决的做法，对于加强波兰的经济十分必要。劳合·乔治提出警告：波兰建立通往但泽自由市（拥有200万德意志居民）的走廊"必将……或迟或早导致新的战争"。尽管劳合·乔治的警告没有得到回应，但他通过劝服克里蒙梭和威尔逊两人，阻止波兰从德国取得上西里西亚和法国从德国取得萨尔，指出这两地的未来应由当地居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上西利西亚在1921年，萨尔在1935年举行公投，与德国合并。这些关于欧洲领土的安排，考虑到复杂的民族问题，对德国而言并非特别不公。

对德国殖民地的剥夺，则不那么公平。尤其是在当时的殖民主义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殖民地被剥夺，这就显得特别不公。劳 733 合·乔治屈从于澳大利亚和南非联邦的压力，不得不答应它们分别占取新几内亚和西南非洲岛要求。他还不得不答应屈从于英国内部帝国主义者的压力，这些人声称德国殖民地在战时曾经给德国海上袭击部队提供基地，所以不应归还给德国。于是，所有德属殖民地都被划为国际联盟托管地。事实上，它们成了国际联盟托管名义下由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和英国分辖的殖民地。若干土耳其帝国属土，也成了国际联盟托管地，法国取得了叙利亚，英国取得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英国履行了1917年贝尔福勋爵对犹太人发表的宣言，即犹太人应当得到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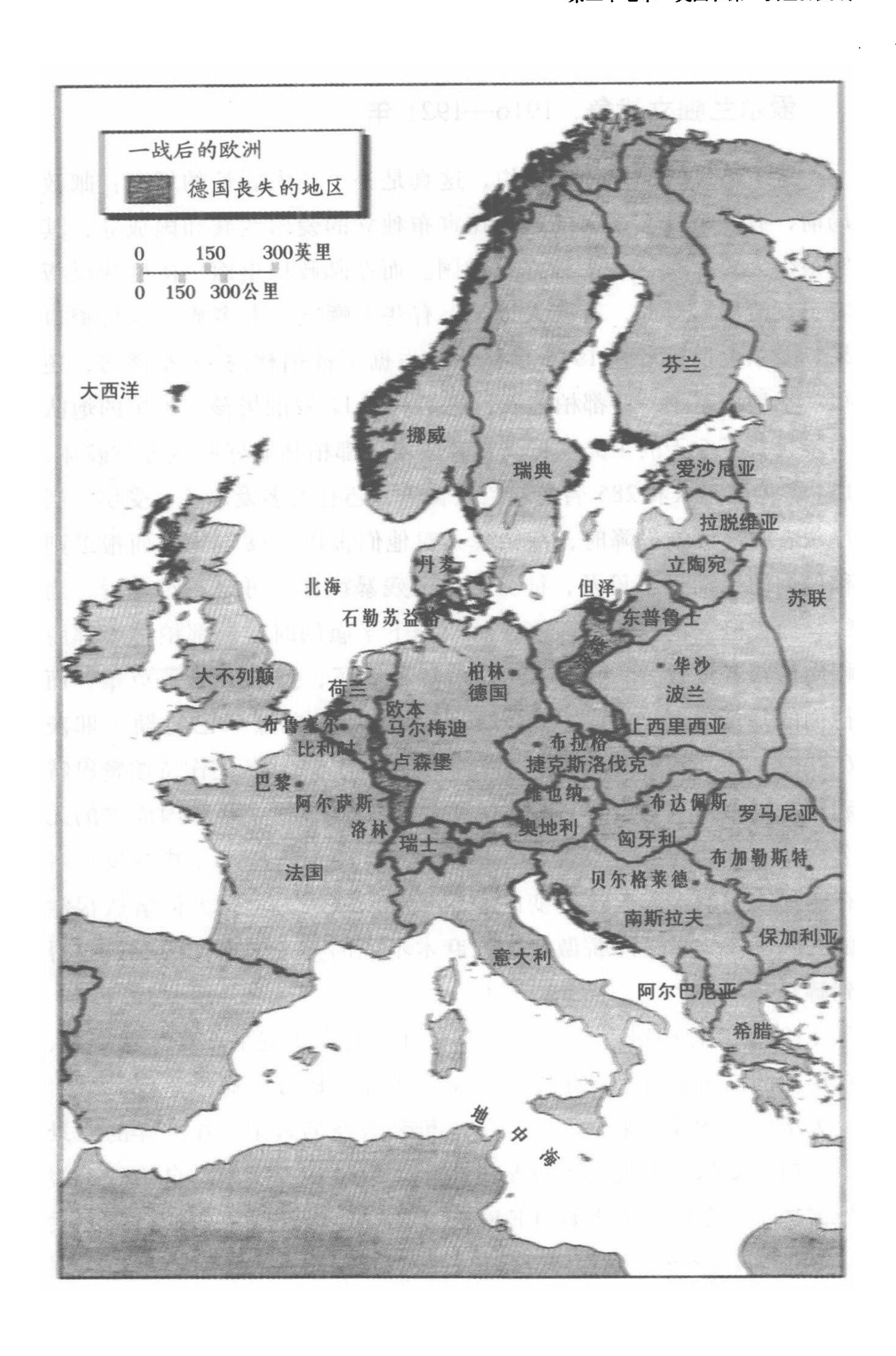
《和约》关于安全的安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公平之处，但后来纳粹德国等崛起，可以证明这种安全安排是不够的。克里蒙梭要求德国以莱茵河为西部边界，莱茵河西岸地区应成为独立国家，跨越莱茵河的主要桥梁由法国管辖。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表示反对。劳

合·乔治说，那会造成一个满腔积怨、渴望复仇的德国。克里蒙梭只得接受莱茵地区由联军占领15年，德国陆军的编制只有10万人，以及德军不得拥有潜艇和空军的方案。此外和会还订立了一项互助安全条约，英美向法许诺，在法国遭受进攻时提供防御支援。

此外还有国际联盟问题。克里蒙梭提出国联应有自己的陆军，同时，国联应由盟国操纵。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又予以反对。他们主张，国联在反对侵略问题上应遵其盟约第16章的规定：成员国对一切被国联大会宣布为侵略者的国家实行制裁，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包括经济、文化、外交及私人关系。克里蒙梭说，这样的国联，不能提供什么安全保证。劳合·乔治对国联的理想主义甚为欣赏，这种理想主义亦为数众多的英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说到安全问题，劳合·乔治认为应当像卡斯累利和坎宁一样，争取实现欧洲的势力均衡。此时的欧洲，俄国已转弱而成为共产党国家，被观为另类；奥地利帝国已经碎裂；德国的人口几乎两倍于法国。这样的情形，很难构成均势。《和约》的安全安排，也很难持久地遏制德国，因为德国因战败而感到耻辱、因殖民地被盗取而愤愤不已、因作为唯一被解除武装的国家而愤怒无比。《和约》关于赔款、战争罪的两项条款，使得愤怒达到顶点。

战争给法国造成的破坏是如此之大，要求德国作出一定的赔偿款是公允之举。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和约》最终解决方案的严厉批评者，认为100亿美元的定额赔款是公允的。虽然《和约》并没有规定固定赔款数额，但赔款委员会在1921年决定，德国应赔偿法国330亿美元。德国可能在事实上已支付了这么一笔赔款——在20世纪30年代里它重整军备的支出还不止此数，但这无疑是巨大的物质牺牲，也许是更大的精神牺牲。这么大的数目，如何支付也成了问题，因为英国法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厉，十分不愿意让德国货充斥其市场和损害其工业。故关于赔款的条款，实为《和约》最坏的部分。从总体上讲，《凡尔赛和约》是一个自我矛盾的和约：一方面，《和约》在赔款、殖民地以及要求德奥担负全部战争罪责诸问题上，均过于严苛；另一方面，它在安全安排问题上则又过于宽松或软弱。

735


一战后的欧洲
德国丧失的地区
0 150 300英里
0 150 300公里
大西洋
挪威
瑞典
芬兰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丹麦
北海
但泽
苏联
石勒苏益格
东普鲁士
柏林
德国
华沙
波兰
大不列颠
荷兰
欧本
马尔梅迪
布鲁塞尔
比利时
卢森堡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
上西里西亚
巴黎
阿尔萨斯
维也纳
布达佩斯
罗马尼亚
洛林
瑞士
奥地利
匈牙利
布加勒斯特
法国
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
意大利
阿尔巴尼亚
希腊
地中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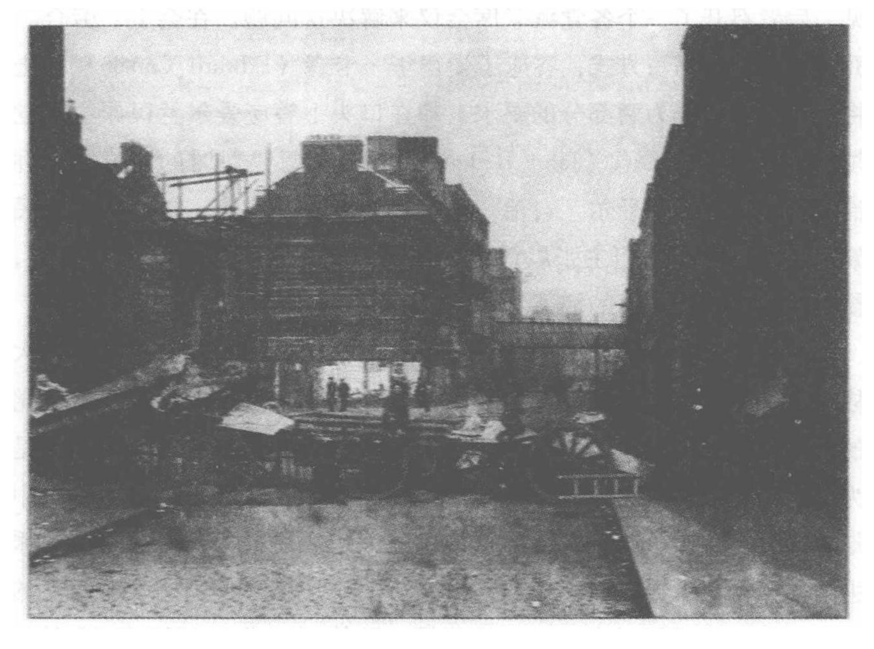
爱尔兰独立战争：1916—1921 年

对于路过的都柏林人来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邮政局前，有一个一文不名的人，在宣布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其实很少人要求有这么个独立共和国。而在邮政局里面，持枪的反叛者正在清场。对此，有些人讥笑，有些人嘲笑，大多数人则目瞪口呆。爱尔兰反叛者在 1916 年复活节占据了都柏林的 11 座楼房，还很不幸地枪杀了一些都柏林人，包括一个 12 岁的男孩。英国的炮队和步兵费了 5 天的工夫才将反叛者逐出。都柏林城好些地方被破坏，134 名英国军人和 285 名爱尔兰人丧生，还有很多爱尔兰人受伤。当反叛者弹尽援绝投降时，都柏林人对他们报以“嘘”声，而报纸则称他们的暴动愚不可及，徒劳无功，残暴疯狂。可是一年之后，当绿、白、橙三色爱尔兰国旗在邮政局下半旗的时候，都柏林人都脱帽向反叛者致敬。6 年之后，爱尔兰独立了，反叛者成了英雄，而他们的复活节暴动，被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威廉·巴特勒·耶茨（William Butler Yeats）颂扬为：“可怖的美”。耶茨还作诗颂赞巴特利克·皮尔斯（Padrick Pearse）——那个宣布独立共和国成立的无名之辈，和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那个指挥反叛者在邮局清场的人。舆论转变的原因，可以从那力量强大但潜伏很深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同骄傲自大但麻木不仁的英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得到解释。

1912 年至 1914 年，爱尔兰人对自治的企望越来越高。保守党、自由党的立法，给了爱尔兰农民很多土地。地方政府也落到了爱尔兰人手中。欧战带来了农产品的涨价和农业的繁荣。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爱尔兰人失去了反叛的理由。但是在现实中，自治的希望越来越小。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厄尔斯特志愿兵（Ulster volunteers）和保守党都已经投票反对自治，而且会继续投票反对。敏锐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看清了这一点，就和爱尔兰志愿兵（Irish Volunteers）一同接受军事训练，参加了新芬党（Sinn Fein），

其含义为“我们自己”的政党。其中最富斗志者，像皮尔斯、康诺利等人也参加了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IRB），这是一个秘密会社，在1917年便已暗中操纵了爱尔兰志愿兵组织。在他们看来，《爱尔兰自治议案》（Home Rule Bill），充其量不过内政自治那么点小意思；甚至还不能应用于整个爱尔兰，比起独立相差甚远。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爱尔兰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大多数的爱尔兰人，虽然内心中希望在得体和极端之间保持平衡，但也持有同样的要求。所以，足智多谋的皮尔斯和康诺利认为，一种似属愚蠢、空想的为国牺牲之举，将会把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炽烈热情释放出来。

他们两人都预料到复活节行动会失败，而且也会失去生命。但他们就是要以自己的牺牲就义，将爱尔兰人从恐惧和冷漠中唤起。温文尔雅的皮尔斯，是位诗人、教师和天主教徒，他酷爱爱尔兰的一切，将自己的牺牲比作基督在十字架上献身。争强好斗的康诺利，则是劳 736



1916年复活节起义期间，都柏林的大街上设立的路障（*Hulton/Archive*）

工组织者、社会主义者和新闻记者，他写着：“没有流血，就没有赎罪。”他使用赎罪这个主题，而不提社会主义的信条，使得天主教会和信徒都把这些人看作献身于爱尔兰的英雄。他们突如其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又在刹那间就义，避免了使许多其他革命运动遭到削弱的信条之争。从军事上看，暴动是愚笨徒劳之举；从理论上看，它是睿智感人的悲剧行动。它将现代史上最大的力量之一——民族情感释放出来。在临刑之时，一位志士慷慨地说：“爱尔兰表明她已经是一个国家。”

英国对暴动所做的反应，不但将反叛者变成英雄，而且也将爱尔兰人赶入了新芬党的怀抱。英国当局迅速将15名反叛者以谋反罪名处死，但有些人是无罪的。另外有一个义士——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爵士，因与德国合谋接济反叛，而被绞死于伦敦。对他的公开审讯，给了这位才华出众、勇敢过人的爱尔兰人以雄辩的口才呼吁民众为爱尔兰的自由而奋斗的机会。阿斯奎斯征询劳合·乔治的意见，后者召开了一个各党派联席会议来解决这问题。在会上，劳合·乔治秘密地用书写方式，答应了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将爱尔兰永远分为两部分的要求，却在口头上答应爱尔兰民族主义党领袖约翰·雷德蒙德（John Redmond）：分离只是暂时的。劳合·乔治也不肯立刻给予爱尔兰自治。这一拒绝断送了约翰·雷德蒙德的民族主义党，该党长期主张以议会方式争取爱尔兰的自由。在爱尔兰，新芬党越来得到人民的拥戴。

737

1918年4月，议会通过了一个愚蠢的法案，征募爱尔兰人参加大战。这就驱使许多爱尔兰青年投入了志愿兵和新芬党。5月，新芬党的领袖们被捕下狱，使新芬党向极端分子打开了大门。这场大逮捕是为了阻止一个在爱尔兰总督约翰·弗兰奇（John French）爵士脑子中幻想的德国阴谋。弗兰奇在佛兰德犯了大错之后，劳合·乔治将他派去爱尔兰再犯大错。他在任期间所实行的许多压迫，以及政府以往的许多错误，使反叛者成了爱尔兰英雄，还使新芬党在1918年12月的大选中赢得73个议席。新芬党议员赢得了厄尔斯特之外的全部议席，

只有新教的三一学院的议席除外。该党便都拒绝出席伦敦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而是在都柏林召开爱尔兰国民大会（Dail Eireann）。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皮尔斯1916年宣布成立的共和国。此举标志着爱尔兰独立战争的开始。

爱尔兰国民大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委任复活节暴动的指挥官之一埃蒙·德·瓦勒拉（Eamon de Velera）为总统，指定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主管内政、麦克尔·科林斯（Michael Collins）主管财政。科林斯同时也是志愿兵的指挥官，这时志愿兵已改组为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科林斯主管财政和军事，成了临时政府的实际领袖。瓦勒拉被爱尔兰共和军从英国监牢里救出来后，前往美国筹措了500万美元给临时政府。格里菲斯作为就芬党的发起人创始人，担当了打头阵的任务，总是敦促使用和平方式和争取拥护者。科林斯清楚只用和平的方法并不足以应付，临时政府得有权力，特别是警察和司法方面的权力，而这些权力掌握在英国人手中。1919年，临时政府成功地将警察和司法权收归己有。新芬党设立法院，组建警察部队，不再理会英国人控制的皇家爱尔兰警察部队(Royal Irish Constabulary）和法院系统。这种权力转移，如格里菲斯所希望的一样，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瓦勒拉到建议，建立在爱尔兰人拒绝效忠和与皇家爱尔兰警察部队和地方官划清界限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抵制方针，使得许多爱尔兰人辞职，削弱了这些军事力量和机构。但科林斯知道，光靠抵制还不够，所以他一开始就用武力对付警察部队和驻扎在中部的英军G师特工人员。

爱尔兰共和军地方部队的行动范围更大，例如1920年在索洛亥波(Soloheadbog)、丹·布林（Dan Breen）开始行动，协助夺取一车炸药，接着便埋伏、抢劫和逃亡。爱尔兰共和军确实使用了暴力，但在科林斯的控制下，暴力的使用还比较有节制和选择性。1919年，警察部队和G师被杀者只有18人。在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中，爱尔兰人采取了夺取武器、抵制行动和恐吓手段，但尽量减少伤亡。

目睹新芬党成了爱尔兰的实际统治者，劳合·乔治政府无法容忍

738 下去，派遣黑衫军（Black and Tans）和后备军增援皇家警察部队，将爱尔兰驻军增至5万人。黑衫军因制服而得名，他们是皇家警察部队的一部分。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的失业军人，多年的战壕生活，耗尽了所有的体面感，极为嗜好暴力。那1500名后备军是皇家爱尔兰警察部队的后备部队，也都是些退伍老兵。他们分成100人一股，到处搜捕爱尔兰共和军。这样，在爱尔兰共和军和黑衫军、后备军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恶斗。爱尔兰共和军的正规兵额有15000人，但实际能够随时投入战斗的兵员，只有大约3000人。他们的有利之处在于目标固定，这些目标就是那15000人的皇家爱尔兰警察部队和1500人大后备军，以及护卫队、弹药、营房、武器等。而皇家爱尔兰警察部队和后备军所面临的对手，则都是涂黑了脸的平民，而不是穿制服的军队。爱尔兰共和军伏击警车，焚烧营房，绑架警察和军官，夺取武器，切断通讯，谋杀对方的特工人员。他们使用暴力，但基本上能够遵守纪律。黑衫军和后备军则粗暴、野蛮多了，他们只知道敌人是爱尔兰人，所以任意报复，焚烧房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射击。他们烧毁科克市中心，袭击民户，将无辜的人民剥衣鞭打，使其屈打成招。他们随意违犯自己所宣誓遵守的法律。换言之，他们变成了一帮强盗。

在一定程度上，黑衫军是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杰作。丘吉尔在1920年10月6日说，他们（指黑衫军）“会把这些杀人的帮派（指爱尔兰共和军）赶尽杀绝”。劳合·乔治也抱有同感，他在11月9日说：“这次我们可以掐住这帮杀人犯的脖子了”。但这只是他们的幻想。麦克尔·科林斯的情报人员早已将英方G师特工的行踪报告给他。11月21日，这些情报人员在都柏林的酒店击毙12名英国特工。这些特工，无论对英方如何忠实，都是爱尔兰自由的敌人。那天下午，黑衫军在一场足球比赛中，枪杀了12名平民，其中没有一个是反英分子。11月21日这个流血星期日、科克焚城事件、后备军的强盗行为以及其他暴虐事件驱使爱尔兰人团结反英。尽管主教斥责暴力，忠实的天主教徒还是和爱尔兰共和军联手行动。宗教和民族主义——爱尔兰最强大的两支力量，就这样地联合起来了。

从复活节暴动以来，英国一直在骄纵傲慢的姿态和帝国主义的盲目驱使下，所描写的戏剧场景，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加纳和越南以不同形式重现。这就是一个为民族主义热情所激励的少数人能够驱使统治他们的帝国主义者采取严厉的行动，而这类严厉行动激起人民对这些帝国主义者更强烈的反抗。到 1921 年 7 月，虽然爱尔兰共和军在物质上几乎被击败，英国政府在心理和道义上却失败了：不但爱尔兰举国痛恨英国的统治，而且在英国，整个舆论界、教会以及自由党和工党也谴责英国的暴行。保守党把持的联合政府于是不得不低头向他们所斥为杀人凶徒的人言和，允许爱尔兰以自治领的地位获得独立，但不包括厄尔斯特的 6 郡在内。

劳合·乔治的顽固虽然延长了爱尔兰战争，但他的外交技巧帮助了和约的缔结，尽管他依然在里面要了一些花招。他赢得了科林斯和格里菲斯的信任，答应他们设立边界委员合，将弗马纳和蒂龙这两个天主教徒占多数的郡从厄尔斯特里面划出来。这样剩下的 4 郡经济力量十分微弱，就不得不与爱尔兰合并。然而像劳合·乔治以前的关于爱尔兰分离是暂时的诺言一样，边界委员会被证明是一种幻想。时至今日，厄尔斯特的 6 郡仍然处于分离状态。

739

劳合·乔治力劝爱尔兰人接受自治领地位，向英联邦元首——英王乔治五世效忠，允许英国保留若干权力。瓦勒拉及共和派激进分子反对这些让步条件，宣布重开内战。内战持续了一年后，瓦勒拉的共和派被打败。爱尔兰维持自治领地位直至 1937 年。当年，爱尔兰共和国成立，瓦勒拉出任总统。但对英国而言，1922 年是一个关键年份，那一年英国在都柏林 6 个世纪统治的日子宣告结束。这样，英国倒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困扰英国的诸多内政问题了。

阅读文献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这是一部记述战壕战斗泥泞和恐惧的打动人心之作，十分出色地运用了诗歌、回忆录和其他文学素材。

Paul Guinn, *British Strategy and Politics . 1914—1918*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该书考察了战争战略与内政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表明战略如何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国家生活状况。

Hart Liddel and Henry Basil, *A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London: Cassel, 1970. 在战略和战术方面，这是一部最佳的关于一战历史的一卷本著作，对打破悲剧性僵持状态的途径有高超的见解。

Lyn MacDonald, *They Call It Passchendaele* ,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78. 该书生动地记述了最为泥泞和伤亡惨重的战役，引用了600多位目击者的陈述。

Arthur Marwick, *The Deluge: British Society and First World War* , Boston: Little Brown, 1965. 该书从形式和精神上描述了从"情况如常"到全面战争的转变过程，内容包括：社会主义、车间里的妇女、征兵制和革命。

Leon O'Broin, *Dublin Castle and the 1916 Uprising* ,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66. 这是一部记述复活节星期一暴动的著作，突出暴动的民族主义激情、无畏的勇气和令人痛苦的失败，严厉抨击了英国。

Siegfried Sassoon, *Memoirs of an Infantry Officer* ,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0. 这是一本诗人的回忆录，以极为敏感和同情的笔触，探讨了这场严峻和残酷战争的深层因素。

Zara S. Steiner,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7. 在研究英国在战争起源作用方面，这是一部最为严谨的近作，特别强调公共舆论的作用。

A. 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这是牛津英国历史丛书中最为睿智和有独到见解的一部，观察问题锐利、富有想象力，偶尔不合常理，但是一本令人愉悦的有用读物。

740

Sir Llewellyn Woodward, *Great Btitain and the War of 1914—1918* , London: Methuen, 1967. 这是一部详尽的、广泛的概述战争的著作，内容包括西线、加里波利、巴格达、马其顿、日德兰战役和潜艇威胁。

第二十八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741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英国的生活多种多样且富于变化。在这万花筒般的生活方式里，人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老们享有沉闷的牧师教堂和玫瑰花园；摩登人士享受夜总会和查尔斯舞的乐趣；失业者陷入愁闷和痛苦；房地产商发家致富，喜气洋洋；商店职员举行喧扰的罢工；富裕的食客享用毕恭毕敬的侍者的服务；保守党、自由党、工党、共产党、法西斯分子和素食主义者则操弄各种政治。他们的生活节奏呈狂热状态，生活风格则令人生厌，不安全感与经济仇恨与或狂躁和贪婪交织在一起。20 世纪 20 年代受一次大战的梦魇之扰，30 年代则受担心下次大战的恐怖之扰。但比梦魇和恐怖还要深刻、更能确定两次大战之间人们心境的是英国经济的反常行为。

经济

1918 年至 1939 年，英国的经济有突发的繁荣，也有突现的衰退，罢工、恢复、崩溃、萧条和复苏，一个接一个，突如其来，无不出人意料，令经济学家摇头，使政治家惊慌。没有一个固定的词汇可以描述其潮起潮落和曲折迂回，除非我们用“不稳定时代”这样的字眼。商业循环的起伏不稳定，地理上的变化也不稳定。1919—1920 年、

1924—1929 年、1934—1937 年和 1939 年，是增长时期；1920—1924 年、1930—1934 年和 1937—1938 年，则是下降、危机和萧条时期。在英格兰的南部和中部，工业在扩展，而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工业则在衰落。经济情况对各阶层人民的影响，也是不稳定的，在 742 1931 年的失业者中非技术工人达 30.4%，而白领工人则为 7%。10% 的人占有国民收入的 42%，而有数百万人则依靠每周 29 先令 3 便士的救济金养活五口之家。不稳定的经济，令社会主义者宣布资本主义已经死亡，令资本主义者称赞自由企业使得英国快速复苏。在英国废置的船坞、无人的煤矿、一半停工的棉纺织厂和北部的生了锈的钢铁工厂里，资本主义在死亡；而中部的汽车工厂和伦敦一带的化学工厂、发电厂，却得到普罗米修斯精神之真谛。

两次战争之间的经济动荡，肇于战争结束后突发的经济繁荣。1919 年，人们拿出他们的战时储蓄来购置战时买不到的东西。被激活的市场又刺激了企业扩张。这些企业所雇佣的工人，大部分是退伍的士兵，口袋里有退伍金，这又增加了对商品的需要。在这种虚妄的繁荣之下，许多资本家进行不够精明的投资，特别是投资于纺织、钢铁、造船和工程等已经过于膨胀的工业门类。他们的投资进一步扩大了以上工业门类的生产能力。其中一些新的大公司是以虚高的股票为基础合并而成。这场繁荣，一年之内就将物价提高 10%。因为工资落在了物价后面，于是 1919 年至 1920 年间，便发生了约 2000 次罢工，参加罢工工人达 250 万。到 1919 年底，实际工资约为 1914 年的 67%—118%，这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现象。

英国政府助长了经济繁荣，一方面，将大量资金用于住房建筑、国民教育和国民保险计划等项目；一方面，又宣布放弃金本位。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持，英镑汇率由 1 英镑兑换 4.76 美元下降到兑换 3.50 美元，贬值的货币反而导致经济的活跃。如果恢复金本位制，政府就需要减少英镑的供应量，进而降低物价和抑制繁荣。然而，对于正统的金融学家而言（几乎所有的金融学家都很正统），赤字支出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1920 年政府遂大量裁减开支。世界市场也突然

崩盘，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顿时丧失。到1922年，物价已从1919年的高点下降20%，失业率增至18%。英国于是进入一个衰退时期。

这次衰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所遗留的影响也有重要关系。战争摧毁了英国商船1/3的吨位，使英国的铁路和制造业缺乏改进的资金，也使英国本应投入汽车工业和电器工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了坦克和炸药的制造，结果让美国在汽车工业和电器工业的规模生产方面在世界上取得了无法超越的领先地位。此外，英国还有很重的战争债务，其海外投资损失率达10%。此外，英国还损失了在南美洲和亚洲的市场，这些损失使美国（而不是英国）成为世界商业和金融的中心。

战争以外的其他因素——其他国家的有效竞争、高关税和农产品及原料生产国购买力的下降——也可以解释英国战后的经济困境。这些国家有不少是大英帝国的成员，它们一向都是英国货物的买家。随着世界物价的跌落，这些国家购买英货的能力也同样下降。

但是，英国所遭遇的麻烦，还不止于市场的衰落。英国的大工业丧失了世界市场的巨大份额。一些工业，如产煤业由于效率低下丧失了市场份额；其他工业，如棉纺织业和造船业则由于不可避免的世界竞争而失去市场份额。在煤炭生产方面，英国未能仿照荷兰和德国对采煤面实现机械化和合并化。自1913年至1936年，英国煤炭工业的生产效率才提高28%，而荷兰提高了112%，德国提高了81%。难怪英国1929年的煤炭出口比战前水平下降18%。虽然棉纺织业、造船业和钢铁业的效率更高，但同样也失去市场份额。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不仅满足自身需求，而且生产世界所需的大量棉布。而且，希腊和意大利制造船舶，美国和德国冶炼巨量钢铁。因此，虽然英国造船业的效率提高，但在1938年建造的船舶吨位，只有1913年100万吨产量的一半。同样导致英国传统大工业的相对衰落的事实是：并非所有企业都作了足够的改善：一些棉纺织厂坚持使用旧式的“骡机”，而不使用效率更高的“铃机”（ring）；钢铁厂仍用平炉而不用更先进的托马斯炼钢法。

743

英国政府也没有想什么办法来阻止这些老工业的衰退。1921 年，政府匆忙废除对煤矿的战时管制。劳合·乔治通过大量增加工资收买了矿工们，用补贴收买了矿主。但他这样做不过是拖延时间。他组织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煤矿工业，其目的也是拖延时问和避免罢工。约翰·桑基（John Sankey）爵士任委员会主席，他是一名法官，赞成将煤矿收归国有，委员会成员构成保持了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包括矿主、工商界人士、工会官员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委员会以 1 票的多数建议实行国有化。劳合·乔治拒绝了委员会的建议，将煤矿退还原主。从 1922 年至 1924 年，煤矿工业因为有政府补贴，又值欧洲市场对煤的需求增大，所以相当繁荣。可是到 1925 年时，灾难降临了，因为欧洲大陆的煤炭生产增加，同时英国政府又恢复了金本位制。

恢复金本位，意味着英镑纸币的持有者可以兑取黄金。不但如此，政府规定实行战前每英镑兑换 4.86 美元的汇率而不是此时每英镑兑换 4.40 美元的汇率。这样提高英镑币值，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才能购得等额的英镑，换言之，就是要更多的法郎和马克才能购得等量的英国煤。英国煤价格战法国和德国上涨，销售量下降。英国矿主们于是想通过降低矿工工资并延长工作时来降低煤价。矿工们坚决反对，他们的领袖们反复讲道：“工资一分不能少，工时一分不能多”。

1924 年，斯坦利·鲍德温第二次出任首相（第一次为 1923 年），也于 1926 年拒绝延长政府对煤矿的补贴。尽管矿工的工资已经低到只够维持生活的程度，矿主们还是宣布降低工资。矿工们所面临的困难推动了其他工会出面给矿工们以援助。自大战发生以来，各个工会认识到团结的必要性。甚至一向主张实事求是的工会领袖们，也在大谈特谈阶级斗争。自 1910 年至 1920 年，工会会员由 250 万人增至 800 万人，但自 1920 年至 1926 年又减少到 550 万。鲍德温的声明说，为了英国的利益，所有的工人都应当降低一点工资。这一点也没有减少他们的担心。越来越多的工会领袖声称要来一次支援矿工的同情大罢工。铁路工会、运输工人工会和矿工工会这三大工会的三角联盟，早就有这个意思。1925 年，同情罢工的威胁迫使鲍德温延长煤矿补贴，

7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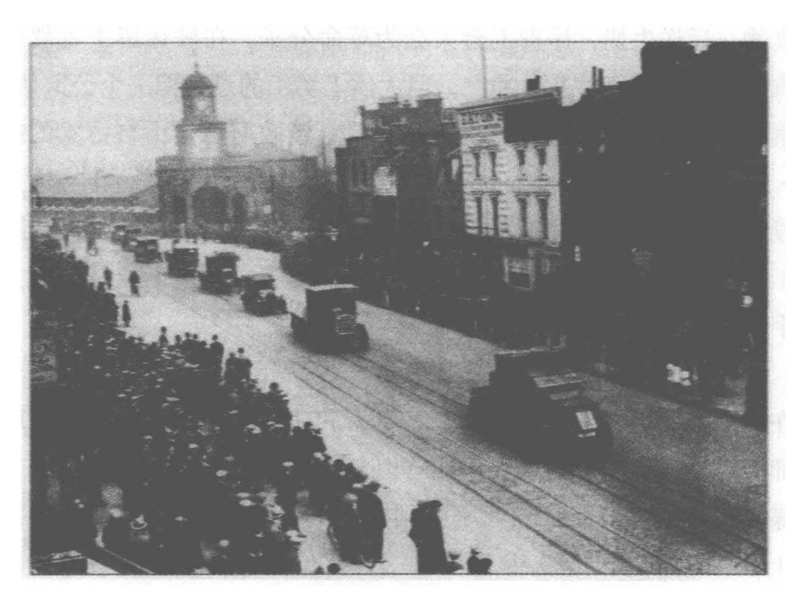
维持了矿工工资水平。这一胜利对总罢工的计划产生了莫大的鼓励。对于支援这些自1900年以来实际工资一直在下降的矿工来说，除了总罢工，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矿主决定减少矿工工资和增加矿工工作时间，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场危机最终驱使政府与英国工会大会（英国职工大会）领导人举行谈判。1926年5月2日，曾停止政府对煤矿的补贴、对矿工减低工资也未采取任何行动的斯坦利·鲍德温，宣布双方谈判破裂。

第二天，英国举行了第一次总罢工。印刷工人、钢铁工人、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公共汽车和运货卡车司机、化工业、金属业和煤气业工人全体罢工。其他行业的工会也宣布参加，但不是所有工会都参加这次罢工。工会领袖们宣称他们不要扰乱社会，不要推翻宪法，不要发动革命，他们所要的仅仅是支援矿工。但是，总罢工的效力，就好比挥动铁匠的大铁锤去击打一只跳蚤一样。工会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准备对抗方面，政府作了精心准备，而工会却疏于准备。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中产阶级志愿人员担任卡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分送食物、运送牛奶，斥责工会大会为革命分子。在破坏罢工者驾驶公共汽车时发生过一些暴力冲突，但大体上罢工的过程像一个公共假期，警察与罢工工人一块踢足球。5月12日，经政府承诺由自由党的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爵士寻求公平的解决办法，工会大会方面投降了。矿工们继续艰难困苦地坚持罢工6个月，最后也认输了。矿工被迫在工资减少、工时延长的条件下复工。煤炭工业是英国大工业中问题最大的一个，但政府却不肯给予援助。

1924年之后，英国经济缓慢复苏，1927年复苏加速。复苏不仅发生在新兴工业部门，如汽车制造、电力和化工，而且也发生在传统工业部门，如棉纺织、钢铁和造船。但复苏还不足以完全恢复问题重重的煤炭工业，也不能将失业率降到10%以下。到1930年，这场复苏停止了。麻烦始于1929年10月24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当时投资者发现投机买入行为已将股票和债券的价值抬得过高，于是突然抛掉1300万股，泡沫随之破灭。企业信心一落千丈，工厂倒闭，失业剧

增。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波及全世界，到处物价狂跌。其中，生产食品和原料的国家受害尤大，因而购买英国制成品的数量大大减少。德国曾向英国大量借债，此时发生银行倒闭，连带使人们对英国银行和英镑的信心受损。英国工党政府于 1930 年放开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到 1931 年发现，因失业大增，政府预算出现巨额赤字。这些情形使得持有英镑的外国人惶恐起来，于是用英镑兑取黄金。1931 年 7 月，从英国银行流出的黄金为每天 250 万英镑。按这个兑换量，英国不久将被迫放弃金本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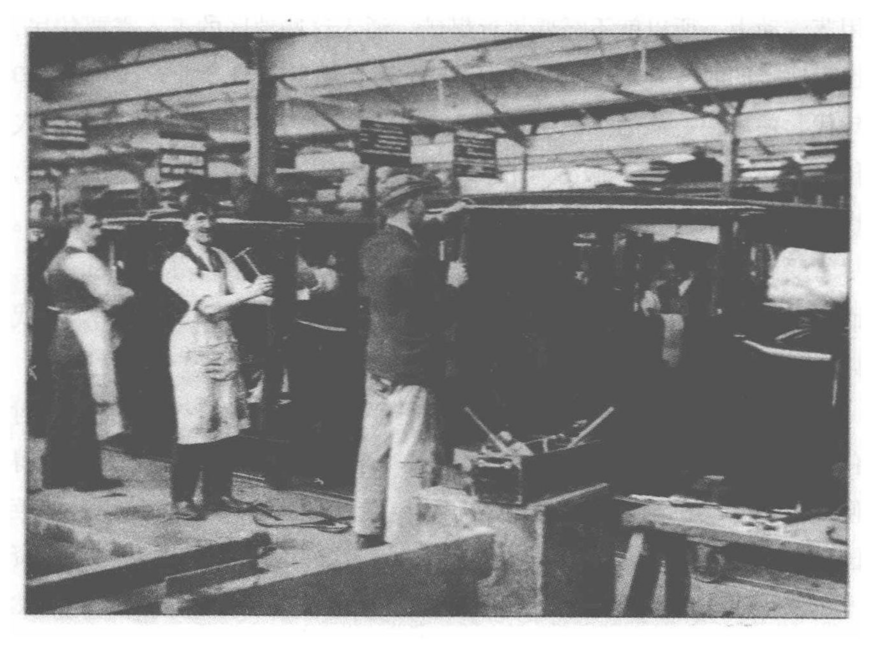
745 8 月，英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发生，导致工党政府的垮台。一个国民政府为了维持英镑的币值，不得不大幅度削减预算，包括削减海军水兵的军饷。由于大部分水兵的收入仅仅在贫困线之上，所以减饷迫使因弗戈登号的水兵发动兵变。虽然兵变很快得到平息，但进一步重创了对英镑的信心。9 月 21 日，就在工党领袖宁肯放弃工党政府也不肯放弃金本位制的 4 个星期之后，国民内阁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从此英镑不再能直接兑换黄金，英镑汇率跌落到 1 英镑兑换 3.80 美元。



一辆装甲汽车在总罢工期间护送运载食物的货车（*Hulton/Archive*）

这场金融危机对工商企业信心的打击如此之大，以至于投资额暴跌，失业人数猛增至近300万人。这样，大萧条像一场大风暴将英国卷入其中。1934年，英国经济开始恢复。恢复也和崩溃一样不可捉摸，任何人也不能控制。英国政府被迫维持已经贬值的英镑。工党政府的殖民大臣、饱学之士西德尼·韦布（Sydney Webb）凄然地说："没有人告诉我们可以那样做。"事实上，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建议英镑贬值，认为低值货币可以刺激经济繁荣。但1931年以后已贬值的英镑的流出，并不是由于凯恩斯的建议，而是因为政府得到了一个偿付战争债务的大好时机。政府发行的债券，利息一直为5%。通过将银行利率降低到3.5%，政府就可以大大减轻还债的负担。 746

银行的低息资金，促进了对产业生产的投资，包括汽车、巴士、收音机、留声机、人造丝、照相机、胶卷、飞机、各种电器以及化学品和铝的生产。新发明和改良也给许多人带来繁荣。例如收音机



装配线应用于英国汽车制造业（*Douglas Miller, Hulton/Archive*）

的奇迹值得关注：1922年，收音机才36000台；到1929年，达到300万台。收音机需要修理，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开起了修理店。收音机，如同其他电器像电灯、电炉、冰箱。吸尘器等，都需要使用电力。1920年用电者为73万人，到1939年，达到1000万人。由于电动机比蒸汽机具有更好的机动性和效率，所以工业也需要使用电力。发电业的发电量每年增长10%，与汽车的增长率相当。1914年，使用电力的英国家庭寥寥无几，英国总共只有38.7万辆汽车、巴士和卡车。到1939年，77%的英国家庭使用电力，道路上行使的各种汽车有300万辆。生产这些汽车需要大量的钢铁、木料、玻璃、油漆、铝、黄铜和铜，于是，许多工厂得以兴建，专门生产这些原材料。

747

生产人造丝的工厂也一天天增多，产量每年增长15%。英国很快就占世界人造丝产量的27%。染料的生产每年也增长5%。这些新工业，大部分分布在伦敦周围和中部地区，因为可以使用电力而不再使用蒸汽动力，所以就不需要靠近煤矿。涌入这些地区的工人需要住房，因为房租的收入比股票债券高，于是资金便流向房产业。20世纪30年代，住房建造最为热门，在政府补贴的资助下，房产业兴建了私人住房250万个单位。服务业，如餐馆、旅馆、干洗店以及娱乐场所，也都兴旺起来。与英国北部的空船坞不同，南部出现了巨大的繁荣。尽管受到萧条的影响，1924年至1935年的工业增长率平均为2.7%，而自1929年至1937年，人均收入增长了13.7%，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这里所谓的“人均”，并不意味着平等。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代，13.7%的增长并非由所有人均分。如矿工和棉纺织业工人的所得便远远少于飞机制造和汽车制造工人，更少于那些大卡特尔——如英国钢铁公司和帝国化工公司的管理人员，这些大卡特尔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操纵于少数人之手。而且，失业者也没有从中得益，他们依然是这个贫富极其不均的社会中主要的社会问题。

失业、贫困和不平等

1920 年，英国经济还充满着希望和繁荣，可是失业问题降临到英国头上，持续长达 19 年之久。到 1920 年 12 月，失业人数为 100 万；6 个月之后，失业人数增至 250 万。在整个 20 年代，失业人数从未降到 100 万人以下。1933 年，失业人数增加到将近 300 万，即每 4 个有保险的工人中有 1 个失业。直到 1939 年，失业人数还有 160 万。这是一个所有政府都无法摆脱的咒语。这也是一个笼罩在近 300 万人头上的咒语，这个数字是根据 1933 年的官方数字，如果连他们的家属，受影响的人数还要再加 600 万以上。此外，英国还存在着非官方认定的失业者——如乡区的无业游民，伦敦街头的流浪汉、乞丐，在马场或赌场以蒙骗为生的人，以及那些拼命装出正人君子气派、挨户去推销杂志报纸或任何可以登门销售商品的推销员。

失业的痛苦也降临在各个城镇。例如在蒂斯河边的造船重镇贾罗（Jarrow），68% 的造船工人失业，镇上店主员工的收入也大大减少。失业者的邻人和亲戚，也深受失业之苦。整个贾罗城，都呈现了衰败的景象。满目空无工人的船坞、关了门的钢铁厂、门窗钉上了板子的店铺和一排排瓦破垣颓的住房。73% 的工人都加入了失业大军。街头巷尾，垂头丧气的失业者无精打采地徜徉着。这个人口 35000 人的小镇，并不是英国东北部唯一的工业坟墓。在英国东北部两条主要河流泰恩和蒂斯河岸，大多数的船坞、钢铁厂和煤矿停工，失业的人数达 16.5 万。这个地区已经有了“贫困区”的标签，类似的地区还有南威尔士、西昆布兰和苏格兰工业区。在南威尔士的朗达，20 万矿工中有 10 万失业。这个 50% 的失业百分比，也适用于格拉斯哥。未标“贫困区”的地方也同样蒙受苦难，例如兰开夏郡的布莱克本，这个棉纺织重镇有 28% 的工人失业，其中半数是已失业 5 年以上。

748

1921 年，英国议会为应对失业问题的挑战，决定大幅度扩大《国民保险法案》（National Insurance Act）的范围，规定：除了政府和雇



贾罗的失业者向伦敦进军（*Hulton/Archive*）

员之外，所有大企业的雇主均要向保险供款。失业工人每人每星期领救济金 15 先令；其妻 7 先令，小孩每人 1 先令，每户可领 26 个星期。法案实行后，因长期失业的人太多，失业金一下就被领光，有关 26 周失业金的条款成了一个笑柄。这样，政府只得发给失业者“过渡款”(transitional payments)。其办法是，凡领取过度款者，必须亲自前往当地的公共救助委员会（Public Assistance Committee，PAC)，逐一回答关于本人或本家庭的所有收入状况的问题。1928 年之后，那些不享受国民保险者，也必须到该委员会领取济贫金（poor relief)。在 19 年里，这些救济款项，而不是公共工程，为失业者提供救济。这是一个救济的时代。

749

1931 年，由于当时的金融危机，失业救济金削减 10%。这时公共救助委员会不但降低救济金标准，而且规定救济金领取者如家中有人有另外收入，必须将数额再行减低。该委员会调查家庭收入，

进行所谓“贫困认可”，引起大家的怨愤。这种调查侵犯了私生活，妨碍家庭生活。子女必须住到外面的廉价房间，祖父母必须搬出（或被赶出），住入合住公寓。这样，子女的20先令工资或祖父母的10先令养老金，就不会妨碍家人领取十分需要的公共救助委员会救济金。

大批工人的长期失业，对于数以百万的国民生活而言，是一场悲剧。大多数人遭受物质上的痛苦——食物缺乏营养、居处污秽、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利物浦有一四口之家的失业户主说，“我们早早上床，这样就不会饿得难受。”就是这户人家，因为放不下面子搬出他们中产阶级的公寓，所以只有靠面包、人造牛油、土豆、淡茶充饥，偶尔吃一顿热菜。别的人家都搬入狭小的地下室，光线和空气都不好，家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破椅，好一点的家具都卖掉或者当掉了。利物浦的数千户失业人家都挤住在久已宣布为不适于人居的地下室里。成千上万的单身汉，都合住在公共宿舍里，每人一张床位，其中一些人跑到街上去弄点东西吃。到领钱的日子，也许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如炸鱼块和薯条之类，或者来一客甜食。有一位失业者说，“领钱的日子，或下一天，是唯一可以一饱口福的日子，余下的日子就只有面包牛油了。”有些主妇极力减少自己的餐食，为的是让做工的丈夫吃饱和保持子女的健康。她们自己由于缺少营养不免憔悴消瘦，甚至患上疾病。

失业者心理上的痛苦比物质上的痛苦还要深重。领救济金过活，是有伤体面的事。有30年勤奋、稳定和诚实的工作资历的人们，一下子变成了没有用的、无事可做的闲人，令人颜面尽失。失业者并不是懦弱无能之辈。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就业的时代，他们的工作打破了生产记录。工作给他们以骄傲，给他们以归属感，正像他们中的一位所说：“当你有工作可做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也为帝国尽了你的一份力量。”工作也可以避免无聊，没有工作往往度日如年，消磨这样的日子与忍受严寒冷一样难受。失业者为逃避空乏的时光和严冬的寒冷，就涌向公共图书馆和电影院，在听公开讲演时打瞌睡，

或上贫民安置所，加入失业者俱乐部，与人海聊一番，或对足球比赛下赌——一种愚蠢的花费，但这是他们逃避绝望的唯一方法。

长期的失业也会产生冷漠心理。许多工作工资之低、条件之苛，使人的这种心理更加顽固。为什么到矿上工作呢？矿上每 6 个矿工中每年就有 1 个受伤，而且多数矿工会染上眼病或肺病。为什么要去到棉纺织厂上班呢？厂里原来每人管 3 架机器，到 20 世纪 30 年代变成每人管 6 架。为什么要当矿工或棉纺织工呢？有 4 个孩子的父亲的救济金不是等于 1 个矿工或织工的工资吗？

750

遭受贫穷的不只是失业工人。工资收入不够生活和养老金不够生活的人，都在贫穷之列。矿工每周的 45 先令工资和织工每周的 48 先令工资，虽然低于大部分别的工种工人，但假如他们终年不缺勤一日，就仍可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在 1930 至 1938 年间，这是很难做到的。据《棉纺织厂时报》（*Cotton Factory Times*）的报道，成千上万的织工，一周才领到 15—25 先令；一位矿工工会职员说，在北部煤矿



1925 年，失业者在一个职业介绍所前排起长队（*Hulton/Archive*）

里，有2/5矿工每周只领到30先令现金。农业工人每周工作48小时，工资35先令，差不多一样贫穷。矿业、农业和纺织工业是英国雇佣工人最多的三大行业，按工资来说，这三个行业的大部分工人处在贫困线以下。然而，他们的情况尚较年老贫苦者为佳，年老者的养老金每人每周才10先令。保守党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说，他认为养老金不足以使老年人“完全独立过活”。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也赞同这种说法，他说失业救助 751 “绝不是一份维持生活的工资”。这样，贫穷的老年人便与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打短工者和低工资收入者一起，住着破旧不堪的房子，吃着缺乏营养的食物，在健康状态欠佳之中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

但是贫困是一个相对的观念。20世纪30年代的贫民比维多利亚时代的贫民过得好，更不用提都铎王朝的流浪汉和诺曼时代的农奴了。193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伦敦东区贫困人口的比例，只占查尔斯·布思1900年所发现比例的1/3。下层社会人们吃的鱼多些，消耗的土豆



诺丁汉的贫民窟（*Douglas Miller, Hulton/Archive*）

多些，喝的茶多些，衣服穿得好些，水管条件也有改善。但是他们也知道富裕人家比他们的餐食好得多。富裕人家，或者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住的房子也要舒服得多。不仅城郊的别墅和伦敦的公寓装有电炉、电灯和最现代的浴室、厕所，新近建成的中产阶级的住房和城市修建的供固定就业者居住的住房也都有这些设施。配有插图的杂志和影剧院令富有者生活舒适安逸。长期住在没有自来水、洗洁水槽和排污水管的房子（伯明翰有1/5是这样的房子）的居民，当看到装有标准浴室的样板房时，心中是多么的苦涩。伯明翰的住房有1/3是没有自用厕所。格拉斯哥和利物浦贫民区的情况更糟，而北牛津郡的14个村庄，只有6个装有自来水。富裕人家房间宽敞，中央供热，拥有冰箱、吸尘器和精美家具；穷人只能挤住在窄小的房子里，房顶漏雨潮湿，墙壁剥落，虫蚁泛滥，供热只有一个煤炉，而且用来煮饭烧菜。1931年，英国两人以上合住一室者占35%，三人以上合住一室者占15%。这种情况比维多利亚时代还要严重，但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减少，然而与中上层人家漂亮的新居相比，仍然形成鲜明的对照。

752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社会学家没法用统计数据来更加客观地衡量贫穷。研究食物和营养的学者约翰·博伊德·奥尔（John Boyd Orr）爵士发现，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膳食结构中，各方面的营养都不足——包括热量、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他还发现全国儿童的1/4处于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层次。收入稍高的另外20%的人也营养不良。他们膳食中的面包和土豆过多，导致软骨病、肺结核、贫血症、发育不良和牙齿不全。没有牙齿成为贫穷的特征。

两次大战之间，英国人的身体健康有了改善。国民保险计划为1900万工人提供了医疗服务，死亡率降低了，传染病减少了，青年身高增加了，而医药在这个时候也有了惊人的进步。到1931年，预期寿命是58.7岁，而1870年时仅为40岁。可是，这些改善也不是划一的。国民保险只保了一半工人，且不包括他们妻子和子女。贫困区内肺结核患者比南部高一倍，朗达煤矿城镇的死亡率要比乡村地区的剑桥郡高一倍。贾罗婴儿死亡率比全国的平均数高一倍。婴儿只有1/4

是在医院出生，其余均在家里出生。健康与医疗，像住房与食品一样，反映了英国社会最基本的事实——不平等现象。

英国社会的不平等，深深植根于过去，其基础是财富分配不均和严格分层的教育制度。1929 年，占人口 2.5% 的富人占有全国财富的 2/3，1.5% 的最富的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 23%。而处在下层的占人口 2/3 的人——工薪阶层——才占有国民收入约 1/3。即使在工薪阶层中间，收入也是不均的：印刷工人每周工资 75 先令，农业工人只有 35 先令；铁路工人每周工资 68 先令，纺织工人只有 50 先令。而在各行业中，男子的工资比女子高一倍。分配虽然如此不均，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有走向平等的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在工会的兴起、福利国家制度的肇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充分就业之上。1913 年，国民收入只有 3% 用于社会服务，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则增加到 10%，但这 10% 的比例在 30 年代里增加甚少，而且没有平均地分配给所有贫困者。约有 1/3 的贫民根本得到任何社会服务。

英国的教育制度，通过将学校分成三等，加深了阶级之间的鸿沟。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约占全国儿童的 6%，他们到收费昂贵的所谓“公学”（public schools）如伊顿公学（Eton）和哈罗公学（Harrow）读书；中产阶级人家送他们的子女到收费不低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s）读书；而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子女到 13 岁方有机会接受教学质量较差的初级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政府为这些人家的 11—14 岁的少年提供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法律规定，文法学校 25% 的名额应留给初等学校（elementary schools）里参加了免费升学考试（Free Place Examination）的成绩优秀者。其余名额需交费用，大部分工人阶级家庭能无力负担，因为这类学校具有半私立性质，收费很贵。工人阶级子女要通过免费升学考试，殊非易事。在伦敦的 7 个最贫穷的街区，每 1000 名学生仅有 13 名能通过这种考试而取得文法学校的奖学金。其余学生，只能留在初等学校里，直至年满 14 岁，所学内容甚为有限。文法学校录取全国 11 岁儿童的 14%，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子女，入学后的课程有现代语

753

言、数学、历史和科学。这些学生出来后约有86%进入工商界或稍次的行业，将成为会计师、律师、职员和公务员。只有14%的毕业生升入大学。

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是要保持那些在公学中养成的上层社会意识和友谊。公学毕业生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然后进入议会，进入伦敦的四个法学院，担任政府高级文官，出任陆海军军官，挤入财经界顶层，参加伦敦最高级的俱乐部，或在政界担任保守党、自由党会工党的领袖人物。英国不同的教育体系塑造了三个不同世界——统治阶级；工商界人士及专业人士；工薪阶层。从这三个世界，产生了英国三大政党——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所需要的选票的政党领袖。这三大政党之间的地位转换成为英国政治的基本问题，这是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然后才有可能去设法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工党的兴起和自由党的没落

1910年，当自由党以275名议员成为下院的最大政党的时候，工党仅有40名议员。1924年，当工党以151个议席（仅次于保守党的412个议席）成为第二大党的时候，自由党则仅有40个议席了。在14年里，自由党丧失了左翼领导党的地位。而工党的选民票数已达550万，成了保守党的第一对手。在同一时间里，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取代民主党的企图却遭到失败。在欧洲大陆，各国的社会党，或被法西斯党压倒，如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或处于弱小地位，如在法国。

英国工党之所以成功，有四个重要的原因：与工会大会的联盟；自由党思想体系的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阿斯奎斯与劳合·乔治的争斗。前两个原因，在大战之前就已出现。有些史学家相信，这两个原因的影响重大，以至于到1914年时，自由党已经穷途末路。1899年工会大会投票决定，在经费和其他方面支持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这对在工人阶级选区竞选的自由党候选人构成莫大威胁。在世界最大的工业化社会里，工会组织决定与工党结盟，使得工党力量的增长呈不可阻挡之势。

754

许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约占人口的3/4——也对一个与个人主义的精神和自由经济的原则太密切的自由党不太信任。而自由党人则对工党在补选中屡屡获胜感到震惊，在1908年到1911年间，他们也推动集体主义，实施养老金、工资评议会、职业介绍所和国民保险等。但自由党并没有继续推进，对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不置可否。直到1918年，这种状况依然如故。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自由党没有好处。它不但阻遏了更注重集体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并且将工党的主要基础——工会会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1918年法案》将选举权授予所有21岁以上的男子和30岁以上的妇女，也使得工人阶级的选票得到了决定性的增长，极大地增强了工党的力量。一战还摧毁了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的一些主要支柱。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所基于的信念是个人自由、自由贸易、世界和平、民主制、道德和进步等。这类信念都与战时赢得胜利所需的团体精神、利害得失、兵不厌诈和沙文主义水火不容。大战显露了阿斯奎斯的懦弱和劳合·乔治的领袖天才，因此就把自由党分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战也加速了宗教的没落，特别是反国教派的没落，而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自由党的主要支柱。1918年，自由党再也无力阻挡阿斯奎斯强烈的虚荣心和劳合·乔治毫无道理的野心。

阿斯奎斯的虚荣心虽然是以上两种破坏力中较弱的一种，但仍然足以损害。他愚蠢地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弗雷德里克·莫里斯（Frederick Maurice）爵士对劳合·乔治的一项指控，即后者在驻法英军人数问题上撒谎。但他更大的错误，是没有敦促劳合·乔治领导自由党夺取大选的胜利，虽然这是人之常情。劳合·乔治的政治野心远在对自由党的忠心之上，根本不管他能否领导自由党取胜。他在乎的只是保守党人愿否与他继续维持战时联合内阁。他的权力和声望此时正如日中天，于是他同意进行联票大选。结果在选出来的议会中，仅有28名独立的自由党议员，其数量少于63名工党议员。工党于是成了主要的反对党，并批评劳合·乔治向拥有335个议席的保守党低头。1920年劳合·乔治向保守党让步，将国家预算裁减

了1亿英镑，这就大大减少了政府用在教育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和在失业救济金和职业介绍所方面的经费。他甚至取消了1909年他的人民预算中开征的土地税，还答应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许多措施，像他在爱尔兰的镇压行动一样，都触怒了无数自由党选民。到1922年，保守党开始对劳合·乔治感到厌倦。当他极力主张搬兵前往达达尼尔海峡以南支持希腊人抵御土耳其人的时候，保守党议员们变得难以控制起来。随后，劳合·乔治提议再来一次大选继续联合政府的任期，保守党人便起来造反。10月19日，保守党人在卡尔顿俱乐部将他罢免。后来任保守党首相的斯坦利·鲍德温是当时主张将他赶下台的人中的一个。鲍德温承认，劳合·乔治是有能量的人，但他的这种能量是可怕的东西，难道它不是"将自由党弄垮了吗"？

755

在10月下旬的大选中，新首相博纳·劳领导保守党取得了胜利，取得的345席，大大超过自由党的116席和工党惊人的居第二位的143席。博纳·劳患了癌症，于是在1923年5月辞职，属意斯坦利·鲍德温接替他的位置。鲍德温宣布举行新的大选，结果保守党取得258席，工党取得191席，自由党取得158席。1922年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的正式言和，并没有使多少人感到信服。劳合·乔治有思想，有感召力，也有钱（有些钱是他出售荣誉头衔得来的），而阿斯奎斯则掌控了自由党的组织机构。阿斯奎斯自己承认，人们将自由党的团结视为是闹剧。自由党党员对自由放任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上的混乱感到困扰。同时，自由党的根基薄弱，因为工人越来越转投工会所支持的政党，而有产者则认为保守党是维护他们和对抗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所以到1924年时，自由党不再是一个可以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政党。英国的主要左翼政党是工党，因此在1924年和1929年，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出任首相。

两届工党政府，均无突出的内政建树。第一届工党政府只是通过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住房法案，并增加了教育经费和失业救济金。《住房法案》（House Act）是政府的中心工作。这个法案授权财政部，对各地的市政委员会和郡政委员会每建一个单位住房，每年拨款9英镑，

共支付40年；这些委员会亦应每年补贴4英镑10先令；所建住房应符合政府规定的面积及卫生标准；每星期所收租金不得超过9先令。这个法案推行的结果是增加了廉价住房50万个单位。第二届工党政府执政时间较长，但成就却不多，主要有：增加了失业救济金，并将领取办法简化；规定缩短煤矿工人的工作时间；设置农业市场局和煤矿委员会，以确定有关额度；提供贫民窟费清除补助金和公共住房建筑补助金。但工党政府并没有废除遭人痛恨的《劳资争议法案》（Trade Dispute Act），也没有减少数百万的失业人数或贫困现象。拉姆齐·麦克唐纳更关注的是显示工党政府能够有尊严地行使统治权，而不是推行与他的维多利亚式自由主义相容的社会主义。

工党政府也没有成功应对1931年金融危机。政府不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新经济理论，虽然政府曾请教凯恩斯，收到了他的意见，但予以拒绝。工党内阁尽力维持金本位，办法是拼命裁减支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内阁会员怀疑过究竟一个平衡的预算是不是必需的，没有一个工党大臣主张赤字开支或实施公共工程。在财政问题上，内阁成员都遵奉维多利亚式的信条。而使工党内阁产生分裂的，是关于将失业救济金降低10%的提议。该提议使最穷的那部分人更穷，缺乏道德上的合理性。工会也对此感到愤怒。就为着这个枝节性的但引人关注的问题，工党政府倒台了。工党未能缔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对世界经济萧条毫无办法。 756

这两届工党政府未能有所作为的原因甚多，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是，这两届政府都是少数政府，须依靠自由党的投票支持。1924年政府倒台起因于自由党提出的一项指责：工党政府撤销对一个共产党编辑的指控。这也是一个枝节问题，但触及了使工党难于处理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英国盛行的恐共症。保守党的报纸借人民的恐共心理，攻击工党政府在外交上承认苏俄，并与之缔结商约的做法。10月大选之前4天，保守党报纸公布了季诺维也夫函件（Zinoviev Letter）。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写了封信给英国共产党，号召他们起来革命。这封信大概是捏造之作，其对这次大选的影响尚难估计，但报界

巨头利用1924年人们的恐共病，却对工党完全不利。

另外有三个原因都是工党的内部问题，也妨碍了工党的执政：本党的成分不够纯净；缺乏一致的观点；拉姆齐·麦克唐纳本人出现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工党是由一些互有成见的团体组成的联盟，缺乏执政经验。这些团体的背景不同，抱负相异：来自独立工党的社会主义教条主义者；年纪很大、心胸狭窄的工会官员；以改造社会为志向的费边社成员；还有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迷梦前途的理想主义者、合作社社员、工团社会主义者、禁酒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当然，英国的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但其社会主义却是空洞无物、尚未成型的社会主义。工党认为社会罪恶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一旦资本主义被废除，社会罪恶便会消失。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遥远的愿景，党的领袖却因此而忽略实际的难题：如何编制预算、如何解决失业和如何振兴工业等等。在大部分工党党员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的愿景，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但这个愿景却包含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因素。比阿特利斯·韦布（Beatrice Webb）仍然担心毫无限制的救济会促成懒惰。财政大臣菲利浦·斯诺顿（Philip Snowden）是工党的支柱，不赞成大规模开支和大笔赤字的政策。而麦克唐纳则称“把国家作为慷慨的阔太太”是保守党的看法，而用政府开支来降低失业是“欺人之谈”。

拉姆齐·麦克唐纳是一个农工的儿子，1866年生于苏格兰。他是在苏格兰个人主义和凯尔特浪漫主义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年青时，麦克唐纳前往伦敦，以燕麦、茶和兄弟情谊过日子。他个子修长、相貌英俊，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才能，在1900年就担任了英国工人代表委员会的秘书，1906年当选议会议员。他是和平主义者，大战之中因此而丧失议会议席，并遭受许多辱骂攻击，但这些到1922年反而使他成为英雄，并当上工党主席。在威严的外貌里，麦克唐纳蕴藏着一种矜持、羞涩而相当天真的个性，颇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他的辞令充满了理想主义，富于同情心；乐于与富裕阶层和贵族人士来往；1911年丧偶之后却变得郁郁寡欢、不喜交游。他对经济学所知甚少，

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列宁称他的思想“是英国工党人物拿来掩饰他们布尔乔亚出身的幌子，是那种油滑而空洞的貌似社会主义的腔调的最佳例子”。 757

麦克唐纳的维多利亚式道德观和经济观，促使他去替财政部官员和银行家的资本主义主张辩护，反对他自己的党，力主减少失业救助。这个悲剧性的错误对当时的经济情况毫无帮助，而对工党则伤害甚大。不仅如此，他还错上加错，抛开了自己的党去担任为保守党占支配地位的联合政府首相。在 1931 年 11 月的大选中，联合政府扫荡了许多工党的议席，就像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扫荡了许多自由党的议席一样。但是，麦克唐纳也有他的成功之处。他是能力高超的外交家和受人尊重的政治家，他向外界证明工党是一个可靠的、可尊敬的、适于执政的政党。1924 年，麦克唐纳主持了伦敦会议，通过了减少德国赔款额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1930 年，他主持了另一次伦敦会议，英、美、日达成了三国海军军舰潜艇吨位相对比例的协定。麦克唐纳是一个通晓时务、手腕高超和开诚布公的谈判家，这些素质使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对总罢工提出批评，将和平立场置于阶级斗争之上。这位具有若干复杂品质的人物，诚心致力于建设一个有活力的工党。但他毫无效率的内政方针将他多年辛苦的建树毁于一旦，特别是 1931 年 8 月的那场灾难将保守党送上了台。

保守党的崛起

两次大战之间英国政治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保守党的支配地位。在 18 年多的时间里，该党一直是议会的第一大党，在 16 年的时间里在议会拥有多数席位。保守党在议会的多数席位，在 1918 年之后保住了劳合·乔治的首相职位，1931 年以后则保住了麦克唐纳的首相职位。同样，这个多数地位确保了以下政治家的首相职位：1922 年的博纳·劳，1922 年、1924 年至 1929 年、1935 至 1937 年的斯坦利·鲍德温和 30 年代末期的内维尔·张伯伦。

两次大战之间保守党的主要领袖是斯坦利·鲍德温。他甚至到1921年9月还不是内阁成员，但在1923年5月就当上了首相。他能够一步登天的原因在于运气好，处事机敏，善于待人接物。他的好运气在1922年降临，当时保守党内能力最强的人物——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贝尔福勋爵和寇松勋爵都因为对劳合·乔治的忠诚，而不愿意进入博纳·劳的政府，这样，他们的拒绝就制造了政治真空，使得鲍德温这位新人得以担任财政大臣。随后博纳·劳围因病辞职，竞争首相者只剩下寇松勋爵和鲍德温。此时，英王乔治五世将决定新首相的人选，他可以选一向骄傲、贵族出身、曾任印度总督、才气过人的寇松，也可以选为人谦和、不摆架子的沃斯特郡钢铁商鲍德温。贝尔福勋爵向乔治五世进言，寇松爱争好斗、趾高气扬，鲍德温则温和谦虚、随和友善，而且寇松不是下院议员，不能在下院领导本党治理国家。

758

鲍德温一上台便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决定就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举行议会选举。他做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是出于他相信对外国货物征收关税可以减少失业，而失业问题正是他十分焦虑的问题。但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使自由党团结起来，使工党斗志昂扬、增加了人们对食物涨价的担心，其结果是保守党的议席减少了87%和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诞生。10个月之后，工党政府倒台，鲍德温不再提及贸易保护主义问题，转而打起温和稳定政策的旗帜竞选。1924年他允诺回到旧有的道路：削减开支，恢复金本位，恢复自由放任经济。但结果并不是稳定，1925年发生总罢工，鲍德温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防范。可是在那9天的紧张日子里，他表现得非常坚定、冷静和灵活，公众觉得他是中流砥柱。

对于企业界、法院和议会中的保守党极端派来说，鲍德温并不是什么中流砥柱。总罢工之后，1000多名参加罢工的工人都因为发表煽动反叛的演说而入狱，还有很多人被拒绝返回原有的工作岗位。在英国各地，雇主都压低工资，并反对雇员参加工会。议会则通过了《1927年劳资争议法案》，规定同情罢工为非法，对工会筹款做政治活

动经费亦加强限制。鲍德温甚至允许警察闯入苏联贸易代表处、批准外交部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这些极端的措施表明在强大的利益团体或保守势力的之下，鲍德温所处的软弱地位。

鲍德温也乐意随波逐流，而不是引导潮流势。1925 至 1929 年，他听任保守党组织的松懈和社会罪恶现象的泛滥。唯一不安于随波逐流政策的是任卫生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他和他的父亲都曾任伯明翰市长，对地方政府有深切的认识，对立法工作亦很熟悉。他起草了一项法案，并获得议会通过，将养老金列入国民保险计划。在这之前，财政部只对超过 70 岁的老人发放养老金，相当于一种贫民救济金。新法案下的养老金则是通过按周供款而得到的一种福利，不再是财政部发给所有年老贫穷者的救济金。这项法案也规定对寡妇、孤儿和依附儿童提供救济。这项法案虽然扩大了福利国家的范围，但仍留有缺陷——那就是千百万人未能参加国民保险计划。不过，这项法案已经令张伯伦感到欣慰，因为它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信念：工人如果按期供款，他们就不需要依靠国家。

1929 年，张伯伦还提出一项法案，规定在英国的 140 个郡政委员会里设立公共救助委员会，并授权委员会向有工作能力者发放失业救济金和贫民救济金。这项法案大幅度削减了各郡的济贫委员会的权力。同一法案还规定对农业财产免征地方税，对制造业者可以部分免征地方税；又规定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额”补贴。1929 年以前，财政部按地方税额发放等额的补贴，这项政策有利于征税较多的富裕地区。在此时，财政部改为按照需要和人口数量发放补贴。 759

养老金、公共救助委员会和大额补助等项，都表明政府的作用增强。1926 年中央电力管理局（Central Electricity Board）和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建立，同样表明了这一点。鲍德温政府对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或减轻最坏的流弊等，都不遗余力地去办；但在涉及解决较大的问题方面，如失业、贫困或不平等问题等，则踌躇不前。在面对重大流弊的问题上，保守党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导致了保守党人在 1929 年 5 月大选的

失败。

1931 年 10 月，以支持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为条件，鲍德温重掌大权。这个内阁由 11 名保守党阁员、4 名工党阁员和 4 名自由党阁员组成，而保守党则在下院占有 473 个议席。麦克唐纳出任首相，鲍德温并没有感到不高兴，因为他们两人相同之处很多。他们都寻求将人民团结起来，摈弃极端主义，实现举国一致。在竞选的时候，他们都以各个阶级的领导者为口号，极力争取中间选民的选票。他们的竞选演说都充满道德和空泛的言辞，鲍德温用来解决社会难题的妙方，是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单词："信心，希望，爱心和工作"；麦克唐纳则许诺："将国家建成遍地花草芬芳，万家炉火温暖，人人快乐知足，各抱雄心壮志的乐土"。

1935 年，麦克唐纳因健康原因辞职，让位给鲍德温。事实上，鲍德温自 1931 年 10 月以来已决定政府的步调，包括两个主题：贸易保护主义和节约开支措施。1931 年 11 月，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贸易部对任何充斥英国市场的外国货物征收 10—20% 的临时关税。1932 年 2 月，议会又通过《进口税法案》（Imports Duties Act），规定对几乎所有制成品征收 10% 的进口税，并授权财政部在必要时将其中某些制成品的进口税率提高到 20—33%。大部分粮食和原料均免征进口税。

贸易保护主义没有使政府丧失人心。但节约开支方面的措施却遭到反对。1931 年 10 月，政府在第一个预算案中提出公务员一律减薪 10%，教师一律减薪 15%。教员们群起造反，在伦敦街头举行万人游行，游说本选区的议会议员，最后迫使麦克唐纳和鲍德温将减薪比例改为 10%。失业救济金也削减了 10%，并且实行贫困状况认定程序，减少了约 50 万人的失业救济额。同时还提高失业救济的申请标准，使得约 25 万人不能申请。许多地方公共救济委员会在发放救济金方面比法律规定更为慷慨。为阻止这方面的非法行为，政府成立失业救济部（Unemployment Assistance Board），其工作人员众多，负责统一救济金发放标准，降低发放额。和上述吝啬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对

农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就相当慷慨。

政府扶助农业的办法有三：第一是设立农产市场局，确定牛奶、咸肉、土豆、啤酒花的价格；第二对咸肉、小麦、甜菜的种植者提供补贴；第三是对进口鸡蛋和禽类实行进口配额。1936 年政府还设置了煤炭销售委员会和棉纺局，规定每个矿山和纱厂的产量配额，对钢铁业提供 50% 关税的保护，给造船业和住房建筑业提供补贴。保守党在经济干预方面，比工党走得更远。该党还违背了竞选诺言，放弃了金本位制，实行预算赤字政策。为了偿还政府的债务，张伯伦将英格兰银行的利率由 5% 减至 3.5%；为了给工业和农业提供补贴，他推行赤字财政。1934 年，张伯伦削减所得税，使得政府赤字进一步加大。到 1937 年，大多数年收入超过 500 英镑者的所得税率并不比战前高，约为 5.5%。而年收入 100 英镑上下的纳税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其所得税率高达 11%。在保守党治下的英国，富人和强者拥有强大影响力。

760

英国的学校儿童则没有这种影响力。保守党政府在应对贫民时，便采用吝啬政策。1921 年的一部法案规定：有资格领取学校午餐的贫苦学童，只应限于持有医生证明的营养不良者，这样只有 4% 的学童符合这项规定。有一个地方卫生官员称这项规定是“残酷的、不人道的和野蛮的”。

1934 年之后，英国的经济缓慢复苏。受到发行新债偿还旧债的做法和世界性萧条的影响，政府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加上廉价原材料和食品进口的推动，投资活动又趋活跃。而 1936 年和 1937 年的高关税、卡特尔经营方式和限制性配额，都推高了生活成本。这既未能阻止英国出口的下降，也没有能够避免 1937—1938 年的衰退。唯有 1939 年重整军备方面的巨额开支，才带来了持续的复苏。

1935 年，温和自满的鲍德温率领保守党取得大选的重大胜利。其原因在于：失业率的下降、自由党的衰落和工党的失信、鲍德温对国际联盟与和平的热情、他施政方面的高超技巧、保守党对新闻片和电台的支配地位以及有关不会重整军备的诺言。

同样在1935年，英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这个法案显示出鲍德温与麦克唐纳合作的顶点。1927年，鲍德温派遣了一个委员会前去印度调查日益高涨的独立浪潮和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冲突问题。1929年，麦克唐纳作出允诺："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授予印度以自治领地位。随后，麦克唐纳又在伦敦主持了三次圆桌会议，甘地出席了第二次会议，申辩了印度独立的理由。甘地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袖，他在印度领导大规模不合作运动，削弱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这几次圆桌会议的结果是《印度政府法案》，规定印度设立联邦政府，扩大各省的自治权。这项法案尚未及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761 发生了，法案的影响不过是使印度独立的可能性大增，并使丘吉尔感到愤怒。印度问题把丘吉尔变成了政府的反叛者、批评者和后排议员（即不担任任何政府职务，坐在议院后排的议员，他们不可坐到前排或财政部席位）。作为一名后排议员，丘吉尔就有了批评鲍德温的机会。早在新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与美国离婚女士华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的爱情故事所造成的尴尬事件上，丘吉尔就已行使了批评权。爱德华八世的父亲乔治五世和他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一样，为英国君主制确立了崇高的标准。乔治五世不知疲倦地立下基石、勤于政务，在圣诞节的电台贺词中以非凡的智慧和魅力致以亲切的问候，素来为人宽厚和令人尊敬，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位率直质朴的公仆。他的儿子爱德华却没有这种质朴和奉献精神。爱德华在1936年继位为国王之后，立即着手与辛普森的婚姻大事。英国国教会指出，离婚是一种罪恶，公众持有相同立场。对这场婚姻表示厌恶的原因还有：华利斯只是一个平民，还是一个美国人。鲍德温看到舆论如此，就面陈爱德华国王：可在华利斯和王位中做出选择，但两者不可兼得。追求爱情的爱德华选择了华利斯，并逊位其弟，这位新国王就是乔治六世（George VI）。这场婚姻危机终于结束，但是不久一场更可怕的国际危机就会出现。但与此同时，民众正在享受再现的繁荣。一场空前的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

进步与幻想破灭

物质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进步，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在这些年中，英国人的心态却是幻想破灭。英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巨大的技术进步，英国人从来没有享受如此自由和解放的日子，也从来没有这么陶醉于娱乐消遣。这也是一个文化创新的时代，是诗歌、小说、绘画、雕刻、戏剧、交响乐和芭蕾舞创新的时代。可是，在这样的全面进步之下，小说谈论的都是虚空，诗歌描述的都是绝望。这种矛盾现象，始于第一次大战之前，在两次大战之间增强，并延续至今。

技术进步最具革命性，以往的技术进步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蒸汽机虽然给维多利亚时代带来了廉价制造品和供旅行用的铁路和轮船，却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像今天的火箭和氢弹没有进入日常生活一样。现在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有：收音机、电视、汽车、留声机、吹发机、电影、冷冻食物和电动搅拌器等，这些都是 1936 年英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电视广播在伦敦始于 1936 年，时值马可尼（Marconi）的收音机、戴姆勒（Daimler）的第一辆汽车和吕米埃兄弟（Lumiere brothers）的第一部电影发明的 39 年之后。无线电、汽车和电影都在 1895 年左右发明。第一次大战后，这些发明突然充斥西方世界市场。同时也有其他许多利用电力的发明物，如电灯、电炉、电热器、电话、手电筒等；以及用电动机的发明物，如吸尘器、电扇、吹发机、食物搅拌机、咖啡研磨机和电冰箱（包括冷冻食物和冷饮）等，也进入西方日用品市场。作为电动机强大竞争对手的内燃机，装备了巴士、卡车、飞机、拖拉机、推土机、压路机和割草机。化学的进步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如塑料、玻璃纸、汽油、化妆品、药物和改良橡胶。改良橡胶使汽车和自行车转动平稳，人们还制成避孕套和避孕片等——这些都有助于节制生育和小规模家庭，也导致了性混乱。 762

经济繁荣和建筑技术的进步，造成住房建设的又一个高潮。因为



汉姆斯特德花园，绿化带内的一处市郊富人聚集区，各户均有汽车出行（*Simmons Aerofilms Limited*）

有汽车，交通便利，所以住房可以散布到较广阔的地域。到 1939 年，英国拥有住房者达 300 万人，拥有汽车者达 200 万人。他们大都属于那人口中最富有的 1/3，而二手房和二手车的连带效应，也使生活居中等水平的 1/3 阶层迁入较旧的郊区。汽车、巴士和电车创造了更大的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这些巨大的都市圈包含众多的郊区。公路向四面八方伸出，其覆盖面令受到地形限制的铁路望尘莫及。电影763 院、工厂、加油站、各种商店和庞大的酒店到处兴建，连一些支路也有半独立的别墅。较不富裕的阶层则住在地方政府建筑的住宅内，虽然面积较小，但也布满了新式日常用品，如收音机、留声机、电炉、价廉但考究的家具，这些用品几乎全部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置。

这是一个物质化的时代，这些用品的作用是安抚寂寞无聊的家庭主妇。在城市郊区，那些矿山小镇、农业村庄和城市贫民区所具有的邻里关系和归属感不复存在。酒馆不止一家，礼拜堂不止一处，人们

各自开车到不同的酒馆和电影院消遣，或乘巴士到沃尔沃斯百货公司或马卡斯与史宾塞百货公司购物，这些连锁经营的百货公司是新物质主义的圣殿，虔诚的崇拜者将各种商品塞满了他们的购物袋。购物袋中还有大量的罐头食品。世界物价的下降，虽然不代表营养会更好，但食品价格一定低廉，而且消耗量更大：冰淇淋和巧克力的消耗量的增长要远远大于蔬菜和水果消耗量的增长。英国人这时食物吃得更多，但酒喝得比以往少。他们去电影院，听收音机，或呆在舒适的家里，就不去酒馆喝酒或到其他好玩的地方闲逛了。以娱乐消遣为例，没有什么能与电影院和收音机相比。90% 的家庭拥有收音机，每星期有 40% 的人去看一次电影，其中有 25% 的人看两次。失业的人花几个零钱就可以在电影院得到温暖、忘却痛苦，寂寞的太太们可以和鲁道夫·范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来一幕梦里浪漫，少年们可以到美国西部去作一番冒险，而那些精神抑郁或受困扰迫的人，则可以欣赏华丽炫目的音乐剧、滑稽可笑的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表演、查理·卓别林（Charles）辛辣讽刺的喜剧片。

英国政府希望广播电台节目不要过于逃避现实。于是，政府委派了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约翰·里斯（John Reith）（后授勋爵）用铁腕加以管理。他规定星期日早晨除天气报告外不得播出其他节目，每月下午 6 点以后才可以播出新闻。里斯认为电台应安排播出人民应当收听的节目，包括讲座、布道、莫扎特歌剧、莎士比亚悲剧和使人放松的萨沃伊（Savoy）舞蹈音乐。所有播音员一律说标准的、上流社会的纯正英语。这是一种庄严肃穆、有学究气和清教风格的古板英语，但英国广播公司以此确立了品味、率直和卓越的标准。这个标准，使英国广播公司未受广告的不良影响，且在二战之后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在人们一心寻求快乐的年代，娱乐方式多得数不胜数。受过教育者去欣赏歌剧、音乐会、芭蕾舞、话剧和画廊；爱运动的人则打网球、高尔夫球、板球、足球、橄榄球，或去游泳、登山和跑步。观看网球、高尔夫球和足球顶级赛事的观众比以往要多得多。工人们常常挤满足球场、赛狗场和跳舞场，观看职业拳击赛，处处下注打赌。富家青年

热衷于开豪华舞会，去夜总会聚会，畅饮鸡尾酒，跳查尔斯顿舞，疯狂地追求享乐。上院的基督纪念日守纪会（Day Observance Society）会长指出："我们真是玩疯了。"

议会认可的最理想的娱乐方式就是度假，为此在1938年通过了《带薪假期法案》（Holiday with Pay Act），将享受所谓"天堂星期"（week of heaven）的人数由300万增加到1100万。许多人去布特林休假营地游泳、晒日光浴、跳舞、交异性朋友和做游戏，享受假期的乐趣。一切都要有趣才行，即使是阅读也是如此。报纸满是插图、大字标题以及简单而生动的报道，内容包括罪案、八卦、丑闻和体育运动之类；专栏文章介绍如何做园艺、谈恋爱和进行投资。报纸还登载字谜游戏、生活秘诀和报社赞助的登山勇士和空中英雄的惊险故事。这个时代的小说，也同样动人心魄。花6个便士就可以买到描写人猿泰山（Tarzan）、邪恶的傅满洲（Fu Manchu）和阿拉伯酋长的小说。出借小说的图书馆更是应接不暇，侦探小说尤其是1930年代的热门。但是非小说类的书籍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英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在欧洲名列最末，所以英国人的自学能力在欧洲独拔头筹。

764



对于不够富裕居民来说，幸运的是有这些市政委员会住房（*N. Vigars, Hulton/Archive*）

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特别是女性也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社交自由。战争、繁荣、社会流动性和城市文明，弱化了旧的传统。科学、怀疑精神、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打破了固有的道德观念。读懂弗洛伊德著作的人很少，读懂爱因斯坦（Einstein）著作的人更少，但是他们的思想广为流传：空间、时间和道德都是相对的，而性不应受到压抑。此时，报纸上的文章放开谈论性问题。卓有勇气的玛丽亚·斯托普斯（Maria Stopes）博士，在满座的女王礼堂宣讲节制生育问题，剑桥政治同盟（Cambridge Political Union）投票认为，她的演讲既明智又符合道德。家庭规模比以前缩小，有一段时间一些观察家声称通奸行为正在增多。家庭规矩和学校纪律都有所松弛，因为心理学家不主张体罚，而进步的学校都主张自由和不加约束的教育方式。

765

妇女也取得了更多的权利。《1922年婚姻法案》（Matrimonial Act of 1922）规定妇女和男子在离婚问题上具有平等的权利。在1920年代，妇女有权做律师，担任陪审员，担任高级文官，在牛津大学取得学位。很多妇女成为秘书、打字员、教师、工厂工人，也有些妇女成为新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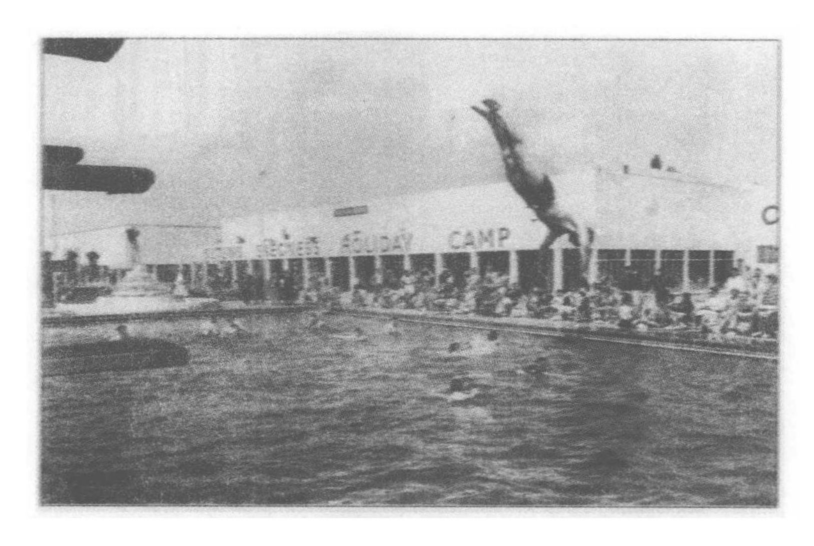


收音机——电视机的寒碜“近亲”，曾是战争期间技术革命的奇迹（*Hulton/Archive*）

者、大学教授、行政官员和医生。她们剪了头发，穿着新式服装来表现独立地位。这种发型和服装表达了一种运动、自由和独立，她们的新生活方式亦然——在公开场合吸烟，饮酒，跳贴脸舞和说黄段子。她们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作品，欣赏伊迪丝·伊文思（Edith Evans）的演出，这两人都是当代知名妇女，文化界的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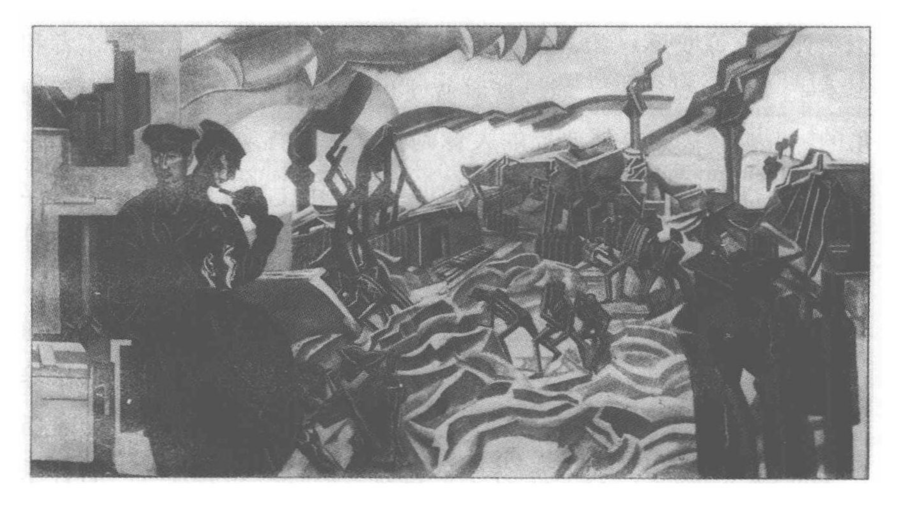
766

当时文化方面一片欣欣向荣，知识界也是蒸蒸日上。物理学方面的进步尤其惊人，1923 年卢瑟福德勋爵（Lord Rutherford）说：“我们生活在物理学的英雄时代。”同年，卢瑟福德的剑桥同事通过发现中子、论证电子的存在和成功进行原子分裂来证明了他的正确性。卢瑟福德是第一个描述原子构造的人，他的实验工作与爱因斯坦的广义及狭义相对论一起，引发了物理学的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亚于伽利略和牛顿时代的革命。生物学、化学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的进步，虽然不如物理那样具有划时代性，但也很重要。这些新发现虽然复杂异常，但在书摊、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里的大众化版本，却使得受过教育的读者对世界了解，比牛顿和伽利略还要更进一步。



对 1500 万目前带薪休假的英国人而言，大多数不会选择昂贵的海滨度假，而会选择一个国内假日营地（*Hulton/Archive*）

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对知识进步产生推动力。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爵士仔细考察传记和社会的细节，对乔治三世时期英国的政治生活所作剖析的精确度，不亚于卢瑟福德分析原子的精确度，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沿着纳米尔的足迹，或另辟路径进行研究。在剑桥大学执教的维也纳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作了十分严谨的研究，他在1922年出版了他的革命性著作《逻辑哲学论集》（*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该著作力图建立一个纯逻辑的知识系统，避开玄学和直觉。这与英国哲学家中的经验主义派，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G. E. 摩尔（G. E. Moore）和 A. J. 艾尔（A. J. Ayer）的观点相吻合，他们希望清除过去哲学中的“糟粕”，然后将所有问题纳入逻辑分析的范畴。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同样主张做彻底的创新和分析，他们在扩展人类知识方面也有贡献，但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7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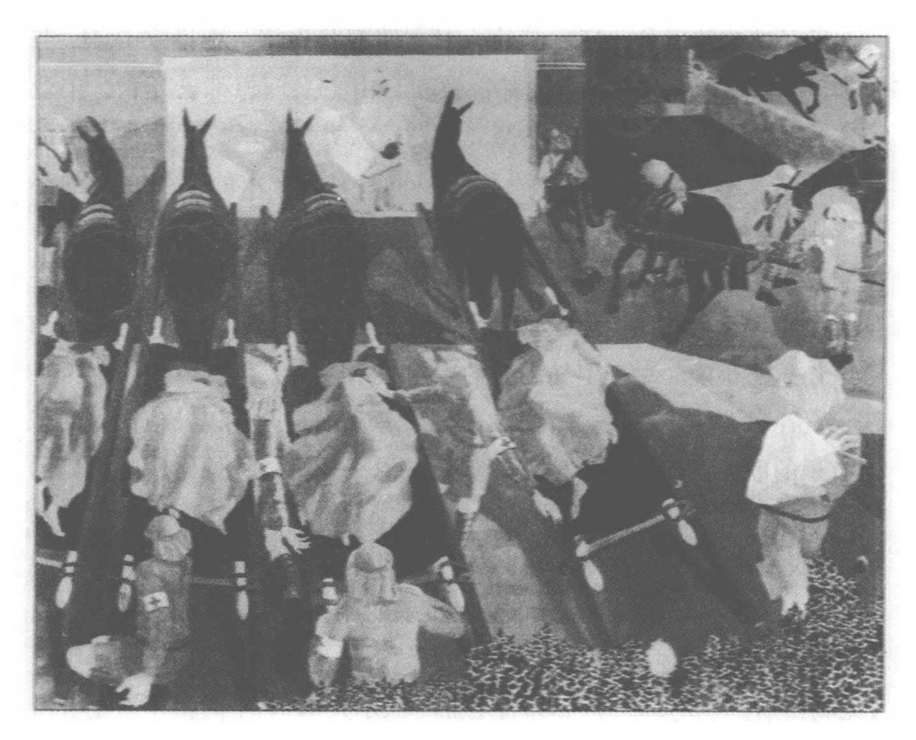
温德姆·刘易斯于1919年创作的《排轰的炮台》（*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知识的进步是一种丰富的、强劲的和令人兴奋的进步，但同时显示出其碎裂性、相对性、多样性和非静止性。物理学展示了不同的真理，认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世界：距离用尺寸和里数来衡量的、老的牛顿世界；时间和空间对观测者的所在位置而言都是相对的、距离用光年来衡量的银河世界；极度微小、储存了巨大能量的原子世界。然而，对原子世界的衡量是如此之难，以至于物理学家海森堡（Heisenberg）提出了不确定定律。心理学家也阐述不同的世界：行为学派注重刺激和反应、环境和条件；心理分析学派强调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行为学派否认这些本能的存在。1930年，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再度告诉英国人，压抑这些本能是罹患精神病的起因。

艺术的特点是千变万化的风格、复杂纷呈的现象和参差不齐的进步。皇家学院的艺术家已经止步不前，而斯雷德艺术学校（Slade Art School）的学生，则十分活跃，才能和理念俱佳。虽然沃尔特·希克特（Walter Sickert）依旧在用印象派手法描绘优美的景色，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在创作雄浑有力的人物肖像，但真正令评论家惊叹不已的，是那位集小说家、评论家、偶像破坏者和画家于一身的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所创作的带有棱角的、几何状的、金属效果的人像画作，和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所创作的生动又神秘的画作，画中的垃圾夫和蝎子也能迸发出美感。另外，两位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和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因其新的技法，也博得赞扬。英国人的艺术趣味，已落在欧洲大陆的后面：他们这时才喜欢塞尚（Cezanne），但还是忍受不了毕加索（Picasso）。英国人的音乐修养较高，经常听音乐会，特别是听英国现代音乐家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和本杰明·布利顿（Benjamin Britten）的音乐作品。

768

英国人还阅读反映较深刻的时代心态的诗歌和小说。对许多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而言，这种心态就是幻想的破灭，其最有力的展示，则



斯坦利·斯宾塞于1919年创作的“马车与伤者到达包扎站”（*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是在T. S. 艾略特（T. S. Eliot）1923年发表的《荒原》（*Waste Land*）之中，诗中一种文明已经变成了：

> 一堆破碎的影像，太阳晒着
> 那死了的树不供一点水，蟋蟀没有救
> 那干的石头没有水的声音。

这是一个寂寞的、隔绝的、没有灵魂的人们的世界。人们的宗教信仰已被砸碎，人们不停地寻求，但始终没有收获。1925年，他们便成了艾略特笔下的“空洞的人们”，“嗓音干得像枯草”，迷失于老鼠肆虐的小径。 769

除了艾略特以外，还有其他人对文明现状失望。小说家 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宣称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理想都已死亡，工业资本主义冷酷无情、现代生活毫无爱意，人类性生活饱受压抑、革命均毫无意义。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很受欢迎的小说，则讥讽世间的一切，包括那种愤世嫉俗的现代人用在"废墟"中安慰自己的享乐主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悲观绝望。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整齐划一的，当时大多数人根本不读令人痛苦的诗篇和令人伤感的小说。对于生气勃勃的青年人来说，人生就像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笔下俏皮、机敏和淫秽的喜剧，以及他谱写的苦中有乐的歌曲；对于生活美满的富人来说——他们总是比悲观失望的人多，有萨姆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引人入胜的小说和 P. G. 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笔调轻快的故事，还有舞台上总是演不完、没有什么特色却能逗人快乐的剧作。对于文人墨客来说，则有富有创新精神的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1922 年的大作《尤利西斯》（*Ulysses*）和弗吉尼亚·沃尔夫 1933 年的新作《达罗维夫人》（*Mrs. Dalloway*）。他们的作品抛掉了严谨的叙述、年代次序和句式文法，其创作就像用一堆由回忆、梦境、意识流、倒序、喜剧场景和诗歌异彩构成的颜料，通通涂抹在一块大幅画布上。但是，这种隐秘的、个人的体验完全没有顾及公共的主题和事业，因而也就不能为减少世界的阴暗提供任何的希望所在。

1930 年代的青年诗人对 1920 年代悲郁诗风所做的反应，就是追求所信仰的事业。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国外的法西斯猖獗，以及国内工党的莽撞犯错和保守党的傲气凌人，他们找到的事业就是激进政治运动。W. H. 奥登（W. H. Auden）是一个医生的儿子、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当时的青年激进分子中最优秀的诗人。他们的队伍中人才济济，包括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C. 戴·刘易斯（C. Day Lewis）和路易·麦克尼斯（Louis MacNiece）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出身，毕业于公学和大学，彼此都是朋友。他们成为一个世界的一

部分，这个世界产生了无数的文学评论文章、实验剧团、激进派报纸、大众宣言和游行示威——所有的一切都代表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的远见，奥登是这样描写这个世界：

> 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明天
> 其中有新的清洁的城市
> 再也没有种种忧愁。

在 1930 年代，英国有法西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信仰社会信贷主义者、裸体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他们大都投身于左翼团体追求的事业。到 1938 年，左翼读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有 10 万会员，有 1000 个以上的讨论小组。1938 年以后，左翼人士最热心的，就是站在西班牙共和派一方与法西斯的佛朗哥将军进行战斗。奥登、斯彭德、戴·刘易斯以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都去了西班牙。奥登、斯彭德和刘易斯都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奥威尔是出众的小品文作家，珍视独立，所以他与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西班牙战争的经验，像身为共产党员的经验一样，对他们都是幻想的破灭。对于奥威尔而言，西班牙战争显示出共产党的冷酷。他在 1938 年所写的《向卡塔洛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中对此作了清楚的阐述。奥登和伊舍伍德均先离开西班牙，再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并退出共产党。幻想破灭一直延续到 1930 年代，体现在政府的绥靖政策之上，这是关系到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 770

阅读文献

Derek Aldcroft, *The Inter-War Economy: Britain 1919—1939* , London: Batsford, 1970. 作者的分析并未涵盖各个领域，而是集中在关键问题和发展之上，比如总体增长问题、发展起伏问题、政府政策问题和重要工业问题。

Roland Blythe, *The Age of Illusion: England in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4. 该书以丰富多彩、幽默讽刺和入木三分的笔调描述了两个十年的状况，从自命不凡的保守党大臣、与人私通的国教教区长和普通人身上发现了这个时期的意义。

Keith Feiling,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该书记载了大战之间年代里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普通生活，作者的陈述充满同情，需要以批判的眼光进行阅读。

Martin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该书对英国绥靖政策作了富有智慧的解释，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项胆怯的和愚蠢的政策，而且也是一项可变通的政策，当然不是以希特勒为对象。

Robert Graves and Alan Hodges, *The Long Weekend: A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1918—1939*,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0. 该书展现了一幅万花筒般的画面，从裸体主义到社会主义，从打扑克到侦探小说等等，尽管内容千变万化，但指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态度和主题。

William McElwee, *Britain's Locust Years, 1918—1940*,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 该书对两个十年作了批判性的评论，作者认为这个时代不值得令人自豪，但仍然能够在没有发生（国内）暴力冲突或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发生迅速变革、危机和战争。

David Marquand, *Ramsay MacDonal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7. 该书对这位依靠自我奋斗起家的苏格兰人作了里程碑式的刻画。麦克唐纳出身贫寒，最终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字里行间流露出钦佩之情，但也意识到其不足之处。

Keith Middlemas and John Barnes, *Baldwin: A B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该书对这位支配英国达 16 年之久的高深莫测的人物作了定性研究。两位作者评估了其影响，并以明辨和同情的笔锋予以解释。

Charles L. Mowat,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Methuen,

1955. 该书周到、彻底地概述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事件，其观点主要是自由主义的观点，略带一点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总体上看具备实事求是的风格。

John Raymond, ed. *The Baldwin Age* ,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0. 14 位杰出的作者探索了鲍德温时代的方方面面，包括大众娱乐、教堂、物理学会国际联盟。 771

John Stevenson, *The Slump: Society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Depression* ,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7. 该书明察了 1930 年代的矛盾现象：一个能够生产 100 万辆汽车的社会，却有 100 万人失业。工党和保守党都对此不得要领。

772

第二十九章　英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于英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将近6年，其中有一年是英国单独对德作战。这次大战和第一世界大战截然不同。死亡人数为32.4万，而不是一战的75万，而在死亡者中，平民占7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分布广、流动性大的战争，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壕沟战，交战双方各据泥泞的战壕，僵持不下。这次战争有太平洋上的海战、非洲的沙漠战、缅甸的丛林战、大西洋的潜艇战和争夺制空权的空战。大战自始至终不断发生出人意料的转折——法国战败、德军东攻俄国、日本轰炸珍珠港、美国参战、盟军在意大利和法国登陆。对于英国人民来说，这次战争虽然不像一战那么惨烈可怕，但它带来的负担以及对英国本土和帝国的破坏，远较一战为大。

大战的来临

英国人民，无论男女，很少有能忘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大战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时常在最具震撼力的文学作品里显露出来，从而激发学者着手研究战争发生的原因。同时，一战也促使许多理想主义者提出种种灵丹妙药，驱使政治家允诺不再动用战争手段。对一战的起因的研究，有的学者将注意力放在战前的结盟体系和军备竞赛之上，两者都是酿成战祸的势力均衡外交的组成部分。一战留下

的最有意义的遗产就是认为现代战争已超出人类的忍耐程度，而且人类必须找出一条解决国际纠纷的新途径。

第二个遗产是对《凡尔赛和约》的深切负疚感。1918 年，这种负疚感还不强烈，当时大家对德国的仇恨正炽，但是后来随着仇恨的逐渐消减，便有著作抨击战后对德封锁，谴责和约的不公平，并指出所有国家都对战争的起因负有责任。 773

然而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凡尔赛和约》的负疚感，都无助于解决一战遗留下来的第三个也是最棘手的遗产，这就是德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德国虽然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和若干在波兰的领土，虽然和约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海空军，陆军不得超过 10 万人，但它依然是潜在的欧洲最强国家。就资源、人口、技术和推动力而言，德国都在其他国家之上。它仍然是一个巨人，且因为战败而心怀愤怒。所以，导致第一次大战发生的德国问题，战后依然存在。此时俄国专注于国内问题，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法国历经 4 年战争元气大伤，于是就只有英国这个世界最大帝国，来领导欧洲的重建和确立新的外交理念。

确立一个新的外交理念并不容易。伍德罗·威尔逊曾为此而努力过，他促成国际联盟的成立，但却激起美国参议院的反对。虽然如此，国际联盟还是在日内瓦建起了大理石宫殿，并以集体安全确保世界和平。这在 1920 年代里，成为了势力均衡外交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可选择外交理念。《国际联盟盟约》（League Covenant）的第 10 款规定全体会员国协力支持任何一个遭受侵略的会员国。第 15 章规定一切国际纠纷应交由国际仲裁解决。但这两章均未明确何时和如何贯彻以上规定。在日内瓦开会时，拉姆齐·麦克唐纳敦促实施日内瓦协定，必须即时举行国际仲裁，必须对被侵略成员国提供军事援助。但由于麦克唐纳的离职，这个协定胎死腹中。他的继任者斯坦利·鲍德温没有再提此事，并且把麦克唐纳与苏俄达成的条约也废除了。这样，他既没有推动集体安全体系，也没有为将来建立遏制德国的联盟奠定基础。

事实上，鲍德温以及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甚至削弱了与法国的联盟，因为他们将联盟并入了 1925 年的《洛加诺公约》。按照这项

公约的规定，德、法、比三国保证把所有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英国和意大利也许诺对被侵略国提供保护，这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国际联盟盟约》已对此作了规定。《洛加诺公约》将德国拉进了国际联盟，拉入了欧洲体系，其出于和解的目标值得称道，但此举并没有任何加强集体安全体系的作用，也没有加强任何一个（反战）联盟。如同 1928 年的《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Kellogg-Briand Pact）——一个由包括英国在内的 15 国反战公约，《洛加诺公约》也不是联盟条约，而是一纸空洞的诺言，并不能加强国际联盟的地位。

1931 年，日本出兵进攻满洲——中国的一个省①，给集体安全制度来了严重挑战。1935 年，意大利出兵侵略非洲的阿比西尼亚，这又是一次挑战。国际联盟对日本毫无办法，对事件如何处理一拖再拖，不过，日本毕竟山高皇帝远，国联鞭长莫及。可是意大利却近在咫尺，况且制服意大利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意大利缺油，它进军阿比西尼亚，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输送给养和兵员。如果英国肯支持国联，就可以封锁运河，或禁止将油料供应给意大利，或者双管齐下。但是英国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由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在 1935 年 9 月向国际联盟大会作出保证：英国将坚决参加任何“应对所有无端侵略他国的集体行动”。可是霍尔到 12 月又改变立场，与法国的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合谋，计划将阿比西尼亚的 2/3 许给墨索里尼，以使之不与希特勒勾结。这项出卖国联的消息被新闻界披露后，舆论大哗，人们群起指责霍尔和鲍尔文背叛了他们声称要坚决支持的国联。霍尔灰溜溜地引咎辞职，鲍德温则含糊其辞地表示道歉，表明了他对外交事务的无知。

774

在霍尔辞职和鲍德温道歉后，英国政府既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封锁运河，也没有禁止将油料供给意大利，反而依然继续进行私下的策划。墨索里尼傲慢地拒绝了英法的提议，吞并了整个阿比西尼亚。阻止墨索里尼侵略的失败，给国际联盟的以集体安全制止国际侵略的努力以

① 原文如此。满洲为中国东北一带的旧称。——译者

致命打击。在此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构想能获得如此广泛的赞同和如此适宜的付诸实施的机会。其结果如此，不是国联不行，而是英法不肯支持国联。而石油禁运、苏伊士运河的封锁、墨索里尼的失败和阿比西尼亚的独立，必然使在一旁观望的希特勒感到震惊，同时国际联盟也必然得到新的鼓舞和信心，从而坚决施行集体安全体系。

集体安全可以采取许多方式——如经济制裁、国际仲裁、武装力量统一指挥和以作出庄重承诺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国际裁军。英国的工党及其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这时就以此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1933 年，已担任国民政府首相的麦克唐纳，向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陷入困境，因为德国要求公平待遇，而法国则宣称法国陆军必须保持优势方可保证本国安全。双方相持不下。法国确实考虑要适当裁军，条件是必须有一种有效的国际监督与核查制度。会议对国际核查的坚持，致使德国退出会议。一星期之后，德国又退出国际联盟，随后便公然重整军备。1935 年 3 月，希特勒宣布恢复征兵制，并夸耀德国空军，而这两者正是《凡尔赛和约》所明文禁止的。从此，以国际裁军防止侵略的梦想便宣告破灭。

集体安全体系于是步入崩溃。1933 年，德国规避了解除武装的行动。1935 年，英国又以阿比西尼亚事件损害了国联。到 1936 年，德国进军莱茵兰，公然无视《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的规定，摧毁了以国际条约维持和平的构想。德国人当然可以说《凡尔赛和约》是强加给他们的条约，但《洛加诺公约》却不是。德国人签署了这一公约，自由和庄重地保证不进军莱茵兰。1936 年德国进军莱茵兰时，英法却无动于衷，这次等于昭告世人：条约与诺言根本不能作为新外交的基础和维持和平的依据。

所以，欧洲新外交，包括公开达成的条约、国际裁军、相互作出的保证、信守条约的承诺，到 1936 年都化为乌有。这是否意味着回到了旧外交、旧的势力均衡和重整军备的老路？温斯顿·丘吉尔提醒议会：伊丽莎白一世、威廉三世和威廉·皮特都曾运用这种联盟。但当时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却采用了另外一种政策，绥靖政策。他在议 775

会宣称，本政府的政策，是“对全世界实行绥靖政策”。

1936 年，绥靖政策——以协商和让步解决国际纠纷的政策——既不是新颖的、也不一定是不明智的政策。在某些条件下，这个政策能够相当有效。当麦克唐纳用来减少德国赔款，或张伯伦用来达成《洛加诺公约》之时，这个政策就相当有效。但是，在墨索里尼进攻阿比西尼亚和希特勒进兵莱茵兰的时候，它便不适用了——虽然这尚属可以理解之列，因为上述事变是两个独裁者的初次侵略行径，而且英国也缺少反应时间。到 1938 年，形势则大不相同。这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守信用已为人所共知，而德国武力的威胁也已暴露无遗。西班牙内战将这两个方面昭彰于世人。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决心严守中立，在伦敦设立了不干涉委员会（Non-Intervention Committee），德国和意大利宣布参加。随后德国派遣空军援助佛朗哥将军，意大利也派出了 10 万军队和数不尽的坦克，艾登对此保持沉默，英国政府也无动于衷。英国不但信守诺言不干预西班牙战争，不使西班牙合法政府蒙受损害，而且未对德国、意大利的违约行为提出任何抗议。大多数保守党人还对佛朗哥及其右派叛军表示同情；对西班牙共和政府中的共产党的作用颇为恐惧，虽然后者在西班牙政府中的作用并不大。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欺骗并没有使张伯伦回心转意，他依然相信，可以通过劝说将他们争取过来。同时，英国政府拒绝为可以派往欧陆作战的远征军装备所需坦克和摩托化武器。张伯伦对空军的作用甚为信赖，早在 1937 年就主张加强空军，但力度有限，因为议会认为军备开支过大必然损害国家经济。相反，在 1937 年 11 月，他派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前往德国拜见希特勒。哈利法克斯对希特勒说，英国可以同意德国通过和平方式，对与奥地利、捷克和波兰交界的领土作出调整。

希特勒的答复便是在 1938 年 3 月派兵入侵奥地利并将它吞并。英国工党要求张伯伦认清危机，与法、苏结盟。他予以拒绝，称这样的联盟会“将我们拉入战争”。

张伯伦还宣称英国没有保卫捷克国土的责任，这等于是请德国下手。希特勒立刻提出要求解决捷克的苏台德问题。那里的居民有 300

万是说德语的居民，但该地区及其居民从来就不属于德国，而且希特勒用收买了的特务进行策划，方才有少数人起来鼓吹自治。同年 8 月，捷克领导人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s）给了这个地区人民很大的自治权，局势趋于平静。张伯伦错误地认为，给苏台德人自治就可以满足希特勒的愿望，如果他能亲自去和希特勒面谈一番，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于是 9 月 15 日他和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会晤，希特勒向他提出苏台德必须割让给德国。他接受了，只是提出要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公民投票来完成此事。于是张伯伦又在 9 月 22 日飞往哥德斯堡（Godesberg），把这个问题搞定。而希特勒又节外生枝，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且统统得在 6 天之内解决。 776



面带微笑的阿道夫·希特勒取悦同样带着微笑的张伯伦（*Hulton/Archive*）

张伯伦碰了一鼻子的灰，垂头丧气飞回伦敦。英国内阁和议会精神激昂，已经准备作战，下令发放防毒面具和挖掘战壕。可是，这位首相继续寻求绥靖解决办法。9 月 28 日，他又飞到慕尼黑，向希特勒表示接受其大部分要求，还要求希特勒在另外一张纸上签字，应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回到英国、一下飞机便扬着那张纸宣布："我们有了这个时代的和平。"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刻骨铭心的公众欢呼雀跃，直到 1939 年 3 月 15 日希特勒并吞捷克全境。

绥靖政策的失败使英国急于办理两件事：快速重整军备和与反希特勒的列强缔结联盟。张伯伦着手做这两件事，但第一件事虽然受到议会的督促，仍进度甚慢；而第二件事，则产生了混乱和软弱。议会成立了军需部（Ministry of Supply），决定实行征兵制，并投票决定拨款成立远征军。1939 年的冬天，法国是英国唯一的盟国；次年春，又增加了四个：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在未充分征询各方意见的情况下，张伯伦就冲动地作出承诺，一是四国遭受侵略，英国将出兵帮助它们保卫领土。事实上，英国连保卫波兰的兵力也没有，而且这四个国家本身没有一个是强国。东欧的唯一强国只有苏联。

777

在捷克危机期间和之后，苏联曾寻求结成联盟。1939 年 4 月，英国外交部终于开始和苏联谈判，但未能取得成果。英国一直不够积极主动。苏联大力敦促双方派遣高级官员参加谈判，英国只派些低级官员拖延。张伯伦根本就不想和苏联结盟。1938 年他向议会说，他对苏联共产党政府"有最强烈的不信任感"。这种强烈的不信任的态度，迫使斯大林在 1939 年 8 月初与希特勒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这样，希特勒就可以放心大胆侵略波兰。9 月 1 日，德军攻入波兰。接着，英国对德宣战，但波兰还是沦陷了。此刻，英法面对强大的德国，既没有苏联作为盟友，也失去了捷克和捷军 36 个师的支援。

如果英法在 1938 年就联合捷克、苏联、罗马尼亚和波兰共同对德作战，是否会比 1939 年只与波兰联合对德作战更好呢？今日的历史学家和当时的军事将领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英国的陆军高级将领向张伯伦说，英法盟军无力阻止德军并吞捷克；同时，德国将领也向希

特勒说，他们无力攻占捷克和抵御法军对德国的进攻。批评慕尼黑阴谋的历史学家们，则拿捷克的36个师连同法国的80个师来与德国的21个满员师和14个半满员师作比较，并特别指出了作为盟国的苏联的潜在力量。赞同慕尼黑协定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捷克的地理位置处于难守的劣势，指出法国陆军士气低落，装备完成的英国军队尚不存在，而苏联即使参战，由于许多军官被清洗，军队实力受到重创。但是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的一年中，德国加强战备的进度远较英国迅速，这就给张伯伦的辩护者提出了一个难题。

虽然1938年的战略平衡问题还可以进行辩解，但其他绥靖政策，如轻信独裁者、迷信妥协的效力、不肯重整军备、不相信结盟政策等等，都是无可辩解的。贯彻这些政策本身，涉及有关绥靖根源的更深刻的问题。绥靖政策的主要根源，在于英国工党左派和道德理想主义者、以及保守党的贵族精英，包括新闻界和企业界对头面人物、伦敦城金融家、出版家、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和张伯伦的内阁成员都对同盟和军备竞赛表示强烈的反感。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反感，因为同盟和军备竞赛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度恐怖。直到1938年9月以及慕尼黑危机的爆发，公众对于德国的恐惧和对希特勒征服的愤怒，才真正取代了对战争的反感，并开始支持对希特勒开战。但是，张伯伦政府却表示反对。

政府的官方理由是：政府尚未做好开战准备；政府需要一年时间完成雷达系统的装备、组建空军和海军。而它未在这之前完成这些备战工作、将赌注押在与希特勒打交道之上的原因，主要是担心迅速加强军备会拖垮经济。英国经济由于背负社会服务开支和战争债务的负担，1918年的政府债务是1914年的11倍，占中央政府总开支的40%。大权在握 778 的财政部、许多工商界人士和内阁成员都确信高税收将会摧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希特勒上台两年之后，英国政府将防务开支限制在预算的15%。防务开支的大部分用于海军和空军，这是保守党历史上的半孤立主义“海洋”战略传统的复活，这项传统只主张英国对欧洲大陆地面部队提供财政和后勤方面的支援。张伯伦和其他人在这个传统中增加了一个新的信条：轰炸机将决定下次战争的胜负。除了经济紧缩、半孤立主

义和崇拜轰炸机之外，还有第四种立场，即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将希特勒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克星。这种仇视阻碍了与苏联的结盟，使这场战争爆发以后，成为一场艰难的生死存亡的搏斗。

生死存亡的战斗

1940年5月20日，德国进攻法国后的第10天，德军到达英吉利海峡。到6月4日，英军已经从敦刻尔克海滩撤离了338226名官兵，但遗弃了全部重型武器和装备。6月22日，法国向德国投降。到8月，德国的潜艇已经击沉英国船只100万吨位，德国空军已经开始轰炸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和飞机。如果这一攻势成功，希特勒将取得制空权，从而可以实施他的海狮行动，即入侵失去防御能力的英国本岛。这是自1805年拿破仑组成大舰队准备渡海以来，英国本岛从来没有遇到如此的危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如同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的“虚假战争”一样，出乎英国人的意料。1939年，人们曾经预料，这场战争就要像小说家、和平主义者、科学家、军事家和电影制片者们所说的那样，从天而降令人肝胆俱裂的大火。当对德宣战和空袭警报鸣响之时，人们都带者防毒面具进入防空洞。150万妇女儿童疏散到乡下去了。人们挖了许多防空洞，医院留出备用床位，政府宣布实施灯火管制。但是，天上并没有降下灾难来。希特勒甚至还未能侵入法国，英国人民继续支持自视清高的张伯伦。英国一切如常，战争来临了也是如此。国家的开支小幅地增加了一点，税也加了一点，必需品并没有定量分配，资本并没有控制，扩充军备的紧急计划并没有推行，失业人数还是100万，军火工厂也没有增雇女工。此外，英国没有组建联合政府，没有调动公众舆论，也没有发出为国牺牲的号召，有的只是坚强的信念：法国一定能够坚持住，“时间对我们有利”，封锁将能够毁掉德国，三军的统帅必将从容应对战事。同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有力行动：大量制造飞机，丘吉尔在海军部忙于指挥，派遣远征军前去法国（司令官是无能的盖米林［Gamelin］将军）。

丘吉尔是唯一富有胆略的大臣，但在挪威方面也许过于大胆。瑞

典北部的铁矿向德国供应铁矿石，其中大部分需要经由挪威的港口——纳尔维克（Narvik）。为阻断这条运输通道，丘吉尔提议派部队穿过纳尔维克，帮助芬兰抗击苏联（苏联于 1939 年入侵芬兰），同时分出部分部队夺取铁矿。这不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主意，但因芬兰的投降而告吹。接着，丘吉尔要求在挪威沿海布设水雷，以阻断向德国输送铁矿石。这个行动和英军开入挪威的计划，驱使希特勒先发制人，下令德军占领挪威。丘吉尔于是力劝政府夺取纳尔维克和其他港口。政府批准了这项行动，军队和舰只进入挪威，但由于空军无法提供空中掩护，英军不久就被赶出挪威。这次失败导致了张伯伦的垮台，反将应对失败负最大责任的丘吉尔推上了首相之位。丘吉尔此时并没有大得人心，但是张伯伦、英王以及重要的议会意识到：英国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领袖、一个自信且富于感召力的领袖来激发人民献身国家。 779



丘吉尔使英国最黑暗的时刻成为其最辉煌的时刻（*Hulton/Archive*）

丘吉尔5月10日就职，立刻组建了一个国民政府，其中工党和自由党领袖都位居要位。他又组建了小规模的战时内阁，自任国防大臣。丘吉尔曾在桑德赫斯特军校受训，在印度当过军官，一战中在西线任少校，又两度担任海军大臣，所以他明确表示：他本人负责指挥战争，这是劳合—乔治无法做到的。同时，这也是一项艰巨的重任。在丘吉尔接掌指挥权的那天，德军以凌厉的闪电战将法国击垮，势如雷电摧枯拉朽。

780

德军战略的大胆和战术的精进，加上法军的无能，造成了一场灾难。德军的闪电式进攻出人意料地取道阿登丛林的狭窄道路，而不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开阔平原。在整个前线，盟军的兵员和坦克都比德军为多。但防守阿登丛林的人数有限的军队，则远不是德军的对手。德军的坦克、运兵车，摩托车和炮车，川流不息地穿林而过，从空降部队先行占领的桥上超过默斯河，然后驶向海岸。这是一个大胆的战略，其神速和出其不意摧毁了行动迟缓的法军的士气。如果不是希特勒下令德军在抵达敦刻尔克之前停止前进，德军本可以将全部英军消灭。从5月27日至—6月4日，英国海军和870艘各式各样的民间船只——渡轮、客轮、拖轮、渔船、游艇、救生船——成功撤离了338000名英国官兵。



快速行进的装甲团横扫法国（*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敦刻尔克之后，希特勒断定，只要取得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便可以将海峡的英国舰队赶走，从而用货轮将德国军队和坦克运到对岸。于是，希特勒下令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皇家空军。这场攻击从8月13日德军的大规模空袭开始。德国空军约有轰炸机1350架、战斗机929架。英国则有战斗机670架、后备战斗机750架，以及每月生产战斗机470架。英国最缺乏的是飞行员。德国进攻的目的是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场、战斗机以及雷达和电话中心，即英军的神经中枢系统。雷达于1924年发明，到1936年才发展到实用阶段。通过1939年的紧急部署，英国空军有了全新的视域，实现了对其东南部上空的全天候雷达监视。

不列颠空战持续了6个多星期。到9月1日；德国击毁英国战斗机338架，击伤104架，德国自己则被击落1 77架，击伤24架。德国的内轰炸还炸毁了机场、机棚和地面飞机，英国空军的7个航空站中有6个被重创，其防御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飞行员每个星期损失达10%。有许多人在清晨跳伞，安全着陆，当天晚上归队作战。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空军、他们的飞机、他们的机场又能支撑多久呢?

德国方面也不得不问他们的空军能支撑多久。德国空军的轰炸机队损失惨重。那些有幸飞回基地的轰炸机往往带回伤亡的机上人员，于是士气受到重挫。虽然情报显示大多数英国机场已被“永久性地摧毁”，但英国飞机从未停止迎击。这种失望情绪，加上英国空军空袭柏林，就使德国在9月7日集中轰炸伦敦。当天有数百吨炸弹落在伦敦东区。德国空军司令戈林（Goering）激动地打电话给他的太太:“伦敦成为火海!”在接到同样的报告后，英国空军少将基思·帕克（Keith Park）说:“感谢上帝。”他要表达谢意，是因为“那按部就班的德国人终于把他们的攻击目标从我的重要航空站移开了”。目标的转移冲淡了德国的攻击。但即使德国空军没有作出以上调整，他们也立刻要面对英国空军新战术的打击。9月7日，当德国空军正要转身返航时，英国空军的战斗机庞大编队忽然自高空俯冲而下，将德国飞机的队形冲乱，一举击落多架德机。这天德国空军损失战斗机52架，而英国仅损失26架。9月27日，德国损失52架，英国损失28架。9

月30日德国空军的损失更大。于是，希特勒下令停止空中攻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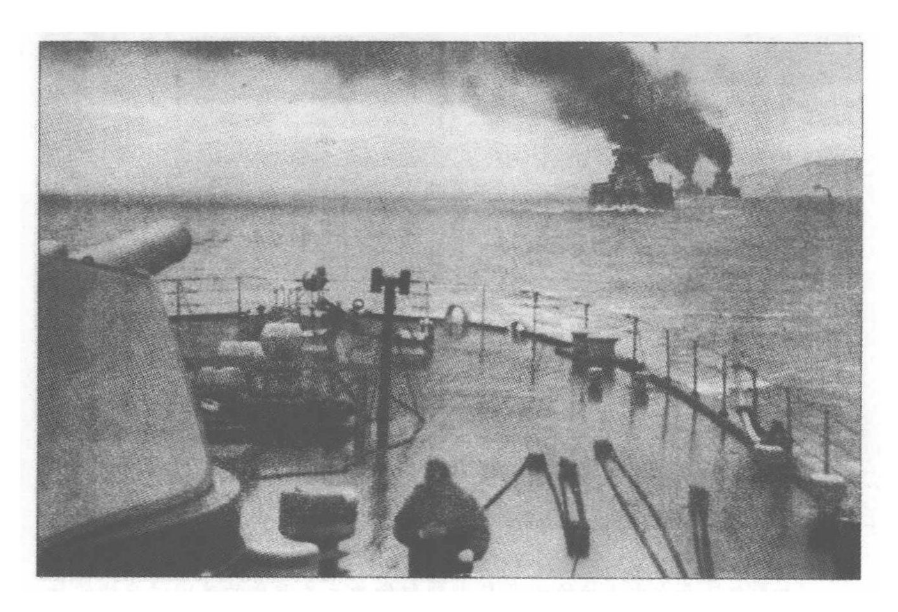
英国之所以能在空战中取胜，有多种原因：戈林将攻击目标从机场转向城市；英国空军的进攻战术得到更新；英国空军飞行员的英勇作战。丘吉尔对此的评论是："在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中，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感到得益于这么少的人。"但是，少数人也得益于多数人，后者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地勤机械师连轴转地工作，防空监测员和雷达操纵员在全无遮掩的地点观察守候，飞机制造工人从1940年4月至9月超额制造的生产的飞机多达650架。

从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英国独力对德作战。英国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得到由世界各地商船队运来的物资。德国海军上将邓尼兹（Doenitz）说，如果我们每月能够将接济英国的商船击沉70万吨位，英国就会崩溃。而在1940年9月，希特勒无力这么做。他把德国的资源优先提供给空军和坦克军团，海军只处于次要地位。不过，希782 特勒仍然拥有一支水面舰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装备新、火力强，而且装甲较厚，引擎强大。在德国入侵挪威以前，这支舰队在德国空军的协助下每月击沉英国商船10万吨位。但是，英国海军的力量毕竟更强，舰只更多。在挪威战役中，德国损失了一半驱逐舰、8艘巡洋舰中的3艘和2艘袖珍战列舰中的1艘。1941年5月，德国又丧失了威力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这些损失将德国水面舰队赶出大西洋。

在这个关头，邓尼兹改用潜艇战。德国这时每年能生产潜艇的200艘以上。1942年，德国的潜艇，加上从挪威和法国飞出的德国空军轰炸机，每月能击沉英国船只65万吨位。1943年3月初，38艘德国潜艇攻击两个庞大的英国护航商船队，击沉船只14.1万吨位，本方仅损失1艘潜艇。这时，尽管护航空军不足是一个问题，而问题的要害是格陵兰通道（Greenland Gap）和邓尼兹的"狼群"（Wolf packs）。所谓格陵兰空带，是大西洋中间的一条300英里宽的海上航道，盟军的陆地轰炸机无法对这个海域提供空中掩护。德国潜艇可以在此处海面上浮加油，在夜间快速航行，其航速较护航舰只为快。所以到3月中旬，格陵兰空带的德国潜艇和直布罗陀的远程轰炸机已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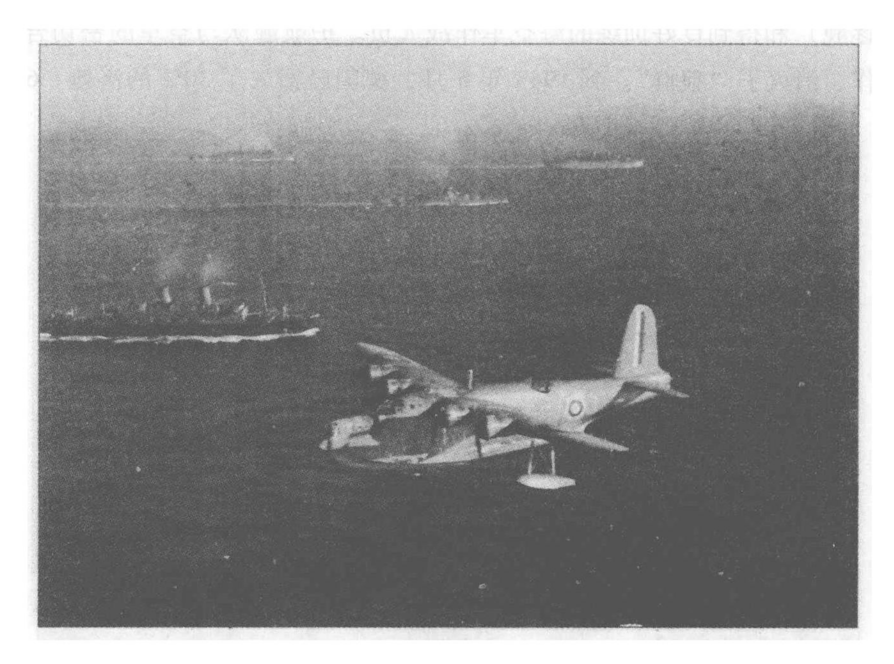
确实威胁到英国的生命线。在此之前，德国远程轰炸机造成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潜艇，迫使英国将第一艘配置弹射器发射战斗机的航空母舰投入护航。这些舰载战斗机和远程战斗机，连同经改进的雷达和探照灯，很快就对邓尼兹的潜艇以致命的打击。到 6 月，德国的潜艇攻势停止。4 月，盟国船只损失下降到 3 月的一半，5 月损失进一步降低，而德国潜艇的损失则大为增加。英国恰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及时运用 783 了适当的技术、资源和战术。

技术在这里是指雷达。英国雷达的波长超出德国方面的接收范围，而盟军的护航舰只和空军可以用雷达发现德国潜艇的位置。资源来自美国援助的远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这些装备马上解决了格陵兰空带问题，而且可以投掷新型的深水炸弹和发射新型的火箭，能够迅速摧毁德国潜艇。同样重要的是得到增强的护航舰队（包括 260 艘美国驱逐舰）和得到良好训练的海空军作战人员。护航舰队与空军的密切合作，消灭了"狼群"。到 1943 年 5 月，德国已损失了 30% 的潜艇。6



从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到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始终保卫着这座岛屿及它的贸易（*Imperial War Museum*，*London*）

月，邓尼兹停止了潜艇攻势。海战是旷日持久、艰苦卓绝和损失惨重的战斗。到战事结束时，德国共击沉盟国商船2828艘1500万吨位、军舰175艘，其中大部分是英国船（舰）只。盟国则击沉对方潜艇789艘，大多数属于德国海军。在这些统计数字的后面，隐藏着许多非战争人员的生动感人的事迹，有惊天动地的，有可歌可泣的，有殊死奋斗的，也有令人兴奋的。对于英国陆军士兵而言，一战最可怕的是那种压抑恐怖、紧张状态和旷日持久的折磨——无处不在的泥泞战壕和无穷无尽、单调乏味和毫无希望的日子。而对于英国空军、海军、坦克手这些不列颠战役、海上战役和沙漠战役的英雄而言，最可怕的是突如其来的袭击——鱼雷突然射入船舱引起惊叫、窒息和死亡；或在一架喷火式战斗机上，心情愉悦，周围是蓝天白云，丽日当空，美不胜收，忽然敌方炮火袭来，立即机毁人亡。 784



护航舰队和空中掩护挫败了U型舰艇偷袭至关重要的英国供应线的行动（*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虽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存在很大差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1年的最黑暗的日子里，与前一次大战仍然存在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那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英国怎么能够击败德国？另外一个问题是英国怎么会确信在地中海击败德国。

地中海战略

1940年6月至1945年5月，英国将兵员和物资大量投入地中海战区。1942年11月之后，美国也进入该战区对敌作战。丘吉尔和他的将领们坚持认为地中海战略将德国的人员和物资从于1941年6月开战的苏联战线引开，因此卓有成效。而且在1944年春季及以后，这个战略还将德国军队从西线引开。这一战略的批评者说，这个战略毫无成效，由于将大量资源消耗在遥远的沙漠里，使进攻法国延迟了一年甚至两年；而攻入法国就能结束苏联的流血牺牲和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地中海战略是否明智的争论始于1941年12月，当时英美两国设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后这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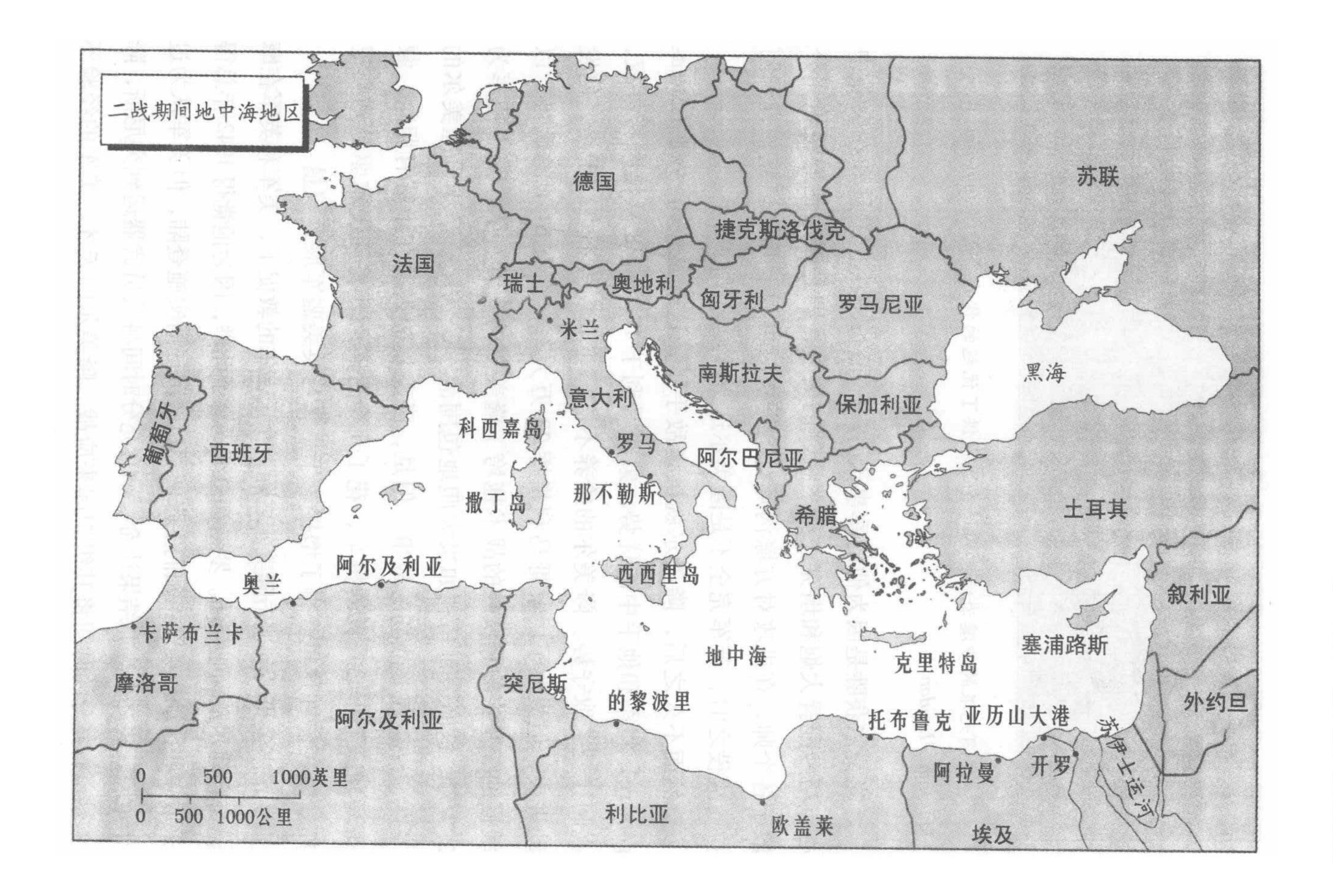
7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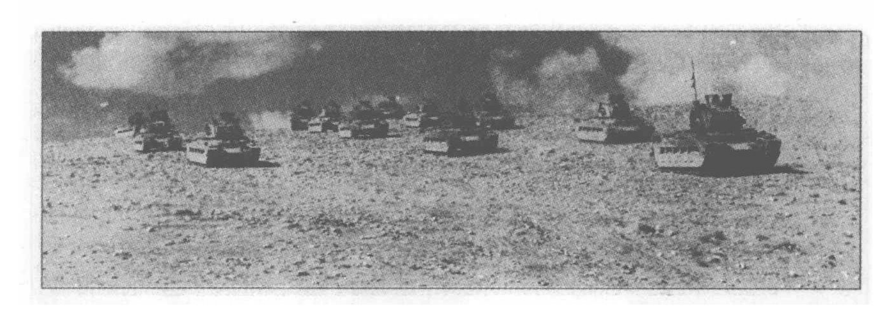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地中海战略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它是当时的形势和旧日的诺言交织作用下临时采取的应变之举，并无内在逻辑性。1940年6月，墨索里尼终于相信希特勒会取得最后胜利，倒向德国一边参战。他下令驻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进攻驻埃及的英军。英国本能地奋起保护埃及，因为苏伊士运河是英国通往东方的生命线，也是通往波斯湾油田的必经之道。这一线的战事于是接踵而至，盟军从摩洛哥一直打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意大利。英军在利比亚的胜利和德国的潜艇战在大西洋的胜利（这打消了盟军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线的计划），导致美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和利用这个良机来测验新组建的军队。1942年冬盟军在突尼斯的几次败北和1943初的胜利，促成坦克和兵员的大规模增援，也使西西里岛登陆成为盟军跃跃欲试的作战计划。攻入西西里之后便是攻入意大利，这是将德军从苏联和西线引开的最快途径。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击败利比亚东部的意大利军队，第二步是英国协助保卫希腊和克里特岛。利比亚大捷的取得出人意料，因为5万

英军击溃了50万意军。英军的大胆包围迫使意军全军投降。这样，控制整个北非便已近在眼前了。但是，丘吉尔不增派援军到利比亚肃清轴心国残敌，反而下令将英军56000人、28000辆战车坦克和许多作战飞机调往希腊和克里特岛去增援该地的英军，抗击已经攻入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德意军队，保卫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安全。丘吉尔是喜欢下赌注的，这次又像在挪威的纳尔维克战役一样过度分散了自己的兵力。1941年5月2日，当德国坦克扫过希腊时，英军又重演了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不过这次英军损失了5万—6.2万人。德军伞兵部队夺取了克里特岛，英军又损失了1.8万人。希腊和克里特岛的英军和希腊军总数超过德军，但他们的空中优势不够。同时，他们也不知道如何阻截迅速前进的德国坦克部队。同样隆美尔（Rommel）将军以两个小型坦克师和一些意大利部队在北非击败了英军的北非部队。随着隆美尔的出现，沙漠战进入惨烈的阶段。

欧盖莱（El Agheila）（约在的黎波里以东450英里）到阿拉曼的距离约700英里，中间都是沙漠，阿拉曼在亚历山大里亚以西60英里处。托布鲁克就坐落在两地中间的海岸线上。1941年3月31日，隆美尔从埃尔阿基拉向东进攻。在4月和5月两个月中，他将英军驱赶到托布鲁克以东，但这座城市仍在英军手中。6月英军以“战斧计划”（Operation Battleaxe）进行反击，阻止了隆美尔的东进。于是，双方形成拉锯战，互有进退。11月，在丘吉尔的督促下，英军实施大规模进攻的“十字军计划”（Operation Crusade），结果损失惨重，隆美尔乘机向埃及边境推进。但隆美尔给787养跟不上，只得又退回到9个月前占据的欧盖莱附近。双方各自补充兵员坦克，到1942年5月26日，托布鲁克以西100英里处的加沙拉展开大规模战役，直至6月15日。英军与敌军的力量对比为：兵员2:1、坦克3:1，但仍然被隆美尔打败。不过，隆美尔兵力也被削弱了，只剩下60辆坦克。一名战术保守的指挥官这时会巩固所取得的战果，隆美尔却不然。他立刻东进，一星期向前推进300英里，沿途缴获了许多坦克大炮。6月20日，他轻易拿下守军士气低落的托布鲁克。7月，隆美尔的军队已经抵达阿拉曼，距离亚历山大里亚仅60英里。


二战期间地中海地区
德国
苏联
法国
捷克斯洛伐克
瑞士
奥地利
匈牙利
罗马尼亚
米兰
南斯拉夫
黑海
意大利
保加利亚
葡萄牙
科西嘉岛
西班牙
罗马
阿尔巴尼亚
撒丁岛
那不勒斯
希腊
土耳其
阿尔及利亚
奥兰
西西里岛
叙利亚
卡萨布兰卡
塞浦路斯
地中海
克里特岛
摩洛哥
突尼斯
的黎波里
外约旦
阿尔及利亚
托布鲁克
亚历山大港
苏伊士运河
0 500 1000英里
阿拉曼
开罗
0 500 1000公里
利比亚
欧盖莱
埃及



广阔无垠的沙漠为经典的坦克战提供了优越的作战条件（*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隆美尔获胜是因为他的军事天才——擅长于快速推进和在突破中心点巧妙配置大炮和坦克。英军将领的失败，则是因为他们将坦克分散于各个师，在进攻对方壕沟环绕的据点时再派上几辆坦克。直到阿拉曼战役之时，英军完全不是隆美尔这头沙漠之狐的对手。

然而不久之后，隆美尔就棋逢敌手了，这就是蒙哥马利（Montgomery）将军和他手中的优势。蒙哥马利于1942年8月接掌指挥权，在阿拉曼采取守势。隆美尔的给养不济，非取攻势不可。于是，他发动进攻，但失败了。蒙哥马利指挥23万大军，拥有6：1的优势，以缓慢的、坚定的和质朴的战术拖垮了隆美尔的8万军队，其中德军为2.7万。这时蒙哥马利如果大胆地包围敌军，就能一举围歼隆美尔的军队，结束北非战场的战事。但是，隆美尔的天赋在于富有胆略。蒙哥马利这个小心翼翼的将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将隆美尔驱赶到突尼斯。隆美尔在这里获得了增援，于是又与英美盟军展开较量。

正当蒙哥马利追击隆美尔之际，在丘吉尔的敦促下，美军和英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罗斯福总统同意了此举，因为他觉得1942年总得采取一些行动。英军将领们主张两军也在突尼斯实施登陆，但美军认为过于危险，将之否决。结果让希特勒有充分时间将兵员武器运到突尼斯，隆美尔也有充分的时间将其组织起来应战。隆美尔的天才、美军的经验不足、英军的行动迟缓，使得北非战争拖到1943年5月12日才结束。

788 总结一下地中海战略的得失，希腊和克里特战役应算是严重的错

误。至于沙漠战争的得失就很难理清。这场战役固然保全了埃及和苏伊士，但盟军的兵员损失远过于德军。起初，发兵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意味着战争资源的巨大消耗，但最后希特勒愚笨地企图救援突尼斯，导致数千德军阵亡、25 万德军被俘。德军的这个重大损失当然令斯大林感到高兴，他一直埋怨盟军拖延开辟第二战场。地中海战略的本意，就是为了消耗轴心国的兵力。在这一点上，战略是成功的。而丘吉尔利用这个成功，劝服犹豫不决的罗斯福同意出兵西西里。而这个行动，就等于进攻意大利。

如果进攻西西里早一个月发动，就能够迅速取胜，从而早日进军意大利。而且，如果向罗马方向进发，就能在德军接防这个城市之前攻下罗马。但是，那位谨小慎微的蒙哥马利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他集结了与诺曼底登陆相当的兵力——2590 艘船舰、8 个师和两个空降旅——才进攻西西里岛。而且，在美国军官看来，蒙哥马利完全忽视空中和海上力量的协同作战问题。德军在造成英军重大伤亡之后，逃往意大利本土。盟军沿意大利半岛的山脉北进十分缓慢。在那不勒斯以南的萨莱诺（Salerno）和罗马以南的安其奥（Anzio）的海上登陆受阻。在亚平宁山脉的卡夏诺山（Monte Cassino）向上冲击的部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从 1943 年 7 月 10 日到 1945 年 5 月 2 日，德军将盟军拖在意大利不得动弹。在 1944 年春天时，盟军在意大利的总数要比德军多 1 倍，这个比例与北非战场不相上下。地中海战略诚然将德军引离了苏联战线和西线，但也耗费了盟军相当数量的兵员和物资，特别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所急需的登陆船只。

广袤帝国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以往的战争相比，更具有全球性战争的特征。战争遍及广阔的欧亚大陆、大西洋和太平洋及其岛屿以及非洲各地。这场战争蔓延到了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英国从苏丹和肯尼亚调集军队，将意大利人从法属索马里和英属索马里逐出（这是意大利在 1940 年侵占的），后又将阿比西尼亚和意属索马里的意军逐出。在苏丹的

英军包括两个印度师和苏丹国防军；在肯尼亚的英军有75000人，其中只有6000是英国人。因此，大英帝国给了英国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到1941年12月，日本将这个说法推翻了。12月8日，日军进攻马来亚。12月10日，日军在新加坡以北海面击沉了英国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巡洋舰“却敌号”。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新年到来后，坏消息连绵不断。1月15日，日军攻入缅甸。2月5日，日军席卷马来亚，俘虏25000人。2月15日，他们迫使英国在新加坡投降，而该地是帝国在亚洲的战略中心，有驻军85000人。造成这些溃败的主要原因，是英国在这一带没有形成有效作战能力的空军。日本空军由于没有受到英国战斗机的阻击，因而得以击沉英国两艘主力军舰。而且，正是由于得到空军的掩护，兵力居劣势的日军就能够征服马来亚。

789

英国人的无能和轻敌，使日军在马来亚和缅甸轻易得手。英国将军认为现代军队无法迅速穿过丛林，他们在远东的最高统帅韦威尔将军（Generav Wavell）则认为将日军战术估计过高是个错误。英军将部队散布于马来亚各地，对东部的丛林道路未能严密设防。新加坡的防御体系也很差劲，《泰晤士报》指出新加坡是一个半设防的地方，就像修建了一半的房子。然而各届英国政府，甚至连丘吉尔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解决。而且，英国政府也没有设法改变英缅军队装备不良、丛林战术训练欠佳和缺乏空军掩护的状况。所以，规模较小、战术素养更高、武器装备更好的日军，在空军的掩护下，既能够迫使6万名英军取道丛林撤退。英军的这次距离达1000英里的败逃，受到疟疾、痢疾和日军的侵扰，伤亡约3500人，沿途充满粪便和死尸的恶臭。甚至连无所畏惧的丘吉尔也试图将缅甸抹去，但美国不同意这么做，希望保持通往中国的公路畅通。美国的财富和势力确保了决定权。

这样，在1943和1944年，深孚众望的“比尔”斯利姆（“Bill” Slim）将军重建这支军队。为削弱日军力量，他派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准将率领他的名为钦迪特（Chindits）的游击部队深

入敌后作战。温盖特就像阿拉伯的劳伦斯，颇有浪漫气质、才智过人、有胆有识，但只有一点不像劳伦斯，那就是傲慢，常常盛气凌人。他的游击部队在丛林中有许多英勇事迹，但除了训练英军丛林战术而外，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1942 年在法国发动的迪耶普（Dieppe）偷袭也没有成功，但使英国人学会了后来在法国登陆时需要的本领。许多英国人投军参加二战也和以前参加一战的老兵一样，顽固坚持那些过时的战术和武器。但在两次大战中，他们最终都学会了新东西：海军将领认识到航空母舰是无价之宝，陆军将军见识到机动性强的坦克集群的威力，旅级军官终于得知丛林可以穿越。英国人确实都在学习，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句古代谚语：英国人总是打败仗，但只有最后一战例外。

期利姆将军确实胜了最后一战。他和他的将士们都掌握了丛林战术、伞降作战、无线电联络、伪装掩护、空投兵员给养和空中掩护。1944 年，全军的后勤供给的 94% 从空投获得，空投者大多数是美国空军。美国要求斯利姆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和夺回上缅甸的机场，这样就能将战争物质运给依然牵制大批日军的中国军队。温盖特游击部队的袭击行动还有一个有利的作用。因为这支部队在印度组建，而日军曾以 8 万人的兵力进攻印度，但在英帕尔大败，损失了 53000 人，被迫撤退。如同德军在埃及和苏联一样，日军战线拉得太长。德国和日本都赢得了开战之初的数场战役，因为两国蓄谋开战已久，采用了先进战术和武器，拼命要征服其他国家。可是两国愚蠢地与更大、更富裕　790 和人口更多的国家交手，这就注定了它们最终失败的命运。

法国解放和德国战败

阿尔卑斯山和巴尔干山脉，为德国提供了比大西洋还要坚固的防御屏障。为帮助苏联击败德国，英美必须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 3000 英里海岸线上某处登陆。1943 年，盟军选定登陆地点为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省海岸。最高指挥官是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将率领登陆大军。战前准备工作广泛而彻底。德国在法国海岸构筑防御工事已经 4

年之久。德军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兵力为60个师，而盟军参加登陆进攻的只有37个师。在这37个师当中，只有7个师能在第一天登陆，完成全部登陆需要7个星期时间。这是相当危险的作战行动，但是仍以实力为后盾。

盟军方面的军力构成是5300艘舰船和12000架飞机，拥有制海权和制空权。英国情报部门对德国使用欺骗战术。1938年，英国缴获和重装了一部德军用来发布重要命令的编码机。通过破译德国密码，英国能够在关键时刻读出敌方秘密信号，得知德国的担心之处，用双重编码系统发出密码欺骗德国。结果，差不多所有英国作战行动，都出乎德国的意料。比如在1943年，英国将一份假文件放在一具尸体身上，让尸体冲上西班牙海岸。德国人看了这份文件后相信英军将在希腊登陆，而不是在西西里。诺曼底登陆也出乎德军的意料。英国对加来海岸实施饱和轰炸，向德国情报人员透露假情报，使德方以为登陆地点就在海峡正对岸。德国空中侦查，也发现埃塞克斯和肯特两地有大批军队集结。他们所见到的，是假登陆艇、假滑翔机、充气橡皮坦克和刚征募尚待训练的新兵。经过充分训练的部队和装备，都隐藏在英国南部的新森林里面。

登陆行动充满危险。第一天战况不尽如人意：伞兵着陆不准确、海上波涛汹涌、坦克运输船被冲沉、海滩太过拥挤、坦克损毁、未发现的防御工事等等，因此当天夺得的滩头阵地小于预期。德军方面，只有希特勒有权调动军队，但他那天睡得过晚；加上隆美尔看到海面风浪很大无法登陆，旅行去了；而在附近的装甲师按兵不动。这样，盟军得以扩展滩头阵地，并将从英国运去的浮动码头装好下锚，然后大批兵员、坦克和大炮，都从这种浮动码头登陆，投入为期6星期的诺曼底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蒙哥马利的英军组成东翼，负责进攻卡恩，与德军最强的坦克军团交手；而美军则构成西翼，需要突破密布篱栅和重兵把守的田野。7月26日，巴顿将军及其所指挥的美军突破敌阵，攻入布列塔尼；7月31日，另一支美军部队攻入罗亚尔河流域，此地的德军都被希特勒愚蠢地调往增援被围的卡恩去了。8月中

791

旬，蒙哥马利横扫法国北部，8月26日夺取巴黎，接着很快连克凡尔登、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此时，德军已退到德国国境防线一带，与盟军坦克的对比是1:20，与盟军飞机的对比是1:25。德军西线参谋长说："莱茵河后面便没有德国军队了……，我们的前线门户大开。"然而，战争又延续了8个月之久。

这种拖延，出于盟军的内部争执，战略上的迟疑妥协；也出于希特勒自杀式的顽抗和德国人的顽强精神。盟军的内部争执之一是蒙哥马利与巴顿争后勤补给，另一场争执是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在战略上的纷争。蒙哥马利自信心过强，十分武断而不近人情，一再要求全部盟军必须置于一人指挥之下，要求北路应集结40师兵力进攻德国。由于未能达到以上目的，蒙哥马利又转而要求将战争物质的大部分交给他统率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但是，他在安特卫普和荷兰的阿纳姆（Arnheim）两地的战绩授人以柄。在安特卫普，蒙哥马利未想到要夺取主要桥梁；在阿纳姆，1万名伞兵降落地点不准确，但他行动迟缓，致使1130人被德军击毙，6450人被俘。北路进攻并不容易。

可是，艾森豪威尔的宽幅进攻战略，也不容易奏效。巴顿所统帅的南路，在美兹河被阻；蒙哥马利在荷兰陷入困境，所以两军之间的联系必然偏弱。12月16日，希特勒已经迅速地将西线德军重新集结起来，又重复使用1940年的闪电战术，突破阿登森林，推进60英里，击溃了美军，结果德军耗尽了油料。到1月，德军不得不全线撤退，但这对盟军是一个重大挫折。正如阿纳姆暴露了蒙哥马利战术的弱点一样，阿登攻势则暴露了宽幅进攻战略的弱点。盟军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总是在犹豫不决再相互妥协。不过，历史上联盟国家用兵，总是充满了错误和混乱。英美盟军在欧洲战场的合作，在历史上已经算是成功的一页了。延迟和混乱局面与这支大军的强大和胜利比较起来，只是十分次要的方面。5月2日，盟军和苏联军队击败德国。

希特勒能够坚持这么久的原因之一是他一直相信飞弹和火箭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原因之二是因为盟军的轰炸未能摧毁德国的士气，也未能大幅度减少德国的军火生产。交战双方都抱有相同幻想，以为轰

炸能摧毁对方的士气，减少对方的军火生产，结果双方都没有做到这点。从 1944 年 6 月至 1945 年 3 月，德国发射 V1 飞弹袭击伦敦，这种飞弹是一种靠喷气推进的、无人驾驶的飞机。从 1944 年 9 月起，又发射 V2 飞弹，这是一种 50 英尺长、携带一吨炸药的火箭。V1 飞弹声音甚大，吓坏了伦敦居民；V2 飞弹没有声音，因为其飞行速度超过音速。两种飞弹都使数百居民丧生，因房屋被毁而无家可归者更多，但它们都未能动摇英国人作战的意志与决心。同样，盟国的集中轰炸也未能摧毁德国的军火生产，而且其支持者坚称也没有摧毁其士气。盟军 1944 年的定点轰炸，并没有能够阻止德国将飞机生产翻了一番，只是阻吓了 25 万德国人在当年参军。盟军的轰炸虽然使德国的战时生产降低了 9%，但这消耗了英国战时生产力的 25%、美国战时生产力的 15% 来生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飞机作为战术武器，掩护陆军和船只，是无价之宝，但用于轰炸，则大多只能造成无用处的破坏。当时如果多造坦克和登陆艇而少造轰炸机，那么，战斗或许会结束得早些。

792

到 1945 年 5 月，战争算是结束了，但使盟国分裂的一些重大问题仍悬而未决。关于欧洲的重大问题有两个：一是众所周知的对德问题，二是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不言而喻的争执。精力旺盛的丘吉尔在战时敦促盟国开了不少会议：与罗斯福在魁北克、华盛顿、开罗和卡萨布兰卡的会议；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议；与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会议。这些会议对于战争谋略和维护团结很有用处，但它对解决欧洲的未来问题却起不了多大作用。1945 年 2 月，三巨头在雅尔塔决定将德国分为英、美、俄三区，并同意波兰的东西国界都要向西移动数百英里。但是，波兰和巴尔干诸国划归苏联势力范围，却是苏联军队而不是雅尔塔会议决定的。美国和英国对此无力阻止。

罗斯福也许对美苏友谊太过乐观，而对他自己不在行和善意的外交太过天真，但这一切对后来东欧局面的形成丝毫没有作用。而丘吉尔坚持要把伦敦的波兰反共政府搬到华沙，同样徒劳无功。在雅尔塔会议上，东欧并没有被出卖，因为西方没有什么可以出卖。苏联的国家利益需要波兰和巴尔干建立友好的政权。这些国家都变成共产党国

家，但这并没有令英国人民不安，因为经过 5 年的战争，他们所担心事情已大不相同。

公民的战争

1940 年，英国议会投票决定：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举行议会大选。各党也同意，不参加由其他政党控制的选区内的补选。政党政治在战时被禁止，无党派政治和民族团结成为新的口号。丘吉尔身体力行，他将工党高层领导人，悉数邀请加入其政府。寡言少语而很难给人印象深刻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担任副首相。笨拙而不善言谈、自学成才的运输工会领袖埃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成为劳工方面的总管，这对他而言等于一切与经济有关的事务。伦敦警察之子、长期主管伦敦郡委员会的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成为内政大臣，负责解决战争及闪电战造成的一切紧张状态。才智过人、洁身自好、十分独立的左翼人士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成为卓有效率的飞机生产部大臣和下院议长。甚至丘吉尔本人，也是一位无党派偏见的人物。他 24 岁当选保守党议员，33 岁成为自由党大臣，50 岁担任保守党财政大臣，60 岁成为无党派的后座议员。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超党派人士；而在若干人眼中，他是一名传统的辉格党人。据艾德礼说，丘吉尔的内阁，从来不以政党分野。

793

在敦克尔刻危机和不列颠战役的紧张之时，丘吉尔用坦诚的态度、过人的口才和坚毅的精神，来征服那些诽谤者。他许诺的不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鲜血、辛劳、泪水和汗水”。他以坚毅的语气说道：“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我们要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要在田野里和街道上战斗，我们要在山上战斗，我们绝不投降。”他的言辞和勇气，深深地打动了那些已经对泄气胆怯的言论感到厌烦的人们。在轰炸伦敦的最黑暗的日子里，丘吉尔激动人心的讲话，给英国千百万人民带来令人振奋的英雄主义精神。

1942 年，随着希腊、克里特、新加坡、托布鲁克战败的消息接踵

而至，这种辞令又变得十分苍白。政治上的批评重新抬头，虽然并不是基于政党立场。这些批评指责坦克制造不够精良和飞机制造的能力不足，或者对丘吉尔鲁莽战略表示怀疑。可是在 1942 年 6 月议会进行的对丘吉尔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中，只有 25 名议员投了赞成票，40 名议员投了弃权票。多达 476 名议员对丘吉尔表示支持。然后，到 11 月的阿拉曼大捷传来，战时对丘吉尔的批评戛然而止。通观战时的民意测验，英国人民肯定丘吉尔领导的比例保持在 78% 以上，但对保守党的支持率就没有这么高。对党派政治的禁止，并不能左右政治观点和民意表达的变化，而在战时这种变化一直不断地向左翼的社会主义靠近。这样的运动从全社会分担伦敦轰炸的痛苦和牺牲的经历中，获得巨大的推动力。

在 1940 年 9 月 7 日开始的伦敦轰炸中，J. B. 普利斯特利（J. B. Priestly）成为走红的小说家和播音员。他将这场战争称之为公民的战争，普通公民是战争的领导者和英雄。到 1941 年 2 月，政府一共发放了 250 万顶安德森防空蓬——一种波形皱纹铁制成的铁蓬，人们将它埋于后院，上面覆以泥土，每个防空蓬可以容纳 6 个人。政府和人民还修建了可容纳 150 万人的公用防空洞。伦敦的防空洞（蓬）能为 4/5的伦敦人提供防空保护。当轰炸开始之初，许多公共防空洞都没有厕所和其他必要设备。政府也对那些从安德森防空蓬钻出来后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毁者如何安置，没有应急预案。到 1941 年 6 月，英国被德国空军炸毁或严重损坏的房子共 50 万幢，其中 60% 在伦敦，空袭中遇难的平民 43000 人，受伤者数以万计。每次轰炸后，都有 15.5 万个家庭没有煤气和水电。数以百万计的公民承担无报酬的志愿工作，如协助无家可归者、救火和放送空袭警报等等。他们加入消防队、空袭警报队，到社区食堂和殡仪馆工作，给轰炸受害者送热茶、毯子和慰问，参加修理小组工作——都不领报酬。这是志愿精神的最好表现，这种精神植根于过去，但能与扩大的政府密切合作。

794

在空袭期间，英国人在各色各样的防空设施——地下防空站、教堂地下室、旅馆大厅、洞穴、铁道涵洞、土耳其浴室里度过了许多夜

晚。每一处防空设施都有其特色，但大家都有一种共同承担牺牲的邻里相助精神。在工厂里和田地里，公民们人人为了抵抗纳粹而加倍努力工作，也都产生了相同的精神。张伯伦实在拖得太久了。到 1940 年 4 月，仍有 100 万人失业，妇女还呆在厨房里。到 6 月底，英国还只有 160 辆坦克。8 月，德国潜艇已经威胁到英国的粮食供应，德国空军也已经威胁到英国的城市。9 月，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和护航舰只出现短缺。飞机制造厂和造船厂的工人，农民和商船水手，对战争的重要性，不亚于军队官兵。大体说来，他们都对战争尽了自己的职责。

农民耕种的土地，从 1200 万英亩增加到 1800 英亩，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他们不仅耕种了多年未动的草地，并且耕种了高尔夫球场、公园绿地、温莎宫的王室土地以及苏塞克斯的草原。成千上万的普通城市居民也耕种了 140 万英亩家庭园地。飞机制造成倍增长，产量由 1938 年的 3000 架增加到 1943 年的 26000 架。坦克、大炮、炸药、卡车、子弹、机关枪从工厂里运出，英国将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 55% 都用到了战争方面，这是盟国中首屈一指，比美国的 40% 要高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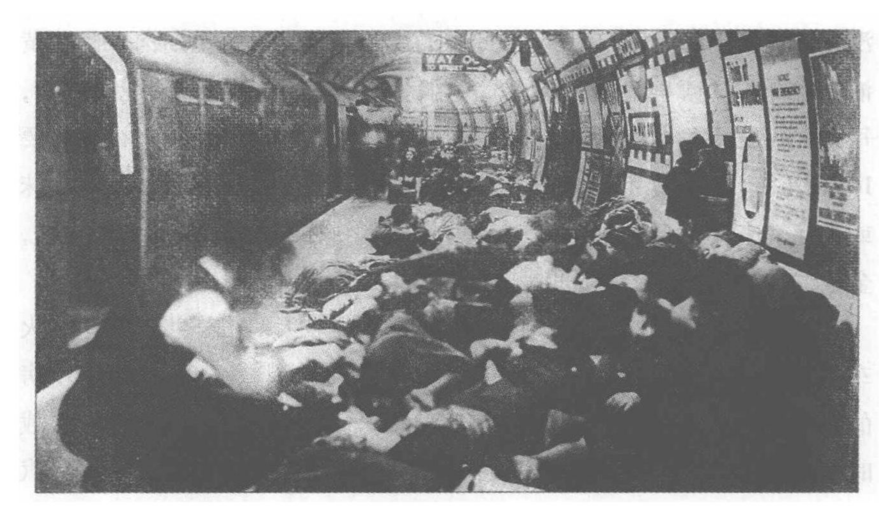
为了汇集这些力量，英国政府混合采用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英国政府的战时权力之大超过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政府权力，享有控制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全权，也享有确定工资和物价的巨大权力。政府拥有和管理 265 个工厂，其设在乔利（Chorley）的皇家军械厂（Royal Ordnance）拥有 35000 名工人和 1500 座建筑物。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缺乏，后通过征调 19—40 岁妇女的办法加以解决。到战争结束时，英国有 675 万人在服兵役或在工厂工作，工人按规定每星期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0 小时。为了支付这笔巨大的薪饷，政府征收标准税率为 50% 的所得税、100% 的奢侈品消费税，并将烟酒税率提高，同时鼓励储蓄。公民储蓄的比例占税后收入的 1/4。虽然这时全民就业，工资提高了，政府的支出也很大，但是战时物价只上升了 50%。不过，战时经济并非各方面都进展良好。中央计划时常脱节，分包数量过多，劳动力的使用常常效率低下，旷工比例很高。潜力很大的工厂管理层，常常藐视工会领袖，率领工人举行局部罢工。煤炭



清理闪电战造成的废墟（*Hulton/Archive*）

的生产下降了15%，数千辆坦克的发动机和枪炮存在瑕疵，1400辆卡车的活塞存在缺陷，这类问题导致蒙哥马利横扫莱茵河地区的行动受阻。

795　在这场公民的战争中，英国科学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德国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号（*Gneisenau*）在布莱斯特被炸沉，不只是高空轰炸机的轰炸员扳动了投弹开关，坐在雷达屏幕前的雷达兵也出了一份力。机载小型雷达有助于大西洋海战的胜利。1942年前，英国科学家对原子弹的研究也居于领先地位，后来美国以丰富的资源和雄厚的财力将其研制完成。英国科学家在各个领域



防空洞（*Radio Times*，*Hulton Picture Library*）

都有建树，例如设计了逃离被击伤的潜艇的方式，制定了 D 日之前准确轰炸法国铁路的计划，配制了战时工人的营养餐食，改进了各种武器，研制了远较一战时更好的药品去挽救生命。盘尼西林这种挽救生命最多的良药（20 世纪科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英国发明的。这次战争伤兵的治愈率，远较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为高。这对成千上万的人而言，这是二战最重要的事实。社会科学家对这场战争也有贡献，他们进行民情调查和民意测验，以了解公众对政府增加赋税和实行物资配给的忍受程度——他们发现公众的忍受程度相当之高。此外，他们还研究战争对参战公民的影响。 796

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清苦生活方式带到英国，其冰冷的指头触及了生活的所有方面。所有日常食品和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制，只有面包、烟草和啤酒除外，但啤酒均用水稀释。有的食品供应相当多，不过通常是些非精细食品，如牛奶、土豆和蔬菜，这类食物的消耗量较战前增加了 30%—40%。人们比较喜欢的精细食品，如肉、鱼、家禽和食糖，消耗量则下降了 20%—30%，水果也下降了 40%。香蕉绝对

没有，鸡蛋则每人每年30个。此外的配给有，每人每星期肉1磅、黄油4盎司，食糖8盎司，奶酪8盎司，茶叶2盎司。在服装配给方面，每人每年发给一本48张票，而一件呢大衣需要18张票，呢礼服需要16张票。所以大家都穿工作用的便服，不穿讲究的衣服了；用毛短袜或不穿袜来代替真丝长袜和人造丝长袜。木料的缺乏使家具出现短缺，金属的缺乏更使男士们排队购买剃须刀片。

排长队现象无处不在，不但在食品店要排队，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和加油站也都得排队。令人最难忍受的是燃料、交通工具和住房的短缺。轰炸使住房成为英国最严重的一种短缺，尤其是因为英国战797 时有3年寒冬，取暖煤炭严重短缺。战时人的流动性增大，火车和汽车都很拥挤，且车辆无法更新，因为坦克和飞机需要优先制造。所以，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公共汽车站前的长队和无穷无尽的等候，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这些以外，还要加上黑暗的不便，因为空袭时停电，英国到处一片漆黑。所有的窗户都遮挡严密，每扇门的门缝都用胶带粘严，往常灯光明亮的城市变得如在坟墓之中一样黑暗。

虽然清苦掩盖了一切，但并没有将英国人逼到绝望，或者去跳河自杀。战时的自杀率反而减少了25%，精神病患者的数字也降低了。虽然实行了配给制，住房被炸掉了，冬天又十分寒冷，但死亡率反而下降。贫穷人家孩子的状况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婴儿死亡率也下降了10%。结婚的年轻人比以往的年份要多，于是战时的生育率上升了17%。物质方面的短缺，也得到了补偿，这就是更多的平等和更亲切的邻里相助精神、更充分的自由和更充实的人生。

更多的平等随处可见。炸弹、配给票和征兵制都完全无视阶级差异。如果说战时税收方面存有阶级差异，那是因为政府盯着富者的银行账户。战时的充分就业也意味着工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公平。战前，占人口1%的最富裕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14%，稍次的10%的富人占有38%的国民收入。战后，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11%和30%。这些统计数字表明，社会正趋向平等，但也表明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战时，富人、贵族和受过高等教育者的生活质量比一般人

要好得多。他们依然上高级餐馆，购置高贵服装，送孩子们上伊顿公学读书，在俱乐部喝杜松子酒与橘汁配制的鸡尾酒，收取房租和进行股票买卖。伦敦西区商店里的食品总要比东区丰富和优质。成本外加赢利的优厚合同使许多制造业者发财。熟练技术工人也赚钱不少。熟练技工每星期可挣7英镑，普通男工每星期仅挣4英镑，而两者都比女工的收入高，即使同工也不能同酬。

上述这些阶级差异并没有压倒对纳粹作战的同仇敌忾之情。各阶层的公民在救生站或救火站里集合，一个工人可以指挥一个银行老板。除了极少数特权阶级之外，其他的人都不分阶级一起排队，一同上酒馆喝酒，一同等候火车，一同上电影院，一同在防空洞里躲避轰炸。

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英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惨淡凄凉而毫无生趣的年代。尽管住处寒冷、饮食乏味，但是，一份防空守夜的工作，可以给生活无着的人一个生活目标；防空洞或社区食堂，也可以给寂寞的人一个安身之所。所以在德军轰炸之后，还有人去防空洞过夜。酒馆更加温暖，阶级之分更小。战时可买的东西少而工资又高，于是英国人把更多的钱花在娱乐上——听歌剧和音乐会，看话剧和赛狗，参加足球、板球、橄榄球运动，或去夜总会、跳舞厅。他们也成群结队地去电影院，那里是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地方。这一代英国人都通通美国化了。英国广播公司尤其受欢迎，其电台广播给疲乏的工人播出喜剧，给农民带来耕作知识，给爱好音乐的人送来贝多芬名曲，给枯守防空哨或消防站的人捎去话剧，给知识界提供学术演讲，而到阿拉曼大捷以后则播送胜利的消息。其最受欢迎的演员是汤米·汉德利（Tommy Handley），他的喜剧节目以丑角手法模仿傲气十足的官僚和神气活现的军官。政府也请汉德利和其他演员，如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到各个工厂慰问战时公民。娱乐从未如此民主化和划一化。 798

战争对许多英国人来说是一次获得解放的经历。这似乎是一种悖论，因为英国政府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强制和审查措施。丘吉尔政府的权力之大，是以往的专制君主梦想所不及的：它可以命令时髦女士进

工厂做工，命令年轻的男子进煤矿干活，还下令封闭了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ly Workers*）。此外，政府下令一律不得刊载、广播危害安全的新闻，甚至连气候广播也不许可，担心敌方借此实施轰炸。但是，虽然政府实行了征兵制、新闻检查和全面的经济指令，战争实际上还是使许多人获得解放，特别是妇女。她们成为有工资收入的人，皮包里装满英镑，从而获得经济独立。她们离家的时间也提前了。离婚率升高，非婚生子的数字也增加了。那清教徒式的性生活条规愈加弱化。人们对精神病患者比以往宽容，对敌人的仇视之心也减弱了。政府和舆论对反战者的态度也趋于人情化，一战时迸发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对“德国人”的仇恨已不复存在。人员的地域流动也对许多人产生影响：在一个3800万人口的国家里，更换住址的次数达6000万之多。宗教信条继续衰落下去。

1900年以来，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数便日益减少。1939年这个数字并不高，而到1945年，这个数字更低。然而，信奉上帝的虔诚，并不见得已经低落。在伦敦城郊举行的民意调查中，男子有2/3、女子有3/5，承认自己信奉上帝。各色各样的宗教信仰，不论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印度教、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还是星相术，无不风行一时。这时，真正出现信仰弱化的是人道主义者对人的信心和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不断进步的信心。这次战争在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怀疑一切的斯多葛主义。诗人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写道：“未怀希望之战是身沐恩典之战。”另外一位诗人基斯·道格拉斯（Keith Douglas）说：“此时纵情多感是危险之事。……而承认有更好世界到来的希望，就是一种罪恶般的愚蠢。”

并不是人人都持有这样的怀疑主义。战争捷报频传的时候，对集体主义的信心逐渐取代了战争初期的那种怀疑一切的斯多葛主义。能够反映这种集体主义的标志之一便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s Report）。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爵士的报告于1942年12月出版，很快就销售了63.5万本全文版或缩写版的报告。该报告主张设立一个普遍的社会保险计划（以参加者每星期供款为基础）

和一个全民保健服务计划。报告还建议对第一胎之后的儿童发放补贴，此项补贴资金不来自供款，而是来自国家税收。此外，报告敦促政府对未享受社会保险的贫民提供直接救济，主张政府保证每一个英国人一律享有体面的最低收入。

这份报告虽得到公众的欢迎，但得罪了许多保守党人，因而被束之高阁。他们更支持具有较温和的集体主义特点的《市镇与乡村规划法案》（Town and County Planning act）和《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这两个法案都是1944年通过的。第一个法案授予地方政府购买 799 私人财产的权力，第二个法案则规定所有人都有权享受免费直至15岁到中学教育。与迪斯累利的家长式政治的措施一样，这些集体主义的法案；都是试验性或妥协性的产物。《教育法案》保持了国教会和天主教会学校的优越地位，并采取了严格的分流措施：分流在儿童11岁时进行，一类是有较强学业水平的学生，升入中产阶级的“文法”学校；其余学生归入另一类，只能进入拥挤不堪的工人阶级的“现代”学校，这种分流使得阶级差别永久化。性别差异仍然很难消除。虽然战争带来了更大的平等，但阶级和性别差异过于顽固，无法予以消除。当卫生部的负责人拒绝为托儿所提供资助之时，企业界的管理者们将71%的女工规定在非技术工种之上，这些工种被划为女工工种。而且尽管战争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但并没有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许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政府和人民能够合力击败纳粹，却不能合力击败贫穷和不平等？保守党对这种民情缺乏了解，这就能够解释该党在1945年大选中败北和英国转而采纳了社会主义的原因。

阅读文献

Corelli Barnett, *The Desert Generals* , London: William Kimber, 1960. 该书记述了5位将军的生平，他们是：奥康纳、坎宁汉、里奇、奥辛莱奇和蒙哥马利，主要记述他们在北非的胜利与失败。

Angus Calder, *The People's War: Britain, 1939—1945*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该书详细研究了战争对平民的影响，考

察了事件相互影响的方式，如阅读书籍的增多是如何导致剧院上座率的下降；妇女参加工作是如何引起社会道德准则的改变。

Peter Calvocoressi and Guy Winch, *Total War: The Story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该书记述了战役与战斗，但其重点放在探讨战争的原因，以及国内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

Winston Churchill, *Memoi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 Abridgement of the Six Volu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9. 该书的作者是与希特勒作战的盟军领导人，文笔优美，带有自己的看法，但在了解战争内幕和进程方面可谓极为出色、无与伦比。

Len Deighton, *Fighter: The Tru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Britai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7. 作者在记述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方面，精神高昂、事实详尽。这场战役以德国微弱的劣势败北，未能摧毁英国的空防。

J. M. Lee, *The Churchill Coalition, 1940—1945*, Hampden, Conn.: Anchor Books, 1980. 该书细致地考察了由丘吉尔为首的包括保守党、自由度和工党议员组成的联合政府，分析了政府的经济政策、社会改革、战略及其成败得失。

Robert Payne, *A Portrait of Winston Churchill*, New York: Coward, McCann and Geoghegan, 1974. 该书是一卷本丘吉尔传记中写得最出色的之一。作者赞扬"一个像雄狮怒吼般的人物，精力充沛、不屈不挠、无所畏惧"，但提到了他的野心、冲动和判断上的错误。

800

Louis Snyder, *The War: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Messner, 1960. 该书简洁、直率地展示了二战的基本事实、关键事件，并作了清晰的解释。

Chester Wilmot,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London: Collins, 1952. 该书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和英国是如何能够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打败德国，并绝妙地分析了胜利能够控制东欧的原因。

F. M. Winterbottom, *The Ultra-Secret*, New York: Dell, 1974. 该书十分引人入胜，像一部侦探小说那么扣人心弦，讲述了英国人如何获得纳粹的译码机、密码以及使用它们来赢得胜利的过程。

第三十章　社会主义的英国：1945—1990年

801

在英国议会存在的700年里，议会只有很少的几次机会能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历史的进程。第一次是1534年的宗教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第二次是1641年的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前者决定英国成为新教国家，后者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决定英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1832年和1867年的议会，则决定英国成为民主国家。1945年的议会，属于这类为数不多的议会之一，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虽然源于过去，但是直到克莱门特·艾德礼领导下的工党政府当政之后，英国才最终确定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付诸实施。

社会主义的实施：1945—1951年

1945年7月，英国举行大选，其中许多年轻人是第一次投票。1200万男女公民在大选中投了工党的票，而投保守党的票者为1000万，投自由党的票者225万，在此以前。工党获得选票从来没有超过总选票的39%，此次却获得几乎半数，并且是通过明确宣布拥护社会主义才获得如此的大胜。

选举工党执政的1200万选民中的大多数，是否真的了解社会主义为何物还是个问题。毫无疑问，其中许多人会接受辞典的定义：社会

主义是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也是工党领袖艾德礼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概念，他竞选中宣称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公有制是根除弊端的良药。可是，大多数英国人并未料想政府将工厂和车间国有化，工党的竞选宣言也只不过是要求实现煤矿、铁路、煤气和电力的公有 802 制。还有许多人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建立一个较高水平的福利国家和实行较高程度的一个计划经济。在工党的工作日程中，排在前面的是公共保健制度和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工党保证要实行计划经济，从而防止经济衰退，消除失业，促进增长，增进平等。

公有制、福利国家和计划经济，是新国家的三大支柱。这反映了一个深刻的信念，即政府必须保证社会的公正、平等和安全。在英国人民心中，社会必须增进公正，推行平等，广求均衡。道德观的增强意味着更多的社会公正、更多的平等和更公平的分配，而不是仅仅是任何的经济学说。这也就是为什么 1200 万选民这次抛弃了领导他们取得战争胜利的政党，而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

这些看法能够深入人心和工党能够击败丘吉尔和保守党的原因甚多。其中一个，便是英国人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情形记忆犹新：贫困、失业、贫民窟、疾病、沮丧和普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保守党政府破坏罢工，攻击工会，削减救济金，实施贫困状况审核制，忽视民众教育等等。此外，保守党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是英国的“罪人”。该党还使英国缺乏应战准备，在外交上受辱和使英国卷入大战。

工党选举胜利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 6 年的战时经历。战时的征兵制、配给制、清苦和伤害，落到所有人的头上，英国人感到作出了共同的牺牲。战争也让英国人了解到，政府的干预对人民的伤害并不太大。难道干预不是帮助英国击败了希特勒，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公正吗？战时经历也给英国人带来更紧密的团结，更深的兄弟友情和更实在的共同责任感。最后，战争的结束导致许多英国人都寄望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看到了新的曙光，看到了一个没有残酷阶级斗争的新英国，一个以争取战争胜利一样大的决心实现社会公正的新英国。

1945 年 7 月，在竞选宣言里宣布要建立新世界的英国工党，对于满足英国人民的这种愿望来说，似乎要比保守党强得多。保守党领袖宣称工党会将“盖世太保”带到英国。丘吉尔运用其富于雄辩的演说才华，在电台演说中提醒听众：工党政府会将“盖世太保”带到英国。但是，英国人民知道，小心谨慎的艾德礼、秉性耿直的贝文和心地公正的莫里森，都曾有管理英国内政长达 4 年之久的经验，这就消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者能否管理好国家的疑虑。英国人所害怕的，反而是在两次大战之间表现得那么冲动的丘吉尔，他派军队前去威尔士的托尼班提（Tonypandy）弹压罢工工人，插手破坏大罢工，派黑衫军去爱尔兰扑灭自治运动，主张不放弃印度。

工党在下院以 393 席对保守党的 213 席和自由党的 12 席。该党拥有如此明显的多数和长达 5 年的执政期，所以有足够的权力和时间去实现新社会理想，而且以速度和胆略完成了预先的构想。政府将 20% 的英国工业收归国有，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福利国家，扩展了计划经济范围。

实行国有化的行业包括煤矿、铁道、电力、煤气、卡车运输、运河、船坞、医院、英格兰银行、航空和钢铁。原已国有化的行业为电话、电报、无线电广播、伦敦的地铁、公共汽车和发电厂。在国有化过程中，发生问题和争执的只有煤气业和钢铁业。而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几乎毫无发生问题，因为该行早已受政府控制。煤矿国有化，也没有遇到什么反对。英国的煤矿一直因循守旧，效率低下，濒临破产，可是对于英国整个经济体系又十分重要。煤矿业需要资本、发展方向和一个整合的而又精力充沛的管理机构，而这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铁道、煤气、电力以及所有垄断性行业的国有化似乎是很自然之事，这些行业也需要现代化。在上述行业实行国有化的过程中，政府给业主支付了优厚的偿金。许多原来拥有煤矿和铁路股票的股东将股票换取了政府债券，变得更加富裕。负责管理这些行业的一些独立的国营公司，如煤业局（Coal Board）和电力会（Electricity Council），而不是政府部门，当然政府负责任命主管人员和下达行政指令。

803



1945—1951 年，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首相，他的外貌与举止温和，指挥果敢有力，辩论强硬有力（*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 Picture Library,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政府属下的各个局负责管理相应的行业，效果参差不齐。煤炭局起初做得不好。其他行业的充分就业，吸引了在煤矿危险环境中工作的矿工。但是到 1967 年，机械化全部实现后，煤炭业的人均产量达到 1946 年的两倍。其他原本状况良好的企业，例如英国航空公司，实行国有制后的经营状况大致与私营时相当。国有化虽然没有创造奇迹，但也没有招致失败。国有化的对象是经营出现问题的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此后直到 1970 年代之前并没有进一步的工业化举措。只是在 1970 年代飞机引擎制造业、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出现濒于破产的情况下，政府才出面相助，重启国有化。

804

工党政府的福利国家建设却有所不同。福利国家的建设一直在推进之中，批评者对这一事实嗤之以鼻，支持者则认为这正反映了它受民众欢迎的程度。这项工作，构成其基础的是 1946 年《国民保险法案》（National Insurance Act）。这项法案遵循了 1911 年《国民保险法案》的原则，规定雇员、雇主和国家均需供款。自雇者也可以参加这项保险。这样，国民保险基金支付养老金以及按星期向失业者或患病者发放补贴。基金还给寡妇、儿童监护人发放津贴，给养育子女的母亲和失去家人的家庭发放抚育和丧葬补贴。相关法案还有：《工伤法案》（Industrial Injuries Act）对受工伤者提供更为优厚的补助和津贴；《国民救助法案》（National Assistance Act）无偿法律补助；《国民保健法案》（National Health Act）提供住房补助和教育补助。所以国民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保障。凡生育第一胎之后子女的家庭，无论收入情况如何，均可领取按月发放的津贴。《国民救助法案》的受益者则只包括赤贫者和没有参加国民保险或从国民保险得到的保障不足者。无偿法律补助，也仅发给赤贫者。

1948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国民保健法案》是福利国家的高峰。自那以后，任何国民都可以自由选择医生或牙医，得到免费诊治，包括医药、装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经济的紧缩，国民保健系统的第一批医院通常设在简易的预制建筑里，但每个患者都可以得到良好的免费医疗服务（*Harrison*，*Hulton/Archive*）

805 假牙和配眼镜。住院治疗和各种手术也是免费。这项服务并不是保险，因为不需要供款。政府用税款支付一切医疗费用开支。医生则得到最低收入保障，并收取门诊费。这样，名气较大的医生收入也较高。由政府委任的地方卫生局拥有和管理医院。在政府接管各地医院之前，医院由自愿组织或地方当局负责管理。国有化意味着医疗服务行业像煤矿业一样开始了社会主义实验，该行业的私有性质或自愿组织管理均已过时。当然，这个行业的工业化也十分困难，十分之九的医生都反对国有化。

住房补助和教育补助使福利国家的建设受挫。战时的轰炸摧毁住房208000所，严重损坏住房25万所，使得25万户暂时无房居住。战后住宅缺乏的问题非常严重。为了应付这一困难，私营建筑商与地方政府订立了承建合同，在卫生部的全面监理之下，从1945年至1951年，共建筑了100万所新住房，修缮和临时建造了另外50万所住房。这与1934年至1935年私营建筑业在政府补助下建成358000所住房比较起来，当然要少。不过，1940年代后期的私营建筑商不用面对资金、建筑材料和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大部分新房大都是地方政府拥有产权，以亏损的方式租给本地居民，亏损由中央和地方的补贴予以弥补。这项住房计划对工人阶级甚为优待，但对整个国家的住宅需求问题缺乏足够的再生产能力。



战争摧毁了近50万座房屋，这意味着住房出现短缺

（*Bill Brandt, Hulton/Archive*）

工党政府教育政策对于工人阶级的优先待遇，与其保健政策和住宅政策相差很远。其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打上深刻阶级烙印和落后于时代的英国教育制度；其二是受到 1944 年《教育法案》的影响。1939 年，英国的学龄儿童，几乎有一半在全龄学校（allage schools）就读，即工人阶级家庭的 6 到 14 岁的儿童属于这个年龄段。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和工人阶级家庭中的学业优秀的子弟，随后就升入文法学校继续其学业。富豪家庭则送子弟入伊顿和哈罗等公学深造。1944 年的《教育法案》，旨在取消那种全龄学校，开设了一种新的中等教育层次的现代学校，作为在文法学校入学考试中落榜的 11 岁少年的学习之所。富家男生当然会进入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富家女生则进入圣保罗学校就读，这些学校均实行寄宿制。其毕业生和文法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均可优先升入大学。工党政府在六年执政期间对这种以阶级分流的学制几乎未加任何改动，也没有将现代学校可就读学生的最高年龄（15 岁）做任何的提高。艾德礼政府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所有部分都具有激进的特性，而是改革和保守相混合的马赛克。比如说，政府并没有在财富的再分配方面采取重大举措。10% 最富裕的阶层仍然占有近 1/3 的国民收入。

806

但是，工党政府在计划经济方面却相当激进。而计划经济与国有化和福利国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它毫不犹豫地运用财政控制手段和金融控制手段，通过降低或提高利率，以鼓励投资或抑制投资；通过实施赤字财政，以增加购买力和刺激繁荣；通过提高奢侈品税率，以压低人民对高价值出口品的消费；还通过提高富人的税率，以平衡社会收入的不均。政府一方面提高进口税率，以阻止消耗美元的货物进口；一方面又控制用于分期付款的贷款，以降低人民的消费。政府还加强了对市场的直接控制，例如从阿根廷购入大批肉类、给农民提供种种补贴、给制造商提供投资津贴、实行食品配给制、为工厂扩建发放许可证和规定 70% 的尼龙用于出口。

在执政的最初两年，工党政府还向工人发号施令。例如，政府计划指派一批工人到煤矿和农场工作，但是工会对此表示异议。贸易部

不断发出生产指令，规定生产商品的种类，制造商也越来越对此感到愤怒。到1948年，政府认识到直接对经济活动下指令，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弊大于利。而政府尽管下达了许多指令，但是还没有任何全盘的计划。这种状况至少存在到1948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出任财政大臣之时。工党政府在学习管理经济的方式方面，备受艰辛之磨难，所得到的教益之一就是以财政和金融手段进行控制要好于直接控制。到1951年，工商业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由对市场作出反应，政府的职责只是确保市场能处于健康状态。

从1945到1949年，政府的直接控制作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大，更多的是来自战争的遗产。战争不但要求建立许多权力巨大的局和委员会，而且还为后来的年代留下一系列棘手的危机。首先爆发的就是1945年7月的英国财政危机。

807 战争在英国国内破坏造成30亿英镑的损失，而出售在国外的资产又损失10亿英镑。战争还使国债翻了三番，达到33亿英镑。为应付这些负担，英国必须把出口增加到1938年的175%，若按1945年的出口低谷，增加的百分比还要加大。丘吉尔在离任时私下写道："我们的国家破产了"。1945年8月，富有的美国又突然停止向英国提供租借法案物资的供应，而这是英国赢得战争、赖以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物质。由于英国经济在几个月内会完全崩溃，所以政府派凯恩斯去华盛顿求援。结果令人失望，华盛顿仅答应借给一笔数额为37.5亿美元的贷款，年息2厘，1950年开始偿还，到2000年还清。随后加拿大又借给英国12亿美元，确实有所帮助。贷款使英国得以保证其人民的衣食，恢复出口工业，以维持国家的生活水准。经济危机使得战时实施的大量管制措施得以保留，1947年的冬季亦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1947年的冬天，是1880年以来最寒冷而且下雪最多的冬天。铁路线被雪掩埋，煤堆在矿里无法运出，工厂只有关门。工厂的关闭使英国损失了价值2亿英镑的急待出口的货物。美元和黄金流出英国，尤以7月英镑和美元恢复自由兑换时为最甚。英国政府之所以准许恢复自由兑换，是因为这是美国给英国贷款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因为银行抛出英镑以换取坚挺的美元，英国政府只实施了 6 个星期，便下令停止自由兑换。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olton）也对英镑的疲软负有责任。道尔顿对失业问题的担忧（这种担忧普遍存在），导致他将银行利率降低至 2%，这就鼓励了银行放贷，进而引发通货膨胀。这样的解决措施，对因失业造成的经济衰退是有效的举措，但对一个就业充分的经济则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通货膨胀只会削弱这样的经济。银行贷款的放宽使得更多的英镑竞相争购市面上稀缺的商品，于是物价上涨。同时，英国货物在国外的市场销售额下降，贸易出现逆差，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外流，库存日减，英镑渐渐无法维持兑换 4.03 美元的汇率。这是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道尔顿的继任者斯塔福德·克利普斯爵士，立刻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停止增加工资，停止进口美国香烟，禁止给休闲驾车提供汽油，禁止花费超过 35 英镑的出国旅行，减少肉类和奶酪的配给，紧缩银行贷款，加紧对原材料的控制。1946 年初发生世界粮食危机，英国就将面包和土豆加入了原有的食物配给清单。加上煤炭短缺和布匹多定为外销，这时英国人的生活实在是相当清苦。由于从美国和加拿大借来的钱已经用完了，美元不断外流，贸易逆差甚巨，克利普斯只得将英镑汇率从 1 英镑兑换 4.03 美元降到兑换 2.80 美元。英镑贬值使英国货的价格下降，同时欧洲经济也转旺，于是英国出口大增，英镑转向坚挺。美国这时推行马歇尔计划，也助了英国一臂之力。根据此项计划，美国赠给欧洲 49 亿美元，其中 12.63 亿美元赠给英国。到 1950 年，英国的经济已恢复到每年 4% 的增长率，许多直接经济管制措施都已取消，于是英国步上了繁荣之路。工党政府在 1950 年的大选中，还能以 8 个议席的多数击败保守党，继续执政。但是，另一个危机——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迫使工党政府推行了一个为期 3 年、总额为 47 亿英镑的扩军计划。美国囤积原材料将其价格推高，加上扩军计划，遂又引起了英国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预算赤字。这一难题留给了在 1951 年大选中获胜的保守党。 808



1945 年后，战时排队的现象仍然存在，当时英国正在努力重建遭到轰炸和战争破坏的经济（*Hulton/Archive*）

富足的年代和保守党的统治：1951—1964 年

到 1951 年，批评家们异口同声地谴责工业国有化效率低下、福利国家耗费巨大和计划经济成为累赘。在支持保守党的许多选民眼中，社会主义只是带来了危机和紧缩、配给本、身份证以及灰暗无光和无精打采的生活。因此，有 1370 万选民投了保守党的票，共选出 321 名该党议员。而在支持工党的选民眼中，社会主义意味着工作、安全、保健、养老金以及更好的生活。所以，投票支持工党的选民为 1390 万，但选票高度集中在工人阶级选区，只选出 295 名工党议员。丘吉尔喊出口号：“让人民自由”，立刻废除钢铁业和卡车运输业的国有化，终止配给制和食品补贴（分 3 年完成），并且撤销了无数的管制条规。但是，其举措也就到此为止。政府并没有废除福利国家制度，

809

也没有在煤矿、铁道、电力、煤气和航空运输等行业部门恢复私有制。同样，政府也没有放弃计划经济。社会化的医疗系统维持原样。所以有一位保守党的重要议员说，保守党接受了 1945 年的既成事实，一如他们接受了 1832 年的既成事实。有些保守党议员甚至承诺超越工党的做法。例如卫生部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便许诺要比社会主义政府每星期多建造 1000 座住房。

此后 13 年保守党执政的结果，可以表明它确实在某些方面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例如，到 1959 年，保守党政府将 16% 的收入用在社会福利方面，而工党 1951 年投到这方面的支出仅为 14%。保守党政府也提高了妇女生育津贴和家庭子女补助金，使用累进制税率以均衡国民收入，每年增建了 30 万所住房，用财政和金融手段管理经济，辅之以局部的直接控制手段，保障了充分就业。最后，他们每年都作出不懈的努力，以保证国家收支的盈余。总之，集体主义的增长，并不是像水龙头一样可以随意关闭。

在 1955 年和 1959 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得票率分别是 49% 和 48%；工党则是 46.5% 和 46%，其他小党为 4.5% 和 5%。在 1951 年的大选中，工党得票数超过保守党，但因选票太集中在工人阶级密集的选区，并不起增加议席的作用，使保守党以 29 席的多数取胜。这一多数到 1955 年增至 67 席，1959 年增至 107 席。连续 4 次大选，保守党的得票数不断增加，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保守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佳绩，是因为得到了许多体力工人的选票，也因为有 10% 曾投票支持工党的工人没有投票。英国的全体选民基本上是按职业和阶级划分：白领工人和富人阶层投票支持保守党，蓝领工人和体力工人投票支持工党。可是，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阶级分野，实际上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如有 33% 的体力工人投保守党的票，15% 的白领工人投工党的票。同时，因为体力工人占全体选民的 65%，所以他们的投票趋势对大选结果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中间 33% 的人投保守党的票，占该党得票的半数；其余 67% 投工党的票，占该党得票的 89%。

1955 年和 1959 年选举的胜负，并不是由于部分体力工人转而投票

支持保守党，而是出于一部分曾投票支持工党的体力工人没有参加投票。1951年，工党得票是1390万，而在1959年，工党得票仅为1220万。而保守党两次均为1370万。就这样，保守党得以连续执政13年。

为什么保守党能够获得1/3的体力工人的选票呢？为什么那样多的工人不参加选举呢？问题的答案是，许多工人多年来就投保守党的票。这来自于一种历史的观念，在家长主义浓厚的小工厂里表现得最为强烈，而在大工厂里，则表现得最为淡薄，因为对同事或对工会的忠心削弱了家长主义的传统观念。第二个原因，工人之所以投保守党的票，是因为保守党政府支持福利国家政策和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在从1951年至1955年任首相的丘吉尔的主持下，保守党所建造的住房比工党政府所建的还要多。丘吉尔也大幅度增加了工资，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在任期的末年，这位已届80高龄的老翁居然还能适应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福利国家的观念。1955年，丘吉尔退休，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继任首相，继续实行政府干预政策。1957年艾登的继任者哈罗德·麦克米伦也如法炮制，虽然两人的竞选演说词都充满了放任经济和自由企业的老话，两人也都曾致力于倡导一个更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竞选演说中，他们两人都颂扬自由放任政策和盈余财政政策，但在执政时，特别是在选举前夕，他们却都不惜以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以实现更充分的就业和经济繁荣。当然，他们也不顾这些举措会造成英镑的严重疲软。

810

一方面，保守党的领袖——充满伟大英雄气概的丘吉尔、冷傲而帅气的艾登和风流倜傥的麦克米伦，都是工人眼中天生的家长或统治者。另一方面，工党的领袖则混乱不堪：克利普斯和贝文死了，艾德礼和莫里森老了，而年轻一辈中能孚众望的奈·比万（Nye Bevan）和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1]，则主张各异，争吵不已。在50年代初，富有智慧而能言善辩的比万和他的追随者们主张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政策，推进工业国有化，减少军备，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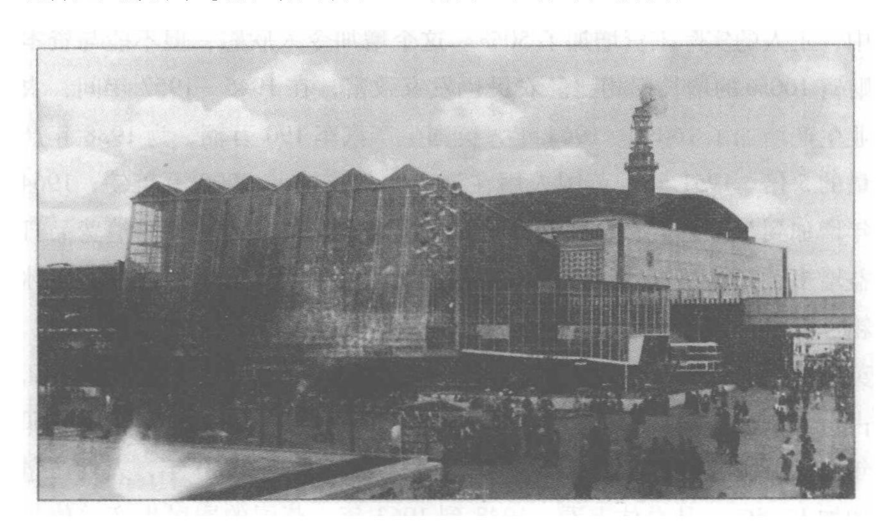
① 原文错为Gaitskill。——译者

重新武装德国和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盖茨克尔和他的追随者则主张扩军，停止国有化，与美国结成紧密的同盟，重新武装德国，加强对苏联的戒备。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工党议会议员的会议里，在报纸和政治小册子上，双方争辩不休。到 1959 年，比万和盖茨克尔突然握手言和，停止争辩。但这时英国的核裁军委员会（Committee on Nuclear Disarmament）突然发动宣传战，反对制造原子弹和装备核武器，主张英国单方面实行核裁军。1960 年，该委员会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压倒盖茨克尔，通过了该项议案。一年后，盖茨克尔又推翻了这项议案。工党领袖的表现说明该党如同一盘散沙，派系纷争不已，鼓吹和平主义，导致一些工人改投保守党的票。

工人投保守党的票或弃权的第三个原因，是许多工人接受了麦克米伦的大肆吹嘘："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日子。"不错，1950 年代英国表现最突出的是经济繁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工党执政时期留下的遗产。从 1945 到 1951 年，除了燃料和粮食出现危机以外，英国经济每年保持 4% 的增长率。社会主义政策没有阻碍英国的经济发展，保守党的福利政策和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在保守党执政的 13 年中，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 50%。这个增加令人欣慰，但不能与资本财富 100% 的增长率相比。农民也发家致富，在 1945—1957 年间，农业生产增加了 160%。1964 年，英国生产汽车 190 万辆，为 1938 年产量的 5 倍。1951 年，英国人用在汽车上的支出是 9000 万英镑；1964 年增加到 9.1 亿英镑。高消费的时代到来了，英国人购买的消费品日益增多，如电视机、收音机、立体音响、磁带录音机、照相机、电冰箱、吸尘器和各种男女时装。这个时代也是世界生产大为扩展的时代，英国的生产占有一席之地。1951 年至 1953 年，英国的工业产品输出，占世界制成品输出的 22.2%，较 1938 年的百分比仅低 0.2%。在 1950 年代，英国工业生产增长了 40%，而从 1955 年至 1960 年，人均产量增加 12.5%。从总体上看，1948 到 1963 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2.8%。到 1950 年代初，这一增长并没有造成过分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每周出版的《经济学家》（*Economist*）称之为奇迹。 811

这一繁荣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科技方面的进步，带来了效率较高的生产力和较新颖、廉价的制成品。英国对这些新产品的推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大规模的现代炼油厂，不但产出了汽车用、家庭用和工厂用的燃料，还产出了新的塑料业和人造纤维业的原料。帝国化学公司是英国最大的卡特尔，从石油中提炼出了合成树脂、聚乙烯和涤纶。化学工业还发明了许多种人造纤维。电子工业生产了大量晶体管收音机、电子计算机、录音机、扩音机和彩色电视机。同时，光学仪器工业也生产了高品质的摄影机、显微镜和医用仪器。

英国科学家自 1945 年以来获得了 35 项诺贝尔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并没有落后。在飞机制造工业方面，英国最先制造出涡轮螺旋桨引擎飞机和喷气式飞机；而且在原子能应用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由于上述发展，英国制成品输出的次序也有了变化：1937 年，排在前 4 位的是机器（除电器以外）、棉制品、煤炭和钢铁。到 1963 年，机器（除电器以外）仍居首位，但后 3 项则变为车辆与飞机、化学制品和电器设备。这几项和其他制成品的输出，在 1950 年代每年增长 19%，这就造就了经济上的繁荣，使得许多体力工人将自己视作中产阶级。



在伦敦万国博览会展出后的 100 年——1951 年，英国经过 6 年的经济恢复，再次庆祝科学的奇迹（*M. Fresco*，*Hulton/Archive*）

在1961年举行的一次调查中，英国工人有40%自称为中产阶级。812 他们在选举时，投保守党的票比自称为工人阶级的人多。计划经济下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阶级流动性，是否使工人富裕起来变成了资产阶级，从而使工党要求建立更加社会主义化的口号丧失号召力了呢？许多参加了1959年大选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像盖茨克尔这样的右翼社会主义者便进行活动，试图将《党章》第四条，即国有化条款，从1918年的工党党章中删除。但这进一步加剧了工党的分裂。同时这样做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到1963年，繁荣已在退潮，财政危机已在加剧，麦克米伦的名望也在下降。来得更容易的金钱和更高的工资引发了通货膨胀和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出口下降，国家收支转为赤字，英镑走弱，保守党政府的乐观情绪便化为乌有。麦克米伦因病辞职。在1964年的大选中，选民将保守党赶下了台，因为该党不善管理，引起通货膨胀，贻误国家和实行精英统治。

这时英国的出口减少，因为通货膨胀将出口商品价格提高，使之不能与外国货竞争。但是进口没有减少，结果美元和黄金外流。市场上投机者又抛出英镑兑换美元，于是英国的美元和黄金库存日趋窘迫，这个1945年以来一直困扰英国的问题又重现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生产为较廉价的商品和提供较便宜的服务；另一个便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收紧信贷（两者通常都会产生失业）来减少货币供应量。历届保守党政府，大都喜欢采用前法，希望通过强硬的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大批的廉价货物以供出口，维持美元和黄金的储备。而保守党的家长主义又可以提供就业、医院、学校和养老金。但这个希望落空了，因为大批的廉价货物从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涌出，而不是从英国涌出。英国2.8%的年增长率，比不过德国7.6%、法国的4.6%和日本的10%。当大众汽车和丰田汽车、德律丰根（Telefunken）和索尼电器充斥于世界市场时，英国汽车和扩音机的销路便暗淡了，英国的钢铁和商船出口情况不妙。到1960年代，曾经名扬全球的英国飞机的销售，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诚然，英国工会的怠工、罢工和工资要求，造成了工业效率的下降，但管理

层的昏庸无能、指导无方和敌对的劳资关系也在责难逃。英国工业的领军人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麦克米伦在1961和1962年眼看所企望的出口大增落空，只得收紧贷款，提高啤酒、烟、烈酒、糖果和冰淇淋的税率，并宣布冻结工资。1959年他被称为“奇迹麦克”（MacWonder）和“超人麦克”（Supermac），如今却声名尽毁。在民意调查中，只有1940年内维尔·张伯伦的支持率低于麦克米伦。其部分原因在于保守党的贻误国政和精英统治。在30年代，麦克米伦是代表提斯河畔贫穷小城斯托克顿（Stockton on the Tees）的议会议员，深知和关心贫困问题。他是凯恩斯经济学和迪斯累利家长主义的信徒，在卫生大臣任内曾致力于住房的建造，在财政大臣任内也曾致力于充分就业。但是他的家长主义存有局限性和偏差。麦克米伦忽略了医院、监狱、少年感化院和学校的改进，没有对地方政府和法律进行改革，减少了医疗保健预算，造成失业率的增加，同时也没有根据物价上涨的幅度调高养老金。尽管人口不断增加，但公共住房建设却低于大肆宣扬的每年30万所的水平。社会上隐含的贫民，亦即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目，与富人的财产一样迅速增长。1961年，政府对富人减税，对资产收益免征税收；可是，政府却宣布工资暂时冻结，包括教师和护士的工资，而他们的工资造就应该予以提高。这表明保守党政府是富有阶级的政府，其用于扩展综合学校的投入，远少于扩展大学的投入。

813

在教育方面，麦克米伦政府在教育的经济推动力方面同样存有短视。虽然社会上的婴儿潮现象、工业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求以及成立两个名人委员会的迫切要求，政府在长达13年的执政期间，没有调整现代学校学生15岁离校的规定，将升入大学的人数仅仅增加了微不足道的18%，尽可能多地否决了各地建立综合学校的计划。综合学校是以美国的公立中学为楷模，将地方上的文法学校和现代学校合并起来。这种学校的使命就是提升大部分学生的教学质量和减弱阶级偏见。但是，这对于从内心里崇尚精英主义的麦克米伦和保守党来说，具有太多的平均主义性质。保守党议员中有3/4是公学的毕业生，麦克米

伦的 12 名内阁成员中有 10 名毕业于伊顿公学。许多内阁成员与麦克米伦或他的夫人——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的女儿有亲戚关系。麦克米伦喜欢以猎山鸡的乡绅或伦敦最高级俱乐部的常客的身份标榜自己。1957 年他担任首相一职，不是经由党的代表会议推举，而是经由党中要人在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基尔摩尔勋爵的倡导下的推举。1963 年，相同的模式得到沿用，这一次的倡导人是麦克米伦，他的继任人则是苏格兰贵族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Home）爵士。

1957 年和 1963 年，新闻界都以为新任首相会是 R. A. 巴特勒（R. A. Butler），一位当时保守党中观念最自由、经验最丰富和才能最出众的人物。麦克米伦手腕灵活，领导得法，将保守党进一步领入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的道路。但是到 1961 年，贸易逆差和英镑疲软等问题相继出现，表明保守党的家长主义的局限性。1963 年，报纸披露国防部大臣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与一个应召女郎发生暧昧关系，而且这个女人也与苏联间谍有染。普罗富莫起初在议会予以否认，继而又承认事情属实。这一丑闻对摇摇欲坠的保守党政府造成很大损害。这个政府与陈腐的贵族和养尊处优的暴发户的关系愈加密切，特权阶层对提高工业效率毫无作为，对改善医院、穷人的状况和工人的收入无动于衷。选民们不再相信“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日子”这样的说辞，不再听从传统的投资者，或者干脆弃权，于是工党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此时，工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解决国家收支不平衡和英镑疲软问题，而且还有英帝国已经崩溃、英国强权已经旁落这个事实。

帝国的崩溃

814

1947 年，英国还统治着世界近 1/4 的人口。21 年之后，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将英国最后一批海外驻军撤回国内。除了香港、直布罗陀几个小岛以及少数象征性的驻外部队以外，大英帝国已不复存在。到 1968 年，英国被美国和苏联的庞大陆军、海军和洲际导弹从四面八

方团团围住，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涵盖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而要考察大英帝国衰亡史，只要涵盖自日本征服马来亚以后的27年就够了。

1945年，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帝国的崩溃。温斯顿·丘吉尔在1948年曾说，英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基于她所居的三种角色：英联邦的首领、欧洲大国和美国的特殊伙伴。英国的力量和政策，都建立在这三环之上。1948年，丘吉尔的三环理论，是正确而实在的。在北非、意大利和诺曼底，英美两国的军事领袖和政治家们建立了亲密的、特殊的关系，其基础是共同的语言、文化和相互利益。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样，英国占领德国、在解放法国中的作用以及4个世纪以来干预欧洲大陆事务以维持势力均衡等，也都是事实。可是，在1945年，这三个事实的每一个都蕴含着危险的幻想：以为英国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当时英国经济体系遭到破坏，城市和工厂化为废墟，还没有原子弹，负有沉重的债务，拥有4700万人口；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原子弹，所占有的资源无与伦比，拥有1.5亿人口。另一个幻想是以为由新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英联邦与大英帝国一样，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实体，正在复兴的欧洲企望英国的领导。1945年至1968年，这些事实和幻想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英国外交政策的特性。

实质上存在的英美联盟，是1945年之后苏联和西方列强之间冷战的主要因素。在雅尔塔，将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视为对欧洲产生威胁的人，是丘吉尔而不是罗斯福。而将希腊游击队与共产主义错误地密切联系起来，而且以为斯大林对希腊和土耳其有企图的国家，是英国而不是美国。美国接受英国的错误判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联征服了10个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尽管从苏联在以往西方的入侵中蒙受的巨大损失来看，它需要这些“友好”国家的愿望有情可原，但是由于苏联将独裁统治强加给东欧国家，拆走东德的机械和粮食，又将军队驻扎在易北河畔，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是感到恐惧。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接着苏联又封锁柏林，

西方的这种不安更加强烈。1949 年，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中国也站到共产主义阵营一边。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这一连串的事件，加 815 深了西方各国对苏联侵略的恐惧，因而强化了冷战。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欧洲势力均衡的观念、本国的民主传统以及不久前在绥靖方面的惨痛教训，都使得英国与美国结成紧密的同盟，共同对抗苏联。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该党领导人一直在防止共产党人进入工党和工会。因此，在 1945—1951 年之间，并没有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出现，有的只是冷战和英美同盟所确定的外交政策。其结果是英美联合建立一个独立的西德，用空运打破柏林封锁，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目标是遏制斯大林的野心，正如往日的同盟遏制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德皇威廉的野心一样。1951 年，工党政府表现了亲美的冷战决心，将军事预算增加 3 倍，并派遣英军参加朝鲜战争。

在 1950 年代，丘吉尔、艾登和麦克米伦都没有背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1952 年，丘吉尔宣布英国由于原子弹试爆成功，现在是美国的更强大和更独立的盟友。他以语言大师的风范，称英国要以“恐怖阻遏”来确保和平。但是丘吉尔的心里十分担心：不仅是因为核战争对于一个地狭民稠的英国来说是一种自杀，而且担心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rster Dulles）用挑战的口吻说要给挑衅者以毁灭性的报复。为了使阻遏策略能够维护和平，艾登和麦克米伦随同丘吉尔与苏联进行友好的接触，主张举行最高级会谈。英方在召开 1955 年的日内瓦峰会议和 1960 年的巴黎会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可惜两次会议都没有取得成功。但是 1963 年，双方的接触终于获得了一点进展，双方签署了停止地面核试验的条约。虽然英国的国力远不如美国，但其影响力基于富有智慧的忠言。到 1956 年苏伊士危机之后，这种忠言便一文不值了。

苏伊士危机始于 1955 年，当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帮助埃及建筑阿斯旺大坝。埃及亟欲建坝以促进农业，为筹措建坝资金，埃及国家元首纳赛尔（Nasser）将军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虽然埃及对公司的股东给予了补偿，但是此事还是激起了安东尼·艾登的帝国主义的怒气，也激发了英国人从对独裁者实行绥靖而变得过于敏感的戒心。于是，英国伙同以色列和法国一起行动，派遣10万军队开入运河区。帕默斯顿精神又复活了，但时代不同了。世界的第一强国已经是美国，而不是英国。 杜勒斯素来不喜欢艾登，艾登也不喜欢杜勒斯。于是美国而不是纳赛尔，强迫英军撤军。1957年3月，热衷于入侵埃及的财政大臣麦克米伦，突然宣布撤军。美国的坚决反对和英镑的疲软，促使麦克米伦只得这么做，用哈罗德·威尔逊的话说，就是“最先进入者必定是最先退出者”。英美特殊关系得到保持，但已大大削弱。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在百慕大会晤，美国允诺向英国，提供“天穹”导弹，而英国则向美国提供一个北极星潜艇基地。1962年，美国因为耗费过大而取消了天穹导弹计划，转而把北极星导弹装备在英国潜艇上。可是，因为美国控制着弹头所用的核裂变填料，所以英国便成了一个依附性的、而不是独立性的核国家。另一方面，英镑一直处于软弱地位，英国还一直需要美国的援助，这样平等的特殊关系便成了一个幻想。

816

另一个幻想是以为走向崩溃的帝国可以成为具有活力的英联邦。1945年，很少有人认为英国能够或者应当统治世界1/4的人民。连丘吉尔和保守党人也投票赞成印度以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身份留在英联邦之内。丘吉尔当然惋惜印度独立，但他对印度加入英联邦感到欣慰。1948年，巴基斯坦和锡兰也加入了曾经是由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和英国造成的白人大家庭。1966年，南非退出英联邦，另外有18个殖民地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英联邦。

英国给予这些殖民地以独立地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不答应，它们就会不受英国的驾驭。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Congress Party）的壮大、圣雄甘地名望的提高、潘迪特·尼赫鲁（Pandit Nehru）纯熟的政治手腕、穆斯林同盟（Muslin League）成立独立的巴基斯坦的决心和几亿印度人决心将英国人逐出印度的事实，把英国的选择余地大为缩小：要么同意其独立，要么听之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这种不

可抑制的力量来自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又源于英国。尼赫鲁是剑桥大学的学生，甘地曾在伦敦学习法律。百年以来，英国语言和文学成为印度统治阶级的精神食粮。他们读边沁和密尔的著作，研究法国革命，产生了对民族主义、自由的莫大热情。要扑灭这些力量，非数百万大军不可。

印度的独立虽属不可避免，但其实现时机和方式，并不是没有选择余地。英国在这些方面本可以坚持自己的统治，一如法国在印度支那所做的那样。但英国并没有坚持，这是因为工党政府所奉行的原则和审慎立场。政府于1946年坚定地宣布，印度将于1948年独立。虽然移交政权是明智之举，但仍未避免流血冲突。当时伊斯兰教徒逃往巴基斯坦，印度教徒逃向印度，在此过程中丧生者将近100万人。宗教仇恨根深蒂固，正是这种仇恨，而不是英国的政策，造成了这一灾祸，导致两个国家的诞生。

宗教仇恨与英国的原则和欺骗，导致1938年巴勒斯坦的分离和分裂。自从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公布以来，英国在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的过程中，推行一种不能相容的两项政策：推进犹太人家园的建设和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厄内斯特·贝文在1945年之后偏向阿拉伯人，激起了强大的以武装从事独立运动的犹太人帮派的憎恨，而美国支持犹太人的独立运动。英国无法调和这两个敌对的力量，也无法对抗美国的力量，便撤出该地，由联合国去将巴勒斯坦分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1948至1951年，工党政府仅仅给予印度和巴勒斯坦独立，而对其他殖民地，连许诺也没有给予。工党政府甚至鼓励白人移居肯尼亚和罗得西亚。这些白人移民，就成为一项伙伴计划的组成部分。在这项计划中白人掌握政权，同时训练黑人进行自治。这种监护责任和父权主义的原则，加上对近东和亚洲的战略考虑，成为保守党政府在1951年至1959年间维护帝国的基础。1950年代，这种政策在非洲尚能行之有效。肯尼亚的6万白人、南罗得西亚的30万白人和其他殖民地的殖民政府官员，以原有的方式维持统治。 817



乍一看，这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举行仪式，再仔细看，发现加纳的国旗正在国会大厦上飘扬，正是1956年加纳的建国场景（*Art Resource, NY*）

但是，那些自豪的、受过教育的和民族主义日益强烈的埃及人，其1936年获得的正式独立由于英国军队的驻扎而名存实亡，但很显然他们不愿接受英国的统治。1952年，埃及革命军官推翻亲英的埃及国王法鲁克（Farouk），建立共和国。1954年，英国作出让步，将6万军队撤往塞浦路斯。可是希腊裔塞浦路斯人要与希腊合并，不愿接受英国统治。他们发动游击战，用英雄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手段打击英军，于1960年赢得独立。英军于是撤往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亚丁，直到1967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最终迫使他们撤离。英军的最后撤离，合上了英国外交政策中最辉煌、最浪漫的一页，这就是英国必须保持在近东的存在，才能保护通往印度的航路。

1967年，监护原则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也不得不向当地力量低头。第一个突破发生在1957年，独立后的黄金海岸更名为加纳，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先后获得独立的国家有：尼日利亚、索马里（1960）；塞拉利昂、坦噶尼喀（1961）；乌干达（1962）；肯尼亚、赞比亚、桑给巴尔和马拉维（1963—1964）。英国允许独立的决定，主要的是开明的利己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武装反抗和民族主义压力的

结果。英国本可以像葡萄牙那样，在非洲再坚持一二十年。但它未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麦克米伦预见到了他在 1961 年所说的“变革之风”将会不可避免地席卷整个非洲。这股变革之风正是源自英国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 818

坦桑尼亚、马拉维、肯尼亚、加纳等国的开国之父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班达博士（Dr. Banda）、乔莫·肯亚塔（Jomo Kenyatta）和卡米·恩克鲁玛（Kami Nkruma），都曾在英国求学或居住过，而赞比亚的国父肯尼斯·卡翁达（Kenneth Kaunda）是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儿子。不仅传教士为卡翁达的父亲、尼雷尔和恩克鲁玛以及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提供了教育，而且英国的教师、行政人员、医生、商人和编辑，也把民主、法治、民权和民族主义思想传授给了非洲人。

在非洲各地，这些西方思想与本土的习俗和价值观相混合，转化成新的模式，其特征是：部族自豪感、一党制政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混合的经济、泛非主义的梦想和不屈的自治愿望。但变革之风对非洲的变革，充满了斗争和冲突。英国人不仅教育了这些开国之父，而且为了阻遏变革之风，也曾将他们投入监狱。尼雷尔、肯亚塔、恩克鲁玛、班达和卡翁达都坐过英国的监牢。英国人还建造集中营，剥夺自由，食言毁约，拖延犹豫，撒谎欺骗，特别是在肯尼亚、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等地。在上述地区，英国对其所推行的监护统治还抱有幻想。但是，肯尼亚的 6 万白人能够压倒几百万黑人，就像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的 30 万白人（特别是在大多数的白人都住在南罗得西亚）能够制服更多的黑人那样可望而不可即。1964 年，英国放弃了以上做法，但以白人为主的南罗得西亚宣布独立，导致英国和联合国采取制裁措施，对其实行抵制。同年，英国与非洲新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迫使南非退出了英联邦。英联邦原本是由白人自治领组成的亲密家庭，此时变成了由原殖民地组成的相互争执、语言各异的俱乐部。随着英联邦内部的异质化日趋严重，英国政治家们转而谋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

丘吉尔三环中的第二环是英国在欧洲居于领导地位。但到 1945 年

之后，这一环便不为英国政府所重视了。英国在欧洲的紧密合作领域包括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但这些都是以大西洋为范围的合作。至于仅限于欧洲的合作项目，如 1951 年的欧洲防卫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未能成立）、1951 年的煤钢共同体（Coal and Iron Community）和 1957 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英国都拒绝参加。由于尚无紧迫的威胁存在，英国的外交趋向孤立：沃波尔和坎宁的精神在贝文和艾登的身上得到重现，他们两人是 1945 至 1955 年的外交大臣，他们的政策是将英国置身于欧洲之外。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英国的孤立因三个方面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渐趋衰微；英联邦的美梦逐步黯淡；英国对欧洲贸易转为繁盛。贸易的数字可以说明这种情形：1950 年，英国出口的 26% 输往西欧，46% 输往英联邦国家；到 1986 年，这个数字变为 37% 输往欧洲，28% 输往英联邦国家。英国的经济发展前途寄希望于海峡对岸。戴高乐和阿登纳（Adenauer）也明确表示，财富和力量都来自欧洲的团结。哈罗德·麦克米伦和保守党于 1961 年 7 月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因为两个问题拖延得很久，一是英国和英联邦的贸易，一是英国的农业。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的共同市场，英国就会对新西兰的乳产品和加拿大的谷类提高关税，增加对欧洲农民的补贴，英国的生活费指数就会上升，英国对英联邦的出口就会下降。

819

1962 年 1 月，在上述问题大都得到解决之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申请。对此，一些评论家认为戴高乐心怀嫉妒，对麦克米伦与肯尼迪总统之间的特殊关系感到不满，对英国有权使用美国的北极星导弹感到愤怒。事实上，戴高乐在告诉英国要么选择欧洲，要么选择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因为戴高乐担心英国会对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形成竞争，所以他总会找出借口来封杀英国。

1967 年，哈罗德·威尔逊又申请参加欧洲共同体，戴高乐再次予以否决。1972 年，在戴高乐退休之后，新任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才使英国最后得以加入共同体。到这一年，英美的特

殊关系已经受越战问题上争执的影响而变得疏远，而且英联邦的内部关系十分松弛，甚至其中两个成员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还展开了一场血战。英国原来同样并重的三环，现在则变成了一个大环——欧洲和处于一旁的两个小环。

英联邦虽然是英国维持民族自豪的心理基础，由此通常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炫耀，但英联邦也不完全是一种虚幻之物。多种相互交织的关系——文化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历史上的关系，将英国和其原殖民地联系起来。1964年，英国将近58%的投资目的地是英联邦。1966年，英国出口的32%输往原殖民地，进口的32%同样来自原殖民地。1966年，在印度工作的英国人比帝国最鼎盛时期还要多。成千的未来英联邦国家的统治者，进入英国的中小学和大学就读。英联邦的首相（总理）们依旧定时开会，表明这样一个异质化的俱乐部，也能够对一个日益和谐的国际社会有所贡献。英国与美国依然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如果说这不过表现在如下的现象之上：美国游客、观光者、学生、娱乐界从业人员依然蜂拥到欧洲这个唯一讲相同语言的国家。在1945年以后的20年中，英国虽然丧失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同时战时最亲密的盟国逐渐疏远，但是英国还是能够适应新的现实。英国继续延续其自古以来的地位，即欧洲列强之一。

威尔逊时代和通货膨胀问题

1951年至1964年，保守党的统治期正处于富足的时代。自1964年至1979年（其中有保守党的短期执政），工党的统治期则处于通货膨胀的时代。保守党统治与富足的吻合和工党统治与通货膨胀的吻合纯属偶然。更为深刻的经济运行趋势，如气候的变化，并非政治家的力量所能控制。这不是说政治家无足轻重。冬天装上防风窗户和夏天装上冷气，还是有用处的举措。 820

1963年，已经成为工党领袖的哈罗德·威尔逊，抨击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首相听任经济问题恶化和遭受经济风暴的冲击。随着1959年选出的议会任期即将届满，威尔逊采取行动要让这次大选成为

工党一连串失败的句号。1945 年，工党的竞选以社会主义理想主义为中心，迎合了那一代经历过战时的同甘共苦和战前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的英国人的人心所向。在富足的 1950 年代，理想主义对享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的人们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1964 年，注重实际的威尔逊试图以现代的、科学的方式赢取选票。他通过民意测验来判断选民的要求，据此制定工党的竞选方针。他宣称工党将进行一场“时尚的白色技术革命”（a white-hot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其内容包括计算机、原子能和电子设备，并保证要建立一个由规划人才和专业人士组成的政府，不允许贵族和俱乐部会员继续当权。威尔逊认为这种以完美的社会主义原则为准绳的政策方针，将在今后 5 年里取得 25% 的经济增长。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反击说，威尔逊是一名“油嘴滑舌的推销员，推销的是科学的大杂烩”。此言不无道理，但却不足以阻止 44.8% 的选民在 1964 年 9 月投工党的票。这不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但是超过了保守党所得票比例的 42.9%。自由党所得的 11.4% 选票意义重大，因为这都是来自中产阶级选民的选票。他们仍然害怕社会主义，但是不再迷恋保守党，因为该党变化无常的经济政策、丑闻和推选党的领袖的不透明方式，都表明英国在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领导下，绝不会成为一个现代的、充满活力的国家。

工党 44.8% 的得票率使该党在议会获得 4 个议席的多数地位，但这个微弱的多数不足以长期掌控执政权。于是，机敏的威尔逊将首相任期的最初一年半时间花在筹备下一次大选之上。1966 年 1 月，他宣布于 3 月举行大选。结果工党得票率为 48.7%，保守党得票率 41.4%，自由党得票率 8.6%，其他小党得票率 1.3%。工党此时的多数达到 97 个议席。威尔逊政府已经增加养老金，停收医生处方费，通过实惠的《住房法案》（Housing Act），为医院拨款，新建经济事务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规划全国工业现代化的方案。威尔逊还攻击保守党在国库收支上留下 8 亿英镑的亏空，致使经济缺乏效率。保守党则仍然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因为爱德华·希思虽不是贵族，但他的活力并不高于 1965 年被保守党赶下台的道格拉斯—霍姆。



1966—1970 年及 1974—1976 年，哈罗德·威尔逊一直在找寻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不平衡、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收效甚微（*Hulton/Archive*）

希思和威尔逊在 1966 年都是 49 岁。他们两人都是牛津大学毕业，也都不是上等阶层出身；他们都长时期为党工作，都比一些才华更高的同僚走得更远，从而登上党魁的宝座；同时他们的结局都不美妙：希思是 58 岁的时候被本党赶下台，威尔逊则是 60 岁的时候因党内分

裂而感到沮丧时辞职。希思富有耐心、任劳任怨，但才华一般、缺乏感召力。虽然他的同事很欣赏他的眼界和目标，但也有一些同事认为他脾气暴躁，举止无常。希思是一个长相俊俏的单身汉，擅长音乐，821 其谦逊的个性，如同他在电视上清晰地阐述保守主义一样令人倾慕。但是，与机智敏捷、能言善辩的威尔逊比起来，希思明显不是对手。在电视和竞选演说中，威尔逊总是具有说服力、魅力和智慧，特别是在讲到现代社会主义的前景时更是容光焕发。在议会下院辩论场合，他善用机智和讽刺击败那肃穆沉静的希思。由于具有 97 席的议会多数、首相的大权、对技术和计划的信赖和天生的辩才，威尔逊成了工党无与伦比的领袖，他要引导英国成为新的社会主义理想国。

但在 1966 年，威尔逊碰到了无数的难题。福利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穷、疾病、困苦和愚昧，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同时，福利国家也酿成了一些新问题，因为它产生了一个耗费巨大、运转不灵和肌体臃肿的官僚体系。虽然保守党政府在 1962 年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但822 医院还是十分缺乏。数以百万计民众，要么没有社会保险，要么失业救济金或养老金被通货膨胀蚕食，贫穷现象又重新出现了。老年人有 1/3 独居，大都陷于贫困。虽然有那么多关于住房的许诺，许多人还是无房可住。监狱大都挤满了犯人，环境令人压抑，而罪案则日益增多。初中入学预试使得不少天资很好的工人阶级子女落榜，只能进入师资水平较差的现代中学。工人家庭的子女，很少能在 15 岁之后继续接受学校教育。

20 世纪 60 年代，也是一个进步思想和进步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所以，哈罗德·威尔逊面临着在离婚、堕胎、同性恋、毒品、假释和死刑等方面实行开明法律的要求。令首相头痛的问题没完没了，还包括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犯罪、监狱、少年帮派、大学风潮、移民以及反移民问题。移民的涌入，迫使保守党在 1962 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对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作出前所未有的限制，规定移民只限于有亲属居住在英国或在英国已获受雇者。西印度群岛黑人、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虽然只占英国人口的 4%，但已在伦敦、伯明翰这样的城市造成了一些问题。他们居住条件恶劣，教育程度很低，找工作遭拒，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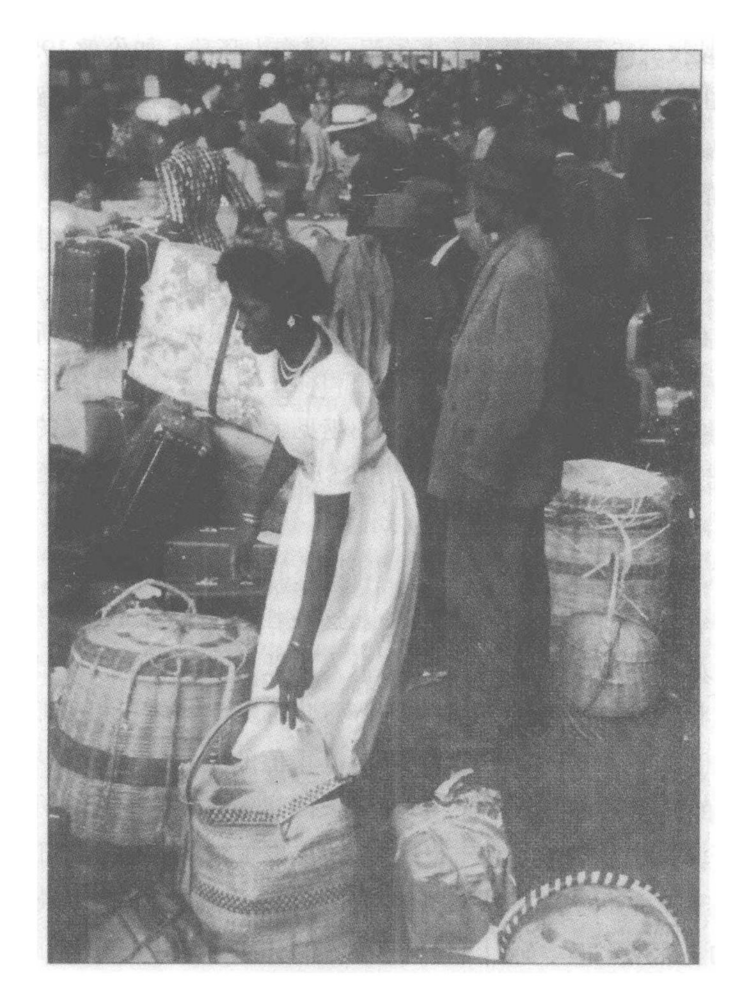
酒馆受歧视，于是不满情绪不断增强，演变为骚乱，如伦敦 1958 年的诺丁汉山骚乱。他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则服用毒品或走上犯罪道路。

在威尔逊面临的问题中，最棘手的要算厄尔斯特问题。当地占居民 3/5 的新教徒将占居民 2/5 的天主教徒排除在最好的工作、学校和住房之外，还以不公正的方式划分选区，致使天主教徒无法得到合理份额的公职。该地的少数天主教徒中的一个小团体——爱尔兰共和军，用暴力手段来结束新教徒的地位。炸弹和杀戮很快就把厄尔斯特一分为二。威尔逊所面临的厄尔斯特问题和移民问题虽然十分棘手，但与低迷和停滞的经济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英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下降到 2.1%，与德国、日本的 5% 以上的年增长率相比，委实是一种耻辱，而且失业亦随之上升。

经济的低迷隐伏着令大家最感到担心的问题：通货膨胀。1968 年的通胀率为 5%，1969 年高达 8%。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严重的问题，在英国尤其如此，因为英镑的价值被人为低估。通货膨胀使出口货物的价格上涨，销量下降。出口的下降意味着美元、马克和法郎的收入下降，也由于并未减少的进口消耗了高币值的美元、马克和法郎，英国银行的外汇储备随之下降，同时无人问津的英镑则储量上升，币值下降。当英镑的币值出现下降，有关英镑贬值的谣言便连绵不断。谣言引起国际货币投机商抛售英镑，使英国政府难以维持 1 英镑兑换 2.80 的美元的汇率。而为了维持这个汇率，英国政府只得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来美元，再用这笔美元买进英镑。

导致英镑疲软的原因还有海外投资的花费、对英联邦国家的援助和贷款以及维持在海外驻军和军事基地的支出。当然，投资只能算一种暂时的损失，如果投资产生利润，就可以赚到美元或其他急需的外汇。但是，海外军事基地则是需要不断拨款，这是大英帝国如此迅速崩溃的一大原因。哈罗德·威尔逊、工党、保守党、新闻界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维持英镑与美元 1∶2.80 的汇率是英国的第一要务。其理由在于，如果英国政府能削减支出，紧缩信贷，增加税收和平衡预算（遏制通胀的主要手段)。那么拥有英镑或愿以放贷来

823



英联邦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向英国，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移民（*Haywood Magee*，*Hulton/Archive*）

支持英镑的国际银行家，就能增加对英镑坚挺的信心。而推行这些政策的重担就压在威尔逊的肩上，正如以往压在艾德礼、艾登和麦克米伦的肩上一样。他必须削减支出和紧缩信贷。于是，威尔逊在 1965 年和 1966 年采取了这些举措。

当英国的国际收支出现盈余和国际金融界看好英镑之时，英国政府便可以放宽信贷，增加开支，增加投资，促进充分就业。而当英国

的国际贸易出现逆差和外汇储备下降之时，政府就不得不裁减开支，提高利率，增加税收，即紧缩经济，压低增长和增加失业。后者会使国家陷于进退维谷的痛苦境地。有一条出路，便是造成经济膨胀，通过重振企业活动来生产廉价的、受欢迎的和畅销的出口商品，赚进大批外汇和黄金。这是孤注一掷的赌博，用通货膨胀来赌经济增长。 824

英国经济难题的核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英国产品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下风。1953 年，英国占世界制成品出口的 20.9%。而到 1964 年，这个比例只有 13.7%。哈罗德·威尔逊的最大愿望就是以技术和计划经济促进英国工业现代化，就是由政府、工会和管理层在委员会中联合办公，遏制工资和物价上涨，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到 1970 年，这个愿望还是没有实现，通货膨胀空前严重。然而，形势并非一团漆黑。英国在计算机、铝制品、电子设备、娱乐业和观光旅游业方面，都相当出色。另外再生纸制造这样的小企业，和北海石油开采这样的大规模经济活动，也都取得成功。1965 至 1970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14%。1960 至 1970 年，人均生产率增长了 40%，而 1950 年代的人均生产率增长了 30%。1967 年 11 月英镑贬值之后，英国的出口一度十分兴盛。

威尔逊的政府也进行了重要的社会改革。从 1959 年至 1960 年，保守党政府的相关开支为：住房建设 4.26 亿英镑、教育 9.16 亿英镑、医疗保健 8.27 亿英镑。1969 至 1970 年，工党政府的相关开支为：住房建设 10.89 亿英镑、教育 25.13 亿英镑、医疗保健 19.31 亿英镑。即使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修正，工党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开支的增加确实相当惊人。然而，一些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许多不平等现象依然司空见惯。1970 年时，虽然综合学校增多了，这种学校的学生已达学生总数的 31%，虽然升学考试的应用范围缩小，但是贫民区学校每班学生超过 30 人的现象仍然存在。只有 25% 的 16 岁少年继续读书，只有 15% 的年轻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教育经费的使用，依然偏重于在文法学校和大学中就读的天资较好或家境富裕的学生。住房补贴和房贷征税优惠，也偏重于较富裕的阶层，贫民依然支付高租金住贫民区

那种条件很差的房子，而无家可归的人依旧无房可住。在社会保险方面，收入高而供款多的人，养老金也比较丰厚，而贫民仍然没有保险。生活在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以下者多达500万。

工党政府之所以在治理国家中出现如此多的败绩，最大的原因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物价上涨，出口受损，贸易逆差增加、国家预算不平衡和失业加剧。这是困扰了威尔逊6年之久的难题，也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无法消除的祸根。对解决之道，各种看法莫衷一是。第一种看法认为：通货膨胀反映了货币供应的增加，解决方法就是减少货币的供应。第二种看法认为：通货膨胀由工资与成本攀升引起，解决的方法是控制工资的上涨。第三种看法则将通货膨胀归咎于物价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两者都反映了公众不断提高的期望，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设立物价和工资管理机构。以上三种解决方法都会引起可怕的恶果：减少货币供应，意味着裁减政府开支、紧缩信贷、降低经济增长、造成失业和削减社会福利计划规模；控制工资增加，就会激怒工会，而工会是工党政府的主要支持者，触怒它们就会引起罢工；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手段去控制物价与工资，就会扭曲经济。

825

可是，通货膨胀又必须加以遏止。威尔逊于是将三种解决方法都试了一遍。1969年的预算案，满纸是加税、提高利率、限制分期付款和裁减政府开支。他还在议会通过了一个《价格工资法案》（Price and Wage Act），将工资和物价冻结6个月，然后再限制调整6个月。这一法案还决定设立价格与收入局（Price and Income Board），授予其否决加薪和涨价权。但由于该局并没有强制执行权，所以它仅能减缓而不能遏止通货膨胀。同时，这个局和紧缩通货的预算也没有能维持英镑的地位。长期以来，英镑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基础过于狭窄。英国政府应当在1960年代中期就将英镑贬值，然后任其浮动。英国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步，是因为威尔逊还顽固地恪守1925年温斯顿·丘吉尔和1931年拉姆齐·麦克唐纳所持的信仰，把英镑视作神圣之物。而币值下降和自由浮动的英镑，虽然可以达到合理的政府预算的目的，但仍然不能完全遏止通货膨胀——这种遍及于世界各地的现象。1969

年，工会又要求提高工资，威尔逊也再一次打算设立政府机构来控制工资和价格。他还敦促议会通过一项议案，授权政府延搁未经批准的罢工，并有权就获批准的罢工对工会会员进行民意调查。这两项举措分裂了工党，而且无助于威尔逊宣布的 1970 年大选，未能解决 8% 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对政府的一系列且试且行的预算有所帮助。威尔逊在这次大选中败北，将这些难以处理的问题交给了爱德华·希思。

舵手爱德华·希思：1970—1974 年

1970 年 3 月，在哈罗德·威尔逊下令举行大选之前，民意测验表明工党支持率比保守党高 12%。在竞选中，希思似乎不是敏捷的威尔逊的对手。威尔逊向群众说，“相信我，我已指引英国驶过了这段危险的水域。”希思是在电视演说中冷静地攻击工党，说工党应对英国的通货膨胀、失业和罢工负责。他向选民许诺他会带来改善的劳资关系、较低的税率，并对税务和地方政府进行改革。他还允诺要推进科学管理，促进市场自由，促使英国经济起飞。他指出强劲的出口会很快消除国家收支的赤字，遏止通货膨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赌博——下注赌经济增长。

在执政的最初两年，希思政府占议会的多数达 30 席。政府大幅度减税，希望通过增加国民储蓄来刺激投资，通过提高人民购买力来刺激经济、降低失业和提高生产率。政府也裁减了开支。政府宣称更倚重私有经济部门，而不是公有经济部门，更希望形成一个人民自力更生的社会。政府推行的贫困认定审核制，只能对贫困家庭申领救济金起到限制作用。因为许多贫民，或出于自尊或出于无知，没有申领救济金，这样国家就节省了大笔开支。通过敦促地方政府提高公有住房的房租和削减补贴，并将公有住房出售给住户，政府在住房方面的开支也得到压缩。政府大幅度裁减教育经费，致使学校 7 岁以上儿童不再获得免费牛奶，免费午餐的供应大为减少，同时不再大力推行取代贫民区学校的计划，并把每班人数限制在 30 人。后来任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当时任教育大臣，对保护文法学校 826

尽了最大的努力，其办法是限制综合学校的发展。与工党一样，保守党也拥有自己的选民。这些选民送子女上文法学校，希望自己拥有住宅（要求对房贷供款免除个人所得税），并期望降低税率。

1970 年和 1971 年两年，通货膨胀达到 21%，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工资，难怪罢工达到了 1926 年以来的最高潮。爱德华·希思对付罢工，用的是 1971 的《工业关系法案》（Industrial Relations Act）。这项法案规定强迫工人加入工会为非法，还规定工会惯常使用的关闭工厂的做法同样为非法之举。此外，令工会更感到愤怒的是，这项法案规定罢工之前必须有 60 天的冷静期，又规定劳资双方所订协约，应由工业仲裁庭（Industrial Tribunal）按法律执行。这个仲裁庭有权用严格的条文限定不公允的劳工行动，并对其课以罚款和监禁。这项法案虽然涉及国家，但把国家置于裁判者的位置上。劳资纠纷可以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中发生，但资方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劳资纠纷连绵不断，1972 年罢工造成的工作日损失，为 1920 年代以来的最高纪录。

希思也不主张政府控制工资和物价。他撤销了威尔逊设立的颇为有用的价格与收入局和工业重组公司（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Corporation）。除了孤注一掷地扩充生产能力以外，希思对解决通胀问题并无其他办法。希思希望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之后，其积极后果就是扩大英国的生产能力。1972 年，这个在 1962 年曾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谈判的希思，终了如愿以偿地使英国进入了这个力量巨大的俱乐部。这标志着英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一个德、意、法的产品强迫英国工业进步的社会。希思虽然崇尚自由放任主义经济，但他也是热衷于科学管理的行政官员。他的《地方政府法案》（Local Government Act）减少了地方权力机关的数目，特别是市政委员会的数目，并设立了 6 个新的大都会市政委员会。中央政府也创立了按地区划分的局，以提高医院管理的效率。希思将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与科学管理结合起来，似乎前途无限。

可是，突然间屋顶垮了下来。问题依然出在通货膨胀上。在希思政府执政时期，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10%。虽然通货膨胀是世界现象，但英国特别严重。其部分原因在于希思大量的减税措施增加了个人收入，而

且他反对实行收入政策以及允许工资大幅提高，这显然对遏止通货膨胀无益。1972 年，当希思意识到自己未能遏止通货膨胀后，便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完全改变了政策方向。他召集工会领袖，描绘了他控 827 制工资与物价的三阶段计划：第一阶段，实行为期 90 天（后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 60 天）的工资、物价、房租和红利冻结；第二阶段，允许工资每周增加 1 英镑，外加每年增加 4%，而物价必须在成本增加到情况下才能提高；第三阶段，工资每周增加 2.25 英镑或每年增加 7%。第一、第二阶段均按计划推行，收到不错的效果，但到第三阶段却未能完成。这时正值 1973 年 9 月的犹太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之后，阿拉伯国家实行石油禁运，造成物价飞涨，英国抵挡不住了。



1970—1974 年，爱德华·希思寻求用资本主义方法解决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不平衡、通货膨胀的问题，同样收效甚微（*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英国工业也离不开石油。石油短缺不仅迫使希思宣布关于实行每周3天工作制，而且也迫使英国紧急提高煤产量。可是煤矿工人仍然不肯让步，英国工业处于半瘫痪状态。于是希思在2月宣布举行大选，他要求选民关注的问题是：应当由工会还是由民选代表来治理英国。大选以他的失败告终。希思未能遏止通货膨胀、减少失业、使工会驯服，未能赌赢经济增长，也未能使英国重归自由放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最后的这一个目标，也许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例如，当象征英国工业强大地位的著名企业——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行将破产之时，希斯不得已将该公司的大部分国有化。他也不得已继续沿用威尔逊设立的国有企业局（National Enterprice Board），给私有企业发补贴和增强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控制。话语不得不屈从于现实。

828 希思在1974年未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又在两次大选中失败，保守党议员就以玛格丽特·撒切尔取代希思。她在1977年就断然宣称英国已经做好抛弃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准备。但是，此刻要与高达12%的通货膨胀进行搏斗的，是工党而不是撒切尔。

威尔逊和卡拉汉：1974—1979年

1974年和1975年，英国似乎已濒于崩溃。2月和10月两次大选，表现出选民对两个大党的失望，数以百万计的选票都投给小党。1951年，工党和保守党加起来获得选票的97%，而1974年这个比例降到75%。对两个传统大党的失望正在表现出来。通货膨胀凶猛异常，无法控制，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工商企业提高物价，实际收入下降，国家收支出现赤字。媒体已在谈论英国病问题，认为英国是一个走在自杀之途的国家、一个无法治理的国家。2月大选的结果是工党获得301席，保守党获得291席。其他小党获得议席的情况为：自由党14席、苏格兰民族党7席、威尔士民族党2席，厄尔斯特民族党11席。工党在下院拥有5席的多数，但如果所有小党都支持保守党，那么工党就会以14席的劣势退居少数党的地位。不过，自由党和苏格兰民族党支持工党，于是威尔逊又当上了首相。因为这个多数地位很不稳固，威

尔逊在 10 月又举行了一次大选。结果工党获得 315 席，比保守党多 39 席，而和全部非工党议员的 315 席（包括自由党 13 席，苏格兰民族党 13 席，威尔士民族党 3 席，厄尔斯特民族党 10 席）相等。苏格兰民族党表现的力量令许多人吃惊。该党的成功，显示了英国对苏格兰问题的长期忽视和苏格兰工人选民对英国工党的失望。这些选民对保守党毫无好感，他们倒向民族党，正如中产阶级选民既不愿投工党的票又对保守党失望灰心，而改投自由党的票。虽然许多人已经预见到 1974 年英国政治的分裂局面，但威尔逊还是说服了自由党和那几个民族党支持工党。

但是，威尔逊自己的党在 1974 年 10 月却陷入分裂。威尔逊在 1967 年支持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到 1972 年却转为反对。1974 年，工党中有许多人想要威尔逊下台。威尔逊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妙招就是全民公决，这是英国第一次举行全民公决。公决的结果是以 2: 1的多数赞成留在共同体之内，其部分原因是威尔逊为英联邦贸易争取到了有利的条件。不过，威尔逊还面对着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和迟滞的经济发展这两个问题。1975 年下半年，物价上涨了 25%。1976 年，生活水平下降了 15%，而且汽车、钢铁和造船工业都不景气，一些效率不高的分厂都没有关闭，因为关闭工厂会造成当地的失业问题。一切都是那么黯淡和了无生气。美国人观察家说，英国将成为第一个由发达国家沦为欠发达国家的国家。另一些观察家则认为，英国由于过度迷信社会主义而陷入病态。

而到 1976 年和 1977 年，英国的经济情况出现转机。1976 年，英国在三年以来首次成了净出口国。1977 年，英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 7 倍。通货膨胀率下降到 10%，且仍呈继续下降之势。工会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再要求增加工资。英国的生产率得到提高，计算机、电子设备、机器、服装和苏格兰威士忌酒，都赚进了巨额的外汇，旅游业和商船租赁与保险业等无形贸易收入也有明显增长，其中在无形贸易方面的收益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到 1978 年，英国通货膨胀率降至 8%，已经接近于国际平均值。有关英国病和自杀国家之类的说法销声

829

匿迹。德国甚至在考察英国成功的收入政策。

英国成功的答案，是三项政策和一个偶然的机遇。这三项政策是政府与工会达成的社会契约；政府的预算削减；政府对工业的资金补助和计划统筹。一个机遇是北海发现了石油，这些石油在1978年能满足英国需要量的2/5，而且未来的产量还会更大。

社会契约包含政府与工会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工会同意只提出温和的增加工资要求，政府则保证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工人收入的稳定和有效地推进社会改革。这些协定是在唐宁街10号和财政部进行艰难的谈判所获得的成果，也是在工会年会上激烈斗争中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些协定之所以能够比较令人满意，是因为政府废除了广受憎恨的《1971年工业关系法案》和通过了一个给予工会前所未有权力的法案。威尔逊是以上这些协定的发起人，于1976年7月辞去首相职务。工党议员推选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为他的继任者。

卡拉汉这时64岁，属于工党保守派，是一位为人友善、处事坚强、精明强干的资深政党领袖。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比威尔逊更有效率的首相。他的智慧与威尔逊不相上下，更善于分析经济的风险问题，而且在处理党内事务方面更有手腕，也更为直截了当。对于工商界头面人物和工会领袖，卡拉汉也善于软硬兼施。他邀请他们前往白金汉郡的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Chequers）去开诚布公地讨论工资、物价和贸易逆差问题。他也说服了工党去支持政府裁减开支的政策。这样，他就能够双管齐下来遏止通货膨胀：一方面阻止工资成本螺旋式上涨对物价上涨的推动，一方面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减少对商品的需求。卡拉汉虽然没有单一追求经济增长，但他也通过对特定行业进行补助来提高生产率。他将造船业、飞机制造业以及英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公司——英国雷兰兹公司（British Leylands）国有化。政府的这一做法，不是出于对国有化的热心，而是由于这些公司已濒临破产。

卡拉汉知道，资本主义从1945年至1979年给英国经济以推动力。他也知道，福利国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都不能削弱这个力量。两大

政党的政治家都认识到，在通货膨胀的时代，明智的计划经济是必需的。同样，在某些时刻，公有制也是必要的。1970年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并非基于两大政党的理论主张，而是解决现实的迫切问题。当两党在野之时，保守党的诉求偏右，工党的诉求偏左。而当两党处于执政地位时，它们又都迫使其领袖走中间道路。20世纪末叶的种种问题的巨大压力，迫使希思转向国有化，驱使卡拉汉裁减政府开支。

因此，到1979年，两大政党中都有不少人对复杂的经济问题看法更加务实和世故，他们领悟到思想学说必须服从于当时的解决问题的需要。但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崇尚务实精神。工党的左翼和保守党的右翼，都变得更加教条。工党左翼在托尼·本（Tony Benn）的领导下，取得了党的执行大权，并得到了工会的支持。这些工会对社会契约感到愤怒，认为对他们弊多利少，严厉抨击卡拉汉。保守党右翼则在推翻爱德华·希思之后，便得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强有力的鼓舞。她作出一些激荡人心的承诺：要少一些政府控制，多一些资本主义，就可以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问题。

到1979年，英国的内部分裂状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左翼更加好战，右翼则更为强硬。虽然两派在中间的共识逐渐增多，但阶级冲突连绵不断。英国从1963年以来，工党政府执政已经将近14年。连年的加税和通货膨胀（到1978年也有缓解）以及欧佩克卡特尔提高油价的做法，已经令人感到厌倦。虽然卡拉汉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些年英国人民还是受够了，无法再忍受下去。1979年5月大选，保守党获得45%的选票，工党仅得到38%，自由党为14%，其余由各民族主义政党分享。结果保守党在议会占有43席的多数。1979至1983年，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届政府执政的4年。接着撒切尔又在下一次大选中获胜，组建第二届政府。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十一年统治

1990年5月15日，玛格丽特·撒切尔结束了11年首相任期。只

有沃波尔的20年（和小皮特的18年及利物浦的15年）首席大臣任期比她的任期更长。这对于在这个时期担任首相的保守党领袖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保守党在1979、1983和1987年大选中都没有获得45%以上的选票。在保守党政府当政的最初三年，失业率翻了三番，1/7的英国制造业工厂倒闭，年通胀率达到21%，该党的民意测验支持率降至28%。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保守党在1983年大选中获得43%的选票，获得397个议席，而工党获得209个，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获得23席。从1984到1987年，许多观察家认为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拯救了撒切尔政府。胜利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功，尤其是在一个曾经伟大和自豪的国家正走向衰落，而其爱国主义为这样的胜利所唤起之际，情况更是如此。

1982年4月20日，8000名阿根廷军人进入距阿根廷400英里以外南大西洋上的福克兰群岛。72天之后，25000名英国陆海军官兵和100艘舰船将阿根廷军队赶出这个群岛。英国自1834年开始就占据这个群岛，群岛上1800名居民大都来自英国，而且他们要求英国继续统治该群岛。这些为英国保卫群岛提供了在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明白无误的权利。

831

然而，这场保卫战维护了英国的国家利益了吗？战争中，1000名阿根廷人或英国人战死，另有1700人受伤。英国的战争支出在27亿英镑以上，或每个岛民平均150万英镑。况且，这都是为了8000英里之外的一个没有任何战略价值或经济价值的群岛。此外在1982年，英国外交官正在谈判准备放弃这个群岛，正是谈判本身激发了这场入侵。

在法律上，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但在国家利益方面，这场战争是无理性的。唯有战争的实施过程极为出色，给人以心理上的极大满足。在遍及英国各地的酒馆里，阿金库尔战役、无敌舰队、特拉法加海战和D日登陆的精神得到复活，玛格丽特·撒切尔则名望大振。这位铁娘子（苏联人给她起的绰号）在保卫福克兰群岛方面无所畏惧。她的坚强意志、充沛精力、绝妙口才、不畏痛苦、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和坚决不妥协的精神，都酷似丘吉尔的风范。保守党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

率立即飙升 20%，为历史学家提供了该党 1983 年大选胜利的关键解释。

1987 年 5 月之后，这个解释似乎不再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尽管没有福克兰战争，保守党仍然获得了 43% 的选票和在下院的多数党地位。在一个又一个选区，保守党 43% 的选票赢得了众多的一席；而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 23% 的选票却不足以赢得议席。工党获得其余的 32% 的选票。撒切尔政府只靠 43% 的选票继续执政的原因并不是福克兰群岛战争，而是左翼政党的严重分裂。

长期隐而不露的左翼分裂，在 1979 到 1981 年的重要时刻突然爆发。各种各样的左翼激进分子，从理想主义的和平运动工作者到残酷无情的战斗潮流运动（Militant Tendency）中的托派分子，纷纷在地方政党选举中脱颖而出，这些政党地方选区的年迈的领导人不再具有接受效忠的号召力。好战分子还在约 20 个工会的选举中获胜，这些工会对威尔逊和卡拉汉正纪律上进行约束和将抑制工资的增长感到愤怒。这些好战分子和选区的激进分子参加工党大会，其数目足以将工党由一个具有共识的多数党，变为一个从事激进事业的少数党。这些激进分子从始终关注选民利益的工党议会党团手中，夺取了推选党的领袖的权力，将它交给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其内部构成为：工会代表占 40%、选区党组织占 30%、曾经握有实权的议会党团占 30%。长期以来，工会是工党的资金来源，在党的大会上获得集体选票的支持，此时控制了推选本党领袖的权力。

工党大会推选出的工党领袖是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这是一位名气很大但毫无效率和相当激进的政治人物。激进分子还要求单方面解除核武装，关闭私立学校，废止私立医疗机构，进一步推进国有化，由工会掌控经济战略。

对工党的四位前任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戴维·欧文（David Owen）和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dgers）而言，这些要求过于极端，过于背离公众舆论。他们深知，当只有 21% 的公众反对核威慑时，却有 67% 的公众支持核 832

威慑，另外公众也不支持关闭私立学校和由工会主管经济。因此，这四人创立了一个新政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起初，该党赢得巨大的支持，尤其是与自由党结盟之时。1982 年，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在民意调查中获得 50% 的支持率。但不久之后，联盟的弱点就暴露无遗，特别是因为联盟由两个不同的政党组成，拥有两位党的领袖——社会民主党领袖戴维·欧文和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David Still）。欧文支持核威慑，斯蒂尔反对核威慑，这是两者之间的众多分歧之一。这些分歧不仅使两位党的领袖貌合神离，而且也使党的普通党员势不两立。由于缺乏清晰坚定的立场，而且并不明确代表任何社会经济利益，所以联盟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在大选中令工党败北。

在 1983 年大选中，工党只获得 28% 的选票，与 1966 年的 48% 相去甚远。这是工党所处的最低点，迈克尔·富特引咎辞职。选举团推选年轻而富有魅力的威尔士人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h）为新的领袖。1984—1987 年，在金诺克的领导下，工党开除了好战分子，将政策温和化，扩大政党基础。在 1987 年大选中，工党雇用了最好的广告制作公司和电影导演，展示出工党明快和温和的新形象。但该党仍然坚持解除核武装，仍由工会控制，党内激进派仍然把持了市镇委员会，支持那些不得人心的诉求和事业，如同性恋权利和尼加拉瓜共产党等等。

工党的衰落还有长期性的原因。该党十分倚重的选举基础在北部工业区，而这个地区处于衰落之中。同时，工会的会员人数也在减少，1986 年比 1980 年减少了 25%。再者，重工业向轻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换，也产生了更加具有独立思想的工人。处于边缘地带的中部地区是小型工业企业集中的地方，当地技术工人显然对激进主义和裁军的论调感到不悦，而且对黑人和巴基斯坦人获取工作岗位和住房感到愤慨，因此越来越多地把选票投给保守党。特别是撒切尔夫人将公房出售给房客的精明政策，使这些技术工人受益，改变了他们的投票取向。在拥有住房的工人中，31% 投票给工党，44% 投票给保守党。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对保守党有利。英国人越富裕，就越会投保守党的票（或至少不会投工党的票）。1970 年代末经济的缓慢增长，导致纳税负担加重，进而引起纳税人的强烈反弹，先后两次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送入白宫。人们已经厌烦了社会主义及其负担，甚至也厌烦了医院的拥挤和市政委员会公房条件的恶化。

在左翼的分裂、工党的激进化、联盟选民和思想基础的缺乏、长期存在的保守趋向之外，我们可以添加第五个要素，来解释保守党连续三次大选获胜的原因——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 1925 年生于林肯郡格兰瑟姆，父亲名叫阿尔弗雷德·罗伯茨（Alfred Roberts），一位拥有两家食品店的店主。撒切尔在当地的文法学校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习，接着在牛津大学获得化学学位。之后，她与一位富有的油漆制造商撒切尔先生结婚，又取得法学学位，步入政坛。撒切尔先当选下院议员，随后任教育大臣，推翻爱德华·希思，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其行事风格一贯坚毅刚强、不屈不挠、不讲情面。她的父亲信奉卫斯理宗教义，向她灌输了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自立自强、刻苦耐劳、节俭朴素、深谋远虑，坚信要建立一个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世界，而这些美德将会带来秩序、繁荣和进步。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之上，撒切尔后来又增加了自由放任经济和货币经济——认为可以简单地以减少货币供应的方法来消弭通货膨胀。在准备停当之后，撒切尔夫人接受造成英国经济衰退的三大挑战：通货膨胀、增长迟缓、社会主义。 833

起初，通货膨胀的咒语几乎毁了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当她担任首相时，通胀率为 10%，两年后为 21.9%。为兑现竞选中的关于在公共部门增加工资的承诺，撒切尔夫人普遍大幅度提高工资，进而推高了物价。她还调高了增值税（一种隐性的销售税），将生活费用指数增加了 4%。来自通胀的压力并没有使撒切尔夫人和她的货币主义顾问们感到十分担心，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只要限制货币供应，就没有必要对工资和价格进行控制。由于银行信贷比流通纸币更能构成货币的主体，所以财政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将银行贷款的利率调高到 17%，这个利率水平将会阻遏信贷的扩大。英国财政部贷款 17% 的高收益，诱

使世界上的银行家们买进英镑，抬高其币值。而英镑的币值已经由北海石油抬得很高，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第五大石油生产国，英镑很受欢迎。到1982年，汇率从只有1英镑: 1.60美元，升到1英镑: 2.30美元。英镑的高企，使得英国所有出口商品的价格远比竞争对手昂贵，给英国工业以破坏性的打击，而这些遭受打击的企业却因利率高达17%而无法借贷。对于许多企业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自1979到1982年，1/7的制造业从业人员失去工作，制造业生产下降17.3%。失业率是原来的三倍，失业人数在1982年达到300万。

300万失业大军，仅靠很少的失业津贴勉强维持生活，加上许多人就业不足，几乎没有消费能力。因此，价格上涨变缓，同时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和石油的供过于求也产生了影响。到1983年3月，通胀率只有4.6%。

在失业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帮助下，撒切尔夫人解决了第一个棘手的难题——通货膨胀。但是第二个问题——增长迟缓，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事实上，在撒切尔政府执政的最初三年，经济完全没有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反而出现了4.2%的下降。但对于撒切尔夫人这样的铁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这样的经济动荡确实必要的。只有这样，那些最适应经济环境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才能为经济效率打下基础。而且，她也不允许工会挡道。为反对关闭缺乏效率的煤矿，持激进立场的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号召他的全国矿工联盟（National Union of Miners）举行罢工。于是，长达一年、充满暴力的罢工发生了，但撒切尔夫人和她手下的特警打败了斯卡吉尔和他的1万名飞行纠察员。1980和1982年，撒切尔政府还分别通过了两项《工会法案》（Trade Union Acts），削弱了工会的权力。这些法案、煤矿罢工以及大规模失业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工会，向她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又跨进了一大步。同样，她还尽可能地取消政府在管制方面的权力。

834

但是到1987年，英国经济依旧增长迟缓。自1979年以来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远低于社会主义政党当政的1960年代的3.1%。而且考虑到北海石油带来的巨大财富，这个增长率真是低得惊人。迟

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英国文化本身。德国工人生产福特旗下的福克斯轿车，只需要英国工人的一半时间，因为英国工人上班迟、下班早，午餐时间更长，而且动作缓慢。管理层的风格也同样松散。同时，英国工人受教育程度也较低。16 岁时，82% 的英国少年已经辍学，德国的这个比例只有 10%；而辍学的少年中，德国有 50% 去当学徒，英国只有 14%。

德国和法国都有明确界定的工业政策。这些政策是在政府、银行和工业计划的制定者进行合作，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中作大收益的投资进行指导过程中产生的。撒切尔夫人就没有这样的工业政策，教育政策方面亦然，因为首相不希望扩展英国的教育。事实上，她甚至削减了 10% 的大学预算，分批关闭了北部的科学学院。她打破工会强大权力和只让有效率企业存在的做法，具有有益的影响。今天英国大部分经济都比 1979 年更有竞争力。但是，撒切尔夫人没有触及深层的文化弱点，所以经济增长迟缓依旧，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那么积重难返。

对撒切尔夫人和那 43% 投票选她的选民而言，社会主义就是英国经济问题的一部分。在 1950 年代，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甚至包括年轻的希思都接受了社会主义，尤其是当它披上父权主义的外衣时更是如此。撒切尔革命就是为了否定这种接受，并谴责社会主义本身。生产方式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罪恶，计划经济同样十恶不赦。甚至连福利国家也与道德观的弱化一样有害。

1980 年代末，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私有化”，即将国有企业转制为私有企业。出售给个人投资者的企业有英国煤气公司、英国宇航公司、英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许多其他国有企业。到 1990 年，20%（而不是 7%）的英国证券和价值 200 亿英镑的国有资产都已变成私有财产。从这些出售中获得的巨大利润，也令那些主张减税者感到高兴。但是，政府实施私有化的基本原因就是认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这个结论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甚至德国和瑞典的社会党也放弃了继续国有化的计划。但是，并不像撒切尔夫人那样鄙视计划经济，因为她推崇自由放任经济。而且，它们也不像撒切尔夫人和她 835

的顾问那样对福利国家持批评态度，因为后者认为福利国家有害于经济增长。法国和德国的许多人（不仅仅是社会党人）都看到，尽管法德两国在1970年代中期用于教育、医疗和福利方面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而英国只占17%，但两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英国的两倍。

玛格丽特·撒切尔从未胆敢正面攻击福利国家。她不会对事实视而不见，民意调查显示只有6%的人愿意用削减福利国家服务来换取减税。她直言到："我们不会取消医疗服务。"但是，如果说不存在正面攻击的话，政府还是采取了不少削减和阻挠措施：公房项目被削减50%；大学预算被削减，以至于3万名合格的申请者遭拒；教师工资被控制在低水平上；学生住房补贴被取消；一些学校被关闭；由于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私人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状况恶化。不过，尽管削减了一些开支，政府的总支出并没有减少。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医疗服务更加昂贵，大量失业者耗去了巨额津贴，而1981年的城市骚乱和犯罪率的上升都需要扩编和扩展警察、法院、监狱和社会服务机构。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11年之后，政府规模、政府支出和福利国家都有了扩大和增加。

社会主义者掌权的地方政府就受到了整肃。如果玛格丽特·撒切尔不能推翻社会主义，那么至少能够推翻一些社会主义者。其中之一就是派头十足的大伦敦市政委员会掌门人肯·利文斯顿（Ken Livingston）。撒切尔政府撤销了这个市政委员会以及其他6个大都会地方当局，削减了所有地方政府的征税和支出方面的权力。维多利亚时代保守党曾大加鞭笞的中央集权制，却由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撒切尔政府还中止了长期以来的平等趋向。最富的10%阶层收入增长速度，比最穷的10%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快6倍。富裕阶层减税的幅度也大于其他阶层。1989年后，这个阶层甚至不用缴纳地方财产税，这个税种已变为所有人均需缴纳的人头税。1989年处于贫困线或之下的人口比1979年增加了33%。迪斯累利所发现的两个英吉利民族——富人和穷人虽然一直存在，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已在缩小之中。在撒切尔时代，这个差距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社会分层上都加大了。北部工业区处于衰落之中，变得更加贫穷，是工党的票仓。南部处于

进步之中，变得更加富裕，是保守党的票仓。城市中心区日见凋落，骚乱不断，城市郊区不断扩展，富足安逸。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住房、周围有绿色的草坪环绕，住在安全、没有种族问题的社区，在私有企业任职，送孩子就读最好的学校；另一个民族租借市政委员会的旧房，周围是垃圾遍地的水泥院落，住在罪案频发和种族分割的社区，没有失业津贴、孩童补贴或养老金，其子女常常辍学。撒切尔夫人有可能 836 是战后能力最强、也肯定是立场最坚定的首相。她十分认同富裕民族，认同富有正面的、创新的和具有雄心的精神，在她执政的 11 年里，撒切尔夫人以她的聪明才智促进其继续发展。但是，她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贫穷民族之上。这个民族处于不利的、少数的和教育程度很差的境地，撒切尔夫人对此完全不予认同。结果，英国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阶级分野最严重的社会。

除了通货膨胀、增长迟缓和社会主义之外，撒切尔夫人还面临着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有北爱尔兰、种族和市中心区骚乱，以及欧洲、国防和外交。她对付这些问题的方针主要是加以抑制，而不是予以解决。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爱尔兰共和军及其在爱尔兰和美国的朋友极力要求建立统一的爱尔兰，而北爱尔兰的新教徒绝不愿意成为统一的爱尔兰第一部分，两者之间充满暴力、不可调和，因此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只能加以遏制。1981 年，撒切尔夫人与爱尔兰总理加勒特·菲茨杰拉德（Garret Fitzgerald）博士采取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行动，创立了英—爱委员会（Anglo Irish Council），但遭到新教徒派别的彻底拒绝。这样，对其决不妥协的斗争加以抑制成了唯一的政策选择。

当然，种族和市中心区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但撒切尔夫人也仅仅是加以抑制。到 1990 年代末，亚洲人和黑人占英国人口的 4.4%。尽管法律和政府委员会反对种族歧视，但种族歧视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例如，市中心区的警察部队中的黑人警察十分稀少，警察内部存在着白人对黑人和被社会抛弃、剥夺的人的偏见，警察的暴行引起居民的愤怒和骚乱。虽然这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同样复杂的解决方法，但撒切尔夫人的对策，只是加强警察部队的控制能力，并没有采取消除种

族歧视的行动。结果，保守党右翼的政治控制力大增。

撒切尔政府抑制欧洲共同体对英国主权的侵蚀，右翼对此也十分欣赏。长期以来，撒切尔夫人在欧共体内十分积极——积极地采取反对行动，直到欧共体同意对其宽泛的农业补贴政策和无止境地对英国提出缴款要求的做法进行改革为止。通过她的不懈坚持，事实上是通过她的强悍斗争，撒切尔夫人以合法的途径消除了对英国的不公。但是，当欧共体计划编制共同预算和实行统一货币时，她顽强地维护英国主权。作为欧洲唯一的货币主义者，撒切尔夫人不允许非货币主义者编制英国的预算。

同样自豪的民族主义也确定了撒切尔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即遏制政策。这个遏制政策含义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1948年表述的内容完全一致：西方要遏制苏联的侵略。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冷峻的斗士，然而却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冷峻斗士。这是戈尔巴乔夫在进行互访之后对她使用的评论用语。尽管华沙条约组织正在崩溃之中，苏联的经济和统一也受到了威胁，但撒切尔夫人仍在向布什（Bush）先生进言：保持武装！保持北约的武装！她下定决心要维持英国的三837 叉戟导弹和原子弹。但为什么？当苏联已经从欧洲拆除了所有中程导弹，当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走向中立之时，英国还要拥有这些昂贵的玩具原因何在？难道这些武器不是像福克兰群岛一样，只不过是过往伟大国家的象征、对国家利益毫无裨益的象征吗？但连尼尔·金诺克和工党也认为英国应当拥有这些武器，“民主”党（由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合并而成一个政党[①]）领袖帕迪·阿什当（Paddy Ashdown）的想法相同。那些在更紧张的时刻要求进行核威慑的67%的民众，可能也持同样的立场。所以，至少要在核威慑问题不再分化左翼的时候，左翼才能团结起来。即使不能团结成为一个政党，左翼至少应当达成分配选区的大选协议。这样的团结能够击败在两个十年里只获得45%多一点的选票、却能当政的保守党。撒切尔夫人的十一年统治规定了1980年代的英国。但却不能规定1990年代的英国。

① 该党的正式名称为社会自由民主党（Social and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译者

撒切尔主义的终结

玛格丽特·撒切尔突然倒台，出乎人们的预料。一系列形势变化为这个事件铺平了道路。首先，从 1986—1990 年，撒切尔夫人脱离了下院后座议员，而正是他们将她推到权力的顶峰（撒切尔夫人在此期间只在议会作了两次正式讲话）。其次，她拒绝支持欧洲联盟的做法，使她疏远了政府内高级官员，同时鼓舞了党内“欧洲怀疑派”。再次，她通过由最贫穷的户主缴纳社区费（community charge，其政敌立即称之为“人头税”）的方式，转移中产阶级的纳税负担。这个政策抵触了英国的公平观念，导致普遍的拒绝缴费行动（数十万拒绝缴费者收到传票）。当受到前任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的挑战时，她未能得到根据党章所需的足够票数的支持，而要继续担任党的领袖，这是必不可少的。内阁成员和党内普通党员都拒绝给予支持（担心撒切尔夫人领导下次大选会落败），因此为避免产生一个赫塞尔廷政府，她决定辞职。保守党转而选举约翰·梅杰（John Major）任党的领袖。他曾任外交大臣，当时任财政大臣。梅杰出身贫寒，15 岁时辍学。他的迅速跻身政府高层的经历，向英国人证明了一个竞争社会确能使人功成名就。撒切尔夫人早在就任首相之初，就看到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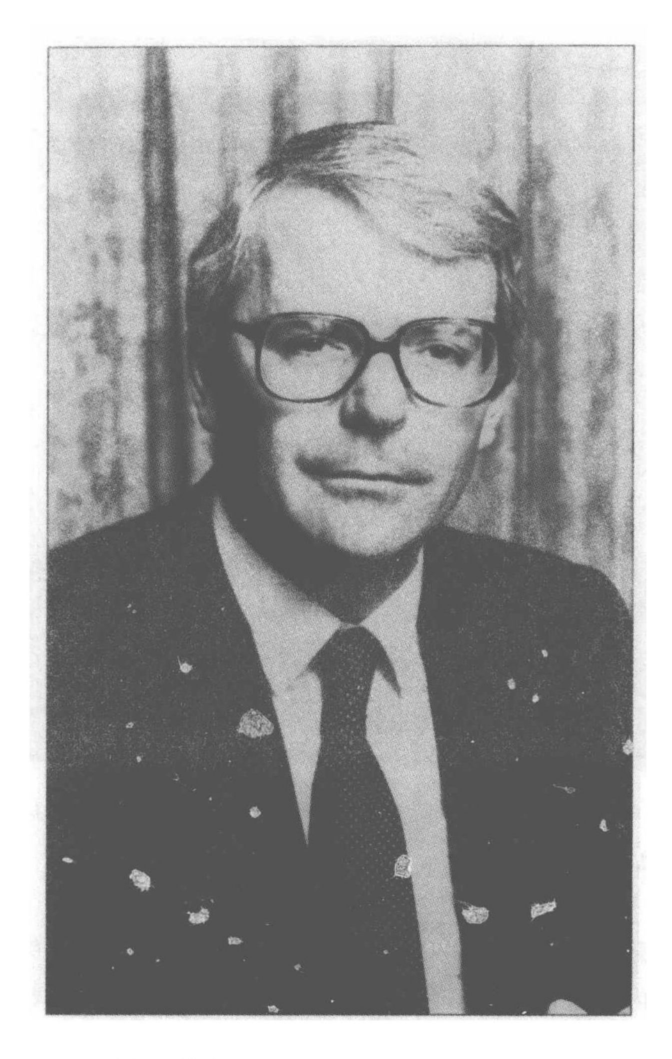
但真正导致玛格丽特·撒切尔每况愈下、最终受挫政坛的原因，是经济艰难时代的重现。1980 年代初，五分之一英国工业生产力的丧失、偏低的投资水平、无节制地向个人提供贷款及资助社团建设、失衡的消费支出和出口增长等等，都造成了政府收支的巨额赤字。结果，通胀率到 1990 年回升到 10.6%。政府的对策很简单：提高利率。但这个解决方法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减少投资和利润，进而引起经济衰退。失业率随着房贷利率上升，失业的房主身负沉重的债务负担。此时，撒切尔的经济奇迹与其政治对手辞职时推行的“收放”经济似乎毫无二致。事实上，按照政府的统计数据，经济运行状况还不如 1970 年代（1969—1978 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2.4%，1979—1991 年只有 1.75%）。艰难时代的重现、在扭转经济下行中想象力的缺位，使 838

得撒切尔失去了她十分看重的权力。

约翰·梅杰继承了一个经济烂摊子和因欧盟问题处于分裂的党。不过，梅杰还是有所建树：在1991年12月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在1992大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以尼尔·金诺克为首的工党，这些都是他首相任期的亮点。1993年12月，梅杰通过谈判达成了《唐宁街宣言》(Downing Street Declaration)，宣布爱尔兰共和军和新教武装力量在北爱尔兰实现停火，这是在这个冲突频发的地区走向持久和平的第一个具体步骤。他还努力改变保守党的僵硬形象：会见重要的同性恋权利活动家——知名演员伊恩·麦克凯伦（Ian McKellen)，反对恢复死刑。但从1992年12月以来，保守党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当时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Rate Mechanism，ERM)，从此英国公众不再认为保守党在处理财政事务方面有独到之处。在竞选中打出减税旗号后不久，保守党政府就宣布增税，使许多选民感到受到了欺骗。这种选举抑郁症一直延续到经济复苏后的1997年。

另一个造成保守党十八年统治结束的因素，是工党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下的复兴。1994年，年仅41岁的布莱尔，就接替能干但缺乏吸引力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担任工党领袖。布莱尔是一位保守党律师之子，先后就读于公学和牛津大学。面对一个由于长期在野而委靡不振的政党、一个仍然将单方面裁军、罢工和社会主义作为标签的政党，布莱尔大力使之重振精神、恢复活力。这是一位充满活力、善于在电视上展示自己的政党领袖，他结果保守党的有关个人责任的口号，增添了集体主义理想的元素，在对政府十分不满的选民中间引起共鸣。布莱尔说服其党内同事同意放弃了第四条款，该条款规定工党支持对重要行业实行公有制（哈罗德·威尔逊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约柜”[①])。1997年，他宣布：如果工党执政，就不会在下届议会任期之内调高最高税率。早些时候，他还作出承诺要“严惩犯罪，用强硬手段消除犯罪根源”。一位观察家注意到，这是来

① 约柜，原指古以色列人保藏刻有十诫的两块石板的木柜。——译者



约翰·梅杰，1990—1997 年任英国首相，财政大臣和文官大臣（*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

自工党全面计划的承诺之一。1997 年 5 月大选结果令人震惊：工党赢得 419 个议席，握有 179 席多数，保守党获得 165 席，社会自由民主党获得 46 席。这是保守党自 1906 年以来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

评论家指责布莱尔模仿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个人领导风格，但他倚重中心小组、民调结果和反应团队，所以他显然是汲取了美国政治家 839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David Jones*，*AP/World Wide Photos*）

威廉·杰弗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的经验教训。布莱尔在任期内在制止北爱尔兰暴力冲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98年《复活节星期五协定》（Good Friday Agreement）确定了当地天主教徒840和新教徒分享政权的框架，规定了由爱尔兰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废除上院的世袭贵族议员，启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进程。有些人担心这些举措会威胁到联合王国的存在，但作为“新工党”的重要财富，布莱尔的工党同事不愿对他的一些专制手段提出挑战。

布莱尔政府的成败，并不仅仅取决于托尼·布莱尔或他的潜在继任者的领导能力。任何政党——保守党、新工党或社会自由民主

党——的未来，都取决于对选民的号召力。英国选民已经厌烦了撒切尔的保守党那种咄咄逼人的口吻，拒绝了迈克尔·富特的社会主义陈词滥调。此时此刻，我们还不能确定新工党的口号“公平和体面的社会”（fair and decent society）或保守党的口号“信任英国”（believing in Britain），是否对变化中的大众民主有更大的感召力。仍然存在的联合王国的人民所要选择的前进方向，目前尚不明朗。但是，在面对未来数不胜数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英国人所一贯依靠的就是变革。

阅读文献

841

David Butler and Donald Stokes,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 London: Macmillan, 1974. 该书以数百次访谈和大选数据为基础，概述了战后的英国政治，主要揭示政党发展的连续性，解释其不断变化的命运。

Peter Calvocoressi, *The British Experience , 1945—1975* , London: Pantheon Books, 1978. 作者称：“这是一个希望被失败击碎的故事”，然而，他仍然对社会主义的英国保持乐观和宽容。

Colin Cross, *The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68. 该书有两个主题：大英帝国如何在其鼎盛时期发挥作用；这个帝国如何、为何如此突然地崩溃。

Pauline Gregg, *The Welfare State :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Day* , London: George G. Harrap and Co. , 1967. 作者赞扬了社会主义和“五个光辉的年头（1945 年后），它将车轮转动由闲散变为繁忙”，但对其中 1950 年后失去原有的势头感到遗憾。

Kenneth Harris, *Attlee* ,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2. 这是一部详尽的、权威性的传记，着重叙述了艾德礼的责任感、基督徒兄弟情谊、对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仰慕和作为首相的坚忍不拔。

Algred F. Havighurst, *Britain in Transition : The Twentieth Centur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该书综合地、详尽地记述了20世纪英国的历史，截止时间为1979年，特别实用。

Peter 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The Ending of tile Socialist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作者以敏锐的笔触考察了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考察并赞扬了她对碍事的、无用的机构所做的大胆和必要的改革，同时也批评了那些使英国两极分化的严厉措施。

F. S. Northredg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The Process of Readjust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2. 该书尖锐地分析了英国由一个世界强国沦落到二流国家的过程，重点放在那些显示英国弱点的危机之上。

Anthony Sampson. *Macmillan: A Study in Ambiguity*, London: Penguin Press. 1967. 这是一部风格明快、笔调尖锐的新闻报道式的传记。这位首相在1937—1957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7—1963年发挥了支配作用。

Alan Sked and Chris Cook, *Post-War Britai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该书是一部概述1945—1983年政治事件的最出色的著作。作者的记述公正，不偏不倚，清楚地分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Harold Wilson, *A Personal Record: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64—1970*,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9. 这是一部传记。再次反映了一位首相记述本人业绩的弊端：带有偏见；也展示了其长处：信息量的丰富。

J. E. Wright, *Britain in an Ag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An Economic History since 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该书广泛而概要记述了近40年的经济变革，重点探讨政府无法控制的贸易、金融、制造业及技术的深层演变趋向。

第三十一章　社会主义之下的英国生活 842

“财政收支危机”和“处于危境中的英镑”是1947年英国人在报刊上常见的标题。同样，在1957年、1967年和其他一些年份，这样的标题也常见诸报端，不过大多数读者都一掠而过，不加理会。听多了“狼来了”的喊声，却不见狼来，他们干脆就将这类伤脑筋的问题交给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去操心，专心阅读报纸的家居栏、时装栏或汽车广告栏以及与30年来切实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的现实相关的报刊版面。这些现实增加了财富，提高了技术，带来了“高品质生活”。人们还阅读报刊上许多充满了性爱的话剧剧评、充满了暴力的电影影评、革命性的艺术展览以及许多最新出版的书籍。报刊社论向读者传递以下信息：综合学校、开放大学、离婚和堕胎改革等。这些问题反映了一个更为自由、流动、开放和紧张的世界。构成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不是关于英镑的讨论，而是这些社会发展问题。在这些发展中，人们可以轻易地指出最深刻的简单的事实：这就是，除了1976年和1977年之外，英国人在所有年头都比上一年更为富足，这是英国科技显著进步的成果。

科技和财富

在1977年——伊丽莎白二世在位的第25年，她的臣民比她登基时要富裕得多。1977年的英国经济与1952年比较，人均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增长了70%。男性体力工人是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实际

工资增加了89%，而且每周工作时间为44小时，而不是25年前的47.7小时。这些增加的英镑收入意味着英国人的收入是有史以来最为843 均衡，而且食用的肉类增加24%、奶酪增加92%，土豆减少46%。食谱中包含更多的冷冻食品、法国奶酪和来自异域的菊芋、茄子之类。普通英国人居住在更加舒适的住房或套房里。1952年，有30%的住户拥有自己的房产；1977年，这个比例增加到53%。1977年，所有住房中91%有浴室，99%有抽水马桶，92%有电视机，75%以上有冰箱和洗衣机，50%以上有电话，74%有私人汽车。对于体力工人来说，汽车特别有价值，因为25年的不断富裕，带来了每年3.5个星期的休假。富裕起来的孩子们开车去探望已退休的父母。英国退休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因为英国的人均寿命，已由1952年的女子71.2岁和男子66.2岁提高到1977年的女子75.5岁和男子69.3岁。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Fiona Hanson, AP/World Wide Photos*）

科学和技术，加上勤奋、高效的劳动力，是富裕和舒适生活的根基。科学在医药进步上的作用确实令人惊叹。英国人在医疗这方面也有不便之处，如在诊所和医院的排队等待，但医疗方面的开支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2%，而美国为8%。1977年的婴儿死亡率也远低于1952年，下降了一半。技术进步也给经济带来奇迹。计算机和激光技术是1920年代以来在自动化和降低成本的持续进步中的最新成就，装 844 配线和电子眼技术是1920年代技术进步的标志。1978年，英国的计算机工业在欧洲最为先进，在机器人的研制方面也领先于他国。居领先地位的技术还有喷气引擎和诊断疾病的放射性扫描仪。猛犸项目与其工程师一样出色。

倘若了不起的维多利亚时代工程师看到因弗内斯（Inverness）附近基斯霍恩湖（Loch Kishorn）旁边的“巨洞”（Big Hole），一定会惊讶不已。1976年，约850人在这里建起了一座高达170英尺的钻塔，不久将浮拖至北海，成为40座这样的钻塔中的1座。塔上有工程师、钻探工人、油井修建工，将打下11000英尺深的钻井寻找石油。这种工作是很危险而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每钻进30英尺，马上就要接上另一截30英尺长的钢管，而且在时间上要分秒不差，在连接上要精准牢固。强劲的海风和巨大的海浪横扫这些钻塔平台。钻井平台工人的伤亡率比普通矿工高10倍，比普通工人高50倍。但这些油井在能源危机时代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石油，设得兰群岛一带油田的产量与科威特油田的产量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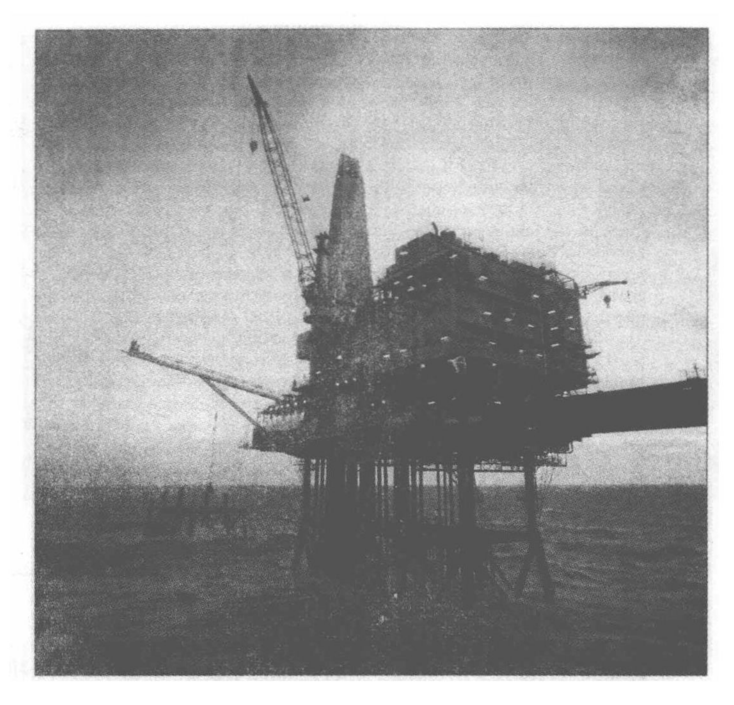
在钻台上工作的工人，所创造的财富要高于所有的前辈，英国的海员、码头工人、电子工人、冷藏食物工人、航空公司职员、农民也是如此。1972年，英国的5.5万海员从海上运出运入的货物吨位要比1947年12万海员所运输的货物吨位还要多。原因在于，船比以前的更大，所需海员的人数比以前更少。而且，船运的大量货物都是用集装箱运输。集装箱的大小正好和卡车与火车车厢相配套，所以，许多码头工人成为多余，而剩下的少数工人则效率极高。电子行业工人的效率也很高：1956年的人数是1939年的3倍，但他们的产量则是那时

的10倍，所以收音机和电视机价格更便宜。生产冷冻食物的高效率也增加了国家的财富。1972年冷冻食物的价格仅比1962年高9%，而其他食物高30%。

机器在任何一个行业的运用都会提高效率：用计算机了解飞机订座情况或查看银行账户收支情况，都只要几秒钟。微型计算机降低了英国汽车的耗油量和污染量，机场大型摆渡车也同样受益。这些摆渡车将乘客运到飞往西班牙利维埃拉的包机跟前。技术全面发展的两翼——机械化和化学，也运用到了农业方面。农民用更大的拖拉机耕地，用化学肥料促进植物生长，用杀虫剂铲除杂草；大型养鸡场和养猪场，以大规模、廉价、专业化的方式生产鸡蛋和咸肉。这对于家禽和牲畜而言，是更加可怕的方式。有一个养鸡场的主人说，“如果你养的鸡不到5000只，而且每周工作不到7天，那么就完全无利可图。”

1945年，鸡蛋会分销到无数的小店铺。但到1978年，大部分鸡蛋会运到超级市场推销。规模销售和规模消费是相辅相成的。马卡斯与斯宾塞公司（Marks and Spencer）成了英国的JC彭尼公司（J. C. Penney），销售质量好、款式新、价格低的服装。手工缝制的裁缝竞争不过批量生产西装和人造丝衬衫的男士服装店。富人都不穿华达呢长裤，而改穿宽松的呢裤。装潢亮丽的连锁电器商店随处可见，销售各种晶体管收音机、立体音响、电视机、灯具、收音机时钟、袖珍计算器和吸尘器。

845 这些商品的生产完全不成问题，重要的是如何鼓励顾客前来购买。英国在这方面也做得相当不错，其方法就是大量的广告和优待的分期付款条件。1954年，电视广告时代开始了。广告商蜂拥而至，一个电视台的老板开玩笑说，广告业务就像印钞机。英国报刊的阅读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广告使报刊都收入丰厚。1960年代，《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观察家报》（*Observer*）和《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gh*）开始发行彩色杂志版，其中3/4的版面是用制作精巧的广告，向读者传授如何在安乐时代享受安乐生活的诀窍。



约 170 英尺高的巨型浮动石油钻井设备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北海石油（*Kim Steele, Photo Disc, Inc.*）

享受安乐的生活，首先就要有一所房屋。在没有孩子出生之前，能住一套带有瑞典式家具的精致公寓应当可以了；或者在那种工人阶级的排屋住一个单位也未尝不可，晋级加薪后就可搬离；如果没有晋级也没有关系，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允许购买一座租用的公房。但是，理想的住房是拥有一条林荫道边的一所单家独院的别墅——或者至少一所两户共建、分开居住的别墅。如果达不到的话，则至少在新的住房区里新建的现代化排屋中拥有一个单位。于是，这迁居的目的地便转向市郊去了。一些人选择合其口味的都铎式房屋，即那种半木料面墙的建筑；另一些人则选择新维多利亚式房屋，带有凸出墙外的窗户和人字形的屋顶。1950 年代，建筑师们建这种房屋，与他们在 1930 年代所做的没有差别。搬到郊区的人们，只有极少数喜欢那种线条简洁和饰有大面积玻璃的时髦房屋。但是，在这些传统建筑形式的内部，

846



英国的发明——气垫船，已证明在快速穿越英国海峡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C. Davey*，*Hulton/Archive*）

现代技术和现代装潢则大行其道。在客厅内的显眼位置，电视机取代了壁炉。在厨房里，冰箱、洗衣—干衣机、电炉、垃圾处理器和冷冻柜等等，则宣告了家庭主妇的自由和解放。宽大的大沙发、厚重的靠椅、大型的柜橱让位于用金属、帆布、泡沫橡胶和强化玻璃制成的现代沙发和椅子，摆在玻璃咖啡桌的四周。

作为这种安乐生活的代价，主妇们不得不外出工作。1900 年时，每十个家庭主妇中有一个外出工作。到 1980 年，每两个家庭主妇中有一个外出工作。同时，这些郊区新居民大力将房屋装修一新，于是电锯电钻响个不停，涂料滚筒将灰暗的墙壁刷得光亮。对此，批评者诘问道，难道这种生活不是破坏了邻里关系、破坏了伦敦东区关系亲密的生活和伦敦西区酒馆中的深厚友谊吗？根据彼得·威尔莫特（Peter Willmott）和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两位社会学家的研究，答案是肯定的。在新的郊区，居民与其父母和邻舍的接触确实存在，但方式与以往已有不同，也不如以往密切。例如，在培斯纳尔格林的老居住区里，43% 们夫妇每天会看望他们两位母亲中的一位；而在沃德福德郊区，这个比例为 30%；每周与母亲有接触的比例，培斯纳尔格

847

林为31%，沃德福德为30%。沃德福特的新居夫妇与邻居的关系也很友善，但他们只是周末才去俱乐部、而不是每晚都去街头进行社交活动。所谓安乐生活就是指俱乐部生活，包括网球、教会、政治、插花或工人俱乐部等等。所以，俱乐部生活，加上看电视、修整花园和装修房屋，居民们便没有时间去酒馆或街头与他人打交道了。

郊区生活并不像市建公房中的生活那么寂寞和相互隔绝。特别是在那种新建的高层住房楼里，1005号套房的住户对1006号套房的住户的情况完全不闻不问。对于曼彻斯特市摩斯塞德区的居民来说，当他们居住的维多利亚式排屋和街道全被拆毁，迁居到一座座庞大而毫无生气的住房楼群的时候，他们所受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原先的街角店铺不见了，新建的亚历山大公园小区的1408个住户，只有4家商店。对亚历山大公园小区十来岁的少年而言，安乐的生活便是沉溺在新的消费世界和大众文化之中，像唱片店和服装店、咖啡屋和爵士乐厅等等。在1960年代，英国十几岁少年的人数，每年都要增加500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是15岁就辍学，且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他们大都是住在父母的家里，所以皮夹子都是鼓鼓的。1957年，他们花在衣服、唱片、乐器和收音机上面的开支是8.3亿英镑。到1960年，他们这方面的开支远超过此数。巨大的商业和广告世界扑向他们，带来了这个时代的新造物主——科技创造的无穷无尽的产品：意大利造小型摩托踏板车、英国造大型摩托车、精美的鞋子、印花衬衫、爱德华式大礼服、迷你裙、意大利女衫、珠形饰品、各色尼龙紧身衣和无数种音响唱片。如果机械制造品、电子制造品和纺织品等等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那么还有各种麻醉药物，如安非他命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对十几岁的少年和成年人而言，科技进步带来了一个享乐主义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享有更多自由的时代。但显得自相矛盾的是，权威主义也在这个时代盛行。

自由与权威主义

1949年，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年》（*1984*）里面预见到了一个由极权国家作为刺探、监视每个人行动的“老大哥”（Big



高楼大厦林立而起，周围是一些缺乏个性、毫无特色的公寓房（*Illustrated London News Picture Library*）

Brother）的社会。当这个不吉的年头到来之时，却不见英国人受到刺探，反而享受着有史以来的最大自由。诚然，国家变得更加庞大，管理部门和警察有时也像“老大哥”那样行动，但这位“老大哥”的法院却保障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警察甚至保护种族主义组织——民主阵线（National Front）的集会权利。“老大哥”还参与了令人惊异的社会、思想和性革命，个人从中获得解放。

848 在许多人看来，性革命意味着道德标准的衰败，因此婚外性关系和同性恋必将大幅度增加。伦理学家们指出了非婚生子增加的情况：1955年非婚生子只占全部新生儿的4.7%；到1970年，这个比例增加到8.4%。此外，社会上还流传有关十几岁少年举行通宵达旦性派对的传闻。许多这样的传闻都是言过其实。197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93%的女生入学时是处女。后来一项范围更广的研究，发现只有17%的19岁女性是处女。婚前性生活已成为常态，结婚通常随之而至。这个常规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反映：60%的第一胎新生儿系婚前怀孕。报纸、小说、舞台、电影和成人商店都

在谈论性问题，而且都十分大胆、无羞耻感和毫无顾忌。公开讨论性问题的自由、舞台上和电影里对裸体的展示、对非婚生子的无羞耻感、对同性恋关系的承认，构成了这场性革命的核心，并引起了法律方面的改革。1959 年，议会准许卖淫业经营，条件是不许当街拉客。赌博业也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法律的允准，不管是下注赌马，还是开设轮盘赌均可。甚至连政府也涉足博彩业，开办了政府彩票。1967 年，议会宣布彼此同意的成年人同性恋关系为合法。1960 年代，政府停止了对剧目的审查，随后舞台上便有裸体男女出现，但为数不多。色情出版物和商品从索荷区隐秘、散发着霉味的后房移到了伦敦西区铺着地毯的大店前厅，店里销售一切与色情有关的东西。此外，单性服装店、同性恋商店也出现了。而在 1977 年有三个剧目，描写变性的故事，上演时场场爆满。伦敦（而不是外地）已经成了一个自由城市。由于 1960 年代里伦敦也发生了服装革命，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购买或穿着任何喜欢的服饰，例如妇女的迷你短裙和男士的花衬衫都很流行。男士留长发、大胡子或络腮短须也很普遍。 849



这群放荡不羁的小伙子是富裕的1950 年代的产物，他们自由、平等、盛气凌人（*Juliette Lasserre*，*Hulton/Arch*）

教育家们也推崇自由。大战前那些九九表的背诵、死记硬背式的学习、专制的教员及其教鞭，都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开放式的课程、自由的探索练习、实验方法教学，注重学生的主动性、自由发展和绘画技巧。批评家指出，新的教学法提倡绘画，却忽视了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不过，1967 年的普洛登委员会（Plowden Committee）发现，1964 年 11 岁儿童的阅读水平和 1948 年的 12 岁半儿童的阅读水平相当。

妇女也要求得到自由。1947 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只有 1%，850 有工作的妇女只有 18%；流产是非法行为，离婚十分罕见，因为离婚的唯一理由是提出通奸的证据；当时还没有实现同工同酬，妇女较男子薪水要低得多。

到 1978 年，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20—45 岁的妇女，一半以上有工作；大多数妇女都接受了 15 年以上的教育，流产已经合法化。《1969 年离婚法》（Divorce Act of 1969）规定，夫妇之间婚姻破裂便构成离婚理由 。到 1980 年代，每 3 对结婚的英国人就有 1 对离



更大的平等体现在：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子女可以入读综合学校，适合于其不同的天资（*Simmon Aerofilms Limited*）

婚。1970 年的《同工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规定男女同工同酬。当然，有法不依和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依然存在。妇女在牛津大学学生会参加辩论，成为职业赛马骑师，占电台播音员的 73%，而且在其他行业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但是，妇女在律师、医生、高级行政人员以及议员所占比例很小。妇女打入男人垄断的世界只不过一个世纪之久，但她们相信时间对自己有利。

自由充斥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对罪犯、精神病人、吸毒者和社会沦落者的看法更具人情味。1969 年议会废除了死刑，1967 年内政部命令工读学校和感化院禁止体罚。1970 年内政部采用假释、缓刑和监管的法律手段，使英国罪犯获得了工业国家最短的牢狱刑期。结果显示：只有 8% 的假释者再次犯罪。政府专员还证实每年有 1/5 的精神病患者出院，同时政府诊所对海洛因吸食者提供免费注射和精神护理。对精神病和犯罪的看法更开明了。苏格兰精神病医生 R. D. 莱恩（R. D. Laing）争辩道，许多精神病的起因都在于患者所处的环境和其他人，而不在于患者自身思维能力的失调，犯罪学家则大量地描述犯罪是社会性的异常，而不是一种邪恶。 851

技术、财富、国家推动了福利事业，受惠者包括贫困家庭、城市流民、收入低下的店员、艰难维持生计的主妇和住家保姆。他们都通过增加流动性、提供多样性的保证和坚决维护个体权利的方式，发挥了个性解放的作用。一位商界巨头表示：“恭顺服从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管理人员都不会以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管理公司。”

尽管自由已经充斥于社会的许多方面，但政府是个例外。撒切尔政府变得更加专断和隐秘，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总统要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实质性制约。在英国，政府大臣、各部和行政仲裁机构都很少受到法院的约束，其原因在于法院法官均由撒切尔任命，其复审权十分有限。政府本身也很少受到议会的约束，其原因大致相同：保守党在议会拥有多数席位，而且忠诚于党的领导；议员中有1/6担任收入颇丰的职务，而撒切尔夫人正是这些职务的任命人。政府几

乎无所不能，例如政府能够禁止英国广播公司播出采访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节目，能够囚禁泄露导弹机密的外交部工作人员，能够给予情报部门完全秘密的行动自由。严肃的学者甚至声称：英国已经不存在任何法治政府。

平等与不平等

严肃的社会学家声称：英国仍然离平等主义的理想相差甚远，英国实际上仍然十分不平等，分为不同的阶级。早在1381年，约翰·鲍尔（John Ball）发问："在亚当夏娃男耕女织的时候，那时有谁是绅士吗?"从那时直到艾德礼和威尔逊政府作出有关的承诺，英国人始终都怀有平等主义的理想。但在一个等级制和财产私有制根深蒂固的社会里，不平等是一种现实。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两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

在这场斗争中，平等得到了推进，尽管速度缓慢，且还不够全面和充分。在20世纪，平等的推进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次世界大852 战中的劳动力短缺，使得工薪阶级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数额增大；第二，从1900到1980年，这个数额增大了3倍，使更多的工薪阶级脱贫，跻身于温饱阶层的行列；第三，福利国家通过对富人征税和对穷人救助，实现了对财富的再分配。在以上三个方面，两次世界大战起的作用最大。穷人得到的数额确实在增大，但富人得到的数额也在增大。从1950年代起，富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穷人。而且，福利国家的财富再分配的规模也不大。在1980年代，收入水平居前20%的人获得税前收入的47%、税后收入的39.4%；收入水平居后20%的人获得税前收入的4%、税后收入的6.9%。福利国家主要不是为了促进平等。其大宗教育拨款，尤其是给大学的拨款，偏重于富人；给富人中的年老者、患病者和失业者的补贴，甚至要高于那些地位较高雇员的收入，后者向社会保险计划的供款额更高。

教育制度尤其不平等。二战之前，社会对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要比对农业工人家庭子女的投入多7倍；二战之后，

对两者教育投入的差距仍有6倍。体力工人占人口的一半，但他们的子女只有5%能够上大学，另外40%中途辍学，没有任何文凭，甚至连修理汽车或修理管道的证书也没有。而54%的大学生来自只占人口18%的业人士和管理层家庭，此外64%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学生来自只有富人子女才上得起的私立学校。虽然综合学校占所有中学的70%，但对教育平等的推进作用并不大，其原因在于富人住房区的学校质量要远高于穷人住房区的学校质量。撒切尔政府确定的税收和工资体系也加剧了不平等现象。1977—1984年，白领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了16%，而非技术阶层的实际收入则下降了9.9%。

但是，平等现象还是存在的。社会的舞台更加宽广，社会上升的阶梯也更加迅即。在爱德华国王时代，占人口约3—4%的贵族和富豪拥有难以企及的特权，另外1/3的富裕阶层拥有相当优越的条件，而处于底层的贫民则难以维持温饱。在撒切尔时代，收入最高的20%的阶层处境独特，获得约40%的国民财富，另外2/5的富裕阶层拥有相当优越的条件，住在市中心的就业不足、毫无特权的阶层则受惠有限。日益增多的财富和不断进步的技术为富有的专业人士、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公务员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在这些飞行员、计算机程序员、广播员、电台工作人员、电视节目制作人、销售经理、工程师、绘图师和工厂工头中，虽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并不多，但他们许多人感觉并不亚于两大名校毕业生，因为他们同样能够居住在绿树成荫的住房区，驾驶捷豹牌名贵轿车，加入网球俱乐部，在时髦的名牌专卖店购物。由于撒切尔时代向各方面的人才打开大门，英国社会变得更为开放、更具有流动性；但由于这些人才来自于不平等的阶级和教育背景，所以英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853

实际情况是：英国既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55%的人保持在所出生的阶层之中；45%的人离开了原来的阶层，少数人跌入更低的阶层，更多的人迈入更高的阶层，其原因在于国民收入是原来的3倍。由中产阶级下层向中产阶级上层的流动性最强，而由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阶级的向上流动性最弱。在人才培养方面作

用巨大的是42所大学和具备大学课程水准的工艺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由技术学校、艺术学校和师范学校改善和提高而成的各种学院。另外，还有开放大学，该校5万名学生通过电视听课，通过邮件获取阅读材料和课程材料，由各地的非专任讲师主持讨论课。但尽管如此，英国只能为20%的年满18岁的青年人提供高等教育，而美国的这个比例为75%。而且，即使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获得专科学校和大学的奖学金深造，但他们只是离开了原有的阶级，升入上层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都铎时代贫寒自由农的子弟得以跃升，成为富裕的斯图亚特时代富裕乡绅相同。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流动，但经济的不平等依然故我。社会上升和下降的阶梯不断运行，但上层的优越和下层的窘迫仍然差距极大。

社会的最上层也向毫无贵族背景的人开放。高收入可以消除一切阶级壁垒。足球球星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和甲壳虫乐队成员的收入远远高于伯爵和公爵们。社会平等和流动性，并没有像其批评家所担心的那样，造成民主精神的枯萎，社会素质的下降和平庸化，以及阶级的消失。根据197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69.8%的回答者称自己是工人阶级，而其中93%的人认为阶级制度（class system）并不存在。不过，社会上存在的是一种与传统的阶级制度不同的阶级制度，在这里，工人阶级也能追求真与美。

真与美

1978年的英国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富足、自由和平等。同样，他们也比以往任何时期对追求真理、创造和享受美感更加积极。如果说英国人发现了真和美的要素，他们不会承认。但是，如果给他们加一点压力，他们会承认今日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世界真理的掌握要比祖先所知道的多得多，虽然他们的所掌握的真理显得千头万绪、支离破碎。其中很多真理是从电视、收音机、电影和唱片等新媒体得来的，但主要媒体形式依然是印刷文字。英国人热爱阅读，超过其他国家的人。根据1950年代的数据，英国人平均每人阅读的报纸，位居

世界第一。英国人也爱好读书。平均每两个英国人就有一个爱好读书。人均每年要阅读20本书，居世界6大民主国家之首。英国政府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在1974年拨出的图书馆经费是1220万英镑，地方政府的支出尚不止此。但是，比扩建图书馆更加令人兴奋的，是1950年代 854 平装书的问世。平装书的内容涵盖几乎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非文学类图书与文学类图书一样畅销，有关宇宙创造的书和讨论生命进化的书相互竞争。

对那些懒得阅读进化论的人，可以看电视。1976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发现“线粒体”的消息，这是每个活细胞的内部都有的一种细胞器官，但线粒体并不存在于细胞核心，那里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DNA）的所在。几年前，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曾报告过DNA的发现，DNA控制一切细胞的繁殖并通过其排列顺序决定遗传性格。科学家们现在发现，DNA现在丧失了它作为遗传的唯一遗传因素的独占地位。既然线粒体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那么，拉马克（Lamarck）学说的复兴就又出现了一个漏洞。一位电视评论家认为，这个节目“是本星期最令人兴奋的节目，远胜于其他节目；是一个震动人心、让人竭智凝思、苦心追索的节目”。数百万英国人了解了达尔文所未曾了解的真理。

那些在电台和电视台节目之外还想进一步求知的人们，可以进成人课程班学习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其他许多课程。在30—40岁的英国人中，每7个人就有1人参加此类课程班的学习。英国政府开办了许多成人课程班，部分地补偿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不足。诚然，英国的这种不足已存在达两个世纪，而依然能够培养出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国民。这两种现象的并存，是一种悖论。对其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英国人勤于自学的事实。1970年代，上大学的英国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人人能买平装书、进课程班、到图书馆去读书学习。热衷于此的英国人，比任何国家都多。

这种教育和自学的结果，是英国人对自身社会的了解，包括对社会的历史和自然世界的环境的了解，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英国

人之所以能得如此博学，应当归功于英国的大量新闻记者、民意调查员、社会学家和统计学者。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磨坊工人，对当时的农民和银行职员所思所为，对当时英国所面临的问题，或者即将到来的一场选举的结果，都几乎一无所知。同样，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职员对磨坊工人和农民，或者未来选举的可能结果，也所知甚少。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磨坊工人阅读每天晚报上刊登的关于民意测验的消息，对即将举行的大选的可能结果和银行职员的看法都了如指掌。而银行职员也能够谈到政府统计局（Government Statistics Office）的315名统计员（比1966年多140人）所撰写的报告和社会学家们所发表的研究论文。

而且，英国人对本民族过去的历史，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作为世界上历史感最强的民族，英国人在1980年时，对他们的历史来源的了解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对增进此类知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约翰·尼尔（John Neale）爵士的《伊丽莎白和她的议会》（*Elizabeth and Her Parliament*）和G. R. 埃尔顿（G. R. Elton）的《都铎王朝的政府革命》（*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就这个光荣世纪的政治内幕，为读者提供了逼真、详尽、仔细的叙述和看法。承担政府研究项目“议会史研究项目”（History of Parliament Project）的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爵士和他的同事们，在为所有担任过议员的人作详细的传记，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目前尚只有历史研究的小部分著作出版，这类既富于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的著作，摆满了图书馆和书房的书架。

855 英国人还大量撰写关于人们应当如何清楚思维的著作。这种思维艺术，已经成为英国哲学家研究的重点。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一位原籍奥地利的剑桥大学学者，于1951年去世，但其著作至今仍为权威之作，虽其立说前后有所不同：在1920年代，他认为严格的逻辑所产生的命题，必然与外在世界的结构相对应；后来他又认为命题之间连接成族群或系统，每个族群都有其自身的规则。其学说的发展趋向变得愈加主观。于是，哲学家的作用，便

在于弄清楚哲学话语中的语言与语法的区别。在这方面，牛津大学的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和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剑桥大学的约翰·维兹德姆（John Wisdom）下了很大功夫，表现出高度的想象力，使语言分析学派成了英美的主要哲学流派。

在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英国人科学家也有极高的成就。其科学发现，就像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美国学者J. D. 沃森（J. D. Watson）在剑桥大学合作研究时对DNA的描述那样，是一件“绞尽脑汁”的工作。物理学家们继续对原子的研究。除发现已久的电子、质子和中子之外，他们又发现了介子、K介子、λ粒子、Σ粒子、Ω粒子以及其他粒子，它们构成一个难以弄清的世界，其无限的力量，足以供应世界所需的能源，或者将世界彻底炸毁。天文学家指出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呈螺旋形，并不断转动。太阳距银河系中心有27000光年之远。太阳需要270年才能绕行银河系一圈。一些英国天文学家认为这个银河系与其他星系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之中作反向运行，于是不断有新的物质——星系的产生，以填补留下的空间。所以宇宙不是一次创造而成，而是不断创造而成。另外一些天文学家不同意此说，认为宇宙不是形成于不断持续的创造，而是形成于一次大爆炸，至今仍在消散之中。他们指出那些能发出强烈无线电波的类星体，形成于遥远的过去。与类星体一样引人入胜的是宇宙中的黑洞，其极为密集的物质和强大的引力，甚至连光线也无法逃避。在黑洞的边际，即地平线上，粒子由空间转化生成，再以辐射形式向宇宙释放。剑桥大学杰出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s）通过用数学分析方法研究亚原子粒子（量子力学研究对象）与黑洞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一个关于相对论的问题，来探索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完美结合”。这也是一个爱因斯坦试图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从DNA、K介子到类星体和黑洞，科学发现揭示了一个巨大无比、神秘莫测、令人敬畏和困惑莫解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复杂无比、类别繁多的世界。随着真理的大量揭示，其本质使越来越难以捉摸，美的真实更是如此。

美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主观字眼。但其广泛使用，也证明了它的真实存在。如果认定1980年英国的房屋、家具、室内装潢、汽车、服装、广告画、商店橱窗——城市生活的环境——比1954年的时候要856 美，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认定从来就没有这么多的英国人从这么多方面去力求增进他们的环境美和文化美，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1974年，英国议会拨款5000万英镑作为艺术画廊、歌剧院、剧院、芭蕾舞团以及画家、雕刻家的津贴，比1964年多4倍。地方政府在艺术方面拨发的津贴也很优厚，拨给博物馆1200万英镑，拨给设计公共建筑物的建筑师的资助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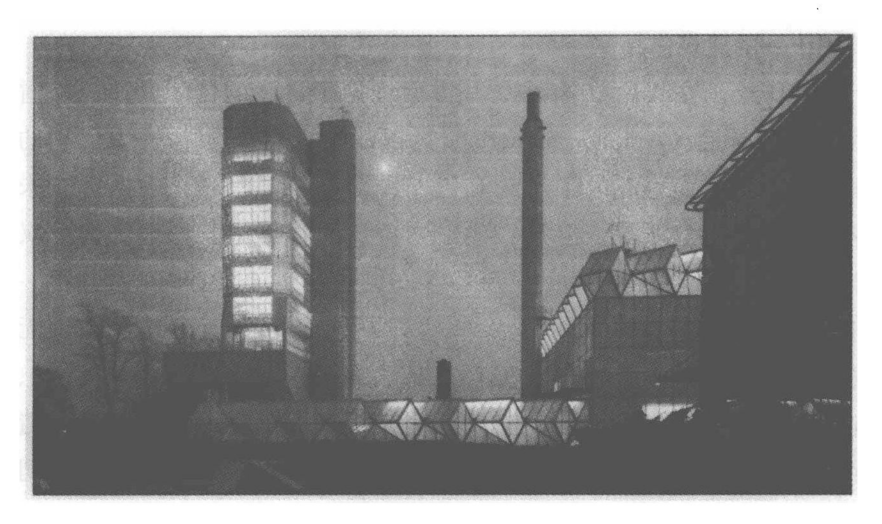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前卫派建筑师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和阿利森·史密森（Allison Smithson）夫妇和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认为大部分建筑，包括1951年建造的精致灵巧的节日大厅（Festival Hall）和刻意琢饰的罗汉普顿（Roehampton）公共住房，都是平庸之作。其原因在于这些建筑采用英国式的纤巧的装饰线条弄巧成拙，冲淡了现代建筑坚实壮观、明朗夺目的线条。到1960年代，那种纤巧装饰线条已经被弃用，但是取而代之的不过是那种带有国际风格的玻璃饰墙方盒式高层建筑。与史密森夫妇在诺福克的亨斯坦顿（Hunstanton）设计的学校，或者斯特林设计的哈姆康芒（Ham Common）住房区比起来，这种玻璃饰墙高层建筑显得笨拙沉闷、黯然失色。亨斯坦顿的学校，以横和直的线条，将简单的对称体与复杂几何体融合成一体，与18世纪的仿帕拉第奥式（Palladian）建筑一样赏心悦目。同样引起人们兴趣的，是这些建筑故意将钢架、水泥、管道和椽子显露在外。对于这种大胆暴露的建筑风格，评论者将之称为“新野兽派”（New Brutalism）。这个名词也适用于斯特林，因为他也将建筑内部的水泥和砖块的显露在外。斯特林设计的窗户精致和谐，在使用建材方面极富想象力，从而赢得了国际声誉。他设计的谢菲尔德工程大厦同样闻名遐迩，大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测量线式的天窗和悬挂在外的水泥扶壁。斯特林、史密森夫妇和其他建筑师，证明了英国建筑师能够像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一样，设计出力与

美相统一的建筑作品。

英国绘画在战后10年中，一方面维持了自己的传统，如以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以战争或自然为题材为代表的画作；另一方面也汲取了纽约和巴黎的最新风格——超现实派、未来派、抽象印象派等。但是一些不肯盲从的青年画家如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彼得·布雷克（Peter Blake）和彼得·菲利普斯（Peter Philips）觉得这些外来的画派华而不实、枯燥无味、偏重学究、不着边际，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鲜活的、明快的、生活的和贴近现实的风格。于是，他们（以及在纽约的同行）创造了波普艺术（pop art）。汉密尔顿在其讥讽逗趣的《向克莱斯勒公司致敬》（Hommage à Chrysler Corp）的作品中，从汽车头部找到了美的所在，上面满是球茎状、乳房状的造型。一位评论家指出，这就是“淫逸女神的樱唇”。波普艺术家喜欢日常世界中的技术、商业、广告、电影和性等等，因此便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形象，如剪贴、明信片、卡通人物、电影明星、机器、长袜、旗帜和贴花图案。他们在这些形象加上鲜艳的颜色和粗线条，通过讽刺夸张和刻意模仿，产生了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

波普艺术家是拼贴艺术的大师，能够从一口袋杂物中发现美。彼得·布雷克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多张照片，嵌入他格调明快的作品——《觅到女友》（Got a Girl）。彼得·菲利普斯则用汽车保险柜、活塞、美女照片和化学品，拼贴成技术时代的缩影——《风俗画第二号》（Custom Painting No. 2）。波普艺术面向广大民众，可以翻印、拍照，甚至上电影。如那幅《波普上了画架》（Pop Goes the Easel），令1962年电视观众大为欣赏。波普艺术充满生气的形象常常用在户外广告画、普通广告、唱片护封和书籍封套上。在18世纪，只有很少人买得起乔舒亚·雷诺德的肖像画。在维多利亚时代，也只有数百资产阶级人士买得起版画。但到20世纪60年代，数百万英国人能买到印有波普艺术的唱片护封和看到饰有波普艺术的地铁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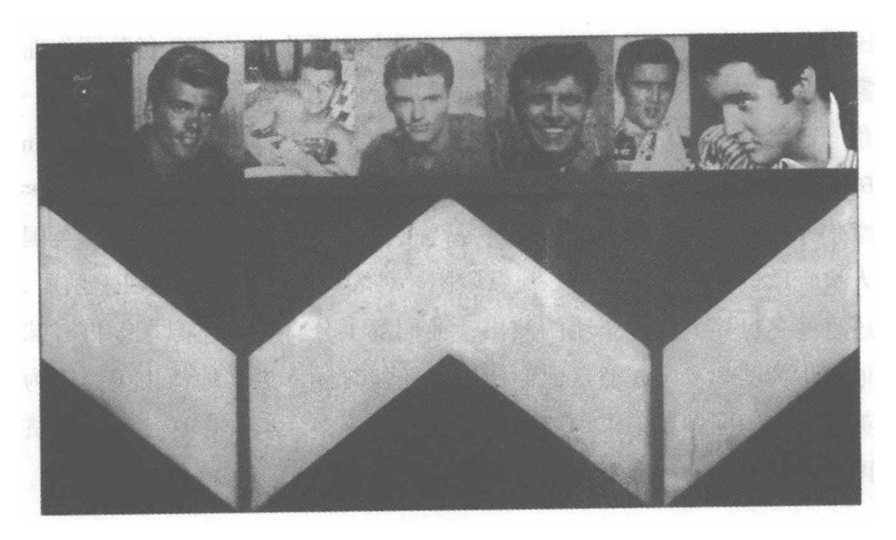
857



莱斯特大学的工程学科大楼，詹姆斯·斯特林设计（*Paul M. Smith*，*University of Leicester*）

英国人的服装也反映出这种对鲜艳美丽的色彩的热烈爱好。1956年，玛丽·夸恩特（Mary Quant）——一位来自威尔士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女子，开了名为“集市”（Bazaar）的服装专卖店，陈列出售她自己设计的妇女服饰，价格低廉，式样时髦，颜色鲜艳，富于创新。其他裁制精致的妇女服装专卖店纷纷开张，男士服装店也出现了。突然间，妇女穿上了迷你裙，短至膝盖以上足有5英寸，男子也穿上了紧身裤，而且男女都配上印花衬衫和珠饰。接着，一如其始作俑者所预料的那样，通过波普艺术追求美的风气广为蔓延。理查德·汉密尔顿说：波普艺术“为大众喜闻乐见，变化迅疾、价格低廉、批量生产、生气勃勃、机敏逗趣、富于性感、手法巧妙、富有魅力，真正是一桩大买卖”。

与波普艺术一样昙花一现的是欧普艺术（op art），即使是欧普艺术的顶尖画家布利奇特·莱利（Bridget Riley）也是如此。莱利像其他欧普艺术家一样，致力于追求几何图形的美。她用许多平行线，产生第二组线条，虽然全是直线，却产生了曲线的效果，有规律起伏的曲线，呈波纹状若隐若现。她的迷宫般的绘画组合风格，有时产生持续



"赢得一个女孩的芳心"，皮特·布雷克创作（*The Whitworth Art Gallery, Manchester,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的动感，有时给予牢固的质感，有时释放炽烈的视觉感，但始终具备悦目的壮美之感，显然也略带一些不安适的晕眩感。欧普艺术不久也不大流行了。布利奇特·莱利的几何图形风格和詹姆斯·斯特林的测量学式的形体，都没有能够抓住美的本质，并不比 18 世纪仿帕拉第奥式建筑和雷诺德的绘画自然法则高明。莱利和斯特林以及 20 世纪的艺术，也都未曾期望超过前辈。可是，即使波普艺术家们未能抓住美的本质，但他们所创造的无尽的图形和所作的无数的尝试，其中确不乏各色各样的美。 858

建筑师未能阻止英国城市的衰败，英国的城市也有不少平庸的建筑和街道开发项目，可是今日的英国已经是一个较以往更加令人快乐和丰富多彩的居住之地。各色各样的艺术美都充满活力。成千上万的观众前去英国 26 家地方剧院欣赏话剧，这些剧院都是在 1962 年以后创立的。伦敦的剧院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时一派蒸蒸日上。伦敦上演歌剧和芭蕾舞的科文特花园剧院，上座率保持常在 96%，其他上演歌剧和芭蕾舞的剧院也为数不少。1974 年，伦敦南岸宏大壮观的海沃德美术馆，举行了 122 名英国当代画家的画展。1975 年，一部关于英

国作曲家的著作出版，专门评述了1900年以后出生的100名英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这两个事件只不过是涉及画家和音乐家活动的冰山一角而已。其中有不少大师，音乐方面有本杰明·布里滕（Benjamin Britten）和沃恩·威廉姆斯（Vaughan Williams）；雕刻方面有亨利·摩尔（Henry Moore）和巴巴拉·赫普沃思（Barbara Hepworth）。英国人最爱欣赏音乐，不论是一流歌剧团、著名交响乐团、经典爵士乐团，还是闻名世界的流行乐团的演出，他们都十分喜欢。英国人不再冒昧地自称为美学专家，但是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谈论美，因为英国人在不同领域追求不同形式的美。对许多人来说，这也是逃避贫困的一个途径。

859

永远难以消除的贫困

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给人类一个机会，以否认《圣经》有关贫困将永远和我们同在的训谕。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改良，20世纪的社会主义，都试图用技术改良来消除贫困。可是到1990年，贫困依然在英国存在。虽然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贫困标准的改变，英国至今还有100—200万左右的穷人。英国政府确定了贫困线之后，发现英国还有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1980年代中期，随着失业率增加到1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英国人的比例也在增加。

失业是1980年代的一种顽症，非官方的失业人数要比官方的失业数字高得多。诚然，政府替失业者付了房租和费用，政府补助金的标准是单身男子每周21英镑，夫妇二人每周30英镑，如有失业保险，则补助更多。中途辍学者大约有半数失业，靠领救济金过口子，前途渺茫；一些从不景气的企业中裁撤下来的年老员工，也是前途无望。另外的一个贫困来源便是75万个单亲家庭。离婚变得更加容易，非婚生子便越来越多，夫妻中一方弃家，也导致成千上万单亲家庭的产生。这种单亲家庭里大多数只有母亲，由于需要照看孩子很难保住工作。结果英国的贫困者中有1/3是儿童。政府的家庭收入补助金，虽然减

轻了贫困，但未能消除贫困。同样，养老金减轻了老年人的困苦，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15%的英国人已年过65岁，而他们之中有36%是独居，许多人处于贫困之中。虽然衣食无虑，尚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但并不舒适。绝对贫困现象已经缓解，1968年的一次普查表明，贫民的实际收入比1948年提高了60%。

但是，穷人的生活仍然艰苦，其主要原因是住房条件的恶劣。从迪斯累利到卡拉汉，历届英国政府都承诺要兴建很好的住房，但是，建起来的住房大都分给了富裕工人，而贫民则能住在如在桑德兰那样的私房里。在1960年代，这种私有住房的90%没有室内厕所，3/4没有浴室，1/2甚至没有自来水。1968年的一项普查表明，英国有180万所住房是不符合居住标准，有450万所缺乏必要的设施或需要修缮，占英国住房总数的40%。在过去30年里，英国政府花费数百万英镑作为领薪水的中产阶级人士的房贷补助金和高工资收入者租用市建公房的房租补助（两者都是选举时的主要选民），而忽视了贫民区里的最底层的200万人的住房改善，后者仍住在拥挤不堪的破旧房屋内。1970年，有28000人甚至连贫民区内的破房都没有，只好向地方政府登记为无家可归者，上个年度增加了15%。虽然法律规定政府需为这些人解决住房问题，但地方政府仅解决了5630人的住房问题。其他许多人出于绝望而成为擅自占住者，所有准备拆除的房子都成了他们的占住地。在伦敦的兰贝斯区，有60%的擅自占住者都是有孩子的家庭。一旦被逐出，他们马上又变成了无家可归者。 860

此外，英国还有50000名吉普赛人和42000名囚犯。吉普赛人家庭观念很强，缺乏驻扎他们的大篷车的地点；监狱里的囚犯被囚于固定地点，但无家庭生活。地方政府对付吉普赛人的办法是要他们继续巡游，但不给他们提供定居之处。政府对囚犯也很苛刻，只允许他们每人每月半小时的探监时间和每星期发出1封信。监狱内拥挤不堪，而最糟的情形是犯人被判定患有伤害他人的精神病，那么这个犯人就会将被囚禁于有110年历史的布劳德莫尔医院，这所定额为500人的医院收治了691人。结果连走廊上也布满了病床，诊断室也住满了病

人。囚犯是被人们鄙视和遗忘的少数。但情况更恶劣的，还有一个被英国人所憎恨的为数甚多的少数，其中大多数是穷人：即从西印度群岛、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等地来的新移民。

黑人和亚洲人占英国人口的4%。他们的住房条件很差，从事最低下的工作，其子女进的是最差的学校，还遭受种族歧视。黑人或亚洲人居住于不符合居住标准房屋的机会要比白人高1倍。从西印度群岛来的移民，差不多是英国黑人居民的全部，其处境是最为恶劣。他们中间有2/3的人，或居住条件恶劣，或没有工作，有的二者兼而有之。许多住进与维多利亚时代贫民窟相当的住房，父母和子女4人共居一室。每5家就有1名失业男子，其中的大部分在13—14岁就辍学，文化水平很低。那些在伦敦或利物浦游荡的黑人青年有40%是失业者，有些人沦为盗贼或毒品贩子，大多数人则游手好闲、扰乱秩序。警察受到不胜其扰，转而反制他们，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981年4月，这些黑人在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发动骚乱，抢劫放火。但这并不是种族骚乱，与1981年7月发生在其他几个城市的骚乱不同。但发生在索斯霍尔的骚乱除外，那是由白人种族主义少年帮派引起的骚乱。其他骚乱都是那些无业的白人和黑人青年出自对他人富裕的嫉妒，或出自对社会忽视的怨恨而引发的。这种忽视特别反映在他们的摇摇欲坠的住房和破烂不堪的内城街道上。正如保守党批评家所说，这是道德和纪律的崩溃。

亚裔移民的家庭关系较密切，也比较注重子女的学校教育。黑人主要在伦敦的城市运输部门就业，或在伦敦的医院从事辅助工作；而亚洲人则在兰开夏郡的纺织工厂和中部的铁工厂工作，同样也在医院和运输部门工作。雇主和技术熟练的白人工人联合排斥亚裔工人，不让他们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安排他们上夜班，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最先辞退他们。亚裔工人在住房方面也受到歧视。有21000名巴基斯坦移民住在布拉德福德的贫民区。这是英国最与外界隔绝的移民社区之一，其中保持着居民的古老风俗，包括将妻子长年关在室内。对于这些妇女而言，社会主义英国的生活，便是贫民窟里的四面墙壁和破房

子。当然这种原始的习俗不是英国的过错，但是英国的过错在于也存在着原始的种族歧视，以致在待售房屋的标牌上，大书特书“只卖给白人”的字样，导致了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的产生。 861

民族阵线不大可能成为一个能够威胁到保守党和工党地位的全国性政党。在民意测验中，其平均支持率只有4.6%。但是只要人口不断增加，亚裔和黑人仍然令心胸狭窄的英国人感到害怕，民族阵线就不会消失。有亚裔和黑人聚集的地方，就会有种族歧视。楼房出租的标牌就写着“巴基斯坦人免谈”。在伦敦东区，有300名孟加拉人租不到房屋，他们不得已做了非法占居者，以躲避风雨和寒冷。穿皮夹克骑摩托车的青年人，高喊“揍扁巴基斯坦人”的口号。有一位亚裔妇女在伦敦东区做过统计，亚裔被白人击伤送入医院的事件超过100次。她向白人邻居求援，向市政府求救，但像指望停止警察暴力那样徒劳无益。1977年，政府设立了种族关系局（Race Relations Board），但是在撒切尔当政时期，这个政府机构在英国顽固的种族歧视面前毫无作为。

社会主义的英国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差别极大，不仅有居住在乡间别墅、年薪3万英镑的银行职员与无业的巴基斯坦裔擅自占住者之间的差别，也有一般工薪阶层与无业黑人青年或者养老金领取者之间的差别。绝大多数英国人所享受的英国实际生活，是财富、自由、平等的不断增加和在文化环境的不断改善。既然大多数人的生活富足，所以他们就会对少数贫民视而不见。政府并不反对这种趋势，因为贫民的选票为数甚少。在谈论大多数英国人享受的繁荣进步时，我们切不可否认这个国土上还有贫民的事实；同样，在看到贫民的存在时，我们也不可扭曲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正在改善的情况。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他们所能享受的是繁荣而不是贫困。随着技术进步，这种繁荣扩展了教育，创造了新的自由，与古老的正统观念和社会精英发生冲突，进而确定了战后英国的氛围和思想。

满足、愤怒的1950年代与多姿多彩的1960年代

1956年，约翰·奥斯本（Joho Osborne）在他的话剧《愤怒的回

顾》（*Look Back in Anger*）里，讲述了吉米·波特（Jimmy Porter）的故事。波特出身于工人阶级，读大学时辍学。他找到了跻身于体面的中产阶级之路，但却对这个找不到高尚事业的时代感到绝望悲伤。此剧得到了富裕阶层观众的好评。1956年，建筑家史密森夫妇、波普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都参加举办了一场题为“这是明天”的展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建筑风格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也是波普艺术在世界上的首次亮相。1960年，激进的《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开始发行。其编委会成员包括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小说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使得刊物声望卓著。该刊刊载的文章对当时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怒。1961年，4名来自利物浦工人阶级的歌手和乐手约翰·列侬（John Lennon）、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

862 和彼得·贝斯特（Peter Best）打出“甲壳虫乐队”的旗号，在利物浦的卡弗（Cavern）歌厅推出重金属摇滚乐歌曲。同年，来自牛津剑桥两校的阿兰·本内特（Alan Bennet）、彼得·库克（Peter Cook）、达德利·摩尔（Dudley Moore）和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在爱丁堡推出了英国战后以来最有趣的讽刺剧。1962年，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布莱恩·琼斯（Brain Jones）和基斯·理查兹（Keith Richards）开始推出他们的滚石音乐（Rolling Stones），将吉米·波特（Jimmy Porter）之类对世间的懊丧和绝望大肆渲染。1956—1962年，从牛津大学的公共休息室到利物浦的爵士乐歌厅，从大学教授到艺术学校学生，都怀有一种遍布英国的特别不安分的，具有反叛性而又富有创造力的情绪。文艺批评家可以在约翰·韦恩（John Wain）、艾伦·西利托（Alan Sillitoe）和约翰·布雷恩（John Braine）等一群最早的愤怒青年的小说里面找到这种情绪。

在这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眼中，1945年以后的十年中流行的那些思想、艺术形式和态度，都是枯燥无味、浅薄无益、令人厌恶之物。这种批评会令1940年代后期的中产阶级人士目瞪口呆，他们向来推崇

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的绘画、华丽·摩尔（Henry Moore）的雕刻和沃恩·威廉姆斯（Vaughan Williams）的音乐，并把他们视为第一流的艺术家。1940年代末期的英国戏剧，似乎也是第一流的。T. S. 艾略特（T. S. Eliot）和克里斯多夫·弗赖伊（Christopher Fry）的韵文剧本，显示了诗剧的文艺复兴。弗赖伊1948年写的《不该烧死她》（*The Lady's Not for Burning*）以及1950年写的《维纳斯探究》（*Venus Oberved*），都充满着灿烂的诗句、精巧的辞藻、浪漫的喜剧和娱人的忧郁。艾略特1949年的诗作《鸡尾酒会》（*Cocktail Party*），显得更为感情压抑，但保有他诗作那勃勃生气、深透内涵和凌厉锋芒的固有特色。

弗赖伊和艾略特的作品不会令眼界高傲的观众感到不安，亨利·摩尔的抒情诗和沃恩·威廉姆斯的田园曲也不会。弗赖伊向观众讲述罗马人、裘特人和英格兰人的故事，讲述一个高贵、安逸世界的消逝，以对宗教信仰、自我抑制和明快诗篇的丧失提供慰藉。艾略特也倡导宗教和传统，但其格调比较晦暗一点。他在《鸡尾酒会》里宣称，人们必须向社会和宗教寻求帮助，以维护现世的生命安全，因为现代世界的民主主义、怀疑主义和享乐主义对传统的真理以及维护这些真理的社会精英构成了威胁。同样令上层阶级感兴趣的，是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于1945年创作的小说《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作者坚决维护保守主义和天主教，反对社会主义和怀疑主义。1940年代末，英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最后一个高峰，这种文化顽固恋旧、保守固执，绝对不肯接受那些着眼未来和技术的趋势。而后者正是1951年英国大典（Festival of Britain of 1951）的主题。工党政府决定在万国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举办百年的时候举行庆典，向世界表明英国仍然是富有创造力的强国。

英国大典在泰晤士河南岸举行。其发明大厅陈列了雷达、喷气引擎和老式蒸汽引擎等等，这些都是对英国科技天才的不朽里程碑。其他展览厅馆内，也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英国产品，大都体现当代风格，以轻快、灵巧、舒适为主。这些设计，以及建筑设计，令850万观众

心满意足。《泰晤士报》称："人们都显得愉悦快乐。"沿泰晤士河而上，进入巴特西游乐场（Buttersea Pleasure Garden），800 万观众一边吃着棉花糖，一边坐着微型火车，人人兴高采烈。有一位英国人说，863 英国大典是"一条彩虹，这个炫耀的标志，一头连着暴风雨的尾巴，一头指向晴朗的天空"。大典标志着饥饿的 1940 年代的结束和另一个较为愉快的十年的开始。

太阳光已经透过了笼罩的乌云，宣布伊丽莎白新时代的到来。1953 年，英国人又举行了一次庆典，庆祝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加冕。1952 年乔治六世去世，标志着爱德华时代精神的终结，这种时代精神遭受打击和嘲弄，但延续下来，先后经历了一次总罢工、一次经济萧条、两次大战和几乎经历了一次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属于那丰裕、壮大、多元的中产阶级，1950 年代是他们的时代。这不是创造性艺术的时代，而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时代。

有关英国加冕典礼的最古老的文件，规定加冕典礼应当在全体国民的面前举行。这一规定的贯彻，从来没有像 1953 年 5 月这次加冕典礼这么彻底。全国半数国民在电视上看到贵族们穿着大礼服，女王戴着宝石王冠，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典礼向英国人民宣布了又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到来。德雷克（Drake）和雷利（Raleigh）的精神仍然存在。那天早晨的报纸宣布，英国人首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拥有新的市建公房、越来越高的收入、幽美的郊区环境、莫里斯牌汽车和奥斯丁牌汽车的英国人民都在享受伊丽莎白新时代。他们相信有些人的说法：英国人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日子。甚至连诗人和小说家也不去打扰这个时代的人们，让他们安享富足与节日。F. W. 培特生（F. W. Bateson）、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和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等诗人都避免浪漫主义的热烈或实验诗歌的晦涩，而尽量用合乎 18 世纪理性主义式的明晰诗行。培特生写道："教皇，你看，科学握着缪斯（Muses）的手，那大笑的色列斯（Ceres）重新耕耘大地。"金斯利·埃米斯也歌颂反浪漫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反放纵主义的审美观。在他的极受欢迎的小说，特别是 1954 年

出版的《幸运的吉姆》（*Lucky Jim*）中，埃米斯用传统的道德喜剧和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来告诫知识阶层的虚伪风气，褒扬人生的质朴乐趣。他告诉1950年代心满意足的读者，小说的目的是供人欣赏取乐。当时的读者接受了他的看法，内维尔·舒特（Nevil Shute）因此成为英国最走红的小说家。舒特的小说讲述波斯航班和澳大利亚森林大火的惊险故事，字里行间充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

富足的1950年代的心境是科学精神的而不是浪漫主义的，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充满了自我满足、享乐主义、布尔乔亚和保守主义。这是一个属于那些野心勃勃、春风得意、体制内的人员，他们拥有郊区别墅，遵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喜欢音乐剧、舒特小说、电视以及意大利咖啡馆。这是一种在当时非常普遍的、具有很大力量的心境，给英国生活添加了牢固的基础。这是遭到吉米·波特、《新左翼评论》和滚石乐团谴责的那种心境，曾被甲壳虫乐队、波普艺术家和撰写《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的4位讽刺作家斥之为荒唐可笑、华而不实之物。对于1950年代末的青年人来说，这种心境意味着陈腐自大、不着边际、微不足道和令人窒息，驱使他们要呐喊、激动、行动和妄为。

多姿多彩的1960年代，肇始于愤怒的新一代人对沉闷的1950年代的造反。这次造反由奥斯本笔下的愤怒的吉米·波特大声宣布开始。吉米·波特就读于一个地方大学，与一位上等阶层人家联姻，表现了出色的才能，拥有远大的前程。但是，他突然退学，落户于破败的街区，开了一个糖果店，猛烈抨击本可以助他成功的阶级。不过，这种成功需要他表示臣服，而且能带给他的东西也比牛津剑桥出身的人为少。约翰·布雷恩在1957年写的《顶层房间》（*Room at the Top*）中，也表现了那些向上进入了一个较高等级的人的同样感受，这个社会本身粗野不堪、竞争激烈、冷酷无情、伪善虚假、欺世盗名。布雷恩笔下的主角运用这一套恶劣品性爬上了最高层；而不肯屈服的吉米·波特以满腔的愤慨拒绝这些品性。艾伦·西利托的《长跑者的孤寂》（*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和约翰·韦恩1953年写的

864

《每况愈下》（*Hurry on Down*）都表现了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的青年，想挤入一个新的、变化迅速、部分流动和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愿望以及挫折感，这个社会本身缺乏确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而他们又丧失了原有的信念，这尤其令吉米·波特感到难受。他抱怨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想——“理性和进步”的丧失，而且“老店被变卖了”；也抱怨 1930 年代的政治事业的丧失——“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再也不用为正义的事业牺牲生命了，已经有人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里替我们这样做了。”

阿诺德·韦斯克（Arnold Wesker）将这种挫折感，写在《厨房》（*Kitchen*）一剧里面。这部话剧描写一个大餐馆里的奴役情况和大众剥削文化现象。韦斯克认为解决的出路在于教育和社会主义，而为促进教育和社会主义，他开办了一家为工人阶级设立的实验剧院。这家剧院彻底失败了，因为工人们不需要社会主义剧院，他们需要花哨的衣服、摩托车以及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唱片。当代的青年们在反抗他们的父母和使他们窒息的现代中学。他们想全身投入一个光耀夺目的世界，那里满是电子产品和塑胶制品新的摇滚音乐旋律。工人阶级的青年一点也不喜欢奥斯本和韦斯克，但非常喜欢是从美国传来的音乐节拍，滚石乐团将音乐厅的音响效果与愤怒、凶狠、挑衅和讹诈的言词巧妙地结合起来。在《街头勇士》（“Street Fighting Man”）这首歌里，贾格尔高叫：“我的名字叫捣乱，我要大声地喊叫，我要把国王给宰掉。”吉米·波特无法想出比滚石乐队更酷虐厉害的字眼斥骂世人，也比不上那些摩登派和摇滚派，这些都是出身伦敦东区工人阶级家庭的十几岁少年，生在 1960 年代，陶醉于这个时代的生活之中。摩登派都特别喜欢穿时髦的女性化服装，留长发，吸食毒品；身穿皮夹克的摇滚派则比较男性化，倾向于异性恋和暴力。在这之后，又出现了来自中产阶级的留长发的嬉皮士。他们成为滚石乐队、甲壳虫乐队和作为 1960 年代基础的商业主义的狂热听众和拥护者。

滚石乐队的核心——米克·贾格尔、布莱恩·琼斯和基斯·理查兹都属中产阶级，都从大学或学院辍学，而且都是富家子弟。他们不

像韦斯克和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那样给社会的失败者一番抚慰，而是发出半成功者以及成功者中的怀有挫折感的人的那种怒吼。这一怒吼使得10万青年人——大都是口袋里装满钞票、受过相当优越的教育者——于1968年聚集到海德公园，与迈克·贾格尔共同高唱喊叫《对魔鬼的同情》（“Sympathy with the Devil”）。

在多姿多彩的1960年代后面，远不止只是愤怒。事实上，甲壳虫乐队以及摇滚歌手、波普艺术家、诗人和各种各样的身着花衬衫、披着长发的青年人，比1950年代愤怒的青年人更加愉悦地享受生活。骑 865 在三股巨浪的浪尖上——经济富足、社会自由和婴儿潮，他们感到生活本身值得欢歌劲舞颂扬一番。甚至连他们富裕的父母也加入到这种狂热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之中，这些社会风潮浸润了多姿多彩的伦敦的时装店、男性商店、咖啡馆、爵士俱乐部、唱片店和艺术画廊。

但是，青年人最沉溺于当时的乐趣和高涨的期望值之中。清教的著名口号“不！”正在消失，青年人比老年人更加背离这个传统。允许取代了禁止：人们尽情赞扬享乐、自由和爱情。甲壳虫乐队总是首 866 先赞扬青少年的新生活方式、聚集在一起的自由和爱的快乐。乐队一首早期歌曲《她爱你》（“She Loves You”）的结尾是一串肯定词：“是、是、是！”摇滚乐中的伦敦一个快乐的、解放的世界，一个滚石乐队也在赞美的世界。这个世界给予多姿多彩的1960年代一种独特、丰富、古怪、幽默以及后来抑郁的格调。1967年，这种格调注入了甲壳虫乐队的唱片《培伯军士的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Sergean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他们唱着：“我们来到这里多开心，你们是多么可爱的听众。我们想把你们一起带回家去。”最后这句歌词能把成千上万的女孩们逗得尖叫狂呼，变成彻头彻尾的甲壳虫迷。甲壳虫乐队并不全是涉及两性，正如滚石乐队并不全是涉及愤怒一样，他们的曲谱和歌词即相当复杂又颇具品质，其内涵变得愈加强劲和深刻。

1966年甲壳虫乐队的那一首《便士巷》（*Penny Lane*），以嘲弄幽默、反复无常的口吻对郊区购物中心作了讥讽，要比那些以前的重

金属摇滚唱片强得多，那张《培伯军士的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唱片也与之相仿。对此，一位评论家认为该乐队“确实证明波普完全可以既是艺术，又能大众化，其影响既立刻见效，又持续永久”。同一评论者也认为滚石音乐，甲壳虫乐队一样，都具有开创性。1960年代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在音乐、绘画、服装、写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成千成百的人创造了新的样式。数十年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在向民众大力推广文化，大多数是莎士比亚和莫扎特水平的文化；而现在，民众却出乎意料地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一种明快的、欢乐的、解放了的和创造性的文化，同时也是愤怒的、短暂的和零散的文化。这时存有许多创造者和许多新创造，但均未能确立伟大和持久的风格。这个多姿多彩的1960年代，诞生于愤怒，却又不幸地终于愤怒。摇滚派用愤怒暴力在海滨袭击摩登派，大学生用愤怒暴力攻击大学，足球流氓用愤怒暴力在足球比赛时捣乱。在1970年代开始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从1945年以来，社会的不满变得越来越强烈。

我们的不满之冬

20世纪英国的最大悖论是：虽然大多数英国人从来不曾享受过这样多的富裕、自由和平等，这样多的科技进步，从来不曾这样长寿、这样健康，从来不曾获得过这样多的世界知识、追求到如此各色各样的美，然而他们却感到不满。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画家都证明了这一点，社会统计资料亦然。

小说家最早描写社会的严峻现实。1947年，马尔科姆·劳里（Malcolm Lowry）的《火山下》（*Under the Volcano*）描写了一个酗酒者在崩溃的世界中所经受的痛苦。30年后，莫里埃·斯巴克（Muriel Spark）在其小说《接管》（*The Take Over*）刻画了狡诈的律师、剽窃的艺术史家和不诚实的仆人，以及造假、褊狭、暴力和欺骗行径。人类的天性似乎没有长进。当代最有名的两位作家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和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所写的都是稀奇

古怪的人。在威尔逊看来，当时的这些怪人也反映了习俗和道德的沦丧以及欺骗、无序和仇恨等黑暗势力的释放。而对于艾里斯·默多克而言，一切真实、有价值和意义的准则，连同现实本身，都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一团主观的糟粕，谁也弄不清为何物。这种一切皆无意义感，到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怎么回事》（*How It Is*）那里，被发挥到极致，这是贝克特的第6部作品，也是英国人争相阅读的剧作。剧中描述了一个赤身露体的人在烂泥潭里爬过一些破袋子、生锈的罐头盒和其他垃圾。最后的结局是他在喃喃自语，不知所云，意指生命全无意义。

867

诗人的作品也相当幽晦。1970年代最走红的两位诗人是泰德·休斯（Ted Hughes）和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休斯在一首诗里写鬼蟹夜间登陆侵扰，清晨退回海里。他写道："我们什么也不是"，"脑筋出现短路失灵"，"历史的大混乱"，以及庞大的鬼蟹将一切扯毁。菲利蒲·拉尔金则有较明朗的一面，他写道，"一阵闪光的、满载着诺言的舰队"，但是舰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堆令人失望的废物"，"一个巨大、鸦雀无声的静"，和一艘挂着"黑帆的船"，"船后没有激起任何波纹"。思想的不确定性令诗人们十分苦恼，迫使最出色的诗人之一——汤姆·冈恩（Thom Gunn），诉苦道："我，生在迷雾之中，垃圾之中，走进假设的丛林。"

大多数的英国人喜欢上剧院，而不喜欢读诗。音乐剧令他们愉悦振奋，而严肃的话剧则无法收到这样的效果。约翰·莫蒂默（John Mortimer）的《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有力地描写了情感上的失败导致人们对宗教的需求，即使在不信上帝的时代也是如此。大卫·斯托里（David Storey）的《家》（*Home*）将受人尊重的制度描写成疯狂之举的避难所。哈罗德·平特（Harold Pinter）的《房间》（*Room*）设置了令人产生幽闭恐怖症的场景，在那里他笔下的主人公也成了疯人。这是生分疏远、丧失认知、理智崩溃和在此之上的荒谬怪诞的一种表现。平特的许多剧本，如同塞缪尔·贝克特的剧本一样，都成了很受观众欢迎的荒诞剧。

直到1976年，贝克特还是荒诞剧的权威大师，而伦敦的皇家戏院（Royal Court）在推出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之后21年仍然是荒诞剧的神坛。《等待戈多》描写两个流浪汉，徒劳地等待那神秘的戈多，或者说是等待无所不能的上帝。剧中充满了洋洋得意的、淡泊自定的和具有人情味的愉悦氛围。《那时候》（*That Time*，1976）只在舞台上展现主角——一个流浪汉的面部，由后台传来的话音讲述他的过去，描写这个流浪汉的落魄生活。与此剧同时上演的《脚步》（*Footfall*），描绘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在台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却找不到答案。这样，贝克特以十分极端的方式将人的一切伪装全部剥去。其手法与这个不满时代的英国主要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如出一辙。培根创作的人物，呈半人半兽状，无一例外地被困在空间封闭、比例失调、房顶很低的房间里，常和一块块的生肉为伴，很像是从被困者身上撕扯下来的肉块，似乎人也属于屠宰场里的一部分，这些人物的脸孔，都充满着无知的怨恨和贪婪，令观众想到奥斯维辛和广岛所发生的事情。

1962年，英国人蜂拥到泰勒画廊去欣赏培根的这些画作。他们也去欣赏贝克特的剧作。这许多关于人生的枯萎的、野蛮的描绘，是反映了少数人私下的痛苦，还是大众的帮忙？某些社会事实表明答案是后者。全国各地的不满有增无减。备受困扰的实业家酗酒，无助的家庭主妇服用安非他命，青年人则吸食各种毒品。媒体报导人们吸食毒品和酗酒的现象十分严重。试图自杀的人数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暴力事件不断增加：1974年，由于埃塞克斯大学的学生损毁了价值32000英镑的财产，警察逮捕了100个学生。1970年，德比的足球流氓将12名足球观众打伤。当然，这比种族骚乱和所谓的“揍扁巴基斯坦人”的袭击要温和得多。1953—1978年，犯罪的数字持续上升。经过逾百年前所来有的公正廉洁之后，政府内的腐败现象又出现了。社会上离婚率增加，而生育率降低。英国人现在平均每对夫妇只有2.2个子女。

868

在新城镇、高楼大厦、甚至在古老的乡村里，人们无根的空虚之感越来越强烈。村上的一个铁匠说，“阿肯费尔德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越来越不满。”阿肯费尔德（Akenfield）是罗纳德·布莱斯（Ronald Blythe）用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萨福克村庄的假名。村里的教区几乎空空如也，酒馆的客人越来越少，再也没有在这唱歌了，而且婚姻破裂的家庭越来越多。这个村民曾经贫穷、但很满足的村庄，而今却只听到村民在谈论“人人都是你争我夺”、“贪婪无厌”，“再也没有人愿意同舟共济了”，以及人人都“关在房屋里看电视”等等。然而，阿肯费尔德是一个相当繁荣的村庄，一个最终消除了封建差异的村庄。

为什么繁荣的英国会产生不满呢？保守派指出原因在于教育的普及和教养的放纵，宗教界认为是宗教信仰的衰落，哲学家们认为是理性信念的丧失，而道德家则认为是物质主义的泛滥。教会信徒和做礼拜的人数都在减少。每10人中只有1人正常参加教堂活动，这些人构成了670万英国国教教徒中的120万人和350万天主教徒中的130万人。而伊斯兰教徒中，有高达70%的人参加各项宗教活动。基督教会中规模得到扩大到，圣灵降临节教派和西印度群岛移民的教会组织，但其教徒合起来仅占基督教徒的8%。所以，这是一个怀疑的、混乱的和各种信仰杂陈的时代。信仰对象包括瑜伽、禅宗真言等等，甚至对科学家和当代高僧而言，这也是些支离破碎的、相对的和不确定的信仰。电视、大众出版物、无线电台和平装书展示了大量的事实和见解，其范围涵盖飞碟、新原子、日益膨胀的星系以及已灭绝的文化等等，极为丰富和充沛，以至于造成了混乱。13世纪重视信仰信条的时代、18世纪崇尚自由法则的启蒙时代以及19世纪强调道德观点的维多利亚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物质主义、互相攀比以及越来越高的期望。

1976年，社会学家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说：“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体系都牢固地建立在物质主义之上。”他又表示，这也是一种平均主义，“染上了嫉妒的色彩”。当问到是愿意自己每星期加

薪5英镑，而其他人加薪6英镑，还是愿意所有人每星期都加薪4英镑时，结果85%的人都选择后者。嫉妒现象也出现在国际层面上。1978年，英国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足，但是从1954年以来，英国在世界工业国家中的地位便从第3位降至第8位，而且其增长率也远落后于法国与德国。于是，杂志上文章指称英国人沉溺于过去的美好时光，患上了忧郁症，一指这个国家有自杀的倾向。这种忧郁症的病因是来自因不断提高的期望值所造成的挫折感。这些期望值是指富足的1950年代在物质方面的期望值和多姿多彩的1960年代在理想方面的期望值。对于许多人而言，“一个闪光的、满载着诺言的舰队”，变成了“一堆令人失望的废物”。

869 但是，英国人1970年代的不满，只是英国社会许多种情绪和看法中的一种而已。有如地质学上的地层构造，这些情绪和看法十分复杂、多种多样。不满与巨大的满足相互重叠交错。都铎时期的郊区别墅与洗衣一干衣机和不断增加的收入，给无数英国人带来了幸福。这种满足层面甚至覆盖和吸纳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和爱德华时代的优雅风格。在这诸多层面之上，是1960年代的那一层，包含了自发性、流动性、个性化社会解放、摇滚音乐，以及愤怒、毒品和对鲜花佳人的幻觉。而深入所有层面的，则是从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和W. C. 吉尔伯特（W. C. Gilbert）以来就有的英国式的机智和幽默。这种机智和幽默，使贝克特的流浪汉不会感到绝望，使培伯军士的忧郁转化为喜剧和解脱，使滚石乐队的粗重旋律变成一种新颖。这种机智和幽默，也使三种不同的评论家将音乐厅单列出来，认为它对贝克特、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是这种产于本土的幽默及其模仿，使许多人能够忍受19世纪的870 工厂生活；加上伦敦诙谐的方言和斯多葛式的宣示，化解了1970年代的许多不满，如同其减轻了欧战壕沟的痛苦一样。这种机智，在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里得到了卓越的表现。这种机智承认世界的荒谬、真理的破碎、美的相对性和幻想的无处不在。但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创造能力、优雅灵巧的诡辩能力和对喜剧方法的妙用，都能令观众忘却

通货膨胀和缓慢的增长率。在斯托帕德的《跳跃者》（*Jumpers*）一剧里，体操运动员、哲学家和侦探们以令人惊叹的机智讨论万花筒一般的人生意义。在《滑稽模仿》（*Travesties*）一剧里，列宁、乔伊斯和一位达达艺术家争论绘画、政治以及人生问题。全部对话都充满激情：对严肃的道德问题和政治事业大加嘲讽，还在艺术的实在性、历史的相对性和人生的虚幻性之间进行了对比。斯托帕德的戏剧的机智和卓越与萧伯纳的戏剧不相上下，驳斥了有关英国文化没落的说法。

这证实了英国数世纪之久的智慧和适应能力。本书所述英国历史的事实，有很多都未能持久存在于世：将秩序和安定带给英国的封建制度；将一切都归于上下有序的等级制度的伊丽莎白时代体系；世界最伟大的大英帝国本身；英国在工业方面的霸主地位等等，都已不复存在。可是，有些要素留存了下来，至今未变。英国历史经过了无数转折，确实产生出一种民族特性。时至1978年，这种民族特性还是存有不足之处：在对待英国莱兰公司的劳资纠纷中所做的与克里米亚战争时一样的霸道武断；在对待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移民事件中还是像18世纪对待偷猎犯一样的傲慢残忍；在对待贫民时仍然与以往一贯所持的态度一样麻木不仁。

但是，英国民族特性也有积极的方面。英国的民族特性和制度，造就了世界上最为出色的文化之一。英国人英勇果敢、百折不挠、沉着冷静、坚忍克己：英国的步兵，虽然军官指挥不力，但仍赢得克里米亚战役的胜利，在西线击败德军，为英帝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英国人讲求实际、创造力强、重视经验、埋头苦干：他们圈耕重质黏土耕地，发明了蒸汽机，完善了代议政治和使之民主化。英国人富有求知欲、好奇心和想象力：他们中间产生了牛顿、达尔文、法拉第和拉特福德。虽然在音乐方面不如德国，在绘画方面不如法国，但是英国人爱好文字和运用文字的天才，因而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这种文学具有深刻的悲剧色彩、高超的表达能力、喜剧格调的模仿讽刺——简言之，就是各式各样智慧集大成之产物，犹如一缕金线，将英国的全部历史融会贯通。英国的智慧，加上其创造才能、实用主义、

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忍克己的毅力，必能阻止原子战争，确保英国历史的长久延续。对“一堆令人失望的废物”，如果能来点幽默，其负面含义必大为减少。

阅读文献

Ronald Blythe, *Akenfield* , London: Penguin Press, 1969. 该书极出色地描绘了20世纪萨福克一个小村庄及其居民的状况。其资料来自大量的采访记录，文字功夫可与小说家相媲美。

871 John Colville, *The New Elizabethans, 1952—1977* , London: Collins, 1977. 作者通过缜密地考察英国宗教、道德观、教育、艺术和礼仪，全面概述了其政治、政府、经济、经纪人和在世界上的位置。

C. B. Cox and A. E. Dys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nd: History, Ideas, and Literature in Britain* , Vol. 3, 1945—19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这是一部最出色的20世纪英国思想史著作。作者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探讨了最深奥的思想发展问题。

Hunter Davies, *The Beatles* , New York: McGraw-Hill, 1983. 该书对甲壳虫乐队作了生动、公正、深刻和彻底的考察。作者与该乐队共同到各地巡游达16个月之久，并对几乎所有知情人都作了采访。

A. H. Halsey, *Change in British Societ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该书对今日英国在其延续和变革两方面作了绝妙的社会学研究，强调阶级、种族歧视、财富分配不均和教育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但仍发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流动性。

Arthur Marwick, *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 , London: Allen Lane, 1982. 作者对40年的社会发展作了分析，资料翔实，想象丰富，特别强调了宏伟希望的丧失、传统枷锁的打破和社会宽容的存在。

George Melly, *Revolt Into Style* , London: Allen Lane, 1970. 该书对多彩多姿的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音乐、文学和艺术，以及这十年的电影、电视、戏剧和时尚，作了最具洞察力和同情心的阐释。

Anthony Sampson, *The Changing Anatomy of England* ,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1. 这是作者剖析英国的三部曲中的最新一部，资料十分丰富，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教会和王室等方面。

Norman Shrapnel, *The Seventies : Britain's Inward March* , London: Constable, 1980. 作者指出了多姿多彩的1960年代留给下一个十年的遗产，主要有：失业、阶级和种族摩擦、各种危机、暴力和退化的语言。

Michael Sisson and Philip French, eds. , *Age of Austerity* ,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63. 11名学者以赞美的笔调记述了多姿多彩的1960年代之前的15个年头的历史，揭示了一项宏大的社会实验充满理想主义和参与精神的过程。

Michael Young and Peter Willmott, *The Symmetrical Family : A Study of Work and Leisure in the London Region*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基于采访和社会调查，两位社会学家描述了因避孕、繁荣和药物所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结果是子女减少、工作机会增多和人的寿命延长。

附　录

国王和女王（1715—1990 年）

乔治一世
（George I），
1714—1727

乔治二世
（George II），
1727—1760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1760—1820

乔治四世
（George IV），
1820—1830

威廉四世
（William IV），
1830—1837

从乔治一世到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君主，均来自不伦瑞克家族（House of Brunswick），亦称为汉诺威家族（House of Hanover）。

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1837—1901

爱德华七世
(Edward VII),
1901—1910

作为维多利亚女王和来自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House of Saxe-Coburg-Gotha）的阿尔伯特（Albert）亲王之子，爱德华七世属于该家族。但其家族的德意志名称促使乔治五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德高潮中，将它改为温莎家族(House of Windsor)。

乔治五世
(George V),
1910—1936

爱德华八世
(Edward VIII),
1936—1937

乔治六世
(George VI),
1937—1953

伊丽莎白二世
(Elizabeth II),
1953—

873

英国首相

（以下表中所有首相任期均到其继任者开始任职为止）

姓名	开始任职时间
罗伯特·沃波尔 爵士（Sir Robert Walpole）	1721 年 4 月
亨利·佩尔汉姆（Henry Pelham）	1742 年 2 月
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	1754 年 5 月
威廉·皮特（老）（William Pitt, the Elder）	1756 年 12 月
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	1761 年 10 月
比特伯爵（Earl of Bute）	1762 年 5 月
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	1763 年 4 月
罗金厄姆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	1765 年 7 月
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	1766 年 8 月
诺思勋爵（Lord North）	1770 年 2 月
罗金厄姆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	1782 年 3 月
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	1782 年 7 月
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	1783 年 4 月
威廉·皮特（小）（William Pitt）	1783 年 12 月
亨利·埃丁顿（Henry Addington）	1801 年 2 月
威廉·皮特（小）（William Pitt）	1804 年 5 月
格伦维尔勋爵（Lord Grenville）	1806 年 1 月
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	1807 年 3 月
斯潘塞·帕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	1809 年 9 月
利物浦伯爵（Earl of Liverpool）	1812 年 6 月
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	1827 年 4 月
戈德里奇子爵（Viscount Goderich）	1827 年 9 月
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1828 年 1 月
格雷伯爵（Earl Grey）	1830 年 11 月
墨尔本子爵（Viscount Melbourne）	1834 年 7 月

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	1834 年 12 月
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	1846 年 7 月
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	1852 年 2 月
阿伯丁伯爵（Earl of Aberdeen）	1852 年 12 月
帕麦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	1855 年 2 月
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	1858 年 2 月
帕麦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	1859 年 6 月
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	1865 年 10 月
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	1866 年 6 月
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868 年 2 月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68 年 12 月
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874 年 2 月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80 年 4 月
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	1885 年 6 月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86 年 2 月
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	1886 年 8 月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92 年 8 月
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ry）	1894 年 3 月
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	1895 年 6 月
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	1902 年 7 月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 Bannerman）	1905 年 12 月
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	1908 年 4 月
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916 年 12 月
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	1922 年 10 月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1923 年 5 月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	1924 年 1 月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1924 年 11 月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	1929 年 6 月

874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1935 年 6 月
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	1937 年 5 月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940 年 5 月
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	1945 年 7 月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951 年 10 月
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	1955 年 4 月
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1957 年 1 月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Sir Alec Douglas-Home)	1963 年 10 月
哈罗德·威尔逊爵士（Sir Harold Wilson）	1964 年 10 月
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	1970 年 5 月
哈罗德·威尔逊爵士（Sir Harold Wilson）	1974 年 10 月
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	1976 年 4 月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1979 年 5 月
约翰·梅杰（John Major）	1990 年 11 月
托尼·布莱尔[①]（Tony Blair）	1997 年 5 月—

① 戈登·布朗 2007 年 6 月 27 日起任首相。另外，原文表中有错漏之处，仍按原文译出。——译者

索 引

（索引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后记

自2007年夏末开始，历经一年有余的窗前灯下笔耕，并幸得前后五届研究生和其他青年学者的参与，这部洋洋近百万字的《英国史》巨著的翻译工作终于得以完成。掩卷搁笔之时，不禁生出一些感想和思绪。

当今的英国似乎只是位于世界地图左上角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国，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欧洲地区的一个大国而已。然而，英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其曾经控制的地域遍布世界各大洲，因此英帝国也有足够的底气号称为“日不落帝国”。而且，英国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在制度建设、文化演进和现代化进程等方面，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和影响。纵观当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主要构成，虽然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其具有现代意义和形式的制度均创建于英国，如议会制度、内阁制度、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曾经风行一时、目前仍在不少国家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也是英国的发明创造。在经济上，英国的重商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以及相配套的银行制度、保险制度、海关制度、证券交易制度、货币制度、贸易制度等等，确立了现代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是近现代历史上最为突出的制度创新国家。此外，在法律上，英国创建的普通法体系（亦称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之一，在英语国家中得到普遍使用。在语言上，英国的语言——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其语言霸权

由于曾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的“一超”地位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而对于各国普通民众来说，英式足球带来的乐趣和愉悦更是难以复加，无愧于世界第一运动的称号。

除此之外，英国这个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大国所做的两件大事是工业化和殖民化。英国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中的重大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开始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此通过工业化向整个世界的扩散，人类向前迈进的速度日新月异，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积极作用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恩格斯这样评价英国工业化所带来的变化：“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很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①] 近代的殖民化，并非适于英国，但其中最为成功者，非英国莫属。殖民化的主要作用和后果就是将整个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成为西方殖民国家的原料来源、销售市场和剩余人口输出地；同时西方国家通过掠取世界各地繁荣财富，一跃成为富裕的发达国家，建立起对非西方世界的霸权。殖民化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应当予以有力的批判和谴责。同时，殖民化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向落后国家和地区传播先进文明的作用，那些仍处于封建社会和前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在外力的强制作用下开始进入更高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因此，马克思在严厉批判殖民主义种种罪恶的同时，提出了“双重使命说”。总之，工业化和殖民化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有目共睹，而英国的作用，于前者是始作俑者，于后者则是集大成者。

在工业化和殖民化的进程中，移民的作用尤为值得关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勃然兴起，一批移民国家的

---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页。

形成更是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工业化制造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和劳动力，为移民运动提供了庞大的移民来源；殖民化抢占了广阔的殖民地，为移民运动开辟了充分的移居地。根据对英国和世界殖民化及移民历史的研究，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种类型殖民地：第一种是移民型殖民地（immigration colonies），其中来自欧洲宗主国的白人移民是殖民地人口的主体，占绝对多数，而土著居民则遭到大规模杀戮或驱赶以及染上殖民者带入的疾病，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对少数。移民将母邦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带到殖民地，并仿照母邦的社会模式来进行开发和建设，因而在各个方面与母邦十分相似，可以视作母邦文化的延伸和扩展。土著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完全退出主流文化的范畴。这种殖民地实际上是宗主国的拷贝和复制品。在英帝国内，北美、澳洲殖民地就属这种类型。第二种是非移民型殖民地（non-immigration colonies）。宗主国派遣政府官员、经济管理人员和专门技术人员、军警等专政力量到殖民地进行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军事控制，宗主国的白人移民很少，只在当地人口中占很小的比例，宗主国的文化很少超出白人统治者的狭小范围之外；而土著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权力得到保留，土著文化仍是当地的主要文化模式，土著人口占绝对优势。英属亚非拉殖民地大多属这种类型。除以上两种较典型的殖民地外，还有一种为人们所忽视的类型，即二元型殖民地（dual-element colonies）。① 对此，国内外学界尚未见专门提及，也没有将殖民地专门划出这一类型或确定该类殖民地名称或类似名称。② 笔者的观点是：在这种殖民地中，白人移民虽然掌握

① “dual-element colonies”系笔者自创的对于“二元型殖民地”的英文译名，旨在反映这种类型殖民地的二元文化特征。

② 西方学者提出的“争夺定居型殖民地”（contested settlement colonies），其强调的特征是移民“往往建立自己的政府，独立于母国，或者甚至违抗母国”（They tended to develop their own government, independent of, or even in defiance of, the parent country.），与笔者的观点不同。而且笔者有关二元型殖民地的观点在1993年就已明确提出。参见：John W. Cell, “Colonialism and Colonies”, in *Microsoft Encarta Reference Library 2004* 和 潘兴明：《中非“白人国家”及其崩溃之原因》，载《世界历史》1993年，第6期，第24页。

了政治统治权、经济支配权和军事控制权，移民人数较多，形成一定的（或较大的）规模，在当地总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并且形成了白人社区和文化圈，但仍然在殖民地人口比例中居少数地位。同时，土著居民虽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土著首领的传统权力得到保留，其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在土著居住区内也得到延续，土著人口也占明显的多数。因此，这种殖民地在文化和社会（含种族）上呈二元性质和特征，殖民者文化和土著文化并存、移民社会和土著社会并存，其界限呈相对泾渭分明的状态。英属殖民地中的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就属这种类型。

在以上各种因素的合力之下，英国现代化得以开启和演进，英国的国力和发展水平也在19世纪中叶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然而，由于国内创新能力下降、帝国负担加重和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英国在帝国“斜阳西下”之中，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和消耗，退出了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尽管如此，英国现在仍然通过英联邦、八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等平台，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一个地区大国的作用。

本人于1978年到六朝古都——南京开始大学本科阶段的求学之路，专修英国语言文学。研究生阶段师从我国英国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王觉非先生，学习和研究英国历史。南京大学北园的图书馆和西南楼的英国史藏书室为我打开了最初的研究资料大门。作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钱乘旦学长领军的学术团队中的一员，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水平得到开拓和提高。南大深厚的学术底蕴、严谨的学术风气和宽松的学术氛围都使本人获益匪浅，能够在学术生涯中有所长进、有所贡献。研究的具体领域由英国国内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到帝国和联邦，再到英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华关系等等，从内政到外交均有涉猎。而对英国及历史了解得越多、研究得越深，越是觉得自己知识的不足和认识的肤浅。因此，阅读有关最新研究的高水平著作成为一种必须，这本由克莱顿·罗伯茨等撰写的《英国史》正是这样的著作。同时，对于研究者，本书是一本十分出色的参考书和资料来源；对于普通读

者而言，本书是一本知识丰富、具有一定可读性的历史知识性读物。

这本《英国史》的翻译工作由本人和华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潘兴明：序言、第一—三、十六—十九、二十五—三十一章、附录、索引；李冠杰：第四—五、二十—二十四章；左敏：第十三—十四章；张芬：第六章；丁福金：第七章；王婷婷：第八章；刘冬青：第九章；许赟：第十章；周鹤：第十一章；原杨：第十二章；刘芳：第十五章。全书由潘兴明校阅、通稿。另外，原杨参加了部分文字校订工作，王婷婷、刘芳参加了地图、索引部分的翻译工作。本书第十六—三十一章的翻译，参考了鲁光桓先生的译本，特此说明并表示感谢。商务印书馆和张艳丽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岳秀坤编辑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潘兴明

2008 年 12 月 29 日于雨中的丽娃河畔